

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
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
——毛泽东

中国人眼中的 朝鲜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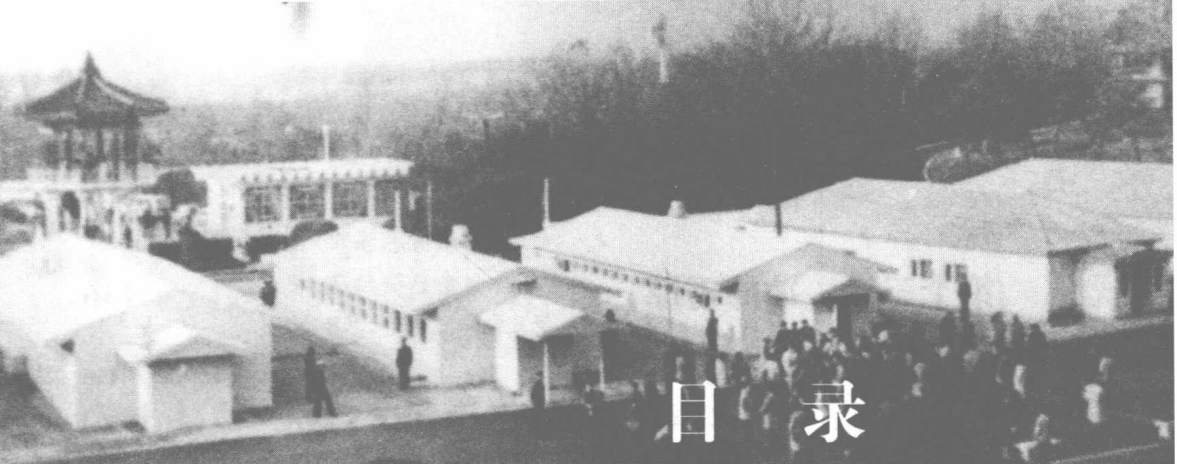
[下册]

罗学蓬◎著

中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

下

罗学蓬 著



中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

第十章	蓝天上不乏中国英雄的名字	343
	1. 碧眼金发的“中国少数民族志愿军”	343
	2. 美国人与苏联人心照不宣	349
	3. 中国的飞行员上了天	354
	4. 被尘封半个世纪的功勋	361
	5. 不打不相识	370
第十一章	将军行	377
	1. 瘸子将军	377
	2. 死神的味道	384
	3. 大将军一诺千金	390
	4. 情山恨海	399
第十二章	纸老虎还是真老虎?	410
	1. 我是“起义战士”，不是“解放兵”	410
	2. 骡马队长口中的“朝鲜战事”	418
	3. 第9兵团仓促入朝	426
	4. 树桩人	432
	5. 惊破霓裳羽衣曲	436

	6. 美国兵可不是纸老虎	446
第十三章	冰峰雪原	456
	1. 叫花子与龙王爷比宝	456
	2.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463
	3. 白的雪，红的血	472
	4. 雪夜惊魂	479
	5. 美军老兵口中的新兴里之战	485
	6. “大白鲨”破网而出	490
	7. 美国人建座大桥像玩积木似的	501
	8. 将军泪	509
第十四章	要么投降，要么战争	516
	1. 拳头是最好的外交	516
	2. 老兵凋谢	526
	3. 过不过“三八线”是政治问题	533
	4. 血涌大江	538
	5. 谁先攻入汉城，谁将载入史册	549
	6. 18勇士夜袭水原城	557
	7. 千万人中独识君	561
第十五章	悲喜英雄	567
	1. 令人拍案叫绝的战地故事	567
	2. 大资本家的儿子也立功	575
	3. 从“违犯军纪”到“重如泰山”，再到……	581
	4. 第一位高呼“向我开炮”的英雄	587
	5. 金日成、邓小平共同关注的英雄	599
	6. 救命菩萨	612
第十六章	为什么停止进攻	621
	1. 轮番作战	621
	2. 摩拳擦掌，壮志难酬	630

3. 轰动西方：“志愿军大规模屠杀美军战俘？”	633
4. 彭老总害怕什么	639
5. 彭德怀与金日成的争执	646
6. 8天，8天，还是8天	660

第十七章 战与和的两手准备 670

1. 美国人决定和中国人赌一把	670
2. 榜样的力量	682
3. 先胜后败	687
4. 一个体面地走向谈判桌的契机	694
5. 金城：最后一战	706

第十八章 尾声：谁是胜利者 716

胜利者不需要解释	716
----------	-----

第十章

蓝天上不乏中国英雄的名字

1. 碧眼金发的“中国少数民族志愿军”

1956年初夏，虽然停战协定签订已近4年，150万中国人民志愿军与以美国为首，总数不下百万的“联合国军”，仍然隔着“三八线”虎视眈眈。

战争并未死去，它只是累了，靠着以一纸飘飘的停战协定做的枕头，在喘口气儿。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一年的6月6日，一年一度的苏联航空节在莫斯科举行。与往届不同的是，为了沟通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打破僵局，苏联还邀请了美、英、法、意等28个国家的航空代表团到会。

中国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也率领中国航空代表团应邀前往。

苏联航空节的第二天，东道主特意安排了一次苏联国家党政军领导人与各国代表团会面的宴会。主持这次宴会的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首先举杯祝酒，然后请刘亚楼讲话。

刘亚楼的讲话译成英文后，与他只有一座之隔的美国航空代表团团长、空军上将特文宁立即站起身来，笑容满面地与刘亚楼碰杯。

时为刘亚楼秘书兼翻译的孙惟韬许多年后回忆说：“这一碰杯不要紧，记者们非常敏感，马上拥住刘亚楼提问题，问这是不是抗美

援朝战争结束以后，中国将军和美国将军第一次碰杯。刘司令员说是的。记者紧跟着又问这是不是象征着中美两国友谊的开始，刘亚楼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当然是的。”

世界再一次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中美空军，如同关注不久前发生在朝鲜半岛的那段空中往事……

1950年10月19日傍晚时分，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跨过鸭绿江，开始历时近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临行前，彭德怀留给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一句话，“我等着你的空军呐”。

也许是被毛泽东的果敢决定所感动，也许是受到志愿军初战告捷的鼓舞，在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取得胜利之后，苏联空军终于在11月1日这一天开始出现在鸭绿江上空了——这仅仅是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12天以后，而不是斯大林承诺的两个月到两个半月之后。

战争初期，美国空军动用了44个驻扎在远东地区航空大队的657架作战飞机来对付北朝鲜。美国航空兵对平壤附近的北朝鲜空军基地进行了接连不断的密集轰炸之后，金日成的空军实际上已经被彻底摧毁，完全失去了作战能力。而中国空军的作战部队当时还没有真正组建起来。所以，能够对付美国空军，而且首先出战的，主要是来自苏联的航空兵。

别洛夫航空师是在朝鲜参战的苏联空军第一支部队。从别洛夫将军到每一个士兵，均穿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服装。

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大将给斯大林的战况报告称：1950年11月1日这一天，参战的苏联飞机在丹（安）东—新义州地区投入战斗，“我们的飞行员用米格-15飞机击落了两架F-82，另两架飞机是被高射炮击落的。共击落4架飞机。在空战中，我方没有损失飞机”，“别洛夫同志的米格-15是从沈阳和鞍山两个机场起飞的，每个机场共起飞了8个架次”。

第一次空战取得胜利后不久，苏联空军在驻守沈阳地区的第151和324两个歼击机师的基础上，组建了由别洛夫少将指挥的第64独立歼击机航空集团军。后来，格奥尔基·阿盖耶维奇·洛博夫中将继任第64航空集团军司令，负责指挥在朝鲜战场的所有苏联空军部队。

苏联空军的主要任务是保护鸭绿江上的桥梁、发电站和大坝，以及在中朝边境以南75公里之内北朝鲜领土上的交通线和飞机场。

不久，该航空集团军又进驻到中朝边境上的丹东机场。仅在11月上半个月，苏联飞行员便取得了击落23架美国飞机的优异战果。同时，斯大林决定分两批再为别洛夫增派120架米格-15新式战斗机。

除了米格-15飞机的性能可以同美国的F-86飞机相匹敌外，苏联空军在朝鲜战争中的整体实力与美国相差很远。不仅飞机和飞行员以及后勤人员的数量大大少于美国，而且在地面导航、无线电干扰、雷达侦察、通讯等技术装备方面也十分落后。至于为空勤人员提供的服务和生活条件，更是远远不如美国。

不过即便如此，苏联喷气式歼击机投入战斗以后，还是对朝鲜的整个空战局面有着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对被称作“空中堡垒”的美军B-29战略轰炸机造成了极大威胁。

身穿中国志愿军军装的苏联飞行员与B-29轰炸机多次交锋，每一次交锋的结果都是美国人遭受沉重损失。因为这种4个发动机的轰炸机价格非常昂贵，而且每架飞机有10至12名机组人员，一旦被击落，就是机毁人亡，给美国人造成了极大的打击。

到1950年11月底，美国远东空军司令部已经感到非常头痛，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在靠近鸭绿江的地区，为那些实施战略目标轰炸的美国飞机提供安全可靠的保障。

11月6日，美国驻远东空军司令乔治·斯特拉特迈耶将军命令自己的战略轰炸机兵团摧毁鸭绿江上6座战略桥梁和北朝鲜的10个边境城市，但是苏联空军的加入使美国空军没有能够完成任务。

过去，美国飞机可以在300米低空俯冲轰炸，还可以反复轰炸，而现在苏联防空火炮的对空射击，迫使美国的战略轰炸机只能在6000—7000米以上的高度实施轰炸，这就大大降低了它投弹的准确性；而性能优越的米格-15飞机的参战，又迫使美国轰炸机只能在目标区域停留很短的时间，这样也阻滞了美国空军执行它的轰炸任务。

战争开始以来，美军的空中优势第一次被打破了。

尽管如此，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仍然拥有强大的空中力量，特别是随着中国军队的向南推进，后方补给线不断延长，遭受美国空军轰炸和袭击的威胁，也就越来越严重。

显然，苏联空军要是只局限在鸭绿江上空作战，就远远无法保证中国军队的物资和兵源补给。为了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交通运输线，经与苏联政府商定，自1951年1月10日起，由别洛夫集团军出

动两个师，掩护集安至江界、丹东至安州两条铁路运输线，以保证后勤供应。

但江界距中朝边界只有几十公里，米格-15在万米高空作战，实际上仍等于是在中朝边界上空。丹东至安州铁路在沿海，而苏联空军禁止在沿海40公里以外上空作战，以防止飞机被击中后飞行员跳伞落海，成为美国海军的俘虏。

而这个时候中国志愿军已经打到了“三七线”，后方补给线长达500多公里。苏联空军由于自己的基地在中国境内，受到飞行距离的限制，无法进一步南下，这就致使中朝联军在江界、安州一线以南地区的物资运输和部队调动，完全处在了“联合国军”空军的威胁之下。

彭德怀在战后的一次总结会上说道：“朝鲜战场我军是‘一军对三军，一线对三线’，就是我方只有陆军，而敌方是陆、空、海三军；我方只在陆地战线上打击敌军，而敌军除陆地战线，还可以从空中、海上向我进行攻击。”

彭德怀提出亟需解决的是后勤运输问题，而要保障铁路和公路运输线，就必须得靠加强空中掩护。

于是，彭德怀专程回国寻求援助，可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大将却回避表态，彭德怀为此对扎哈罗夫大发雷霆，甚至拍了桌子。

其实彭德怀找错了对象，扎哈罗夫没有得到国内的指示，自然不敢对他做出任何承诺。事后彭德怀也向中央作了检讨，承认当时对苏联朋友发脾气不对。

不过，这样一来，反而推动了问题的解决。

周恩来在2月26日以毛泽东的名义拟了一份给斯大林的电报，经过毛泽东审定后，3月1日发出。

这个电报提出：组成三批部队轮番作战，准备“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军几十万人，使美国知难而退”，以彻底解决朝鲜问题。

电文中还反映了彭德怀强烈希望苏联尽快派空军进驻朝鲜境内，掩护朝中军队的后方交通。

斯大林于3月3日回电毛泽东说：“如果您能够在丹东地区留两个中国空军师掩护当地的电站和交通线的话，我同意将别洛夫将军指挥的第151和第324两个歼击机师的基地转移到朝鲜境内去，以掩护中

朝军队的后方。如果朝鲜已有一条钢板飞机跑道，那我们可以从苏联再提供两条钢板跑道。同时必须建立不少于4个混凝土跑道的机场，因为钢板跑道不够。我们希望建设工程在劳动力和物资上将得到保障。如果您同意，我们可以提供高射炮以掩护机场，并向您供应高射炮弹。今年下半年我们还可以供应6000辆卡车。”

但问题是朝鲜境内没有可以利用的机场，原人民军的机场遭到美国空军的轮番轰炸，损毁得十分严重，已经全部无法使用。

于是，苏联空军能否入朝作战的关键，就在于朝鲜机场能否尽快得到修复了。

周恩来根据斯大林3月3日回电，在3月4日同扎哈罗夫总顾问商讨了中、朝、苏空军入朝作战和修复机场等事情。5日又派空军司令刘亚楼和苏联空军顾问飞往东北，同东北军区的苏联顾问进行商谈。

3月15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说苏联决定再派一个3团制空军师（90架喷气式战斗机）到丹东地区，以便使中国空军在丹东的一个师，前推到平壤地区作战。

同一天，周恩来致电柴成文转金日成，并告彭德怀，通报了苏联来电的内容。

周恩来指出：“现在朝鲜境内抢修足够的机场，已成为目前争取苏联空军早日参战的中心课题。为完成此项任务，只要中国能办到的，我们决尽一切可能加紧准备。但沙石、洋灰与人工，则必须请朝鲜方面解决，特别是人工最为重要。”

3月22日，周恩来又给彭德怀和高岗发电报，通报中、朝、苏三方空军入朝作战前的兵力准备、机场修建情况和对指挥机构设置的意见。中、朝、苏三方准备进入朝鲜境内作战的空军部队将增加到17个团，即中方10个团，朝方3个团，苏方4个团，飞机总计509架，如果再加上苏联空军在丹东的飞机，就是599架。

电报说，目前不论作战，不论运输，都以争取尽快修好机场，以利苏联空军率先出动掩护为中心一环，故只有以战斗部队修筑机场，才能完成此项任务。

经过反复的研究，目前不管在人力、物力、运输、掩护诸方面，都不可能做到所有机场同时动工，只能采取逐步进行的方针。

因此决定第一步由中方负责，先在平壤以北安州以南地区内修建4个机场，让苏联空军的两个师120架飞机能同时进入这个地区作战。

朝鲜方面负责在美林、平壤、力浦、温井里、安岳等地，首先修建两个喷气式机场，使中国空军可以先进去一个师。

在空军指挥方面，苏方3个师成为独立的指挥系统，由别洛夫将军指挥，中方和朝方仍是空军联合司令部，归中朝联合司令部领导，任命聂凤智为司令员。为了加强别洛夫集团军与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之间的联络，保证战斗中能协同一致，双方可互派代表（联络参谋）驻在对方司令部。

为了使朝、中、苏三国空军进驻北朝鲜机场，以有效地掩护后方交通，并支援地面部队作战，从1951年4月起，中国调派了第47军、第36军和第37军入朝，同朝鲜军民合作修复机场。

当时预定中、朝空军进驻平壤地区及其以南的8个机场，苏联空军进驻鸭绿江以南平壤以北4个机场。中国还向苏联订购了两个机场的钢板跑道器材。

然而，美军发现朝中方面大规模修建机场的行动后，利用它掌握的绝对空中优势，对修建中的机场展开狂轰滥炸，还大量投掷定时炸弹。如果仅仅是跑道，还可以铺设钢板，但机场还需要有机库、油库、弹药库、指挥塔台和通讯设施，才能供战斗飞机起降。这些建筑物，今天建起，明天被炸掉，明天建起，后天又被炸掉。历经半年的修建机场工程，尽管调了不少高射炮掩护，但由于美国空军的破坏力实在大得来超出了想象，终于还是未能建成。1951年12月，中央军委不得不决定放弃修建机场和空军进驻朝鲜境内机场的打算。

所以，苏联空军部队始终没能进驻朝鲜，志愿军空军也只能从中国境内的机场起飞到朝鲜上空作战。彭德怀曾在8月17日下达了准备举行第六次进攻战役预备命令，后来第六次战役没有举行，除了国内外政治形势变化和朝鲜发生了40年来最大洪水灾害外，空军无法进驻朝鲜机场，为攻击部队提供空中掩护，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朝鲜战争期间，苏联真正进入朝鲜境内参加地面作战的只有高射炮部队。当时在中国境内有苏军5个高射炮团，任务是掩护机场，其中2个高射炮团于1951年4月推进到鸭绿江以南朝鲜境内的铁路沿线，掩护铁路运输。

这些苏联官兵也一律穿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服装，对外称“中国少数民族志愿军”。

同时，随着中朝边境地区庙沟、大堡和大孤山3个新机场的建

成，大批苏联空军后续部队，也加入到掩护中朝联军后方的战斗中来。

到1951年春，苏联歼击机在朝鲜上空的军事行动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完成了掩护鸭绿江大桥的任务，对中朝联军的运输线也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

虽说由于受飞行距离的限制，无法阻止住美国航空兵对朝鲜中部和东部地区机场和交通线的轰炸和袭击，但是在朝鲜西北部鸭绿江至清川江地区的上空，“米格-15歼击机已成为美国飞行员越来越感到恐惧可怕的敌人”。

后来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的王海将军在回忆录里写道：“战争初期，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还相当年轻、弱小，空战主要是苏联空军打的。后来的大机群作战，特别是与F-86大机群作战，仍由苏联空军唱主角，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协同苏联人完成作战任务。因志愿军空军尚未经过夜航训练，还不具备夜间作战的条件，夜间作战的任务也由苏联空军承担。”^①

2. 美国人与苏联人心照不宣

1951年8月开城停战谈判中断后，美国又恢复了大规模轰炸，从8月18日开始对北朝鲜的交通枢纽实施密集空袭。8月上半月，美军飞行强度平均每天174架次，到下半月达到248架次。

这时，第64航空军有3个航空师（151、303、324），2个高射炮师（82、92），武器有能够自动定位的高射炮，用于警戒和指挥炮位瞄准的雷达站，1个航空供应师，2个独立探照灯航空团，以及医院和其他后勤分队。

但飞机总数不多，在丹东地区部署的性能优越的新型米格-15歼击机只有190架，处于战备状态的米格-15的数量还要少。这支空军所要对付的美国驻朝鲜的空军有不同型号的机型和海军航空兵的飞机

^① 引自王海将军自传《我的战斗生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达1500架。

尽管如此，苏联空军还是从9月1日开始了反击美国空军的积极行动。在9月19日的空战中，米格飞机打下了3架“佩刀式”飞机和3架歼击轰炸机。在10月23日的战斗中，美国8架B-29重型轰炸机虽有34架F-86、55架F-84的严密掩护，但仍被击落了3架。10月24日，当34架美国飞机轰炸顺川大桥时，40架米格飞机起飞迎战，美国又损失了1架F-84飞机和1架B-29轰炸机。10月30日，56架处于战备状态下的米格-15飞机中的44架迎战由21架B-29轰炸机和200架护航歼击机组成的美国机群，美军损失了12架B-29飞机和4架F-84飞机。

苏联空军的英勇战斗，使美国飞机无法对这一区域选定的目标实施有效的轰炸，而只能集中力量轰炸平壤地区的目标。最后，米格飞机在朝鲜西北部地区的空中优势，迫使美国远东空军禁止在白天使用B-29战略轰炸机，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战争结束。

据苏军总参谋长什捷缅科向莫斯科报告，从1950年11月1日到1951年12月6日，苏联空军共击落敌机569架（其中高射炮击落59架），自己损失63架飞机。

第64航空军的另一项任务是帮助中朝联合空军，不仅为他们训练飞行员，而且还带领他们作战。

中朝联合空军是在1951年秋天以后参加作战行动的。由于语言障碍，中朝空军与苏联空军并没有混合编队和联合作战。但双方在协调作战方针、统一使用兵力等问题上始终都是经过协商的。第64航空军的机组人员负责击退在F-86歼击机强大掩护下的大批轰炸机，而中朝联合空军的飞行员只是负责在必要的情况下进行增援。他们在前线主要是与小股敌机进行战斗。苏联歼击机还需要为中朝空军提供援助，如在危急情况下，拦截追击中国和朝鲜驾驶员的F-86飞机。

一般情况是，中朝飞机在8000米高空飞行、作战，苏联飞机则在10000米高空监视和保护。即使后来中朝联合空军在前线机场安东、庙沟、大堡、大孤山的飞机总数已经超过了第64航空军的米格飞机，但由于飞行员飞行技术的原因，一些比较复杂的任务，仍然需要苏联飞行员去完成。

比如在1952—1953年冬天，那时中方和朝方飞行员的飞行技术还不熟练，不能在复杂的气象条件下飞行，中朝联合空军实际没法投

入战斗，这样就加重了第64航空军的作战任务。1953年苏联空军战斗飞行的月平均数量与上一年相比，增长了23%。

苏联空军参加朝鲜空战的一个原则是不能进入敌占区，以免飞机被击落，飞行员跳伞后落入敌军手中，从而暴露苏联参战的行动，造成苏、美直接的冲突。这些限制，在心理上和作战技术的发挥方面，都给苏联飞行员造成了严重的障碍。

在所下达的命令中，严禁任何飞机从苏联领土起飞投入作战；苏联飞机要消除一切自身的标志：有的伪装成中国飞机，有的则涂上朝鲜飞机的颜色；所有苏联飞行员都要穿上中国志愿军的军装，并写下保证书，宣誓绝不泄露他们曾经进入过朝鲜作战；苏联飞行员还奉命在任何时候都不得在空中通话时使用俄语。

最为重要的是，绝对不能有苏联飞行员被俘，因此，严格禁止苏联飞机在“联合国军”空军的控制区和靠近前线地区的上空飞行，以及在黄海上空作战，严格禁止米格飞机跨越平壤—元山一线往南追踪敌机，也就是不得飞越北纬39度线，虽然1951年前线已经稳定在“三八线”。

由于同样的原因，苏联空军也不可能与中国地面部队协同作战。斯大林曾在一份电报中指责驻华军事总顾问空军上将克拉索夫斯基（原总顾问扎哈罗夫大将已于1951年4月奉调回国）和别洛夫将军，说培训中国飞行员的工作进展太慢。

斯大林指出，“中国军队不能在没有空军掩护下战斗。因此，应当尽快建立一支由8个中国空军歼击机师组成的集团军，并将他们派往前线。现在这是你们最重要的任务”。同时要求“别洛夫的一个师可派往靠近中国东北边境的地方，两个师可放在北朝鲜后方，从而为中国歼击机师靠近前线腾出两个机场。这是绝对必要的。应当这样来进行安排，即中国人在前线只能依靠自己的空军”。

据第64集团军报告，在1951年4—5月最激烈的战斗中，中朝军队由于没有航空兵支援，在敌人优势兵力的攻击下被迫全线撤退。而为了避免遭受敌军的空中打击，反攻大多数是在夜间和恶劣天气条件下实施的。

许多当年参加朝鲜空战的苏联军人后来回忆说，他们的空军与中朝的地面部队没有任何合作，甚至也没有通过军事顾问进行过这种合作。由于缺乏联系，竟然多次发生北朝鲜高射炮向苏联飞机开火，以



及苏联飞行员击落中国飞机的事件。

苏联空军在作战中没有出动过配合地面部队作战所必需的轰炸机，而且也从来没有准备这样做。

洛博夫后来在接受采访时承认：“我们没有轰炸机。我们不曾有过一架轰炸机对美国军舰进行过轰炸，因为那不是我们的任务。”

1952年11月志愿军第50军攻占朝鲜西北近海大、小和岛时，只有中国志愿军空2师的拉-11飞机、空8师和空10师的杜-2飞机参战，配合第50军登陆，所有的苏联顾问都于战斗开始之前撤出了。

或许是因为能逮着机会和美国空军直接交手实在是一件新鲜事，每一位参加战斗的空军指战员都显得情绪亢奋，不能自持。特别是在最初一段时间飞上蓝天和美国人作战时，首长们总喜欢把事情弄得来热热闹闹，欢天喜地，就像过大年一样。

参加了大、小和岛之战的吴清江当时是一大队的领航员，晚年他接受采访时说：“虽然我们中国空军的基地于洪屯机场远在沈阳，但我们好像做什么事情都已经习惯了大轰大闹一番才行。原本应当严格保密的军事行动，却在行动开始3天之前就闹翻了天。机场里的大喇叭从早到晚宣传鼓动，念决心书。基地上红旗飘扬、横幅招展、锣鼓喧天，除了召开动员会，还抓紧时间给参加战斗的人员照烈士相，吃油大（改善伙食）。这就等于扯起嗓门对无孔不入的美蒋间谍宣布，你们注意啊，咱们中国空军马上有重要行动了。为了鼓舞士气，政治部主任还在动员会上即兴做了一首打油诗，也让高音喇叭传了好远好远。就连于洪屯机场周围的老百姓都知道，我们又要飞到朝鲜去和美国人打仗了。”

全世界的空军有这样打仗的吗？

结果自然是乘兴而去，扫兴而回。此战，志愿军空军9架轰炸机被击落4架，歼击机被击落3架。战果是击落美机2架。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史上，又增添了一次因人为原因而导致的“惨痛教训”。

驾驶着当时最先进的米格-15歼击机的刘玉堤清楚地记得，他从高空往下看，发现我方好几架飞机都已经着了火。心急如焚的刘玉堤一下子从高空俯冲下来，对准一架敌机就开了火。一开炮他才发现，由于起飞匆忙，机务人员还没来得及给他打开瞄准镜。一击不中，F-86向下一拉飞走了。

许多年后，刘玉堤将军回忆起来大、小和岛之战，仍扼腕叹息。

吴清江记得，当他们回到基地时，热腾腾的庆功宴已经摆满了桌子。一大队的餐桌上摆着36个人的碗筷，可此时他们只回来了20个人（当时还不知道有一人跳伞成功）。看着桌子上那些空着的碗筷，大家直掉眼泪，谁也吃不下去。

首长宽慰大家说：“大家先吃饭，现在我们还在呼叫。”

但大家都明白，此刻还没能够坐到桌子边的那些战友们，是永远也不可能回来了……

由于受飞行距离和飞行技术的限制，中朝联合空军也很少在前线作战，他们只是在天气好的情况下才配合步兵作战，而在恶劣天气下不实施战斗行动。

直到1952年底，在志愿军空军700多名飞行员中，只有28人掌握了夜间简单气象条件下的作战技能。

因此，1951年12月，中央军委根据实际情况，对志愿军空军的任务也不再强调直接支援地面部队作战，而是改为夺取并保持清川江以北地区的局部制空权，有重点地保卫重要交通运输线、军事目标和工业目标，间接配合和支援地面部队作战。

直到冷战结束后人们才知道，当时美国领导人与莫斯科有着同样的顾虑，他们需要和苏联人共同保守苏联空军参战的秘密。

实际上，美国空军很早就知道他们真正的空中对手既不是中国人，更不是朝鲜人，因为美国飞行员不仅在空中看到了欧洲人的面孔，而且在无线电话中听到了“带弹音”的俄语。

这一情况上报以后，美国决策机构认为对此必须保持沉默并封锁消息，以免刺激舆论，迫使政府采取报复行动，从而导致战争升级。

当时美国的决策机构曾经进行过辩论，是否应该将俄国人参战的消息告知国民？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司长保罗·尼采起草了一份文件，建议保守秘密，给这个事情做出了结论。

尼采对后来的访问者说：“如果我们公布真相，公众必然会要求我们对此采取相应的行动。最终，在民意的推动下，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只能是扩大战争，卷入与苏联更加严重的冲突之中。”

艾森豪威尔政府也一直将这一消息“束之高阁”，因为如果“泄露出去，将形成与俄国开战的巨大压力”。

正是华盛顿与莫斯科的这种默契，使苏联空军参加朝鲜战争的历



史真相沉寂了40年。

苏联空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与中朝军队并肩作战，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在整个战争期间，先后有12个苏联空军师投入了空战，轮番参战的空军人数总计为72000人，1952年最多时达到26000人。苏联空军的歼击机总共击落了1097架美军飞机，高射炮兵击落了212架敌机。

根据现在看到的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档案文献的统计数字，苏联航空兵在朝鲜损失了335架飞机和120名飞行员^①。在整个朝鲜战争中，苏联军人总共牺牲了299人。

3. 中国的飞行员上了天

朝鲜战争前期，虽然中朝方面的空军由“中国少数民族志愿军”挑大梁。但在战争后期，一些由中国空军单独去执行的任务中，中国人也有着极为出彩的表现，其矫健的身手，凌厉的攻击，再加上不怕死的精神，也曾让美国人瞠目结舌。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时，中国空军成立尚未满周岁，新中国第一支航空部队第4驱逐（当时对歼击机的称呼）旅正式成立还不到一周。

据统计，朝鲜战争爆发初期，美国及其盟国投入了强大的空中力量，各型作战飞机1500余架，当时中国空军作战飞机不足200架，比例是6：1；美军飞行员飞行时间多在1000小时以上，多的达3000小时，志愿军飞行员飞行时间最多不足100小时，比例是30：1；美军飞行员大都经过二战洗礼，战斗出动平均在300次以上，而志愿军飞行员刚刚放单飞，从未参加过战斗，比例是300：0。

有人把朝鲜战争中的中美空战形象地比喻为：“重量级拳击手与轻量级拳击手不公平的较量。”

正应了“初生牛犊不怕虎”这样一句老话，年轻中国空军的强势

^① 因苏联飞机从未越过三八线作战，故飞行员跳伞后大多能得到地面人员的帮助幸存下来。

亮相，让美国人很难接受这一事实。

1951年6月，由于战绩不佳，美国远东空军司令斯特拉特迈耶将军被解职，接替他的是奥托·威兰中将。

威兰上任后做的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电请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要求再派一个空军联队到日本，调两个喷气式战斗机联队到朝鲜，以形成兵力上的绝对优势。

不久，美国空军不但如愿所请，还派遣了一批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牌飞行员到朝鲜作战。这些老油子的飞行技术和战斗素质的确令人咋舌。轰炸丹东鸭绿江大桥时，他们能够做到只炸毁朝鲜一侧的半幅桥而不碰中国一侧；在志愿军与美军相距仅50米，短兵相接时，美军轰炸机仍敢以凝固汽油弹实施轰炸……

此时，中国空军也在不断壮大，1951年9月，新组建的中国空军已经有了9个驱逐师和2个轰炸师可以参战。

而仅仅在两年之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里，空军还只不过是一副只能勉强供检阅用的“花架子”。

年轻的中国空军之所以能在抗美援朝中取得傲人战绩，除了在战争中迅速学习战争的智慧 and 过人的勇气外，很大程度上也受益于米格-15这种精良的武器。

1949年10月1日下午，17架参加受阅大典的飞机出现在天安门上空，这是新中国空军的首次亮相。

据那一天参加过检阅的飞行员回忆，当时中国就那么点儿飞机能上天，撒到天上去实在显得寒碜。空军首长们为了“以壮行色”，扬一扬新中国的国威、军威，想了一个主意，命令这17架飞机飞过天安门上空后，一左一右，马上分为两路，各绕一个大弯倒回去。改为另外一种编队，再次飞过天安门，给在地面上欢庆建国大典的人们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空军“无比威武，无比强大”，而且数量众多的印象。

当飞机编队在天安门广场上空一次又一次飞掠而过时，数十万观礼人群欢声雷动，兴奋异常。

可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只是缓缓地抬起手臂，凝目仰望着天空。

毛泽东十分关心中国空军的创建，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他用坚决的口吻说道：“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10月25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肖华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正式成立。在筹备之初，刘亚楼曾赴苏联考察、谈判，并草签了苏方向中国出售飞机437架，派遣专家和顾问878名，帮助开办6所航空学校等内容的协议书。

空军组建后，中央军委赋予的第一项使命是：在一年之内，训练出300名以上能够作战的飞行员。

中国空军飞行员的选拔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所有的飞行员都从陆军中精心挑选。他的标准是年龄必须在18—23岁之间；打过仗并且作战勇敢；再一条就是在战斗中表现得灵活机智。

当时被选中并成为中国空军首批飞行员的马占民晚年骄傲地说：“我所在的三纵，打过仗的一共有5万人，没上过战场的人没有资格参加选飞。这5万人中凡是年轻的、头脑灵活的，而且必须是作战勇敢的，尤其是在战斗中参加过突击队，也就是敢死队，和敌人拼过刺刀的优先。筛来筛去，结果三纵挑了多少人呢？120个，每一个都是敢上刀山，敢下火海的铁血好汉。”

勇者无畏，勇者无疆。从零起飞的人民空军，很快把朝鲜半岛的天空，变成了英雄比拼的擂台。

空战在热兵器时代最有“古风”，飞行员驾着战机，就像古代骑士跃马上阵决斗一样捉对厮杀。

曾任空军第八研究所副所长的秦长庚大校说：“我们的部队一直以来都是装备落后，被称为‘土包子’‘泥腿子’，我们自己也承认。可是有了米格-15就不同了，因为米格-15算得上当时最先进的战斗机，我们的空军这回成‘洋豹子’了。”

从中国陆军中挑选出来的“敢死队员们”一旦学会驾着世界上最先进的飞机掠上蓝天，不弄出点惊天动地的事情来绝不罢休。

1951年1月29日，在朝鲜定州以西上空，大队长李汉率两个中队8架飞机对敌发起攻击。

4架敌机调转机头，迎面而来。在速度很快的喷气式战斗机面前，一二十公里的距离，只能用秒来计算。

狭路相逢勇者胜。李汉正对着敌机冲了上去。

5000米，3000米，1000米……对手终于沉不住气，一个侧翻，避开了李汉的飞机。李汉旋即一侧机身，切着敌机的飞行方向拦截上去。敌机赶忙急速翻滚下降，企图逃窜。紧追不舍的李汉在300米处把敌机紧紧套进瞄准环，3束炮弹闪着亮光直向敌机射去，敌机当即冒出浓烟，向地面坠去——在人民空军的历史上，首次拥有了击落敌机的记载。

1951年9月25日，志愿军雷达发现，由美军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组成的混合编队共计5批112架，向我新安州地区进犯，空军第4师12团副团长李文模，奉命率领16架米格-15战斗机紧急升空应战。

12团大队长李永泰飞到新安州上空时，突然遭遇敌机。

“我首先把副油箱扔掉，然后我就一头扎下去了。”李永泰回忆说，“由于高度低，我们的高度高嘛，下去一看敌机飞得太低，米格机下不了这么低，我一看不行，打不了。我正往上拉，一升空，刚好这个时候，就看到我这两个机翼，好多地方都成筛子，透得过亮了。”

时任空4师师长的方子翼晚年回忆说：“当时4架美军飞机围着李永泰打，把他的飞机一共打了56个窟窿。把他的发动机也打得熄了火。到了这步田地，李永泰完全可以弃机跳伞。可那时候一架飞机多贵重啊，他怎么也舍不得弃机，硬是凭着敢死队员不要命的精神，把失去动力的飞机‘滑’回来，落到了丹东机场上。苏联飞行教官们跑拢来一看，吃惊得大叫：‘这哪里是飞机，他开的简直是坦克呀！’所以，李永泰从那时起就得了个诨名，叫‘空中坦克’。”

就在李永泰拼了老命也要把受伤的飞机“滑”回机场时，担任掩护的5号机陈垣、6号机刘涌新也同一批正在偷袭李永泰的美机展开了厮杀。

方子翼说：“刘涌新是个新飞行员，他被6架美军F-86围住了，他打掉了一架F-86，可是炮弹打光后，他也被其余的美军飞机打掉了。”

刘涌新壮烈牺牲，年仅22岁。他打下的，也是志愿军空军打下的第一架美军佩刀式飞机。

美国空军承认，这3天战斗，是历史上最长、最大的喷气式飞机战役。而且显示了中共的飞机和飞行技术已经得到了大大的改进。



10月2日，毛泽东看到空军第4师的战报后，欣然写下了“空4师奋勇作战，甚好甚慰”。

10月12日，刘亚楼下令空3师进驻丹东浪头机场，接替空4师出征。而刚刚上任的美国远东空军司令奥托·威兰则发誓彻底摧毁“米格走廊”。

空3师一上阵，便遭遇一场恶战。

11月4日，第7团飞行中队长赵宝桐，在第一次空战中，就击落敌机2架，为空3师首开纪录。在整个抗美援朝空战期间，赵宝桐共击落敌机7架，击伤2架，创造了志愿军飞行员击落敌机的最高纪录，成为中国空军历史上的“空战之王”。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空军除了李汉、赵宝桐，还涌现出刘玉堤、张积慧、王海、韩德彩等一大批空战英雄。

在给李汉授勋的仪式上，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故意使出激将法，点着刘玉堤的名，问自己麾下的一大群老虎般精壮勇猛的飞行员：“刘玉堤，你们和李汉都是同学，我知道，对李汉打下飞机，你们一个个都是不服气的，我现在问你们，有没有胆量像李汉那样，也打下美国飞机？”

时任空3师大队长的刘玉堤呼地站起来，大声回道：“刘司令员请放心，李汉能打下飞机，只要叫我们上，我们也一定能把美国飞机揍下来！”

这不，好不容易才盼来了这个机会！

1951年10月23日，美机出动飞机36批，共116架，活动于朝鲜平壤上空，企图袭击清川江口一带的地面目标，我空3师24架米格战斗机腾空而起，从8000米高空做了180度的下滑转弯，向美机活动的空域扑去。

刘玉堤以闪电般的速度接近敌机时，狡猾的8架敌F-84飞机正下滑高度，妄图向海面上逃窜。

刘玉堤强压下心中的亢奋，紧紧咬住最后两架美机，一个俯冲直追下去。敌机想转弯脱逃，可为时已晚，说时迟那时快，在440米处刘玉堤以猛烈的炮火，将敌机打得凌空开花，葬身大海。敌僚机慌不择路，恰巧将机腹暴露在刘玉堤面前。他抓住这稍纵即逝的瞬间，一按炮钮，敌机被打得立时起火，拖着浓烟，一头栽了下去。

刘玉堤打下两架敌机后，掉头去寻找自己的僚机，却不见了僚机

的踪影，他只好返回战区上空。

这时，他又发现了7架F-84飞机正在轰炸铁路运输线。刘玉堤迅速跟上后面两架敌机。敌机慌乱中，一个俯冲钻进了山沟，企图甩掉刘玉堤，但刘玉堤紧紧咬住不放，在敌机拉起瞬间，恰巧被刘玉堤瞄准镜锁定，旋即开炮，一举击落敌机。

刘玉堤没有恋战，立即退出攻击，驾机上升到5000米高空，准备寻找自己的队伍。

这时，他又在清川江口上空发现50多架正准备返航的美机在海湾上空盘旋。

“真是天赐良机！”刘玉堤心中暗喜。

他悄悄地降低高度，迅速向美机群的左后方接近，并跟紧后面两架敌机。当距离接近400米正欲开炮时，被敌机发现了，敌机陡然双机分开，妄图各自逃命。

就在这一刹那，刘玉堤灵机一动，来个急转弯，盯准敌僚机，在150米距离上开了炮，敌机凌空爆炸。黑压压的美机群顿时像炸了窝似的四处散开。趁敌机惊魂未定，刘玉堤以一个燕子钻云，跃上万米高空，瞬间退出战区，顺利安全返回机场。

刘玉堤^①在这次抗美援朝空战中创造了一次空战击落敌机4架的战绩，成为中国空军空战中的范例。从此，孤胆英雄美名传扬开来了。

1952年2月10日上午，美军出动了F-80、F-84战斗轰炸机，轰炸朝鲜军隅里附近的铁道线，美军在朝鲜战场上成绩最高的喷气机王牌飞行员、有着3000小时以上的飞行经历，被美国方面称为“百战不殆”“特别勇敢善战”的“空中英雄”，美第4联队第234中队中队长乔治·阿·戴维斯少校，率领18架F-86战斗机担任掩护。

志愿军空军第4师紧急起飞两个团，共34架米格-15战斗机升空迎敌。

张积慧说：“戴维斯的飞机迎面而来，我也对着他飞过去，疾速地转过弯来咬他，一下就把它的尾巴咬住了。我就靠近他，在四五百米距离的时候，我就抢先向他开炮。空战挺激烈的，我把前面的美机打下去了，可另外一批美机也打中了我。”

方子翼说：“那一天打仗回来以后，谁也没向我报告说打掉了敌

^① 刘玉堤，空军战斗英雄，后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中将军衔。



人的飞机。唯独跳伞的张积慧被人送回来后，向我报告说，我被美国人打掉了，但是我把美国人也打下去了。”

这一天被中国空军打下去的，只有戴维斯一人。

美国大名鼎鼎的“空中英雄”被中国空军击落死亡的消息传回美国，美国国会议员、共和党领袖鲍里奇在国会上大发雷霆，说这场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最为耻辱的战争”。

戴维斯的遗孀也向美国空军当局提出了强烈抗议。

多年后谈到这场空战，张积慧说：“打仗一个是靠技术，再一个靠勇敢精神，在装备不如对手的情况下，精神因素显得尤其重要。我们的飞行员都有一股子为国争光的热乎劲儿。大家只要一上天，就拼了命地去找美国人打。顶齐天不就是你把我打下去！能够经过层层挑选，加入到空军的那一刻，我们每一个人，就已经具备这样的献身精神。单是我所在的空4师12团，就先后牺牲了两任团长，第一个是国民党起义过来的，叫赵大海，在此战时牺牲了。第二个团长陈亮，他本来已经在坠机前成功跳伞了，可是两架美军飞机追着他用机关炮扫射，等落地时，已经不成人样了。击落戴维斯那次空战，我是长机，单子玉是我的僚机，我是在子玉同志的掩护下把戴维斯击落的，所以说功劳不能只算我个人的，而是我和子玉共同拥有的。最让我难受的是，在击落戴维斯的这场激战中，负责掩护我的单子玉被击中，连人带机坠毁了……”

在抗美援朝期间，张积慧先后击落4架F-86，志愿军空军司令部给他记了特等功，并荣获“一级战斗英雄”称号。

1952年12月3日下午，在一场大空战中，被2架敌机咬尾的孙生禄为了保护空中指挥员和机群的安全，不顾自身安危，驾机向4架敌机冲去，但却被后面的2架敌机击中，冒出浓烟。勇敢的孙生禄仍在弹雨中坚持与敌周旋，直至飞机轰然起火……

提起一级战斗英雄孙生禄的牺牲，他的大队长王海至今扼腕不已。“他是一个空中拼刺刀式的飞行勇士，在抗战中，16岁的他曾独自与两名日本鬼子搏斗，并刺死其中的一个。”

地面拼刺刀中得来的勇气，以及好像天生的飞行才能，使得年轻的孙生禄取得了击落6架敌机的战绩，孙生禄也因此成了前线有名的“空中敢死队员”。

“他在坠落的瞬间，仍做出向敌机撞去的姿势……”作为那次

空战的空中指挥员，孙生禄英勇的冲杀姿态已永远铭刻在王海的记忆中，“牺牲前，孙生禄共击落6架、击伤1架敌机。”

一个个空战传奇的背后，有多少中国志愿军英雄的鲜血，把那方天空染红？

为了粉碎敌机的偷袭行动，范万章烈士来不及报告就单枪匹马奔向战场；为了完成大和岛轰炸任务，毕武斌烈士艰难地操纵即将失控的战机朝着地面目标俯冲而下，与敌人同归于尽……

奔流不息的鸭绿江畔，年轻的空军将士勇敢地倒下，高擎起一个新生政权不可侵犯的尊严。

4. 被尘封半个世纪的功勋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上海同济大学，一位老军人牵头，和十几位离退休老军人一起参与上海同济大学的卫生工作，共同负责11幢学生宿舍楼的卫生清理，牵头的这位老同志被学生们亲切地称为“扫帚大叔”。他每天骑着自行车按时“上班”，督促勤务人员搞好学生宿舍卫生。看到宿舍大楼有不干净的地方，就亲自动手打扫；发现个别违章用电的，就耐心劝阻；少数学生有思想波动，他协助老师做思想工作，常常忙到夜里十一二点才回家。

他到同济大学两年多时间，和其他老同志一起改变了学生宿舍脏、乱、差的现象，使同济大学被上海市高教局评为卫生文明先进单位。

看起来，这本是一种平常事情，可是，他的这一行为不但在同济大学学生中间引起强烈反响，就连上海的大小报纸、电视、广播等新闻媒体，也争相报道，一时间他成了新闻热点人物。

人们可能会想，一个普通的“临时工”，怎么会引起社会这么大的反响？原来这位“扫帚大叔”是朝鲜战场上叱咤风云的英雄飞行员、曾经指挥过千军万马的空军某部原副军长蒋道平。

1953年11月1日，《人民日报》以《一个空军英雄的成长——记志愿军飞行员蒋道平》为题，对这位“扫帚大叔”作了专题报道：



“今年国庆节志愿军归国观礼代表团英雄的行列里，有个23岁的志愿军空军特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自由独立勋章获得者蒋道平。他曾先后击落、击伤了美国侵朝空军的7架佩刀式飞机。”

遗憾的是，由于美军的隐瞒，当时全国人民无从知晓蒋道平击落美军“三料王牌”飞行员麦克康奈尔的事迹。

1953年1月22日下午约4时，空15师45团出动了16架飞机，蒋道平为第2中队4号僚机。起飞后，按照空联司（中朝联合空军司令部）指挥部指挥飞到清川江上空，也就是朝鲜的北部，其任务是掩护前面参与空战的部队。这一次，45团16架飞机没有遭遇敌人，回到了机场上空时，空联司指挥所要求蒋道平所在的中队，在机场上空盘旋，掩护团里其他12架飞机先行着陆。

当前面飞机着陆以后，空联司即命令最后一个中队着陆，就在蒋道平操纵飞机缓缓地降到700米，正准备进入着陆航线时，从无线电里却传来指挥员的紧急呼叫：“注意，机场上空有F-86战斗机！”这时空中只剩蒋道平一架战斗机，在数量上处于劣势。蒋道平保持应有的镇静和警惕，他刚把飞机改平，准备战斗时，飞机已经抖动起来了。原来隐藏在山背后的敌机中有一架已经咬住蒋道平的飞机，并开了火。蒋道平驾驶着受伤的飞机，沉着应战，并根据老飞行员传授的经验，上升侧滑把飞机拉起来。就在蒋道平蹬舵把飞机拉起来的一瞬间，“唰”的一声，一架F-86战斗机，一下子冲到前面去了。

蒋道平回忆说：我一看这个飞机，喷的是花颜色，离我很近，那个飞行员戴着头盔，还回过头来看我，他显得有些胆怯。这时，我俩就像编队一样，忘了向敌机开炮。好像有人提醒似的，你怎么不开炮？瞬间蒋道平把机头对准敌机，瞄准后按下炮钮，当时三炮齐发，那架飞机翻着身冒着浓烟落下去了。

“后面还有两架，注意保持高度！”正当蒋道平看到这架敌机坠毁在机场旁边的山沟里冒烟时，塔台指挥员及时提醒。蒋道平回答“明白！”也正是这时后面的两架敌机疯狂地向蒋道平发射了炮弹。由于距离较远，蒋道平飞机的四周都是火花，机身多处负伤，无线电也被打坏，信号发射不出去，但仍能听到地面的呼叫。发动机虽然被打坏了，好在还能运转。蒋道平就近选择机场准备着陆时，起落架却放不下来，他便采取手动装置将起落架放下，终于凭着顽强的毅力驾

机安全着了陆。飞机落地以后，地勤人员检查飞机发现一共有50多处弹洞。

蒋道平回忆说：第一次打下这架飞机，我没有多大的体会，要问我有什么经验，就是突然之间我被敌人攻击了，我处于劣势，敌人是处于优势，当时谁犹豫谁挨打，那就是一瞬间的事。

1953年1月31日中午，飞行员正在午餐时警报拉响，他们放下手中的饭碗，跑步登上飞机，刚做好战斗准备，绿色信号弹升空，令45团全团起飞。升空后，空联司命令团长樊玉祥率24架飞机直飞清川江上空。到达指定位置，未遇上敌机，空联司又令机群向朝鲜西岸飞。蒋道平是最后一架，一面跟长机编队，一面监视敌人，由于注意力分配欠妥，与长机拉距2000米，他正要加大油门跟队时，发现右下方有一架敌机向他逼近，因为阳光的影响，敌人可能误把蒋机当成他们的飞机，敌机一面向前赶，一面摆动着翅膀，表示要和他编队。蒋道平明白了，这是一架被我空军飞机打昏了找不到长机的敌机。此时，蒋来不及报告，便机智靠上去，敌机果然等待蒋道平编队。蒋道平收油门，放减速板，使敌机冲前，即刻瞄准开炮，三次开炮，才将敌机打了个空中开花。

蒋道平回忆说，那时他飞行技术应该说是比较差的，能击落敌机靠的是过硬的射击技术。

1953年3月9日上午，我志愿军空军机群完成了航飞任务返航，二中队执行掩护机群返航任务，在清川江上空发现两架敌机，中队长李世英令长机组攻击，僚机组掩护。在激烈的空战中，蒋道平击伤一架。当蒋道平正要追击受伤后企图逃往海上的敌机时，忽听中队长命令“470（蒋道平代号）编队返航”。听到呼叫，蒋道平即停止追击，编队返航。事后，他认为此次战斗没有击落敌机只是击伤，是由于急于攻击，才没有达到全歼的目的。后来蒋道平总结了多次空战经验，归纳为：先敌发现，援救战友，近距歼敌，要稳、准、狠。

3月13日下午，蒋道平与长机宋义春跟随团长樊玉祥和领航主任4人编队返航，正往北飞时，发现两三公里远的地方有两个黑点，一时还判断不清是敌机还是友机。蒋道平立即报告团长：“461（团长代号）、461，在你的左后方发现两个目标。”一会儿，蒋道平看清楚了是两架F-86战斗机，直接窜到团长后面并咬住了团长的飞机。情况十分危急，蒋道平呼喊团长的代号让他尽快摆脱，可团长并没有



动静（那时空中无线电仅有一个频率，打起仗来像闹市一样嗡嗡响，据后来听团长说，他听到了报告，但没有看到敌机）。蒋道平立即报告长机：“469，我攻击，你掩护！”说完驾驶飞机钻过去，蒋道平想尽快轰跑敌机，刚对准就开炮了，没有打中，但敌人听到炮声马上左转脱离了团长。这时蒋道平机智地跟了上去，瞄准敌机就是一串炮弹，一架F-86战斗机当场掉了下去。

蒋道平打了4架美国飞机以后，被送到沈阳北陵机场空3师补课。主要是学习飞机放单飞必须掌握的飞行特技。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必须拿到飞复杂特技的资格证书。当时蒋道平驾着自己的战斗机飞往沈阳，空3师的领航主任张滋说：“你已有打下几架飞机的经历，实际上已具备了飞复杂技术了。”而后带他飞了一下说：“你完全可以放单飞了，回去吧。”蒋道平当天就驾机回到中队。

4月12日上午约8时，蒋道平在45团团团长樊玉祥率领下，12架战斗机编队，按空联司令部的命令飞向龟城、清川江地区上空，其作战任务是保证水丰发电站和鸭绿江大桥。

按照地面指挥所指示的航向、高度，编队飞到龟城附近上空以后，蒋道平正搜索敌情时，由于没有注意到飞行编队转弯，转眼一看自己成了单机，也就是在这个瞬间，他发现敌机从南向北编成纵队，每批4架，一批接着一批向北飞去。敌人可能有自己的目的，半路上他也不会和你纠缠。蒋道平左转弯插进去，咬住两架敌机，由于离敌机偏远没有被发现。蒋道平想，你向北飞，早晚会转弯。果然不出所料，他立刻切了个半径赶上去，先向敌僚机开炮，没击中。又向长机开炮，被击落，飞行员在黄海海面跳伞获救。他单机迎战四机，并击落后来被美国空军命名的“首席三料王牌飞行员”麦克康奈尔驾驶的座机。

这一天，他们团三大队的副大队长马建中在返航于朔州附近，也击落F-86战斗机一架。

6月7日下午，美国空军组织一个混合机群，共21批160架，其中16批F-86战斗机122架。F-86主力在昌城至义州地区组成较严密的拦阻网，并以4至8架连续封锁我一线基地，直接掩护美军对拉古哨发电站进行袭击。

那时，美国空军为了达到其轰炸我鸭绿江沿线重要目标的目的，常以4至8架的小编队封锁我一线机场，阻止和打乱我飞机出航

或待机袭击我返航着陆的部队。这天下午，空15师45团奉命起飞12架、43团起飞8架米格-15战斗机，由团长樊玉祥率领至铁山地区与敌空战后经昌城返航。此时，敌对我拉古哨的轰炸已经结束，大部分飞机已开始返航，仅剩8架F-86活动于大堡机场附近，企图袭击我着陆部队。

14时43分，45团准备着陆时，领队长机樊玉祥接到地面指挥所关于机场附近有敌情的通报后，命令部队驾机绕到敌潜伏区的侧后，使敌不能在潜伏区内窥探我机动向。同时，也集结了部队，加强了搜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2中队宋义春发现左后方两架F-86企图攻击领队长机樊玉祥，他立即提醒长机拉起来，同时让僚机蒋道平向右侧发起反击。宋义春开炮射击未中，蒋道平切内圈迅速接近敌机，连续射击6次，将敌长机击落。然后再去攻击僚机，只开了两次炮，因炮弹卡壳（当时认为炮弹用完，后检查为卡膛），只是把该机打伤没有击落。这一次空战，蒋道平击落击伤敌机各一架，这也是蒋道平入朝最后一次升空作战。

1957年，美国空军上校詹姆斯·T.史蒂华撰写了《空中威力——朝鲜战争中的决定力量》一书，吹嘘美国空军的救援行动如何迅速高效，提到“当年联合国军的战斗飞机在‘米格走廊’遇到困难时通常是飞向黄海，以取得救护机的救援。麦克康奈尔上尉（朝鲜战争中击落米格机最多的喷气式飞机王牌飞行员）从被击中的F-86飞机跳伞后六分钟，就被直升机拉上去了”。

此后，美国出版的《米格走廊——朝鲜上空的格斗》、《朝鲜空战》等许多有关朝鲜空战的书和故事片《麦克康奈尔传记》，都把营救麦克康奈尔当作范例来炫耀，大肆宣扬美国的救援能力。他们这样吹嘘却不小心揭穿了美国隐藏多年的事实，暴露了麦克康奈尔曾被击落的事实真相。

发生在这两位王牌之间的空中对决，直到48年之后才得到确认。中国空军的辉煌战史上，又增添了一笔显赫战绩。

20世纪90年代初，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扩建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增设抗美援朝空军馆。时任空军第八研究所副所长的秦长庚大校担任筹展办公室负责人。1992年的一天，他听到了一个从未被空军记载的战果。



负责收集整理抗美援朝空军历史资料的是沈自力和邵福瑞两位教授，分别来自空军第一航空学院和第六飞行学院。他们在美国的出版物中发现，1953年4月12日早晨，一个叫约瑟夫·麦克康奈尔的美国空军王牌飞行员被中国空军击落，跳伞逃生。

秦长庚常年研究空军历史，对抗美援朝期间志愿军空军的战史熟悉得如掌上观纹。他说，当时最被人熟知的美军王牌，一个是被张积慧击毙的戴维斯，一个是被韩德彩击落的费希尔，麦克康奈尔也被中国空军击落，以前闻所未闻。

再详查麦克康奈尔其人，所获更是惊人。在美国，麦克康奈尔是朝鲜空战中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他驾驶美国空军的F-86佩刀式战斗机，总共击落了16架米格-15，是美国击落米格飞机最高纪录的保持者。由于战绩非凡，麦克康奈尔获得了杰出服务十字勋章和银星勋章。这个纪录也让他成为美国朝鲜战争中的首席三料王牌飞行员。

美军把击落5架飞机的飞行员称为王牌飞行员，击落10架以上的称为双料王牌飞行员，击落15架以上的称为三料王牌飞行员。在朝鲜战争中，美国空军仅有两名三料王牌飞行员。麦克康奈尔的战绩率先达到了这个数量，因此成为首席三料王牌飞行员。

谁打下了麦克康奈尔这个美国空军头号王牌？秦长庚、沈自力和邵福瑞三人满怀兴奋地开始了进一步查找。

空军司令部原办公室主任王公圻是筹展办公室主任，抗美援朝期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空联司作战处参谋，熟悉当年空战后的战果评定。王公圻对击落麦克康奈尔一事也没有印象，不过，他协调帮助筹展办公室，查阅了空军档案馆里抗美援朝作战的全部档案文献。

1953年4月12日这天，志愿军空15师的战报有击落了两架敌机的记载：第45团三大队副大队长马建中、一大队飞行员蒋道平4月12日各击落一架F-86飞机。

马建中击落的F-86是在朝鲜昌城上空，敌机中弹起火后坠落，撞在山上，机毁人亡，这个战果有战后捡拾的飞机残骸为证。而蒋道平击落的F-86是在朝鲜龟城附近上空，敌机中弹后滑向黄海。按照战果报告中蒋道平的描述，他看见敌飞行员跳伞脱离机舱，落入黄海。

这个细节将被击落的飞行员与麦克康奈尔联系起来。

沈自力和邵福瑞发现麦克康奈尔被击落一事，是在《朝鲜战争中

的远东空军（1950—1953）》和《空中威力——朝鲜战争中的决定性力量》两本书中。这两本书出版于朝鲜战争之后不久，是美国官方作为战争总结性史料公开发表的。1963年6月，空军将这两套书作为内部资料翻译过来，供师长以上干部研究参考。这两本书具备可信用和权威性，对于研究美国空军在朝鲜战争中的活动有重要参考价值。

在这两本书中，美军自然不可能特意宣扬自己的头号王牌被击落，这件事其实是无意间透露的，甚至可以说是在“自我表扬”中“自曝家丑”。

麦克康奈尔被击落一事，在美军的记载中是作为一次成功的救援范例出现的。《空中威力——朝鲜战争中的决定性力量》一书提道：“联合国军的战斗飞机在‘米格走廊’遇到困难时通常是飞向黄海，以取得救护机的救援。救护机从美军控制下的岛屿出发，很快就到达出事地点。约瑟夫·麦克康奈尔上尉从被击中的F-86战机跳伞后六分钟，就被直升机拉上去了。”

书中提到的“救护机”是美空军H-19型直升机。直升机在朝鲜战争中第一次投入实战，主要用途是运输和战场救援。秦长庚说：“从纯军事的角度看，美军在直升机的使用、对飞行员的抢救方面确实是开创性的，值得称道和学习。不过，这些记载也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战果信息。”

所有资料指向一个结论——击落麦克康奈尔的极有可能就是蒋道平。

即便没有击落美国空军头号王牌这样显赫的战绩，蒋道平也早已是闻名遐迩的空军英雄飞行员。

在抗美援朝空军馆的设计中，原本就有他英雄事迹的展板。秦长庚准备在展板中加入蒋道平击落麦克康奈尔的战果。这个突出战绩此前从未在人民空军的战史中有所记载，事关重大，他给空军司令部打了报告，提请确认蒋道平的战绩并公开展示。

报告层层批转，最后，时任空军副司令员林虎中将做了这样的批示：“可以认定麦克康奈尔被我击落，至于是被谁击落的需有确凿事实，不要轻易作结论。”

这位同样是抗美援朝英雄飞行员出身的将军，对空军战绩采取了一以贯之的严谨态度，史实——即便是为空军增光添彩的战绩，也必须确凿无疑才能认定。

秦长庚说，看到林虎副司令员的批示，他明白了，麦克康奈尔究竟是被谁击落？时隔40年了，确实不能草率行事。他们的报告认为蒋道平击落了麦克康奈尔，是在中国和美国两方记载基础上的对应推论，而最终确认此事还要深入细致的工作。一次抗美援朝空军馆的筹备会上，林虎专门对秦长庚说，将来把全部事实弄清楚了，由组织上履行程序确认此事。在此之前，不要下结论。

秦长庚说，在此之前，志愿军空军已经击落了两个美军王牌飞行员，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张积慧击毙的戴维斯、韩德彩击落的费希尔。这两个美军王牌飞行员的身份之所以当时就得到确认，有很大程度的巧合。戴维斯被击毙后，飞机残骸和他的身份牌被朝鲜民众发现并上交。费希尔是在中国领空被击落，他跳伞后正好落在了志愿军空15师的机场，当即被中国人“热情地请进了战俘营”。

“如果麦克康奈尔的飞机残骸当时被找到，也早就确认他的身份了。”秦长庚说。美国飞行员喜欢在自己的战斗机上涂刷个性化标志或图案。麦克康奈尔把妻子的名字漆到了飞机上，称自己的飞机“布奇”号。可惜这架飞机掉到了海里，麦克康奈尔又被美军直升机很快救走，使得志愿军一时无从获知其身份。

直到39年之后，秦长庚、沈自力、邵福瑞等人为筹建抗美援朝空军馆整理史料，才把蒋道平和麦克康奈尔联系起来。基于对战绩核实的严谨态度，空军并没有马上确认是蒋道平击落了麦克康奈尔，蒋道平本人对此也是毫不知情。

又是8年过去，另一位研究者通过麦克康奈尔被击落的细节，找到了蒋道平。

1999年初，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宇在图书资料馆中偶然发现了这个空战史上的秘密。为确定击落麦克康奈尔的飞行员到底是谁，陈宇前往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考察，又远赴国外走访了一些专家学者。经过多方收集资料、反复比较核实，他写出了调研报告，确定了蒋道平击落麦克康奈尔的历史事实。

陈宇通过军事科学院将这一研究成果向空军进行了报告。

研究蒋道平击落麦克康奈尔的还有其他人。空军第一航空学院教授沈自力惊喜地发现，1953年4月12日蒋道平曾击落一架F-86战斗机，那么击落麦克康奈尔的飞行员是不是他？空军第六飞行学院教授邵福瑞也开始试图解开这一历史谜团，到空军档案馆查找相关资料。

两位教授一起研究，初步认定是蒋道平。他们将发现过程写成报告送给空军展览馆负责人秦长庚。三人又进一步进行查证。此后，筹备组写出了专门报告，请示空军党委确认这一战绩。

空军司令部确认究竟是谁击落了麦克康奈尔，比媒体要慎重严谨得多。

根据当年空联司的战果记录，1953年4月12日这天，共有4架美军飞机被击落，其中两架是空15师蒋道平和马建中的战绩，另外两架是苏联空军击落的。

最终的确认依据，在志愿军空军战果统计的原始档案里，1953年4月12日蒋道平的战果认定表上有这样一句评定：“经查友军当时没有击落敌机。”

这是当时认定蒋道平击落敌机的重要依据，也成了48年后认定他击落麦克康奈尔的最重要依据。

中苏朝空军联合司令部的原始记录与志愿军的战果统计在作战时间、空域、战果、自身损失等内容上都是一致的。

“友军”自然指的是苏联空军，“当时”指的是1953年4月12日7时55分。

这一天，麦克康奈尔是在清晨于龟城上空被击落的；

这一天，苏联空军的击落战果是在中午和下午；

这一天，地面高射炮部队没有击落敌机的记录。

2001年10月29日，空军司令部在告知军事科学院和蒋道平的信中说：经查证，空军党委常委会于2001年10月15日研究确认，1953年4月12日美军“三料王牌”飞行员麦克康奈尔为蒋道平所击落。

2001年10月29日，空军司令部给蒋道平发去了嘉奖函。

历史真相大白，志愿军空军的史册又载入了精彩的一页。

2007年建军80周年之际，蒋道平又作为全军英模代表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

2010年5月20日，蒋道平不幸病逝，享年80岁。^①

^① 笔者注：本节内容，征引了董少东发表在《北京日报》上的长篇报道《击落王牌》。



5. 不打不相识

王海，空军上将，原空军司令员。抗美援朝空战中共击落击伤敌机9架，先后荣立过二等功、一等功、特等功，被空军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他所带领的年轻的“王海大队”，与号称“世界王牌”的美国空军激战80余次，击落击伤敌机29架，荣立集体一等功。

提起50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大空战，老英雄十分激动：那是有史以来世界上第一次喷气式飞机大空战！

喷气式战斗机是纳粹德国发明的，并在二战末期投入了实战。不过，它没能扭转纳粹德国覆灭的命运。战后，美国和苏联分别获得了德国喷气式战斗机的资料，以后各成体系的美式、苏式战机，追根溯源其实是同一个基础。

老英雄回忆说：当时敌我空中作战力量悬殊。参战初期，志愿军空军只有200架左右的作战飞机，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却有1500多架飞机；我们的飞行员平均飞行时间不到100小时，在喷气式飞机上飞行时间只有20到30小时，而美军飞行员平均飞行时间都在1000到2000小时以上，飞喷气式飞机的时间都在200到300小时以上，并且许多是参加过二次世界大战的老飞行员。

敌人虽然强大，但志愿军空军也有自己的优势，那就是飞行员总体素质好，许多人经过地面战斗的艰苦磨炼。用王老英雄家乡胶东人的话来说，就是勇敢不怕死。

参战前，当时的空军副司令员常乾坤到沈阳进行战前动员，叫王海发言表态，他只说了一句话：“美国人是人，中国人也是人，我就不相信我们打不下美国飞机！”

“1951年11月18日下午2点50分，是一个难忘的时刻。”王老回忆说，指挥所通报：美国有9批184架飞机在清川江一带活动，主要是执行轰炸任务。“当时，美国佬根本没把中国空军放在眼里，显得很猖狂。我们紧急升空后跃升到8000米高度，像猛虎下山一般直扑20多架敌F-84飞机。敌机看我们来势凶猛，也顾不上轰炸了，炸弹胡乱一扔就迎了上来。这时，我盯住一架敌机，一逼近就开始攻击。一架敌机绕到我的后面，想打我，被我的僚机焦景文看到后，迅速扑过去，一下子就把这架飞机打掉了，接着我把前面那架敌机也打掉了。

又一架敌机悄悄绕到焦景文后面想攻击，我发现后干脆利落地把这架敌机也干掉了。这次空战，我击落敌机两架，我的僚机焦景文击落两架，我们大队的另一名飞行员孙生禄也击落了一架，打了个非常漂亮的5比0。”

不过，王老英雄也感慨地说：“抗美援朝的空战还是很残酷的，我们夺得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胜利，但也有不少战友壮烈牺牲，为国捐躯。那是1952年12月2日和3日。2日下午我们打了一仗，孙生禄的飞机被打了12个洞，他没跳伞，飞机降落在大虎山机场。3日中午才赶回来，下午又要起飞，我劝孙生禄就不要飞了。孙生禄说：我又没有病，人又这么少，我得飞！

“这天下午，我们的飞机到了清川江上空，突然遇到敌人70多架F-86和50多架F-80的围攻，孙生禄被十多架敌机包围后，飞机中弹着火了，他发现后驾冒火的飞机猛烈冲向敌机群。牺牲时，他才刚刚24岁。”

回忆起牺牲的战友，老英雄的眼眶红了。孙生禄先后击落击伤敌机7架，是志愿军空军在战场上牺牲的唯一的一级战斗英雄。

“像他那样，我们大队先后有4名飞行员在空战中英勇牺牲，这是当时我们大队的百分之五十啊！”说起这个数字，王老十分感慨。

正是战友们的勇敢战斗和不怕牺牲，才换来了辉煌的胜利。

王海将军介绍：整个抗美援朝参战期间，我志愿军空军经过2年8个月的作战，战斗起飞2457批26491架次，击落击伤敌机330架，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战绩，连时任美国空军参谋长的范登堡都惊呼：

“共产党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世界空军强国。”

一个刚刚建立不久的年轻空军，能够重挫号称世界头号空中强国的美国，主要靠什么？

靠人！

具体地说，就是一靠志愿军空军飞行员在战斗中勇敢不怕死；二靠志愿军空军非凡的智慧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没有这两条，说破天也是不可能打胜仗的。

关于美国前任空军参谋长加布里埃尔到底是不是被王海打下来的？王海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得很清楚。

那是1984年7月，我随当时的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访问美国。



在会谈开始前，张爱萍同志向美方介绍我们军事代表团的成员，介绍到我的时候，当时任美国空军参谋长的加布里埃尔将军走到我面前，握住我的手说：你就是那个朝鲜战场上的王海？我当年在朝鲜就是被你打下来的。

我笑着说：“如果你们再来进攻我们，我们还要把你们打下来。”

我的话一说，会议室里响起了一片笑声和掌声。

张爱萍将军说：“这就叫不打不相识嘛。”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可能是翻译有误，把加布里埃尔那句“被你们打下来的”翻译成“被你打下来的”。实际上，在朝鲜战场上，机群与机群作战，加布里埃尔不可能确切地知道是我把他击落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打掉了他。

不过，他后来告诉我，他是美国空军第51联队的，当时，他们这个联队的F-86飞机上有两条黄杠子，我们在空中经常碰到的就是这个联队的飞机。

我想，不管怎么样，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确实是被我们志愿军空军打下来的。

第二年，加布里埃尔到中国访问。

他提出一个要求，要亲眼看看王海当年驾驶过的那架米格-15飞机。他爬上了王海驾驶过的那架喷有9颗红星的英雄战机，并在战机上留影后，说自己最喜欢的格言，是中国的一句老话：不打不成交。

加布里埃尔退役后，王海再次访问美国，美方负责接待安排、陪同的是美国空军副参谋长麦克皮特，他不仅是飞行员出身，而且当过美国“雷鸟”飞行表演队的飞行员，飞行技术十分精湛，素来十分骄傲。

有一天，王海一行要去参观一个军事基地，突然下起小雨，麦克皮特做出了一个令众人惊讶不已的举动，亲自为王海撑开雨伞。

对于这段往事，王海曾这样解释：军人的心是相通的。

与加布里埃尔一样，费希尔是美国空军另一名被击落的王牌飞行员。

1953年4月7日下午，当费希尔又一次偷袭得手，击中了一架正在降落的志愿军空军的飞机，准备溜之大吉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已被那架长机的僚机死死咬住。

视摆脱跟踪为拿手好戏的费希尔此时并不在意。一推杆，随着一个大坡度的下滑，飞机朝着机场一侧的山头扑去。这位“老油条”准备贴到山坡时才拉起来，尾随的飞机要是继续追，必定撞到山上。

可是，他没有想到，追击他的飞行员非但没有跟着他下滑，反而往上拉了拉高度。这样，当费希尔拉起来的时候，正好落在了那架飞机的正前方。

大吃一惊的费希尔立刻把飞机翻过来，先是向左翻，接着向右翻，一连串漂亮的翻滚，就是与飞行表演相比也毫不逊色。

可是，就在费希尔自以为彻底摆脱了追击，把飞机稳定住的一刹那，一串近距离发射的炮弹重重地打在他的机身上。一只机翼当场被切断，飞机打着旋往下落。

在这种情况下，费希尔只有一条生路：跳伞。

击落费希尔的，是那一年刚满19岁的韩德彩。

1953年春，美国空军将在朝鲜的F-86飞机增加到300余架，其战术也发生显著变化，他们调一些飞行时间多达一两千小时的王牌飞行员，组成“猎航组”，在丹东的机场上空，做高空盘旋等待机会，伺机急速俯冲下降，偷袭我方正在下滑着陆或正在起飞爬高的飞机。

当时志愿军空军15师驻在丹东附近的大堡前线机场。驻同一机场的还有一支苏联空军的歼击机部队，他们装备有全新的米格-15战斗机，飞行员大部分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斗力很强，空战经验丰富，可称得上是苏联空军中一流的作战部队。他们是秘密参加抗美援朝的，苏军规定，飞往朝鲜上空作战的飞机，严禁飞过“三八线”，而且在空中不准用俄语相互通话或指挥，以避免引起苏美间的直接战斗。中苏两军在机场东、西各驻一方，各设自己的指挥所，可以通过翻译及时交流在朝鲜上空的空战情况和地面信息。在那紧张的战斗的日子里，参战起飞的机群和返航着陆的飞机，相互配合、相互关照，地面上的交往也比较多。

韩德彩时任空军第15师43团一大队中队长。

1953年7月，韩德彩与战友驾驶的僚机征战归来，准备着陆。当飞机下滑至高度1000米时，耳机里突然传来了地面指挥员急促的喊叫声。

“塔台不断地叫我‘拉起来，拉起来！敌人向你开炮啦！’”韩德彩说，“我在前面，我就反过来向这边看，向后看，没看到。又马



上反过来向另一边看，还是没看见。就把机头改平，向机场方向看，这时就看到山洼里的机场上方有两个黑点，距离很近。原来是一个美国人在撵一个苏联人，一边撵，还一边不停地开炮。为了救援苏联战友，我不顾飞机的油量警告灯已经开始闪烁，加大油门，向着美军飞机冲去。第一串炮弹过去，就看见美军飞机起火了，紧跟着出来个黑乎乎的东西。我赶紧喊地面：‘敌人跳伞啦！快抓俘虏！’喊了两嗓子，我就赶着下去了。油不够了，再不抓紧下去，我这飞机也得撤了。”

飘飘扬扬地落到志愿军高炮部队阵地上的，是美国空军第51联队的上尉“双料王牌驾驶员”哈罗德·爱德华·费希尔。

在中国监狱被关押两年之后，费希尔和其他4名美国飞行员于1955年5月在北京受审，5人都以侵犯中国领空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周后，5人全部获释。

此举当时被看作是中国和美国之间化解紧张局势的姿态。

费希尔获释后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我很高兴我成为了中国人的俘虏，因为中国人对待战俘，就如同对待自己的士兵一样。”

不过，刚刚成为俘虏的费希尔远没有这么从容。面对审讯他的中国军人他恐惧得全身颤抖，几次叫他坐下，他都不敢落座。

直到后来狼吞虎咽地吃光中国军人给他端来的煎鸡蛋、馒头，喝光一大碗鸡蛋汤以后，他才平静下来，提出想见见把他击落的中国飞行员。

当年仅19岁的韩德彩出现在他面前时，费希尔看着这个年轻的中国飞行员，凝视良久，默不作声。

当告诉他就是这位年轻的中国飞行员把他的飞机击落时，费希尔一下子惊呆了。韩德彩离开后，他沉思片刻然后说：“了不起，了不起！简直不可思议……”

获释后，费希尔重返美国空军服役直到1978年以上校军衔退休。

1997年，时隔40多年后，费希尔随美国飞虎队协会访华，在上海见到了昔日的对手韩德彩。

韩德彩以军人的直率笑着对费希尔说：“当年我把你打下来，你一定不服气吧？”

费希尔头一扬，挥着手大笑着说：“在特定的时刻，面子并不是

那么重要。我唯一庆幸的是，我掉到地上还活着。”

韩德彩接下来又恭维对方：“其实，我现在必须向你承认，你的技术比我要好得多。”

费希尔说：“你说得不对，你的技术比我的技术更高。”

韩德彩又说：“那时候我们的空军建军才两年，都缺乏经验。我在米格-15战斗机上飞了100个小时左右，和你们比起来，完全是个新手。”

费希尔说：“那个时候光是F-86飞机，我就飞了500小时以上，之前还飞过几百个小时的其他飞机。”

两位须发斑白的老人早已冰释前嫌。

哈哈大笑的费希尔竖起大拇指对韩德彩说：“你是世界上飞歼击机里面最好的飞行员。”

“如果单说技术上，你是世界上第一流的飞行员。”韩德彩也客气地说。

这时候费希尔的陪同人员在旁边说了一句话：“你们俩都是世界上最好的飞行员。”

听到这样的话，两位老人都开心地笑了。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空军与苏联空军一起，在朝鲜西部的清川江和鸭绿江之间，面积约6500平方英里的地区，建立起一道令对手生畏的“米格走廊”。美远东空军轰炸机司令部不得不下令，轰炸机指挥部的一切没有护航的飞机不得进入米格走廊。

在两年零八个月的抗美援朝空战中，人民空军共击落敌机330架，击伤95架。涌现出三等功以上功臣8000余名，特等功臣16名，一等功臣68名，一级战斗英雄6名，二级战斗英雄12名。

在1988年的全军授衔中，空军被授予中将以军衔者32人，他们中有16人参加了朝鲜战争，其中14名飞行员中有13人共击落击伤敌机53架。他们击落敌机的总数，大大超过他们肩上的将星数量。

这批将军中，时任空军司令员的王海是唯一的一位上将。

正如王海所凝望的这座刻满英烈和英模名字的英雄墙那样，在人民空军驰骋长空的60载光辉岁月中，湛蓝的天空中，从不缺乏中国英雄的名字。

几十年后，从空军司令员位置上退休后的王海，在他的回忆录



《我的战斗生涯》扉页上，郑重地写下这样一行文字：

谨以此书，献给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战友们和英烈们！

第十一章

将军行

1. 瘸子将军

彭德怀上了战场便不顾自身安危，勇往直前。他麾下的战将们一个个也都不甘示弱，军长们甚至包括兵团司令也都争先恐后地进入了战场，像他们的总司令一样奋不顾身地当起了“尖兵”。

来自红四方面军的著名战将吴瑞林是个瘸子。瘸子将军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在几十年革命战争的烽火中，他身经百战、智勇双全、出生入死、屡建奇功。

1932年，17岁的吴瑞林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8岁时当上“红都”通江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时，却受到一场来自内部的惊骇。在突然袭来的一场大肃反中，他被打成了“托陈取消派”，连这罪名是个啥意思都没弄明白哩，就等着砍脑壳了。

幸亏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傅钟一句话，救了他的命。

傅钟奉命前去与杨森派出的代表进行秘密谈判，需要对当地情况比较了解的同志协助，有人向他推荐了出自巴中的吴瑞林，傅钟说那就马上让吴瑞林来^①。那人说，吴瑞林被打成了“托陈取消派”，关

^① 笔者注：傅钟将军虽是四川人，但他的家乡在川南叙永县，对地处川北的大巴山地区并不熟悉。



在大牢里，马上要被砍脑壳。傅钟说，先把他放出来，要砍脑壳也得先帮我把事情办完再砍。

傅钟一句话，吴瑞林跨出大牢，这辈子就再也没有进去过。

1935年6月，吴瑞林带领红四方面军总部和川陕省委工作团，随红30军在川西懋功迎接刚刚翻过大雪山后北上的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甘宁边区后，在中央党校学习时，他第一个报名要求奔赴抗日前线，受到中央领导的表扬；随即赴山东抗日战场，浴血奋战，在反日军“七路围攻”的一次战斗中连续两次负伤，浑身上下留下9处伤口，腿也给日本人打瘸了一条，经抢救后才死里逃生。

解放战争中，他指挥的42军原来是东野5纵，是林彪手下资历最浅，战功最不起眼的一支偏师，幸亏后来捞着个机会，灭了全副美式装备的廖耀湘部队。紧跟着又马不停蹄，吴瑞林率队入关，长途奔袭，横扫北平西，提前52小时抢占丰台，堵住了傅作义突围的通道，顶住了国民党军6个师的轮番进攻，一战缴获蒋军106辆坦克，脸上才添了些光彩。吴瑞林在一大帮战功赫赫的将领中，说话声音也才响亮了许多。

1993年8月29日，已过古稀之年，老态龙钟的吴瑞林将军在北京家中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

他说，42军有个独创，针对韩、日、美电台都有华语广播，军部通讯科从1945年起，就搞了个《电讯报》，专门收记敌方电台播出的时局电讯。挑选出有用的东西翻译成中文后，复写百十份，发到全军营以上单位。42军战士在1950年时，有二分之一是“解放战士”，来自全国各地。能通过《电讯报》了解自己家乡的情况，一个个高兴得很。6月25号“三八线”上炮声响过的第二天上午，收听人员就知道了，马上报告了我，“但我当时连政委也没告诉，直到事件公开后才讲。连麦克阿瑟在记者招待会上讲了些啥子话，我都一清二楚”。

他还说，美军发“性交证”，从俘虏兵身上搜到的。他亲自审问过一个美军上校俘虏，确有其事，二战时有，美军的历史上也有，没有证干了算强奸，要受军纪惩罚。性交证的上面是英文，下面是韩文。“我让政治部把这个东西当作教育42军官兵的反面材料。志愿军也有强奸朝鲜妇女的，开始抓住了一律枪毙。二次战役后，金日成发了话，以后一般便不枪毙了”。

不枪毙不等于不受惩罚，凡是犯了错的，通通弄去当挑夫，顶着

美国飞机的狂轰滥炸往前线背运炮弹和粮食。

1950年3月，42军奉命转入生产，两个师前往河南、安徽、湖北的大别山开荒，一个师留在东北修水利工程，全军官兵都成了黄泥巴脚杆。大家哭啊，骂娘啊，当兵打仗，没想打到最后打成个农民！连封信都不好意思给家里写了。

吴瑞林说：“我想啊，既然部队是分散从事农业生产，以后肯定会与人民争地，容易引起矛盾，干脆打报告请求去荒无人烟的北大荒，那儿大片大片的土地没人种。我这人有个怪脾气，干啥子事都不愿落在人后头，42军搞生产，也要搞出个名堂来！42军曾经流行一副对联：兴安岭下练雄兵，兵强马壮；黑龙江边开屯田，为国为民。搞生产时，决心二至三年达到自给，并有余粮上交国家。那时候国家连年打仗，早就被打成一副烂摊子，穷啊！”

吴瑞林指挥的42军原本已经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开进北大荒建农场，种庄稼，对部分思想不通闹情绪的官兵，还在做工作，让他们放弃扛枪打仗，杀敌立功的雄心壮志，拿起锄头镰刀，安心农业生产。没想到一下子又下来了入朝参战的命令，要大家重新披挂上阵，到朝鲜去打这“保家卫国”的一仗。全军政治思想工作，猛一下又颠倒过来。

吴瑞林记得很清楚，周总理发表声明后的第三天——6月30号，高岗召他去沈阳，命令42军迅速集结到鸭绿江一带。

吴瑞林随即提出，自己率参谋经过化装，先期进入朝鲜勘察地形。经高岗同意后，7月初，他即率一名作战处参谋、一名情报处参谋，化装成火车司机到平壤以北活动。从新义州至平壤，再从平壤经江界回来。中部、临江、东部都去了。吴瑞林边看地形边讲，作战参谋记，情报参谋画。3个人到朝鲜勘察了6天，主要是沿铁路沿线看。为了便于观察，他们一路上鬼鬼祟祟，偷偷摸摸，有时待在火车顶棚上，有时甚至站在火车头上，指手画脚。

“政委、副军长都不知道，我对他们说是去开会了。坐在车长室里，吃饭也在里头。事先没通知朝鲜方面。后来朝鲜内务部的特工人员发现了，拿我们当特务，一边派人跟踪监视，一边飞报给金日成。金日成一听是个瘸子，就估计是我吴瑞林过来勘察地形，没让他们惊动。”吴老将军笑着对记者说，“真要发生点不测之事，我们只好向朝方人员出示证件了。”



时年37岁的吴将军真算是胆大包天，那时不仅天上有美国人的飞机轰炸扫射，从南边过来的韩军便衣特工活动也十分猖獗，到处炸桥梁、搞暗杀，时不时还往重要机关扔包炸药。一个军长只带两名参谋，连警卫员也不带，就扔下部队上了战场，真要是遇上点“不测之事”，损失就大了！

吴瑞林从朝鲜侦察回来不久，便带着经过短短两个月战前训练的42军，从集安隐蔽神速地跨过鸭绿江，连续参加了第一至第四次战役和横城反击战，歼敌两万多人。首战在长津湖成功阻击了美陆战1师，此后又相继和美2师、美5师多次交手，才吹起得胜号，浩浩荡荡，班师回国。

1951年5月，邓华副司令员率领首批出国作战的4位军级首长：38军政委刘西元、39军军长吴信泉、40军军长温玉成、42军军长吴瑞林，回国向毛泽东主席汇报朝鲜战场的战况。

5月底的一天，吴瑞林刚吃过晚饭，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办公室主任安东来饭店接吴瑞林。吴以为聂荣臻要找他谈话，拿上文件包准备走，安东说：“这些就不要带了，只带钢笔和笔记本就行。”

直到上了车，安东才告诉吴瑞林：“毛主席要见你。”

吴瑞林一听，心里既兴奋，又紧张。

汽车经新华门进中南海，直驶到毛泽东的住房外停下来，吴瑞林一下车就看到毛泽东站在门口迎候，他赶紧上前两步向主席敬礼。

毛泽东握住吴瑞林的手说：“你比过去瘦多了。我听说你在战场上累得吐了血，怎么回事呀？”

吴瑞林告诉毛泽东：“那是内伤，过去的伤口破裂出血。经治疗后，现在已经很好了。”

毛泽东又问：“你是突破‘三八线’时伤口破裂的吧？能坚持吗？”

吴瑞林说：“是的，当时我虽然吐了血，但对群众保密，连下面干部都不知道。彭老总把他自己吃的药都送给我了，以后军委和东北军区专门送药给我。突破‘三八线’时，我是坐在担架上指挥战斗的。”

毛泽东感慨地说：“正是有了你们这些同志坚持指挥战斗，我们才什么也不怕了。”

进屋以后，毛泽东请吴瑞林坐下来，让他脱下上衣，又递给他一

把芭蕉扇，然后点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对吴瑞林说：“现在言归正传吧，我要问你几个军事方面的问题。”

吴瑞林首先向毛泽东汇报了对抗美援朝战争的认识，接着就讲起了入朝作战在军事方面做了哪些准备工作。他谈了对付敌人空中优势，志愿军采取夜战、近战、不良气候条件下作战；对付敌人坦克、装甲车，采取依靠地形地势，利用爆破箱、小包炸药等我军传统战法。当谈到对付敌整体装备优势的炮兵，采取集中火力重点使用，在局部地段将劣势变为优势时，毛泽东说：“好呀！你们抓住了要害，解决问题具体，方法对头，这是我们的优势嘛！”

当吴瑞林说到在国外作战，首先教育部队要尊重朝鲜人民的风俗习惯，要尊重朝鲜的领导，团结朝鲜人民军队，才能取得胜利时，毛泽东又说：“这又是你们抓住了更重要的要害呀！只要坚决地坚持下去，就能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军呀！”

吴瑞林又谈到对付敌人的毒气战，采取每人准备一块大的纱布或白布，用水浸湿捂在口鼻和眼睛上；在山上如无水可取，则可用尿代替，亦可预防。并讲起在抗日战争中，遇到这种情况就曾用尿来防毒气时，毛泽东称赞说：“这很好嘛，我们的老同志有经验嘛。这种办法要及时往下传达，用土办法对付洋东西，这是我军的光荣传统嘛！”

接下来，毛泽东还详细询问吴瑞林只带两名参谋，冒险深入朝鲜侦察地形的经历。

吴瑞林汇报，他这一趟侦察获益颇多，实地察看了朝鲜地形后才知道，步兵从火车道上走障碍太多，速度太慢，他就想了个主意，事先派工兵把木板搭在枕木上，与铁轨镶平，再用两爪钉钉牢，这样既不影响铁路上过火车，步兵也能以4路纵队大踏步通过。一个团两三千人，一小时能走十好几里。他们还在江水浅处修了水下桥。

吴瑞林说他看地形时，光着身子到江中试了一下，认为可以用石条铺水下桥，离水面有半尺深，这样美军飞机在天上就看不见，不但步兵可以过，派工兵在两岸抢修出简易公路，连车辆、马匹也都能从水下桥过去。

毛泽东听了拊掌大笑，说：“这个办法现在可用，将来也可以用，这就叫天无绝人之路嘛，好！好！这个能算你吴瑞林的发明。”旋即又问：“修水下桥的石头从哪里来？”

吴瑞林回答：“我看地形时，发现在通化北面一个叫大理寺的地方，堆放着许多伪满洲国准备在那里为溥仪皇帝修建皇宫用的条石。我们就用火车把这些条石运过江来了。另外，通化地委书记张雪轩同志根据我的要求，动员石匠打造了一部分条石送过来。还组织了一千多名石匠和建筑工人，在工兵指挥下，很快就建成了几座水下桥。”

毛泽东听得高兴，又笑着说：“好呀，好呀！北朝鲜江河多，都可以采用这个办法。”

“修桥的石头那里有的是，在我工兵营的指挥下，北朝鲜人民军也修了水下桥。”

“有图纸吧？”

“有”。

“有总结吗？”

“有，不过这次没带来。”

毛泽东满意地说：“送给东北军区，要他们研究，这个办法不单在朝鲜有用，就算以后美国人打过了鸭绿江，我们在东北对付他们时，也用得上啊！”

接着，毛泽东很有兴趣地说：“我从战报上看到你吴瑞林在公路上炸石头，炸毁、炸伤敌人的坦克车十余辆，你说说，是怎么回事？”

吴瑞林说：“第一次在黄草岭作战，敌人出动坦克，沿着悬崖脚下的公路向我们进攻。我就采用了这个办法，叫工兵在石缝中塞上小包炸药，扩大口子后，再装上几百公斤炸药，电发火，用电话机起爆，飞起的石头一下子炸毁敌人坦克车5辆，炸伤8辆。敌人不知道我用的什么战术和新式武器，地面部队五六天不敢行动。第四次战役打开后，在龙头里、元宝山、中元山三个不同的方向，我都采用过这种方法，炸坏了敌人不少坦克和装甲车。”

毛泽东点点头说：“美帝国主义有飞机、大炮、坦克的优势，我们有山头，有石头嘛！”说完用手指着吴瑞林的头继续说道：“还有这几千、几万、几十万个脑壳嘛，这就是我们强大的优势。”说着毛泽东拿起吴瑞林递给他的两份表格说：“我看了这两份表，你们打了近3个月的防御战役，还有29000人啊，还保持了一个2000多人的完

整团呀。”^①

吴瑞林说：“这是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的教导嘛。”

毛泽东问：“你保持一个2000多人的完整团的意义是什么？”

吴瑞林回答说：“我当时考虑留这个团的作用有三：一是防止敌人空降；二是防止敌人从海上偷袭登陆，保证侧翼安全；三是万一哪个地方出了漏洞，就用来补漏。”

毛泽东说：“好嘛，打仗要有预备队，以防万一嘛。你考虑得很细、很好呀！高级指挥员要有各种应变能力，这是非常必要的。”

毛泽东站起身来，在屋子中间踱了几步，又转过身子，面对吴瑞林问：“我听说从敌占区找回来的朝鲜人民军部队和指挥员，都想找你吴瑞林军长谈谈，有这事么？”

“有，”吴瑞林挺直了身子回答说，“那是因为我熟悉他们的干部比较多，时间也长些，他们想找我了解我们志愿军的情况。他们想知道，我们支援他们参战，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对此，他们心中没数。我是根据彭老总的指示，和他们30多个师团级干部、4个军级干部谈了话。这些人中，有我在三个不同时期认识的三批人，他们都认识我，或者知道我。”

“噢，三个不同时期？怎么回事呀，说来听听。”

吴瑞林回答：“第一批是在1945年，我们刚从山东到东北的丹东时，在那里招收学生办军校，肖华同志派我兼任校长，一下子就招收了1600多人，其中有朝鲜族学生600多人。我每个星期抽时间去讲一两次话。金日成同志回国路经丹东时，我根据中央指示曾向他汇报过，后来他派崔庸健副总司令来看望这些朝鲜族学生，他们感到很好，就把这批人要走了。第二批是我们到东北后，组建了一支朝鲜族队伍，支队长是李红光，有7000多人。这支部队后来发展为两个师，全副武装，很能打仗。再后来金日成同志将该部队要去改编成为第5军团^②。第三批是中央军委曾把各野战军里的朝鲜族同志集中起来，整编成立了一个加强师，我们42军那时驻在河南郑州。因为其中朝鲜族人原属四野的最多，四野首长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军担任，这个师共编了4个步兵团，1个炮兵团，1个技术营。我给他们讲过几次话，所以认识我的各级干部都有。”

^① 42军跨过鸭绿江时有5万余官兵。

^② 就是方虎山和李德山的两个朝鲜师的前身。



毛泽东说：“这很好嘛！这对朝鲜人民军的建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嘛。”

“可是就因为我去执行这项任务，却耽误了直接指挥在新仓里消灭美骑1师一个团的穿插任务。”吴瑞林说。

“一个团是个战术问题嘛，而与人民军干部谈话，要他们回到敌占区去找被打散的部队，是个战略性的任务。你执行彭老总的指示是对的，是有重要意义的。”毛泽东鼓励说。

1952年11月29号中午，金日成在平壤牡丹峰首相官邸，召来朴一禹、方虎山、李德山、徐辉等一大批“延安派”将领，设宴为即将率42军回国轮休的吴瑞林军长和郭成柱政委饯行。

听了吴瑞林说他当年带着两名参谋先期过来侦察的经历后，金日成说：“果然不出所料，1950年8月，我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看到后方发来的一份电报说：有3个人坐在火车头上，其中有个瘸子用手指指这边，又指指那边，一个胖一点儿的人在纸上画。我看到后，就估计是你带着人过江来看地形。”

金日成一听有个志愿军的瘸子首长带着人到朝鲜看地形，马上就猜到是吴瑞林，是因为林彪带着四野入关后，吴瑞林率领的42军没去，留在东北，和金日成打了不少交道。

吴瑞林曾两次负责把解放军中的朝籍官兵遣返回朝事宜，他对记者说：“两次遣返总数约为5万人，他们基本上都愿意返朝，只有极少数要做说服工作。第一次是在丹东，当时接待金日成和其下属几千人。我找人给他做帅服，给其余人做军服，让他们回去开国。第二次是1950年，在郑州，遣返费我记得每人发了5元。”

那年月，在重庆、成都，两毛钱能买一大盘回锅肉；在上海、杭州，5分钱能吃一碗阳春面；在济南、保定，一毛钱能买很大一个驴肉火烧。5块钱，可不是个小数。

2. 死神的味道

随着战事的逐渐扩大，更多的志愿军源源不断地开进朝鲜三千里

江山。

以最快速度响彻全军的，是刚入朝的第3兵团第15军军长秦基伟发出的豪言。

他在全军营以上干部参加的战前动员会上掷地有声地表态：“我——秦基伟，到朝鲜来，不在功臣簿上署名，就在烈士碑上留名！”

5万条手臂高高举起，5万副喉咙齐声宣誓。

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①晚年回忆：“当时由于战情紧急，为了抢时间，兵团党委决定组织由各军军长、师长、团长参加，以军为单位，由军长亲自带领的先行勘察队，先期乘汽车至指定的集结地域，铺开摊子，等待大部队到达后立即投入战斗。”

杨得志率领他的兵团司令部过鸭绿江没多久，要不是遇上一个英勇的朝鲜少年，数百人的兵团指挥部，便差点集体进了鬼门关。

杨得志与兵团司令部人员在丹东登上火车，乘专列进入朝鲜。列车开得飞快，1100多米长的鸭绿江大桥一掠而过。如果说已经遭到美军飞机数番轰炸的丹东是处于临战状态，那么专列一过鸭绿江，过了新义州，或者说一踏上朝鲜的土地，战争的烟云便扑面而来了。

美军飞机三五成群，来往不断，远处不时传来隆隆的爆炸声，还伴着闪烁的火光。既有敌机扔下的炸弹，也有我军高射炮兵射出的怒火。茫茫大地上空空荡荡，几乎看不到一个完整的村庄。

夜幕降临，在东南天际时而腾起的一颗颗信号弹、照明弹，不时将漆黑的夜空撕裂成碎块。

为了避免遭到空袭，17日拂晓，专列过了定州车站，火车头把第19兵团司令部机关乘坐的4节客车车厢送进定州南边的一个长长的山洞里，又把后边装载着车辆物资的几节平板车送进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山洞，准备等到天黑后再走。

杨得志等机关人员乘坐的车厢进入山洞，里面一片漆黑。天黑人静，成群结队敌机的轰鸣声更加清晰，时而倾泻下来的炸弹震得山摇地动，似乎连洞内的火车都要掀翻一样。

杨得志从车上下来，无目的地顺着车厢随便走了走，只见同志们有的三三两两坐在一起，交谈着什么；有的将地图摊在地上，打着电筒不知是在察看家乡还是在查找现在所处的位置；也有的在写日记。

^① 杨得志，朝鲜战争后期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有不少同志看见他经过，性急地问：“司令员，我们什么时候走呀？”

有的更干脆，大声叫嚷：“走吧，司令员，到了朝鲜还整天躲在洞子里，也太窝囊了。”

好不容易等到太阳下了山，火车头“隆隆”靠近的声音给大家带来极度的兴奋。年轻人你戳我一下，我戳你一下，手舞足蹈，像是马上要出击的敢死队员一样亢奋。

大家刚上火车，便听得“咣当”一声巨响，车头与车厢的挂钩撞在一起，然后车厢缓缓开始了移动，逐渐加速，越来越快地驶出了山洞。

朦胧中，杨得志感觉到似乎有些不对，这长长的车厢不像是被车头拉着往前走，而是在往后退。不过，这样的念头仅仅是在脑海里闪了一下，就马上被自己推翻了，不会的，这大概是在漆黑的山洞里待了一整天后，大脑出现的错觉。

也就在这个时候，已经出了山洞的专列速度骤然加快，车向前倾斜，小桌上的茶缸、军用水壶等物件直滑，相互碰撞，叮当乱响，杨得志伸手抓住座椅靠背也站立不稳。

有人大叫起来：“怎么回事？这车走的方向好像不对！”

兵团作战科副科长余震大步跑到杨得志和兵团政委李志民跟前，叫道：“糟了，我们的车厢没有火车头了！”

杨得志一听大吃一惊，扶着靠背，透过车窗向车前车后看去，果然没有看见火车头。车厢顺着山势，由高向低，风驰电掣般地朝着远处来时的山脚下飞速滑去。

李志民大喊：“快拉制动闸！”

几个人在叫喊声中同时拥向了车厢另一头的制动闸。

但是，由于坡度太大，车速太快，制动闸已经无济于事，受制的车轮在钢轨上摩擦出一串串闪亮的火星。

车窗外的丘陵、山崖、树林，闪电般地后退去。当时车厢里除了19兵团的负责同志，还有兵团司令部机关的全部人员，可以说这里是19兵团的神经中枢。

片刻的慌乱之后，李志民看着杨得志和兵团副司令郑维山，说：“怎么办？”

郑维山反应奇快：“跳车！赶快跳车！”说罢呼地蹦上座椅，双

手提起车窗，踩到茶几上，就打算往外跳。

杨得志赶紧喊道：“不行维山，车速太快，跳下会摔得粉身碎骨！”

十多分钟后，车厢飞一样滑回了定州火车站，老远就看到迎面停着一列货车。所有人的心都悬了起来，一旦与货车相撞，必定是车毁人亡！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见月台上箭矢一般射出一个瘦小的身影，迅速扳开了道岔。

一瞬间，杨得志等人乘坐的4节车厢驶向了另一条铁轨上，冲出一段距离后，才缓缓停了下来。

多少悬起的心，这才“咚”地落到了实处。

杨得志和李志民、郑维山赶紧跑下车去，向这个“救命恩人”道谢。这时大家才发现，扳下道岔的居然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小男孩，穿着也非常破烂。小脸小手被冻得像红萝卜似的。给几位志愿军大首长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小孩胸前还挂着一支比他矮不了多少的美式冲锋枪，和那一副少年老成的面孔和神态。

可惜双方语言不通，杨得志等人只能用手势表达感激之情。

这时正好有位六七十岁的老大爷过来，用杨得志等人能够听懂的中国话说，北朝鲜的成年人都上前线打仗去了，这位小朋友替哥哥在这里当扳道工，还兼着车站的警卫工作。

老大爷还对他们说，这个车站的全部工作，都是由妇女和儿童承担的。

杨得志晚年感叹道：“这是我们踏上朝鲜土地接触到的第一位朝鲜群众，他虽然是一个只有十三四岁的小孩子，但是他的气质、他的勇敢和机智不能不使我们这些成年人有肃然起敬之感。我让警卫员给他拿来一些吃的东西，他很爽快很大方地收下后，对老大爷说了些什么。老大爷翻译说：‘孩子说，谢谢志愿军东木（同志）！’我一下把孩子揽在了怀里。”

等到车头追上来，他们才弄明白车厢自滑的原因，原来是挂钩出了问题，车头挂车厢时没有挂上挂钩，反倒撞了一下，车厢就顺着倾斜的山势滑跑了。

此时重新挂好车头，告别了小扳道工，告别了定州火车站的妇女和儿童，志愿军乘坐的专列重新又踏上了征程。



路途中谈起这事，大家还颇有些后怕，想到当时郑维山急得跳窗的狼狈样儿，又觉得好笑。

事出偶然，杨得志虚惊一场，只是近距离闻了一下死神的味道。可在当时的朝鲜铁道线上，却真是险象环生，几乎每天都要出事。

三登火车站被炸，堪称志愿军后勤史上最为惨痛的一页。由于南韩军派遣过来的便衣特务潜入车站附近，用镜子向美军的轰炸机群发信号，志愿军留在车站附近来不及运走和屯积的共有204节车皮的物资，最后只抢救出了6车皮。其损失的生、熟口粮，油脂，军衣都以数百万斤、数十万件计，而且还有大量其他军事物资被炸毁烧尽。

那时南韩军特务经常潜入“三八线”以北志愿军的后方搞破坏，让志愿军防不胜防，伤透了脑筋！

在志愿军野战医院工作的朝裔华裔老兵长金，就亲身经历了南韩军特务的一次破坏。

那是我们第一次入朝，我们一个战友把命都丢了。那回是在一个火车站上，我们都在等“错车”，那时因为铁路线少，许多火车相汇时，要统一指挥调度。本来我们的车已经停在那里了，对面又开过来一趟车，混进车站里的南韩特务打了一个绿灯信号，让它通行，那车就一直撞了过来。

我们当时正是停车休息，车门也开着，我们那个战友站在车门口撒尿呢，车一撞，车门随着惯性一关，那力量很大，一下子就把他夹在那里了。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出事了，也不知道是有人搞破坏，只是骂骂咧咧的，骂这些朝鲜调度瞎指挥。

到了吃晚饭的时候，那个战友还站在车门那里，那时乱糟糟的，谁也没“屡护”（东北话，“在意”或者“注意”的意思），叫他过来吃饭，他也不动。我们拿手电筒一照，他满脸是血，过去一看，脑袋都夹扁了，脑浆糊了一脸，一拉就倒下来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是南韩军特务搞的鬼。刚入朝的时候，火车站上的员工用的都是朝鲜人，一些南韩军特务就混在里面，那时都是到了晚上火车才开，黑灯瞎火的，这帮特务就趁机搞破坏。比如，你这趟车本来可以通过，他给你打个红灯，你以为又是“错车”，还停在那里傻等呢。

后来我们志愿军发现铁路工人里混进了不少南韩军特务，也没法清理干净，就干脆让志愿军来个军管，把朝鲜人全送进军队去打仗，由我们国家的东北铁路局派人过来，把朝鲜的铁路全部给接管了。^①

长金先生说：“要说南韩军特务，最可恨的是在车站上乱打信号，给美国飞机指目标。我们三登火车站那么多物资被炸，后来才弄清楚就是特务打的信号。再说我们志愿军总部吧，大榆洞那里连我们自己人都不知道，它美国飞机咋就能发现呢？还准准地把凝固汽油弹扔到彭老总的司令部头上。要不然毛岸英也不会死。你说它‘黑寡妇’侦察机眼睛咋就那么‘尖’（东北话，锐利，或者聪明的意思）呢？不可能嘛，肯定是特务搞的鬼，它才炸得那么准。南韩军特务那时候主要任务是给美国飞机找目标，满山乱转，发现目标就打信号枪；如果是白天，就做记号啥的。

“后来我们发现了，你打信号弹，我们也打信号弹，特务那信号弹就是暗号，比如打几发，都什么颜色的，肯定有含义。我们搞不懂这些含义，就跟他们打同样的信号弹，你往哪个方向打，我就往别的地方打；你打啥颜色，我也跟着打啥颜色；你打几发，我也打几发，搞得美国飞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全被我们搅乱了。

“我们在朝鲜都不准用小镜子，就是因为南韩军特务经常利用镜子的反光给美国飞机打信号。我们的汽车挡风玻璃都抹上泥，或者用树枝伪装起来，也是怕玻璃反光。

“说起南韩军特务，那确实让我们挺头疼，弄得我们后方挺乱的。实在没法搞清楚那些朝鲜人谁是老百姓，谁是特务，或者说特务就是老百姓里面的人，他被收买投敌了，和老百姓一样生活在这里。他们也种田，也和我们打交道，但他脸上又没写字，真假难辨。更可恨的是一些特务干脆就穿上人民军的军装，你一看他官衔还挺高，坐着吉普车，还挺威风，我们还得给他敬礼。

“那时我们的哨兵只是检查介绍信，特务也有伪造的介绍信。我们发现这种情况就想办法了，在介绍信上做标记。比如，去某地的介绍信，在信纸的下方有一道红杠，如果是往返，就有两道红杠。特务

^① 引自志愿军老兵长金口述。人民网。



不知道这个变化，一拿出假介绍信就被我们抓住了。我们就这样抓了不少特务，他那介绍信上没红杠，还装得挺牛，嘿嘿，被我们抓了、毙了，还不知道自己是露了啥破绽。”

3. 大将军一诺千金

志愿军将领中除了“吴瘸子”，还有勇冠三军，打起仗来不要命，顶撞起上级来也不顾后果的“王疯子”。

“王疯子”大名王近山，在群星闪耀的志愿军将军谱里，若不是他后来指挥打了上甘岭一仗而名震天下，以战绩而论，他不仅算不上最耀眼的一颗，甚至还因第五次战役中他麾下的第60军180师全军覆没，而从此难以扬眉吐气。

王近山的女儿王媛媛回忆：“第五次战役失利后，爸爸在总结会上大发雷霆，他把一个伤兵要见见美国大鼻子的话也捅到了会议上：‘我们的兵连美国人的面都没见到，就全让人家给拍了，这么打仗怎么行？这是放羊撵狗打法，不讲战术！这样打滥仗，是葬送军队，是拿我们的兵去送死！’”

自己打了败仗，居然还敢当着彭德怀等总部首长的面大发雷霆，公然责怪上级首长指挥失当，恐怕也只有“疯子将军”才有这份胆量。

上甘岭一仗是王近山在朝鲜指挥的最大动作，他这“一撒疯劲”，上甘岭这不到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引得双方各自投入兵力10多万人，战死战伤4万多人。克拉克原来想“出其不意，只要用两个营的兵力5天就可以达成目的”，最后不得不说：“‘金化攻势’发展成为一场残忍的挽回面子的恶性赌博，……这次作战是失败了。”

他的下属美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则更是公开承认：“这是战争最血腥的和时间拖得最长的一次战役，使联合国军蒙受到重大的损失。”

王近山15岁参加红军，二十几年间打了多少胜仗败仗恶仗，他自己也数不过来，故而写王近山生前死后如何打仗，如何得一“王疯

子”绰号的文章，多得来铺天盖地。

笔者不谈王近山打仗，只谈他那独特鲜明的个性，谈他那大将军一诺千金的豪侠劲儿，以及因为这股子“豪侠劲儿”给自己带来的后半生的跌宕起伏，充满悲情的命运。甚至连毛泽东都拿他当个共产党高官里的陈世美，将这位以善打硬仗、恶仗而勇冠三军，独树一帜，屡建奇功的开国中将，开除党籍，逐出军界，谪贬到地方一个县级农场当个场长还是个副职，可以说是一撸到底了……红与黑，败与胜，仁与义，对亲人的情山与恨海，以及后半生的光荣与瑕疵，全都为王近山个人所拥有。

1950年11月，第12军军长王近山离开重庆，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兵团副司令员，率部征战朝鲜。司令员兼政委陈赓因在越南丛林里指挥胡志明的部队作战，刚回北京就病了，故而未能到职，王近山就成了第3兵团的代理司令员。

他这统领十几万人的大司令和彭老总、吴瑞林一样，扔下庞大的部队，带着参谋长王蕴瑞和一个警卫班先行入朝，勘察地形，了解情况。

给王近山开车的人许多年里雷打不动，就是和他后半生的悲情人生休戚相关的朱铁民师傅。

如今90岁出头的朱大爷和老伴住在北京通县一栋没有电梯的老式楼房里。简陋的家里清汤寡水，像块白板。最醒目最有价值的，无疑就是身着志愿军军装的朱大爷，和兵团司令员王近山在朝鲜战场留下的一张黑白照。

朱铁民从解放战争开始就在枪林弹雨中为王近山开车，到了鸭绿江边，王近山要赶在大部队前面去看地形，没人敢给他开车，朱铁民也不敢。王近山就拿脚踹他，还红眉毛绿眼睛地骂开了：“狗娘养的，莫非你也害怕美国飞机往你脑壳上下蛋蛋！”

朱铁民说：“不是我怕美国佬往我脑壳上下蛋蛋，我一个小兵疙瘩‘光荣’了，没啥，司令员你要在我车上有个三长两短，我有几个脑袋，敢负这天大的责任？”

最后，还是兵团保卫部认可了首长的命令，朱铁民才敢下决心大白天把王近山拉过鸭绿江去，头顶着美国人的飞机四处转悠。他心里赞道：“全军除了我们的疯子司令员，任谁也不敢这么干！”

出发时全都带了枪，还往车上装了些猪肉罐头，再带上一箱朝鲜



苹果。朱铁民挎上他的德国20响，王近山也带了一支他在二野时缴获的一位国民党兵团司令佩带过的“勃朗宁”。他最喜欢美式卡宾枪，又轻，还能连发，吩咐警卫班长也替他带上了，有时爬坡上坎看地形，王近山就拿卡宾枪当拐杖使。

警卫班带上了长短武器和手雷，并且装足了子弹。

提起和王近山在朝鲜打仗的那些久远得已经发黄破旧的日子，朱大爷的眼睛里立刻放出灼人的光芒，满是皱纹的脸颊上露出红晕，也不咳嗽了。说起自己的老首长，就像回忆自己的兄长父辈。

“参谋长王蕴瑞坐第一辆车，王近山坐我开的第二辆车。那时总部有规定，怕招来美国佬的飞机，白天都得找地儿猫着，夜里才准出来活动。可夜里不能开灯，路上实在不好走，还危险，一个闪失就下了深不见底的悬崖。我就出了个‘伤天害理’的馊主意，找几个身高腿长的警卫战士，身上披块白被单，轮流在前边带路。车在黑暗中跟着他们的身影走。开始还可以，但走着走着就不行了，为啥呢？战士是肉体凡胎，咱是铁家伙呀，车与人同步，一个是速度太慢，再一个呢？当兵的身体再好，时间长了你也吃不消啊，接连跑伤了好几个战士，严重的都累得吐血了。司令员就说：晚上是比白天安全，可是黑乎乎的怎么看？不但看不清楚，还看得慢，这样老牛慢车地看到哪一天呢？兵贵神速啊，地形、地貌、山川、河流、制高点白天看，多清楚呀！干脆，咱们白天出去。”

朱铁民担心地说：“首长，白天出车，敌机满天上乱窜，公路上就我们这两辆车，很容易被敌机逮着，成为攻击目标的。”

王近山眼一瞪：“我说白天就白天，怕死给老子滚一边去！”

光天化日之下，两辆汽车沿着公路——实际上大多是崎岖不平的山路——不断地绕过弹坑前进，遇上实在太大的弹坑，护路的朝鲜老百姓就用肩膀把车扛过弹坑。两辆车拉开距离，缓缓前进，王近山和王蕴瑞用望远镜观察着地形，一边商量和作指示，作战处长在地图上做标记。王近山还时不时叫朱铁民停车，徒步登山，把地形看个仔细。

第三天正紧张地看地形时，朱铁民看着老百姓惊惊慌慌的样子和跑的方向，就知道敌机从南边过来了。他让首长赶紧下车，警卫员保卫着两位首长，迅速跑进路边山坡上的一片草丛里隐蔽起来。

这时，两架“油挑子”已看得真真的，轰鸣着出现在头顶上。

朱铁民第一个念头就是如何把“油挑子”引开，引得越远，首长会越安全。于是，他驾驶着空车，跑跑停停，故意招引敌机，有时朝前加油猛冲，等敌机俯冲下来扫射时，他猛然一个刹车，然后又飞快地往回倒车，等敌机调头回来，他又流星般朝前开去了。

两架“油挑子”撵着他打，子弹一阵阵像暴雨般泼洒下来，在他前后左右绽开了朵朵泥花，就是伤不了他，看得两位首长和警卫员全都惊呆了。

王近山在坡顶焦躁地看着朱铁民的动作，一颗颗炸弹就像炸到他心窝上一样。他急了，伸手向警卫班长要卡宾枪，想开火打俯冲下来的飞机。警卫班长拒绝执行命令，说临出发前保卫部长有交代，任何情况下也不能暴露首长的目标，必须把确保首长安全放在第一位。

王近山大骂：“你们这些胆小鬼，老子都不怕死，你们还这么怕！敌机再俯冲下来，你们全都给我打，我这老伙计若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把你们这帮家伙全‘突突’了！”

这时鬼子飞机发现了情况，像发了疯的野兽，掉过头就猛扫机关枪，还狂扔炸弹。警卫班长奋不顾身地压到王近山身上，但碎弹片仍击破了王近山的左臂，霎时血如泉涌。大家忙给他止血，用急救包包扎。王近山挥了挥还渗着鲜血的左臂，安慰大家：“没有伤着骨头，挂了点彩，美国飞机想炸死老子，没那么容易。”

朱铁民晚年对上门采访的记者说：“司令员是志愿军兵团以上首长在朝鲜唯一负伤的人。美军飞机飞远了，变成两只‘嗡嗡’叫的小苍蝇了，我急忙往回开。首长从山坡上下来，见我灰头土脸，帽子也跑丢了，枪挂在肚子上摇晃着，急忙上前抱住我的双肩问：‘受伤了没有？看你这个样子，哪像个志愿军，像他妈个土八路了……’我猛然发现首长臂上血糊糊的绷带，知道首长为我负伤，不由大哭起来。首长也悲喜交加地说：‘伙计，哭个啥？咱们不都好好的吗？’还当着大家的面，拍着胸口说：‘我这个老伙计上医院查了，死精，没有生育能力。我决定了，今后不管我老婆生儿生女，都送给朱铁民，让他（她）拿铁民当亲生父亲孝敬，替铁民养老送终！’您说说，我和首长是什么交情，那真是不掺一点假水的生死之交啊！”

兵团司令员和小车司机一起在鬼门关前打转转的经历，远不止入朝勘察地形这一次。

刚打过第五次战役，总部通知王近山等兵团首长去桧仓开会。白



天飞机太猖狂不能出车，就晚上乘4辆车去，警卫车打头，3兵团副政委杜义德紧跟其后，政治部副主任李震殿后，王近山的车走在李震前头。刚开出20多公里，敌人的夜航机突然来了。

沿途志愿军防空哨不断鸣枪报警，朱铁民立刻关了灯，首长和警卫员飞快下车躲到树林里。

美国人很狡猾，不时发射照明弹，用机枪扫射和投下炸弹。

敌机越飞越近了，发动机的轰鸣声越来越大，朱铁民和几位驾驶员也离开公路，跑到树林里隐蔽下来。

这时，他突然听到王近山一声怒吼：“他妈的，谁的车灯没关？”边吼边站起身来，身边的警卫员都冲上去摁住了他。

朱铁民往停车的公路上一看，才发现是李震车上的灯没关。李震的司机是个刚上来的新兵，慌乱之中犯了错。

他的心差点蹦了出来，这大灯亮着还得了！那一刻朱铁民连想都来不及想，就冲出树林，扯掉脚杆往山脚公路上跑去，一把将车灯关掉。可这还不行，为了保险，他索性摸黑把车往前猛开了一长段，幸好敌机没有看清怎么回事，便扬长而去。事后大家都长嘘了一口冷气，说真是有惊无险。首长们纷纷上前和朱铁民握手，夸奖他勇敢机灵。

重新出发后，王近山嫌走走停停太慢，说这什么时候才能到总部？他发现每当敌机一来，防空哨枪一响，公路上车辆和人群就纷纷躲起来，敌照明弹又把公路照得如同白昼。于是灵机一动，对朱铁民说：“伙计，咱们来它个出奇制胜，你趁着敌机照明弹的亮光，紧冲快跑。”还冲后面的车大声喊：“不怕死的，跟上老子的车往前冲！”

这样一来，车队不一会儿就开出去很远。没有照明弹的亮光，王近山竟然还命令司机打开车灯，灯一开前面的人车纷纷让路，因为都怕引来敌机轰炸，这样就又加快了行军的速度。后面的车跟得很紧就不必开灯。

当然，这样的情况是违背灯火管制纪律的，防空哨兵急得直往带头的吉普车上空放枪警告，但王近山仍命令朱铁民：“不要管他，往前开就是了。”

能够按时赶到总部开会，可以说是用命换来的。

“事后，司令员特别奖给我两条中华香烟和几个朝鲜苹果。过

去有人问我，你这辈子跟王近山学到了什么？我回答他们，就学会一样，不怕死！就说在朝鲜吧，上甘岭战役从1952年10月14日开始，总共打了43天。最紧张的时候，司令员看着一支支部队雄赳赳、气昂昂地开上阵地，两天就打光了，再派，上去的个个视死如归，后面又整装待发，全无惧色。敌人封锁太厉害，我听首长给洪学智挂电话：‘洪麻子，老子的司机、警卫员眼睛都饿花了。老子缺弹药，缺食品，缺水，你得保证供应。’洪回话：‘王疯子，你别着急，我想办法供应，就是背，老子也给你背上去！’首长有时着急还骂过他手下的军长：‘秦基伟，你要守不住，就给老子滚回去放羊！’上甘岭一开始被认为是为两个小高地的一场小战斗，后来越打越大，成了震惊世界的大战役了。战事越来越紧，首长上了火，经常三天两夜不睡觉，也不怎么吃东西，一碗饭经常是让我和炊事班长端上来又端下去，他还命令我把仅有的一箱苹果送到前线部队。我心疼首长，悄悄在口袋里装了几个，给他关键时刻解渴顶饿用。有时搞点雨水泉水什么煮碗炒面、挂面。没有一点蔬菜，不少官兵得了夜盲症。首长浑身是枪伤弹痕，我真担心他会累倒，他却一边看地图一边轻松地对我说：‘老朱，咱们都是穷人出身，知道什么野菜能吃，你到后山摘点树叶，刨点野菜什么的去吧，别忘了带上你的20响！’从解放战争到朝鲜战场，从北京军区到公安部，都是我给他开车，要不首长怎么能把他的亲闺女媛媛送给我当女儿？电影《英雄儿女》里面军长和女儿王芳的关系就是受到我和首长真实故事的影响哩，拍电影那会儿，导演和编剧，都来找我聊过几次哩！”

王近山将军的女儿、北京医科大学主治医师巧巧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打上甘岭时，我父亲是3兵团代司令员，指挥四五个军，还有两万多朝鲜人民军。他的掩体指挥部离上甘岭不远，有一个连队在前线，被打得只剩两个人了，但他俩仍然顽强地战斗，被打瞎的战士眼里流着血，背着被打断了腿的战士向扑上来的敌人射击。父亲告诉我们：‘上甘岭上不算24000名伤员，每平方米平均就有咱们阵亡的3.2个兵，这是我指挥过的最惨烈的战役。’父亲那时才30多岁，虽然多次在战争中负伤，但看到这样的情景，那股子‘拼劲’和‘疯劲’全上来了，忘记自己是十几万部队的司令员，夺过卫士的冲锋枪就往掩体外冲，警卫班五六个人一齐扑上去，才把他拦住了。后来兵团党委专门作出一个规定，任何时候都必须有一个卫兵守在掩体口，阻止王



司令员上战场。”

王近山的“疯劲”一撒，把全世界都震撼了。

他和他麾下的官兵们把上甘岭变成了一支军队、一个民族精神和意志的丰碑。败北的一方当然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记忆：为什么占尽了物质和技术优势，却无法逾越这两个小小的山头？这场战事结束多年之后，一位名叫沃尔特·G. 赫姆斯的美国战史学者仍然对当年那些中国士兵“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的勇敢表现十分不解且耿耿于怀：中国军人竟然敢于穿过“联合国军”极为密集猛烈的炮火——甚至他们自己一方的掩护炮火，冲进战壕与对手血肉相搏！

可能是百思不得其解，赫姆斯先生很省事地就把答疑解惑权推给了神经外科：“一些战场观察家们认为这可能是他们服用药物的结果。”^①

这样的话在胜利一方的士兵们看来，只能是一个笑料。

在当年的上甘岭，在当年的朝鲜半岛，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多少这样勇敢无畏前仆后继的士兵？这支军队常常是饥寒交迫连饭都吃不饱，只能以“一把炒面一把雪”糊口——在上甘岭甚至连水都喝不上一口，何曾奢华到了乞助于药物来壮胆的地步？什么药物能让黄继光扑向机枪眼？什么药物能让“为整体为胜利而自我牺牲的伟大的战士”邱少云默默地忍受烈火在自己身上肆虐？眼睁睁看着烈火把自己烧成一块焦炭而一动不动！

当年的上甘岭，还曾经诞生并极快地在战地上流传开这样一个真实的战例。

1952年11月4日在537.7高地北山的进攻战斗中，第15军第87团第5连战士薛志高、王合良身负重伤；薛志高臂折腿断，王合良双目失明，于是失明者背负起断腿者，断腿者给失明者指路，继续向前冲击并打击反扑之敌，在薛志高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后，失明的王合良仍然坚持战斗，直到被后续部队抢运下阵地。

这个故事感染和激励了上甘岭上诸多志愿军官兵。在这个故事诞生一个星期后，第12军第92团第6连在同一个高地继续与“联合国军”争夺。在战斗的紧要关头，一位叫程荣庆的重伤员向战友们讲起了兄弟部队这个“瞎子背瘸子”的故事，于是众多的伤员从血泊中撑

^① 沃尔特·G. 赫姆斯《停战谈判的帐篷和战斗前线·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起伤残的肢体继续投入战斗；而程荣庆自己再次负伤双目失明后，也与他人结成“互补组合”，在战友的指示下继续向进攻的敌人猛掷手榴弹，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这些普通士兵以鲜血和生命践行的是一种被他们称之为“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这支军队的创建者和统帅曾经对这样的精神作过这样的阐述：“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他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の場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瞎子背瘸子”故事的主人公之一的王合良^①老人生前曾经这样回答“眼睛都瞎了为什么还要打”的质疑。

“这不太好回答，我想来想去，可能有几种原因鼓励着我，一是到了东北知道了祖国之大，看见了无数烟囱在冒烟，数不清的工人同志们在生产劳动，这是在建设新中国呀！任何一个年轻人，看见这个，都不会不为之动容。我到朝鲜后一个月之内，收到祖国各城市学校和机关的慰问信有二十多封，还有很多慰问品——祖国这个力量就是这样传递给我们的！二是到了朝鲜，走了一晚上，没有看见过一所房子，就是看到一座城市，也是光秃秃的。上平康前线时，过了一个火车站，我数了一下，有80多个火车头被炸烂了扔那儿，也是光秃秃的没有一间完整的房子。90岁的老奶奶没房子住，连吃的都没有，都是部队从那儿过的时候接济一点——那时我们部队一天只开两顿饭，要省出一顿来救济朝鲜的老百姓。

“我们在平康前线的时候，当地朝鲜政府组织少先队员课余给志愿军挖野菜，一个少先队员背了一大背野菜给我们送来，走到半路就让美国飞机给炸得尸骨无存……那时我就想，这个战争要是摆在我们祖国，我们祖国不也得跟朝鲜一样？要是摆在我们西南，那么西南人民不也同样是牛马不如？我们的母亲也同样没有房子住，儿童不也一样被炸得尸骨无存？哪里还会有‘无数个烟囱在冒烟’？”

“退后一步是家园”，这就是当年的王合良们勇敢无畏的力量源泉！

不过，赫姆斯先生在同一部著作中也表现出了让人肃然起敬的坦率：“从中国人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所显示出来的强大攻势和防御能

^① 王合良，四川省三台县人。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等功臣，获二级英雄称号。

力中，美国及其盟国已经清楚地看出，共产党中国已成为一个可怕的敌人，它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那个软弱无能的国家了。”

后来，上甘岭战役被拍摄成了一部中国人无人不爱看的电影《上甘岭》，当影片上映的时候，已经跌落到人生最低谷的王近山特地去看。可他看了一半就泪流满面，中途退场了……

朝鲜战争结束，王近山归国后当上了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公安部副部长。到了1955年，40岁的王近山又被授予中将军衔。春风得意之际，没想到他的人生却触上了巨礁，一场感情变故，使他从辉煌跌落到了谷底。

而这场家庭变故的起因，竟然是为了兑现他当初在朝鲜战场许下的那句诺言：“今后不管我老婆生儿生女，都送给朱铁民，为老朱养老送终。”

1953年初冬，王近山的妻子韩岫岩生下了一个女孩儿，为了纪念抗美援朝胜利，王近山给女儿取名援朝。

援朝是韩岫岩所生的第6个孩子。

王近山守在产床旁，打量着孩子，心事重重，沉吟良久才期期艾艾地对妻子说：“岫岩……你晓得的，铁民上医院检查过，这辈子没得生育，这个娃娃……我已经答应送他，给他两口子养老送终了！”

韩岫岩一听犹如晴天霹雳，朋友再好，也不能好到拿自己的亲生骨肉当礼物送人啊！于是大发雷霆，坚决不允：“谁让你自作主张把娃娃送人啦？你和我商量过吗？女儿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天下有你这么当爹的吗？”

王近山咬着牙，一声不吭，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再提此事。

大家都以为王近山忘记了哩，其实一诺千金的大将军怎么可能忘了自己的承诺？

在王援朝两岁刚上幼儿园的时候，有一天，王近山背着老婆，偷偷摸摸把援朝抱出来，亲手交给朱铁民，对他说：“我把援朝交给你了，让她跟你姓朱，我每月给你40块钱，做她的生活费。”

后来朱铁民说：“当时司令员催我抱走援朝时，我真有点不敢相信，回头时，看见司令员眼里含着泪水。”

虽说王援朝被送给司机朱铁民做女儿，并改名“朱元”，小名叫“小元儿”。但其实她和父母并没有完全分开，因为大家都住在同一所大院里，朱铁民和陈美卿夫妇俩住前院，王近山和韩岫岩一大家子

住后院，三天两头都能见面。

为了区分两个爸爸，王媛媛把他们分别叫作“司机爸爸”和“司令爸爸”。

一字之差，天上地下。

王媛媛说：“对于父亲将我送人，我长大后没有一点儿埋怨。因为司机爸爸和美卿妈妈对我宠爱备至，当作心肝宝贝，总是给我穿最好的、吃最好的。可以说，我比其他兄弟姐妹们，更多了一份来自亲人的宠爱。”

正是朝鲜战场上兵团司令员对一名普通战士的庄重承诺，媛媛此生便有了两个爸爸。一个是“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才子自风流”的赫赫有名的传奇战将王近山；一个是“无名英雄垂青史，有胆战士壮山河”的普通司机朱铁民。

4. 情山恨海

但是，在妻子韩岫岩的心里，却埋下了对丈夫王近山不可原谅的怨恨，从此两人之间摩擦不断。

韩岫岩为了发泄对王近山强行把媛媛送人的怒气，开始不停地争吵、赌气，并且发誓这辈子再也不生孩子了，又是内服麝香，又是外用麝香。因为她是医生，知道麝香可以避孕。

王近山喜欢跳交谊舞，韩岫岩曾经是他最好的舞伴，但闹矛盾后，两人就再也跳不到一起了。

韩岫岩不跟王近山去，可她又不甘心别的女人跟他跳，想了半天，想出一个“好办法”，把自己大学毕业的妹妹韩秀荣接到家里，让亲妹妹去陪王近山跳舞——实际上，妹妹成了姐姐派出的“特务”，承担着监视姐夫的重任。

谁知，姐姐的做法却无异于引“狼”入室，妹妹早在王近山率12军随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剿匪驻扎在重庆时，就对指挥千军万马的姐夫崇拜得五体投地了。

中年以上的读者想必都记得，毛泽东未雨绸缪，离开西柏坡“进



城”之前，曾经督导全党全军高级干部，人人必须认真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其用意明明白白，就是希望和要求麾下的“文臣武将”们，千万不要一“进城”就争着抢着做那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他自己也绝不愿当李自成。

事实证明，这一剂“清醒丹”来得正逢其时。

1949年，刘邓大军挺进大西南，西南军政委员会在重庆成立，城市的社会秩序由12军实施军事管制。

王近山就是12军军长。曾经在抗战时做过临时首都的重庆城花团锦簇，香风习习，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集中了全中国最高档次的物质享受。从山沟沟里走来的有些将领们，一见重庆的女娃儿标致，心旌摇荡，纷纷打发了上不得台面的“糟糠之妻”，换得年轻貌美有文化的新妇。一时间歪风难煞，涌涌荡荡，竟成为时尚潮流。

不仅老百姓痛恨此种现象，西南军区政委邓小平同样对此现象深恶痛绝，在大会上狠批抛弃糟糠之妻的干部们思想堕落，作风腐化，是资产阶级的俘虏。他把城市比作染缸，城里的女人比作糖衣炮弹。为了“防糖弹、拒腐蚀”，他抓住“张唐事件”做典型，向全区干部敲响了警钟。

“张唐事件”的张，是张柯岗，时任12军宣传部长；唐系唐平铸，时任12军政治部副主任，都算得上位高爵显之新贵。张柯岗把自己的小脚老婆换成随军名记者曾克，唐平铸把大字不识一个的发妻休了，娶了个新潮大学生。邓小平拿张、唐开刀，是因为他俩都是表率军队的高级政工干部，警示全军最具有震慑力。

与此同时，12军还有48位师团级干部给老婆“换了一届”，都遭到了同样严厉的惩治。

在12军召开的党委扩大会上批斗张柯岗和唐平铸时，有人哼起刚在部队传唱的一首歌：“什么最可怕？享乐又腐化；什么最可怕？骄傲又自大；什么最可怕？功臣自居，自私自利，到处抓一把……”

这首歌是张柯岗写的词，时乐濛谱的曲。

批判者哼罢，指着张柯岗问：“歌词是不是你自己在批判自己？”

张柯岗辩解说：“我不是腐化，我只是改变了自己的爱情观念。”

当时，将领们对自己的婚姻离异，就像撤换战斗不力的部属，无

须通过法律，仅向上一级的组织部门备个案，然后给女方所在的县、区、乡政府发封函，凭借军队的大章和本人职务，没人敢站出来道半个“不”字。

最不服气的是张柯岗，整天牢骚满腹……张柯岗的愤然遭到组织上更为严厉的处置，命令他脱下军装，把他打发到重庆市文联爬格子。

邓小平还把“张唐事件”提到了巩固政权的高度。他责令军区所属的文工团，大演“李自成进京”以教育部队。

这出戏的剧情来自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说闯王率大顺军攻进北京，不爱江山爱美人，仅因死活爱上陈圆圆，把刚到手的新政权很快丢失。邓小平的目的是借古喻今告诫部队，要是像李自成一样为女人而堕落，就会退回太行山打游击。在他的倡导和影响下，由中共中央作出部署，在全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腐学习运动，从800万人民解放军中清理出数以千计“被糖衣炮弹击中”的干部。

一位副师长在一次批判会上放声大骂：“怎么怪‘糖衣炮弹’呢？都是你们偷鸡摸狗的，管不住自己，瞎戳乱戳，自作自受！”

王近山长得十分的英武俊朗，变着法子想和他接近的年轻女子，犹如过江之鲫。

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那时，王近山经常应邀给大学生作报告。他那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幽默风趣的语言、英俊硬朗的形象，让大学生们敬佩、喜爱得不行。这其中就包括韩岫岩的嫡亲二妹韩秀荣。

现在，姐姐请自己去陪姐夫跳舞，并担任监视姐夫的“特别任务”，韩秀荣自然求之不得。王近山因为与韩岫岩闹别扭，身边也没个说心里话的人，活泼开朗的韩秀荣就像是沉闷的天空射进的一缕阳光，给王近山带来了光明和快乐。

可韩岫岩看到王近山和韩秀荣一到周末就出双人对地去跳舞，平日里两人也谈笑风生，竟开始怀疑王近山与韩秀荣好上了，越来越厌恶丈夫跳舞。

不过也难怪，不少高级将领一男一女搂抱在一起跳舞，跳出事的也不少，北京为数众多的部队大院里，就经常为这样的风流韵事，弄



得来雷翻阵仗，有时甚至“挂红带彩”。

王近山负过7次伤，一条腿和一只胳膊都骨折过，他穿的皮鞋是特制的，一边要比另一边高5厘米，这样才能正常走路。

韩岫岩竟拿王近山的伤残身体来讽刺撒气，对人言：“别看他腿瘸，一搂着年轻漂亮女人跳舞就不瘸了。”

韩岫岩恨自己最爱的两个亲人如此对不起她。这让她伤心透顶，悲痛欲绝。她越来越不信任丈夫，不论王近山上班还是开会，都要严加盘问，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

韩岫岩就像一只刺猬，深爱着王近山，却总是在不经意间将他刺得遍体鳞伤，最后竟闹到了要离婚的地步。

其实，王近山一开始并没有离婚的打算，毕竟是结发夫妻，又有了那么多的儿女，谁家没有点磕磕碰碰呀？韩岫岩是海军总医院的副院长，同样是从战火纷飞的岁月里熬过来的女军人，显失女性的温柔与冷静，多了几分武断与泼辣。她完全不顾及王近山的感受，她那种固执暴躁的性格与我行我素的做法使事态很快不断地升级。

她使用了当时最流行的做法：发动亲友声讨、找组织、去妇联，甚至跑到北京军区和中南海去闹。

最后居然惊动了毛泽东，毛泽东亲自指定刘少奇出面处理。

刘少奇派人来做王近山的思想工作，王近山一听妻子把自己的“作风问题”告到了党中央，惊动了两位主席，成了“国家大事”，脑子里轰的一炸，就只剩熊熊怒火，呼呼燎窜了。

再加之没过多久，在韩岫岩的投诉威逼下，韩秀荣又被妇联的领导同志领着警察强行带出了门。

王近山就像一只被激怒的雄狮，疯劲陡地蹿上来，就再也没人劝他得住了。他不但不听组织的劝告甚至警告，反而向组织打离婚报告，坚决要和韩岫岩离婚。“我王近山好马不吃回头草，离婚铁定了，你组织爱咋办就咋办！”

1964年，韩秀荣被以“生活作风有问题”发配到遥远的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家医院工作；而且组织上有指示：韩秀荣不能再回北京的家，也不能在北京、天津等地工作。

总而言之，离王近山越远越好！

倔强的韩秀荣没有怨恨，没有哀求，孤身一人去了偏远的边疆。

从此，韩秀荣像是从人间蒸发了，几十年来，渺无音讯，韩岫岩

和子女都不知她还在人世。直到2007年，韩岫岩去世，韩秀荣才再次回到北京，向姐姐的遗体告别，王近山的子女们才再次见到她，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而这一别，竟是整整半个世纪！

韩秀荣的离开，不仅没能缓和王近山夫妻的矛盾，反而使事态迅速激化。王近山见妻子如此对待自己的亲妹妹，更加气愤地提出离婚。

韩岫岩更不服气了，她希望引起组织直至党中央、毛主席的重视，用最激烈、最强硬的手法压服王近山解决问题。韩岫岩天真地以为，利用组织来施加压力，就能使王近山回心转意，屈服于她。

如果这时的王近山能退一步的话，也许能“海阔天空”，起码职务、地位和家庭都能保住；而且，婚姻问题对于夫妻来讲，纯属“人民内部矛盾”，很难说清楚谁对谁错，关键是如何处理。

然而，韩岫岩的极端做法，却将王近山伤得体无完肤。

王近山是谁啊？那可是死都不怕、出了名的“疯子”司令，他怎么可能容忍自己的老婆如此伤害他的自尊心？于是，他坚定地把一纸“离婚诉讼状”，不仅送进了法院，还同时报呈了党中央！

王近山的离婚案，一时间引起了全军乃至全国的一片哗然。

当时，有不少高级干部进城后厌倦了原配夫人，换老婆现象相当普遍，社会影响非常恶劣。中央为严厉打击这种不正之风，对很多干部进行了严厉处分，当时官场称之为“铡美风暴”。

被韩岫岩一闹，王近山也很快被推上风口浪尖，竟成了“铡美风暴”中的典型。

尽管是新中国，离婚仍然是旧社会“休妻”的同义语，是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典型罪证，是洪水猛兽。王近山要将家庭改组进行到底，与当时其他个别高级将领的贪污腐化相呼应，顿时引起了中央和毛泽东的警觉。

老政委邓小平苦口婆心相劝，无效；周恩来总理亲自出面做工作，没用。

王近山得到最后通牒：“收回离婚报告就算了，否则，开除党籍、军籍！”

前来劝解的老部下们几乎要给老首长跪下：“王司令，我们都希望在你手下再打胜仗，你就承认不离婚，行吗？你哪怕等形势缓和一点后再离，也行哪！”

王疯子对爱情的执着也是一个“疯”字：“我王近山说出口的话，落到地上砸成坑。”

毛泽东火了，专门指示刘少奇主持“铡美案”，杀一儆百。

刘少奇找王近山谈话，希望王近山不要离婚，国家主席甚至明确警告他，离婚会受到组织上严厉的处分，只要不离婚，哪怕是维持现状也行。

但王近山却斩钉截铁地说：“我王近山明人不做暗事，离婚我铁定了，组织上爱咋的咋的！”

就这样，韩岫岩企图挽回丈夫的种种努力，最终换回的却是一纸离婚书。

1964年初，王近山和韩岫岩离婚了。

对王近山的处分也紧跟着下来了：撤销大军区副司令员职务，降为大校；开除党籍；转地方安排。

本来只是一件普通的离婚案，最终却沸沸扬扬地弄成了一桩震惊全军乃至全国的大案，还闹到了毛泽东那里，弄得高层震怒！

战将王近山被一撸到底，这大大出乎了人们的意料。只可惜王近山没有被战场上的千军万马打倒，却因为离婚事件被搞得身败名裂。他曾经的显赫战功被人们忽略了，却落下了一个“爱美人不爱江山”的恶名！连他的七个亲生儿女也全都站在可怜的妈妈一边，对头上戴着一顶“现代陈世美”臭帽子的父亲充满憎恨。

很快，王近山被安排到河南周口地区西华县黄泛区农场当副场长，由兵团副司令级别“滋溜儿”一声降为副科级。可能偌大中国，再也无人能够打破他创下的降职纪录。

王近山毅然决然的离婚，让韩岫岩恨得来钉心透骨。可王近山遭到组织严厉处分，韩岫岩却一点胜利的快感也没有。看着王近山寂寥地离去，她眼里流露出的是难以掩饰的苍凉和悲哀。

就在王近山收拾东西准备出发时，组织上曾经安排到他家里当过一段时间勤务员——主要是照顾韩岫岩坐月子——的黄慎荣，专门赶来看望他。

见到过去八面威风、一言九鼎的大首长，竟然沦落到眼前这样的可怜地步，小黄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决定跟着王近山去农场给他当保姆，照顾他的生活。

把个王近山，感动得不轻，赶紧说：“我这么大把年纪了，你跟

我去吃苦，何必呢？”

黄慎荣说：“首长，只要你不嫌弃我，我就照顾你一辈子。”

这样的时刻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明摆着她心中渴望发展的，就不是一般的同志和上下级关系了。

“这可不行，你才20岁，我是个犯了错误的人，岁数又比你大一倍，老得能当你爹……”

“首长，我不在乎，你是个大好人，我情愿照顾你一辈子！”

落难中的王近山没法不对自己两三年前的勤务员动真感情。

这年10月初，他们在农场结了婚，成了相依为命的患难夫妻，黄慎荣还先后为王近山生下了两个孩子。

韩岫岩听到王近山与勤务员黄慎荣结婚的消息，脸色“唰”地白了，喃喃念叨：“这怎么可能？怎么弄成个这样啊？”

当时才40岁，身居海军总医院副院长的韩岫岩后悔得肠子都青了，以至于终生没有再婚。

朱铁民说：“首长下放到一个县农场，没有专车了，我想去也去不了。没过多久，我被诬陷为特务，关了起来，审查我半年，也查不出什么名堂，才把我放出来。”

王近山在农场生活了4年。1968年初，王近山所在的西华农场派人到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肖永银那里搜罗王近山的“反动”材料。

一直关心着王近山的老部下肖永银义正词严地告诉外调人员：“王近山同志政治上无错误，历史上从来没有反党反毛主席的任何言行。他犯的是生活作风问题，不属大节！”

穷困潦倒的王近山获知此事后，感动得大哭一场。

这还不算什么，到了这年年底，刚刚升任南京军区参谋长的肖永银出了个主意，叫自己的老首长主动给毛主席写一封检讨信，坦承自己的“错误”，并恳请回部队工作。

王近山把信写好交给肖永银，肖永银再交给许世友，托许世友再转交给毛主席。许世友是有名的侠义将军，和王近山、肖永银同出自红四方面军，私交不错；许世友同时和毛泽东的关系非同寻常，也只有许世友最容易见到毛泽东。

1969年，“九大”召开。巧的是，毛泽东来到军队组参加分组讨论时，讲到准备打仗，还谈起老同志犯错误问题。许司令见机进



言，对毛泽东说：“主席，战争年代有几个人很会打仗，官却越做越小，现在日子很不好过，建议主席亲自过问一下。”

“你是说谁呀？”

“一个是王近山，一个是周志坚。他俩虽然犯了错误，但处理太重了，时间又过了这么久，应该恢复他们的工作。”

第31军中将军长周志坚与王近山一样，都是许世友的老部下，犯的也是和王近山同样性质的错误，双双在“锄美案”中落了马。

“行啊，请恩来同志处理一下。不过，我这是放虎归山喽，你们哪个军区敢要啊？”

许世友高兴地说：“两个我都要。”

毛泽东转脸征求康生的意见：“许世友同志要这两个人，你看是不是给他呀？”

康生说：“他们两人都被开除党籍了，不是党员，怎么回部队当领导？”

许司令话接得很快，说：“江苏、安徽两省成立了生产建设兵团，让他俩先到两个生产建设兵团当副参谋长过渡一下，恢复党籍后，再调到军区机关。”

一个月后，南京火车站，从郑州开往南京的硬座车厢里走出一对农民装束的老夫少妻。老夫一手拎着只破皮箱，一手拎着一只装着几只咯咯叫的老母鸡的篮子；少妻一手抱着孩子，胳膊上同样挎着一只篮子，里面装满了五谷杂粮。

3名将军带着小轿车在月台上恭候。他们是第27军军长尤太忠、第12军军长李德生和南京军区参谋长肖永银。

见到这位农民打扮的老头儿从火车上下来，3位将军立即跑步上前，毕恭毕敬，“啪”地就是一个敬礼。

随即，肖永银上前接过老头手中的旧皮箱，说：“老首长，你还是这脾气，连卧铺票也不买。看，还带着两个孩子哩，这一路上，累坏了吧！”

这位老农民装束的人，正是原二野6纵主帅王近山。

迎接他的，全是他过去的老部下——原16旅旅长尤太忠、17旅旅长李德生、18旅旅长肖永银。

王近山和周志坚到了南京军区以后，在许世友和肖永银的直接帮助下，两个人很快恢复了党籍，不久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王近山与周

志坚双双调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依照许司令员的意见，王近山分管作战，周志坚分管直属队。

朱铁民说：“首长60年代末在部队恢复了工作，一到南京就想到我，把我两口子接到家里住着，一口锅里开伙。有时还让我开着他的国产吉普车和小卧车，到外面兜兜风，过过车瘾。”

王近山复出后，韩岫岩总想改善与王的关系，可无论她费了多少心机，留给她的，却只有永无尽头的绝望与哀伤。

1974年11月，王近山突然大吐血住进了医院。

打开腹腔，胃癌，还是晚期，赶紧缝上。

医生吩咐家属，想吃啥好的，可劲儿吃吧。

王近山患癌症的消息传到北京的韩岫岩那里，她心急如焚，毕竟曾是那么多年的结发夫妻呀，韩岫岩又给他生下了7个儿女，心中那份深深的牵挂，哪儿能够轻易抹去？

尽管王近山在南京已有自己的家，有名正言顺的合法妻子黄慎荣照料着，韩岫岩还是忍不住买了大包小包的补品想去趟南京，想看前夫一眼。

可当韩岫岩拨通王近山的电话，向接电话的王近山的一位老警卫员吞吞吐吐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愿时，这位对老首长忠心耿耿的警卫员一听她要去南京，不带半点客气地说：“不准你来！首长说过，他就是死，这辈子也不愿再见到你。你来，是不是想让首长早点死？”

韩岫岩被呛得瞠目结舌，唯有无语凝噎。

受到冷脸的韩岫岩依然十分牵挂王近山，张罗着四处寻医问药，却没有人愿意理睬她。

韩岫岩始终不甘心，硬是来到了南京，和已经升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肖永银联系，要求最后看一眼王近山。

韩岫岩的执着感动了肖永银，他大着胆子安排了一次让王近山和韩岫岩见上一面的机会。

那是在南京军区大礼堂观看演出，王近山带着黄慎荣正准备入座，肖永银过来悄悄地告诉王近山：“韩岫岩来了！”

王近山先是一震，随后呼地站起身，掉头而去。

黄慎荣也紧随丈夫，离开了大礼堂。

王近山回到家里，心脏病犯了。

小黄赶紧递水送药，等到好了一些，王近山才说出了事情经过。



他说：“幸亏今天没见着，要不，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她这就是要我的命了！”

此时的王近山把韩岫岩当成了眼中钉，可在韩岫岩心里，他却成了韩岫岩唯一的精神支柱，无论如何也舍弃不下与王近山见面的念头。

她还在执着地寻找着机会。

可惜，老天爷再也没给她时间。

1978年5月10日，一代将星陨落。

时年63岁的王近山走了，却把难题留给了他的战友们——20岁就当师长的王近山的最终职务和他的赫赫战功太不相配！

在筹备将军的追悼会时，南京军区司令员聂凤智感到十分棘手，把这个难题交给了专门前来参加追悼会的武汉军区副司令员肖永银。肖永银胆大包天，居然掏出笔来，把悼词上“副参谋长”中的“副”字画掉了。

画掉一个“副”字，级别立即由正军一下“提升”成了大军区副职——当然这是不算数的，只不过觉得这么做会让逝者和生者心理上好受一点罢了——而此时，王近山的许多部下都担任了大军区副职以上的职务。

刚刚复出的邓小平获悉后，指示南京军区：“人已经死了，不能下命令搞个名堂，就叫顾问吧。近山同志为革命出生入死不容易，我们能给死者的安慰，也就只有这个了！”

邓公这样一发话，王近山就成了名正言顺的大军区正职，追悼会的规格自然就不同了，抚恤标准，也随之往上蹿了一大截。

党中央对王近山的后事非常重视，邓小平亲自审定了悼词，对王近山一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很高的评价。

中央军委紧跟着补发了王近山为南京军区顾问的任命。

5月17日，南京军区举行的追悼会十分隆重，邓小平、叶剑英、刘伯承、徐向前、许世友、李德生、陈锡联、彭冲、宋任穷等，以及王近山的生前友好送的花圈，摆满了悼念大厅。

又过了13年，为纪念王近山文集出版，老首长邓小平特意为这位桀骜不驯、绯闻不断，而又敢打敢拼、战功赫赫的爱将题词：一代战将。

王近山逝世后，韩岫岩悲痛欲绝，她非常想参加王近山的追悼

会，却被告知遵照王近山的遗愿，不允许她参加。

韩岫岩因此一度精神恍惚，整日以泪洗面。

当时，王援复员回到北京，在商务部上班，与养父朱铁民和养母美卿妈妈住在一起。

后来，王近山的骨灰被安葬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韩岫岩经常去陪王近山，守着骨灰盒，一说就是老半天。

1986年，韩岫岩从海军总医院离休，常常后悔当时的固执和冲动。她始终不承认她跟王近山离了婚，还说她从来就没见过他们的离婚证书。没有离婚证，那就说明她和王近山从来就没有离过婚，她这一辈子就是王近山的合法妻子。

韩岫岩家里一直都挂着王近山的那张穿着将军服、神采奕奕的彩色大照片。韩岫岩还将自己一张彩照放大到和王近山照片一样大，并排挂在客厅的墙上。每逢过年的晚上，韩岫岩都要做上一大堆好吃的饭菜，摆在王近山大照片下面的桌子上，点上一炉香，再摆上一副给王近山专用的碗筷和酒杯，絮絮叨叨地跟王近山说上一阵儿悄悄话，才开始吃年夜饭。年年如此！从无间断！

有一次，韩岫岩听说王家列了祖宗牌位，便说她是王近山明媒正娶的妻子，要大儿子去把她排在王家的牌位里。大儿子被她缠得没了办法，只好敷衍说已经给她排了牌位，她这才安静下来。

2007年6月，韩岫岩病情恶化。临终前一周，韩岫岩挣扎着要到王近山墓前去祭拜。子女们怎么劝阻都拦不住，最后只得开车将韩岫岩送到了八宝山。

下了车，韩岫岩大概是回光返照，情绪特别好，竟不让子女搀扶，自己坚持着走到王近山墓前，献上鲜花，然后轻轻摩挲着王近山的墓碑，泪雨蒙蒙地喊着王近山的名字：“近山，近山，我最亲最爱的爱人，最好最好的战友啊，我马上……马上来陪你了。下辈子，韩岫岩再做你的妻子，岫岩这辈子错了，下辈子要好好照料你……咱们永远……永远也……不再分开了……”

说罢这话几天后的一个凌晨，86岁的韩岫岩真的跟着走了。

和王近山一样，她的骨灰盒同样也有资格安卧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里。但是她的墓地，只能与王近山的墓地紧紧相邻，而不可以如她所愿，与“最亲最爱的爱人，最好最好的战友”同卧一穴。

第十二章

纸老虎还是真老虎？

1. 我是“起义战士”，不是“解放兵”

1950年11月1至7日，作为志愿军二梯队的宋时轮将军的第9兵团，紧随13兵团之后，也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

第9兵团此番出征的任务，毛泽东交代得很清楚。

宋陶，并告陈饶张，彭邓，高贺：

一、9兵团全部着于11月1日开始先开一个军，其余两个军接着开动，不要间断。

二、该兵团到后受志司指挥，以寻机各个歼灭南朝鲜首都师、第3师、美军第7师及陆战第1师等4个师为目标。该敌现位于城津、咸兴、元山及以北一带地区，有分路向临江、集安方向进攻模样。

三、兵站事务须自设机构办理。

毛泽东

10月31日10时

第9兵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精锐部队，下辖20、26、27三个军，12个师，其中20军50569人（军长张翼翔，政委张振球），26

军48894人（军长张仁初、政委李耀文），27军50501人（军长彭德清，政委始而刘浩天，继而曾如清）。

全兵团共近15万人。

9兵团的3个加强军的前身是华野的王牌主力1纵、8纵、9纵，它们都是孟良崮战役歼灭张灵甫的整编74师的王牌主力。20军是粟裕、叶飞等人带出来的一等一的王牌部队，擅长穿插；26军是山东老八路为骨干组建而成，尤擅攻坚；27军是许世友打出来的王牌，在孟良崮、淮海、渡江等战役中屡次立下大功。这三个军合成的9兵团，也是准备用来解放台湾的主力军。

2006年，入朝时担任第27军参谋长的李元将军在接受记者访问时回忆说：“给一幅地图，一个翻译，部队就稀里糊涂地过了鸭绿江。一到这边，部队马上上山。穿林海，过雪原，一路上看到老百姓穿的白衣服，上衣很短，裤裆吊着，这么大……战士就问，这到什么地方了呀？这时才告诉他们，这里是朝鲜，抗美援朝，这就开始了。”

李元还说：“部队里有一个顺口溜，怎么讲呢？‘中国撒拉密（人），来到朝鲜地。吃的汉嘎叽（酸菜），受的飞机气。鬼子能上天，老子能入地。’”

笔者的江津老乡谭秉云，就是第27军80师239团3营7连的一名战士。

谭秉云和与他同时过江的第9兵团近15万官兵一样，参加了五次战役中的第二和第五次。那是因为第一次战役他们还没来得及过江，没赶上趟；第二次战役部队死伤惨重，9兵团27和20两个军伤亡过半，撤到后方大山沟里喘口气。轮到打第三次战役时，志司就不忍心让伤痕累累的9兵团上，让他们分散隐藏在靠近鸭绿江边的两岸深山密林之中，抓紧时间补充补充，休整休整。每天除了完成例行的训练任务，便是喂猪、种菜、磨豆腐、发豆芽，伙食有荤有素，小日子过得来有滋有味，直到后来拉上去打让谭秉云一战成名的第五次战役。

再后来“边打边谈”期间打的那么多大大小小的仗，已经成了名震全国的战斗英雄的谭秉云，部队打仗时他参加志愿军英模代表团，回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到各个中央机关、大学做报告去了，也没能赶



回去放一枪。等到忙完这一摊子回到朝鲜，没过多久哩，朝鲜战场已进入轮战阶段，劳苦功高的第9兵团凯旋了，他也就再没有机会打上一场像模像样的仗。

不过，谭秉云对笔者说他那个英雄当得有些不爽，就像是代表国家去参加足球比赛，球队没赢，自己却被评了个“全场最佳”，想想，心里那是个啥滋味？

事实上谭秉云他们那代军人在朝鲜战场上已经把人类的顽强和智慧、勇敢发挥到了极致。谭秉云所在的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队伍上很多像他这样的老兵已经在国内打了七八年的仗。枪打得准，战斗经验丰富。摸个山头，攻个阵地“嗖嗖”几下子就解决了。往野地里一撒一会儿谁也找不着，都在最佳的位置上猫得好好的，战斗经验硬是没话可说。所以部队跨过鸭绿江时，新兵害怕过了江就回不去了，老兵们却该说说，该笑笑，根本没把美国佬放在眼里。

谭秉云出国时是大班班长，当了大英雄后跳着升，一次升两级，当上了排长。

谭秉云自1953年冬转业回到家乡，除了完成本职工作，还到处讲自己在朝鲜打仗当英雄的故事，一直讲了几十年，江津大大小小的机关、厂矿，尤其是学校，他不单全讲遍，年复一年，还被好多学校请去讲了若干次。

笔者读小学、中学时，便两次挤坐在学校大操场密密麻麻的人堆中，听谭老英雄前来给全校师生作报告，讲他经历的那一连串惊心动魄的战斗故事。

后来，笔者又与谭老英雄同系江津县政协常委，经常在一起参加各种地方社会活动。

有一次在守怡堂民政局家属院他家中喝茶摆龙门阵时，谭老英雄拿出一张发黄的黑白照片对我说：“你看，站在中间这个是我，右边是军长邱会作，左边是27军政委，我只记得他姓曾，年辰久了，叫什么名字，就搞不清楚喽。”

笔者根据谭秉云的回忆，写了一篇短文发在报上，却招来一片“指责”声，说我把带着27军5万将士在朝鲜浴血奋战的堂堂志愿军军长的大名都搞错了。邱会作从来没有跨过鸭绿江，到过朝鲜，和谭秉云照的哪门子相？

作为一名管一个加强班24个战士的小班长，谭秉云能让统领27军千军万马的军长和政委夹在中间拍一张具有重要人生价值和历史意义的纪念照；可是，他居然弄错了自己军长的姓名，搞不清楚自己政委的名字！

再后来，他又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到了晚年，连朝鲜的最高领袖金日成也发来请柬，邀请他重游三千里江山，还招待他吃各种各样朝鲜美味，如朝鲜冷面、打糕和泡菜——谭秉云生前始终坚持认为朝鲜人做的泡菜好吃，主要是因为那里的水质好。部队在北朝鲜的大山沟里休整时，他发的豆芽也长得特别肥壮。

不过，后来笔者才搞清楚，谭秉云也“马大哈”得可以。他不仅搞不清楚和他合影的军政委姓曾名如清，连军长也错得来十万八千里。他竟然把自己的军长彭德清，搞成了从未带兵去朝鲜打过美国人的邱会作。

不过，在那样一种特殊的战争年代，不认识甚至不知道自己的高级首长，并不让人惊奇。

特别是像谭秉云这种曾经在国民党军队里泡过好些年头的老兵。

“我是‘起义战士’，不是‘解放兵’。”说到这个问题时，谭秉云不止一次神情严肃地向笔者强调。

我当然明白这些充满政治与时代色彩的词儿后面的严格区别与意义。这对于他们来说十分重要，即便同样是解放战争期间起义的兵，政策上还得分个前期后期，政治生活与物质待遇也有着明显的不同。

除了明白“起义战士”与“解放兵”在政策上的不同，谭秉云掌握的知识，懂得的道理还真不算很多。

这一呢，是因为他两眼一抹黑——这不奇怪，当时志愿军里的文盲占80%以上，大都出自苦寒人家的子弟。

二呢，他在国民党军队里待了5个年头，先打日本鬼子再打共产党，打到1948年，长官弃暗投明，下令反戈一击，成了“革命不分先后”的起义将领。他呢？星星跟着月亮走，也就成了个光荣的“起义战士”。

几十年过去，谭秉云还记得他起义的那个地方，就是以火腿闻名天下的浙江金华。

像谭秉云这样的先参加国民党军队，再加入解放军，最后过鸭绿



江打“联合国军”的人不计其数。比如曾泽生的国民党军60军，在长春起义后，匆匆整训一段时间，把仍然坚持反动立场的军官尽可能清除干净，再从老部队抽调一批军官进来充实领导，然后把番号改成50军，基本上原封不动就拉过了鸭绿江。傅作义的心腹董其武将军在绥远起义的部队，也是如法炮制，把国民党军装一扒拉，解放军军装往身上一穿，番号改为26兵团，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而且和有着光荣传统的老部队一样披荆斩棘，出生入死，笑傲沙场，建功立业。

还有1950年4月22日，在四川成都附近什邡起义的董宋珩的国民党军第16兵团，遵照中央军委命令，从第16兵团近7万名官兵中，挑选出士兵和军官约15000人，开往华东整训，然后分别补入解放军9兵团各军。

在丹东市中国人民志愿军纪念馆的“志愿军烈士墙”中间花环里，清楚标明了志愿军烈士的数字：183108人。^①

烈士墙两旁是该馆统计的各省区市分别的牺牲人数：福建1173人；甘肃1259人；云南1604人；江西3258人；辽宁1374人；山东19766人；吉林18499人；四川21051人；湖南1151人；河北11853人；河南11048；江苏8444人；青海56人；重庆9468人；安徽6375人；北京1551人；上海1634人。

牺牲20000出头的，唯有四川，居全国之冠。

而且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按照当时的行政区划，重庆属于四川省管辖之下的一个市，如果将重庆与四川的志愿军烈士加在一起，就高达30519人！占了志愿军英烈的六分之一。

按照过去的阵亡和战伤1：3的比例——而且美国人的火力远比过去的日本人、国民党军队杀伤性强得多——单单一个四川省的伤残者，就高达10万之巨。

为什么以北方人居多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会有这么多四川人牺牲呢？除开董宋珩部的15000人，《邓小平军事文选》里还有记载，在组建东北边防军时，中央军委从四川起义部队中挑选了65000名官兵，将他们火速运到东北，编入了第13兵团序列。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最新确认的抗美援朝烈士增至197653名。包括朝鲜战争期间牺牲和失踪的志愿军官兵、支前民兵民工、支前工作人员，以及停战后至志愿军回国前帮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生产建设牺牲和因伤复发牺牲的人员。这197653名烈士中，也包括牺牲在“三八线”以南的志愿军官兵。

在朝鲜战场上，这些来自四川的“起义官兵”浴血奋战，用他们年轻的生命，为祖国和民族赢得了尊严与荣誉！

俗话说“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谭秉云1943年20岁时第一次参加国军，到1948年年底反戈一击，他在国民党军队里当了足足5年兵，打的大仗小仗连他自己都数不过来，身上的伤疤窟窿不少，可他居然连班长都没替自己捞上一个。

这是因为谭秉云为人老实，又不爱说话，入朝时，他当兵已经整整7个年头。当兵都当成精了，才当上一个一班之长。

不过他带的这个班是大班，连他一共25个人。

谭秉云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9兵团刚刚经历了血火拼杀，正在无锡、苏州、金华、上海等地进行休整，秣马厉兵，积极准备渡海解放台湾。在中央军委的计划中，这支精锐的虎贲之师是攻台的首选部队。但是当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攻台计划被暂时搁置，第9兵团也就自然解除了攻台任务，一边警备苏南、上海，一边继续整训。随着朝鲜战局的发展，不久后又转往山东，以便随时根据战局发展的需要入朝参战。同时考虑到即将入朝参战，为了更好地适应出国作战需要，将第30军88师、89师和第32军94师分别编入第9兵团所属的3个军，使各军均下辖4个师，并将在苏南、上海等地招收的数百名青年学生和四川起义的原国民党军第16兵团董宋珩部15000人分别补入9兵团各军。

当时9兵团都按“四四”编制，谭秉云所在的连有4个排，一个排4个班，一个班8个战斗小组，一个战斗小组3名战士，加上连部人员，一个连队有267人，能当一个小营使了。

谭秉云随部队从浙江金华被火车拉到山东泰安，大家私下都在风传很可能马上就要开到朝鲜去和美国佬打仗了，一个个嘴上不敢说，其实心里都害怕得很，晓得美国人的武器是全世界最好的，还有原子弹。以我们那点破装备，有点拿脑壳硬往石头上撞的样子，上了战场，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光荣”。

可不去呢，又不行！几个平时有来往的四川老乡就邀邀约约，到泰安县城的大街上，找间饭馆整他一肚皮油水，喝几杯烧酒，先给自己压压惊再说。一群大兵来到大街上，进了饭馆，点了一大盘卤得红亮亮的猪脑壳肉，十来个卤猪蹄，还有几瓶酒。

可还没来得及吃两筷子哩，连长就心急火燎地派人找来了，叫赶

紧回去，马上坐火车出发。一帮大兵把酒“咕嘟咕嘟”往嘴里一灌，把猪脑壳肉和卤猪蹄往挎包里一倒，扯掉脚杆就往营房跑……

时任27军营副教导员，后来当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的迟浩田将军回忆说：“到什么地方，执行什么任务，当时上面一点也没讲。我们从泰安出发，坐的什么车呢？黑黑的，长长的闷罐车。里面铺的什么呢？稻草、麦秸草。四个角上，一个角放一个大木桶。大小便都在桶里解决。营以下官兵，全都是这样的。火车哐当哐当，从泰安一直就过了秦皇岛、山海关，再到了丹东。”

第27军营教导员张桂绵也在北去的闷罐车上，他晚年回忆说：“我说这方向不对呀，怎么解放台湾让我们往北走啊？凭什么知道是往北走呢？因为越往前走越冷啊。往南走应当越走越暖和才对嘛，是不是这个道理啊？这才10月份嘛，南方哪有这么冷啊？大家就感觉到有些不对头了。”

谭秉云装了一肚皮在朝鲜打仗生活的精彩故事。几十年来，到各所学校去作传统报告基本上成了他的“副业”，当然是不拿一分钱的。离休后，他又担任了重庆市江津区“关工委^①”副主任，更是三天两头往学校跑。不过哪些当讲，哪些不当讲，他嘴上有杆秤，有一些精彩故事，他从没对学生讲过。

在学校不能讲的故事，他对笔者讲了很多，仅举以下数例：

打仗相持阶段是最难熬的，死亡就在眼前，却不晓得什么时候落到自己脑壳上。这个时候很多人精神上受不了，有发疯的，有自杀的，也有自伤的，自伤的一经查实那是军法无情，立马枪毙。

你们都笑话我吃饭快，三刨两刨就下了肚，菜还没上齐哩，人就下了桌。其实这都是我在军队里练出来的本事，第一碗只舀半碗，几口就刨光，第二碗按紧按紧地舀他冒尖尖一大碗。这样才能比别人多吃点。不是编龙门阵，我吃饭要是慢一点，这条命早就丢在朝鲜了。有一次，我们班正在围着菜盆吃饭，我几下吃完，就出去换哨兵来吃，我是班长嘛，干啥都得带头才行。刚走出山沟，美国人的飞机就过来了，一串炸弹丢下来，我那个大班二十几个人，就剩下了我和哨兵。满沟炸碎的尸体，捡都捡不起来，只好拿箩筐抬去埋。

^① “关工委”系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简称。

美国人的武器不晓得比我们好了多少倍，朝鲜这场仗能打成这个样子，还得感谢苏联老大哥。如果不是他们送来的“喀秋莎”，结果怎样，就难说得很喽。那东西，厉害得不得了，连那么先进的美国人，当时都还没得哩。一阵炮弹打过去，对面山头上就基本没活物了。

有一次营里组织敢死队，每个队员都领到一个一斤半重的猪肉罐头，大家高兴得不得了，敞开肚皮大吃。没被选中的战士闻着香味难受，忍不住在旁边说怪话：“那是送行饭，你们吃了都得去送死。”敢死队员一边吃罐头，一边得意洋洋地哈哈大笑说：“你没捞着吃不还是个死！我装他一肚皮油水去死，千值万值！”

谭秉云身体精壮，面相饱满，红脸膛，国字脸，退伍多年，依然是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好一副军人英姿。只要说起朝鲜往事，永远是一脸自豪。当上“解放战士”以后，接下来的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他全打了，因为各项军事技术不仅过硬而且炉火纯青，都表现得不错。可就因为他不善言辞，太老实，加上为人义气，性子倔，看到欺侮人的事爱打抱不平，甚至还和同样是“解放战士”的排长演过一次全武行，把习惯了用拳脚和士兵说话的排长打得来口鼻流血，两三天下不了床。这样的性格，就不太容易讨领导喜欢了。虽说获连长指导员口头表扬若干次，可一到立功时，就没他的份了。这就让在战场上从不服输的谭秉云，心里暗暗憋着一股子气。

稍后在解放上海的战斗中，谭秉云一马当先，每次都冲杀在最前面，左小腿被弹片划了一道长长的口子，一只脚杆看上去就像刚从红油漆桶里扯出来一样。他咬着牙，忍着痛，冒着猛烈的炮火，不畏艰险跳进河里为突击队推船架桥，在激流中顽强战斗两个昼夜，腿上的伤口都泡烂了，长蛆了，这才为自己挣到了一个三等功。

所以刚刚跨过鸭绿江，谭秉云便迎着漫天风雪，咬牙切齿吼出一句话：“是骡子是马，到时候大家牵出来遛遛！”

他在等待属于自己的机会。



2. 骡马队长口中的“朝鲜战事”

彭德怀在部署第五次战役的会上，向众将领强调：“如果这次打胜了，全体指战员的功劳算一半，后勤算一半，本司令到时论功行赏。”

笔者的另一位江津老乡沈长江，便是后勤战线的一个兵。

沈长江远征朝鲜的经历，当然不可能和享誉全国的大英雄谭秉云相提并论，他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团部军需员，统领着200来条壮汉和100来头骡马组成的一支运输队，给前方运送各种作战物资，时间长达3年多。他一直待在后方，从来没得着机会向“联合国军”士兵放一枪，也就鲜有立功受奖、出人头的机会，却仍然是数番死里逃生，还被美国飞机丢下的炸弹震聋了一只耳朵。

沈长江的从军生涯，同样精彩纷呈，别样光景。

他对笔者说：“我们从江津徒步行军，先经江口下重庆，再坐轮船到武汉。在武汉时，连长每天就让我们进山砍毛竹，扛回来锯成满尺长，一节一节的，在营房里堆码了好多好多，问连长拿这东西做啥用，他说这是军事秘密，现在不能说，到时候你们就晓得了。后来部队出发时，让每人带上几个竹筒筒，上了闷罐车。火车一开，嘿，才晓得这东西的妙处。我们坐的是军列，从武汉出发，一开就是几天几夜，到了才晓得是东北的安东，也就是后来的丹东。中间从太阳起坡到太阳落坡，这一路上都是不停车的。人有水火之急呀！满车厢装的全都是男人嘛，屙尿倒好办，拿个竹筒筒，朝裆下一对准就解决了。可解大手就麻烦了，就算把海碗大的竹筒紧紧抵在屁股上，那味，也捂它不住啊！招来一顿臭骂算温柔的，像我们这种刚参军两个月便出国作战的新兵疙瘩，大都挨过老兵的拳脚。”

我问他：“参军时你多大岁数？怎么参军的？”

沈长江：“我是个中学生，那年才16岁，江津县城解放才几个月，刚把天下从国民党手里夺过来的共产党，威望高嘛。‘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老祖宗传下的诗文，还是让我们这些自命不凡，多少有点儿英雄情结的学生娃娃热血亢奋。‘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这样的老话，同学们还是耳熟能详的嘛。所以啊，人民政府一号召‘抗美援朝，保

家卫国’，大家就踊跃地起来响应。再加上部队吸引学生参军的方式很有效，他不是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来招你们当兵，而是请我们学校的学生看电影，电影是苏联人拍的，叫作《普通一兵》，是新中国引进的第一部外国电影。主角是个像黄继光那样扑敌人机枪眼的英雄，叫作马特洛索夫。”

笔者：“你把参军那天的情况给我讲讲。”

沈长江：“电影还没开演，学生们就排着队进了部队营房的大操场——就是南安门的财经学校——我们进去时看见战士们正蹲在地上吃晚饭，8个人围一个圆圈圈，菜盆子放在中间，一大盆蒜苗炒回锅肉，一大盆芋儿烧红烧肉，冒尖尖两盆菜放在地上，红亮亮、喷喷香，馋得我们直流口水。旁边的几个大甑子里的白米干饭，敞开盖子随便舀，看得我们口水直流。然后部队首长就上台讲话了，后来才晓得，讲话的这个首长，就是我们的师长。”

笔者问：“师长叫什么名字？”

“我们是15军，军长是秦基伟嘛，打上甘岭的，有名得很哩！师长嘛，哎呀呀，我只记得他姓向，”沈长江不好意思地说，“都过去65年了，连师长的名字我都记不得了。反正，我当了5年兵，和我们师长也就只见过这一回面。”

笔者说：“15军姓向的师长，应该是44师的向守志吧？”

沈长江猛地在额头上一拍，“对，对，师长就是向守志！我就是44师的嘛。哎哟，小老弟，你比我还弄得清楚哟。”

笔者：“我要采访你，事前得做点功课嘛。”

沈长江：“向师长那晚对学生们讲，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缴获了很多美式装备，苏联人又陆续给我们运来了很多新式装备，由于我们的战士文化程度太低，绝大多数是文盲，使用起来很困难，所以急需大批学生上战场，去掌握新武器、新装备。然后又说，愿意参加志愿军的，马上可以到旁边拿碗拿筷，回锅肉、红烧肉、白米干饭随你们敞开肚皮胀。每个月还发一万块钱津贴（旧币，相当于后来的一块钱）。我的个天，好吃好喝还倒给一块钱，不愿意那不是脑壳有病么！像我老汉，在城里衙门口开个卖香烛钱纸的小铺子，起早摸黑辛辛苦苦一个月，还赚不了10块钱哩。向师长话音一落，至少一半的人当场就报了名，部队嫌有的十四五岁的学生太小，不收。领不到筷子端不上碗的这些青沟子娃娃，在旁边看着获准参军的同学大口吃



肉，大口刨饭，急得嗷嗷哭。”

如同谭秉云再三强调他是“起义战士”而非“解放兵”一样，沈长江也着重强调：“我们是学生入伍，那时不叫当兵，是15军随营军政大学招收的正规学员，秦军长就兼着军政大学的校长，那样的牌子，也响亮得很喽。刚刚解放那些年辰，在相当闭塞的川东，有高小文化的人都算人才了，像我们这些中学生，在社会上的地位差不多就像现在的研究生了。所以‘军政大学’那样一块金字招牌，对我们还是相当有吸引力的。到了朝鲜，部队也的确把我们当个宝贝使唤，分配到各个机关，没让我们提着枪，到前线去冲锋陷阵。”

沈长江被分到团部辎重股，做了一名军需员，被派去管理运输大队。还离战场远着哩，运输大队的汽车就被炸光了，变成了骡马大队。

65年后回忆起当时的壮观情景，沈长江依然激动不已，说：“过‘三八线’是在天黑以后，千军万马一齐往南涌，一条土公路上拥挤着好几支部队，还有大量民工。人马车辆，密不透风。士兵一个贴着一个往前走，根本转不过身来。我那年才16岁，还没发育全，个子矮嘛，有好几次被挤得双脚离地，飘浮在南去的滚滚大潮流里。那天走到大半夜时，前面传下口令，注意了，前面就是‘三八线’。我抻长了脖子看，四野漆黑一团，只见正前方远远地闪烁着敌人探照灯的光柱，剪状交叉地将夜空铰成一幅幅菱形。”

在朝鲜，沈长江经常要跟老百姓打交道，他带着骡马队，不管走到哪里，都是住在朝鲜老乡家里。朝鲜人能歌善舞，很乐观的一个民族，喝着米酒，拿辣椒当下酒菜，敲着铜盆就跳起来了。

沈长江说：“朝鲜人一高兴都喝得烂醉如泥，有扶着墙的，有躺到地上的，谁也不管谁，谁也不知道给谁敬酒了，跳也跳不动了，都找不着家了，那就说明喝得很实在。那时候美国飞机老是轰炸，也没法几种地啊，就吃板栗，皮儿上带刺的。板栗是朝鲜的特产，满山都是板栗树，用棒子一打，装一袋子，放菜窖里，吃的时候端一盆上来。那地方还出苹果，朝鲜话‘苹果’的发音就像‘傻瓜’。后来有个朝鲜电影叫《摘苹果的时候》，我看起来可亲切了。我们那时发津贴，是朝鲜的钱，红色的，听说是苏联给印的。我记得100块钱可以买一面袋子苹果或者栗子。朝鲜还有一种野菜，朝鲜话叫‘豆拉基’，就是桔梗，朝鲜不是有个民歌嘛，就叫桔梗谣。

“‘朝鲜人，大裤裆，辣椒面，狗肉汤；一进门，就脱鞋，尿盆放在炕头上’，这段志愿军编的顺口溜，说的是朝鲜‘四大怪’。换了苏式服装的志愿军穿的马裤也是大裤裆。朝鲜人除了爱吃狗肉，还爱喝大酱汤，东北人喝着还行，南方人可喝不惯，主要是一股臭脚丫子味儿。朝鲜人吃饭男女分开，一人一个桌，地铺烧得热热的，大冷天睡着挺暖和的。朝鲜人过年要做打糕，就是用棒槌把米又捣又砸，吃起来挺筋道的。朝鲜人说，夏天吃打糕，就像吃人参，说是能保健。他们洗衣服也用棒槌打，还用柴灰煮。朝鲜妇女的脑袋可厉害啦，全是用脑袋顶着东西走路，有时候头上戴一个垫圈，一般啥也不戴，走得稳得很呢，都不用手扶。朝鲜男人就不用头顶了，而是在身上背上一个木头架子，我们管那叫‘马架子’。

“朝鲜老乡和我们关系很好，除了知道我们在帮他们打美国鬼子，还指望我们送他们一些食品啥的。所以，我们一到驻地老乡家号房子，都抢着往家里领。一般我们住在人家里，肯定会给他们一些罐头啥的，打饭的时候多打几份回来，给他们吃。到了朝鲜战争后期，我们经常有很多罐头，吃都吃不完，像牛肉罐头，还有蛋黄罐头。蛋黄罐头其实就是蛋黄粉，用水一和，能摊鸡蛋吃。有时候，我们回国送伤员一趟，回来能带点肥皂、手绢、袜子、毛巾、雪花膏啥的，朝鲜老乡可稀罕了，你送给他，他乐坏了。

“朝鲜人有的还会说中国话，老人有很多会说日语，日本的殖民地嘛。说起朝鲜乡亲跟我们志愿军的感情确实是很深。朝鲜人习惯喝凉水，冬天也照样儿。但他们知道我们习惯喝热水，总是给我们烧开水喝。他们的生活也很困难，但家里有啥能吃的，像咸鱼啊咸白菜啊啥的，都会拿出来给我们吃。其实，朝鲜老乡生活特别苦，房子都烧了，都挖洞，美国飞机一来就猫洞里，或者往山上的洞里钻。”

沈长江还说：

“我这个军需员带着骡马大队不单单是往火线上运送作战物资，有时遇上火线上刚刚打过仗，还得临时客串特殊任务：打扫战场。打扫战场就是寻找、掩埋烈士遗体，真可谓是执行特殊任务的‘特种部队’。骡马大队成员每人领到一套捡尸工具：一个铁皮带柄勺子，一个铁齿抓耙。这两种工具作撮、刨碎尸、断肢用。还领到一套全是橡皮制品的防毒服及面具：帽子、口罩、手套、鞋袜。从头到脚封闭得严严实实，以防中毒。穿戴上这身打扮，带着工具以班为单位在朝鲜



老乡（向导）带领下到曾经打过仗的地方满山遍野地去找。每个班还配有一名军医随同，以验证人体26块大骨。我们经常在山头、水边、坑道、河沟、树枝上、茅草堆里、荆棘丛中找到血糊糊的支离破碎的躯体，惨不忍睹。

“各个参战部队都有这样的规矩：不管是志愿军或朝鲜人民军，凡在某地与敌人打过仗，战后都要清点人数，看牺牲了哪些战士，是怎样牺牲的。活着的战士都有责任在自己所在的排、班、组清点登记上报，并且尽量认准，弄清他们的名字，再查对标在他们衣帽里的姓名、年龄、血型、部队番号、班排等名称。然后用刺刀从树上削下一块树皮或钉上一块牌子，写上姓名、番号、连、排、班置放或插于尸体旁，等待后面的捡尸队来处理。为了使捡尸队分辨敌、我、友，往往也把敌尸，友军尸体标上记号。例如，‘这是美军士兵’，‘这是人民军士兵’的字样。

“我们按照牌子、树皮到处去找。找来一具完整的尸体就用一块白布裹住放进事先钉好的木板箱里，盖上盖，四周用铁丝捆紧，抬到停在公路上的汽车里，待装满一汽车，便由专门拉尸的司机拉到‘烈士陵园’里（说是陵园，实为荒山）掩埋。有时我们找到的尸体很不完整，炸断的四肢连着皮不是挂在树上就是掉进山谷中或别的什么地方。像这样肢体分裂的，我们尽量找到，看还缺少什么部位，再由军医鉴定，只要基本完整，就包好放进木箱里。我们在捡尸体的过程中，常常是一边寻找，一边流泪：为那些年轻战士的英勇行为而骄傲，也为他们死得悲壮而哀伤。有很多战士死后还保留着各种拼搏姿势：手里还握着手榴弹，刺刀还插在敌人胸膛，卡敌人脖子的，咬敌人耳朵的，抠敌人生殖器的……那种拼尽全力肉搏置敌于死地的姿态令人敬佩。我记得很真切：有一个战士，年纪十七八岁，个子小，把一个大块头敌兵压在下面，双脚跪按在敌兵的腹部，双手卡住敌兵的喉管。他头发蓬乱，眼睛似乎还闪着愤怒的光，军衣的纽扣全部脱落，军衣背部撕破处粘满了血浆，全身可见明显的滚打痕迹。这说明他原先是被大块头敌兵按在下面而后翻过身来骑在敌兵的身上的。正当他与敌兵扭打在一起取胜时，是冷不防被背后增援的另一敌兵猛捅一刺刀而牺牲的。然而，刺他的敌兵也没逃脱性命，他刺刀甩在一旁，也死在这个战士的身上，形成了3具尸体叠压的形态。

“有时我们在陡峭的山崖上找，找来的尸体装入箱里很重，须得三五个战士一起抬下山。如果上下通公路，一抬下山就可以装车，如果不通公路，就得直抬到通公路的地方。朝鲜的山多江多，时而爬山，时而涉水。一般4个战士抬一箱，挂挂扯扯地极不好走，途中还要躲飞机，防特务，一直抬到通公路处堆放好，待汽车来装运。如果太黑了，堆得很多，汽车拉不完，特务是要来破坏的，放炸药爆破。有时装了车在公路上行驶，特务也来拦截。因此，每台车上都派机枪手和冲锋枪手押送。执行这个任务的艰苦性不亚于直接与敌人接火。一次战斗后，我们不可能马上跟在后面去捡收尸体，往往都是过了很长时间。即便时间短，也在5至7天中，过了这些天，尸体也腐烂发臭。那种臭、腥、酸等各种难闻的味道直冲鼻腔，令人恶心作呕。但想到他们的死我们的生，也全然不顾这些，反而越发觉得必须收拾好战友的尸骸，使他们安息九泉。”

沈长江在朝鲜亲历的事，和他听到的奇闻，不仅有益有味，有些还带“彩”。

朝鲜那时候成年男人都当兵打仗去了，朝鲜人民军也死了几十万人，男人死得太多，家里留下的都是老弱病残，或者是妇女。我们看见路上指挥交通的，担当防空哨的大都是女的。朝鲜女人平时都见不到年轻男人，一见到我们志愿军小伙子，喜欢得不得了，有的就干脆要拉着你睡觉。现在想想，这也很正常啊。我们那时候纪律严，再说出国打仗，谁还敢想女人啊！

朝鲜女人都在河里洗澡，部队行军路过的时候，这些女人不但不躲开，反而兴奋得很，跳起脚板向志愿军官兵招手。后来沈长江他们才晓得，金日成下了死命令，北朝鲜只要不缺胳膊不少腿的青壮年男人，全都得上战场。处在双方争夺地带那些小城小镇小村子里，无论是北边的军队，还是南边的军队，来了第一件事就是抓壮丁，哪个抗拒就枪毙哪个。

沈长江还清楚地记得一桩趣事，他所在的军需股在离鸭绿江几十公里的北朝鲜大山沟里驻扎期间，恰逢过年，朝鲜老百姓带着慰问品来到部队营房，和志愿军举行联欢会。那时要搞这样一场联欢会很不容易。部队里都传开了，说国内来的慰问团在演出时出事了，天津的一个很有名的相声演员叫“小蘑菇”（常宝坤）的被美

军飞机炸死了，所以特别重视防空。白天当然不敢搞这样的活动，只有晚上进行。汽灯、马灯挂在树上，几个山顶都布置了防空哨。规定敌机到了放两枪，赶快灭灯，敌机走了，放一枪，再亮灯继续联欢。

联欢会开始之前，股长把队伍集合起来，板着脸对手下那些欢乐的士兵颁布命令：“大家规矩点，跳舞就跳舞啊！”

有老兵问：“要是朝鲜女人硬上，我们咋办？”

股长眼珠子转了转，操着一口河南腔，一脸正气地回答：“朝鲜女人摸你们——中，你们胆敢摸朝鲜女人——老子军法伺候！”

从沈长江讲述的“朝鲜从军记”中获知，有时在朝鲜最考验人的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朝鲜老百姓的炕上。

金日成的宣传工作搞得很到位，北朝鲜的老百姓对志愿军亲热得不得了，有时志愿军就借宿在老百姓家里。好胳膊好腿能动弹的男人全都上了战场，就剩些女人和他们睡在一条炕上，没点想法，那不可能。灭灯后有的年轻女人就主动往志愿军战士身上爬，往他们怀里拱，不停地搞些小动作，把年轻体壮、精血充足的中国小伙子们弄得恼火得很，又一点不敢乱来，实在是相当地磨难人、考验人，一个个都睁眉鼓眼地望着天花板。可谁都清楚地知道，要是定力不好，稍微把持不住，脑壳就除脱了。

即便军法无情，依然还是有只图快活不惜命的愣头青。可志愿军的纪律严得很，谁敢犯作风问题，军法伺候，为这事被枪毙的，沈长江亲眼看见的，听说的，就有好几起。

其中一位战士回国前偷偷离开部队，犯了作风问题，被部队查获。该朝鲜女人与母亲执意不让她离开，如要枪毙则3人死在一起。最后此事一路上报，呈至军部，得到的答复是：取消他的中国国籍。这已是相当不错的结果。

1952年夏天，沈长江所在的辎重股驻扎在北朝鲜临时首都江界附近一个叫义真里的小山村。辎重股有一个通信员，河北保定人，是个满族人，姓都，十八九岁，长得来阳光灿烂，活力四射，成天背着一支卡宾枪，蹦蹦跳跳，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儿。

一天中午，股长派小都去运输大队送信，运输大队与辎重股隔了十几公里远近，山中小道，虽然难走，不过当天可打来回。

临走前，小都还和股长说说笑笑，约定晚上一定赶回来，小百分

的干活。到了晚上，不见小都的影儿，股长也没在意。到熄灭灯号吹过后，也没看到他回来。

第二天，股里的同志们议论纷纷，说小都可能失踪了。辘重股与沈长江通电话，沈长江说小都把信送到就立即踏上了归程，天黑之前应当赶回连队。

一听这话儿，股长和指导员急火上冲，这是在外国，小都又不可能去走亲串友，这么大个活蹦乱跳的大小伙子，一夜未归，会跑到哪儿去了？股长亲自率领一个班的战士，沿着去运输大队的路上寻找。为便于联络，股长还专门找了一个从延边参军的朝鲜族战士当向导。

那是在远离战场的后方，平日里很宁静，很轻松的。而且朝鲜的夏秋季节到处是青山绿水，鸟语花香，漂亮得很。最不好的就是冬天，而且朝鲜的冬天特别冷，特别漫长，把春季也捎带进去很长一段。

股长和战士们不敢掉以轻心，全副武装，仔细搜索。股长的要求是“生要见人，死要见尸”。队伍早饭后出发，来回二十来公里，走得大家一身大汗，连小都的影子也没有见着。

朝鲜人称村为里，镇为洞，县为郡，省为道。搜索班这一路上经过了好几个小村子，大都被美军飞机炸成了残垣断壁，妇女儿童老人分散在田间忙碌，很难看到一个青壮男人，也向村里的里委（村干部）和接待大嫂打听，她们都说没有见过单身的志愿军战士。

大家回到驻地，分析过去，分析过来，也理不出个头绪，莫名其妙丢了个活蹦乱跳的战士，弄得股长和指导员灰头土脸。又接着派人到附近山里找，仍不见影儿。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准备向上面报告时，小都却自己回来了！

那是失踪后的第6天凌晨，吹起床号不久，哨兵带着一个身裹白布床单的人从山道上走来。近了大家一看，竟然是小都。他见到战友们时号啕大哭，不说一字，大家再仔细一看，白布单里竟然一丝不挂，枪支弹药、军装背包，一概皆无。

大家七拥八拥，拥至股长和指导员的卧办公室，股长指导员惊愕一阵，把大家都撵了出来。

究竟出了什么事，股里守口如瓶，谁打听谁挨批。指导员严令，不许议论小都的事，以后出去，无论何事必须结伴而行。几天后，小都被送往团部。股长是送押人之一。一路上，不管其他押送战士如何

哄骗，小都就是一声不吭，一脸漠然，全无以前的青春活泼模样。

后来才知道，小都毕竟年少，在回来的路上，贪图吃喝，进朝鲜村子里想找点好吃物，谁知被3名青年朝鲜妇女绑架，掠走枪支，扒去衣裤，好吃好喝好招待，就是不许走。

一天深夜，小都趁看守他的朝鲜大嫂瞌睡，才裹一床白布单，跳窗狂逃，这才回到驻地。后来股长和指导员去村里交涉，要回了武器子弹。

再后来，听说团里将小都遣送回国，复员了事，还安排到沈阳铁西兵工厂工作，也没给啥处分。

当时只有营级干部年满27岁以上才可以谈恋爱，团级以上干部才可结婚。私下里的恋爱关系却比比皆是，女方大都是女文工团员和女护士。还有因此受处分的。

由此可见，人的欲望与情感在任何情形下都会存在，越压抑便越反弹，有如石下小草，阳光照射后，它们总会自觅出路。

3. 第9兵团仓促入朝

北京向全世界坚称，美国入侵北朝鲜只不过是入侵中国的借口。

在这一问题上，中国人的立场从各党派1950年11月4日发布并广为传播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联合声明中反映得清清楚楚：

今天的情势已经十分明显了。美帝国主义者正袭用着当年日寇先侵略朝鲜随后侵略中国的故伎。谁也知道，朝鲜是一个较小的国家，但其战略地位则极重要。美帝国主义者侵略朝鲜的目的，主要地不是为了朝鲜本身，而是为了要侵略中国，如像日本帝国主义者过去所做过的那样。

历史的事实早已告诉我们，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是密切相关的。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不只是道义上的责任，而且和我国全体人民的切身利益密切地关联着，是为自卫的必要性所决定的。救邻即是自救，保卫祖国必须

支援朝鲜人民……

我们主张朝鲜问题应当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军应当从朝鲜撤回去。然而美帝国主义者及其帮凶们不但不愿意撤退侵略军，停止侵略战争与以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反而向“三八线”以北，向中国的边境鸭绿江、图们江疯狂地发展这种侵略战争。

这样就迫使我们认识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想要得到和平，就必须用积极行动来抵抗暴行，制止侵略……

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这份发人深省的声明出现在一个紧要关头：中共刚刚给了向鸭绿江分东西两线推进的“联合国军”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警告性打击之后，在主动向后撤退，脱离接触之前，中国人再次发出的信息，是明确无误的。

但是，美国人仍然置若罔闻。

于是，彭德怀再次抡起的铁锤，稳准狠地砸到了“联合国军”的脑袋上。

彭德怀此时制订的作战方针是“西攻东顶”，即以38、39、40、50、60军主动出击、穿插，分割处于西线的美第8集团军，趁乱将其包围、歼灭。仅以吴瑞林的42军，顶住东线正杀气腾腾向着鸭绿江扑来的阿尔蒙德的第10军。

阿尔蒙德指挥的第10军里有美国人引以为傲的王牌部队中的王牌——装备最为精良，训练最为严格，火力最为凶猛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师。

陆战1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加了几乎所有在太平洋战区的重要战役，特别是1942年8月开始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1943年11月的布干维尔岛战役，1944年9月发生的贝里琉岛争夺战，1945年2月的硫磺岛战役，1945年开始的冲绳岛战役，陆战1师无一例外地出演了头号主角。《风语者》、《父辈的旗帜》、《血战太平洋》等反映美日两军争夺太平洋战场的好莱坞大片，以及当下好莱坞花费巨资，拍摄的反映朝鲜长津湖之战的大片《严寒17日》，也全都是陆战1师为模特儿。

陆战1师与中国结怨弥久，渊源颇深：1900年攻入北京的八国联

军中的美军就是这支部队；1945年二战结束后在北京、天津、青岛等地登陆的也是他们；1946年“安平事件”和强奸北大女学生的“沈崇事件”，也是该师所为。

现在中国军队与其在朝鲜狭路相逢，正可谓“不是冤家不碰头”。

11月5日第一次战役结束后，美国已明确知道中国已出兵朝鲜。而且他们的飞机已经轰炸了正停留在朝鲜北部巍巍大山之中的厚昌、江口、江界一带焦急等候着苏联人快些把新式武器运来的志愿军第9兵团26军，给26军造成了重大伤亡，以至未能赶上第二次战役。

事实是，麦克阿瑟清楚地知道志愿军的大部队已经进入了朝鲜北部的莽荡群山之中，正向着北上的“联合国军”迎头杀来。只不过，麦帅过于自信，认为这支部队不足以对“联合国军”构成值得他必须重视的威胁。

此时，“联合国军”在朝鲜共有14个师，28万人，一线兵力即有13万。而志愿军人数上虽然占优，但装备与火力悬殊，根据毛泽东“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的军事原则，迫切需要二线部队迅速跟进，因此第9兵团入朝参战的时间表，也就骤然提前了！

第9兵团此时奉命紧急开赴朝鲜长津湖地域预定战场集结，就是为了增援东线势单力薄、仓促从北大荒农场拉出来，所以战力稍显不济的42军，并力争以15万精锐之师（42军未包括在内），全歼美第10军。

由于朝鲜战局的急剧变化，第9兵团入朝参战计划从最早的先从山东开赴东北整训一段时期，到1951年开春后再入朝参战，到“11月1日起车运吉林梅河口地区进行战前整训，前线如有战略上急需则可调用，如无此种急需则不轻易调用”（毛泽东10月27日致彭德怀电）。后是“第27军11月1日从泰安直开集安，直接开赴前线，其余两个军接着开赴通化、集安地区休整待命，以备必要时使用”（毛泽东10月29日致彭德怀电）。再到“9兵团全部开赴前线，11月1日先开一个军，其余两个军接着开动，不要间断”（毛泽东10月31日致宋时轮、陶勇电）。最后到“宋兵团立即入朝，江界、长津方向应确定由宋兵团全力担任，以诱敌深入，迅疾各个歼敌为方针。而后该兵团归你处（指志愿军总部）直接指挥，我们不遥控。9兵团之一个军应直开江界并速去长津”（毛泽东11月5日致彭德怀邓华并宋时轮陶勇电）。

尤其是11月5日的电报，彻底打乱了先前制订的第9兵团到东北先整训、换装，然后再择机入朝的计划。

原本，按照预订的作战计划，高岗和贺晋年等已经为9兵团准备了在寒区作战必备的冬装，每个官兵最低保障是一顶棉帽子、一套棉军服、一副棉手套、一双或新或旧的棉大头鞋、一件或好或破的棉军大衣。但是，由于临时改变了作战计划，原定在集安过江的一些部队改到临江过江，所以很多冬装，还来不及发放到官兵们手中，他们便径直提前入朝参战了。

20军的列车开进山海关火车站时，总参谋部派高级参谋拦住列车宣读了中央军委“紧急入朝”的命令。十几列闷罐火车只在沈阳稍停片刻，就继续火速开进。

停车的时候，东北边防部队看见入朝官兵穿着如此单薄的衣装大吃一惊，立即动员干部战士脱下身上的衣帽换给这些部队。但数量极少，而且部队停车时间极短，连当时脱下的衣服，很多也来不及送上列车。

20军刚到沈阳火车站，奉中央军委命令，前来检查部队入朝准备的东北军区副司令贺晋年见到官兵们身着华东地区的棉衣（装1斤半棉花），头戴无帽耳的布质大檐帽，脚穿胶底单鞋，大为震惊，惊呼：“你们这样入朝，别说打仗，冻也把你们冻死了！”立即找到正在指挥部队运输的20军副军长廖政国，要求紧急停车两小时，以便从东北军区部队中调集厚棉衣（装3斤半棉花）和棉帽、棉鞋、棉手套，却因军情紧急，要求立即出发，已无法允许更换厚冬装，20军58、59和89师都没有停车，便直接开往朝鲜江界。只有军直属部队和后卫的60师在短暂的停车间隙里，得到了为数寥寥的厚棉衣和棉帽。结果第9兵团一过鸭绿江，官兵大面积冻死冻伤立即成为残酷的现实！再想作任何补救，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虽然新中国成立时，宋时轮已经是国内威名赫赫的战将了，但是真正让他在世界军事史上浓墨重彩地留下一笔，还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长津湖之战。这场至今仍然让中美两军健在的老兵们言之色变的经典战役，后来分别被两军的军事学院编入了战例教材，也被两国隆重地载入了各自的历史。

一位参加过长津湖作战的前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师的中校军官卡罗尔·迪次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这样说道：“我从没有见过像这样的

战斗，我曾经在二战中遇到过德军在东线匈牙利巴拉顿湖地区发起的最后一次大反攻，那也远远不及长津湖之战这样激烈，那情景，真是不堪回首！”

1950年10月23日，第9兵团司令宋时轮将军奉命进京，接受入朝作战任务。

在北京面见毛泽东时，毛泽东对宋将军说：“我不会遥控你，我们派你去朝鲜，是用你之长。你要对付的，是美军的王牌部队陆战第1师。”

毛泽东赞扬宋时轮的“长”，是指宋领导过的部队军纪严明，擅长阵地攻防，有“排炮不动，必是十纵”的美誉。

接受任务后，宋时轮立即命令部队，开展入朝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他原本的打算是利用3个月的时间进行整训，但十来天后的11月5日，中央军委发来指令，命令第9兵团立即入朝。

此时，第9兵团近15万官兵远赴寒区作战的棉衣都未来得及准备，就匆匆踏上了征程。

笔者问谭秉云：“你在什么地方过江的？”

谭秉云说：“临江。我们9兵团也有从集安过江的，比如20军。我后来从战史资料上看到，毛主席最初命令我们27军在集安过江，后来又命令我们改从临江过江。那时的临江简直就是一座巨大的兵营，车站是兵，公路上是兵，公路两边是兵，山上是兵，山下也是兵，眼睛能看到的地方全都是兵。我们团过江那天是11月7号，每人一个行军背包，扛着三八大盖和汉阳造，最好的就是美制汤姆森冲锋枪了，不过好武器得连长、排长、战斗英雄和战斗小组长才有资格背。苏联的好家伙是在打过新兴里，部队撤到后方休整以后才源源不断运上来的。过江时我看到大量部队在鸭绿江边结队前进。虽然武器落后，但也军容整洁，浩浩荡荡，很是壮观。多数步行，有小部分是卡车运输。”

笔者：“我从资料上看到，第9兵团过江前因为没有来得及发冬装，冻死冻伤了很多，你们师，你们团的情况怎么样？”

谭秉云说：“我们239团过鸭绿江时才发冬装，已经不能叫作换装了，就在路边给你。有的领到一件棉衣，有的领到一条棉裤，有的领到一双棉鞋，一顶棉帽。有的人还啥也没有。我运气好，除了领到

一件用针脚压了竖条杠子的厚棉衣，后来部队穿过一座小镇子时，我还从路边被炸塌的老百姓屋子里捡了一床很厚实的铺盖。当时从旁边路过的志愿军战士不少，都看见了，嫌脏，上面还压着死人，沾了很多血和脑浆，俗话说‘担不加斤’，害怕背不起，都没敢要。我不同，我是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老兵，不怕，就上前提起来，掂了掂，至少有七八斤重，捡来背上。结果就是这床厚墩墩的铺盖，救了我的命！”

过江之前，每个战士还领到一张比巴掌稍大一些的毛主席正面肖像照。这张照片在后来打仗的时候起到了很大的精神作用。

敢死队员出发前，都有一个庄严的仪式，胸前挂武器，左手拿相片，右手握拳举至额头，对着相片一脸肃穆地宣誓：“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话音刚落，就趁着这股子热乎劲儿，人人怀着必死之心，一齐杀向敌人的阵地……

自古以来行军作战便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说法。

《孙子兵法·军争篇》也写道：“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

但是，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恰恰对于第9兵团的使用，却违背了人类战争史上形成的普遍规律。高层的想法是让第9兵团立即过江，翻越江南山脉和狄逾岭山脉，在长津湖一带阻住气势汹汹的“联合国军”的前进。没关系，你们在前面先打着，冬装与粮食马上用汽车源源不断地给你们运上来。

这样的设想看起来完全无懈可击，没有问题。一旦放到我们尚未了解的实战环境之中，就蓦然发现战前的诸多设想，已经完全行不通了。

美军的火力——尤其是第9兵团的主要对手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师的火力配置，后勤保障究竟有多强？美军的陆海空立体战法到底有多厉害？在战斗打响之前，恐怕从志愿军最高统帅到每一位士兵，都是想象不到的。

在朝鲜带着骡马队专门负责给前线运送军需物资的江津老乡沈长江对笔者说：美国佬从后勤供应这方面找到了志愿军的短处，就开始消耗我们，这一招确实很厉害。而我们还不了解现代化战争后勤的重要性决定成败，从上到下往往重打仗，轻辎重。其实古人就知道兵马未

动，粮草先行；但我们刚刚入朝时，志愿军连自己独立的后勤体系都没有，整个后勤供应全部由东北地方政府负责，后来看见不行了，冻死饿死的人太多了，志愿军才成立后勤部，自己管后勤。志愿军开始到朝鲜的只有13和9两个兵团，后勤问题还没显露出来，到了100多万人上去的时候，战线又那么长，美国飞机的封锁那么厉害，我们就开始吃苦头了。“联合国军”是大后勤战略，50公里以前是前方司令部的事，50公里以后就归后方司令部管了。朝鲜战争尤其是这样，战场不仅仅是刀对刀枪对枪的前线，后方的供应同样重要，可能还更重要。美国佬一直狂轰滥炸我们的运输线，就是在我们后方打一场战争。这条线就是我们志愿军的命脉，是一条血线啊！

下面都听说这样一件事，当时彭德怀痛下决心，让志愿军自己搞后勤，他和洪学智发生过争论。他让洪学智管后勤，洪学智不愿意干，要指挥打仗。照志愿军的首长们看来，上了战场只有打仗才是英雄，管后勤就是没本事，很丢人似的。可见，那时我们的思想意识确实是“土八路”的水平，根本不懂得后勤是战争的生命线。听说当时彭老总发火了，跟洪学智急眼了，说：“你不干？那我干！你来指挥部队打仗好了！”洪学智还不服气，说：“打仗么，我又不是现在才学。你彭老总这么说，是将我的军。”彭老总说是你将我的军，还是我将你的军？后来，洪学智不得不服从命令管后勤，但还是提了个条件，打完朝鲜战争就不干后勤了，现在说起来都好笑。

彭老总不仅和洪学智发过火，他还为后勤供应不上的事跑到北京在全军各总部首长的会上拍桌子发火，毕竟坐在北京的首长们，看不到那些爬冰卧雪，没穿没吃的战士啊！

4. 树桩人

1950年冬，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进行了第二次战役，一举将“联合国军”击退到“三八线”以南。

在这次战役中，在朝鲜东北部长津湖地区作战的志愿军9兵团英勇奋战，重创美陆战1师为主力的美第10军，并掩护了主动向敌发起

攻击的西线志愿军主力的侧翼。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第9兵团的冬装未能及时补充，广大官兵受到严重冻伤，出现了大规模减员的惨烈现象，最终导致第9兵团未能达成预订的作战计划。

以20军为例，由于上级临时改变了命令，走在后面的20军和原本担任9兵团前卫的27军互换了位置，率先过江，率先接敌。

这支在战场上从不甘心落于人后的部队里，和兄弟部队一样，从来不乏“梁山好汉”型的骁勇悍将。好的一面是，他们从不惧怕任何敌人，上了战场，从不怯阵。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上级交下的任务，更是溶化在他们的血液和骨髓之中，早就成为他们坚定不移的思维定势。他们通常行之有效的带兵模式，便是“身先士卒”、“牺牲光荣”、“弟兄们跟我上”。他们脾气暴躁，耿直莽撞，尤重战友之情，没打仗的时候待自己的部属亲如弟兄，裤子脱下来打伙穿都成，所以深得士兵拥戴，都能做到服从命令听指挥。不好的一面则是，有了“任务至上”的固定思维后，部属的生命——当然包括指挥员自己最宝贵的鲜活生命，也就自然而然，理所当然地退居其次。

“人在阵地在”、“完不成任务决不回来见你”，出现在各种宣传品和文艺作品里的这样的豪言壮语多年来让每一个中国人耳熟能详。只要上级首长一声令下，无论是上刀山，下火海，他们连眉头也不会皱一下，便率领部队一往无前地冲杀上去。

接下来发生在鸭绿江边的一件事让人震惊。20军某团在集安过鸭绿江时，天上大雪纷飞，气温降到了零下20多度。美军飞机赶来轰炸，把靠朝鲜一侧的浮桥炸塌了很长一段。那一刻，天上雪花飘舞，江面上涌荡着、层层叠叠地挤压着被炸弹炸碎的大块小块的浮冰。

团长是用大片刀杀出来的红军老干部，见此情形心急如焚，为了抢时间，准时到达上级指定的作战地点，大吼一声：“弟兄们，我们连美帝国主义都不怕，还怕这场大雪么？老子第一个下水，怕死的都给我在岸上待着别动！”话音刚落，团长几下扒拉掉裤子胶鞋，第一个冲进了冰冷刺骨的鸭绿江中。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团长已经带头扑进了冰河，部属还能畏缩不前么？官兵们此时唯一的选择只能是照样学样，争先恐后扒下裤子，跟在他们团长身后，扑进翻滚着被炸弹炸碎的大小冰块的鸭绿江中。霎时间，只见鸭绿江中水花飞溅，人影憧憧，叫声嘈杂，浮冰



相碰，“吱嘎”有声，沙滩上、河水中，光屁股、白腿子，浩浩荡荡一大片。

该团长身先士卒，勇则勇矣，可惜老天爷不给开路条，严酷的事实证明“人定胜天”不过是用来激励人心的一个口号。提振一下精神可以，真要拿它当回事，就会出问题，甚至出大问题。

第一个下水的团长还没走出几十步哩，眼看着就不行了，龇牙咧嘴地瘫倒在水中。身后紧跟着波涌浪卷，响起一阵“扑通扑通”之声，下水官兵，大都跟着倒下。没倒下的，也都拖着冻得来毫无知觉，犹似两棍大冰棒似的腿，扭头向着河滩上，一步一串响儿地挪去，身后洒落下一路冰碴和朵朵红梅花儿般的血迹。

结果，包括团长在内的众多官兵被冻得来青红紫绿，立即送往医院抢救。

当场冻死多少战士那个年代没有披露，后来就形成了永远的历史残缺。活下来的700多名战士个个被冻成高度残废，从15岁到20出头，阳光灿烂的花样年华刚开始，便进入了痛苦不堪、默默无闻的漫长一生。

那位勇猛的团长被冻得来惨不忍睹，双臂、双腿都被齐根锯掉，整个人成了个“长方形”的大肉块，一天到晚像一根被剔除了枝丫的树桩子一样躺在床上。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这位团长的行为不但没有受到任何批评，反而因为他在困难面前表现出了置自己生死于不顾，敢于带领自己的士兵“上刀山，下火海”的英勇精神，受到了上级的隆重嘉奖。

这当然是出自那样一个激情燃烧的特殊年代的特殊要求——因为在战火纷飞的战争岁月里，整个国家和民族最需要张扬的，就是那样一种人人敢于为国献身，勇往直前的杀气、血性，与精神！

接下来发生的事实是，这位时年28岁，有结婚两年多的妻子和一个刚满周岁儿子的英雄团长在截肢后，却选择了绝食的方式来告别短暂的人生。好在，靠着妻子和护士每天守在身边给他念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念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①，他才有勇气熬过了刚刚截肢后的那一关，异常艰难地活了下来。

^① 吴运铎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兵工事业的开拓者，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刻苦研制武器，创建兵工厂，其间三次负伤，身体被炸残。《把一切献给党》是他撰写的一部自传，影响了建国之初的一代人，他也被称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

不过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他才意识到要鼓舞起让自己继续活下去的决心，比在鸭绿江边发出的那一道让他痛悔终生的命令，和带头扒掉裤子扑进翻滚着冰块的鸭绿江的行为，不知要艰难多少倍！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常常望着身边那些比他年轻得多的弟兄，泪流满面，不置一言。

至今仍然在荣军院里活着的冻残战士，一提到和他们在同一所荣军院里生活了这么几十年，不久前才去世的首长当初在鸭绿江边的那一幕无知无畏的英勇壮举时，一个个欲哭无泪，连骂他几句的心性和火气，都早已在漫长的岁月里消蚀得一干二净。

这批仅仅隔着鸭绿江看了一眼朝鲜“三千里冰雪江山”，尚未来得及跨过鸭绿江参战的志愿军战士很快就会知道，像他们这样的冻残战士，仅仅一个第9兵团发起的长津湖一次战役中，就高达30000多人！冻死4000多人！单单是翻越高山峻岭，茫茫雪原，把这样一大批人运回国内，就是一项难以想象，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巨大工程。

但无论如何，还是有少部分幸运者被部队千方百计，付出重大牺牲后运回祖国，一个个躺在手术台上，迷迷糊糊中只听得刀子锯子一阵乱响，该截胳膊的截胳膊，该锯腿的锯腿，如同清除被伐倒的树木身上的枝丫一样，截除掉他们身体上已经不可能保留的部件。然后待伤口痊愈后，再把他们分送到全国各地的荣军院里，过着彼此大致无异，心灵上从此再难有灿烂阳光和烂漫春花的日子。

这么多年来，因冻伤而被截肢的战士们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叫“树桩人”。

组织上对他们的照顾理所当然是很到位的，不过有些事，连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的组织也很为难。比如说荣军院的领导在为这么多“树桩人”介绍“对象”这项人生大事面前，就遇到了难以突破的坎儿。

谁都明白，这是一种特殊的“对象”：以妻子的名义，终身陪护缺胳膊少腿的丈夫，陪他说说话、聊聊天，一辈子照料他的吃喝拉撒，用女性的温情与妻子对丈夫应尽的义务和责任来排解他内心的寂寞和痛苦。尽管荣军院的领导做了相当艰苦的努力，开出的条件也算优厚，保证女方从此衣食无忧——她们大多来自暂时还吃不饱饭的农村地区——但仍少有姑娘响应。

可是，他们付出的肢体的牺牲，却远比生命的牺牲来得更悲壮！更惨烈！更残酷！同时也更冷寂无言——因为在长达一个多甲子的漫



长时光里，鲜有媒体会想到把镜头对准他们——在一些有着特别意义的重要日子快要来临时，偶尔也有媒体前去采访过他们。不过，采访者通常都会出自好意地要求被采访者把残疾的身体部分挡一挡，遮一遮。如此去做的理由冠冕堂皇：太残酷了，这样的镜头让青少年看了容易产生副作用……

漫长的岁月过去后，这样一大批“壮志未酬身先残”的志愿军战士，已经相继前往另一个世界集结待命去了，剩下的已经不多。

以笔者之能耐，不可能知道全国现在还有多少高度残废的志愿军老兵健在于人世，但知道全国最大的荣军院——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里目前仅存29位志愿军残疾军人。

这些耄耋之年的志愿军老兵，是那场战争留给我们的最后记忆。他们带着满身伤痛顽强地活着。因为他们活着，那些血染沙场、英灵永逝的战友们也就还活着——至少在他们这29名战友心里永远地活着。战争无情，但军人无悔；历史无情，因而英雄无悔！

我们的有关方面如果要想留下那样一段惨烈悲壮的历史，以激励后人——笔者以为更多的是把他们的遭遇如实地告诉世人，以此来警醒全世界的政治家：千万不要轻启战端——恐怕动作得快一些才行。要不，极有可能又会成为一个无法弥补的重大遗憾！

5. 惊破霓裳羽衣曲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最高统帅部一道紧似一道催兵出征的“金牌”，惊破的并非什么霓裳羽衣曲，而是志愿军第9兵团15万官兵御寒的冬装。

最高领袖迭令第9兵团马不停蹄，火速入朝进入预设作战地域，从战略上讲，值得后来的军事家们认真研究和总结。第二次战役彭德怀的战略指导思想就是“西攻东顶”，东线在彭德怀的沙盘上只是次要方向，只要集中力量击溃西线沃克的美第8集团军，那么东线阿尔蒙德的美第10军必然会赶紧后撤。

从战术上讲，将入朝的志愿军两大兵团分散在东西互不协同的两

条战线上，也违反了毛泽东总结并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十大军事原则》里的第4条：“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毛泽东注：2倍、3倍、4倍，有时甚至是5倍或6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

至于第9兵团所发的棉衣棉裤应该加厚的的问题，后勤部门当然老早就意识到了。早在1950年8月26日中央军委检查和讨论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的会议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张令彬将军汇报时就明确指出，“如南方部队北调时，棉衣均需加厚”。

但问题是，毕竟当时部队还在南方，“如现在加厚，若部队不北调时穿着太热”。

这个理由当然成立，因为华东部队如非立即北调，让其穿着东北部队配发的装3斤半棉花的冬装，笨手笨脚，也实在太不方便，而且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因而张令彬提议：“南方部队北调时，加发一件棉背心及一条绒裤，再发一件大衣即可。”

但因后来部队临时调来调去，时而集安，时而临江，很多战士并未领到张令彬所说的这些御寒之物。

如果说出于国际国内政治上的考虑，无论如何也要把东线的“联合国军”阻挡在远离鸭绿江的地方，那么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做到了。

因为在此之前，南韩军第6师（青星部队）第7团的一支侦察部队已经第一个到达了北朝鲜西北面鸭绿江边的楚山镇；而美军第7师第17团的一支搜索部队也紧随其后，抵达了北朝鲜东北面鸭绿江边的惠山镇。

为了庆祝这个胜利的时刻，最先抵达楚山镇的南韩军隆重地来了一个“鸭绿江献水”，这件事以及参与这件事的南韩军士兵后来被浓墨重彩地载入了韩国历史。

而美国牛仔们的庆祝方式则明显缺乏创造力。

第17团的大兵们效仿当年他们打败了希特勒的军队后在莱茵河边的举动，解开裤子，集体面向对岸的中国原野山峦，向鸭绿江里撒了一泡热气腾腾充满骚味的尿。

美军抵达惠山镇无论是从军事价值和政治意义上都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因为按照麦克阿瑟发布的命令，从现在起，他们的仗已经打完了，就应当着手打道回府了。所以，连东线美军最高指挥官阿尔蒙德



也忙不迭地带着部属乘直升飞机赶来，在惠山镇的鸭绿江边，以江对岸的中国为背景，和他麾下的3名将军站成一排，合影留念。

麦克阿瑟欣喜若狂地从东京致电阿尔蒙德：“致以最衷心的祝贺！转告戴维·巴尔，第7师中了头彩！”

而这两支分属不同国家的小部队在此后随着志愿军进攻行动的展开，不也全都慌慌张张地向南撒丫子逃跑了吗？

为了让第9兵团的15万官兵穿上不至于一过江就被冻得失了人形的冬装，再好手好脚地上阵与敌人厮杀一番，就算东线阿尔蒙德的第10军到了鸭绿江边，天也不会塌下来。我们从北向南，由高处往低处打，身后有举国支援，不照样能够把他们赶回去！

而事实上就发生了在沈阳火车站，贺晋年要求停车两个小时，给20军官兵赶发冬装，却未获允许这样令后人备感痛心的事情。

我们可以从《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中看到，原定计划9兵团补给冬装应该在沈阳、梅河口，而出动计划改变后，物资要从沈阳、梅河口抢运集安、临江。这一厢运到集安卸下刚入库，过河地点又猛地改到了临江，得，这又得再次装车拉到临江。原本运转就不太灵的运输部门这一来更是手忙脚乱，造成官兵领冬装时锣齐鼓不齐，也就不足为怪了。

更严重的问题是，东北此前准备的冬装，已经配发给了先期入朝的第13兵团，因此作为第二批入朝的第9兵团赶来后，就远远不够了。

东北财政部副部长倪伟关于军事供应问题的报告称，“到11月底尚需赶制40万套棉衣。所以9兵团到达后，只好发给棉大衣，而不能保证棉衣，而单就棉大衣一项来说，也储备不足”。

11月8日，20军乘坐的专列抵达沈阳，在沈阳火车站目睹身穿南方薄棉军装的20军官兵的贺晋年副司令员，将原准备发给13兵团而未来得及运走的35090件棉大衣赶运至皇姑屯，上了20军的专列。此时沈阳的库存，也被搜罗一空了。10日兵团司令部和27军到沈阳时，只有赶制的边防军大衣2980件，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高岗又批示由财政部拨给的新旧棉大衣10万件中，送给27军3万多件。此后，又不得不将剩余的6万多件也批给了第9兵团。再后，各地又紧急送来一些棉大衣。至11月底，总共发给第9兵团新旧棉大衣

226661件。

读者朋友要问了：9兵团只有15万人，这不一人一件，还有剩余么？

这账啊，可不能这么算，226661件新旧棉大衣的庞大数字是从东北发出的数字，而并非在前线的第9兵团接收到的实物。这两者间的落差大得来天上地下，因为绝大多数车辆和棉衣在运输途中就被美军飞机炸成了破铜烂铁，烧成了灰烬，运到前线的冬装，不足一成。

同时第9兵团自己负责后勤工作的一些干部“没有对朝鲜战地环境的认识，认为打仗不会冻着人，朝鲜比辽东、辽南纬度低，想当然地认为应该更暖和一些。60师把全师的大衣、背包留在集安不带走，害怕背不动，影响行军速度。某团团长竟然下令徒涉鸭绿江，当场冻死冻伤近千人。过江时原本粮食充足，可是不少指挥员担心带多了影响行军速度，各部队普遍只携带3到5天的粮食，脑子里还是老黄历，以为当兵的只要手中有枪，走到哪里都不怕没吃的”^①。

第9兵团后勤部长官宗礼自己也承认，“造成这种情况，我们在主观上要负大部分责任，如果后勤工作开始时，在思想上、组织上做好准备工作，就可减少伤病员的痛苦和死亡率，但这里确实有些困难需要上级领导上和组织上来解决”^②。

虽然后方物资有充分储备，“在鸭绿江中国一侧，物资堆积如山”，真正能够突破美军的封锁线，到达一线的数量，却极其有限。

即使是先入朝的第13兵团部队也有类似问题。

如38军后勤部在12月21日的报告中抱怨：“东后及分部由电报所分发的东西，大部限于纸上空谈，现在远不知在何处，何时能到手。一分部供应38军二次战役的物资，电报上称送了多少车多少东西，实际只收到白面3车，炒面7车，实物5车（还不知道是发给哪一部分的，是被饿得没法了的官兵自发截留下来的），另外加上部分弹药，仅此而已。”^③

“自发截留”，说明被饿得嗷嗷叫的前线官兵，已经出现了哄抢给养的现象。

① 引自《前方几个单位汇报后勤供应情况》1951年1月24日之《第9兵团（东线）后勤部官宗礼部长汇报》。

② 引自《前方几个单位汇报后勤供应情况》1951年1月24日之《第9兵团（东线）后勤部官宗礼部长汇报》。

③ 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会编《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专业勤务上册，金盾出版社1987年版。



11月25日，就在长津湖战役箭在弦上之际，由于美军飞机疯狂轰炸，谭秉云所在的27军45辆满载粮食弹药的大卡车，一次轰炸就被炸毁了39辆，剩下6辆，即便能够不顾死活地冲到前线，杯水车薪，对战役又能起多大作用？

从后勤上讲，第9兵团仓促入朝，未及换装，更是使原本就相当薄弱的后勤补给，增加了战地补给的沉重负担。

因此笔者有理由认为：如果采取只以27军由集安入朝接替或加强吴瑞林的42军在东线的阻滞力量，而以第9兵团主力20军、26军一并投入西线战场，集中第13兵团与第9兵团主力来对付沃克的第8集团军，必然会在西线取得更大战果。

这样，一来可以使第9兵团在入朝前获得换装补给的时间，二来也能避免在中途变更计划而出现种种不利状况——如第9兵团中途接到直接入朝命令时，27军已开往集安，不及调转，只得以后卫20军改作前卫，结果改道至梅河口因铁道线路坡度大，列车动力不足，爬不上去，必须拆散行车序列，重新编组才行，这样一来，就导致20军入朝时的建制，被完全打乱。

时任9兵团政治部主任的谢有法将军在《谢有法将军文辑》中回忆说：“宋时轮过江之前曾打电话给高岗，提出推迟两天过江。他要求直接向毛主席打电话，提出这个建议，并估计毛主席很可能会同意。但高岗不同意宋直接与毛主席通话。”他还写道：“志愿军司令部要9兵团在11月25日与西线同时发动反击，宋时轮请示彭老总说：‘25日发动不了，因为部队还没有到位，要求推迟两天。’彭老总考虑到虽然是一个战役（即第二次战役），但它是一个独立的方向，迟两天打也没有关系，就同意了。”

彭老总“就同意了”，那是因为他没办法不同意。发动偌大一场战役，所辖部队锣齐鼓不齐，有力使不上劲，他这总司令心里能好受？

把第9兵团搞得手忙脚乱地拉到朝鲜，关键时刻却又派不上用场，得让兄弟部队先打着，两天后等部队到位再上，那还不如让他们迟两天过鸭绿江，先把冬装备齐了，再往这冰天雪地里钻，多好！

从档案材料和其他材料进行综合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朝鲜战争初期，毛泽东明显高估了中国的军事力量，低估了美国的军事力量。

三封电报，足以证明毛泽东在“知彼”这个重大的问题上，有一个逐步了解的过程。

毛泽东在1950年10月31日夜里10时给宋时轮、陶勇、陈毅、饶漱石、彭德怀、高岗等人的电报中强调：“该兵团（第9兵团）到后受志司指挥，以寻机各个歼灭南朝鲜首都师、第3师、美军第7师及陆战第1师等4个师为目标。”

一月后，毛泽东又在11月28日发给彭德怀、邓华、洪学智等人的《关于集中4个军歼灭美军3个师的主力的电报》中称“目前任务是集中我42军、38军、40军、39军，歼灭美骑1师、第2师、第25师等3个师的主力。只要这3个师的主力歼灭了，整个局势就很有利了”。^①

敌我双方尚未谋面、交手，毛泽东就想始而“歼灭南朝鲜首都师、第3师、美军第7师及陆战第1师等4个师”，继而又打算“歼灭美骑1师、第2师、第25师等3个师的主力”。如此宏伟壮阔的战役决心，显然还是建立在解放战争时期对付国民党军队的大歼灭战的经验上，辽沈一役歼敌47万，平津一役歼敌52万，淮海战役再歼敌55万，一连串大手笔，打得来何等痛快淋漓，何等气吞山河！再加上第一次战役的遭遇战性质，打得狂妄自大的美国人措手不及，仓皇败下阵去，也使得毛泽东对美军的战斗力，产生了低估。

最高统帅一仗要“歼灭美军4至3个师”，他麾下的众多志愿军将领们同样是豪气干云，根本不把美国佬放在眼里。

“要成建制地歼灭几个师的美军。”

“美国鬼子不也是肉体凡胎嘛，咱集中优势兵力，就收拾不了它？”

“美国兵最怕死，冲上去就能立个国际功！”

统率3兵团十几万兵马的代司令员王近山将军更是气冲牛斗，眼睛更高，他承认自己看不起美国人。“他们有多少兵？加上李承晚的伪军，还抵不上咱们的一个军区，不够咱们一个淮海战役打的！我看把美国鬼子赶下太平洋不成问题，朝鲜多大个地方呀？咱只要把部队拉到‘三八线’上撒泡尿，就能把他们冲到釜山去！”

从毛泽东到高级将领莫不轻敌如此，不知深浅的基层官兵，更不会把美国人放在眼里。志愿军刚刚小试牛刀，尝到了一点甜头，对美

^① 两封电报均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军的特点并不完全了解，上上下下，便匆忙地作出一些失之偏颇的判断。

“战争是政治的一种手段。战争中的政治热情必不可缺，而且它还是赢得战争最后胜利的重要保证。但是，在每一场局部的、具体的战斗进行中，战争双方所较量的更多的则是知己知彼、运筹帷幄的战争智力，以及遵循战争特有规律的周密而准确的战术运用。战争观念的陈旧、战争手段和战术的落伍，最终受到损害的，必然是政治利益。”当代著名军事历史作家王树增在《朝鲜战争》一书中如此针砭，极为精当。

等到志愿军上了战场，与美军几番较量后，毛泽东再给彭德怀布置任务，要求就明显不同了。就拿美陆战1师来说吧，一方面，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个强劲的对手，可是临到作战开始时，他似乎又把陆战1师当成了一只煮熟的鸭子。他甚至还想用陆战1师做钓饵，引来更多敌军加以歼灭。从12月3日毛泽东发给彭德怀、邓华、朴一禹、宋时轮、陶勇、覃健并告高岗、贺晋年的一份电报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还真是这么想的。“对柳潭里地区之敌，除歼灭其一部外，暂时保留一大部，围而不歼，让其日夜呼援，这样便吸引援敌一定到来，使我有援可打”。^①

毛泽东认为光陆战1师这碟小菜，是不够志愿军吃的。谁承想，宋时轮以20和27两个加强军10万官兵（手里拿着刚刚送来的新家伙的26军主力紧追慢撵，也没能够赶上趟）在冰天雪地里围追堵截美陆战1师外加美步兵7师一个团，总共大约25000人马，血战17个日日夜夜，结果不但没把鱼钓上来，反倒让这条已经被打得皮开肉绽的“大白鲨”，把渔网撞了个大窟窿，带着累累伤痕溜掉了。

笔者和读者朋友一起来一个事后诸葛亮似的分析，想必会认为第9兵团如此紧急入朝，并无绝对之必要。最高统帅部的想法就是想抓住战机，出其不意地在东线打它个漂亮的大歼灭战。

而战争的实际发展却证明，志愿军不仅未能实现歼灭东线“联合国军”3个师的宏伟计划，实际连一个陆战1师都远未能歼灭，反而给第9兵团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在历时17天的长津湖战役中，9兵团究竟伤亡了多少志愿军官

^① 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兵？毛泽东在给宋时轮的电报里有具体数字“4万余人”。

笔者查到，“4万余人”的说法应当是来自9兵团后勤部长官宗礼于1951年1月24日的汇报。

官部长称：“9兵团总共冻伤和战伤44344人，其中战伤12587人，冻伤18437人，死亡7332人。”

但，这个数字离真实的伤亡数字恐怕相差太巨。

我们从第9兵团20军在东北军区第一届后勤会议上所作的《20军后勤工作初步总结》的字里行间就能清楚看到，并可以据此作出合乎情理的推断。“全军25000伤员，冻伤占60%以上，约15000人。原因是部队除棉衣发齐外，棉帽、棉鞋及其他保暖物资都未得补充。在冰天雪地中作战非常痛苦，唯一办法是拆被子做袜子、手套、耳套等。据不完全统计，全军60%的被子拆完了。”^①

20军是9兵团前卫，全军50569人，没有单独的阵亡数字。仅官宗礼报告的伤员便高达25000人，占50%。他们最先过江，最先投入战斗，所以领到的冬装与紧随他们其后的27军会更多一些。“除棉衣发齐外”，说明他们至少每人领到了一件3斤半重的厚棉衣。

不过，从中同样也可清楚看出，即使发齐棉衣的部队，配套物资不足，仍不免有冻伤发生，且冻伤之比例也并不比其他部队有明显的降低。那么处在完全一样的严酷的自然条件之下，而且未能发齐棉衣，兵员大致相差无几（都是加强的四四制），面对的是同一支美军虎狼之师，经历的战斗也同样惨烈的兄弟部队27军，伤亡想来不会比他们低多少。

再加上主力虽未赶上第二次战役，却因骡马受惊遭美军轰炸和人民军坦克部队误击的26军同样损失惨重^②，3个军的伤亡数字加起来，超过“4万余人”。

关于第9兵团的大批官兵被冻死冻伤，中国官方权威的《抗美援朝战争史》（2000年版）如此总结道：

9兵团在入朝前一直在准备渡海登陆作战解放台湾，因朝鲜东线

① 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会编《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专业勤务上册，金盾出版社1987年版。

② 志愿军入朝参战之初，因中朝双方在由谁指挥的问题上产生矛盾，导致彼此情报沟通不畅，多次出现人民军误击志愿军的事件。如1950年11月4日志愿军第39军在博川东南围攻美第24师时，突然遭到奉命向顺川挺进的人民军坦克部队误击，致使被围之敌逃脱。

战事紧迫，为把握战机，才在到达中国东北后没有做停留，也没有进行换装整训，就提前直接入朝作战。结果各种准备很不充分，入朝时寒区服装来不及发放，加之对战区气候知之甚少，部队又是长期在中国华东地区驻扎和作战，缺乏高寒地区生活和作战的经验，防寒准备严重不足，人员衣着单薄。同时山路险峻，美军飞机猖獗，大量汽车被毁，粮食、被服、弹药补给运不上去，战区内人烟稀少，语言不通，就地筹粮十分困难。

部队进入战区后，缺少粮食，饥寒交迫，住房基本被美军飞机炸毁，只能在雪地宿营，而长津湖地区温度在当年11月下旬已经下降到零下二三十度。官兵们衣着单薄，粮弹缺乏，忍饥受冻，加上后勤补给困难，有的部队一两天只能吃上一顿结冰的高粱米，官兵体质严重下降，冻伤减员严重。

在新兴里战斗中，第27军第80师第240团第5连冲锋时受到敌人火力压制，全连呈战斗队形卧倒在雪地，最后全部冻死。

严寒的天气，也直接影响了武器的使用，部队配备的迫击炮70%无法使用，许多步枪、机枪枪栓被冻无法击发，通信联络也极不通畅。

美陆战1师在拥有远比志愿军完备的御寒装备的情况下，在22215名官兵中仍然有7300人被冻伤，占了全师官兵的三分之一。而穿着华东地区仅装1斤半棉花的单薄棉衣进入零下二三十度的长津湖地区作战的第9兵团情况则更加严重，入朝行军第一天就有七八百人冻伤。战役结束后公认此战出现了我军历史上最严重的冻伤减员现象，各方面记载也基本一致，因此冻伤3万余人，冻死4000余人的数字，应当没有什么争议。

多年后，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的迟浩田上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起那场战斗仍唏嘘不已。他说：“一冷我马上拿雪搓一搓，搓完身子再搓脸，所以我是全营唯一没有冻伤的。”^①

迟浩田是山东招远人，小时候曾经和父亲一起闯关东，因为有东北生活的经历，在严寒的天气中，迟浩田的父亲就曾经教过他很多御寒和防止冻伤的方法。

① 迟浩田时任志愿军第27军79师235团3营教导员。

诚然，我军后勤供给不上是导致当年志愿军将士大面积冻伤的主要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稍稍多了解一些健康预防知识，哪怕只教会战士们“搓一搓”的简单常识，也能让更多官兵免遭冻死冻伤。

除了冻，还有吃。

谭秉云告诉笔者：“美国人吃的啥？志愿军吃的啥？那真是没法比哟！我们打新兴里时，3天发了两次洋芋，头一次一人3个，后一次一人2个。冰天雪地里，等送到阵地上，发到战士手头，早冻成冰坨坨了。那东西，硬得像石头，牙齿硌掉了都啃它不动，硬是没法吃。可人是铁，饭是钢啊，啃不动也得吃。你是在外国打仗啊，冲锋号一响，你马上得扑上去；撤退时，敌人坐着汽车坦克在后面追，你还得有力气扯掉两条脚杆跑才行。饿狠了，打起仗来跑不动，那还有个活？大家只好把冰坨坨塞进胳肢窝里夹一夹，等解了冻，再拿出来啃两口，啃不动了，又赶紧塞进胳肢窝里温温。那滋味哪，恼火！”

关于志愿军在冰天雪地吃洋芋的细节，笔者的另一个江津老乡、在15军当军需员的沈长江也谈到了。

“我带着一个两百来人的运输队，照道理应当饿不着，可事实上却经常饿肚子。那是因为美军飞机太厉害，见人见骡马就炸，还追着人和骡子用机枪扫，弄得我们的运输特别困难。后方的物资运不上来，我们也没东西往前线运，自己也得饿肚子。那时老百姓的房子差不多都被炸光了，人也跑光了，志愿军就经常挨饿。后来首长觉得再这样饿下去战士就没法打仗了，急得来催我们想办法筹粮。

“有一天，我带着两个人和一头骡子，走到很远的一个山沟里，找到了一处老百姓的房子，人已经跑光了，我们在里面翻出了一袋稻子和一袋土豆。当时毛主席强调了，要爱护朝鲜老百姓的一草一木，可是我们出国又没带钱，这咋个办？后来我们就把土豆驮走，给那个朝鲜老乡留下了一条军毯，和一个缴获的美军鸭绒袋作为抵押。土豆扛回来怎么吃呢？又不敢生火，白天不能冒烟，晚上不能见火，因为飞机经常轰炸。

“到后来没办法，我又带着人和骡子，把这一袋土豆驮到那户老百姓家去了，把这袋土豆煮熟了。可是等这一袋子土豆煮熟了，送到前线阵地以后，土豆全都冻成冰坨坨了，没法吃。战士们饿啊，怎么办？硬啃，夹在腋下化，化一层啃一点儿，再化，再啃。如果不是亲

身经历的话，是很难理解的。我们的战士，就是这样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和美国人打仗的。后来每当我坐在餐桌旁，面对着丰盛饭菜的时候，就常常想起65年前，在抗美援朝前线那一段艰苦的日子。”

在部署第五次战役的高级军事会议上，彭德怀特别强调：“后勤工作，再重复一句，要特别认真对待东线5个军的粮食供应，如一两天没饭吃，再好的计划都完了。如果这次打胜了，全体指战员的功劳算一半，后勤算一半。”

可见，彭德怀等志愿军的将领们对后勤工作的重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担负后勤工作的官兵也尽职尽责，全国人民的支援也到了位。各种军需物资在鸭绿江北岸堆积如山，可就是因为美军飞机炸得太厉害，没法运抵前线。

志愿军的补给到了苦不堪言的地步，而“联合国军”的军需物资是用汽车、军舰运输，再加飞机空投。咖啡、乳酪、蔬菜罐头应有尽有，胡萝卜、土豆切成细丁烘干，黄油牛肉充分供应，按营养价值计算热量及纤维，节日还有盛宴。美国大兵也实在娇气得令中国人羡慕嫉妒恨，啤酒送到火线上，就因为没有冰镇，大家还不愿喝……

6. 美国兵可不是纸老虎

由于宣传工作的强有力作用，再加之首战告捷，不仅南韩军被打得屁滚尿流，连美国大兵也不在话下，志愿军官兵的思想从出国之前普遍存在的“恐美心理”，很快便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轻敌。

通过志愿军政治部编印的《云山战斗经验基本总结》小册子，我们就能清楚地感受到这种十分危险的现象。

这是一份志愿军官兵必须组织认真反复学习的资料，上面除了对美军在协调火炮和坦克，步兵火力速射，以及后勤补给能力和空中支援能力等多方面表示羡慕外，对于美国士兵的战斗力的战斗力，却是不屑一顾，藐视到极点。

总结中写道：

美国士兵在被切断后路时，会丢弃所有的重武器，扔得到处都是，而且还装死。

他们的步兵缺乏战斗力，胆小怕死，不具备进攻和防御的胆略。

他们在前进时如果听见枪声，便会退缩不前。

他们只能在白天打仗，不习惯夜战和白刃战。

如果他们战败，便会溃不成军。

如果他们没有炮火支援，就会不知所措。

当补给停止时，步兵便会完全丧失斗志。

这样的“纸老虎”，还需咱中国人动手么？冲他吹口气儿，不就垮掉了。

我们的宣传材料里不单是千篇一律地把美军官兵普遍形容为怕死鬼，而且称他们是只知道吃喝玩乐，贪图享受的“少爷兵”，一捅就破的“纸老虎”。

在上甘岭一战成名的秦基伟在回忆录里写到了毛泽东单独接见他的经过。

为了这次意义非凡的接见，光是皮鞋，他就买了三双，第一双小了，第二双大了，第三双才合脚，可见精神之亢奋、紧张。

他原本抽烟厉害，每天至少得抽两包烟，可跨进毛泽东的办公室门槛，毛泽东热情地拿出烟来请他抽时，他却说自己从不抽烟。

我觉得在毛主席面前吞云吐雾不太合适，就推说不会抽烟。主席有点意外，说：“噢，当军长的还不会抽烟呵！”

其实，那时候我一天没有两包烟下不来。上甘岭战役第一阶段，我的烟一支接一支，几乎昼夜不断。

毛主席见我推辞，以为我真的不会抽烟，便自己点火抽了起来，烟草香味直往我的鼻子里钻，还真的把烟瘾勾上来了。可是，既然已经说不会抽了，再抽，就不好意思了。

在谈到对敌斗争时，毛主席问：“美国佬好对付吗？”

我说：“刚入朝的时候对他的活动规律摸不着，有点生疏，后来交了几次手，就感到美国佬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并不可怕。美国佬有三个长处：一是机动快，二有制空权，三是后勤及时充足。但他也有三条缺点：一怕夜战，二怕近战，三怕死。有这三条，他



就注定要败在我们手里。”

毛主席笑着说：“张牙舞爪到处要吃人的大老虎，也被志愿军战胜了，可见确实是一个纸老虎。”^①

笔者从吴信泉、吴瑞林、曾思玉、杨得志、杨成武等将领的回忆录中看到，毛泽东在陆续接见志愿军高级将领时，无不询问美军的战斗力究竟如何。而将领们的回答与秦基伟大同小异，都认为美国佬徒有虚名，全都是一打就屁的怕死鬼，没什么了不起的。

可见，从后方官兵到高级指挥员，直至最高统帅，都的的确确把美国佬当成了纸老虎。

但在前线和美国大兵拼死相搏的普通士兵眼中，那就不一样了。

志愿军老兵张清劭说：“从出国开始，上级就宣传美国兵是少爷兵，是不堪一击的纸老虎。我们都相信哪。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我们有个班长，他对我说，我买了两支牙膏，恐怕用不完就打完仗回来了。后来到了朝鲜一接火，才晓得美国人也是很勇敢的，也是敢和我们拼刺刀的，哪儿像上面说的什么一打就屁啊？后来上面就改口号了，要我们把‘纸老虎当真老虎打’。不过，不管敌人强与弱，咱们部队的士气一直都挺高的。在朝鲜那样艰苦的环境里，说实话，志愿军要没有一种必胜的信心，战士们要没有这样一股子不怕死的精神力量，是绝对撑不下来的。”

而美国人灌输给他的士兵头脑中的中国军人的印象，则要实事求是得多，甚至是不吝称道的口吻。

美国军史中写道：“中国军队里的士兵绝大部分都是农民出身，他们对艰辛劳作、忍耐与贫困早就已经习以为常，并不以胜败和人员的损失为意，对他们信奉的东西则坚贞不渝，而且对上司大都唯命是从。长期贫困艰难的生活使他们的士兵都能够在给养不足的情况下，进行远距离的艰苦行军，并且在行军结束后仍能进行战斗。他们可以翻山越岭，又不会因为精疲力竭或用力过度而倒下。在这方面，他们不像大多数美国士兵那样，习惯于乘坐机动车辆，很少进行体能训练，几乎没有长途行军和翻山越岭的经历。”^②

美国人的军事文化观念促使他们必须尽可能准确地把敌人的特点

^① 引自《秦基伟回忆录》，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

^② 引自（美）贝文·亚历山大《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告诉自己的士兵，以避免他们在遭遇对手时作出错误判断，达到更好地消灭敌人的目的。

其实，美军官兵在前线作战时的表现究竟怎么样，待在前线的志愿军官兵心里都有数。甚至他们的敌人在作战期间吃的什么，穿的什么，喝的什么，甚至拉的什么——当志愿军战士第一次缴获了美军在战场上广泛使用的抽水马桶时，这种稀奇古怪的战利品让他们大费了一番周章。当从见多识广、十分稀有的都市兵口中得知此物的独特功用后，有好奇心重的战士褪下裤子，勇敢地坐上去试了一下，左摇右晃，憋得一张脸膛子通红，最终也未能获得成功时，于是愤愤骂道：唉，这美国佬真他妈的是个怪物，坐着咋也能把“粑粑”屙出来？

志愿军战士也比后方机关里的人员更加清楚对手的补给能力有多强。因为他们不仅经常在战斗中“缴获甚丰”，而且还不时遇上天上掉大馅饼的好事。美军被志愿军包围时，他们的飞机赶来空投补给品，降落伞经常被风刮到志愿军战士的阵地上。每当那样的好事从天而降，中国人无不心花怒放，欢声雷动。天下掉下来的不仅有吃的用的，有一次还收获了许多花里胡哨，用来调剂美军士兵精神生活的裸体女人图片。

到了战场上，志愿军官兵这才知道，美国大兵根本不像学习材料上宣传的那样，个个都是怕死鬼，一打就屌。他们和中国军人一样坚忍顽强，一样能拼命，而且战斗素养也相当高，甚至毫不客气地说，若论技术兵种，比咱中国军人高得多。

志愿军炮兵王绳金说：“志愿军是什么人组成的呢，我告诉你，绝大部分是翻身农民，十个人里七八个、八九个是文盲，连报平安的家信都不会写。不打仗的时候，成天找我写家信的人排成队。我是炮兵，那时候我们炮兵的素质低到了什么地步？我们的炮兵指挥技术和各方面的知识都远远不够，所以只能打直瞄射击，就是近距离把炮推到能看见敌人的地方，一炮把你打倒，打不倒你我就被你打倒，相当于咱们炮兵也和步兵一样，拉上去和美国佬‘拼刺刀’，就是这么回事，普遍都是这种射击方法。这种射击方法加上不怕死的精神，打个游击战，轰个鬼子的炮楼还勉强能凑合，大兵团作战也这么打，就根本不行了，付出的代价相当大。所以美国人认为我们志愿军炮兵不堪一击，是有道理的。”

如今居住在重庆南岸的志愿军老兵陈卓文向笔者回忆：



第五次战役一开打，时任38军113师某连副指导员的陈卓文就感觉不对劲儿。晚上急行军，路上踩得一软一软的都是尸体。天亮一看都傻眼了，从没见过那么多的尸体，很多都是前头部队留下来的。也有韩国人的，老百姓的。这还没回过味儿来呢！飞机就来了，像蝗虫一样一堆堆的，见了动的东西就是几个炸弹，或者一颗汽油弹。要不就一头扎下来扫一通机关炮。战斗部队还好，后勤可倒了大霉了。汽车、大车给炸得光光的，没活下几个人。连他们的炊事班也让一颗炸弹炸得还剩3个人，锅碗瓢盆全给炸没了。仗还没开打，就饿饭了。饿得头昏眼花才吃一口干粮，还得急行军，陈卓文那个连个个委屈憋闷。

一帮守阵地的倒霉鬼韩国兵撞到枪口上，伸手不见五指的后半夜，几个老兵绕到他们的后面，贴着山壁悄无声息地摸过去，还没等韩国人反应过来，就被一顿手榴弹、冲锋枪干趴下一片，大队人马趁势一冲，一会儿近百个韩国兵就剩了稀稀拉拉三五个当了俘虏，其他的都见阎王爷去了。大家赶紧从死人身上找了点吃的，把干粮袋塞满，把腮帮子塞满，这才算恢复点元气。正嚼呢！劈头盖脸的炮弹就打了过来。那个密啊！口径还大，一下子像刮了一阵狂风。立着的活物、死物全扯碎放倒，部队一下子就是大半连没有了。

做梦也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么打炮的！

接着就是飞机扔汽油弹。烧得昏天黑地，人只能猫着，既不能做工事，也没法子撤下去了，就听着乱下蛋的飞机和大炮在自己头上阵阵怪叫。

过了不久炮火渐渐转移了，我们头一抬，见敌人上来了，从土堆里爬出来端起机枪，还没打几发，敌人就撤下去了。几发直瞄火炮炮弹跟着就打过来了，陈卓文亲眼看见身边的机枪手被炸成两截，上半身挣扎了几下就不动了。

陈卓文说：“一会儿工夫，敌人又上来了。这次大家学乖了，把他们放上了阵地后再反击。他们立马就不行了，上来多少，被打下去多少。可是我们的一个连打退两次冲锋后就只剩十几个人了，而且人人带伤，营部这时候才下命令说撤。一个200来号人的大连，两个多小时后，就只剩下十几个人撤了下去。”

这次战斗中，陈卓文屁股上也让炸弹片崩掉巴掌大一块鲜肉，一发炎走不了路，就送后方去了。他说是朝鲜民工给背下去的。他还一

直念念不忘一个朝鲜人民军女卫生员。当时中朝两国人民的情谊那真是没得说：那个女卫生员忍饥挨饿把自己的干粮给他吃；敌机轰炸时扑在他身上用自己的躯体来掩护；娇弱的身子和男人一样扛担架，背伤员，翻山越岭，还要给伤员们换药，照顾安慰他们。说起这段陈卓文总是唏嘘不已。

到了后方一看，天，伤兵人山人海，重伤员转送国内，陈卓文不算重伤就留在医院里了。那个地方在一个山洞里头。血腥气扑鼻，经常也会有飞机轰炸。可是你说怪不怪，很少听到有人哭天抢地的，疼得受不了也仅仅是“哼哼”几声。大家互相照顾，安慰。互相帮着换药，每个人都尽力帮医生、护士做点事儿。很多重伤员活活疼死也不喊叫，就那么静悄悄地走了，几尺白布一裹连棺材也没有，抬到山后就埋了。人太多了，顾不过来了！医生、护士一个个也眼瞅着撑不下去了，累得脱了形，还是咬牙坚持着。

还有让陈卓文震惊的就是那些精神受到刺激的人。前方有，后方也不少。一个个目光呆滞，胡言乱语，动不动就在那里“打炮了！打炮了！卧倒卧倒”地乱叫。那样子没有人见了不发怵。这样的人，一般很快就被带走了。

等陈卓文再回到前线的时候，运动战已经结束了，前线开始了守备作战。连里就只有几个认识的老面孔了，刚补充了120个四川新兵。全是来自成都、温江、眉山一带川西坝子上的人，一大群“青沟子娃娃”，还有几十个别的连队调过来的老兵。“荣升”连长的陈卓文一接手就犯了愁，新兵太多了，老家伙还不到三分之一。这帮青沟子娃娃连最基本的军事训练都没接受过，就是换了一身衣服就被送上来了，连手榴弹都没扔过，天真烂漫，嘻嘻哈哈。打起硬仗可怎么办？那时候部队的供应比一、二、三次战役时好多了，饭能吃饱。可是这帮四川兵还是受不了，没几天跑了两个开小差的。被抓住送了回来，按规定得按“军法从事”。两个人眼泪汪汪地说就是想到后头去找碗米饭吃。面对两个还没长“醒”的娃娃，陈卓文能说什么呢？他违反规定，放了他俩一马，然后给各排班长、战斗组长、老兵骨干们打招呼，大家提高警惕，看管照顾好新兵，防止娃娃们再跑。

原志愿军步兵排长、两次担任敢死队长仍大难不死的朱克说：“冲锋的时候，咱们的弟兄那都是舍了命地往上冲，人家美国佬那完全都是机枪、重机枪，都是这样那样的炮，咱们呢？净是人啊，就三



大样，人、枪、手榴弹。说实话，咱们的弟兄一上去，前边的想都不用想，马上就把自己的身体趴在铁丝网上了，让后面的弟兄踩着自己的后背往前冲。趴到铁丝网上，趴到枪眼上多得很，一群一群地争着上，那不是光宣传的黄继光一个，哪一次敢死队员冲上去没几个堵枪眼被打死的？没有几个趴铁丝网被战友活活踩死的、滚地雷阵被炸得捡不起来的？你不趴铁丝网不滚地雷阵你的部队哪儿能上去，对不对？你不这样做跟在你后面的都上不来嘛，想都不用想，那是肯定的嘛。连这都做不到，你还有脸当敢死队员哪，对不对？说实话，黄继光那只是一个典型，志愿军里不知道名字的‘黄继光’，多了去！”

沈长江对笔者说：“我是个军需员，在朝鲜待了那么多年，从来没有真刀真枪地和敌人打过一仗，甚至从没得着机会向美国兵放一枪。可是我看打仗看得多啊，有时把补给送到阵地上，正看见部队进攻，就远远地待在一边看上了。咱们一个连、一个营上去，整个被敌人打下来了，没剩下几个啊，结果首长又派第二批硬往上冲，下来时，又没剩下几个。我跟你讲，步兵打仗啊，那牺牲太惨重了。发起冲锋的时候，敌人的火炮、飞机一炸一大片，我们的弟兄一倒一大片，前边倒，后边‘哗啦啦’跟潮水似的又涌上去了，人人都杀红了眼，那真叫作一个不怕死，志愿军所以打胜仗，根本的原因就是不怕死！我连命都不要了还怕你个屎啊，你说是不是？”

“还有个事我得说一说，有的人认为我说志愿军死得多，是灭自家士气，长别人威风。我这绝对不是打胡乱说，我说的是千真万确的事！美国人不光是武器好，他们也真能打仗，战死的志愿军，就是特别多。我不怕，他中央首长在这儿我也这么说，我们得实事求是嘛，对不对？”年过八旬仍雄风犹存的志愿军前资深敢死队员朱克面对记者的镜头大声强调，“我这个排是加强的，编制是80几个人，每天阵地上都要死几十个，有的甚至连名字都不知道，打着仗，打着仗，没人了，打光了，后面再不断地补充上来，你连名字都没弄清楚，又牺牲了，接着再补充。上面说的是登记一下，实际上阵地上哪来的笔，找不着笔，你拿啥登记？再说了，我也不识字，结果差不多都没登记。我这当排长的，凭脑子能记住三个五个，七个八个，多了咱哪儿记得住？阵地上堵枪眼的弟兄多得很，可咱们中国人最后只记住了一个黄继光，其他的，连名字都不晓得。”

朱克说这事，时任3兵团代司令员的王近山后来落魄到黄泛区西

华县当农场副场长时也对人说过：“电影只表现出那场战争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啊！就说你们都知道的上甘岭的大英雄黄继光、邱少云、胡修道吧！何止这几个呢！我说有几十个、几百个、上千个都不为多，不过他们3个，是众多志愿军英雄的代表而已！”

一位志愿军老战士的儿子在纪念抗美援朝战争64周年时在網上撰文说：“一次战斗，还没看见敌人，更没来得及挖工事，铺天盖地的炮火下来，阵地上一两百人就只剩了父亲他们7个。一次炮火袭击，参谋长喊父亲快卧倒，父亲捡了条命，可参谋长被炸飞了，父亲找了半天，找回一铁锹碎骨头烂肉……或许，参谋长的呼喊和炸弹的呼啸不时还在父亲的耳边回响，眼角偶尔还会反射刺刀见红的血光，战友绝望的呻吟还会在某天凌晨突袭父亲的梦境，触手可及的武器成了噩梦的最佳伴侣。我问父亲杀死过美国兵没有，父亲拒绝回答这个问题。看战争片，我问父亲你们打仗是不是也这个样子。他说这是宣传品，真实的战争不是这个样子。我问他见过美国兵没有，父亲说战场上都是硝烟，哪里看得见？冲锋时端起枪，只管朝前面开火就是了。”

当年轻的志愿军战士在战场上猝然发现当面的敌人与宣传材料上描绘的美国大兵截然不同，少数意志品质薄弱者的心理防线瞬间崩溃了——所以张家口的沙岭子、浙江的诸暨，才有专门为他们这种特殊“伤员”办的规模不小的医院——而更多勇敢无畏的战士，也必须要通过极其严酷的一个或长或短、充满血腥的阶段，才能逐渐地适应敌人的凶猛与强悍。

志愿军打仗有什么特点，听听对手的战后点评，可能会比自己的总结，更加客观一些。

不仅参加了云山之仗，稍后也参加了更加惨烈的长津湖战役的白善焯将军战后成为大韩民国的第一位名誉元帅。此前，美国、俄罗斯、德国等几个国家主要在战争时期任命元帅，但韩国一直没有自己的元帅。2009年6月22日，韩国主流媒体《朝鲜日报》报道：韩国国防部当初研究将白善焯推举为“元帅”，而不是“名誉元帅”。但由于现行法令规定“在战争时期，经过国务会议表决及国会同意，可以将现役大将任命为元帅”，而此时也非“战争期间”，因此只能决定推举他为名誉元帅。



出生于1920年的白善焯迄今仍然健在，仍在不遗余力地为他的祖国效力。

中韩建交后，他率领友好团体出访北京期间，受到了当年在板门店谈判时的对手柴成文的热情款待。虽然战争期间柴成文将军是一名志愿军方面的高级情报官，并未在战场上与白善焯将军执戈拼杀。但在板门店谈判期间，白善焯是大韩民国派往“联合国军”谈判代表团里的韩国首席代表，柴成文系中朝联合谈判代表团的秘书长，地位也不比他低。从1951年7月10日至1953年7月27日，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他们在谈判桌上仅仅隔着一张蒙上厚军呢桌布的长条桌，整天横眉怒眼、唇枪舌剑，指鼻子戳眼睛地相互抨击，连脸上有多少颗雀斑，都数得一清二楚。

但是，半个世纪过去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大韩民国的建交，这两位曾经在朝鲜战场上面对面大眼瞪小眼的对手，竟然可以亲亲热热地坐在高屋华堂之上，在欢声笑语，推杯换盏之中，一起来回忆那场彼此曾经打得血飞肉绽，你死我活的战争。

白善焯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如此评价他当年的对手：

中共军在战争中总是如此，比起规模巨大的战争，他们总会隐藏自己的弱点，最大限度地让对方显露弱点，他们一直都用这样一种方式展开着战斗。

当时，中共军的最大弱点就是补给和火力，而他们用藏在暗处攻打对方的偷袭、迂回和埋伏等方式弥补了这一劣势。比起正面，他们会选择侧面来进攻；比起白天，他们会选择晚上来进攻对方。

此外，他们经常忙于首先搜索出我方的要地和要害位置。中共军用这种方式突破了核心后，会把大量的兵力转移至此，用人海战术展开波浪式的进攻。

相比之下，朝鲜军就比较单纯。他们受禁于苏联式的教条战斗法。苏联军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总是在平原上展开战斗，受此影响，朝鲜军也经常从正面展开进攻。

1950年6月25日南侵当时也是如此，他们首先盲目地在“三八线”的所有战线上对南侧发射了长达三四十分钟的野炮，原封不动地照搬苏联军在平原上作战的战斗方法，此后，他们就像潮水一样向我军涌来。

这是一种将强大火力置于最前方，看似华丽地进攻对方正面的战法。朝鲜军在发动了南侵战争后，在所有战线中也采用了同样的战法。

不过，如果说有比较特别的地方，那就是他们出动了督战队。督战队会到战线的最前面去，用枪口对准自己士兵的后脑勺。这种督战队主要是为了营造后退即死亡的恐怖心理，不断把自己的士兵往前逼进。虽然朝鲜军比较凶狠残忍，但是相比于中共军，采用的战法还算是比较单纯的。朝鲜军的战法比较直接，但中共军的战法则接近于曲线。中共军总会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现在所处的情况及敌我双方的优势与劣势，探索比较现实的办法。他们的这种特点最终体现在了战场上的迂回、偷袭、埋伏和包围作战上。^①

美国军史家莫里斯·艾泽曼在《朝鲜战争》一书中写道：“当美国的报纸里充斥着关于中国军‘人浪’攻击的夸张报道时，在前线的事实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中国军队令人敬畏，不是因为他们人数众多，而是因为他们善于运用欺骗战术和达成攻击的突然性。”

^① 引自（韩）白善焯《最寒冷的冬天：一位韩国上将亲历的朝鲜战争》，重庆出版社2013年版。

第十三章

冰峰雪原

1. 叫花子与龙王爷比宝

1950年11月27日，就在西线的美第8集团军逐步陷入绝境的时候，东线的志愿军第9兵团在长津湖地区，向钻进包围圈的美第10军发起了总攻击，惨烈的长津湖战役，就此拉开了帷幕。

早就在冰峰雪原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志愿军第13兵团4个军，使出一招“拖刀计”，突然转过身来，在增援上来的第50、60两个军的协同下，从冰锁雪裹的巍巍大山中怒潮般突然涌出，向沃克中将指挥的第8集团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志愿军发起猛烈攻击的第二天，眼看前线处处告急，难以招架的麦克阿瑟在东京第一大厦会议室果断地作出了一个十分明智的决定：

“联合国军”火速脱离与中国军队的接触，转过身来，火速向南撤退。

随着西部战线的崩溃与“火速撤退”，东线阿尔蒙德的美第10军，就立即失去了在北朝鲜继续坚持战斗下去的可能，随即掉过头来，开始向兴南港转移。在那里，近百条军舰已经闻风而至，准备迎接他们的到来。

其实这时候的战场上已经用不着发布什么命令，“联合国军”各路人马早已是在为保命而战了。在数十万志愿军官兵冒着狂风暴雪的拼

死攻击下，曾经睥睨天下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就像一群被围猎的猛兽一样，不顾一切地开始向南逃窜。

美军用地面、空中和海上的火力，在兴南港周围织起了一道密不透风的火墙，导致部署在东线的志愿军第9兵团难以对敌人形成致命的打击。兴南港围攻战一直持续到12月24日，残余的美军凭借着无以伦比的海运能力，终于逃生了。

历经一场惊心动魄的大血战之后，朝鲜半岛再次恢复了平静，“联合国军”争先恐后地狂退三四百公里，被赶回到“三八线”以南。

战局的突然逆转，不但一下子打蒙了美国人，连中国人自己都大吃一惊！如果说很多人曾经对是否应当入朝参战，以及能否与世界超级强国拔刀较量持有怀疑甚至畏惧的话，传说中不可战胜的西方列强军队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打败的消息传回国内，让人们把这一切都抛诸九霄云外。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处都能听到高呼“万岁”的声音。举国上下，都沉浸到胜利的喜悦中。

对于第9兵团来说，折磨摧残他们的不仅仅是严寒，粮食问题也同样要他们的命。

20军后勤工作总结摘要：“部队11月12日入朝，到18日第一列车100万斤粮才发出，造成赶不上部队的严重后果。粮食由集安运到前川，离前线还有300余里，须翻山越岭。军部的汽车损失很大，兵后（笔者注：兵团后勤部）汽车又前运不及，故基本上无法供应前线，造成全军官兵普遍饿肚子，60师最坏情况是3天无一粒粮食送到，从龙水皮发出的两万斤粮食，由于中途轰炸，前线官兵只收到两三千斤。接下来的连锁反应就是跟进的27军供应也跟不上，因为兵团汽车不得不优先供应担任兵团前卫的20军。”

11月10日，27军关于后勤供应的报告中反映：“军部汽车20辆加兵团汽车共110辆全部使用，5天往返一次，每次仅可运输68万斤物资。而27军每天粮食菜蔬需要量17万斤，5天就是85万斤。这还不包括需要前运的250万斤弹药和20万斤其他需补齐的装备。也就是说，光是部队每天吃饭，都无法保证。”

这可是天大的事情！

因此27军后勤部认为急需解决的问题首先是粮食，其次才是保暖物品，最迫切的是皮棉鞋和手套（原注：不是棉衣。因为寒区打仗手脚



最容易冻伤，而如果手脚冻伤即失去战斗力）。

有人迄今仍撰文坚持认为：对第9兵团来说，能吃上饭，打得响是第一位任务，有限的运力应首先保障这两项。不能说因后来发现冻伤严重，就反过头来认为应该先解决棉衣问题。因为如果没有饭吃（原注：事实上一线已经有大批士兵饿饭甚至饿死的情况发生），那将面临更加严重的局面。

后来，当大量官兵冻死冻伤的问题暴露出来以后，总后张令彬副部长借高岗、李富春的意见，批评华东军区，称“以后，凡调东北的部队，必需按东北标准装备齐全，不能到东北后又要东北来补充。此次宋兵团来到前说宋兵团一切装备好了，结果到后，一无棉鞋、棉帽，棉衣单薄，二又组织不健全”。^①

从综合国力直至前线的每一个士兵的装备保障来说，志愿军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的是一场完全不对称的战争。

对中国人来说，朝鲜战争是一场需要非凡的胆略和勇气，需要气吞山河的英雄主义气概才敢打的战争。

正如毛泽东战后所言：“那是一场叫花子与龙王爷比宝的战争。”

1950年中美国力和工业能力对比表^②
(括号内为世界排名)

	中 国	美 国
人口	5.7亿 (1)	1.5亿 (4)
军队数	550万 (1)	150万 (3)
钢产量	60万吨 (26)	8785万吨 (1)
原油产量	20万吨 (27)	2.6亿吨 (1)
发电量	45亿度 (25)	3880亿度 (1)
汽车产量	0	600万辆 (1)
国民收入	100亿美元 (13)	2400亿美元 (1)
国防开支	7亿美元 (5)	150亿美元 (1)
人均收入	24美元	1600美元 (3)

中美两军在后勤供应方面存在的差异，更是巨大得令人无法想象。根据总后勤部所编《外军后勤战例选编》中“美军陆战1师长津

① 关于志愿军后勤工作的情况，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会编《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专业勤务上册，金盾出版社1987年版。

② 引自《抗美援朝启示录二》。

湖、兴南地区战斗后勤保障”以及《后勤战例选编》中“志愿军第27军长津湖地区进攻战斗后勤保障”中所提供的资料，以汽车运输能力来说，美军陆战1师汽车运力达10个汽车连。由古土里撤退时，部队总人数不过14000人，各种车辆即有1400辆，平均10人一辆，机械化程度之高，令世人咋舌！

南韩军的专用口粮有饼干、大米、沙丁鱼和牛肉罐头、泡菜、饮料、香烟等。一个士兵能把一天的配给吃完是一件困难的事，而在“联合国军”里，南韩军的待遇还是最差的。

志愿军27军4个师、1个炮兵团，共50501人，只有1个汽车连（汽车45辆，第一次出动即被炸毁39辆），以及82辆骡马大车，剩下的就得靠每个战士肩扛背驮了。

解放军总参谋部编印的《朝鲜战争敌军资料汇集》中写道：“美陆战1师可广泛采用空运补给方式，空运对象可达到连级，如对防守德洞山的连队，空投补给3次。美军伤病员可由空运方式撤退，长津湖作战期间，飞机后送伤病员达4500人，极大地减轻了突围部队的负担。美军除进行专门的防冻训练外，有大量的防寒物资保障。陆战1师的冬装包括防寒帽、厚呢军装、毛衣、大衣、毛袜、皮靴和鸭绒睡袋。连队装备棉帐篷、火炉等。每班、每辆车除配备汽油炉外，阵地上还有专门供热的电炉。由于弹药、汽油充足，为防止装备受冻损坏、汽车不能发动，规定隔一段时间射击一次，汽车发动一次。有肉、豆制成的熟食罐头（C种野战口粮），甚至有肉、奶制品、蔬菜、水果罐头（B种野战口粮）供应。一线美军即使无法及时得到食物，当送来的食物已冻结而无法食用时，还可以依靠身上的厚衣服捂暖再吃。”

与志愿军在战场上交手的“联合国军”士兵所享受的生活待遇除了上面罗列的种种外，还有志愿军当时根本不知道，也想象不到的许多玩意儿。

美军的每个团都拥有自己的军官俱乐部、士官俱乐部和士兵俱乐部，都以食物精美和娱乐高档著称。

“联合国军”能够很快重振士气，其中一个原因是开创了一项新的休整计划：各参战国的官兵，都能够轮流到日本去进行5天休整。

实行初期，参加的人数很少。每周一个师有大约200人前往，但随着战事不振，人数剧增。这个计划很快就成为一种重要的因素，使

“联合国军”官兵有能力忍受执行任务中的孤寂、疲劳和危险。

把那些厌战的士兵从朝鲜半岛的战壕里用飞机送到灯火辉煌的东京和其他日本城市去休整享乐，这的确让人难以置信。

轮休的目的是希望振作官兵士气，免得他们斗志消沉。

士兵们很快给这种“休息与休整”度假起了一个“纵欲加纵酒”的绰号，或者叫得更粗俗些，就是“性交加饮酒”。

随着这一计划得以进入常态化的实施，随着从生死线上到来的大批士兵在日本有充分的机会饮酒作乐，日本的情色产业遍地开花，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在日本，为军官和士兵开设的俱乐部比比皆是。许多由日本人开办的一流的商业性夜总会吸引了众多前来休整的官兵。这些俱乐部提供上等的日本啤酒，日本职业伴舞乐队到场演奏助兴，穿着暴露的女歌手们演唱一些美国流行歌曲，那里通常还有许多日本姑娘在迫不及待地等着与大兵们结识。美国和其他“联合国”部队的官兵们为这些常常美丽动人却又总是极有礼貌和整洁的日本女人所倾倒。

日本人还开辟有众多官方许可的红灯区，以典型的日本方式向“联合国军”的大兵们提供不同品味的色情服务，从粗野下流到拘谨讲究，不一而足。

一些官兵常常出入这些场所，而深受大多数官兵们青睐的则是到城市的大街小巷里自由寻求女伴。

通常能够成为大兵们临时性伴侣的日本姑娘和年轻妇女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妓女，而是一些中下层社会的妇女。她们被轮休官兵提供的刺激和奢侈的生活所吸引，几乎毫无例外地站在大街旁，羞怯地上前招呼每一位出现在她们眼中的外国军人。

对于那些来自朝鲜战场上的眼睛凹陷长着金发的大兵哥来说，他们太需要女人的慰藉和温情了，而这些年轻的日本女人对他们来讲，宛如梦幻成真一般。5天时间里，这些日本女人能够充分地满足这些年轻男人对异性的渴望与需求，大兵哥们也只想躺在日本女人营造出的温柔乡里短暂地躲避朝鲜战争这一地狱般的现实。

突然爆发的朝鲜战争对已经跌入绝境的日本人来说，不啻是久旱逢甘霖！

看看朝战期间活跃在日本高层的重要人物对朝鲜战争的反应是如

何的欣喜若狂吧。

日本首相吉田茂：“中国参加朝鲜战争与美国作战，无疑给垂死的日本病人注射了一剂强心针，更如一股突如其来的神风庇佑日本。此乃天助我也，日本经济企划厅称此为‘日本经济的回生妙药’。”

松下电器创始人松下幸之助：“我们又可以得到勤奋工作和欢喜生活的好机会了。”

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石川七郎：“朝鲜战争是上天对日本经济的恩赐。”

美国驻日大使R. 墨菲：“日本以惊人的速度把4个岛变成一个大供应基地，没有这一招，朝鲜战争是打不下去的。日本国民像支援抗美援朝的中国人民一样努力生产。只是中国在朝鲜战场上是纯粹的消耗，日本则是大大获益。日本电力70%、煤炭80%、海陆交通90%，100万人以上为朝战服务。丰田卡车满足了美军需要，摆脱了积压。”

《战后日本外交》写道：“朝鲜战争发生之前，作为战败国，日本还在接受国际社会的制裁，为二战的罪行赎罪。朝鲜战争结束后，日本的面貌焕然一新。原本千疮百孔的经济面貌得到大大改善，甚至凭借这一时期的积累，日本重新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几乎威胁到美国的宝座。《旧金山对日和约》（简称《旧金山和约》）在朝鲜战争期间签订，日本崛起了。凭借着这项签署于1951年9月8日的重要和约，日本暂时摆脱了各种纠缠已久的领土争端，成功地将苏联势力清除出日本，并得到了美国的全力支持，实现了双赢——原定用于战争赔偿的850座工厂正式交还日本，其中有飞机制造厂314座、军火工厂131座、武器研究所25个。朝鲜战争期间，日本作为美国在远东的‘兵工厂’，为美国提供了大量武器弹药，价值1.1亿美元。”

在朝鲜战争之前，日本人与美国人之间那种你死我活的关系在美军占领期间已开始和解。虽然如此，但正是朝鲜战争本身才使得成千上万的美国年轻男人有机会来到日本，得以在酒吧、俱乐部、旅馆以及大街小巷与日本女人有了肌肤之亲。这种短暂的造访与接触渐渐使二战遗留下来的对日本人的敌对情绪化为了友好感情。凡是访问过日本的美国人，哪怕是只有短短的5天轮休，在他们离开日本时，很少有人不对日本女人怀有留恋和赞美之情。



在朝鲜与中国人作战的官兵常常拿这种轮休开玩笑，把它戏称为“性交加饮酒”。一方面大兵哥们确实尽情潇洒了一番，许多人回到部队后对自己的艳遇津津乐道，成为他们在战壕和帐篷里的一种永恒的话题和经久不衰的精神享受。

而军官的轮休较之普通士兵则要显得优雅许多，他们大多很快会放弃军事基地为他们提供的简朴住所，搬进日本的小旅店里。店主往往是一位成熟而被称作“妈妈桑”的女性，她让他们在门口脱下鞋子，并领他走进一间非常干净、整洁的房间。屋里铺着榻榻米，上面放着一尘不染的被褥。

随后，他们被领到旅店的后院，那里装有巨大的传统日本式浴盆和为他进行全套服务的漂亮温柔的日本女人，浴盆里加满热水，专门用来泡澡。泡澡前，还要把周身打上肥皂，然后用软布和小盆冲洗。

这种洗浴不仅冲走了军官们数月来从战壕里带来的身上的污垢，驱走了疲惫，而且也使他们的身心得到了极大抚慰。尽管他们归来后谈论美酒、女人，而留在他们多数人记忆中最久远、最快乐的莫过于在那些旅店度过的时光。由年轻漂亮的女人伺候着洗澡，然后纵情地和她们做爱，躺在榻榻米上安睡，不受迫击炮和狙击手的干扰，也不为寒冷和潮湿所苦。

在战场上和志愿军作战的美军官兵乘着飞机跨过日本海，恍若一下子进入人间天堂，泡在温泉里搂着日本女人尽情享受时，他们的对手却只能待在比地狱还要恐怖万分的战场上忍饥挨冻。

人们从志愿军某部文化教员聂征夫的日记里，看到了他在被冻死三天以前的情景：“不知道过了多少山沟和陡坡，也不知道走了多少里路，夜更深了，山谷里的寒风卷着雪粉，直向脸上打来。我们的胡须上、眉毛上都凝结了一层冰珠，呼吸也感到困难，饥饿、寒冷和疲惫同时袭击着我们。我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往上爬。已经两天没有吃上饭了，我弯腰抓起一把雪填到嘴里，顿时清凉一阵，可很快就无济于事了。身上软绵绵的没有一点力气，心里像虫咬一样难受，脑袋更是昏沉沉的。同时，两只手也感到异常疼痛，从手背一直疼到手臂。我以为是路边爆炸的炮弹炸伤了，仔细一看，才发现手背肿得像馒头一样，原来是血液已经被冻得凝固了……”

2.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谭秉云入朝后参加的首次作战，是长津湖战役中的新兴里战斗。就在这场战斗中，第27军第80师第240团第5连被全部冻死，而谭秉云是27军80师239团第7连的一个大班班长。

他没有被冻死，靠的就是他在鸭绿江南岸的废墟中捡来的那床带血的七八斤重的厚铺盖。

谭秉云说：“那打的是什么仗啊，美国人的飞机逼得我们的千军万马就像耗子一样全往地下钻。进了林子还不成，还得挖洞。雪一刨开，冻板了的地面就像花岗岩一样硬。要掘下去半尺，泥土才能松软起来。挖上个能待25个人的洞穴，把棉被子铺开，大家紧紧挤在一起，洞口还得用雨布和树枝挡起来。天黑了，才钻出洞子，去袭击敌人。”

作为普通战士，谭秉云根本不了解笔者前述的一切。他是指挥24名战士的大班班长，他只知道发生在他眼前和周边的事。连什么新兴里，自己在新兴里和“联合国军”里的哪一支部队交手，对方有多少人，指挥官是谁，也都是打完这一仗，过了许多年以后，才从资料上知道的。

虽然他们一到天寒地冻的临江就被冻得瑟瑟发抖，但只要一声令下，依然抖擞起精神，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一头钻进了冰封雪裹的狼林山脉的千峰万壑之中。顶风冒雪一次急行军下来，脸上、眉毛上、后背上、前胸上以及胡须上全都挂满了由汗水冻结成的冰花。“吃的第一顿饭，雪花不断地落进碗里，吃得里外透心凉。”

初入朝鲜的日子，对谭秉云来说已经成了一段永远无法排解的梦魇。许多年后，他对笔者回忆说：

我们过了鸭绿江，一口气走了7天，过江时每人在兵站领一袋高粱米，那粮袋就像现在女人的长统袜一样，装满了高粱米就朝颈子上一笼，斜搭在肩膀上。每袋装五六斤，哪里够吃？开头两天吃8分饱，3天以后吃半饱，5天以后粮袋子就空了。原来给我们说的是队伍先过江，补给随后用汽车送上来。可没想美国人的飞机炸得那么凶，补给车都被炸掉了。人是铁，饭是钢，三天不吃心头慌啊，当

兵的饿得嗷嗷叫，当官的也着了急。翻越雪山艰巨而危险，不时有人滑倒坠入山下。到前线的长途跋涉要花费两个星期，只能靠每个人携带的物品。一个星期不到粮食就吃光了，我们只好见什么能吃就吃什么。白天，美军飞机一见有东西移动就轰炸，部队只好隐蔽起来。夜晚不生火。但就是这些预防措施也不能避免人员伤亡。向南行军的路上，好多人倒下了，那些被饿得半死不活的人乞求战友帮忙开一枪。但谁忍心哪，那是自己的弟兄啊！

北朝鲜的冬天有好冷，你没去过根本就想不到。进入朝鲜时，我们全都穿的一斤半棉花的薄棉军衣，棉手套、棉帽、棉鞋，在寒区作战必须有的，全都没有。我们9兵团的战士9成以上来自华东地区，11月初，像金华那样的地方，冬天虽然也下雪，但温度应该在5度左右。我们到了北朝鲜，当地的温度“嗖”地降到零下二三十度，我们又不是神仙，这肉体凡胎，咋个遭得住？大家穿的是胶鞋，手脚都冻坏了，手指头一开始肿得来亮锃锃的，像一根根红萝卜，不到几天就变乌变黑，流脓水，肉也烂了，枪都莫法拿，更不要说开枪杀敌了。夜里一不小心手要碰着了枪上的铁部件，马上就粘住了，你要一用劲，那肉“刺啦”就去了一大块。枪栓也冻住了，打不响，打仗时大家捉住鸡儿使劲屙尿冲。

许多战士因为冻伤没法行军。回去离鸭绿江有两三百里远，吃的又断了好些天，只有坐在路边，听天由命。说句老实话，受伤的战友，基本上都那个了，那种时候，哪个有能力把你送回国哦？我们80师入朝头一个星期就有上千名弟兄被冻掉了手指头、脚指头、鼻子、耳朵。我仗着有床厚铺盖，才活了过来，可后来在新兴里围攻美国人的北极熊团，脚趾尖还是被冻坏了两个。其他师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担任兵团前锋的20军，冻得比我们还惨。

战后，美军曾翻译过一份中国志愿军第27军关于朝鲜东线战事的总结材料，其中有这样的文字：“食物和居住设备不足，士兵忍受不住寒冷，发生非战斗减员达10000人以上。武器不能有效地使用也是原因。战斗中，士兵在积雪地面野营，脚、袜子和手冻得像雪团一样白，连手榴弹的拉环都拉不出来。引信也不发火，迫击炮管因寒冷而收缩，炮弹有7成不爆炸。手部皮肤和炮弹和炮身粘在一起了。”

有时士兵休息，来不及挖洞子，大家把棉被铺开，垫在树林子里的雪地上，大家裹在被子里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紧紧地挤靠在一起，只是保持不被冻僵，根本谈不上取暖。到了第二天早上，身子几乎被厚厚的雪埋住了，雪地上只露出一个个脑壳，一张张脸膛。

美军白天掌握着制空权，第9兵团本来稀少的汽车也被炸得所剩无几。志愿军辎重装备无法上送，所有重型装备都被留在后方，部队轻装，战士肩膀上扛着轻便火炮徒步行军。这些部队直到战斗打响前，少至两三天，多至9天没有吃过一顿热饭，喝过一口热汤。有的只能靠被炸死的骡马填肚子——那时候还没有用炒面作口粮——在冷得浑身瑟瑟颤抖的同时，还得靠吃冰雪解渴。在大雪中行军的唯一好处是“渴了可以直接从前边战友的背上抓雪吃”。

谭秉云后来了解到，他所在的27军进入朝鲜后，军长彭德清一面向国内催要冬装、粮食，一面派代表去和流浪中的金日成政府联系，希望能通过北朝鲜政府获得一些粮食，以解燃眉之急。

接待志愿军代表的是金日成政府派来的一个副委员长，此人在中国待过很长时间，能讲流利汉语，也懂得中国军队历来就有在战地补给的传统。没绕弯子也没说场面话，这位官居高位的“中国海龟”对志愿军代表坦言道，此刻北朝鲜政府已经失去了行政管辖功能，请中国同志自己想办法向老百姓征集粮食，打个收条、做好统计，打完仗再由中国政府归还就可以了。

1950年11月22日，感恩节的前一天，英国记者雷金纳德·汤普森乘坐停泊在离元山港不远的海面上的美军航空母舰“好人理查德”号上的直升飞机飞到下碣隅里，采访了第1陆战师师长史密斯准将。

英国记者得出的印象是，这位儒雅得像个大学教授的美国将军，对阿尔蒙德命令他用最快的速度前往鸭绿江边并不感到愉悦。对美国人独创的感恩节并不感兴趣的英国人对美国军队的后勤保障能力倒是记忆深刻。他看到美国人用运输机把大批火鸡、酸果酱罐头、南瓜馅饼运到这里匆匆修建起来的临时机场上，让每个在大雪纷飞，朔风怒号的北朝鲜打仗的美国儿子享受传统的感恩节大餐。

汤普森几乎怀着忌妒的心理蜻蜓点水般地访问了柳潭里和新兴里，他看到美国人在前线也营造出了节日的欢乐气氛。各个团指挥所

印刷了精美的菜单，桌上铺着雪白的桌布，烧焦的村庄废墟中央点缀起节日蜡烛，发放了威士忌酒，更有甚者则提供官兵奢侈的热水浴和更换新军服。

不过，英国人也看到恶劣的天气叫美国人大吃苦头。

在新兴里，一个美国大兵去上厕所，几分钟后同伴听到呼救声，原来屁股冻在了马桶上，最后只好请军医动手术刀才把他的屁股“旋”了下来，然后马上用直升飞机把他送上了停在海上的大型医疗船上。

而在他们四周的高山峻岭上，两个军10万中国人民志愿军——当然也包括谭秉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来的国防部长迟浩田——正趴在厚厚的雪被之上，手肿得像泡粬一样，忍着钻心之痛，瞪大了眼睛。

11月24日上午10时，也就是感恩节的第二天，为了催促沃克尽快向鸭绿江进攻，麦克阿瑟的座机降落在清川江畔的野战机场上。

他召见沃克和米尔伯恩将军时，蹲在地上抚弄米尔伯恩的德国牧羊犬。听罢战况简报，他站起身，当着一群将军和好几名与他如影随形的记者，说了一句立即传遍全世界的话。

“沃克，你可以告诉士兵们，赶到鸭绿江，全都可以回家。我保证说话算数，让他们能够同家人共进圣诞晚餐。”

于是麦克阿瑟未能兑现的“感恩节攻势”，顺延至一个月后的“圣诞节攻势”。

谭秉云所在的第9兵团20军和27军徒步翻越狼林山脉，开赴预定集结地域的时候，第9兵团的另一个军26军却被留在了江界、厚川一带。作为兵团预备队，眼巴巴地盼望着后勤部门把苏联新式武器运上来，赶快更换掉手中参差不齐、林林总总的“万国牌”枪支。

在首批入朝的13兵团发生过这样的事，补给车突破层层枪林弹雨，九死一生到了前线，却因为部队武器型号太多太杂，运上去的弹药无法匹配。

中国人都懂得“临阵磨枪”这句成语的意思，恐怕怎么也不可能想到，咱们的志愿军竟然是上了战场才现“换家伙”。待新枪到手，单单是苏式步枪上银光闪闪的三棱刺刀，就让战士们啧啧称奇哩。

如此这般，再勇敢的战士，再精锐的部队，就这么拉上战场，战斗力也必然会大打折扣。

20、27军顶风冒雨行进之际，布置在东线的吴瑞林的42军已经

和美陆战1师劈头盖脸地大打了起来。

42军经过政工干部苦口婆心的动员，才总算让到了北大荒的官兵们安下心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安下心来种庄稼。这种下地的种子还没来得及收上一季哩，朝鲜一开战，还是那些政工干部，又同样苦口婆心地动员官兵们赶快拿起武器，到朝鲜去帮兄弟国家打仗。

那入库的枪好拿，可散了的精气神，哪儿这么容易收拢来呀？

偏偏，这样一批刚刚放下锄头，重新操起家伙的老兵，一上战场遇上的又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美军头号王牌部队。

而且枪炮一响，对手不仅火力异常凶猛，他们还有游弋在朝鲜东西两侧海面的7艘航空母舰上的飞机轮番赶来助战，单是那遮天蔽日黑压压飞来的庞大机群，便让志愿军官兵心惊肉跳。

可到了夜里，美国大兵还在鸭绒睡袋里做春秋大梦哩，124师“哗啦”一下卷土重来，对美军实施多路反击，370团1营曾一度突入美军陆战7团在水洞的核心阵地。担负纵深迂回的370团3营袭占水洞以南400.1高地，但因火力悬殊，反而遭到美军围攻，激战至3日晚，力不能支，最终经苦战后突出重围，但部队伤亡惨重。

11月6日，鉴于西线反击已胜利结束，第9兵团也已渡过鸭绿江，志愿军总部电令42军撤离黄草岭、赴战岭等阵地，节节抗击，诱敌北至长津湖，为正火速赶来的9兵团围歼该敌，创造条件。

单说11月2日这天，正当第9兵团27军从山东泰安、大汶口登车，向鸭绿江紧急开进之际，美陆战1师第7团向吴瑞林麾下的124师守卫的烟台峰、松茸洞、水洞一线发起猛攻，双方杀了个天昏地暗，日月无光。经反复争夺后，124师不敌，于黄昏放弃阵地。

11月8日，遵照麦克阿瑟的命令，远东空军及远东海军所属舰载航空兵倾巢出动，集中轰炸鸭绿江上的桥梁以及鸭绿江至清川江之间公路、铁路，鸭绿江沿江新义州、朔州、楚山、满浦、惠山等地的6座桥梁更是此次轰炸的重点目标。

不过，华盛顿的命令是只允许炸毁朝鲜一侧的桥梁，不能炸到中国一侧的桥梁——这无异是杜鲁门总统给麦克阿瑟套上了一根绳套，让他极为愤怒，却又不得不执行。

在对鸭绿江大桥的轰炸中，美军为避免飞机进入中国领空，特别要求飞行员必须采取与大桥成直角的航线接近目标。这样一来，飞行



员就必须要将航线始终保持在弯弯曲曲的鸭绿江主航道南侧，再加上沿岸的防空火力，使轰炸行动在最初几天代价大，效果小，至11月底付出较大代价才只炸毁了4座桥梁。

为了减少飞机损失，提高轰炸效果，轰炸机部队的下级军官和飞行员都心照不宣地改变了轰炸航线，沿着与大桥平行（通常是南北方向）的航线一直向北飞，在飞抵大桥朝鲜一侧时投弹，然后急转向南返航。

这样就势必会有飞机侵入了中国领空，这也正是中国抗议美军飞机侵犯领空的原因。

11月15日，美陆战1师占领下碣隅里。

志愿军20军到达以南兴洞为中心的集结地域，开始进行战前准备，并以59师176团和89师267团接替42军在长津湖地区的防务。

就在麦克阿瑟踌躇满志地发动“圣诞攻势”时，他的情报处长威洛比少将向他报告：“在咸兴以北的长津湖地区集结的中国军队，也许现在就能夺取主动权，向南发动一场协调一致的进攻，切断咸兴北面的联合国军部队。”

但是，在高傲的麦克阿瑟眼里，中国人无疑是劣等的黄色人种中的最劣等民族，他的脑海中对于中国人特质的判断无论是在智力、精神、体质、心灵等等一切方面，都是低下的、奴性的、虚弱的、自私的、贪生怕死的。所以麦克阿瑟从来不会把来自中国的任何威胁当成一回事。

就像李奇微所描述的，“麦克阿瑟动辄压制批评他的人，斥责他们根本‘不懂得东方人的思想’”。

麦克阿瑟自认为他懂得他眼中长期固化了的东方人。在周恩来警告他不要越过“三八线”时，他有充分根据藐视懦弱的中国人的言辞，因为即使“赤色中国真的愚蠢地出兵，那将只是为他们创造了回到石器时代的机会”。

其实，中国军队的第一阶段攻势已向麦克阿瑟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出了极其严厉的警告。其攻势迅猛果断，规模之大，令人惊讶。中国人曾公开警告：如果美军向前推进的话，他们将予以迎头痛击。他们说到做到，已经将这种警告付诸行动。美军统帅部竟然无视这一警告而再入虎穴碰了个头破血流，这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其原因在于，第8集团军和远东司令部都不愿意相信他们面对的是有组织的中国军队。

“联合国军”司令部10月16—31日的战报提到俘获了中国俘虏，但得出的结论却是：“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进入朝鲜的中共军队是有组织的。”

10月26日，中央情报局也得到了白善焯将军的南韩军第1师在云山抓获的第一个中国战俘的审讯报告，但在上报时却对情报的来源和内容作出了最低等级的评估。

东京的远东司令部和华盛顿的领导人都对中国发出的警告未予重视，因而，也未能在大灾难发生之前停止一切行动。

正如施纳贝尔和沃森在其《朝鲜战争期间参谋长联席会议史》一书中所说的那样：“不管作出何种解释，在中国人后来称之为‘第一阶段’（即中国人说的第一次战役）和‘第二阶段’攻势之间出现了连续3个星期无战事的局面，这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它完全可以趁机重新调整其策略，以适应变化了的形势。但终因优柔寡断、举棋不定和判断失误，而错过了时机。”

国务卿艾奇逊后来曾说过：“本届政府失去了在朝鲜停止走向灾难的最后机会。在这件事上，总统的所有文职官员和军事顾问都清楚，某个方面出了严重问题，但他们却坐失良机，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如何找出这一问题，也没有考虑如何去对付它。”

麦克阿瑟于11月5日下达命令，轰炸朝鲜一端的鸭绿江大桥（还包括从鸭绿江到“联合国军”防线之间的所有工厂、通讯设施、城镇和村庄等），这离他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说无法对中国干预的“实际情况”作出判断后仅有一两天时间。

而现在，他却下令投入远东空军的全部力量进行为期两星期的狂轰滥炸，给北朝鲜及其盟友中国予以沉重打击，以图迅速结束战争。

麦克阿瑟命令远东空军司令乔治·斯特拉特迈耶中将：“如有必要，就让参战的机组人员飞到筋疲力尽为止。”

麦克阿瑟甚至没有把这道命令通报给华盛顿的参谋长联席会议。

这一命令极具挑衅性，北京会把它看成是一种直接对抗的举动。但斯特拉特迈耶将军完全明白这样做的潜在影响，所以，他提醒其在五角大楼的空军上司重视这件事。

在轰炸机将要从机场起飞前3小时，国防部的官员与艾奇逊取得



了联系，他马上前去面见杜鲁门。杜鲁门说他主要关心的是部队的安全，但又说麦克阿瑟应事先讲明进攻的理由，然后才能实施轰炸。

于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于11月6日电告麦克阿瑟，要他立即取消对靠近东北边界5英里之内的一切轰炸，并要他尽快回电说明下令轰炸鸭绿江大桥的理由。

麦克阿瑟后来的愤怒答复不仅清楚地表明，不管产生什么后果，他都决心继续实施轰炸计划。

而且从中也看得出，他本人此时对中国干预的危险所做的估计要比原来的估计严重得多。假若以前还没有人这样做的话，麦克阿瑟后来流露出来的情况也足以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杜鲁门政府举起了示警红旗，促使他们立刻停止一切行动，直到澄清存在的危险之后再行定夺。而相反，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政府却任由麦克阿瑟口出狂言。

此时此刻，他们本该当机立断，行使领导权，但他们却没有这样做，而是让可能产生灾难性后果的政策继续下去，以致造成了可悲的结局。

下面是麦克阿瑟回复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电文，其非同一般军事报告的最大特点正如同麦帅的讲演一样，居高临下，充满了文学性夸张与煽情性描写：

大批人马和物资从满洲越过鸭绿江上的桥梁潮水般涌来。这一举动不仅对我指挥的军队构成了重大威胁，而且还有可能最终导致我的部队全军覆灭。

过江的实际行动可以在夜幕的掩护下进行，而鸭绿江和我军防线之间又很近，敌军遭遇不到什么空中封锁即可完成针对我军的部署。

阻止敌军增援的唯一办法就是摧毁这些桥梁，并从空中最大限度地摧毁北部地区帮助敌军推进的所有设施。每迟延一个小时，美国和联合国其他成员国就要付出巨大的血的代价。

按照原定计划，位于新义州的主要渡口将在几个小时内遭到打击，而且轰炸任务实际上已经在执行之中。

在提出最严正抗议的同时，我正在贯彻你们的指令，暂停这一轰炸计划。我命令采取的行动完全符合战争规则，并且是在我从联合国得到的有关决议和指示范围内的，它一点也不构成对

中国领土的任何轻微侵犯，尽管从那里发生了肆意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你们所施加的限制对将士们的身心所造成的灾难性影响，我无论怎样强调也不会过分。

我希望这件事立刻引起总统的关注，因为我相信你们的指令很有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灾难；假若总统没有亲自直接地了解这种情况，我就不能对此承担责任。

时间极为紧迫，我要求立即重新考虑你们所作出的决定，在此期间，我当然完全服从你们的命令。

布莱德雷将军后来在自传中说，在华盛顿，他本人和其他人“都没有想到麦克阿瑟在回电中语气竟然如此强烈”，更没有想到他“完全改变了自己在11月4日对敌军力量所作的估计”，这“在华盛顿引起极度震惊”。

恰在此时（11月6日），麦克阿瑟又发表了一份夸大其词的特别公报，指责“共产党不宣而战，让中国军队跨过鸭绿江进入北朝鲜，犯下了有史以来最令人生厌的违反国际法的罪行”。

公报还指责中国赤色分子以东北为基地大规模集结军队。

事实上，中国的领导人周恩来和聂荣臻都通过不同的方式，向美国人发出过明白无误的警告：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军队将予以打击。

麦克阿瑟的电文和公报里所包含的令人惊愕的信息还不是说必须炸毁鸭绿江上的桥梁，而是说中国人正在对“联合国军”构成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胁。假若中国军队的调动真有可能使“联合国军”遭到覆灭，假若中国人真的在东北集结部队，那么，炸毁鸭绿江大桥相对来说就仅仅是一个技术层面的小问题；而怎样对付中国的威胁，才是大问题。

中国人可以非常迅速地在鸭绿江上架起浮桥。不管怎么说，鸭绿江不久就要结冰，到那时大江就会变为通途，而不是一道障碍。没有一个美国人会愚蠢地相信炸毁桥梁，就能阻止中国军队进入朝鲜。

头等大事应该是怎么消除对“联合国军”构成的威胁。明显的答案并非坚持为发动进攻做准备，而是要立即着手制订保护“联合国军”的计划，要么就地挖壕固守，要么把部队撤回到比较容易进行防

御的战线上。

然而，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并没有立即着手解决这件事，反而只是开始处理那件令麦克阿瑟放心不下的事情：鸭绿江上的桥梁。

他们打电话给杜鲁门，并把麦克阿瑟的回电念给他听。

杜鲁门左右为难，因为一方面他的战区司令官要求进行轰炸，而另一方面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又拿不出其他办法来，于是，他只好同意对鸭绿江上的桥梁进行空中攻击。

继仁川登陆之后，麦克阿瑟再一次取得了胜利。

不过，这一胜利对千千万万的美军士兵来说，是一场重大的灾难！

3. 白的雪，红的血

现在我们早已知道了，紧跟着发生的确凿无误的事实是，麦克阿瑟“自己在判断敌人意图时，完全误入了歧途”。

事实是万众视之若战神的麦帅高踞在坐骑上耀武扬威，却万万没有想到居然被来自中国湖南的一位农民的儿子带领一大群以高粱米、洋芋和炒面维持着最低生存标准，用最简陋的武器装备起来的中国人拉下马来，摔得鼻青脸肿，十分有碍观瞻地结束了自己如日中天、光辉灿烂的戎马生涯。

当然，那是稍后发生的事，而那时得到警讯的麦帅尚在“马背”上，他镇定自若地对多少显得有些惊慌的情报处长说，中国志愿军在长津地区的出现，不过“是中国在外交棋盘上采取的又一个小小的步骤，不会马上对联合国总部产生任何影响”。

为了要在“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麦克阿瑟命令阿尔蒙德的第10军，以迂回北朝鲜的临时首都江界为目标，主力沿着长津湖水库实施突击。

美陆战1师沿下碣隅里向北进攻；美7师沿新兴里向北进攻；美3师于高原、元山地区为预备队；南韩军第1军团指挥其首都师、第3师沿东海岸向朝鲜图们江推进。看上去真可谓浩浩荡荡，势不可挡！

11月17日，首批入朝作战的42军军长吴瑞林完成掩护第9兵团展开任务，向20军军长张翼翔移交完防务后于当晚开始西移，至20日到达旧仓地区，转入休整。

彭德清则率27军（94师）到达以越上庄为中心的集结地域，准备战斗。

第9兵团两个军的10万兵马，蛰伏在冰雪覆盖的大山密林之中，等待着那最后的一声发令枪响。

长津湖在朝鲜北部狼林山脉与赴战岭山脉之间，每天早上，团团白雾在湖面上飘来荡去。狼林山脉的一座座大山就立在长津湖的东西两端，什么雪寒岭、荒山岭、死鹰岭、剑山岭……单是听到那些名字就让人身上起鸡皮疙瘩。谭秉云和战友们在寒风冰雪里睡觉，一个个身上挂着亮晶晶的冰凌，就像穿上了一层银色的铠甲。

谭秉云说：“幸亏那时候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抓得紧，抓得扎实。要不然，莫说打美帝国主义，白天零下20多度，夜里零下三四十度啊，我的个天，用不着打仗，单是一个冷，一个饿，就能把部队整垮喽！何况还有同样要命的徒步行军，我们过江以后，为了隐蔽，更害怕被美国飞机发现往头上扔炸弹，都是白天睡觉，天黑后行军，一个通宵要走30公里，一连走了7个夜晚。”

当时每个战士至少有40公斤的负荷，除自己佩带的枪支、180发子弹、4枚手榴弹、背包外，还要带一周的干粮和两枚迫击炮弹。因为迫击炮连自己带的炮弹远远不够一次战役用的，所以只好把炮弹分摊到每个战士身上。有的地段积雪达一二尺厚，一脚踏下去要好几个同志帮着才能拔出腿来。有的地段雪与冰凝在一起，坚硬如铁，一步三滑，战士们称它为“玻璃路”。不少战士拄着树棍还不断地跌跤，没走三五十步，平平的力士鞋底就粘满了厚厚的冰块，像传统戏曲中演员们穿的厚底靴一样，迈起步来摇摇晃晃。

队伍行军也罢，宿营也罢，都绝对没有可以遮风挡雪的地方，大山沟，大树林就是部队最好的宿营区。而所谓的宿营，也只能是伏冰卧雪的同义词。所以不少战士宁愿行军，也不愿宿营。

夜间，敌机的照明弹一抛就是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简直达到了昼夜不分的程度。好在朝鲜的高山密林可作战士们的自然屏障，部队避开灯光，钻山沟，穿树林，争分夺秒地往前赶。寒冷的气候是战士们在国内从未遇到过的，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大雪，真是风如刀，雪



如剑，连空气都冻僵了。

俗话说“路远无轻担”，更何况战士们负重极大，夜行道路又十分坎坷，他们腿跑肿了，脚上打出了一个血泡，每迈一步都会钻心地痛，脚掌上全是血。有的战士竟累得大口大口地吐血，但他们还是坚持向前走，人人都清楚，只要倒下去，那就是死路一条。

谭秉云力大无穷，又是一班之长，班长就得时时事事给自己的战士们做表率，所以别人背180发子弹，他背300发，手榴弹别人背4个，他背8个。班里一大一小两口锅，他背大的，副班长背小的。8个战斗组长也得带头，辣椒、生姜、酱油、盐巴都要背着，花生米也要背着。晚上行军，白天不敢走，在树林里面躲着。不敢冒烟，一冒烟要被天上的美国人发现了，那也是死路一条。

谭秉云说：“有的人走着走着就不动了，后边的人轻轻一推，就倒在了地上，无论怎样都喊不起来，他们就这样牺牲了，大都是一些十七八岁的娃娃呀……想运回国呢，又没往回走的车，我们27军的汽车，差不多被美国飞机炸光了。当时的规定是团级以上干部的遗体才有资格运回国内，一般战士，就只能就地处理。想埋呢，也做不到，那地冻得像铁板似的，一镐下去‘当’的一声脆响，地上只显出一个白印，根本挖不动，就只好把他们拖到路边，砍些树枝，就这么遮盖一下……唉！”

谭秉云说这么多年有一个惨烈的场面一直像电影镜头一样，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那是已经得到补充的第9兵团结束在朝鲜北部大山沟里的休整，开上去打第五次战役时发生的事情。他们连队的电话兵，叫魏少均，重庆上清寺人，求精中学的学生，才16岁，一张脸红通通的，笑起来阳光灿烂。连队到达指定阵地后，魏少均马上提起线拐子，去架设连队通往指挥部的线路。为了避美国飞机的轰炸，他反穿棉衣，把雪白的一面露在外面，看上去就像奔跑在雪地里的一只活蹦乱跳的小白兔。

就在他刚刚把线架好，准备回到阵地的途中，一架突然而至的美国“油挑子”像老鹰发现了猎物似的发现了他。阵地上的谭秉云等战友眼睁睁地看着一架飞机追杀一个大小孩般的志愿军战士。那种低空掠过的声音激人心魂，“油挑子”又是用机关枪扫射，又是丢炸弹。

“小白兔”就在战友们的注视下，被炸得飞了起来，然后又重重地砸在地上，一大片雪地上，顿时洒满了魏少均的鲜血和内脏。

等到敌机离去后，谭秉云他们跟下去一看，魏少均不仅没有了双腿双脚，连身子也被掏空了……

费城是美国一座古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

1790年至1800年，在华盛顿建市前，曾是美国的首都。著名的独立宣言，就是在费城签署的。

2007年，在邻近费城独立宫的港口边，矗立起一座朝鲜战争纪念碑。

战争经过岁月的洗礼，留下的是那些刻骨铭心的伤痛记忆。黑白历史图片以及密密麻麻战死士兵的名字，镌刻于黑色大理石之上。

图片全都是1950年12月美国海军陆战第1师在长津湖地区与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时，由战地记者所拍，它们记录下了这支诞生于费城，战功赫赫的军队最为惨痛的一次失利。

1950年11月27日晚18点30分，埋伏在长津湖地区的志愿军9兵团20、27两个军10万大军迅猛出击，一举将美陆战1师25000兵马切成5段，分别包围在新兴里、柳潭里、下碣隅里、古土里以及真兴里几处村镇。

张翼翔军长率领20军主力集中围攻下碣隅里的美陆战1师师部，其他两个师则包围了驻扎在柳潭里的美陆战第5团和陆战第7团。宋时轮还派59师控制了柳潭里与下碣隅里之间的德洞山口，派58、60师潜伏在古土里和真兴里之间的黄草岭一带，切断了陆战1师南逃的通路。

陆战1师——这支曾在釜山保卫战和仁川登陆战中战功辉煌的美海军陆战部队，此时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重重包围之中，看上去似乎已经插翅难逃了。

下碣隅里之战，是一场浴血之战，陆战队伤亡惨重。

美国随军记者约瑟夫曾作如下报道：“陆战1师师长奥利弗·史密斯将军在下碣隅里过夜，他用一台‘吱吱’乱响的收讯机收听到了利兹伯格上校的战报。来自朝鲜西部的消息说，沃克将军的第8集团军在不断遭受灾难。史密斯向阿尔蒙德报告了陆战1师的困境，但直到上午10时，仍未收到实质性的答复。使史密斯感到震惊的是，没有从第10军收到关于修改计划的只言片语，这意味着陆战1师要继续从柳潭里向北推进。史密斯认识到，任何这种推进的企图都是愚蠢至极

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继续进行进攻性战斗是不明智的。我们现在是在为我们的生存而战。在弄清楚情况之前，有必要在所有地方采取守势。’史密斯自作主张，命令第5团和第7团巩固他们目前的阵地，即在柳潭里掘壕据守，并等待进一步的指令。”

柳潭里的战斗惨烈无比。

美陆战第1师两个团，连续5次冲击柳潭里的两个高地，燃烧弹将志愿军阵地炸成一片火海。在被烧得滚烫的焦土阵地上，双方反复争夺，几度易手。到第二天天亮时分，志愿军守住了1282高地，但也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

第27军3连副指导员邹世勇回忆说：“我们副连长负了重伤，我一看他不行了，肠子都流出来了。我把他扶起来抱在怀里，把耳朵贴到他嘴上。他跟我说，‘敌人的火力太强了，告诉弟兄们，冲锋的时候，千万别喊，别出声，悄悄打’。就给我交待了这么几句，他就死在了我怀里。这是我们3连干部用血和生命换来的惨痛教训。因为我们这是第一次跟美军打仗，谁都没有经验。营里通知我们撤下去整编，准备再战。撤下来以后，我点了一下全连人数，我这个连是232个人，这一仗打过后，只剩下37个。”

迟浩田说：“第一天我们抓了5个美军俘虏，一审问，才知道是美陆战第1师的。我们两个营打柳潭里，伤亡很大，没打下来。2营又接着打，还是不行。后来轮到我这个营了。我当时是副指导员，指导员呢，冻病了。我们两个商量，说咱们不能这么干，咱们要把衣服翻过来，里边是白的嘛，雪下得很大，鹅毛大雪。”

与此同时，纽约一家报纸的军事专栏作家，对朝鲜东线长津湖地区的战事，在一篇文章中作了如下报道：

陆战队陷入困境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世界。在加利福尼亚州德尔马营的海军陆战队训练中心，一位军官冲进司令官梅里尔·特文宁中将的办公室。

“将军，”他喊道，“收音机传来消息说，中国人已经包围了陆战1师。”

特文宁从办公桌上漫不经心地抬起头说：“年轻人，我只能说，我真为那些中国佬感到惋惜。”

11月27日晚些时候，史密斯终于从阿尔蒙德的指挥部收到了命

令，要他把他的一个团调回下碣隅里，“以解救水库东面的陆军部队”。这对他来说难以置信。“我的上帝，”他叫道，“当时我们自己正受到中共军队3个师的攻击。我们显然遇到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但在两天的时间里，我们没有从军团得到马上撤退的命令。我们除了进行防御以外无他策，因为不经上级允许我不能撤退。”

在史密斯看来，阿尔蒙德、麦克阿瑟和他们的参谋人员都已束手无策。“每隔4小时，我们就向第10军报告发生的情况，但他们显然是不知所措；他们对中国人大举进攻一事怎么也拿不定主意。他们不得不重新考虑他们的想法。”

直到11月28日晚些时候，史密斯才接到命令，要他把全部军队撤至下碣隅里，并向沿海“前进”。“他们用了两天时间才琢磨过来”，史密斯愤愤不满地说。

经过两天的激战后，第9兵团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可就在这时候，美军却来了个先下手为强，突然向志愿军多个阵地，同时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坚守在下碣隅里东南角1071.1高地的是第20军58师172团3连3排，指挥员是连长杨根思。

28岁的杨根思是新四军老战士，参加过淮海战役等大小数十次战役战斗，多次荣立战功，是著名的战斗模范和爆破英雄，9月份刚出席过第一次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受到过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可眼下这样残酷的战斗，杨根思也是生平第一次经历。

杨根思奉命率3排坚守位于下碣隅里东南的1071.1高地扼制公路，是下碣隅里被围之美军向古土里南撤的必经之路。美军在飞机、火炮狂轰滥炸的掩护下，疯狂抢夺高地，炸弹、炮弹、燃烧弹混杂在一起，阵地上硝烟弥漫、烈火熊熊。杨根思沉着指挥，勇敢应战，连续打退数倍于己的美军的8次进攻。战至上午10时，弹药已经耗尽，他带领战士们用刺刀、枪托、铁锹、石块与美军拼杀。

当美陆战第1师发起第8次攻击后，阵地上活着的人只剩下杨根思和两名伤员，所有的弹药已经打光。只剩下一个10公斤重的炸药包，杨根思命令两名伤员带着重机枪撤离阵地。



这时，有四十来个敌人蜂拥而上，杨根思拉了导火索，抱起“嗞嗞”作响的炸药包冲向敌群，一声巨响后，英雄与敌人同归于尽。

朝鲜政府在杨根思牺牲的山头立起了一座石碑，碑上镌刻着“永垂不朽”4个中国字，并追授他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颁发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

1951年5月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为杨根思追记特等功，并授予“特级英雄”称号，他生前所在的连队，被命名为“杨根思连”。60多年来，每一批新入伍的战士，都会在杨根思塑像前庄严宣誓：“我是杨根思的传人，我宣誓：不相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

在杨根思牺牲的当天下午，为解下碣隅里美军困境，美陆战1师师长史密斯派出一支特遣队，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增援下碣隅里。

特遣队刚一出发，就遭到志愿军的猛烈阻击，并很快将其分割成数段，包围在由南至北的公路上。

参加了此次战斗的孙荣臣（时任第20军副指导员）回忆说：“零下二三十度啊，气温太低，枪栓冻得来拉不开了，要打枪啊，怎么办呢？只得屙尿冲，用尿把枪栓滋热，滋热以后才能把它拉开，打上几枪以后，就好使了。”

志愿军第20军178团的指挥员们面对战场上出现的胶着状态，一个个心急如焚。

这时，两个美军战俘被送到了营部。

时任第20军政治部副科长的唐吾定回忆说：“这个营的教导员很有政治头脑，他说这个情况啊，就需军事和政治一起来解决。所以他就是通过翻译，做这两个美军俘虏的思想工作，结果呢？其中的一个美国军官同意到火线上去喊话……”

在朝鲜，只有月亮是属于志愿军的。一旦等到天亮后，美军飞机来救援，彻底消灭特遣队的可能性就几乎为零。

于是，等美国军官喊完话后，第178团一名会讲英语的志愿军战士向继续顽抗的美军提出最后通牒。

“给他们一个规定，”唐吾定说，“我给你半小时考虑，半小时后再不投降，那就决不留情，全部消灭。等了半个小时后，敌人没有动静，我们就开火了，这一打，敌人马上投降了。”

在这个被美军称为“活地狱溪谷”的谷地里，仅存的240名特遣队员全部放下了武器，这是志愿军军事压力配合政治工作，争取美军投降的又一个成功战例。

4. 雪夜惊魂

一场血战，让北朝鲜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新兴里，陡然闯入了诸多中外政治家、军事家和战争史家的视线。

战前，80师师长饶惠潭升任第23军参谋长，新的师长还未到任，副军长詹大南赶赴80师指挥所，指挥新兴里战斗。

“我采取的是突然袭击的打法，”2006年，92岁高龄的詹老将军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说，“1950年11月27日，我率领80师238、239、240团和81师242团共4个团的兵力，隐蔽进入了新兴里地区。我们在新兴里战斗攻击开始后10分钟内，把他们的团长打死了，这是很关键的，灭了他的主官，队伍就乱了。阵中日记也缴来了，团旗也缴来了，把美军鼎鼎有名的‘北极熊团’打垮了，全歼了。”

239团3营营长毕序阳记得，“当时下着鹅毛大雪，冷得要命，我们都在冰天雪地里露宿。部队夜行昼停，仍然在规定时间内赶到预定战场。一个多星期的急行军，全营冻伤减员超过了百分之二十。”毕营长观察到美军在公路两边搭起帐篷，“战斗打响以后，我们冲进帐篷，才知道敌人一个个全睡在鸭绒睡袋里。”

东邻长津湖的新兴里，北部山势平缓，南部山岭突兀，村东南有一块高地。

此时，孤军冒进的美陆军步兵第7师第31步兵团上校团长麦克莱恩和他的3000余名官兵，已悄悄钻进了詹大南布下的包围圈。

麦克莱恩的部队号称从未吃过败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围攻列宁创建的红色苏维埃战斗中，美军第31步兵团攻入俄国西伯利亚，战功显赫，被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授予“北极熊团”称号，并由总统亲自授予“北极熊团”团旗。



此次行动，美第7师32团的一个营、师属57炮兵营和坦克分队也加强给麦克莱恩的第31步兵团，总人数达到了3000人。

1950年11月25日，在控制了新兴里几个高地以后，志愿军发动了围歼战。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仅打了一个通宵，毕序阳带领的3营就牺牲了一大半。

“经过一个晚上激战，北极熊团伤痕累累，我军伤亡也很大。”詹大南回忆，“通过审问俘虏，我们才知道，原来以为新兴里地区之敌只有一个加强营，其实呢，是一个多达3000人的加强团。”

凶悍的“北极熊团”已经被志愿军关进了笼子里。公路被燃烧着的卡车烈焰映得雪亮，枪炮发出强烈闪光，高速炮弹像红色的圆球一样在黑夜里急速划过。迫击炮弹与照明弹纷至沓来，炮弹落地时引起的爆炸声和枪炮的射击声在山中引起的回响震耳欲聋。整个世界如同白昼一般。厚厚的积雪覆盖着地面，凛冽的寒风不时扑打着士兵们的脸膛。

谭秉云对新兴里之战记忆犹深，笔者多次在各种场合听他说过：

为了隐蔽，干部战士都将棉衣反穿，保持与雪地相同的颜色。深夜里，进攻新兴里的命令一下，只看到满山遍野的人都从雪地里起来，不要命地往前冲。我带领我的班钻出树林子，也向村子里冲杀过去。

这时候，有好几个弟兄已经冻硬了，翻越狼林山时呢，又有两个摔下山崖，连我一起，原本25个人的大班，只剩下十五六个人了。我们吹着小喇叭和哨子前进，后来才知道，这些小喇叭声和哨子声让美国士兵听起来既恐惧又烦躁。他们认为这是使用的某种心理战。实际上，这是我们迫不得已采用的一种通讯方式，因为我们的无线电通讯只能到达团一级，电话联系只能到达营一级，营以下的单位主要靠小喇叭、哨子、照明弹和手电筒发信号进行联系。而在夜里向敌人发起袭击的时候，就用事先规定好的小喇叭声和哨子声，来控制攻击的节奏。

四下左右，遍地都是我们的人，炮弹不断地落下来，机枪、冲锋枪全对着我们扫，那时候脑壳里啥也不想，该死该活，全交给老天爷了。四处不断地有人喊叫着倒下，快冲进村子时，也不过十来分钟的时间，我那个班就只剩下十来个人了。

我的副班长姓吴，浙江宁波人，叫啥名字记不得了，入伍前是个小学体育老师，军事技术很不错。他颈子上挨了一枪，仍然咬着牙坚持打，后来胸口上又挨了一枪，倒在地上叫我救命。那种情况下，我咋个救？身边又没得卫生兵。我怕他被自己人踩死，赶紧把他拖到一个稍高点的坡坎上放着，对他说兄弟你在这儿待着别动，我打完了仗来接你。说完我就往前冲。快天亮时，我们撤了下来，我真去找他了，可惜我这副班长早就被冻硬了。

在迷茫的大风雪中出现的中国士兵令美军不知所措。中国士兵中有的人脚上连鞋都没有，在零下35摄氏度到零下17摄氏度的气温中，这让美军士兵看上去就像一种幻觉。

朝鲜战争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奇特的例子。在这里，两支截然不同的军队相遇，他们都在尽力扬长避短。中国军队巨大的优势在于，他们的单个士兵都具有在地势险恶的地方运动的卓越能力，他们能做到这一点，靠的是自己的双脚和他们所能携带的轻型武器、弹药和食物。这意味着中国军队可以随心所欲地到他们想到的任何地方去，可以突然出现在“联合国军”后方的纵深处，可以插到他们的侧翼或者切断他们的前线部队。由于中国军队善于悄悄渗透到哪怕是防守最严密的阵地上以及他们擅长在夜间进行调动和作战，他们的优势得到了加强，尽管他们在夜间必须依赖号角、哨子、照明弹来运动和作战。

美军的巨大优势则在于他们惊人的火力，这种火力实际上能够摧毁面对的任何对手。由于火力意味着消耗（有时甚至是浪费）大量弹药，并需依赖重型武器如坦克、大炮以及带有履带和轮子的车辆，因此，美军的行动不可避免地被限制在了公路上。

严寒总是令人惧怕的，那一夜，谭秉云亲身感受到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下，不论穿多厚衣服的人都会在瞬间降低行动能力。

那种感觉，就像手脚已经脱离了自己的躯体。

他对笔者说：“我和战友们终于冲进了新兴里，与美军士兵开始了残酷的肉搏战。双方使用了能够使用的一切搏斗工具，包括挖工事的锹、镐、枪托、刺刀和拳头。士兵扭在一起在黑暗中滚动，互相掐喉咙、挖眼睛、打击对方的面部。”

从新兴里突围而出的一股美军企图步行从冰封的长津湖面上绕过



志愿军的阻击，结果冰层轰然坍塌，尽数落入湖中冻溺而死。

天快亮时，有的攻击部队还在收拾剩余的美军士兵，谭秉云他们这边已经开始收集美军的枪支弹药了，还有就是吃的和药品。没办法拿时，他们就把美军尸体从睡袋里拖出来，把弹药、食物和药品塞进睡袋，两人一袋拖着往回走。

11月30日，战斗进入了第5天，围歼“北极熊团”的最后攻坚战开始了。夜里11点整，新兴里战场的夜空，一发发信号弹腾空而起，几乎在詹大南发出作战命令的同时，震天撼地的枪炮声，骤然回响在盖马雪原的这个山村周围。

“我要来它个瓮中捉鳖。”几十年后，已经担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詹大南将军仍对自己的作战部署感到很满意。

毕序阳带领的第3营与兄弟部队一起，对困守新兴里的美军发起了总攻。战至12月1日拂晓，各部先后突破敌前沿，与敌展开逐壕逐屋的争夺，打得美国人溃不成军。

但是，进攻新兴里的志愿军遭到了来自空中的打击，凝固汽油弹雨点般落下来，很多人被活活烧死。那情景很恐怖：温度高达1000多度的熊熊烈火中，几百位战友倒在一起瞬间便化为灰烬。幸存者逃到附近的树林里，等到天黑下来后，再重新出发去攻打美国人。

毕序阳说：“27日夜，我们打了美军一个措手不及，28日夜的战斗，则打成了拉锯战。美军一个师就有八九个炮兵营，比志愿军一个军还多出许多。敌人夜间丢失的阵地，白天在空军强大火力的支援下，又夺了回去。我们则是反着来，夜里攻，白天守。”

美军陆战队员很快就明白，中国军队的一次夜袭不管有多大的破坏性，多么让人丧失斗志，造成的损失多么巨大，只要能坚守阵地到天亮，那么，他们就能够得救。能见度一恢复，有地面支援的飞机和配备观测员的大炮以及迫击炮的炮火就会立刻迫使中国人钻进林子里躲藏起来。即使美军陆战队继续被围困而无法转移，它也可以从空中得到物资供应。中国军队要想压倒对方，就必须一次次发动进攻，那样也会消耗他们大量宝贵的弹药，使进攻部队元气大伤。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美军陆战队虽然损失惨重，而进攻的中国军队往往遭受更大的损失。

29日，27军参战部队冻伤、冻亡和伤亡减员已达三分之二。

为避免被动，詹大南下令各部队以部分兵力控制已得阵地，其余

部队于当日拂晓，逐次撤出战斗。

他要调81师主力协同80师聚歼新兴里之敌。

眼看“北极熊团”面临被全歼的境地，美第10军军长阿尔蒙德严令此时已经前进至新兴里以南下碣隅里的陆战1师师长史密斯，无论如何也要把“北极熊团”解救出来。

接到命令后，同样也处在中国军队包围中的陆战1师，派出一支部队在12辆坦克和多架飞机配合下，沿公路向新兴里方向攻击前进。

11月30日晚11时，最后的攻击开始了。

“快天亮时，我负伤了，伤在腿上。”11次立功、被华东军区授予“华东一级人民英雄”称号的宋协生时任238团7连副连长，他晚年回忆说，“是通信员把我背下来的。天冷啊，下不来马上就会被冻成大冰棍。村子里壕沟中时时见到我们的战士，端着枪，眼睛大瞪着前方，一身的雪，一动不动，战死的少，大都是被冻死的！”

毕序阳说：“大约在28日早上6点左右，我们突破了敌人用坦克围成的防御阵地，炸毁敌人坦克两辆，控制了新兴里之敌据守的最后一个制高点1250高地。”

同一时间，2营4连指导员庄元东率一个排隐蔽进至新兴里东山，“他们发现山腰帐篷内一个排的美军正在睡觉。这30多个敌人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消灭了。”

毕序阳说：“詹副军长一声令下，向新兴里的总攻就打响了。各支突击队都按预定作战计划，向着自己的目标冲杀过去。我率领3营从新兴里南面冲进村子，看见十几辆汽车、十几辆坦克围着几顶帐篷和几栋房子。打掉了三栋房子以后，我们发现前面的房子里面灯火辉煌^①，里面‘哇啦哇啦’，声音也很响，直接就冲上去了。机枪啊、冲锋枪啊这一扫啊，就打得差不多了。进去一看，乖乖，是敌人的指挥所，还有电台。”毕序阳回忆，全部攻占帐篷和屋子后，他又派右翼的4连突入敌军一停炮场，捣毁了敌人的炮兵指挥所。

收缴战利品时，官兵们发现，各屋均有电话机、报话机，墙上还挂满了作战地图，地上还有未燃尽的作战文书。在一座独立屋子内，还有一具美军上校军官的尸体。

“后来证实，那就是‘北极熊团’团长麦克莱恩。”詹大南说。

^① 笔者注：美军部队均配有发电车，作战期间也能用电。

到12月1日拂晓，逐壕逐屋的激烈争夺开始了。盘旋于战场上空的美军飞机难以识别目标，只能袖手旁观。詹大南见势，果断下令白天继续攻击，和敌人挤压在一起，务求全歼。天黑以后，有约400余残敌乘数十辆汽车、坦克逃至一洼地时，被242团截住消灭。

激战至12月2日4时许，枪炮声喊杀声方告平息。这一仗，志愿军共缴获美军大炮103门、火箭筒127具、枪2445支、坦克11辆、汽车199辆，美军新兴里守敌31团加32团的一个营，共3191人大部被歼，团长麦克莱恩被击毙，曾经不可一世的美国陆军精锐步兵团“北极熊团”整团覆灭。弥漫了5天5夜的硝烟终于散尽，但却有一样东西留了下来，成为历史沉默而有力的见证——那就是美军北极熊团的军旗。

亲手将这面军旗作为战利品上缴的毕序阳回忆道：“北极熊团旗在被上缴之前，还在部队里引起了一场小小的争夺战。在最后一天的追歼战中，营部通讯班长张积庆击毙两名美军之后，顺手捡回了压在他们身下的包袱，打开一看，里面是块质地不错的布料。张班长本打算拿它来给战士们当被子盖，却被营部炊事班长发现了，想用来当蒸笼布，蒸馒头、包土豆，便于火线送饭。正在僵持不下的时候，碰上了我。我接过布料，拉起两只边角一看，是一面宽逾一米二、长逾一米五的绸缎料子做的旗子，周边是黄穗带，旗子中央有金黄丝线绣的老鹰，老鹰嘴上叼着外文字的绶带，一只爪抓着一支箭，另一只爪抓着一束橄榄枝，下方绣有一只北极熊。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外文。我赶紧请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翻译刘光锐帮忙看看，这一看不打紧，正是辉煌了30年的北极熊团军旗。这意味着，这支被认为是美军最精锐、最优秀的王牌团的番号，从此消失了。”

如今，这面“北极熊团”团旗，作为国家一级文物，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这是朝鲜战争中，志愿军唯一一次成建制全歼美军一个团的光辉战例。

1979年，当年的中国人民志愿军27军军长彭德清以交通部长身份访问美国，与陪同的美国人谈起朝鲜战争。没想对方竟然是一位长津湖战役的幸存者，对客人说：“你们中国军队的装备太差，太落后了。”

“可不我们也不在新兴里消灭了你们一个王牌部队北极熊团吗？”
当对方知道眼前这位鹤发童颜的部长，就是当年吃掉北极熊团的

27军军长时，惊讶之余，还不忘幽默一下：“如果你们的武器装备稍好一点，我今天也不可能在这里和你见面了。”

谭秉云虽然参加了在后来的中外战史中被称为长津湖战役中的新兴里战斗，而且身上钻进了两块美国炸弹的弹片，但他在朝鲜作战的时候并不清楚，志愿军在朝鲜前5次战役中最为惨不忍睹、惊世骇俗的伤亡，正是以他所在的9兵团在东线的这次遭遇为最。

他同样不知道的是，半个多世纪后，一个曾经与他在新兴里交手的美军老兵，在加拿大的家中，与一位来自中国的客人，比他更加生动、更加恐怖地谈起了新兴里之战。

5. 美军老兵口中的新兴里之战

2001年1月15日，一位中国人送女儿去加拿大留学，在阿尔伯达省首府埃德蒙顿市附近一个只有几万人口的小城中，与一名开餐馆的老板邂逅。一番交谈后，初次谋面的二人，竟然有相见恨晚之感。

就在中国人准备回国前夕，这位操着美国东部口音的老板，专门邀请一见如故的中国人到他家里，而不是他私人餐馆里做客。

他们彼此对对方感兴趣，那是因为他们特殊的身份和经历。中国人是已经退役的一位解放军大校，而美国人早年曾是一名前美军少尉，曾经远赴朝鲜打过仗。回国后娶了一位加拿大姑娘，再后来他就随妻子来到加拿大，在这座小城里开了一家“必胜客”连锁店。

白驹过隙，日月如梭，转眼半个世纪，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去了。

宴毕，中国前军官才明白，这位叫约翰的美国前少尉之所以要设家宴请他，是因为太想告诉他半个世纪以前，发生在自己和中国人身上的一段非比寻常的故事。

约翰说：“我终于又见到您了，太高兴了，真的。51年了，我一直盼望着这一天。”

“约翰先生，我们应当还是初次见面吧？”中国前军官分明为对方过度的热情感到惊讶。



“不，不，我们见过，51年前，在朝鲜。”

“哦？”这马上让客人肃然起来。

“51年了，我一直想再见到你们，做梦都想。我非常敬佩中国军人！真的，先生。”

“不，约翰先生，那不是我……”

“不，那就是你——你们：中国军人。一样的。”

“哦，约翰先生，这话……从何说起呢？”

约翰开始讲他毕生难忘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朝鲜北部大山中一个叫新兴里的小山村，他的对手就是谭秉云和他的战友们。

那是1950年11月底，当时，约翰是美军第7师第32团的一名少尉排长，他们已经打到离鸭绿江只有几十公里远的地方。

约翰说：“麦克阿瑟将军告诉我们，‘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我们可以回家过圣诞节了’。”

约翰先生记忆里的北朝鲜冬天太可怕了，山里的风非常大，夹着纷飞的鹅毛大雪，整天下个不停，冰雾弥漫，整个世界都被冻住了，很大的湖面上都可以开汽车和坦克。他们只有待在屋里才能活下来。

下午4点多钟，天就黑了，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雾气，不过这不是水微粒形成的雾气，而是冰的微粒结成的冰雾。气温一旦超过零下30摄氏度，空气中的水分子就结成冰粒了，这叫“冰雾”。在铺着厚厚积雪，树枝上挂满冰凌的荒原和大山沟里行军，人被冻透了，有一种没有穿衣服的感觉。

在那个奇冷无比的冰雪严冬里，约翰和他的战友全副武装，多数坐在罩着厚厚篷布的卡车里，少数需要担任观察任务的士兵则挤坐在坦克上面。

在浓浓的冰雾中，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部队向着鸭绿江方向进军，那种感觉“就好像一大群没穿衣服的人，战战兢兢地钻进了一个冰冷透明的巨大奶瓶里”。

那天晚上，他们的部队在朝鲜北部一个叫作新兴里的小山村搭起帐篷过夜。

约翰说宿营是在一块平坦的坝子上，周围都是大山，附近还有一个很大的湖泊，已经冻得像玻璃一样晶莹剔透，湖面可以过部队。连续几天，他们的飞机都已经侦察过了，说这一带山区里没有发现敌

人。即使有，风雪严寒早就把野外的敌人全都冻死了。

所以，约翰和他的弟兄们放心大胆地在帐篷里烤着火，吃着罐头，喝着咖啡。

很快，这一夜便成为了约翰此生永难忘记的噩梦。

他刚刚躺下一会儿，屋外就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和爆炸声。

约翰撕开用鸭绒被堵住的窗户向外看去，天上有照明弹，他惊恐万状地看到前面有中国士兵模糊的身影在冲锋。他们从浓浓的冰雾中不断地显现出来，每个人背上披着一块用来在雪地上掩护自己的白布，冲锋时人一跑，白布飘飘欲飞，给中国士兵增添了一种令他们感到神秘恐怖的飘逸感。

“他们一群一群地从树林里冲出来，根本不知道有多少人，也不知道他们在树林里躲藏了多长时间。宿营地前面有条小河，10多米宽，河水不深，河面上的冰层已经被我们的炮火炸碎了，河水冒着水汽在流淌；你们的士兵在蹚水过河，上岸后，两条裤腿就被冻住了，他们跑得很慢，因为他们的裤腿不能弯曲，而且奔跑的时候‘咔嚓咔嚓’不断地发出脆响。他们的火力很弱，没有炮火掩护，他们的枪好像也被冻住了。这样一来，他们冲锋的时候看上去不再快速灵活，就像无数根僵硬的原木在移动。哎，您知道什么是原木吗？没有生命的……原木，僵硬，被采伐的一截一截的木头。”约翰不断地向客人重复着。

客人不予回答，心中犹如翻腾的大海，除了对前辈的崇敬，也分明有着哀伤与无奈。

约翰继续着他的人生轨迹。

“我们的火力很猛，我们的坦克、火炮、卡宾枪和机枪都在向他们射击，我们的火力像无数的火蛇一样在原木中穿行。巨大的火球在原木中滚动，他们像僵硬的原木一排一排地倒下。可是，他们又有人不断从树林中涌出，他们大声地呼喊着，他们嘴里喷着长长的白汽，他们不断地冲过河来。

“在我们强大火力的打击下，原木仍然在冲锋，我们的火力根本无法阻止他们。我们拼命地射击，我的枪管都打红了，但原木仍然在我的准星前移动，他们越来越多，越来越近，一拨一拨的，就像潮水一样涌过来，我已经不知道该向哪个目标射击了。他们僵硬地移动着，很多人倒在了雪地上，倒在小河中，但他们不断地涌过小河，冲

上岸，扑向我们。小河里，河岸上，躺满了一片一片的尸体，像原木一样，冻得僵硬。”

那是冰与火中的新兴里，那是属于激情澎湃的中美两国铁血军人共同拥有的人生大舞台。

晶莹剔透的冰雪世界骤然破碎了，雪夜在巨大的炮火中映得如同白昼一般，大地在颤抖，河水在跳跃，硝烟染黑了白色的冰雪。雪夜中，火光一片，枪声一片，杀声一片，血光一片。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硝烟味道。火光中，冰雪在燃烧，大地在燃烧；河水红了，洁白的冰雪也红了。

“无论倒下多少，可是仍然有更多像僵硬的原木一样的中国士兵在向前移动……我记不清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多长时间，我被这样难以置信的场景惊呆了！”约翰的眼神发直，手在颤抖，两眼紧紧地盯着客人。那是一张扭曲而僵硬，充满恐怖的脸。约翰说不下去了，他低下头，好一会儿没有说话。他抬起头，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客人。须臾，他喝了一大口酒，继续说道：“那天晚上，我被那些不畏死亡的灵魂震撼了……太可怕了！他们像原木一样在移动，倒下一批，紧跟着又冲上来一批，我们的炮火根本阻止不了他们前进。我当时就知道，这是一场没有胜利希望的战争。”

约翰说，后来，他们被包围了；再后来，他们就逃出去了。一个连只逃出来十几个人，他们和赶来救援的美军陆战1师一起，冲破了中国人的围追堵截，穿过冰雪世界，一直逃到朝鲜东海岸的咸兴港。在那里，他们终于登上了前来接他们的军舰。

约翰说，那天晚上，他被冻掉了7个脚趾。

中国客人这才明白，他走路时为什么是那种怪怪的样子，像个小脚老太婆。

约翰说，后来，他被飞机送到了东京，再后来，他又被送回了美国，再再后来，他就来到了加拿大……

正是包括谭秉云在内的9兵团第20、第27军10万官兵用难以用语言描述的忍耐力与殊死搏杀，才赢得了同为军人的对手的尊重，也为中国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在接下来的这场被历史学家们称为“决定了朝鲜乃至世界历史进

程的长津湖战役”中，我的老乡暂时还未能成为一个英雄，不过，他已经离战斗英雄的称号只有一步之遥。

这当然不是因为谭秉云在新兴里之战中表现得不勇敢，而是因为太多的战友表现得和他同样勇敢，甚至比他更勇敢。

谭秉云说：“和我一个师的孔庆山，是炮兵连班长，奉命带一门92步兵炮，配合238团去攻击敌人。结果238团在前进的路上碰到了山腰上一栋房子，房子前面是开阔地。敌人在这里有个火力点，我们步兵伤亡很大，冲不上去。连长就命令用92步兵炮消灭敌人，消灭这个火力点。孔庆山就带着炮，想办法找了一个地方，绕到敌人房子的侧后，这个地方敌人的火力打不到。这个炮有两个炮腿扎在这个地下，平时要打炮，要把地下挖个坑。可是在这个山冈上呢，就没办法。地全部冻得像铁一样硬，而且时间很急啊，到后来看看实在没办法，就把炮架上去，一条炮腿搞了一个铁锹，铁锹把炮腿别住，再把这个铁锹压到他的肚子下面，另一条腿就拿肩膀子扛起来，命令战士开炮。他们这个地方离敌人的火力点不到30米，还在这个炮弹的火力圈之内。战士不敢开炮，因为这一炮开出去，班长就会牺牲。可孔庆山命令开炮，战士含着泪开炮了。一炮就把敌人的火力点炸毁了，美军30多人非死即伤，可是孔庆山被这个炮的后坐力弹出去五六米远，当场壮烈牺牲。”

志愿军里像孔庆山这样不要命的普通一兵，太多太多！

正是凭着这样一种无所畏惧的精神，27军的将士才突破了美军环形阵地的外围防线，冲到了美军团指挥所和炮兵阵地，乱枪击毙了团长麦克莱恩上校，阵地上的美军群龙无首，一片混乱。

代理团长费斯中校在下达了分散突围的命令后，也被志愿军战士扔出的手榴弹炸死。全团四散奔逃，很多人企图从冰封的长津湖突围，结果造成冰层坍塌，落入湖中冻死淹死。

史密斯将军派了一队人马从下碣隅里赶来解围，但无济于事，只有眼睁睁地看着“北极熊团”被中国人一口口吃掉。

一位在朝鲜战场上先当步兵，在火线上冲锋陷阵，英勇杀敌，后来给团长做警卫员的战士晚年对人说，真实的战场上，没有理智者。一般只要上点规模的战斗，脑子里除了枪声、爆炸声、炮声外，你什么也听不到的。你只有一个选择，就是执行战前命令，端着枪往前冲，看到穿不同军服的人就开枪！晚半秒，先倒下的肯定就是你！没有人会认得



你是谁，知道你要做什么，即使你突然发现和你一起冲锋杀敌的是你失踪多年的亲兄弟，那一刻也不会拉住他招呼一声，问问父母好还是不好什么的。只有等冲锋结束了，活下来的才会猫着腰，转着眼睛，稍稍冷静一下，再看看自己的战友，活下来多少？

“至于堵枪口的事有没有呢？可以肯定地回答：绝对有！而且很多！战场上比堵枪眼更悲壮的各种事情多的是！比如一个上千人的加强营刚刚赶到一座预定的山头上，美军的凝固汽油弹扔下来后，有几个能活下来的？温度1000多度，山上的石子都能烧成石灰，钻进坑里也得被烤熟，你能往哪儿躲？满山遍野，都是烧得焦黑的骷髅架子。

“我就亲自伸手去抓住地堡射击口的机枪往外拖，手被烧烂了都不晓得痛，直到战友往里面扔手榴弹炸了才放手。实际上不能叫放手，叫甩开，因为老美的机枪管子打红了，手一抓上去就黏在了一起，得用力才能甩开。顺便说一下，当时国内制造的弹药差劲得很，步兵最好使的手榴弹，十个能响七八个，就算运气好的了。

“活着回到工事里的士兵晚上还要去收尸，战友阵亡了，你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躺在那里日晒雨淋啊！一个兵晚上的任务是收3具尸体，不敢打手电，都是用手摸鼻子，摸到鼻子钩的就是美国兵，鼻子平的就是中国兵扛回来。我就是在一次收尸任务中捉到一个还活着的美国兵，立了功才进了警卫班，得以生还回来的。

“至于抱着敌人同归于尽这些事并不少见。自动往敌人枪口上扑的战士不少，当然不是为了堵枪口。是为了压歪机枪！枪口用人是堵不住的，哪怕是支步枪你都堵不住，只能用身体把它压坏。不是我们不怕死，而是当时没有选择，也容不得你选择！当时的情况只有上过战场的人才知道。英雄狗雄，就那一秒钟定终身。战场上的很多事，都是不可以用和平时期的思维模式和道理来评说的。”

6. “大白鲨”破网而出

就在美步兵第7师第31团在新兴里同中国军队展开血战的同时，

美陆战1师也在长津湖南面的下碣隅里和东南面的柳潭里，陷入了志愿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师长史密斯少将是一位谨慎、寡言、考虑周密但个性倔强的美国军人。作为陆战师的最高长官，肩负着25000名士兵生命的重任。因为作战理念不同，他经常会与上级产生冲突，并且毫不让步。

在陆战1师奉命向鸭绿江推进途中，由于中国军队已经出现在西线战场上，引起了史密斯的高度警觉。所以史密斯在接到“联合国军”参谋长兼第10军军长阿尔蒙德将军快速前进的命令后，并没有马上执行，他给下属各团的指示是：“放慢前进节奏，等我们和其他部队真正会合后，再恢复正常的进攻速度。每天在前进之前，必须事先确定前进目标和距离，确保部队面临突袭作战时，能保持最大的反应与反击力量！”所以陆战1师行动十分谨慎，部队以日均5公里的速度，像只蜗牛一样，慢慢吞吞地向着鸭绿江方向蠕动。

史密斯率领陆战1师向北进军的时候，始终对部队的后勤补给线给予极大的关注。陆战1师进入长津湖地区以后，史密斯更是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总觉得中共军队不知躲在什么地方等着他的到来，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突然向他发起袭击，就像他们突然出现在温井、云山一样。

陆战1师进入长津湖地区后，他命令工兵部队用推土机在下碣隅里抓紧修建一个简易机场和物资堆放站，用以储存军备物资；重新修筑古土里至真兴里之间的公路，使M26坦克能够顺利地通过。史密斯还命令下属部队，进入长津湖地区之后，首要任务不是前进，而是构筑防御工事和火力网，以防被中国人突然袭击。

事后证明，正是史密斯的这一系列小心翼翼的防范举措，才挽救了陆战1师绝大多数官兵的性命。

交战仅仅一天，见势不妙的麦克阿瑟即命令陆战1师转过身来，背对着中国人向南“前进”。

在成群飞机掩护下，美军开始竭力往后收缩，企图先聚集到下碣隅里，再往南逃。

在中国人一波接着一波的猛烈打击下，全部机械化装备的美军在大部分时间里，仅能以每小时500米的速度前进。战斗间歇，漫天飞降的暴风雪更让美军士兵备感绝望。

即使是装备优良的美军士兵境况也不是那么乐观，军医们不得不



把吗啡针剂塞在口中融化再使用。

《生活》杂志的摄影记者戴维·邓肯看到一名士兵背靠在坦克车身上，尽可能地把身子蜷缩在军用大衣里，想用匙子从罐头里挖一颗冻结的蚕豆却怎么也挖不出来。

严寒冻伤了他的眼睛，他好像已经看不见东西了。最后，他总算挖出了那颗蚕豆，慢慢地把它送入嘴里，然后抬起脸，一动不动地等待着把蚕豆含化。

“假如现在是圣诞节，而我就是上帝，”邓肯对他说，“那么你想要得到的是什么呢？”

那个士兵琢磨了好一会措辞，然后抬头看着雪花风舞的灰蒙蒙天空，说：“给我明天吧。”

许多年后，詹大南将军饱含热泪地对采访他的记者们说：“新兴里战斗中，村子里、壕沟中，到处看见我的兵端着枪，两眼瞪着前方，一身的雪，一动不动。那是被活活冻死的，像塑像一样啊！荣誉，应该属于他们。”

同样是许多年后，谭秉云感慨万端地告诉我：“那时候冻死的，打死的，遍地都是，见多了，神经也就麻木了，死人成了稀松平常的事。我的一个兵平时体质有点弱，天又冷，又没东西吃，我看他已经浑身无力，走路都偏偏倒倒了。可就这副样儿，只要你还有口气，就得打下去。那天，我和他一起挖掩体，挖着挖着，他一下就倒下了，我赶紧把他抱起来，想用身子给他暖暖，但是我们的军装外面都像盔甲一样裹着一层冰，根本没有温度。他就这样在我怀里冻成了一根冰棍，最后看着他咽气。当然冻死的远不止他一个，要举例子我也举不过来，太多太多哪。过了几十年了，我现在可以给你们说句大实话，我们27军80师入朝时1万多人，那一仗打下来，缩编成了几个连。就我所在的239团7连，不算作战打死的，光冻死饿死的，就占了五六成！”

战役是11月27日傍晚发起的，打到12月5日，新兴里、柳潭里等分散于附近几个村子的美军突破志愿军的包围，不顾一切地向着下碣隅里冲来，集中在这里的美军已超过1万人，各种车辆一千台以上。美军这样多的人员车辆集中在一个方圆仅仅几平方公里的小小地域里，再加上堆积如山的各种军用物资，哪怕有一发炮弹落到这里，都会引起巨大的伤亡。但是，在朝鲜东线作战的第9兵团因为无法抗拒

美军飞机的轰炸，所有的重炮，包括极为有限的坦克，都没有过鸭绿江，因此只能无可奈何地远远看着美军人员车辆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大规模移动、集结。

至少已经落到包围圈里的史密斯师长心里明白，中国军队吃掉他的决心已定：通过空中观测机上的电台传来的情报告诉他，中国已经换上苏军装备的第26军正在向长津湖地区步步逼近，刚刚结束新兴里、柳潭里战斗的第27军也快速向下碣隅里压了过来。更糟糕的是，在陆战1师下一步撤退的道路上，大约有五六个师的中国军队已经迅速南下，在下碣隅里至古土里，乃至五老里的道路两边准备节节阻击。而现在，这条道路上的所有桥梁已经被中国工兵炸毁。可以说，陆战1师仍然深陷在包围之中，突围出去的路上，处处布满了死亡陷阱。

阿尔蒙德下达的命令只有短短一句话，“尽快撤退到咸兴地区”。

史密斯也恨不得立刻就撤退到咸兴南面的兴南港，或者是稍远一点的元山港，登上专门赶来接应他们的军舰。

但是他的陆战1师根本动弹不了，除了要整顿经历过剧烈的战斗而损失巨大的部队，并让士兵们稍微恢复一下体力之外，更重要的是，那些遍布在下碣隅里每一座帐篷里的伤员，必须先撤退出去。伤员的人数大约在5000人左右，带着他们突破漫长的血路撤退到兴南港、元山港，是绝对不可能的。

只有一个办法：空运，把伤员空运出下碣隅里。下碣隅里的简易机场终于可以使用了，这是史密斯在这段暗淡的日子里唯一感受到的一丝光亮。当阿尔蒙德催促陆战1师迅速北上进攻的时候，陆战1师因为坚持修建这个机场严重延误了北进的时间，史密斯为此几乎丢失了自己职业军人的前途。但是11天后，当第一架远东空军的C-47飞机载着伤员飞离下碣隅里的时候，阿尔蒙德终于认识到敢于在自己面前抗命不遵的史密斯的预见，是何等的明智。

美国军史写道：

陆战队工程兵们难以置信的顽强工作精神令人敬佩！

到12月1日，这个简易机场仅有2900英尺长，50英尺宽，而依照施工手册的要求和下碣隅里的海拔高度，得有7600英尺长的跑道



才行。相比之下，这座机场简直小得可怜。然而，医院里挤满了伤员，到了危急关头。从柳潭里来的部队还在不断带来大批负伤和冻伤的士兵，不管这些伤员的情况如何，“联合国军”必须在数天之内的撤离。史密斯将军决定在这座机场进行一次试降。

12月1日下午2点30分，一群群裹着防水短外套的陆战队员站在旁边，焦急地望着空军一架带有着陆阻力板的C-47运输机降落。飞机恰好降落在冰雪覆盖、冻得僵硬的机场跑道上，它在高低不平的地面上颠簸向前，然后紧急刹车，试降成功了。

半小时后，真正的考验到来了。

那架C-47运输机载上24名伤员，飞行员加大油门，飞机随之绷紧了弦，制动器最后也被松开，飞机开始在跑道上轰鸣。在那短暂、可怕而又让人难熬的一瞬间，飞机好像在这条短短的跑道上根本无法起飞似的，然而，在地面上的人们热烈的欢呼声中，飞行员竭力使机尾抬起，两翼也得到足够的升力，飞机终于离开地面，慢慢掠过山顶向南飞去。

下碣隅里简易机场就这样诞生了。在其存在的短暂过程中，它创造了人类征服天空的一项伟业，也是美国人坚韧不拔精神的一次验证。在这一天，又有3架C-47飞机降落，其中2架载着60名伤员飞走了，第3架却留了下来。它满载弹药在此降落，接触跑道时起落架不幸被撞坏。这架飞机不得被拖到一边，炸掉不要了。

次日，C-47运输机开始令人惊讶地在下碣隅里与兴南西南几英里的烟浦机场之间穿梭往来。大多数人都从烟浦来到兴南的第1陆战师医院、咸兴陆军第121后方医院或者是到停泊在兴南港的美军“慰藉”号医疗船上。少数伤势严重的伤员被直接从下碣隅里运送到了日本。飞回下碣隅里时，C-47运输机不仅带来了急需的易受损的设备和药品，而且还运回了在日本医院里康复的537名陆战队员。

12月2日，空军和陆战队C-47运输机共运出914名伤病员。12月3日，又有700名被运了出去。到12月4日，人数增加到1200名左右。然而，到12月5日上午，仍有1400多名负伤和冻伤的人员滞留在下碣隅里的医院里，而下达的命令要求突围于次日上午开始。面对命令规定的最后期限，C-47的飞行员加快了他们往返的速度，在夜晚来临之前，终于将所有伤员都运了出去。

当最后一架飞机越过山头，消失在去烟浦方向的上空时，空军和医疗人员计算了一下所取得的成果：5天之内，有4312人从这个简易机场被运送出去，其中有3150名美军陆战队员，1137名陆军步兵，25名英军陆战队员。C-47的飞行员没有损失一个人，圆满地完成了任务。^①

从柳潭里撤往下碣隅里的第一夜，是美军陆战1师大批伤亡的夜晚。天亮之后，美军大批支援飞机发出巨大的轰鸣声，几乎贴着陆战队员士兵的头顶，掩护着他们一寸寸地撤退。

按照战斗的常规，这一夜应该是美陆战1师的两个团全军覆灭的一夜，但是，最善于夜战的中国军队却没能抓住时机将其歼灭。原因除了中国士兵的饥饿和弹药不济之外，对于中国士兵来讲，威胁最大的就是美军的空中支援，这是没有任何空中支援和防空火力的中国士兵无法克服与战胜的，只要天一亮，中国士兵几乎不能在战场上露面。

如果说中国军队哪怕拥有少量的空中力量，美军陆战队在这一夜就将血流成河。拿美军陆战1师作战处长的话说：“如果中国军队拥有一定数量的空中力量和足够的后勤保障，陆战队肯定一个也别想活着跑出来。”

12月4日，陆战1师5团、7团终于从柳潭里撤退到了下碣隅里。从柳潭里到下碣隅里的距离是22公里，陆战1师的先头部队在这22公里的距离内用了59个小时，后卫部队则用了77个小时，平均每小时行军300米，每前进1公里需用3个小时。在撤退的路上共有1500人伤亡，其中的500人是冻伤。

《纽约先驱论坛报》随军女记者玛格丽特·希金丝在目睹了美军士兵撤退到下碣隅里阵地时的情景后写道：“我在下碣隅里看见了这些遭到中国人痛打的官兵，不由想到他们如果再受到一次打击，究竟还有没有再次逃脱的力量。官兵们衣服破烂不堪，他们的脸被寒风吹肿，流着血，手套破了，线开了，帽子也没了，有的耳朵被冻成紫色，还有的脚都冻坏了，穿不上鞋，光着脚走进医生的帐篷里。第5团的默里中校，像落魄的亡灵一般，与指挥第5团成功地进行仁川登

^① 引自（美）贝文·亚历山大《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陆时相比，完全判若两人……”

而“像落魄的亡灵一般”的默里中校自己则在回忆录里说道：“打开血路的5天5夜就像是一场噩梦，是海军陆战队不曾有过的最坏的时候。在柳潭里的附近，我每天晚上都会想大概不会再见到天亮了。”

12月5日，当更多的新闻记者搭乘飞机赶到下碣隅里时，美军部队已经做出计划，决定次日晨撤往古土里。

照玛格丽特·希金斯看来，这里几乎不像是个战场，没有任何战斗的迹象，但史密斯师长对他手下那一群顶着风雪站在野地里的军官们一番简短的训话，却令她备感形势之紧迫。

“黎明时分，他告诉他们，我们要向后方进发”。在史密斯训话时，希金斯注意到那些军官的脸上流露出一种自尊心深受伤害的表情。“这绝不是退却”，史密斯厉声重复着，“这只不过是向另一个方向的进攻。在我们去往海边的道路上，有着比我们面前更多的中国人在围堵拦截。但我们还是要离开这儿。任何有不同看法的军官尽可以坦然地装成受伤的瘸子，被送离这儿。但是”，他环视了一圈，“我不希望有任何人这样做”。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和晚上，希金斯都在设法与从柳潭里逃出的幸存者交谈。这些人仍处在迷乱之中，一个个衣衫褴褛，肿胀的脸上露出被凛冽的寒风刮出的血迹，破旧的手套都已抽丝了。还有些没帽子的人，耳朵都冻紫了。这些人正光着脚丫子走进军医的帐篷，因为他们穿不进那冻成冰块的靴子。自仁川登陆成功后，希金斯就一直没再见到史密斯。现在史密斯看上去很憔悴，他对她解释说，能从柳潭里脱身，完全是托福于中国人犯了一个根本性错误。

“假使中国人把军队聚集在出口处，我们就永远也休想逃出那个陷阱。可他们想要彻底包围我们，所以分散了他们的兵力。”

“您认为他们还会再犯这样的错误吗？”

“一定会的！”

希金斯朝着那些躺在担架上等待运送的伤员们走去。

一等兵温·斯科特望着她同几名伤员交谈，希金斯冲他弯下腰来，问他是如何忍受战场上的酷寒的，但心情沮丧的一等兵拒不回答。

“你必须对付的最艰难的事情是什么呢？”希金丝不死心，换了一种方式问。

斯科特想了想，然后咧开嘴笑着说：“最难的就是强逼着我们把1根3英寸长的针，穿过6英寸厚的衣服，女士。”^①

在撤退伤员的工作中，陆战队员在机场的跑道上发现了曾经仓皇逃窜的美陆军第7师的假伤员。这些美国陆军士兵“走到跑道上，裹上一条毯子，倒在担架上大声地呻吟起来，于是卫生兵就抬起他们上了飞机”。

在这种情况下，一名军医向史密斯师长报告了一个奇怪的数字：他管辖的帐篷里原来有450名伤员，可当天他运走的伤员人数却是941人。到了天黑的时候，他从机场回来居然发现又有260人躺在他的帐篷里。军医认为，如果不加强检查，会有更多的“没有受伤的士兵混上了飞机”。

史密斯师长当即宣布这位军医是“上飞机资格的最后裁定人”。军医为了更方便地执行裁定，选择了一个活“样品”：一位叫莱森登的军医由于脚冻伤，走路一瘸一拐的，于是所有的伤员都必须与这位军医相比，“伤势不重于莱森登医生的人不准上飞机”。

除了伤员外，史密斯师长坚决主张把200多具美军士兵的尸体抬上飞机。为此，他又再次和尔蒙德争吵起来。史密斯的态度十分强硬：“我们不惜生命也要带回这些尸体，我们绝不会把这些阵亡的士兵留在孤寂荒芜的朝鲜北部的大山沟里！”

然而在柳潭里和新兴里，阵亡美军士兵的尸体已经就地掩埋了。

更让史密斯恼火的是，那些被运到日本医院的士兵的冻伤状况引来了舆论对陆战1师的指责，说使士兵冻伤是“指挥员的失职”，要求军事法庭“调查失职者”。为此，史密斯愤怒地又给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官凯茨将军写了一封信：“我在这里刚刚把一枚银星勋章授予一名中士，他为了扔手榴弹脱下了手套，结果手指被严重冻伤。你能因为这位士兵未能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冻伤，而把他送交军事法庭吗？你能因此把他的营长、团长，甚至师长，送上军事法庭吗？”

^① 引自（美）约翰·托兰《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约翰·托兰在他的《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中写道：“在朝鲜东线的战斗中，装备和补给都劣差的中国军队因冻伤而失去战斗力甚至死亡的士兵数量约为1万人，相比美军因此而失去的战斗兵员而言，这几乎像是一个天文数字。”

虽然史密斯师长的愤怒隐含着推脱，但战争就是战争，战争从来就是不讲道理的。

为了撤退，美军对下碣隅里进行了空前的物资补给。美军的四引擎飞机以红、蓝、黄、绿和橙色的降落伞，投下了大量的食品、药品、汽油和弹药。数量之大使空军的降落伞都不够用了，以致要从下碣隅里的地面回收，但落在下碣隅里的降落伞已经被美军士兵们撕开当作御寒的毯子和围巾了。

由于地面冻得坚硬如铁，空投的物资一半以上落地时损坏，还有一部分落到了中国军队的火力控制范围内，因此尽管空投的物资总重量已达到300多吨，史密斯师长还是认为远远不够。

对陆战1师的另一项重要补充是人员。500多名在仁川登陆时负伤现已伤愈的陆战队官兵也被空投到下碣隅里，以作为陆战1师撤退时主要的突击力量。

12月6日清晨，美军自下碣隅里向南大规模撤退的行动开始了。首先，美军自己引爆了炸药，他们要把下碣隅里彻底毁灭，特别是军事设施和可以御寒的一切房屋，同时还要彻底销毁一切携带不走的物资，包括剩余的衣服、食品和弹药。推土机把堆积如山的罐头食品压碎，泼上汽油点燃。带不走的物资中还包括随军小卖部的一些商品。当最后一批美军离开下碣隅里的时候，冲入下碣隅里的中国士兵冒着美军发射来的炮弹，在大火中寻找可以补充自己继续作战的物资。

离开下碣隅里的美军是一支庞大的、豪华的、诸兵种联合行动的队伍：先头部队在坦克的带领下沿着公路两侧攻击前进，后面是步兵与车辆混合而成的长长的纵队，然后是后卫部队。炮兵与先头部队之前已经出发，为的是抢先占领发射阵地。

在整个队伍的上空，数百架处于不同高度的飞机严密地掩护着地面的撤退。这是朝鲜战争开始以来最大规模的空中掩护，从航空母舰“莱特”号、“巴里”号、“福基”号、“菲律宾海”号、“普林斯顿”号、“斯特雷德”号、“凡尔登”号、“西西里”号

起飞的舰载飞机以及美军第5航空队的侦察机、战斗机、中型和重型轰炸机，依次轮番起飞，在整个陆战1师撤退的必经空域形成了严密的掩护火力网。

“4艘快速航母，2艘护卫航母，1艘轻型航母在近海直接支援这次突围行动。所有这些舰载飞机，再加上远东空军，代表着一次令人畏惧的空中力量的大集结，而且为陆战队员和陆军士兵提供了一个空中保护伞，并成为整个撤退中一个可靠的空中打击平台。尽管长途跋涉向海边撤退的地面部队赢得了英勇无比、坚韧不拔的美名，但如果没有空军和海军将士，他们所作的努力肯定还要付出更大的代价。”^①

公路上缓慢地走着美军长长的车队，在公路两边的几乎每一个高地上，都有中国士兵射向公路的子弹和迫击炮弹，而且，没过多久天就黑了，美军的飞机不能来支援，美军士兵知道该他们倒霉了。中国士兵从公路两边的高地上冲下来，以班、排为单位抵近美军撤退的队伍，先是用手榴弹进行试探，然后干脆就径直冲进来。美国士兵在令他们魂飞魄散的黑暗中拼死抵抗，撤退的队伍一次次被迫停下来。

美军军官们一次次地组织抵抗，尽最大的努力不使撤退的队伍溃散。美军的主要炮兵火力105榴弹炮因为没有了炮弹而成为废铁，一辆满是伤员的卡车仓皇中撞上一座小桥的护栏，桥被撞塌，卡车连同伤员一起掉入冰河之中。轻伤员挣扎着爬上岸，而用绷带捆在卡车车厢上的重伤员立即没有了踪影。

在地面美军的强烈要求下，美军飞行员在扔下大量的照明弹之后，破例开始在夜间进行火力支援。飞机扔下的炸弹不可避免地使双方的士兵都受到巨大的伤亡。飞行员们也许感到这样的低空轰炸实在是太刺激了，当地面要求他们向公路边的一个高地进行火力支援时，他们竟然在一个有中国士兵身影出没的小山脊上使用凝固汽油弹和500磅炸弹整整轰炸了25分钟，他们说他们要使那条小山脊成为“世界上最没有用的地皮之一”。

这一天上午长津湖地区的雾很大，这样的天气明显有利于中国人。他们不顾头顶美军飞机的扫射和轰炸，开始对陆战1师进行殊死

^① 引自（美）大卫·哈伯斯塔姆《最寒冷的冬天：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重庆出版社2010年版。

的阻击。中国军队把美军先头部队的坦克放了过去，然后猛烈地射击美军的步兵，密集的子弹从公路两侧的每一个山头射来。

同时，在令美军士兵心惊肉跳的喇叭声中，中国士兵无所畏惧地冲上来与美军搏斗。陆战1师撤退的序列开始混乱，长长的车队被迫停下来进行抵抗。虽然是白天，但中国士兵勇敢的阻击令美军整整一天才撤出去5公里。

天黑下来后，火力比20军、27军凶猛了许多的26军终于赶到了战场。宋时轮给张仁初军长和李耀文政委的命令是：全面向撤退中的美军发动坚决的攻击。遗憾的是赶到下碣隅里的只有26军的第88师，而76、77、78三个师扛着苏式武器，还在零下30多度的暴风雪中艰难行军，未能赶到战场投入追歼美陆战1师的战斗。

在迫击炮和轻重机枪的掩护下，武器虽好，却因美机轰炸和大面积冻死冻伤造成严重减员的88师不顾一切地向东丘发起了猛攻。

和这支手持新锐武器却已精疲力竭的志愿军部队交火的是美陆战1师7团，这个团的士兵已经在尸山血海中滚爬过几回了，因此面对中国士兵们反而无所顾忌。他们呐喊着，在一种近乎疯狂的状态中拼死抵抗。

陆战1师5团是后卫，抵抗着从新兴里和柳潭里压下来的中国第27军的追击部队。在公路两侧的各个山包上，交战双方反复争夺的状况一直延续着，将荒凉的山谷杀得血光冲天。美国士兵后来把这条山谷称之为“火炼狱谷”。

此时此刻，中国士兵们和他们的指挥员一样，都明白这是歼灭美军的最好的时机。北风卷起漫天飞舞的雪粉，志愿军战士们手脚冰冷，浑身挂满冰凌，在齐腰深的积雪里，抱着像冰一样冷的步枪，潮水一般涌向敌人。他们凭借着步枪、手榴弹，每人背着一条长袜子似的干粮袋，竟然将美陆战1师打得魂飞魄散，落荒而逃。

美国军事史专家蒙特罗斯将12月7日这一天的战斗称之为“最壮观的战斗”，“陆战队员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众多的中国人蜂拥而至。中国人一次次地顽强地进攻，夜空时而被曳光弹交织成一片火网，时而照明弹发出可怕的光亮，把跑步前进的中国部队暴露无遗。尽管陆战队的炮兵、坦克和机枪全力射击，但是中国人仍然源源不断地拥上来，他们视死如归的精神令陆战队员们肃然起敬”。

美军的坦克先头部队冲过枪林弹雨到达了古土里，伤痕累累的美

军士兵一头倒在帐篷里就睡，但是让他们原程返回的命令到了，因为陆战1师的主力部队，尤其是辎重部队此刻处在了与中国军队的混战之中。中国士兵已经把辎重部队紧紧地包围了，这支部队因为等待工兵修复被中国士兵炸毁的桥梁和开辟迂回道路而滞留在这里。

负责掩护辎重部队的是美国海军航空兵司令哈里斯将军的儿子哈里斯中校，中校已经把手中掌握的3个步兵连全用上了，但辎重部队依旧处在危机之中。在中国军队的顽强攻击下，辎重部队副团长很快战死了，指挥部的两名参谋也相继死亡。

没过多久，连哈里斯中校也在混战中被中国士兵击毙了。

7. 美国人建座大桥像玩积木似的

这时，留在下碣隅里附近担任后卫任务的陆战1师5团与中国军队的战斗更为残酷。阻击中国军队前进的美军士兵用坦克、榴弹炮，无后坐力炮、火箭筒和机枪组成了强大的火力网，可是中国士兵决不后退，他们以令美军士兵目瞪口呆的顽强，一拨又一拨地冲杀上来。

蒙特罗斯写道：“中国士兵的身影浮现在照明弹青白色的光亮下，如此顽强的进攻许多美国士兵从来没有见过。”

战斗持续到了7日下午。

美军陆战1师的主力，陆续撤退到了古土里。

从下碣隅里到古土里，这段短短18公里的道路，美军竟然走了38个小时，平均每小时前进500米。美军在这18公里的路上损失了官兵616人，平均每公里伤亡34人。

集中在古土里的美军多达14000人。

这里距离陆战1师最终的撤退目标兴南港还有9公里。

美军到达古土里的时候，一场猛烈的暴风雪来了。惊魂未定的美军官兵在极度的寒冷中听到了一个比呼啸的暴风雪更令他们恐惧的消息：在继续向海岸撤退的路上，有一个极其险峻的隘口，隘口上唯一可供通过的桥梁，已经被中国士兵炸毁。

那座使美军陆战1师无路可绕的桥，叫作水门桥。



发生在水门桥的故事，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作战双方工业能力的巨大差距，导致了战争双方军事实力悬殊，从而使战争在战争力量相差巨大的前提下，如此惨烈地进行着。

水门桥位于古土里以南5.6公里处，跨度为8.8米，是连接下碣隅里至兴南港口的山间公路上的一座最重要的桥梁，桥下是万丈深渊，周围没有任何可以绕行的道路。

战役双方都看到了这座桥的巨大价值，展开了一场炸桥与修桥的反复对抗。

在长津湖战役中，第20军军长张翼翔接到兵团司令员宋时轮的命令，把从下碣隅里至真兴里的桥梁全部炸掉，以封锁美军陆战1师的南逃之路。

第一次是12月1日，志愿军20军60师炸桥小分队在夜幕的掩护下，穿插到水门桥，成功将水门桥炸毁。但是美军陆战1师的工兵部队迅速将其修复，并加强了守备。

两天后的深夜，志愿军炸桥分队发起第二次攻击，又将美军架好的桥梁炸毁。美军工兵部队又在原桥残留的桥根部迅速地架设了钢木桥梁，使其恢复通行。

12月6日凌晨，志愿军再次发动进攻，攻夺桥梁的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愤怒的志愿军炸桥部队索性将美军新建的桥梁及其基座一起连根炸上了天。

水门桥第三次被炸毁以后，20军60师一名副师长亲自到悬崖边视察了一番，从中国人的观察角度，以中国人对科技与工业的了解，得出的结论是：没有半年的时间，美军休想在此处重新架设桥梁。

在向兵团司令部请示后，志愿军60师在断桥南面的高地上只留驻了一个连担任守备。与其说是准备阻击敌人，还不如说是让他们留在这里，待会儿看看美国佬到了断桥上，怎样变成热锅上的蚂蚁。

第9兵团司令宋时轮也认为陆战1师已经是煮熟了的鸭子，就算插上翅膀也不可能飞走了，严令20军刻不容缓，一路紧追。

退路一断，困在途中的美陆战1师成了煮熟了的鸭子，插翅难逃了。此时拿着火力凶猛的新家伙的26军88师也已接近战场，即将对陆战1师发起更加凌厉的攻击。

但是，美国人不这么看待问题。

就在美军几乎陷入绝境时，陆战1师的第1工兵营营长帕特里奇中

校提出一个大胆设想：请求总部空投桥梁组件，然后再架桥。

美军强大的后勤机构立即开始运转。日本三菱重工连夜制作了8套M-2型钢木标准桥梁，用8架C-119运输机在7日凌晨运往1000多公里以外的朝鲜水门桥附近上空，21时30分用巨型降落伞直接空投到美军狭窄的环形阵地里，其中6套落地后完好无损。

就像玩积木一般，经过整整一天的紧张施工，陆战第1师的工兵部队于8日16时在悬崖上架起了一座载重50吨，可以通过所有型号的坦克和车辆的钢制桥梁。

美军全部通过水门桥后，立即炸毁了桥梁。

长津湖一战志愿军从战役层面而言，可谓精彩绝伦，妙到颠毫，成功地将美第10军铁桶般包围起来。从战术层面讲，军官用命，战士赴死，并在新兴里全歼了美军王牌“北极熊团”。可是，陆战1师却像一条喷吐着烈火的铁甲巨兽，虽然落在了中国人布下的天罗地网之中，中国人却牙不利，爪不锐，始终咬它不碎，吞它不下，生生被它撞出一个大洞，成功地逃出了生天……而紧追而来的志愿军望着眼前断桥下的万丈悬崖，却只有徒呼奈何，无能为力。

美国人通过长津湖之战，发现了中国军队的弱点。

美国军人的乐观不无根据，中国人已经显露出了他们的致命弱点——他们不能持久作战，不能有效地利用已经取胜的进攻扩大战果。尽管他们在长津湖的一系列进攻中获得了巨大胜利，却不能继续推进，赢得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成功。他们只是在几次极其有限的交战中，比如像在“地狱之火谷地”中对付一支小部队那样，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其原因可以从他们原始的补给和运输系统中找到。

这个系统靠的是人背畜驮，因而进攻只能局限于短暂的交锋。短暂的交锋只需要较少的弹药，而这些弹药可以轻而易举地运到战场。

按照美军的惯例，作战需要储存大量补给品，但这对中国军队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中国军方的决定必须迅速果断。迫于形势所需，他们基本上不得不立足于进行局部战争。

鉴于中国军队落后的后勤保障体系和他们依靠脚力进行运动的事实，那么，当他们突破“联合国军”的防线后，就无法果断地利



用大规模的快速机械化部队向纵深处推进，旨在取得战术或战略上的全面胜利。

中国军队不像美军那样拥有以道路和卡车为基础的庞大的后勤保障体系，能够向快速推进的部队提供大量的物资供应。

相反，不管中国军队在战术上取得了多么大的胜利，他们都不得不暂停下来，在继续推进之前先对部队进行重新组合和重新补给。由于受“联合国军”的大炮、迫击炮和空中力量的影响，要进行这样的重整旗鼓最好是从战线上撤退下来，这既减少了危险，同时又缩短了与后方供应的距离。因此，中国军队的进攻很快就采取了这样一种模式：前进，进攻，撤退；前进，进攻，撤退。

这意味着中国军队能够取得大量的局部胜利，这样的胜利可以给对手带来全面的灾难性后果，对他们的士气来讲尤其是如此。然而，不管中共军队赢得了多少局部胜利，他们却无法摧毁一支拥有坚定的指挥官领导的机动性强、火力威猛的现代化军队。^①

更让我等中华后人为之一叹的，是留在水门桥公路边一座山头上伏击敌人的第20军60师3营一个连的志愿军官兵，当美陆战1师过了水门桥，经过他们的阵地方向咸兴逃去时，他们竟然眼睁睁看着，却一枪未发。60师师长极为愤怒，立刻派人赶来追责，到了阵地才看见，所有官兵，早已被冻成了“冰雕”！

长津湖战役中，志愿军官兵成建制被冻死的惨剧在多地多处出现。志愿军27军79师235团3连副指导员邹世勇就曾亲历了这一场面。“当美军陆战1师和陆军第7师最后逃跑的时候，我们奉命从侧翼追击，追到一条公路上。那是敌人逃跑的唯一一条公路，我们发现大约有大约一个连的志愿军部队。我上去一看，发现这是20军的部队，头上戴着大盖帽，拿毛巾把耳朵捂起来，穿着胶鞋和南方的棉衣。每个战士都蹲在雪坑里面，枪就这样朝向公路。我想去拉一拉，结果发现他们一个个都冻硬了，他们全都活活冻死在自己的阵地上，一个连啊！他们不是被打死的，全部是被冻死的，枪都整齐地朝着公路。那一幕，我永远不会忘记！”

枪炮突然停止，山川大地，万籁俱寂。

^① 引自（美）贝文·亚历山大《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收殓烈士遗体时，战友们从一名叫作宋阿毛的上海籍战士手掌心里，发现了一张纸片，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一首绝笔诗。

我爱亲人和祖国，
更爱我的荣誉，
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
冰雪啊，我决不屈服于你！
哪怕是冻死，
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

美陆战1师作战处长晚年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曾说：“如果中国人有一定的空中力量和后勤保障，陆战1师肯定一个也别想活着逃出来。”

当然战场上是没有“如果”的，这是落后了数百年的中国不得不面对的巨大落差，志愿军默默地接受了这个落差，并用超人的勇敢坚强，和自己无数士兵的生命、鲜血将之弥补。

现在的中国人若是能够穿越到朝鲜战场，置身于力量对比，敌强我弱的险恶环境，去掂量掂量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就不能不感叹前辈们惊天地泣鬼神，舍生取义的英勇壮举！

不是我们的先辈愿意以血肉之躯拼坦克，是他们不得不以血肉之躯拼坦克。因为当时的中国没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更没有生产现代化武器装备的重工业。

在前线作战的志愿军指战员都有一个共同心愿，为了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欺负，为了不再以血肉之躯拼坦克，我们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建立自鸦片战争以来几辈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重工业，哪怕勒紧裤腰带，也在所不惜！

12日，美陆战1师终于与赶来接应的美第3步兵师会合。美军的两个师继续向南撤退，一直到达东海岸的咸兴市。

一路上，虽然20军一部继续穷追不舍，但是装备最好的26军除了一个88师，其余3个师无论怎样扯掉脚杆奋起直追，也始终没有能够赶到，投入战斗。

88师政治部主任孙良浩的儿子根据父亲留下的日记，写了一篇博文，详细地记述了当年父亲参加长津湖之战的经历。

88师分成两个梯队，师长吴大林、师政委龚杰^①带262团和263团为一梯队开进，我父亲孙良浩和参谋长李东海带264团和师直为二梯队。在行进途中，遇上了零下30多度的严寒，部队在没膝深的大雪中艰难行进。部队没有向导，没有翻译，就凭着不准确的地图，才在12月6日勉勉强强赶到了阻击地点。

263团赶到阻击地后，发现公路积雪上有清晰的车辙印，说明美军已经过去了。是撤退还是等待？团长犹豫了好一会，最后下令回撤，就在部队下山过公路的时候，遇见了美军突围出来的坦克，遭到了美军坦克的碾压，往山上跑的士兵被坦克火力准确射击，部队伤亡惨重。一个主力团还未与美军实际接触就失去了战斗力。战后团长被撤职。团长曾是新四军东海大队的大队长，资格挺老，部队的战斗力也很强，打上海时战果辉煌。这位团长最后只任山东泰安军分区的副司令。

262团赶到阻击地后，冻雪上根本来不及构筑工事，就匆忙展开队形阻击美军，一阵激烈交火，当时没有一点反坦克武器，战士用生命抱炸药包在美军密集的火力下根本靠不近坦克，美陆战1师在坦克的掩护下，很快突了过去。

在途中遭到美机轰炸时，师长吴大林由于躲进被炸毁的美军坦克里，部队一时失去指挥。我父亲听到262团和263团的报告后，着急万分，马上带领二梯队264团和师部警卫连、侦察连追击美军。美军全是机械化部队，行军速度远快于我军。只能追到美军一些伤兵，美军有羽绒衣、鸭绒被仍然有不少冻伤员，我军可想而知。

志愿军战士只带了不到一个星期的干粮，追击美军时就开始断粮了。士兵没有手套没有棉鞋，冻伤的无数。但88师将士就饿着肚子，带着冻伤，无望地追击。

部队在深夜里追到了一个村庄，团长下令包围，派出小部队监视美军。等天亮发起进攻，天蒙蒙亮，部队进入阵地，发现监视美军的战士都没有动静了。我父亲赶到阵地上一看，全都冻死在雪地上了，不禁泪流满面。打了多少年仗，牺牲过多少战友，我父亲从没流泪，这次他哭了。作为军人他必须服从命令，作为中国军人，他爱惜自己的荣誉，但作为一个一向爱惜一兵一卒生命的指挥员，

^① 龚杰：后任中国人民武警部队副政委。

他痛苦万分，十分矛盾。

部队继续追击，追了7天，早没粮了，战士搞到什么吃什么。部队进入一个村庄，发现有一垛垛的冻苹果，战士饿坏了，抓住连皮带肉就啃，苹果本来就没有什么热量，又是冻的，下了肚反而降低体温，战士吃了后肚子当时撑饱了，等到吹集合号的时候，许多年纪大点的，体质差点的，都已经冻死了，我们的战士就这样一批批倒了下去。

在零下30多度的严寒中，没有后勤补给，师团指挥员的生命同样受到威胁。是一把黄豆救了父亲的命。在后方留守的师政治部干部部长沈汉卿^①，看到大部队出发几天后没有消息，军后勤的汽车都被美机炸光了，用自己的坐骑，驮着仅剩的一点口粮，自己步行，立即往前方赶。26军是山东部队，唯有88师都是苏北子弟兵，他连追几天，循着苏北口音找到了父亲的指挥所，已经是深夜，父亲和师副政委刘立封^②、团长张元和^③在一座废碉堡里和衣而眠。沈汉卿叔叔的夫人秦道南阿姨当时是师文工团员，她在后方连夜炒了一锅黄豆。就是吃了这一把黄豆，才救了我父亲的命。

指挥员指望前面遇着村庄能补充粮食，但朝鲜老百姓早就跑光了，根本无法借粮。指挥员最后指望追到兴南港，缴获美军的物资。

12月14日，部队追近港口时，美军把所有的物资都引爆了。看着冲天的大火，指战员都瘫倒在了雪地上。牺牲了这么多战友，还是没能抓住美军，还是失去了最后补充给养的希望。父亲心情极为复杂：为自己从来没打过这么窝囊的仗，也为自己从来没遇见过这么窝囊的指挥而痛苦。

上万人的88师回来时一个团都凑不齐，一起联名给毛泽东写信，吴师长才活了下来。

战后，26军军长张仁初在志愿军总部作了公开检讨，88师师长吴大林因“右倾消极怯战”，行动迟缓，与龚杰政委双双被撤职，不仅如此，连88师的番号和建制也一并被撤销了——作为88师的官兵，这是此生最大的耻辱！

① 沈汉卿后为77师政治部主任，山东省人防办主任。

② 刘立封后为二炮政委。

③ 张元和后为76师师长，江西省军区副司令。

吴大林是四川省南部县人，1932年2月参加红四方面军，193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率领部队跨过鸭绿江时，已是主力师师长。以他的资历和职务，1955年授衔时一颗“豆”是跑不了的，结果就因为长津湖一仗打砸了，只评了个大校。职务呢？1956年5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148师副师长兼参谋长。刚干了一个月，6月里又调他去当辽宁省锦州地区军分区的司令员，1960年8月离职。1991年3月2日因病在成都军区总医院逝世，终年80岁。

过去让美陆战第1师官兵无比自豪的是，在这支部队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使用过“撤退”的字眼，但是在朝鲜北部一个叫作长津湖的地方，他们在中国人的打击下，第一次不得不撤退了。

这对他们的心理影响非常大。

12月11日，撤到咸兴的美陆战第1师，战斗减员4000余人，非战斗减员7000余人。在美国海军舰载飞机和舰炮的掩护下，残部陆续在兴南港登船，从海上撤离。

这一天，恰好是西方的圣诞节，也是麦克阿瑟不久前信誓旦旦地向全世界承诺“联合国军”饮马鸭绿江，宣布结束朝鲜战争，送美军官兵回家的日子。

结果是，“联合国军”在中国人的打击下，东、西两线全部来了个“向后转，齐步走”，向着出发地“英勇前进”，一直逃过了“三八线”，才敢停下来喘口气儿。

英国人麦克斯·哈斯丁在其著作中认为“（美）陆战队员的表现是英勇的。他们从长津湖成建制地退出来，基本上保留了他们所有的重型装备”。

12月25日，志愿军第9兵团27军和朝鲜人民军一部，收复了咸兴、兴南地区，以及东线沿海各个港口。

第26军未能全军及时赶到长津湖战区投入战斗，使20军与27军消耗完了最后一点力量，也未能在最有利的时机分割歼灭被围美第10军，甚至连最后进入美军已经放弃的咸兴、兴南港等地的战果，都落入了连续作战多日的27军之手。

1950年12月24日，亚洲时间的平安夜，美第10军从兴南港装船撤离，次日27军占领兴南，历时近一个月的长津湖战役，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东线作战，同时也是整个第二次战役落下了帷幕。

8. 将军泪

志愿军第27军的战后总结，对于当时处于朝鲜战场的中国军队具有普遍意义，“对敌人估计过低；大部队过于分散，小部队过于集中；侦察手段有限，后勤供应严重不足……”

志愿军第20军60师政治部主任徐放回忆：

我师经过半个月的战斗，由于缺乏防冻装备，冻伤人员很多，粮食供应困难，有时每人只能分到四五个地蛋（山东鲁南地区对洋芋的俗称）。冻饿造成伤员日渐增多，严重影响部队的战斗力。180团担负防守门岬及黄草岭1081高地，于12月7、8两日，顽强阻击真兴里北援之敌，后遭黄草岭南逃美军与真兴里北援之敌南北夹击，180团3营顽强阻击，伤亡很大。

由于弹药耗尽，3营担任守备的一个连在零下40多度的冰雪露天战壕里，没有一点热食进口，穿的单薄棉衣，又不能生火取暖，全连干部战士一个一个都俯卧冰雪的工事旁，手握步枪、手榴弹全部壮烈冻死在阵地上。众多的血肉之躯与冰雪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冰雕般的英雄群像。当第二天早晨来打扫战场的我军指战员看到这个无比悲壮的情景，人人都悲痛欲泪。

就连美军史料上也不得不称颂坚守1081高地的部队说：“这个阵地的中国60师的一个连，忠实地执行了它的任务，顽强战斗，无一生存。”

同时牺牲的还有180团团长赵洪济，团参谋长身负重伤，送治不及时牺牲了。我的亲弟徐文华也负伤不治，光荣阵亡。

由于我军缺乏反坦克武器，冻饿伤人数量多，粮尽弹绝。终于让受到重创的美军陆战1师余部经兴南港和元山港从海上狼狈逃窜。

谭秉云不仅参加了炼狱般的长津湖战役中的新兴里战斗，以及通往古土里的追击战，并且活了下来，不但活了下来，他率领的班还获得了集体三等功。

不过，这个三等功对谭秉云来说不是荣誉，而是羞耻。

以他在战斗中的出色表现，原本战功会更加“辉煌”一些的。

可战斗中出现的一个小插曲，却让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了全连，甚至全营的笑谈。激战新兴里时，谭秉云和他所带大班剩下的已经不多的战士冒着炮火，冲杀在整条攻击线的最前面。当他们歼灭了一座帐篷里的敌人后，谭秉云第一个冲了进去，那一刻，帐篷被打燃了，在摇曳的火光中，眼前出现的情景把谭秉云吓坏了，只见他丢魂丧魄般惊叫了一声：“鬼！鬼呀！”然后转过身撒腿便跑。跟在他后面的战友不明就里，也随他逃了出来。

就在他们惊魂未定时，只见从帐篷里出来了一个双手高举着卡宾枪，浑身黝黑，块头犹似黑熊般巨大的“异物”。

这样一来，已经到手的一名美军战俘，就成了别人的战利品。

等谭秉云知道这是美军中的黑人士兵，知道世界上有一种皮肤就像刷过黑漆一样的人叫黑人而不是什么鬼时，后悔已经迟了。

因为谭秉云在攻打新兴里时带头“转身逃跑”那狼狈不堪的一幕有多人亲眼目睹，所以，原本打得不错，至少应当荣立集体二等功的他那个大班，也就被降了一等。

他对笔者说：“在战场上当英雄除了不怕死，还得靠点运气。”

这话里的意思分明是，我这次没能立大功当英雄，是运气不好。

不过，好运气离他，已经不远了。

此役，志愿军方面宣布美军伤亡13000人。

根据美军战后公布的资料，陆战1师的伤亡情况是：陆战1师从10月26日至12月15日阵亡604人，伤重死亡114人，失踪192人，伤3508人，战斗伤亡总数为4418人，另有7313名非战斗减员，主要是冻伤和消化不良。此外陆战队飞行员还有8人阵亡，4人失踪，3人负伤。整个陆战队战斗伤亡为4433人。

美军后来公布的修正数据为：除陆战1师伤亡4418人之外，步兵第7师31团战斗伤亡2670人，再加上美步3师一部，南朝鲜首都师，土耳其旅的伤亡，第二次战役中的东线美第10军战斗伤亡为10495人。另有冻伤减员5300余人。

关于志愿军在这次战役中的伤亡，官方没有公布具体数字，但是综合毛泽东发给宋时轮的电报，以及第9兵团、20军、27军在后勤工作的总结检讨会上的材料来看，此战出现了我军历史上最严重的冻伤减员现象。

谭秉云和他的战友们一样，也因此未能参加稍后的第三、四次战役，一部分后撤到鸭绿江南岸的北朝鲜大山沟，一部分撤往北岸，回到祖国的土地上休整补充。

关于第9兵团在长津湖战役中冻伤减员人数，《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披露如下：

据11月10日27军军长彭德清、政委刘浩天给高岗、贺晋年并报军委的电报，“自临江出发就发生手足冻伤、不能行走500余人，还冻死两人”。

前卫20军冻伤更严重，60师到战地3天，冻坏2000余人。战斗开始以后，因部队白天黑夜均在野外，且缺乏粮食供应，冻伤人数急剧上升。

12月11日，宋时轮在“第9兵团对东线作战的检讨”中称：部队入朝后，日夜生活于野外，即便有时有米也无法煮熟（白天防空，晚上作战），偶尔煮熟送上火线均成冰冻，无法破碎，更无法吃，造成严重的、普遍的饥饿现象。（战士）体力日益削弱，战力随之降低，加上冬装未补齐，仅靠棉衣服应付零下二十几度的寒冷，特别是每夜下雪，衣服普遍湿透，无法烤干。形成大批冻病、冻僵，直至不少数量已经冻死的严重现象。

12月8日，宋时轮向彭德怀、毛泽东转报谢有法（兵团政治部主任）在27军的调查电报，称：“第9兵团经近半月激战，部队已经极度疲劳，特别是冻伤减员十分严重。以79师为例，于3日至7日止，一个师战斗伤亡2297人，冻伤减员2157人，全师缩编为5个步兵连、2个机炮连，难以继续实施较大的作战行动。94师有营长及连干部被冻死，280团团长和参谋长冻失踪。80师239团3营6连在攻击新兴里之敌时，受敌火力压制即卧倒冰地上，最后打扫战场时，发现全连除一个掉队战士与一个通信员外，其余200多名干部战士呈战斗队形，全部冻死在阵地上，细察尸体，无任何伤痕与血迹。”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下，当年解放上海时睡大街被照相登报成为大新闻的文明之师，就是伤亡最为惨重的27军79师，可见其部队官兵执行纪律，有多么严格。

长津湖战役结束20天后，志愿军第9兵团奉命“撤回鸭绿江两岸

休整”。前去迎接过江部队的东北边防军的干部惊呆了，呈现在他们眼前的志愿军9兵团的士兵：他们胡子拉碴、毛发遮脸、棉军装破烂、眼窝深陷、眼光空洞无神，走起路来摇摇晃晃。许多人披着朝鲜老百姓的破棉袄御寒，用毛巾包着耳朵，看上去处于极度的疲劳和虚脱状态，一踏入祖国的土地后，立即昏倒了……

宋时轮电报发于1950年12月8日18时30分，毛泽东收到电报时北京天色已晚。

据身边工作人员后来回忆，毛泽东默立良久，黯然神伤，独自走至院内，向着东方脱帽致敬。然后回书房复电宋时轮，盛赞：“9兵团此次东线作战，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完成了巨大的战略任务。由于气候寒冷、给养缺乏及战斗激烈，减员达40000人之多，中央对此，极为怀念。”

彭德怀阅电后反应强烈，就在宋时轮12月8日晚将27军减员的情况汇报上去之后，第二天，彭德怀即发去电报，称“79师已处极端严重困难，其他各军、师想大体相同，十分悬念。除力促用一切办法加强运输接济外，望速解决当前战斗（如吃不消可放走一部）。越过黄草岭数十里南，即较黄草岭北温和得多。围敌一部，打援计划，应即停止进行”。

彭德怀不惜放走已经落入自己精心设下的包围圈中的美军，以求第9兵团能够尽快结束战斗，减少官兵的伤亡和痛苦。当时东线的部队既不可能回撤数百里到后方休整，也不可能待在原地继续忍受严寒，彭德怀敢于将已经近在眼前的战役胜利置于众多士兵的生命之下，果断命令第9兵团放弃已经被包围的敌人，赶紧向南前出几十公里，到气温稍高一些的地区休整，将严寒造成的部队伤亡减至最低，这恐怕是他一生中作出的最艰难，同时也是最了不起的决定之一！

4000多个跟着宋时轮来到朝鲜的年轻人被活活冻死在冰天雪地里，4000多名生龙活虎的战士啊，站在宋将军面前那会是怎样的一幅情景？一张张红润且充满稚气的脸膛，密密麻麻，铺天盖地，一眼望不到头。那些略显稚嫩的娃娃们还不知道自己的敌人长的什么模样，绝大多数人还来不及放上一枪，就冷冰冰，硬挺挺地戳在异国他乡的狂风暴雪之中了。想想电影《冰山上的来客》那个胸挎冲锋枪的“冰人”吧；想想天崩地裂，雪瀑从天而降的那个长镜头和那首撕心

裂肺，感天动地的歌子吧，“当我永别了战友的时候，好像那雪崩飞滚万丈，啊——亲爱的战友，我再不能看到你雄伟的身影，和蔼的脸庞……”

1952年10月，第9兵团从朝鲜回国，车行鸭绿江边，宋将军叫司机停车，下车后向长津湖方向默立许久，然后脱帽弯腰，深深鞠躬。

当将军抬起头来，警卫员惊讶地发现，刚过不惑之年便已两鬓染霜的首长泪流满面，不能自己。

当几乎所有人连同我们这个伟大民族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光里都把长津湖战役当作一场伟大胜利来轰轰烈烈地大肆宣传、并将其载入煌煌史册的时候，唯有亲自指挥这场战役的宋时轮将军却显得那样的不合时宜。

他在给彭德怀和毛泽东的电报中除了沉痛汇报第9兵团在长津湖战役中伤亡44000多名官兵，其中冻伤30000余人；27军80师6连、20军60师“3营担任守备的一个连”全部冻死的惨烈战斗经历外，还特别写上了这样一句对自己的前程有着很大“杀伤力”的话：“这次作战打得很不好，应由职负主要责任。”

笔者必须指出的是，第9兵团在长津湖对美军陆战1师为主力的第10军围歼失利，反遭重创，并不能抹杀中国军队发起的第二次战役的胜利。因为第二次战役包括东西两线，彭德怀的战略计划是“西攻东顶”，西线沃克的第8集团军被13兵团6个军30余万志愿军打得落花流水，节节败退，志愿军收复了“三八线”以北的全部领土并攻占了“三八线”以南的延安半岛和瓮津半岛，迫使“联合国军”由进攻转入防御，从而一举扭转了朝鲜战局。

在毛泽东和彭德怀趁热打铁发起的第三次战役中，连美国第8集团军司令官沃克中将也在后撤途中慌不择路，座驾一头撞到了南韩军的大卡车上，来了个“出师未捷身先死”。

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军战斗意志上遭到的最沉重的一次打击，就是由志愿军主动发起的，包括长津湖战役在内的第二次战役。美国人被中国人打得不知所措，西线的沃克和东线的阿尔蒙德被打蒙了，东京的麦克阿瑟被打蒙了，华盛顿的美国当局也被打蒙了，这个时候他们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艾奇逊当时讲过一句著名的话：“总统和总统的顾问们都知道出了问题，但问题出在哪儿，谁也说不出来。”



第二次战役从11月25日西线反击开始，至12月24日战役结束，历时一个月，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中国人民志愿军共歼灭“联合国军”36000余人，其中美军24000多人，一举收复了北朝鲜首都平壤，使世界为之震惊。

美国前总统胡佛承认：“美国在朝鲜被共产党中国击败了。”

美联社则痛心疾首地表示：“这是美军历史上最丢脸的失败！最黑暗的岁月！”

当然，志愿军的牺牲也极其惨烈。

在长津湖战场遗址一座山顶上的烈士陵园里，安葬着9867名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的英烈。他们都是在长津湖战役中，或牺牲于枪林弹雨之中，或被严寒夺去了年轻的生命。

长津湖战役结束后，中美双方战史都对本方的作战行动大加褒扬。志愿军在战略态势上取得了胜利。总部向第9兵团发出贺电：

“你们在冰天雪地、粮弹运输极端困难情况下，与敌苦战一月有余，终于熬过困难，打败了美国侵略军陆战1师及第7师，收复了许多重要城镇，取得了很大胜利。这种坚强的战斗意志与大无畏的精神，值得全军学习。”

此战过后，彭德怀对美军的超强战斗力和朝鲜战争的艰巨性有了新的认识，12月19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据我看，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并且提出采用避免与美军正面交战的方式，“拟集中4个军（第50军、第66军在两翼牵制敌人）首先歼灭伪军第1师，后相机打伪6师。如果战役发展顺利时，再打春川之伪3军团，如不顺畅则适时收兵。能否控制‘三八线’，亦须看当时具体情况再行决定”。

打一个南韩军1师都要动用4个军了，而当初打美陆战1师加上部分美3、美7师不过才动用了2个军（26军未能赶上投入战斗），由此可见，此战对中方的影响有多么沉痛、深重。

成功败退的美陆战1师则把长津湖一战视为其骄傲的资本，美国军方为长津湖作战共颁发了17枚荣誉勋章、70枚海军十字勋章，是美军战史上唯一颁发勋章最多的一次。

《时代》杂志称长津湖作战是“在美军历史上无可比拟，是坚忍和勇气的史诗”。

西方历史学家在谈到长津湖之战（西方人称之为“清长之战”）

时，早就习惯性地宣传什么毛泽东、彭德怀以宋时轮9兵团15万人马围攻美陆战1师两万余人。结果自己反而伤亡了四五万人，陆战1师虽伤亡1万余人，却成功地从中国人铁桶般的重重围困中杀出一条血路，撤退到了兴南港。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样的说法在西方已经成为一种不容置疑的共识。可笔者必须指出的是：这样的说法不仅错误，而且错得来太离谱！

确凿资料证明，此时的陆战1师共有战斗人员25000余人，当时到达长津湖地区是3个陆战步兵团、1个师属炮兵团、1个坦克团，设有工兵营、补给营、通信连、侦察连、军械连、宪兵队、医疗队等辅助兵种，拥有各类火炮200门、坦克150辆、汽车1400辆，是一支装备先进、配置齐全的地面作战部队。

而师部部分人员、师直属第1海岸营和第1水陆两栖车运输营以及一些后勤人员还留守后方基地兴南港。

据美方公布的最新修订资料，该师参加“清长之战”的官兵实际只有22215人。但是，宋时轮的10万大军面对的却并非仅仅是这样一支劲旅，单以地面部队而言，除了陆战1师，他们还有编入第10军的美步兵7师31团（即志愿军27军在新兴里全歼的“北极熊团”），美步兵第3师一个团，以及南韩军首都师、土耳其旅。

此外，美军还有从南方各个机场，以及7艘航空母舰上轮番飞来的上千架飞机助战。以上种种，难道不也应当列入美军投入到“清长之战”中的战斗力？

在风刀雪剑的盖马高原上，参战的双方无论是志愿军的第9兵团还是他们的对手美军陆战1师、美7师（部分）、美3师（部分），在惨烈的战斗中都表现出了令人难以想象的超凡英勇与顽强。在几乎是绝望的不利态势下，美军陆战1师苦战突围，将陆战队顽强坚韧之传统，发挥到了极致。而在几乎是一无所有的后勤补给下，缺衣少食冻饿交加的志愿军第9兵团（并非全兵团）官兵，完全依靠意志和精神在与钢铁、烈火以及冰天雪地的恶劣天气搏杀，以自己堪称军人典范的行为，赢得了对手的尊重！

尊重敌人，是一种境界；敢于尊重敌人的民族，是充满自信的民族。

第十四章

要么投降，要么战争

1. 拳头是最好的外交

1950年11月26日，得到加强的志愿军第13兵团38万兵马，在韩先楚副司令员的指挥下突然出手，发起猛烈反击的第二天，随着3个韩国师的彻底崩溃，美国第8集团军的右翼就已经不复存在了。

志愿军如同一把长长的尖刀，直插“联合国军”的后方。

27日，也就是西线集团突然开火的第三天，东线宋时轮第9兵团10万大军，也在长津湖地区成功地将美第10军包围起来，并分头发起痛击。按照此时的战场态势发展下去，中国人必将很快切断“联合国军”的陆路补给线。如果顺利的话，甚至可以堵死东、西两线“联合国军”的退路。这样一来，有可能像火鸡一样被吃掉的不是金日成，而是与金日成有着同样胖乎乎、矮墩墩身材的沃克将军指挥的第8集团军，和阿尔蒙德麾下的第10军了。

当东线美陆战1师突破志愿军第9兵团布下的天罗地网，拖着钢铁长龙般的身躯不顾死活地冲杀到兴南和元山两个港口，登上军舰逃出生天，西线的“联合国军”在志愿军6个军的沉重打击下，损失惨重，美2师、土耳其旅、南韩第2军均已失去战斗力，美25师遭重创，美骑1师、美24师均遭较大伤亡。

沃克为避免全军覆没，遂逐步向南实施总退却。

就在联合国军东西两线均遭败绩的消息传到东京的一天夜里，麦克阿瑟手下最得力的情报官之一詹姆斯·波尔克中校写信给妻子：

总司令部的人都情绪消沉，我想现在整个自由世界都是如此。

我近来很沮丧，所以3天没有给你写信。

战事发生了急速的变化，几天前，战争眼看就要以一次伟大的胜利而结束，但是现在，谁也看不到它的尽头了。

情况真是糟透了。正如你在这儿时我多次对你说过的，老头子（我指的是麦克阿瑟）的确是个可怕的赌徒。不过，这次他赌得比较吃力。他的运气比以前差多了，输得很惨。

他完全清楚会发生什么，但仍然孤注一掷，结果一败涂地。他就是不相信中共的军队会全力介入战争与他为敌。

我真希望他遭到失败，因为这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①

在这次全线退却中，发生了这样一个令韩国人痛心疾首的悲剧。他们把这件事，以及制造这一悲剧的美国人 and 土耳其人，也一并载入了他们的煌煌国史。

美第2师38步兵团团长乔治·佩普洛上校率部在南朝鲜军的右翼，按要求应与南朝鲜军一个师协同作战。

佩普洛在指挥所里看到南朝鲜军一个团的兵力，正穿过美军阵地溃逃。这个团所在的师已被志愿军打垮，师指挥官要他的士兵逃到美军守住的地段，以便保住性命。

美团长向其师长凯泽将军打电话：“我们的友军（指南韩军）一个团正蜂拥到我防区，怎么办？”

凯泽认为他的团长向他反映的问题没有价值，于是勃然大怒，厉声斥责说：“你指挥他们，让他们到前面去冲锋！混蛋，你懂吗！”

南韩军败逃，出现了缺口，为了堵住这个突然出现的缺口，美军指挥官把几天前才到朝鲜参战的5000多人的土耳其旅紧急派去堵缺口。

这一行动，后来被马歇尔将军比作是“用一个阿斯匹林药瓶的软

^① 引自（美）约翰·托兰《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木塞，去堵一个啤酒桶的桶口”。

土耳其人事先未得到情况介绍，接到命令后就匆匆忙忙地投入了战斗。几小时后，传来土耳其人大获全胜的消息，说他们在与蜂拥而至的中国人的交战中，不仅守住了阵地，还歼灭了上千名敌人，抓获了几百名俘虏。

沃克听到这一消息后喜出望外，但分明又不太敢相信土耳其人在面对中国士兵时会有这般神勇。立即打电话给凯泽师长，要他派人去审讯战俘，以便向麦克阿瑟报功。

美第2师情报部门派人带着翻译去审讯战俘，没想这些战俘全都是南韩军士兵。原来他们在逃跑时误入了土耳其人的防线，不是被打死，就是被活捉。

担任第二次战役正面进攻的中国38军、39军、40军、42军、50军、66军在韩先楚的指挥下，不顾一切困难，不畏一切风险，不惜一切代价，向南勇猛前进，力图最大限度地歼灭溃逃中的敌人。

“联合国军”的车轮竟不如中国士兵的脚步快，这令全世界颇感惊讶。

日本军事史学家认为，“中国士兵创造了战史上罕见的纪录”，这是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表现出的“7个不可思议”中的一个。

所谓“7个不可思议”是：

1. 中国军队介入朝鲜战争的目的、动机和规模；
2. 中国军队是如何侦察的；
3. 中国军队的伪装、土木作业的能力；
4. 原始的后勤系统是如何装备和供应部队的；
5. 中国军队卓越的夜间战斗本领；
6. 视死如归的人海战术；
7. 中国军队在没有机械运输的情况下机动、追击的速度。

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第二次战役胜利后，“联合国军”一下退到了三四百公里之外的“三八线”以南。彭德怀认为志愿军和敌人之间的距离不能拉得太大，所以志愿军各部略事休整后，又急速向南挺进。

这时，志愿军总部所在地大榆洞离前线已经太远，彭德怀要求靠前指挥，于是往南面的君子里迁移。

那里离平壤比较近，同朝鲜领导人联系也比大榆洞方便。

彭德怀的指挥所就设在山脚下—个木板棚里，在棚后的石壁上挖了一个既深且长的防空洞。这样，办公、防空都不成问题。

彭德怀的警卫员景希珍一到君子里，就用报纸把彭老总办公室的板墙糊得严严实实，用废弹药箱垒起了一张办公桌，放在进门的左边。桌上铺着白布，放着彭老总最心爱的象牙边的放大镜，以及紫狼毫毛笔、铜墨盒、烟灰缸，还加了个竹筒做的很精致的笔筒。进门，板墙上挂着一幅大军用地图，还在废弹药箱旁边放了一张凳子，在靠山脚板墙那边放了一张行军床。另外，进门的右边放了一张比较像样的长板凳，那是招待客人用，是办公室里唯一的“奢侈品”。

彭德怀第一次走进这间办公室十分满意，笑眯眯地对景希珍说：

“小景啊，你虽然大字不识几个，倒还是很有艺术细胞嘛，布置得很不错，像个高级招待所。”

朝鲜战场西线和东线接连取得胜利的捷报传到北京，全国人民一片欢腾。

建国一年间，17个国家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它们是：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东德、阿尔巴尼亚、缅甸、印度、越南、丹麦、瑞典、瑞士、印度尼西亚。有8个国家已承认了新中国政府，它们是：巴基斯坦、英国、锡兰（斯里兰卡旧称）、挪威、以色列、阿富汗、芬兰、荷兰。

尽管10月开始的抗美援朝战争使新中国面临新的考验，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个在硝烟和血泊中实现了美丽的新生的东方大国，已经在内政外交上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这一变化，赋予了中国人在历史前进中新的感觉。从此开始的人民记忆，尽管时而低沉，时而昂扬，但在一个完整的形态中展示着丰富的性格。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开始了新生活的人们抑制不住心中的歌唱——

呵！绿水青山，
呵，春风杨柳，

古老而美丽的祖国呵，
你在地球的衣襟上
织出一片醉人的锦绣。
你辽阔的幅员上——
风光何等旖旎；
你富饶的地层下——
宝藏无比丰厚。
你泥土的养料，
赋予我们勤劳朴素的美德；
你江河的乳浆，
给了我们精壮饱满的血肉。

你是养育我们民族的摇篮呵，
你是我们心上的绿洲，
世世代代，我们在你的怀中
探求，献身，春种，秋收。
我们为你的俊容而自豪，
更把深深的爱倾注给你呵
——我们的多娇江山，
——我们的华夏神州！^①

被周恩来安排住在颐和园里，曾致诗毛泽东“倘遣名园长属我，躬耕原不恋吴江”，向毛泽东讨要颐和园做私家大宅院，遭毛泽东以“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开导的柳亚子，填了一首《浣溪沙》，送呈毛泽东。

白鸽连翩奋舞前，
工农大众力无边。
推翻原子更金圆。

战贩集团仇美帝，

^① 引自宋强、乔边《人民记忆五十年》，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和平堡垒拥苏联，
天安门上万红妍。

毛泽东随即和了一首。

颜闾齐王各命前，
多年矛盾廓无边，
而今一扫纪新元。

最喜诗人高唱至，
正和前线捷音联，
妙香山上战旗妍。

毛泽东填罢词章，遂对朝鲜战局作出进一步筹划，给彭德怀等前方指挥员去了一电：

彭邓朴^①洪并高贺：

大体上可以确定平壤敌人正在撤退，其主力似已撤到平壤至“三八线”之间，其后卫似尚在平壤以北及东北地区。你们应于明5日派一个师或一个师的主力，向平壤前进，相机占领。

毛泽东

12月4日23时半

12月5日凌晨，毛泽东又为新华社起草了关于《朝鲜人民军和我志愿军正向平壤进攻》的新闻，并批示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此件请即刻广播，并于5日见报。”

前线的志愿军还没动手哩，国内的报纸已经把消息登出去了。

这既表明毛泽东对志愿军的下一步作战行动充满信心，恐怕也还有一点“鞭打快牛”的意思。

彭德怀看完电报当即决定，指定第39军为全军前锋，分三路向南推进，试探敌之企图，然后相机攻占平壤。

^① 朴即中朝联军司令部的副政委朴一禹。

12月6日，朝鲜北部，漫山遍野风雪弥漫，由90%的志愿军和10%的人民军组成的中朝联军迎着寒风大雪，冒着美军飞机的轰炸和骚扰，忍饥挨冻，咬紧牙关，奋力尾追溃逃之敌。

39军吴信泉军长命令116师作为全军前卫，向平壤攻击前进。该师师长，正是笔者在前面浓墨重彩写到的志愿军大帅哥汪洋将军。

就在白善焯率南韩军第1师退出平壤，渡过大同江向南撤退时，他的老对手汪洋带着116师从北面舍人场方向，进入了平壤市区。

笔者曾经强调，汪洋不单是员武将，还是个玉树临风、才华横溢的大才子。长得眉清目秀的汪洋将军满腹华章，难得的是还弹得一手好钢琴。他读过师范学校，也入过延安陕公和抗大，1937年从抗大毕业，17岁的汪洋被分配到115师344旅689团，先当排长、连长，后来被团长韩先楚慧眼相中，打仗时就把汪洋调到身边当见习参谋，不打仗时又放他回去当连长。一年多时间，调了几个来回，不单汪洋纳闷，其他同志也有议论。解放后韩先楚才对汪洋道出原因：“我那么做，是怕你被打死了，在我眼睛里啊，你是个少有的大知识分子，宝贝疙瘩嘛！”

就这样历练了几年，汪洋23岁的时候，就已经成为新四军4师10旅一支队独立2团的团长了。平津战役结束后，汪洋任东北军区警卫师师长，曾负责毛泽东访问苏联时铁路沿线的警卫任务。他这个师被东总评价为“东北部队中之头等主力师”，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9军116师。按照军功和资历，那个时候的师长几乎是清一色的老红军，所以1949年29岁的汪洋担任师长时，应该是中国军队中最年轻的师长。

说起这116师，也很不简单，它是当年刘志丹在陕北创建的红26军发展壮大起来的，抗战初期是林彪115师下属344旅的主力部队之一。1937年9月25日参加115师首战平型关，打破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13年之后又是这支部队，由汪洋率领在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朝鲜战场上，首次与美军交手便旗开得胜，打败了由华盛顿创建的美国常胜师、百年不曾尝过败绩的骑兵第1师，同时也戳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汪洋个人辉煌的军事生涯，正是在朝鲜战场上大放异彩的。

志愿军发起攻击的第一天下午，116师便率先进入了平壤。

同日，毛泽东再次为新华社撰写了《平壤解放》的新闻。

这则新闻立刻向国内外广播，并于12月7日登载于全国的各家报纸上。新闻全文如下：

（新华社6日电）本社记者从朝鲜前线报道：朝鲜人民军和我国人民志愿军本日解放平壤。

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侵略军以及李承晚匪军残部，向平壤以南溃退。

朝鲜人民军和人民志愿军的正规部队，于12月6日下午2时进入平壤城。

自朝鲜战争爆发以来，美国的大多数盟友一面在投票时老实实在地与美国保持一致，一面又小心翼翼地支持联合国邀请中国的特使，参加联合国会议。

英国人不但规劝美国人在鸭绿江南岸建立缓冲区，以示无意威胁中国东北，孰促美军放弃台湾，甚至还在私下里同中共举行了谈判。就这样，由于西欧人不露声色的拆台，美国人终于再也无法在联合国堵住新中国的嘴巴了。

1950年11月28日，朝鲜前线东西两大战场激战正酣，以世界超级军事强国美国领衔的“联合国军”节节败退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派出的特使伍修权将军出现在联合国的讲坛上——中美两国除了在朝鲜战场打得死去活来，此刻又在联合国的会议大厅摆开战场，兵戎相见。

王树增在《远东朝鲜战争》一书中说过一句相当精彩的话：“如果说中国人在暗无天日的殖民主义时代学到了什么的话，那便是：拳头是最好的外交。”

当轮到伍修权将军发言时，他掷地有声地质问这个对中国人明显不公的世界：“各位代表先生，能不能设想，因为西班牙内战，意大利就有权利占领法国的科西嘉？能不能设想，因为墨西哥内战，英国就有权利占领美国的佛罗里达？显然，这是毫无道理的，不能设想的。那么同样的道理，请问是谁破坏了太平洋地区的和平？是中国军队入侵了夏威夷，还是美国军队入侵了朝鲜和中国台湾？”

伍将军继续有力说道：“我现在带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我代表全中国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民，在这里控诉美国政府武装侵略中国的领土台湾，是非法的和犯罪的行为！”



中国将军宣告：“只准帝国主义侵略，不准人民反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打败敢于侵略中国的一切帝国主义者！”

面对西方列强，中国人什么时候可以用这样的神态、语气，痛快淋漓地说出自己想说的话？

拿毛泽东的话来讲，“伍修权是大闹天宫去了”。

伍修权将军身后是正在朝鲜苦斗恶战，打得“联合国军”满地找牙，一路南逃的数十万志愿军将士，故而他的声音才如此响遏行云，声震寰宇。

“这也是红色新中国在世界外交舞台上的首次登台亮相，第一次发出自己的声音。而在那之前，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都对这个崛起于黄土高坡的红色新政权视而不见。如果他们能多少正视一下中国人民对于尊严的渴望，他们还会在朝鲜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刺激中国吗？直到毛泽东抡起‘金箍棒’，把朝鲜战场搅了个天翻地覆，西方政客们才不得不正视这个崭新国家的力量与决心”。^①

这次联合国大会上出现了两个重要的提案，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美国侵略台湾案”，一个是美国提出的“中国侵略朝鲜案”。

11月30日，针对中国的提案，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沃伦·奥斯汀向英法两国代表建议，应该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一项措辞更加严厉的谴责中国侵略的决议案。

英法两国对此反应比较谨慎。他们并不乐意提出一项让联合国卷入与中国的直接对抗，而可能使欧洲受到苏联进攻的决议案。

一些亚洲和拉美国家也表示，公众舆论不会支持与共产党中国打一场战争。

美国正在面临危险的孤立局面。

同一天，詹姆斯·赖斯特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说：“毫无疑问，由于过去几天事态的发展，人们，甚至国会，对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信心都已严重动摇了。同样毫无疑问，由于杜鲁门总统接受了麦克阿瑟胆大妄为的进攻计划，美国在西方世界的领导地位，已

^① 引自王树增《远东：朝鲜战争》，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经受到了严重损害。”

当时，印度等友好国家对中国的处境十分关注和同情，力图缓冲和调停这一紧张局势。11月28日伍修权将军率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发表了引起轰动的演说后，12月7日，以印度为首的13个亚非国家即提议停火。

但此时的毛泽东，已经不以恢复北朝鲜为目的了。他的想法很清楚：趁热打铁，把“联合国军”彻底赶出整个朝鲜半岛！

这一宏大的战略构想，在他于1951年1月19日的批示中便已毫不含糊地表明了：“我军必须按照新的情况进行各项准备，采取新的战术，以求解放全朝鲜。”

于是，12月21日，中国拒绝了联合国的停火议案，其理由是：“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一切联合国行动，均是非法的。”

12月23日，周恩来致电13国集团，明确拒绝了印度等13个中立国家的斡旋。电文亦由北京电台播放。

周恩来在电文中开列了中国军队在朝鲜停火的五项条件，第一条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必须取得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并且严厉指责美国的行动，声称由于“联合国军”入侵北朝鲜，“三八线”已不复存在。他宣称除非就外国军队撤离朝鲜、朝鲜事务“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美国侵略军从台湾撤走”也达成一项协议，否则中国将不会考虑停火。

停火条件的第一条不是关于朝鲜，也不是关于台湾，而是关于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国”的权益和地位。

直到此时，美国人才终于明白了，拿破仑眼里的那头东方睡狮，伸伸懒腰，打了个呵欠，这回是真的醒过来了。

12月23日是朝鲜战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除了因为毛泽东决定把战争继续打下去，以迫使美国放弃台湾，同意中国加入联合国。还有另一个原因，即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官沃尔顿·沃克中将在这一天因车祸遇难。

于是，一个比沃克更加难以对付的对手——李奇微将军——出现在了彭德怀的视线之中。



2. 老兵凋谢

毛泽东在决定出兵朝鲜时，就已经明确地设定了气魄宏大的战略方针，“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而且必须速战速决”。

毛泽东以其与国民党军队作战的丰富经验乐观地认定，中国军队一个战役即可消灭美军几万人。当得知苏联空军要在两个半月以后才能出动的消息后，毛泽东也只是调整了入朝作战的部署，即“出而不战”，尽量先与南韩军作战，或者在平壤至元山以北山区组织防御，争取时间装备训练，然后等候苏联空军到来后，再放开手脚和美国人大打。“在6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即在“空中和地面均对敌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击平壤、元山等处”。

当战场的实际情况不允许中国部队“出而不战”或“阻击待援”时，毛泽东和彭德怀确定了以运动战消灭敌军的策略。在列举了不应准备进攻的平壤、元山、汉城、大丘和釜山等城市后，毛泽东紧接着便指出：“（待）我飞机大炮的条件满足之后，再把这些城市逐一打开。”

尽管毛泽东这时提到了一个与后来战争命运攸关的问题，即“迫使”美国与中国进行外交谈判的可能性，但他对这种前景并没有寄予多大的期望。在毛泽东看来，美国政策的改变，只会出现在几个美国整师被歼灭之后。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战略方针，是中国军力所远不能及的。

当中国军队进行了两次成功的运动战以后，不仅莫斯科和平壤受到极大鼓舞，要求毛泽东按照其既定战略方针继续打下去，就连毛泽东本人也产生了过于乐观的情绪，尤其是吴信泉的39军在云山“打韩军打出个美军来”，而且首战告捷，使他毫不怀疑其战略方针的正确性。

然而，恰恰在这时，现实环境和客观条件表明毛泽东设定的战略方针是难以执行的。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美国人在国际政治中的最大障碍，就在于不能够将社会革命和激进民族主义同苏联的扩张区分开来。也正因为如此，美国人眼里的朝鲜战争，就完全变成了冷战当中，苏联对美国的一次直接的战略挑战。

美国在朝鲜半岛上其实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战略利益，从某种角度来说，美国在朝鲜参战的首要目标，就是要向全世界证明，自己不惜采用军事手段来对抗对手的扩张。

然而当一场原本唾手可得的胜利，被突然出现的中国人夺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跨过鸭绿江仅一个多月就挺进三四百公里，一直把“联合国军”打回到了“三八线”以南。仅仅一个第二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便歼灭了“联合国军”36000余人，其中美军24000余人，收复了“三八线”以北的全部领土。

“联合国军”的大溃败，让措手不及的美国朝野大为震惊。就这样，在这场大棋局当中，原本主动出击，想要把战略缓冲区推进到朝中、朝苏边境的美国人，却拱手把主动权交到了中国人手里。

于是，全世界都在屏息凝视，毛泽东的下一步棋将会怎么走？

在几年后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坦率地总结道：“我们革命成功的时候，斯大林说它是假的，我们不与他争论。当我们一开始抗美援朝战争，我们的革命，才变成真的了。”

从这一意义上讲，让中美两国兵戎相见的朝鲜战争，也为中国赢得苏联的信任提供了契机。

将这场战争继续打下去，把一半以上的美军地面力量拖在远东，这十分符合以中苏联盟为基础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利益。

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后，两战皆捷，全世界舆论一片哗然，中国的国威、军威如日中天！

布莱德雷称：“朝鲜战争出乎预料地一下子从胜利变成了丢脸的失败——我军历史上最可耻的一次失败。”

美国著名军事评论家米德尔顿则撰文称：“无论就军事还是政治而言，中国人都是胜利者。中国军队达到了出奇制胜的目的。在政治上，这次胜利确定了中国在亚洲大陆上的主要军事强国的地位，因而增强了北京在整个地区的影响。”

当时彭德怀认为美国不可能退出朝鲜，志愿军也不可能把美国赶出朝鲜；且志愿军伤亡惨重。特别是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后勤损失，惨不忍睹，汽车也严重损失，补给困难。因为武器太差，志愿军用子弹怎么能打透人家的装甲车呢？运输线整个被美国飞机轰炸切断后，弹药、粮食上不来，吃，吃不上；喝，喝不上；大批伤病员下不



去；大量的兵员也无法得到补充。到了寒冬腊月，冬装也跟不上。所以彭德怀的意见是：这个仗再也不能照这副样子打下去了，无论如何部队都要休整！

12月8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建议“不能给敌以歼灭性打击，即使能够越过‘三八线’或取得汉城，也不宜这样做”。

因为12月下旬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确定的国策是：“最大的危险仍在欧洲。美国必须在那里部署大量军事力量，并鼓励北约盟国也采取同样的做法。美国决不可陷入亚洲一场持久战，消耗掉原应部署在欧洲的军事力量。这很可能正是克里姆林宫所希望的。”并命令：“把战争限制在朝鲜；保持对空海力量的限制；不再向朝鲜派遣任何增援部队，尽可能稳住‘三八线’附近的战线，然后寻求停火，达成停火协议，使朝鲜恢复到1950年6月25日前的状况。如果顶不住，就撤出第8集团军去保卫日本。”^①

这道命令清楚地表明，美国政府实实在在不想再和中国人继续打下去了！

眼看美国兵就要被中国人追着屁股往大海里跳了，这在西方世界掀起了一股不可名状的惊慌。盟国领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质问杜鲁门：“请对我们说实话，联合国军是不是打不下去了？为什么还不撤离那个该死的远东半岛！”

然而此时让杜鲁门忍无可忍的堵心事正接踵而来，面临朝鲜战场上的严重挫败，美国究竟该怎么办？几乎所有的人都有点不知所措，只有远在东京的麦克阿瑟强作镇定地给华盛顿发来一封电报。

他在电文中一如既往地强调：“如果不给我们更多的部队，或者把战火烧到中国本土，既要守住朝鲜，又要保卫日本，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力量。”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高官们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因为麦克阿瑟明明知道斯大林的20000辆坦克还摆在欧洲，如果美国在此时陷入与中国的全面战争，就等于是落入了斯大林精心编织的一个巨大陷阱。

后来他们才意识到麦克阿瑟的这封电报是“留给后人看的”——言下之意是一旦战败，本帅概不负责。

这是赤裸裸的抽梯子！

^① 引自（美）贝文·亚历山大《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从五角大楼到白宫，所有人都被麦克阿瑟抽了梯子——尤其是杜鲁门。

怒不可遏的整个华盛顿官场都在咬牙切齿地问：“这个该死的老头，到底是反共的老英雄，还是通敌的老间谍？”

1950年12月29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麦克阿瑟一个秘密指示，要求他准备战线一旦不保，务必将部队安全撤出朝鲜。

1951年1月13日，尽管中国军队在第三次战役中一举占领了汉城并推进到37度线，杜鲁门依然亲笔写信给麦克阿瑟，强调上述命令，甚至撤到济州岛，也不打算再往远东增兵了。

这使麦克阿瑟极为愤怒，他最终因坚决地反对总统的命令，要求把战争扩大到中国本土而下台。

麦克阿瑟亲手毁了自己的地位，这似乎让人难以置信。可事实上，他却正是这么做的。

从深层次究其原因，只能说他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但离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所具备的综合条件太过遥远。

麦克阿瑟明白美国正在设法谋求停火，并努力探寻同盟国的意见。美国总统正打算通过电台传递给中共一个信息，主动提出和平与一项和解措施——结束战争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

参谋长联席会议于3月20日向麦克阿瑟再次强调了总统的意见。

三天后，麦克阿瑟将军在不向美国任何人打招呼的情况下，擅自发表了一项声明。这是有史以来，一位战区司令官蔑视上级指令，违抗他所效忠的国家的既定政策的最露骨的一种行为。

麦克阿瑟的声明是在远东时间3月24日公布于众的。

声明中，他除了篡夺本应属于美国总统的大权外，还使用傲慢和轻蔑的字眼来贬低中国人，“如果红色中国不求和，战争将会继续扩大”。

他的话在北京看来，不啻是最后通牒。

麦克阿瑟在声明中宣称：“即使现在联合国部队的行动受到种种限制，红色中国也因此获得了相应的军事优势，但事实证明红色中国完全没有能力以武力来征服朝鲜。”他转而又指出：“根本问题实质上仍然是政治问题，因此，必须在外交领域里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他接着说：“因此，敌人现在必定已痛切地认识到：一旦联合国



决定改变其宽容的态度，不把战争局限在朝鲜地区，而把军事行动扩大到中国沿海地区及其内陆基地，那么红色中国注定会在军事上面临迅速崩溃的危险……”

尽管麦克阿瑟矢口否认自己曾有意提出一项国家政策，但证据确凿，难以抵赖。他是在为扩大对中国的战争进行辩护。他知道杜鲁门政府反对扩大战争，而且看到总统新的倡议会将那扇大门轰然关上。他在获悉总统计划的几天之后，便悍然向中国发出了最后通牒。

这显然不是巧合，而是有意为之。

麦克阿瑟3月24日擅自发表的声明实际上是一位战区司令官令人难以置信的犯上行为。正如杜鲁门后来所写的那样：“政府曾三令五申不得就外交政策自行发表任何声明，这是一种完全无视命令的行为，这是在公然违抗我作为总统和总司令下达的命令……”

杜鲁门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指示麦克阿瑟遵守总统有关发布声明的指令。

参谋长联席会议也向麦克阿瑟发出了以下重要电报：“总统指示你应注意他在1950年12月6日下达的命令。考虑到1951年3月20日向你发出的指令，你今后发表的任何声明都不得违背12月6日命令的内容。总统还指示，如果中共军领导人在战场上要求停战，你应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听候指示。”

可是，麦克阿瑟却根本没有把华盛顿放在眼里，接下来，他开始公开挑战并试图改变美国的国家政策。

贝文·亚历山大在《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中写道：

就在1951年3月15日麦克阿瑟越权发表声明之后不久，即3月20日，他又在给众议院中少数派（共和党）领袖小约瑟·W·马丁的复信中再放厥词。

马丁在3月8日致函麦克阿瑟将军，希望他能够支持自己有关在战争中使用中国国民党军队的观点。在此之前，麦克阿瑟也曾多次向杜鲁门政府提出同样要求，但均遭到拒绝，而且每次政府都向他解释，利用蒋介石的部队会引发政治问题。

然而麦克阿瑟在复信中不但表示同意马丁的看法，而且再次提出他那众人皆知的论点，即杜鲁门政府的政策是以牺牲亚洲来偏爱欧洲。

在复信中，他批评有限战争的战略，并用那句“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胜利”的话来作信的结尾。

这句话经他反复使用，已理所当然地在公众心目中成了麦克阿瑟本人的代名词。

到了1962年，麦克阿瑟又将这番话讲给了西点军校的毕业生听：“你们的使命依然是固定不变，明确而又神圣的，那就是打赢我们的战争……必胜的信念，要切实认识到，战争中只有胜利，任何东西都不可代替胜利。”

麦克阿瑟就是这样表现他自己的战争理念的，即战争要打到底，要打到全面胜利，要打到敌人无条件投降。这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观截然相反。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国家政治目标的延伸，只有为国家的利益，才有必要继续进行战争。因此，麦克阿瑟要把战争打到底的观念只会有悖于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国家政策。朝鲜战争显然是为有限的国家目标而进行的，而不是要美国卷入一场与中国为敌的、结果难以预测的全面战争。

一位战区司令官竟给众议院中的反对党领袖写出这样的回信，简直令人难以置信。麦克阿瑟对美国保护台湾和支持中国国民党这个远东最具爆炸性的政治问题大发议论，这无疑将自己置于杜鲁门政府的反对派手中。

麦克阿瑟应该会对马丁后来的行为感到吃惊。

4月5日，马丁在众议院宣读了麦克阿瑟的复信，这无异于向公众宣布麦克阿瑟反对政府的政策，这样，麦克阿瑟在这场争执中的立场便首次被公布于众。麦克阿瑟要求扩大在亚洲的战争，而种种迹象表明，共和党人，尤其名义上是孤立主义者的共和党人，为了攻击杜鲁门和艾奇逊，正在利用麦克阿瑟。

于是，再也无法容忍的杜鲁门施出了重手。

1951年4月11日午夜刚过，华盛顿的各大新闻单位突然电话铃声大作。白宫新闻处告诉他们将于凌晨1时举行一个“特别的记者招待会”。

来到白宫的记者们满腹狐疑，纷纷猜测会有什么重大事件发生。有人认为是和苏联发生了武装冲突，有的猜测是总统得了什么急病。

1时整，白宫新闻秘书肖特发给记者每人一大叠文件——第一份



文件便是杜鲁门总统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声明，上面写着：

我深感遗憾地宣布，陆军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有关正式职守的问题上不能全心全意地支持美国政府的政策和联合国的政策。根据美国宪法赋予我的特殊责任，以及联合国特别委托我的责任，我已决定更换远东统帅。

因此，我免去麦克阿瑟的各项指挥权，并已任命马修·李奇微中将接替他的职务。

记者们还拿到了另一份文件——杜鲁门致麦克阿瑟将军的一份电报原文：

总统致东京麦克阿瑟将军：

作为总统和美国三军总司令，我有责任撤换你盟国最高统帅、联合国军总司令、远东总司令、美国驻远东陆军司令官等职，对此深感遗憾。

你应将所任各职移交马修·李奇微中将，立即生效。你有权下达为前往你所选择的地方所需下达的命令。

撤换理由将在上述电文送交你时，同时公布。

此消息一经公布，立即引起舆论大哗。

麦克阿瑟回到美国后，在华盛顿受到了万人空巷的英雄式欢迎。据纽约警方的估计，那天为欢迎麦克阿瑟而抛撒的五彩纸屑总计2850吨，整个纽约市“仿佛经历了一场暴风雪的袭击”，许多大城市都爆发了支持麦克阿瑟，反对杜鲁门的游行示威活动。

1951年4月19日，麦克阿瑟在国会大厦发表了题为《老兵永远不死》的著名演讲。

1962年5月2日，82岁高龄的麦克阿瑟回到母校——西点军校，接受军校最高奖励——西尔维纳斯·塞耶荣誉勋章。

在授勋仪式上，他即兴发表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也是最感人的一次演讲《责任—荣誉—国家》：“……我的生命已近黄昏，暮色已经降临。我过去的音调和色彩已经消失，它们已经随着往事的梦境模糊地溜走了。往日的回忆是非常美好的，是以泪水洗涤，

以昨天的微笑来抚慰的。我渴望但徒然地聆听着远处那微弱而迷人的起床号声和那‘咚咚’作响的军鼓声。在梦境里，我又听到‘隆隆’的炮声，‘噼啪’的步枪射击声，战场上古怪而悲伤的低语声。然而，在我黄昏的记忆中，我总是来到西点，耳边始终回响着：责任—荣誉—国家。”

1964年4月5日，美国人心中的传奇英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沃尔特·里德陆军医院（美国陆军医疗中心）悄然去世，享年84岁。

而令中国人深感遗憾的是，这位美国老人至死也没有弄清楚打败他这一生最大的敌人并非《麦克阿瑟传》中的中国湖北人林彪，而是一位中国湖南人彭德怀。

随着麦克阿瑟的黯然离去，李奇微取而代之，朝鲜战争也因此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3. 过不过“三八线”是政治问题

志愿军两战两捷，把“联合国军”赶回到“三八线”以南，双方形成对峙以后，中国政府以强硬的姿态拒绝了以印度为首的13个中立国家所提出的先停火后谈判的提案。

周恩来严厉质问：“美军打过‘三八线’的时候，13国怎么不说话？”

周恩来的回答明确传递着威慑的信号——言下之意，志愿军是绝对不会在这个节骨眼上给美国兵以喘息之机的。从“联合国军”跨过“三八线”，向着北朝鲜平推迈进的那一刻起，这条人为的界线，在中国人的眼中就已经不存在了。如果不立即接受中方提出的停火条件，中国政府就决心把这场战争进行到底。

美国政客们对毛泽东态度的理解是：要么投降，要么战争。

美国人说对了，的确如此，当下毛泽东考虑的是现在的局势和仁川登陆之后已经完全颠倒过来了，不是麦克阿瑟打到鸭绿江让官兵回家过什么感恩节、圣诞节的问题，而是他要把“联合国军”赶下太平



洋的问题。

而作为前线总指挥，彭德怀远没有毛泽东那样乐观豪放，他看到，经过两次战役后，部队疲惫不堪，病员增加，没有冬装，弹药和粮食也接济不上。因此，才有了他12月8日的电报中向毛泽东提出的“不过‘三八线’、部队‘过冬休息’”的建议。

聂荣臻接到彭德怀的电报后，也认为部队亟须休整补充，况且在一线兵力上，中国军队也不占绝对优势，因此向毛泽东建议推迟两个月，再发动下一次战役。

但是，就在彭德怀发出电报的同一天，金日成发表了告全国人民书，号召“向祖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总进军”，把“美国武装侵犯者和李承晚卖国匪帮送进坟墓”。

斯大林也给毛泽东发来电报，对志愿军取得的战果表示钦佩，并要求中国“继续进攻”。

12月4日，王稼祥大使回国前问葛罗米柯：“从政治角度看，中国军队在成功地继续进攻的情况下，是否应当越过‘三八线’？”

葛罗米柯回答：“鉴于当前朝鲜的形势，我们认为提出‘趁热打铁’这句古老的谚语，是十分恰当的。”

而刚刚接替什特科夫担任苏联驻朝大使的拉祖瓦耶夫于12月19日，居然当面指责彭德怀未立即发起新的进攻，延误了战机，气得脾气火爆的彭德怀，拍着桌子和他大吵了一架。

斯大林此时当然是极力主张把美国从朝鲜半岛上赶出去，他为了鼓励彭德怀打消停火休整的建议，继续发起进攻，主动提出再为志愿军提供2000辆卡车。

这时，联合国及印度、英国、法国、瑞典等国代表不断探询中国接受停战的条件。

为了掌握主动，周恩来请示莫斯科，准备以书面方式，递交中国政府拟定的五项停火条件。

苏联政府立即回电，建议中国暂不要提出这些条件，而等美国和联合国首先提出条件。

斯大林甚至起草了中国应该如何回答这一问题的具体表述方法，他明确指出：“目前的停火建议，多半只是美国政府因美军的失败而采取的缓兵之计。在解放汉城之后，再考虑停火问题。”

于是，北京确定对停火谈判采取“敌急我不急”的方针。

在这种背景下，一直站在国际政治的高度看待朝鲜战争问题的毛泽东，当然不可能赞同彭德怀暂停进攻的主张。

他复电彭德怀，第一句便否定了彭的意见，“请不要提出过冬休息的口号”，并命令彭立即发起第三次战役，迅速突破“三八线”。

“此次作战规模很大，东西两线各军可能伤亡4万人，请高岗同志加速对新兵的征集训练工作，争取于12月中旬有几万新兵补入”。

毛泽东还电告彭德怀，“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①

彭德怀看完毛泽东发给他的电报，顿时眉头紧锁。作为志愿军统帅，他太知道他的部队如今是怎样一副状况，眼下几十万志愿军迫在眉睫的不是继续进攻，而是抓紧时间休整补充。

彭德怀深感不安，没有人比他更清楚残酷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当全军沿临津江与敌人形成全线对峙态势以后，彭德怀的意见是志愿军急需休整3个月以上，并于12月8日致电毛泽东，明确提出建议，“拟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停止，让敌占‘三八线’，以便明年再战歼灭敌主力。”

日后有学者算过这样一笔账，认为假如中国政府在此时宣布志愿军不跨过“三八线”，双方在这场战争中的伤亡都会大为减少，朝鲜战争有可能就到此为止了。

如果朝鲜战争仅仅是一场孤立的局部冲突，这种充满了善意的看法或许不无道理，但是，在几位大国领袖的眼中，发生在远东这个蕞尔小国的战争，就远没有那么单纯了。毛泽东要求彭德怀打过“三八线”的理由，绝不只是一个乘胜追击可以解释的。

可以看出，毛泽东不理睬彭德怀反映上来的志愿军面临的种种困难，命令他越过“三八线”，多少是迫于苏联和朝鲜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压力。

所以，不少学者认为正是毛泽东这种非要消灭或至少要将“联合国军”全部驱逐出朝鲜半岛的心态，使中国坐失了以胜利者结束朝鲜战争的一次极其有利的机会。

^① 以上电文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其实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斯大林在竭力鼓动中国继续打下去，毛泽东即便想鸣金收兵，也是不可能的。

有关社会主义阵营的大事，还必须得斯大林同志拿主意。

至于中国的事情，当然是毛泽东说了算。

1951年6月16日，在华军事顾问科切尔金少将给苏军总参作战部长的报告中，谈到了中国志愿军的指挥系统存在的问题，“尽管形式上有总参谋部，但至今它没有找到自己的恰当位置，在领导武装力量和军事行动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实际上对彭德怀给予什么指示的，只有毛泽东同志一人”。

彭德怀坐在松木做成的长条凳上，沉默良久，然后苦笑着说了一句：“我们的伟大导师，已经被胜利陶醉了。”

军事上不允许打，但政治又不能不打，内心饱受煎熬的彭德怀，头脑仍然是清醒的，他虽于19日致电毛泽东：“得13日复电后现已遵示越‘三八线’作战”。可是，却并无具体行动。

12月22日中国拒绝了印度等13国提出的停火提案。经几次往来电报应答，直至12月28日20时的电报中，彭德怀还说：“在部队中动员，强调越过‘三八线’的政治意义，还须作一番解释。”

这是在向毛泽东委婉地表达出自己的不同看法了。

毛泽东29日复电再次强调越过“三八线”，并批评彭德怀，“从12月初起，整个冬季我军都在休整，没有动作”。

而金日成呢？甚至向斯大林告状，责怪彭德怀“按兵不动”。

彭德怀别无选择，只能命令志愿军大举越过“三八线”，继续向南推进。

在毛泽东的主导和坚持下，一度平静的前线到1950年12月下旬发生了变化，美国人发现中国志愿军有准备南下的迹象，防守中部战线正面及中东部战线的南韩军第8师和第9师最先遭到了重击。

偏偏祸不单行，就在这要命的时候，又突然传来沃克将军因车祸殉职的消息。

12月23日，沃克去美军第24师看望于前一天获得银星勋章的儿子——山姆·沃克上尉，然后为准备李承晚总统对部队的视察而驱车前往议政府北部的英国旅。沃克平时酷爱开快车，这次也不例外，他的车在超速行驶中与韩军第6师的一辆大卡车相撞，还没来得及送到

医院，就停止了呼吸。

沃克将军死后，美军派陆军副参谋长李奇微中将来韩就任第8集团军司令。

马修·李奇微，二战后再再升起的军界新星，登上过《时代周刊》杂志的封面。

朝鲜战争伊始，时任美国陆军参谋长助理的李奇微就主管朝鲜作战事宜，那片遥远的土地上的几乎每一个地名，他都耳熟能详。

1950年12月25日，时年56岁的李奇微接到命令，接替沃克第8集团军司令官的职务，当晚启程。这位以治军严谨、战术机敏著称的将领，简单收拾行囊，并写下遗嘱，带上一张与妻儿的合影，在圣诞之夜登上了飞往远东的飞机。

中国军史专家齐德学少将评价李奇微是“朝鲜战争期间三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当中，军事指挥才能最强的一位美国将军。他既不同于前任麦克阿瑟的骄狂，也不同于后任克拉克的谨小慎微，甚至是无所作为。李奇微是一位既会治军，也会打仗的美国将军”。

多年以后，在李奇微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席话：“我将面临的问题是我在军校学过的，和我所经历过的战争不大一样，这不是程度上的差别，而是性质的基本不同。敌人在战斗力上占优势，而且擅长朝鲜的山地作战和夜间作战。战局是险恶的，如果教官现在问我应该怎么办，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李奇微将军眼中的朝鲜半岛笼罩在湿漉漉的雨云之下，战局也如同这天气一样令人绝望。第8集团军刚刚创造了美国陆军史上距离最长的撤退纪录，面对300多公里长的“三八线”，惊魂未定的“联合国军”能布防在一线的部队少得可怜，某些步兵排三五十人的防御阵地，竟然宽达一公里。

但这条两面透风的防线还不是李奇微最棘手的麻烦，第8集团军在中国军队的打击下，从精神到肉体全都垮掉了，陷入了一种走投无路的鸵鸟把脑袋塞进沙子里一样的心态。

当他赶到一个前沿指挥所里，要求向共军阵地炮击的时候，所有人都尽可能躲闪着这位司令官的一双慑人的鹰眼——因为，魂不守舍的美国大兵哥，根本不知道中国人此时已经打到了哪里。

南朝鲜军队依旧是看上去漫无目的的，其实却是轻车熟路地向南溃逃。12月21日，韩国政府实行了《国民防卫军设置法》，征召所



有17岁至40岁的男人参战，军官们发疯似的抓捕连枪也拿不稳的壮丁了。而那个倔强的李老头，这会儿只会情绪激动地嚷嚷着要治中国人的罪。

在朝鲜作战的高级军官多数都是李奇微的老朋友和老部下，但他仍然在上任后的3天之内，眼都不眨地一口气撸掉了7个师长中的3个。一时间乌纱飞舞，三军肃然。

他站在弹药箱上，毫不留情地羞辱第8集团军的将校们。“如果我们美国步兵的老祖宗们看到第8集团军被道路缠住脚，经常忘记占据路边的制高点，既不能和前线阵地保持联络，也不了解地形，他们准会气得在坟墓里打滚儿。”

他要求所有指挥官的位置，都必须是在敌我枪弹交错的地方，任何一个不身先士卒的指挥员，都会被他撤职并一脚踹过太平洋。

和麦克阿瑟一样，李奇微也知道神话的力量，并且擅长创造关于自己的神话。出现在朝鲜战场上的集团军司令官穿着伞兵作战服，一副风尘仆仆的模样，胸前总是挂着一颗甜瓜型手雷和一个急救包，尽管谁也不会真的指望自己的司令官亲自跑到前沿阵地朝中国人扔手雷，但发出的信息很明确，他们的司令官是永远冲前面的勇士。

李奇微在回忆录中写道：“赴任前麦克阿瑟将军曾对我说，当务之急是整合现有的兵力，尽最大可能地守住北部防线，以保全韩国。但我通过了解发现，他们已经丧失了军人应有的胆魄、勇气和战斗精神。”

胜利一次对李奇微来说太重要了，但是，那得先找准对手的软肋才行。

4. 血涌大江

20多年前曾驻守中国的李奇微，并不了解自己所要对付的敌人。美国情报部门递交的报告里，仍然坚称对方的指挥官叫林彪——他当然也和自己的顶头上司麦克阿瑟一样坚信不疑——中国人的空军是

零，坦克是零，连炮兵也只是零零星星若隐若现……这些中国人是怎么单凭着简陋的步兵装备和“人海战术”，就把铁嘴钢牙，把自己武装得像变形金刚似的“联合国军”，打得落荒而逃的呢？

添油加醋的媒体，把中国人渲染得如同从满洲腹地里冲杀出来，并有着无穷无尽力量的不可抵御的游牧部落。

和志愿军数度交过手的美军空降187团的老兵科尔曼日后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对志愿军所谓的“人海战术”的诠释，和总喜欢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人和中国军队的西方人的想象完全不同。

人们常常混淆日本旧军队的“万岁冲锋”和中共军队的“人海战术”，“万岁冲锋”是中世纪式的狂热的集体冲锋，是我们的机枪火力“收获”日本兵时最受欢迎的举动。

中国人在进攻时也用很多人，但中国士兵比日本兵狡猾得多，他们通常都是在黑夜的掩护下，悄无声息地匍匐前进到扔手榴弹的位置，一声哨子响过，便如同下雨一般把手榴弹甩向敌阵，或使用机枪及冲锋枪边扫射边前进，攻下一个掩体后，再有条不紊地攻击下一个掩体。当冲杀在最前边的士兵伤亡，后面就有另一个去接替攻击。如果再伤亡，下一个再去接替，如此下来，就好似有无限的人力，这就是所谓中国式的“人海战术”。

志愿军敢死队长朱克晚年回忆：“前面的人牺牲了，后面代替的人必须赶紧冲上去，那一套战术组织得相当严密。各记各的口号，各记各的位置，各记各的次序，各看各的信号，那是纹丝不乱。至于现在电视上拍的也好，电影拍的也好，我一看见就烦，在那儿冲啊！扯着嗓门喊杀啊！我的个老天，到了真正的战场上，谁听得见哪？我在朝鲜打了那么几年仗，当了两次敢死队队长，从来没见过那样子打仗的。一个个耳朵被震聋，嘴巴鼻子被震得流血，谁听得见喊什么呀？到了冲锋的时候，就是凭眼睛看，那个时候的脑子里啊，就只剩下一个念头，怎么把敌人消灭了，让自己活下来！”

像美国大兵那种打法，志愿军做梦也想啊，可祖国有那么多飞机、大炮、汽车、坦克，有那么多钞票、钢铁给他们吗？

没有！

没有就得靠血肉之躯拼！不拼，怎么能把列强欺负弱国的淫威打



下去？不拼，志愿军不甘屈辱的军威如何打出来？不拼，一百多年来几代中国人被几百个不平等条约压弯了的腰杆，哪辈子才能挺起来？

落后是要挨打，但落后的中国，决不能忍受挨打！

这就是志愿军官兵共同的心声。

这就是形成“人海战术”的最根本的原因。

科尔曼写道：

这种中国式的所谓“人海战术”的真正可怕之处，在于中国人就像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在夜幕的掩护下，你发现自己总是会被他们佯攻、奇袭、穿插、包围和渗透。他们好像对美军炽烈的火网毫不在意似的，第一拨倒下，第二拨就跨过尸体前进，还有第三拨和第四拨继续前进。他们不怕死，坚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的意志，仿佛是些殉教者。美军官兵在惊叹其勇敢的同时，也感到非常害怕。在这种人海般的攻击面前，无论多么强大的部队一旦后路被中国人截断，都会立即陷入军心大乱，惶恐不安。

在刚刚结束的第二次战役中，“联合国军”几乎没有一次顽强的坚守作战。实际上，绝大多数的人员和装备损失，都出现在盲目的突围过程中。在这种精妙的战术指导下，顽强勇敢，不惧牺牲，严守纪律的中国志愿军官兵，毫无疑问是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轻步兵部队。

目光异常敏锐的李奇微很快便发现中国军队的进攻在逐渐放缓，他感到对手好像已经在自己眼前露出了破绽。

可是留给他去寻找这些破绽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李奇微不知道自己下一把会摸到什么牌。当他忧心忡忡地举起望远镜向北眺望时肯定看不到，层层叠叠了无尽头的雪原中，中国士兵已经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开始悄无声息地向着冲击阵地进发。

1950年12月31日，是李奇微到任后的第6天。

第二天起床，如果天气好的话，就有可能看到新一年里一轮崭新的太阳了。

天色刚落黑，美国士兵便钻进了温软的尼龙睡袋里。

而在距离他们并不太远的一个巨大的矿洞里，志愿军的参谋人员

已经拿起了电话，眼睛盯着手腕上的表。

志愿军的最高指挥官彭德怀把目光从地图上移开，摘下老花眼镜，闭上眼睛，在脑海里把战役计划又重新梳理了一遍。开弓没有回头箭，彭德怀沉吟了片刻，随后下达了全线攻击的命令。

在雷霆万钧的隆隆炮声中，大地开始了震颤。

这是中国炮兵在朝鲜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火力最凶猛的一次炮击。尽管火力准备时间只有短短的20分钟，但，这已经是他们竭尽所能的表演了。

密密麻麻的志愿军官兵，蜷缩在大雪中静静地等待着。

进入冲击阵地之前，不多不少，一个战士发给9尺白布，那就是战死后裹尸用的。

每一个战士的口袋里面还缝了巴掌大的一小块白布条，上面写着姓名、籍贯、年龄、单位，还有血型，它就是保证战死以后啊，让组织上知道你是什么地方来的兵，能够准确地把你战死的消息告诉给你的家人。缝白布条时，所有人心里都在想，这东西一缝上，自己这条命，就彻彻底底地交给国家了。人真到了那个地步，也就没什么好害怕的了。因为很简单，就算前面是刀山火海，咱是当兵的，冲锋号一响，就必须往里跳。虽然每个人还活着，心一下子就死了——这里说的心先死了，就是说每个人都齐刷刷做好为国家献身的精神准备了，而绝对没有半点害怕的意思，因为很简单，那个特殊环境下的军人，已经超越了普通人脑海里那条世俗的生死线。

“联合国军”在江南岸又建铁丝网，又抓了好些民工，往又长又陡的江堤上泼了水，冰冻了足足有一尺厚，整条江堤滑溜溜的，坚固得很，他们以为这样一来，中国兵就算是神兵天将也爬不上去，突它不破。

汪洋的116师对面有40个碉堡，志愿军这边每一门大炮对准一个碉堡，炮火一开，马上就把它摧毁了。

过江之前有硬性要求，只准穿棉衣，不准穿棉裤，每个人都得把棉裤脱下来，绑到脖子上，像马拉的那个轭套一样。夜里零下30多度，人能受得了吗？可不这样不行，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冲锋时炮弹溅起的江水溅到棉裤上。棉裤一旦冻着就板了，人就无法跑了。这也是汲取了第二次战役时第9兵团的弟兄们被大面积冻死冻伤的惨痛教训，算是吃一堑，长一智。



当官的要大家牢牢记住，想活命就穿着单裤一直往前冲，一停步就得冻成冰棍。过江以后，再赶快把棉裤穿上，动作慢了也得冻成冰棍。

脱了棉裤，大家站着队，每人发给半小茶缸白酒，不管能喝不能喝，全都得喝。有的“咕嘟咕嘟”几口就下了肚，有的苦着脸，一小口一小口地抿。

当官的还叫大家别喝光了，剩下一点往腿上抹。后来才知道酒是救命的仙药，要没了这宝贝，不知道还要多冻死、冻残多少人。

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排雷兵手持一丈多长的扫雷器提前20分钟就出发了，他们冒着对岸暴雨一样射来的子弹，不顾死活地冲向布满地雷的开阔地。他们只有20分钟，时间一到，不管河滩上的地雷排没排完，后面的大部队都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前去万枪齐发。

所以，每一个排雷兵的脑子里都清清楚楚，他们活下来的机会微乎其微，不是被脚下的地雷炸得粉身碎骨，就是倒在对面的“联合国军”或者是背后战友的乱枪之中。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很难活过自己短短的一生中这最漫长的20分钟。

20分钟后，在步兵冲锋的信号弹腾空而起的瞬间，士兵们争先恐后地从雪地里站起来，奋不顾身地冲进了临津江。

江面上的冰层有一米多厚，大卡车都能开过去，跟平地一样。敌人进行了火力封锁，炮弹往江面上一打就是一个大窟窿，江水“咕嘟咕嘟”不停地往上冒，冒一会儿它就冻住了，像个坟堆一样，江面上一会儿便出现了好多这样的“坟堆”。中国士兵就绕着坟堆跑，彻骨的冻冷让他们立即透不过气来，溅到头发上的江水瞬间就凝结成了冰挂。不断有中弹的士兵被江水冲走，指挥员冒着弹雨，站在齐腰深的冰窟窿里，把掉进窟窿里的士兵一个个推上冰面，已经没有力气的士兵们向着江对岸跌跌撞撞地冲上去，等待着他们的，是地雷、鹿砦、铁丝网，还有陡峭光滑的冰堤，亮如白昼的探照灯，和更加密集的炮火。于是，鲜血就像温水一样地喷涌出来，朝着半空飞溅，天地间就像飘洒着殷红的雨，浓烈的红艳艳的血腥味儿直呛鼻子。

雪下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密，极度的严寒几乎使每一个战士的思维都已经完全麻木，他们只剩下一个念头，那就是趁自己还能动弹之时冲上江堤，占领敌人的阵地。

已经过江的志愿军战士被无数条活着的巨蟒似的探照灯光柱缠住了，那是整个冲锋中最为恐怖最为悲惨的时刻。

中国人的眼睛被强烈的灯光晃花了，看不见敌人在哪里，手里的武器不知往哪儿射击，许多人没有来得及看一眼敌人就倒下了。倒下的不是一个，几个，几十个，而是一大片，一大片，如果不是夜晚而是白天，一定能看见冰冻的江面上犹如泼满了亮旺旺的红油漆。

发起冲锋13分钟后，汪洋的116师首先突破了临津江防线。

那一刻，冥冥之中仿佛有一种神奇巨大、催人奋进的节奏。这种节奏顷刻之间便已灌入了几十万志愿军战士的胸中，与他们的在一起有力地、亢奋地跳跃。

指挥员挥舞着手枪，站在陡峭的冰堤上，向着蜂拥过来的士兵们嘶声大喊：“不能停！停下就没命了！弟兄们快跑，跑，跑快！啥时跑出啥时停！”

过了临津江的战士继续往前跑，没能冲过火线的士兵躺在江面上奄奄一息，喘着粗气，大睁着眼睛，看着鲜血从自己身上的伤口里汩汩而出，像大大小小的蛇一样缓缓爬动，还来不及爬到旁边的冰窟窿里，就冻成了一根根有粗有细，晶莹剔透的血条。

当1951年新年钟声响起的时候，每一秒钟都有中国士兵死去。

仅仅用了一个小时，38军、39军、40军、50军全线突破了临津江。左翼的42军、66军也同样进展顺利。

38万志愿军战士全部突破了“联合国军”的防线，试图用铁锹铲土挡住尼亚加拉大瀑布的李奇微放弃了努力，汉城以东南韩军部队的溃逃，使汉城地区的10余万“联合国军”处于被中朝联军从右翼实施深远包围，在汉城以北背水作战的危局。

激战到第4天，志愿军司令部的无线电侦听部门截听到一个极重要的机密：李奇微不守汉城了，美军要逃跑！

彭德怀立刻命令39军、50军和朝鲜人民军第1军团攻击汉城。

“美国人的炮弹真他娘的多！”仅仅两年前还率部在东北和解放军血战的50军军长曾泽生狠狠骂了一句。

曾泽生相貌威武干练，一看就是个典型的职业军人，虽然加入解放军才短短两年，但已经被人民军队这个大熔炉重新熔铸了一遍。

50军是一支有着特殊背景的部队，对荣誉看得比其他兄弟部队更



重一些事出有因，情有可原。

因为，50军的前身，就是在长春起义的曾泽生将军指挥的国民党陆军第60军。整个儿一锅烩，就是换了个番号，派了一批干部进去加强领导。上上下下，心急火燎的就是渴望着快些打几个胜仗，给自己来不及创造光辉历史的部队挣得些光彩。

曾泽生的部队在改编后补入一批从老部队来的优秀干部、知识分子和工农成分的新兵，战斗力急剧增强，部队面貌焕然一新，随即奉命南下参加入川作战，一路迭立战功。协同兄弟部队，全歼宋希濂部；紧跟着又在成都凤凰山机场俘获蒋介石警卫团3000人，因蒋介石仓皇起飞，无法将其带走，蒋介石登机前下令给每人发了两根金条。该警卫团全部为浙江人，文化程度均系初中毕业以上，每人都是一长一短的美式装备。这3000人被俘后，全部被编入了50军，很快又被拉到东北，跨过了鸭绿江。

1950年9月下旬，根据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刚经过精简整编，剔除了不可靠分子，由5.8万余人锐减至3.3万余人的第50军，紧急收拢分散在湖北、河南执行水利、生产、剿匪等任务的部队，乘火车仓促北上，拨归新成立的东北边防军。

第50军抵达东北后，10月24日晚10点，军政委徐文烈接到东北军区政委高岗的电话，命令第50军即刻乘已经派来的火车，向中朝边境紧急开进。

第一列火车刚到丹东，部队在没有地图，没有翻译，没有作战动员，一切供给全无准备的情况下，又接到上级的命令：立刻过江，参加第一次战役。

实事求是地说，初次出国作战的第50军把仗打得来灰头土脸。由于遭敌阻击、行动迟缓和兵力不集中等原因，部队连续三次扑空，接连错过了歼敌的好机会。

第二次战役结束后，第50军领导赴志司开作战总结会是准备挨骂的。前车之鉴摆在他们面前，早在第一次战役中，第38军执行迂回敌侧后任务时，因对敌空袭顾虑较大、受错误情报影响而贻误战机，军长梁兴初被彭德怀当众骂得抬不起头。

出乎预料，在第二次战役中重蹈覆辙的第50军，并没有受到彭德怀丝毫责备。

不过，不受责备比受责备更难受——因为，第50军是“解放

军”。让曾泽生等以为，彭德怀没有对他们爆粗口，明显是透着客气——而客气，那就证明彭老总没拿他们当自己人。

回来后，50军的作战总结会就像开了锅，指战员们的情绪相当激烈。尤其是调到50军军部的处长科长们，没有几句好话。

“打的什么屁仗？连美国佬的屁毛也没抓到一根，太窝囊了！”

“38军有彭老总1928年平江起义时的老底子，第一次战役没打好，被骂了个狗血淋头！第二次战役穿插三所里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全军通报嘉奖，成了人人羡慕的‘万岁军’！想想吧，彭老总宽容我们这样的‘解放军’，还能是好事？”

“就是啊，根不正苗不红，既然成了‘解放军’，想挨骂都靠不上边！”

听听，连“解放军”在这里都变味了！

只要是老部队来的军官，几乎都提出了“这个部队不能待了，我们要求调回老部队！”

曾泽生的脸一阵红，一阵白。一个令他这一军之长异常痛苦的事实，明明白白地摆在了桌面上：没人瞧得起他这支“解放军”！更没人会从内心尊敬他这个“解放军”的一军之长！

曾泽生铁青着脸，冷不丁从嗓子眼儿里吼出一句火爆爆的牢骚：“这‘解放军’军长老子也不想干了，我马上向毛主席写申请，要求调到38军去当一名伙头兵！”

一言既出，举座皆惊！

曾军长负气要到“根正苗红”的老部队当炊事员不是孤立的现象，由于部队仓促出国参战，思想工作“不摸底”，思想动员没跟上，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一度“陷于停顿”，以至于指战员中“右倾保命、短工帮工思想”相当普遍，“走糊涂路，吃糊涂饭，打糊涂仗，糊里糊涂到朝鲜”之类的怨言，一度流行。

针对存在的问题，第二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党委决定：利用作战间隙，全军上下普遍开展为期一周的思想整顿，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批判右倾思想”，检查“战斗意志和战斗积极性”，总结作战的经验教训。同时，调整了个别“思想右倾”的团以下带兵主官。

经过整顿，思想情绪得以迅速扭转，部队求战热潮空前高涨。

在国民党军队中饱受蒋介石中央嫡系白眼的曾泽生感觉到自己走



对了路子，他现在急于想做的大事，就是尽快用战功来表白自己对共产党的忠诚。

曾泽生一直随队靠前指挥，要求和他一样憋足了劲的指战员：“一定要打个翻身仗！”

就在这样的時候，英国人的一支坦克纵队突然闯到了他们的枪口下，成了他们祭刀的牺牲。

50军的官兵没有辜负军长的信任，第三次战役攻占汉城时，以勇歼英国皇家第29旅重坦克营一役而名垂军史。

在碧蹄里，冲向汉城的50军干净利落地打垮了美军一个营的阻击，除了死的伤的，这个营还能动弹的美军全拔腿开溜，把和他们并肩作战的一支兄弟部队扔下不管了。

50军当即围住被扔下的敌军一阵狠揍，哈，原来是英国人！

英国军队仿佛是为了替他们曾经横行中国大地的前辈们偿债，在朝鲜战场上吃尽了败仗，从来没有打胜过一次。狡猾、缺德的美国人不是叫他们掩护美军撤退当替死鬼，就是叫他们打先锋充炮灰。

这下掩护李奇微逃跑的英军第29旅被50军截住了。虽然大部分英军手脚麻利，在坦克飞机的掩护下逃跑了，但还是有一支分队永远回不了英国——英国军队的一支王牌装甲部队，第29旅皇家重坦克营被50军死死缠住了！

毕竟是同胞同种，一千多英军拼命回头援救重坦克营，却被打得尸横遍野。眼看美军越跑越远，再不走主力就要搭进去了，29旅的官兵纷纷开始在胸前画起十字，为坦克营的兄弟们祷告，然后也溜了。

入夜，50军围歼皇家重坦克营的战斗开始了。山道上到处都有中国兵提着爆破筒、扛着炸药包冲向50吨重的英国坦克，有些战士离炸点太近，被震得吐血。

一个叫李士禄的士兵扛着炸药包干掉了一辆50吨重“百人队长”式坦克，自己也被炸晕，醒来后又冲上了一辆巨型喷火坦克，炸得这个庞然大物四处喷火。这还不算，第二次醒过来的李士禄居然挣扎着爬过去炸掉了第三辆装满汽油的坦克。

一夜下来，皇家重坦克营31辆坦克都被50军用最原始的手段干掉了！

50军两个营打掉英军31辆坦克。捷报送到军部，军长曾泽生和政委徐文烈既喜又惊，他们太需要这样一场胜利了，但又不敢相信有

这样的好事会砸到他们脑壳上，于是，专门派随军政治部摄影记者胡宝玉去战地调查取证。

曾泽生向他交代：“你用照相机给我拍下来，他们要敢造假，我毙了他们！”

接下来的汉江激战，在漫天钢风铁雨中，50军坚守修理山主阵地整整7天，把美25师打得头破血流，并且再一次打垮了土耳其旅。第三次战役更是一直冲到水原附近，是志愿军在朝鲜打得最远的部队之一。50军给美军以极大杀伤后，曾泽生奉命率部撤出修理山阵地，退回汉江以北。

满身硝烟的曾泽生来到志司复命，彭德怀紧紧握住这位前国民党中将军的手：“50军打得好，你指挥得好，我给你补兵，苏式武器来了，优先给你们50军换装！”

曾泽生闻此言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在国民党军队里混了20年，作为滇系部队的一名高级军官，他和部下受尽了蒋介石中央嫡系的歧视和白眼。不要说补兵换武器这种好事，蒋介石是几次要对他这支云南部队下毒手啊。

曾泽生含着眼泪说：“我们尽力了，我们能在兄弟部队面前抬头了！”

彭德怀闻语动情：“这是什么话？就因为50军是国民党改编部队吗？我彭德怀和你一样，也是旧军队的杂牌湘军，彭德怀从来没有把你们当后妈养的，你回去告诉你的官兵，彭德怀向50军的同志们鞠躬致敬！”

志愿军的总司令真的当着50军中那么多前国民党军人的面，向曾泽生军长鞠了一躬。曾泽生和他的袍泽们热泪纵横，向彭德怀端端正正恭恭敬敬地献上一个军礼。

1955年在怀仁堂，曾泽生和那些身经百战的老红军、老八路站在一起接受毛泽东、周恩来的授衔。他位列中国人民解放军177名中将军之一。

不是冤家不聚头，在临津江畔，中韩两大帅哥再次面对面过招。这一次，白善焯比在云山败得还惨。

12月31日接近傍晚时分，南韩军第1师正面的志愿军116师在进行了猛烈的火力准备后，突然潮水般地发动进攻。在军号和铜锣声



中，志愿军用“人海战术”冲过冰层被炮弹炸碎的临津江，向第1师阵地平推过来。

汪洋师长可不会拿着上万名战士的性命去和敌人傻拼，在发动进攻前，他就派出几支便衣队混杂在难民中，穿插到南韩军阵地附近。战斗打响后，他们立即协助主力部队，向南韩军阵地发起进攻。南韩军第1师右翼的12团猝不及防，抵挡不住，很快败下阵来。

白善焯后来回忆道：“前线的急报是一份接一份。最后，我甚至将师部的工兵和通信兵组织起来投入到前线。当听说左翼的第11团尚完好无损，右翼的两个团已希望不大时，我两眼一片漆黑，不禁问自己：‘我的第1师就这么完了吗？’上峰命令我师全线后撤，我的精神一直恍恍惚惚的。战争打响以来，我所带的部队从没被打得这么惨，我的自尊心几乎到了崩溃边缘，我感到极度虚脱，甚至连撤退的力气都没有了。当与下属部队取得联系时，我居然挂断电话，又开始准备下达作战命令。中共军就要打到师部了，但我不想后撤，觉得自己应该与师部共存亡。这时，美军顾问团的梅伊上尉跑进来，二话不说，抱起我放到吉普车上，风驰电掣般地向碌蹠里驶去，使得我在屈辱中捡回一条性命。”^①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之后，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发起了第一、二、三次战役，把“联合国军”赶到了“三八线”以南，而这三次战役，39军116师都是担任主攻任务。尤其是在第三次战役中，汪洋指挥116师突破临津江的过程，后来成为了南京军事学院课堂上专门研究的一个典型战例。

曾任志愿军代司令员的陈赓大将把突破临津江的作战方案概括为“三险三奇”，让学员们进行讨论。最后院长刘伯承元帅在点评时，说此战例突破口选择和整个作战部署应该打5分，也就是满分，这是汪洋的军旅生涯里最光彩的一页。

临津江一破，志愿军兵锋直指汉城。

^① 引自（韩）白善焯《最寒冷的冬天：一位韩国上将亲历的朝鲜战争》，重庆出版社2013年版。

5. 谁先攻入汉城，谁将载入史册

2005年，时任汉城市长的李明博宣布，将首都的中文名称由“汉城”改为“首尔”。

1951年1月3日晚，志愿军发起第三次战役后，经一天激烈的战斗，突破临津江的志愿军和人民军各部，立即转入追击作战。

接下来的战斗像无法遏制的雪崩一样，“联合国军”全线大溃败。

尤其是屡遭重创的南韩军，他们扔掉了所有的重炮、重机枪等支援武器，爬上卡车向南疾驰，车上的人挤得连个小孩子都不能挤上去了，甚至携带步枪的人也寥寥无几。

他们只有一个念头：把那可怕的中国佬甩掉几英里，拼命跑呀！跑呀！

李奇微决心以身作则去阻止溃军，把他们赶回前线，但形势令人绝望。元旦拂晓，他乘吉普车去寻找这支溃退的部队。

在汉城北面几里路，李奇微碰上了第一批南韩军溃兵，所有人都想尽快南逃到汉城去。他们把武器扔掉了，只有几个人还带着步枪。

李奇微把吉普车横在路中心，阻止这条人流，然后设法找出他们的长官来。以前他从来没有这种经验，他希望以后再也不做这种事，因为要设法拦住一支败军，就等于拦住一次雪崩一样。

由于汉城以东南朝鲜部队的溃逃，使汉城地区的10余万“联合国军”陷入了被中朝部队从右翼实施包围，在汉江以北背水作战的危险局面。这位美军最高战地指挥官在上任一周后，便下达了令他遭受莫大耻辱的命令——“放弃汉城”。

“联合国军”从汉城撤退时，采取了疯狂的破坏行动，凡是可能被中朝方利用的设施，无论是军用的还是民用的，全部焚毁。美军第8集团军在撤离汉城的同时，用汽油、炸弹对汉城、仁川、金浦机场等地进行了疯狂爆破。汉城的学校、医院、图书馆、博物馆、国会议事堂等遭到严重破坏。

路透社记者怀特搭乘飞机离开汉城时，看到“汉城在烟火中燃烧，大火在城南50英里处仍可看见”。

当李承晚宣布再次“迁都”的时候，汉城又一次陷入巨大的混乱



之中。1950年12月中旬，汉城的人口为150万人左右。由于战局的恶化，大约有四五十万人早已逃难。但当时在汉城估计还有100万市民是在认为“联合国军”不至于放弃汉城的推测和愿望下留下来的。

唉，不到最后关头，谁愿意离开自己温馨的家呢？

1950年6月汉城大逃亡的情景，在1951年1月又一次出现了。

汉城几十万难民背着包袱，扶老携幼，争先恐后向汉江边拥去。狭窄的浮桥由于挤满了车辆和人流而摇摇晃晃，其通过速度极其缓慢。不断有人被挤下浮桥而掉在布满浮冰的江水中，凄凉的叫喊声在寒冷的风雪中令人毛骨悚然。尽管一部分难民从仁川被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荷兰的船只接走，同时联合国救援机构尽力向难民分发食品、衣服，并提供医疗和收容服务。

但有幸得到帮助的仅仅是难民中的极少数，大部分难民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在越来越近的炮火声中惊恐地走向了未知的前方。

冰天雪地里，部队徒步行军困难得不得了。志愿军的很多士兵在这次长途奔袭中倒下了。不是死于战斗，而是因为体力严重透支，双腿在雪地上无论如何也追不上“联合国军”的车轮。

当胜利的旗帜已经在汉城城下迎风飘扬的时候，彭德怀心里却越来越没底。他太清楚不过，他的部队已经极度疲劳，粮弹补给也出现了困难。再加上朝鲜南方的群众基础和北方完全不同，不仅很难得到有力的支援，反而不时有志愿军的后勤运输线遭到南韩便衣游击队袭击的消息传来。一向强调“军民鱼水情”的志愿军突然发现自己成了瞎子聋子，或者变成了游在刺骨冰水里的鱼儿。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呈送到彭德怀面前。

1951年1月3日上午，第三次战役开始以来，一直困扰着彭德怀的最大悬念消失了，志愿军情报部参谋跑进彭德怀指挥部，报告说他们在美军的无线电电报中，截听到了美军准备从汉城撤退的对话，“联合国军”不打算死守汉城。美军要逃！

彭德怀十分清楚，如果李奇微决心把汉城变成朝鲜半岛的斯大林格勒——他是完全具有这个能力的——那就不知道还要消耗多少时间和生命才能攻破城门。

如果能够占领韩国的首都，那必将是一个震惊世界的事件，这将是抗美援朝战争取得重大胜利的一个显著的标志！

获知如此重要的情报，彭德怀长长地吁出一口气，他甚至觉得这

是冥冥之中，老天爷对他的特殊眷顾。

彭德怀立刻命令39军、50军和朝鲜人民军第1军团攻击汉城。

“联合国军”撤出汉城的同时，便开始在市区内进行大规模的“坚壁清野”，金浦机场上来不及运走的50万吨航空汽油和3万枚凝固汽油弹被点燃了，巨大的火团和浓烟笼罩在汉城上空，把半边天空都烧红了，那情景如同地狱降临人间。

毕生为美国政府的对外军事政策提供服务的贝文·亚历山大，那一天也率领着他的军史分队撤出了汉城，当他驾驶吉普车穿过汉城的大街时，他眼中的整座城市，只是一个空壳而已。坍塌的楼房、废墟瓦砾，比比皆是，只是看不到人的影子；空旷的大街也似乎成了死胡同。国会议事堂弹痕累累，只设有一个警卫，形单影只。汉江上的那座大桥在战争的最初几天里即被炸坏，残存的桥墩上搭了座临时的便桥。城南几英里外的金浦机场是座灰蒙蒙的空军前方基地。他亲眼看到一架打算降落的英国海军战机因有一个起落架无法放下，在天空飞来飞去，无法着陆。若干年后，他把他所看到的，听到的，了解到的朝鲜战场上的一切，写进了他的《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一书中。

午夜时分，收音机里传来了“美国之音”的报道：“南韩国军给予中共军重大杀伤后，安全转移。”

要求撤退的告急电报不断从各个防御阵地飞向李奇微设在汉城的指挥所。1月3日上午，李奇微乘坐一架小型飞机前往前线，会见一些高级指挥官。在这些指挥官众口一词的催促下，迫于中共军队全线突入纵深的巨大压力，李奇微只得下令撤到汉江以南，尽管此举非常危险。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将汉江以北众多的部队和火炮、坦克及各种车辆撤过乱冰阻塞的汉江，无疑是一种大规模的复杂军事行动。一旦撤退因中国志愿军的迫近轰击而延误在汉江以北，损失将难以想象。

当日午后，李奇微就告知接替穆乔出任美国驻南韩大使的莫西奥，要他通知李承晚，美国第8集团军准备立即撤出汉城，要求南朝鲜政府仍留在汉城的部分机构，必须在下午3时以前撤出汉城。自下午3时起，汉江大桥和来往要道，仅供军队通过，民间车辆和行人一律禁止通行。

很快，李奇微就接到莫西奥大使的电话，转达了南韩总统李承晚对将军的如下质问：“李奇微将军讲过，他是准备长期留在朝鲜的，可现在他刚到朝鲜一个星期，就要撤离汉城，难道他指挥的军队只会



撤退吗？”

“请您告诉那位可爱的南韩总统，”李奇微在电话上对莫西奥大使说，“最好请他到前线听听中共军队进攻吹起的刺耳的军号、看看成千上万的中共军用不堪入耳的英语高喊‘缴枪不杀’和蜂拥冲锋的情景，再看看他们南韩的军队是怎样像羊群一般地溃逃吧！”

李奇微越说越来气，对着电话大声咆哮：“大使先生，请你也帮我考虑考虑，这样的军队怎能实施我的反击计划？而坚守阵地就等于送死！请你务必转告那个可恶的老东西，我李奇微现在只是撤离汉城，并没有准备离开朝鲜！”

李奇微打完电话，立即吩咐手下把第1骑兵师师长助理帕尔默准将叫来，命令他亲自赶赴汉江大桥，全权负责交通管制。

他说：“你要以我的名义，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保证第8集团军源源不断地通过。从下午3时起，禁止非军方以外的一切车辆和行人通过，以免堵塞交通。我最担心的是，百万汉城难民涌上大桥，那就给中共军帮大忙啦！”

1951年1月4日是李奇微踏上朝鲜半岛履任新职的第10天。这一天，中国人民志愿军突入了已经遭“联合国军”放弃的汉城市区。面容严峻的李奇微最后离开了位于汉城市内的指挥所。

他走得镇定自若，一直到担任后卫的美军第27团开始撤退，他才收拾起妻儿的照片，离开了自己的司令部，并且颇有风度地挥笔在墙上写下了一句后来全世界都已经知道的话：“美第8集团军司令官谨向中国军队总司令致意。”

彭德怀听到汇报的那一刻便清醒地认识到，在这样的时刻还有心情和自己幽上一默的李奇微，今后必将是他更为强劲的对手。

就在李奇微走出指挥部，登上吉普车时，至少有两支中国志愿军小部队几乎是踩着他的脚后跟进入了汉城。

1月4日那一天，随39军汪洋师长的116师一支侦察队行动的炮兵观察员张瑞明回忆说：“汉城没有打，敌人2号就把汉城炸了，烧了，炸江桥、炸电厂、烧大楼、烧民房，炸完烧完，他们就跑了。我们不是夜里过江的么？天亮部队才进城，我们进去的时候，美军还有一个营正在收拾东西，准备往南边跑，就和另一支队伍打上了。我们只是听见枪声，没听见大炮响，就是冲锋枪、机关枪、小炮和迫击炮。打了很长时间，足足有两个来钟头，敌人一部分被歼灭了，剩下

的突围跑了。”

志愿军第50军的官兵肯定会强烈反对39军老兵张瑞明的说法。

道理很简单，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大不相同。

谁先进入汉城，这不是小事，这是必定会被载入中华民族煌煌史册的莫大荣誉。

这事后来闹到了志愿军总部。

张瑞明有一点说得没错，天亮后他们进汉城，听见正准备逃跑的美军和“另一支部队打上了”。

不过，这支正在和美国人激战的部队并不隶属于他所属的39军，而是志愿军第50军148师第442团第1营，和临时配属给1营的团部机炮连，加起来有700多号弟兄。

志愿军夺取汉城，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作为耻辱，韩国现代史将这次汉城失守称之为“一·四事变”，迄今陈列于国家战争博物馆里。

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敌人的痛苦之上无疑是亘古不变的战争铁律，与韩国人相反的是，志愿军攻占汉城的消息传回国内，毛泽东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祝汉城光复”，天安门广场祝捷群众彻夜狂欢。

最先攻占汉城是一项载入史册的荣誉，这支部队究竟是谁？

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洪学智和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的回忆录为代表的多数志愿军战史，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占领汉城的部队是如此排序的：“志愿军第50军、第39军116师和朝鲜人民军第1军团。”

洪学智、杜平等志愿军总部首长的记忆没错。

就在第50军149师围歼英军第29旅皇家重坦克营的同一天晚上，该军第148师442团副团长陈屏奉命率领所属第1营，作为全军前锋，直插汉城。

陈屏如今定居于沈阳军区司令部第二干休所。当年的第442团1营政治教导员刘进昌，如今定居于成都四川省农业厅宿舍区。两位率先攻占汉城的战争亲历者对这段战史是这样强调的：

第一，在这3支部队中，最先攻入汉城的是我们50军148师442团1营；

第二，占领汉城的方式不是“进入”，而是“攻入”，第442团1营攻入汉城时，不但付出了重大伤亡代价，还取得了歼敌成果，并且圆满完成了预定的作战任务；

第三，我军攻占汉城的时间不是1月4日晚上或下午，而是1月4日凌晨攻入，当日上午攻占的；

第四，由于上级没有给这支前卫分队配备电台，攻占汉城的战况向志愿军总部报告晚了。39军的一支侦察队在50军之后进入汉城，可是他们带了电台，报告及时。所以，志愿军总部关于占领汉城的通报，只提到了39军，而没有我们50军。

65年过去，两位老人对他们率部最先攻进汉城的战斗场面，依然历历在目。

1951年1月3日晚23时，陈屏接到上级命令，要他率领第1营和团部机炮连为全军前卫，在突破敌人防线后，急行军35公里直插汉城，于天亮前控制汉江大桥。

压在陈屏肩上的担子重啊！他们不仅要突破敌人在高阳、议政府一线的既设阵地，夜间急行军35公里实施大纵深穿插，还要以劣势装备的一个营去攻占对方的首都，并控制汉江大桥，以扼住敌掩护部队的逃路。上级要求任务必须在拂晓前完成，可天一亮，敌机就来了，他们又没有防空火器，干挨炸不说，任务也别想完成。

整整一夜急行军，部队遇到敌人决不恋战，走累了也不停留，不顾一切地直插汉城，就怕敌人跑掉，包不成“饺子”。

部队没有向导，夜间行军就靠一张地图，结果按图行进走了一大半路程，一看：“怎么走到了汉江江边了？不对头！”路走错了，失去的时间一定要夺回来。部队掉过头，再顺着公路沿江而上，一路小跑。因为走得太急，不少体质较弱的同志都掉了队。

抵达汉城时，天刚蒙蒙亮，除了附近的隆隆炮响，一座超过百万人的大都市，已经失去了往日“京城”的嘈杂声。

陈屏赶紧整理部队，就地紧急展开。这时才发现，经过一夜急行军，各连队均不同程度走乱了。特别是团部机炮连，有的重机枪射手跟上了队伍，副射手背着弹药箱却没有跟上来；有的60炮班炮手把炮身扛上来了，扛炮座板的却掉了队，机炮连基本上不能发挥作用了。这时候真要当头遇上一股敌人，他们就只有扔下家伙往回跑了。

幸亏1营3个步兵连建制基本完整，还能打。

此时，前卫连正被敌人压制在小山包前的开阔地。躲，无处躲；退，无路退！绝处求生，只有一拼。

第1连在副营长刀剑明和连长李仲文的指挥下，就地疏散开，继续以火力从正面还击敌人。

跟在第1连后面的副团长陈屏果断下令：营长李永富带领2连，从右侧向小高地发起冲击；教导员刘进昌带领3连，从左侧向小高地发起冲击。

说到这次冲锋，刘进昌老人扬着岁月霜雪浸染的剑眉，眼眶里闪耀着战火硝烟熔炼的炯炯目光，至今还在为那高昂的士气骄傲着：“大家都是喊着杀声冲上去的，包括我和我的警卫员，‘嗷嗷’的！”

就这一冲，敌我双方“粘”到了一起，美军密集的炮火随之失去了优势，临空助战的美军飞机也无可奈何地在头上盘旋着，始终不敢丢下一枚炸弹。

在伴着嘹亮军号和“嗷嗷”的喊杀声中，美国大兵被冒着弹雨冲杀而来的志愿军指战员吓破了胆，纷纷撤下高地，跳上早已准备好逃命的汽车，向着汉江南岸仓皇溃逃。

冲上小高地的指战员一边喊着“杀”声，一边紧紧咬住逃敌，实施火力追击。2连副连长李德枝带着2连2排率先追上公路，抓住一名没来得及爬上汽车的美国白人大兵。

刘进昌说：“这个美国大兵当时是跪在地上，举着双手向李德枝他们乞求饶命的。当时，大家都觉得好笑：装备这么先进的武器，竟然这样草包。”

当2连把美军俘虏送到副团长陈屏跟前时，美军俘虏没再下跪，而是从口袋里掏出一叠美元，并摘下了手腕上的表，向陈屏伸出大拇指，再用小拇指指自己，一边比画，一边“呜里哇啦”地说了一大堆西洋话。

陈屏说：“那小子可能是想贿赂我，他不懂志愿军的俘虏政策，怕我们虐待他。我们没有带英语翻译，也听不懂他讲了啥，没理他，更不能要他的东西，马上派人把他送往后方了。”

第50军军史记载了第442团1营攻占汉城的战果：“经一小时激战，共毙伤敌50余人，俘虏美军一人、南朝鲜军二人，缴获火箭筒一

具、自动步枪14支，击毁通讯车一辆。”

这一仗虽然第1营伤亡也很大，但全营率先攻占了汉城，控制了汉江大桥，圆满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

志愿军总部关于39军116师首先占领汉城的通报，陈屏、刘进昌他们是在战场上得知的。全营指战员刚刚经历了攻占汉城的浴血奋战，功劳反而落到了兄弟部队头上，通报上对50军148师442团一个字也不提，其反响可想而知！

为了这件事情，曾泽生军长专门向志愿军总部汇报了第442团首先攻占汉城的实际战况。包括彭老总在内的志愿军总部首长对这支起义才两年多的新部队，不但一视同仁，而且非常尊重。经过核实，志愿军总部后来的战役总结关于占领汉城部队的叙述，补上了第50军，并且把50军排在了39军之前。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团以上单位被总部批准授予称号的，只有“白云山团”，即曾泽生麾下的第50军149师447团。该团坚守白云山主峰的第5连，是长春起义部队唯一发生叛变的连队。据当年曾被叛兵绑架过的该连指导员高汝云回忆，叛变平息后，他将多数叛兵从监狱里带回连队，经过教育，其中不少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的还被提升为干部，还有部分战士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流尽了最后一滴热血。

该部起义将领陇耀师长的长子陇涤湘闻知此事后，脱口就是一句：“就这一点，共产党简直太神奇了，真的！”

在百万倒戈官兵灵魂裂变后重新营建的精神家园里，广大起义官兵实现了重树人生目标的心灵皈依。

在笔者采访过的起义官兵中：

——参加长春起义的中校副团长马占伟转业到地方后，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劳动教养3年，然而在69岁那年，还是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终于了却夙愿。

——长春起义的中校副团长、代理团长李峥先，第三次在中国共产党党旗下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已88岁。

——海城起义少尉赵霖芝患癌症临终时，在其散发的《告战友书》中，述说了其毕生追求的理想天国：“我去的地方，风景秀丽鸟语花香；我去的地方，没有阶级，更没有压迫；我去的地方，没

有富人，也没有穷人，所有的人一律平等；我去的地方，每周开一次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①

在到处冒着浓烟和火团的汉城街道上，已经出现了“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汉字标语。这些比箩筐还大的汉字，就覆盖在欢迎“联合国军”的英文标语上面。

汉城的华侨绝大部分都是山东人，熟悉的胶东口音让志愿军官兵感到非常亲切。

6. 18勇士夜袭水原城

第三次战役打响后，志愿军中涌现出的英雄好汉，如满天繁星，数不胜数。

3月31日，《人民日报》在朝鲜通讯专栏报道了“18勇士夜袭水原城”的传奇战绩。

水原，位于汉城市南44公里处。

1951年1月25日夜，中国人民志愿军18勇士曾把这座当年南朝鲜首都的卫星城搅了个稀里哗啦，把白日仰仗飞机大炮等武器装备优势的美军守城部队打得屁滚尿流。

当年18勇士之一的吴亮，时任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3营8连2排副排长，如今离休定居在昆明。

2006年12月25日，吴亮在《云南人物周刊》举办的座谈会上，回顾了当年18勇士夜袭水原城的情景。

“说起这次夜袭战，我至今还觉得好笑，因为决定夜袭水原城的前一天，我们8连9班奉命进城侦察，结果全城空无一人，倒是城内的仓库里堆满了作战物资，什么都有，好多白面、罐头仓库里放不下，就堆在仓库外面的屋檐下，大家索性背点吃的东西回来。我还记得，每个班分了一筒七八斤重的牛肉大罐头。很快，接到团里的通知，叫

^① 引自高戈里《一个国民党军少将的死刑与撒判——兼论解读历史需要的草根视角》，发表于《中国报告文学》2011年第1期。



各连队准备次日派人进城扛些‘战利品’回来。”

此时春节已近，志愿军补给跟不上，缺粮少弹，这“洋财”是美军在志愿军第三次战役打击下，仓皇溃逃时留下的，不捡白不捡。

1950年12月31日发起的第三次战役，也仅仅两日，“联合国军”防御阵地即被全线突破，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转入战役追击。

战至1951年1月4日上午，志愿军第50军148师442团1营率先攻占汉城。随后，第50军各师渡过汉江，继续向南追击逃敌。其中第442团1营曾一度追至“三七线”上的平泽，成为志愿军攻击最远的一支部队。

鉴于两个来月连续发起三次战役，我军极度疲劳，减员很大，后方补给线由100多公里突然拉长至500多公里，缺少空中掩护的粮弹运输更为困难，且我战略预备队尚不能及时赶到，彭德怀下令各部队进至“三七线”附近后，一律停止追击。

1月8日，第三次战役结束，志愿军主力转入休整，准备于两个月后再发动春季攻势。

志愿军第50军停止追击后，将已推进至“三七线”上的部队全部撤回至水原以北山地转入防御，部队动员。吴亮说：“我们在前面顶着，掩护主力整补，准备打大仗！”

根据防御部署，第149师447团奉命坚守水原城以北的白云山地域。

吴亮回忆：“1月25日天亮后，我准备带人下山，到水原城去弄点白面、罐头回来，正打算动身哩，大批敌机突然临空，一阵狂轰滥炸之后，敌坦克引导步兵对我前沿的警戒阵地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中午12时，敌推进到我前沿阵地前，攻势被我阻止。打了一整天，太阳下山时，美国佬撤出战斗，退缩回水原城据守。”

原来，25日上午，美军第25师一个营和宪兵一部进驻志愿军主动放弃的水原城，附近高地也派驻了部队。

面对突然出现的情况，“查明敌情，打乱敌人的进攻部署”，是一线部队当前最重要的任务。149师师长金振中接到军首长传达总部首长的命令后，指令447团派出侦察分队对盘踞水原城的敌人进行夜袭。团长张振山把这项任务交给了3营副营长戴汝吉，戴汝吉立即从8连和师部警卫连、团侦察排中挑选出精兵强将，组成一支200多人的侦察分队。

张振山交给戴汝吉的任务是率部插入敌人心脏，把水原城搅他个稀里哗啦，杀杀他们的锐气，再逮个“舌头”回来，问问两个月来三次溃不成军的美国佬究竟要搞什么名堂。

戴汝吉是一位长春起义的原国民党上尉军官，他的故乡在云南丽江。丽江纳西人的忠勇是有名的，两届“云南王”唐继尧、龙云招募保驾侍卫的士兵多垂青于丽江玉龙雪山养育的子弟。戴汝吉的忠勇，在旧军队是冲着栽培自己的长官。长春起义后，经过以“泪血大控诉”为主要形式的政治整训，他便成了中国共产党忠肝义胆的追随者。面对重重困难，戴汝吉受领任务时，只向团长提了一个要求：“如果我牺牲了，请追认我为共产党员！”

夜幕降下后，戴汝吉率领夜袭分队出发了。

25日晚，他们刚刚摸到水原城北门，就被守敌发现了，由十来挺机枪组成的火力把他们堵在了城外。

“同志们，跟我冲啊！”紧要关头，来不及多想，戴汝吉果断下令侦察分队由偷袭转入强攻，战士们纷纷拔出手榴弹，向敌人的火力点扔去，只见红光频频闪烁，敌人的机枪随着几声巨响哑巴了。

戴汝吉带着人刚冲进街口，突然身后枪声大作，周围的探照灯也陆续打开了。他回头一看，10多道火舌把夜袭分队拦腰斩断，主力被敌人猛烈的火力死死地压在城外，进入城内的，也处在敌人的火网之中。

狭路相逢勇者胜，戴汝吉果断地命令身边的战士：“跟着我往里打！”随即，带人往城里冲去。

戴汝吉等人一口气插到街中心时，在十字路口右边发现了一座大洋楼，楼房四周被黑森森的树丛和铁丝网围绕着，院子里停着1辆坦克和7辆吉普车，灯火通明，人声嘈杂，几辆吉普车正在发动，惊恐万分的敌人慌乱一团。显然，此地是敌人的一个指挥机关。

戴汝吉问吴亮：“你带手榴弹没有？”

吴亮回答：“带了。”

戴汝吉迅即作了战斗部署：“倪玉成，你带一个组封锁街口；廖忠良，堵住院门；王洪讯砍断楼房周围的电话线；其余人员跟着我往里猛打！”

话音刚落，手榴弹、冲锋枪、轻机枪像突如其来的风暴卷向大洋楼。



冲进院子的3排长陈有智先用冲锋枪封住大洋楼的大门，李春成敏捷地跃了上去，朝里面扔了两枚手榴弹。手榴弹爆炸的瞬间，另一位战士乘机向楼门冲去，不料，被楼梯、窗口射来的子弹击中。

吴亮回忆：“第一拨冲锋受挫后，我和1排长王洪讯、6班长李影朝，他现在住在禄丰县城，我们4个人再次向大洋楼冲去。我刚一进去，就被敌人的手榴弹炸了出来。戴营长看到我抱着右手，血顺着袖子直往下流，赶紧问我：‘吴亮，能行吗？’我回了个‘行’字，咬着牙，二话没说又冲进去，从楼里连拉带扯地拖出一名脖子上挂着卡宾枪的美军俘虏。”

借着敌人的探照灯，戴汝吉发现俘虏的臂上带着“MP”字样的臂章，高兴地大喊起来：“同志们，我们抓到敌人宪兵了。这是敌人的指挥所，往里冲啊！”

18勇士犹如锋利的尖刀，狠狠地捅进大洋楼，把敌人的五脏六腑搅了个七零八落，打得白天趾高气扬的美国大兵鬼哭狼嚎，抱头鼠窜，就连那辆坦克也逃得无影无踪。

攻占大洋楼后，戴汝吉随即下令将不能带走的汽车和军用物资全部烧毁，押上俘虏，从东门迅速撤离了战场。

当18勇士撤到城外一座小山冈时，敌人才如梦初醒，组织炮群对准北门乱轰一气。

这一仗，18勇士毙伤美军60余名，击毁、烧毁敌汽车10余辆，缴获迫击炮2门、电台1部、轻机枪1挺，俘获美军宪兵1人。

18勇士夜袭水原城的事迹在1951年3月3日的《人民日报》作了报道。1953年4月，抗美援朝胜利在即，上海印刷发行10万份《中国人民志愿军18勇士》画报，向全国发行，使全国人民都知道夜袭水原城的18勇士全部是云南人。

志愿军第50军在这次汉江阻击战中，与阵地共存亡的有7个整连，31个整排，138个班。

时任第50军447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说：“我们入朝的时候全军三万多人，最后就剩了两万多人，牺牲了一万多人。他们都是十八九岁的青年，在那样艰苦的情况下连续战斗，很多人都倒下了，都是一个个的好小伙子啊。这么多年来，只要我讲到他们，就会特别难过。”

在第二次战役中获得“万岁军”美名的第38军在汉江阻击战中，打得同样顽强。在第50军主力撤至汉江北岸后，第38军奉命继续留在南岸迟滞敌人，掩护兄弟部队后撤。此时，经没日没夜的连续战斗，第38军中一半以上的步兵连已不足40人，每个班只有三四支步枪还能打响。

第38军342团的2营、3营阵地相继失守后，在第三次战役中因首先突破汉滩川而被命名为“钢铁营”的1营，因位置突出，成为了美军猛攻的对象。营长曹玉海带领他的1营，连续击退了美军第1骑兵师数十次进攻，曹玉海和副营长倒在了阵地上。

最后时刻，教导员方新拉响炸药包，和冲上阵地的敌人同归于尽。

当增援部队赶到阵地时，在敌我双方战死者组成的尸山血海中，发现了两名还剩下一口气的志愿军伤员。

“钢铁营”营长曹玉海和他的教导员方新，同被授予“一级英雄”。

7. 千万人中独识君

116师率先进入汉城，汪洋师长当晚就住进了李承晚的总统府景武台^①。他看到总统府里有一台黑色的三角钢琴，不禁揭开琴盖，坐上琴凳，手指在琴键上随意地游走起来。虽因久未练习，演奏说不上运指如飞，行云流水，但自幼练就的童子功并未丢生，即兴演奏的《红梅花儿开》、《共青团员之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在中国广为流行的苏联歌曲，仍然激起了官兵们的一片掌声。

就在汪洋挥师攻入汉城没两天，军邮员送来了千里之外的红颜书笺。寄信人是汪洋新交的恋人周湘玟。在凯歌声中接到恋人的远方来信，汪洋喜不自禁，于是在韩国总统府里写下了一首豪气干云的快意诗篇：

^① 1960年4月19日，84岁的李承晚下台，尹谱善当选总统并入主景武台，不久即将白墙蓝瓦的景武台更名为青瓦台。

三八防线坚，
临津江水寒，
三奇复三险，
破阵旦夕间。

抚琴总统府，
饮马汉江边，
应谢信使者，
香江有书笺。

这是志愿军将领在朝鲜战场上少有的既轻松快意又潇洒浪漫的镜头。

自古英雄皆豪情，不过这里要说的却是诗的最后两句，“应谢信使者，香江有书笺”。

这两句可不仅仅是铁血豪情，而是柔情缱绻，写的是一段英雄爱美人，当然美人也爱英雄的战地传奇故事。

美人名叫周湘玟，是汪洋只见过照片还没睹过真容的女朋友。

汪洋跟随吴信泉军长和李雪三政委从新四军时期的盐阜一路征战到朝鲜，1950年，通过39军参谋长沈启贤和夫人潘荻介绍，汪洋和时在广州中山大学读书的周湘玟开始通信联系。两人鸿雁传书，互赠照片，交流甚欢，彼此都有了意思。

汪洋将军入朝前夕寄给周湘玟的是一封信和一个精美的贺卡。

那个时候在志愿军中流传一首苏联歌曲《共青团员之歌》，抒发苏联共青团员保卫祖国上战场时的激越心情，里面有一句歌词“再见吧亲爱的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汪洋在给周湘玟的信里改了两个字，把“妈妈”改成了“朋友”，变成了“再见吧亲爱的朋友，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在那个特殊背景下，这样的巧用心机还是十分煽情的，周湘玟心中被掀起了点点涟漪，立刻给汪洋回了一封信，信里附上一首新诗《我等待着您》，这首诗的意思就是反映她送别一位新交的朋友赴朝参战，她相信男友一定能取得胜利，一定会胜利归来，她也一定会等着他。

这显然就是定情的意思了。

从网上看到的旧照片中，依稀仍可看出周湘玟当年的青春美丽和高雅气质。汪洋也是一派英武的儒将风度，英雄美人相互倾慕，自在情理之中。

周湘玟是香港人，父亲是前国民党中将编练司令，此时客居香港。因“不可抗拒”的政治原因，二人之间的联系被迫中断。汪洋为此陷入了深深的，而又不可言说的痛苦之中。

1952年春，在中央安排下，第39军政委李雪三担任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团长，率英模代表们到全国各地巡回作报告。

回国前，李雪三专门找汪洋谈了一次话。

李政委问汪洋：“你是否还决心和周湘玟谈下去？”

汪洋明确表示愿意。

政委说：“如果你决定谈，我这次到广州，找机会了解一下情况。”

1952年3月，李雪三率志愿军归国代表团辗转来到羊城作报告，工作之余，向叶剑英同志和陶铸同志汇报了汪洋师长与周湘玟恋爱被阻止之事，并提出是否可找周湘玟来广州面谈一次。

叶剑英同意，并派人将已回香港家中的周湘玟接来。

当晚，由广州市副市长陈志方和夫人王静陪同，到广州长堤白宫酒店，与李雪三团长见面。

会见中，周湘玟提了不少问题，主要是了解汪洋的人品、学识和人生经历。李雪三有问必答，详细介绍完汪洋的情况后，热情地请周湘玟吃木瓜，却不知如何吃法。周湘玟亲自动手洗，动手切，并向大家介绍这种岭南名果的吃法。

在交谈过程中，李雪三也以长者的目光，审视着周湘玟。

这次见面后，李雪三即刻给汪洋写信，保证周湘玟和其父在政治上绝无问题^①。并向叶剑英和陶铸提出，可否安排周湘玟到东北和汪洋见面。叶剑英大力支持，指示相关单位负责安排一切。

周湘玟遂于1952年6月28日抵达丹东，29日便与从朝鲜战场前线赶回来的汪洋师长见面。不久，在组织的安排下，周湘玟从香港调往平壤工作，一直通过鸿雁传书的汪洋和周湘玟，终于得以在朝

^① 笔者注：周湘玟父亲系中共特别党员。



鲜相聚。

1953年6月14日，停战协议签订前夕，汪洋和周湘玟在平壤喜结良缘。

周湘玟的一生也是不平凡而且历尽坎坷。1947年她就投身学运，面对敌人的枪口，高举大旗，走在示威队伍最前面。有她英勇身姿的照片，至今被珍藏于广州革命博物馆。她协助父亲为共产党做地下工作，入龙潭虎穴而从不畏艰险。

不料这段浪漫的婚姻到了60年代却遇到问题，“左”倾路线肆虐，怀疑一切，“洪洞县里无好人”，周湘玟被疑为“问题严重”。他们已有二子一女，有关领导竟然命令汪洋与她离婚。

周湘玟在诗中叹道：“一生一世一双人，偏要叫你两离分！”

晴天响起霹雳，家庭笼罩悲哀。而清白与忠诚被泼污水，更令周湘玟五内俱焚。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当年地下工作领导人提供事实，证明她对革命忠贞不贰，一场劫难，遂告终止。

汪洋归国后曾任军长、七机部部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等职，2001年辞世，被誉为“我军杰出的军事指挥员”。

男儿重横行，戎马壮一生。汪洋不是那种剽悍勇武的赳赳武夫，他也曾经写过不少诗章，这非常切合英雄美人的故事模式。

他的诗大马金刀，气贯长虹。诸如《登雁门关》：“雁门上望悲鸿，今日还闻战马鸣。列阵高丘埋烈骨，忠魂犹护古长城。”《覬杨五郎庙》：“秀水奇山载过云，晓钟暮鼓送晨昏。一家忠烈无归处，忍解征袍入佛门。”

而文心柔情的周湘玟更是兼具豪放婉约，她用词表现个人生活，花月风情，绮丽婉约；用诗反映家国社稷之事，重大题材，洗尽脂粉，风格豪放。

且看：

秦兵俑

兵如岳峙阵如云，千万人中独识君。
黄土有情留一笑，青山无奈葬三军。
春闺梦断黄金甲，羌笛声残翡翠裙。
旷古传奇谁解此，秦皇陵下死生坟。

题欢儿所绘小马图

依依有小马，春风初试蹄。
鬣鬣雄风壮，泱泱水草美。
水草不关情，其志在千里。
回首仰天啸，云飞风顿起。

还有一首写武则天的《鹊桥仙·武则天无字碑》，也值得一读：

蛾眉淡扫，秋波解意，赢得君王垂顾；更兼挥斥有奇才，便胜似男儿无数。

丰功旷世，骂名昭著，自是古今独步。已拼毁誉任由之，又何必碑文絮絮。

这些浪漫歌咏都被收录在一本汪洋与周湘玟的夫妻合集《勿忘庐人家诗集》中，其中有汪洋诗作55首，周湘玟诗作138首。

汪洋将军戎马一生，到了晚年，最令他魂牵梦萦的，还是征战朝鲜的那一段岁月。在他的晚年诗作当中，有不少是追忆抗美援朝中的诸多战役的。

其中，还包括他对一位无名小战士的深情缅怀。

那是在马良山战斗刚刚结束，有一个在战斗中立了功，来自贵州的新兵，奉命给师指挥所送来缴获的战利品——一袋口香糖。

中国人都没见过这雪白的软不拉叽的洋玩意儿，大家不停嘴地嚼，鼓起腮帮子吹泡泡，都觉得稀罕。

小战士看到自己送来的战利品给师首长们带来这样大的惊喜和欢乐，也很高兴。

汪洋师长也拿了一块，刚准备吃哩，美军飞机来轰炸了。

结果，被炸死的人中，就有这位送口香糖来的小战士。

汪洋目睹了那悲痛的一幕。多少年后，他在回忆朝鲜战事的时候，特别为这位贵州战士写了一首小诗——《战士奖我一块糖》：

马良山前摆战场，



捷报频传喜欲狂。
坑道官兵共庆祝，
战士奖我一块糖。

我未吃糖他先亡，
糖留手中恨难消。
四十八年忆往事，
铭心刻骨倍感伤。

（附注：我至今尚不知道这位小战士叫什么名字。）

第十五章

悲喜英雄

1. 令人拍案叫绝的战地故事

命运的无常，往往由一些极其偶然的因素构成。尤其是在两军大战，你死我活的战场上，愈发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性。

谭秉云数次对笔者说过：“英雄不是想当就能当的，得碰运气。”

发生在朝鲜战场上的几个活生生的例子便足以说明，这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兵的经验之谈。

志愿军入朝很长一段时间，为了避免遭到更惨重的损失，总部作出硬性规定，敌机空袭时严禁开枪还击。那是因为志愿军没有制空权，而这些可恶的美国“蚊子”拍死一只，会马上飞来一群，专叮部队驻地和老百姓的村庄，一阵狂轰滥炸。为避免遭受惨重的损失，志愿军总部严令官兵不得擅自向美军飞机开枪，违令者军法从事。

1951年9月28日上午，驻扎在朝鲜顺川郡一座山坡上的申明和正在营部组织各连指导员学习，通讯员匆匆跑来报告：“教导员，来了七八架美国飞机，大家快进洞子躲躲吧！”

申明和回头让营部通讯员赶紧通知各连学习者进防空洞隐蔽。随后抓起一支美式汤姆步枪，边往外走边说：“我上山顶观察一下。”

营部旁边的小山坡上长满了密密麻麻的栗子树，申明和藏在树林



里，从枝杈里伸出望远镜，只见8架美机从南边飞来，在驻地上空转起了圈儿。它们肆无忌惮惯了，根本不把志愿军放在眼里，一架架飞得很低，望远镜里瞅得很清楚，那金发碧眼钩鼻子的老美，嘴巴还一鼓一鼓地嚼着口香糖。

打吧，军纪在那儿摆着，弄不好真会被“军法从事”；可不打吧，看着它们在眼前蛮横地飞来窜去，心里又憋屈得慌。

眼看美国飞机开始爬高。经验告诉申明和，它们下一步就要升空投弹，轰炸或向驻地俯冲扫射了！

一腔热血“哗”地冲上中国军人的脑顶，申明和牙关一咬，打它个狗娘养的！

申明和以前在解放军里就是全军特等战斗英雄，著名的神枪手，连天上的麻雀都能打下来，对付这么个大块头，他还是蛮有把握的。

他将射击标尺拨到500米距离处，提前预瞄了一个飞机靶位，屏住气，轻轻一扣扳机，嘿！这头一枪就打得那美国飞机一哆嗦，晃了晃翅膀。

申明和不管三七二十一，紧跟着又补了一枪！

随着第二记枪响，只见那架飞机翅膀猛地向左一倾，右翼根部冒起了蓝烟。不一会儿，蓝烟变成红烟和黑烟，飞机随即歪着翅膀，朝着一公里多远的9连驻地附近滑了下去。

这架美机被击落后，余下的飞机立即掉转机头，慌不迭往回跑了。

在望远镜里，申明和看见那架被击落的飞机居然蹦蹦跳跳地降落在西面那片平坦的河滩地上，没有爆炸，也没有起火，就是直冒浓烟。

眼瞅着舱盖掀开，那个美国飞行员吃力地往外爬，申明和赶忙端起步枪，可再看看距离，唉！射程太远，够不着，干着急！

几分钟后，从东海岸方向又飞来一架美式直升飞机，绳梯上吊下一个人，把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绑在绳梯上救走了。

申明和他们后来从击落的飞机机舱里发现了许多血迹，原来神枪手申明和打中了美军飞行员，而且伤得不轻。战士们从飞机上还拆下6挺崭新的机关炮，炮身上的烤蓝晃眼睛。

申明和击落美机不到一个小时，师里和军里全都知道了。

军部下来个军法处长，铁青着脸，把他叫到团部，拍着桌子狠狠地训斥了一通。

申明和无话可说，心想这下完了，等着上军事法庭吧，只要不判我死刑就不亏。

下午，军政治部又派人来调查，临走时说：“军有军规，肯定会给你处分，你得有个思想准备。”

申明和提心吊胆，等了好些天，夜里老做噩梦。结果，等来的不是军事法庭的判决，而是政治部给他的一个二等功。

据说，是吴信泉军长和李雪三政委碰了意见：申明和打义县时是特等功臣，全军首届党代会代表。这次打飞机事出有因，应予嘉奖。

又过了几天，军部就开了禁：允许打飞机了。

战士们跃跃欲试，不时有喜报传开。

而后，美军飞机到了志愿军头顶上，再也不敢随心所欲，飞那么低了。

1950年12月31日，三八线附近风雪交加，气温骤降。黄昏，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西起临津江口，东至鹿蹄的200多公里正面发起第三次战役。如同摧枯拉朽，“联合国军”的阵地被我军迅速突破。

1951年1月1日，志愿军全线转入追击作战。

当时，50军149师和39军116师分别向高阳和汉城方向迅猛攻击。追击部队直插釜谷里，切断了联军退路。

釜谷里是距汉城不到40公里的一个小镇，虽没什么名气，却无疑是敌我双方拼死必争的“咽喉要道”。1951年1月2日晚，向汉城方向开进的我志愿军347团，在釜谷里遭到“联合国军”的阻击。当时，我侦察排潜入敌方阵地抓回一名哨兵。经审问得知这里全是英军，有一个联队的兵力。当时我方翻译误把一个“联队”理解成了一个“连队”。当时团领导就派1连和3连上去，说你们赶快把他们俘虏算了！没想到后来才知道，这里的守敌竟有一个团（英军的联队就是团）。

弄清事情的原因后，团首长迅速调整部署。3日凌晨3点，7连还剩下的83名官兵，接受了攻占釜谷里北面一个小高地，切断敌人退路的任务。

郑起就是7连的司号员。

守敌的抵抗相当顽强，再加上他们有强大的炮火支援，所以，在攻击无名高地时，刚到山脚下，7连指导员和副连长就相继牺牲。



7连战士拼死冲锋，前仆后继，经过一番激战，终于攻占了小高地，但全连只剩下26人，连长也负了重伤，牺牲前他对战友只说了一句话：“弟兄们，我们钢铁连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你们一定要守住阵地！”

这时，在他身边的郑起就站起来对连长说：“您就放心吧。我是共产党员，请把手枪交给我，我替您指挥！”

关键时刻，郑起拿起那把手枪，他在山头上大喊：“同志们，现在连队的干部都牺牲了，大家都听我指挥。共产党员都要站在前面，人在阵地在！”

英军为了打通退路，向无名高地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猛烈冲击，这是郑起在朝鲜战场上经历的最为惨烈的一次战斗。当他带领大家打退敌人的第三次反击时，全连只剩下17个人。

不久，英军像输红了眼的赌徒，在炮火掩护下，又气势汹汹地向7连阵地发动了第四次进攻。郑起不失时机地动员大家：“同志们，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我们要把敌人打下去，为毛主席争光！”接着，轻重机枪同时开火，硬是把蜂拥而上的英军“压”了回去。但我方也损失不小，此时全连仅剩11人！

丢下一片片尸体后，敌人不甘心失败，很快他们又向7连发动了第五次、第六次进攻。经过一番殊死较量，英军又被击溃。

这时，郑起发现阵地上只剩下7个人！

后来郑起才知道，被困在釜谷里的是英军的王牌部队“莱福枪团”和一个重坦克营。该团团长奥斯特曾扬言，“莱福枪团”的战斗可以顶得上中国的一个师或一个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当天，他们发动了6次规模很大的进攻，竟没有攻下这个不足一连志愿军战士守卫的小高地。

中午时分，阵地上除四处弥漫着战斗硝烟外，显得格外寂静。在这短暂的寂静里，郑起组织战友抓紧加固工事和掩体，并将弹药集中到一起，做好迎击敌人再次进攻的准备。

下午3时10分，最后的较量开始了。“莱福枪团”孤注一掷，在半小时内将5000发炮弹雨点般倾泻到了7连阵地上，整座小山仿佛被“犁”了一遍。

接着奥斯特命令，把发射完炮弹的大炮统统炸掉，然后组织8辆坦克和一个营的兵力，向7连阵地发起了最后的冲锋。英军心里清

楚，只有强攻下这个高地，才能跳出志愿军的包围圈，逃回汉城。

郑起带领另外6名战士用机枪凶猛扫射着。而这次敌人也玩命了，常常是前面倒下黑压压一片后，后面又马上潮水般涌了过来。志愿军战士不停地射击，投手榴弹，阵地上一时尸横遍野。激战到下午5时30分，郑起发现，他们的弹药已所剩无几！

这时，英军士兵已冲到距阵地不到20米的地方，手榴弹扔完了，最后一根爆破筒也扔进了敌群。

郑起端起冲锋枪，几梭子弹一顿猛扫，虽然放倒不少英军，可子弹很快也打光了。敌人就要冲上来了，怎么办？

忽然，郑起想起了连长交给他的那支手枪。他从腰间拔出后，对着冲过来的敌军“啪啪啪”就是几个单发射击。眨眼间，手枪子弹也打光了。眼看敌人就要占领阵地了，情急之下，郑起想到身上的军号。他把军号从身上取出来，傲立山头奋力吹响了冲锋号！

“嘀嘀哒——哒嘀……”伴随着嘹亮的军号声，仿佛有千军万马汹涌冲杀而下。

英军太了解这种“如魔鬼般狂啸”的喇叭声了。此后，“联军”总司令李奇微，曾在《朝鲜战争回忆录》里这样描述志愿军的军号：“这是一种铜制的乐器，能发出一种特别刺耳的声音。在战场上，她仿佛是非洲的女巫，只要她一响起，共产党军队就如着了魔法一般，全部不要命地扑向联军，每当这时，联军总被打得如潮水般溃退。”

当然，这次也没有例外。当郑起一口气吹响两遍冲锋号后，对面的英军被志愿军的这股士气镇住了，虽然他们端着枪，距这位志愿军战士只有十几米，却没有向他开枪！

后来，一位英军士兵在日记里这样写道：“听到这号声，我感觉到这分明是中国式的葬礼！”

最初，英军迷惑、惊慌，接着转头便往山下逃。真是兵败如山倒，正如他们的总司令所说，“联合国军”再一次如潮水般溃退了。

当然，这其中包括他们那几辆无坚不摧、火力强大的重型坦克！

就这样，我志愿军347团7连从83人打到最后7人，从2日午夜打到3日黄昏，硬是击退英军的轮番进攻，像钉子般牢牢守住了阵地。由于扎紧了口袋，他们配合主力部队，创造了歼灭英军王牌“莱福枪团”大部的经典战例。

1951年冬天，郑起荣立特等功。不久，志愿军总部又授予他



“二级战斗英雄”称号。他那把曾在阵前吓退英国王牌军的小铜号，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

釜谷里的战斗结束一年以后，郑起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在北京参观了几天之后，9月30日，郑起收到了一个红色请柬，上面写着：谨请光临——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

在中南海的怀仁堂，毛泽东宴请200多名各界来宾。

毛泽东所坐的桌子是100号，郑起坐的桌子是66号，排列的原因，郑起和毛泽东仅仅相隔一张桌子。

19岁的郑起，出身于一个苦命人家，两岁时父亲去世，三岁时母亲改嫁。他要过饭，放过猪，要不是参加了军，他根本不知道人吃饱饭是什么滋味。

郑起端着一杯酒，走向毛泽东，说：“毛主席，我想敬您一杯酒。”

毛泽东：“你是志愿军的代表？”

郑起：“是。刚从前线回来。”

毛泽东双手接过酒杯，一饮而尽，然后放下酒杯，握住这个年轻士兵的手，使劲地摇了摇。

郑起回到朝鲜的战壕后，对他的战友们说，毛主席的手热热的，又厚又软。

晚年，郑起对登门采访的电视台记者回忆说：“我感到很幸福，为什么呢？第一，我没死，第二，我到北京见到了毛主席，参加了全国第一届第三次政治协商会议，还到主席家做客。我们19个代表中的3个人到了主席家，给主席讲故事，主席问我怎么用冲锋号吓退敌人，毛主席还给我签了名，朱总司令给我签了字，我和毛主席合了影，在主席家吃了一顿饭，也就四个菜一个汤嘛，还有一个辣椒，这是毛主席的生活特点。当时毛主席岁数挺大了，我那时候才20多岁，我说吃您老人家做的菜饭啊，我非常光荣啊！”

如今郑起老人已80多岁，离休后在辽宁鞍山安度晚年。

年长者大概还记得，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鼎鼎大名的高元钧曾说过一段山东快书《一车高粱米》。这个故事的主角叫作宋惠国，起义前是国民党第8军的一名老兵，后来参加志愿军入朝作战。

宋老是山东海阳人，现年87岁，居住在花团锦簇的成都，身体硬

朗得很。

宋老回忆，那是一段很偶然，很刺激，而且还充满喜剧色彩的久远往事！

1951年11月的一天深夜里，雪大风紧。身为中国人民志愿军38军后勤部汽车18团5连的宋惠国接到命令，从阳德运送一批高粱米到前线。

当车队路经原山附近一个交叉路口时，防空岗哨突然鸣枪示警：敌机来了，赶快熄灯！

所有车辆赶紧把灯灭了，继续摸索着往前开。行驶在车队最前面的苏联嘎斯车由宋惠国驾驶，副驾驶座上坐的是个新兵。他们两人各自佩有一支波波沙冲锋枪，宋惠国把枪放在右手边，方便自己随时战斗！

行驶到交叉路口时，由于一处路牌指向了错误方向^①，再加上着急赶路，宋惠国驾着车一溜烟冲过了志愿军前沿阵地，误入到防线一公里处的美军阵地上。

一直到宋惠国看见前面不远处灯光亮着一大片，发现不像志愿军待的地方，志愿军的阵地上哪有电灯？赶紧调转车头往回开。

孰料，就在他紧张倒车时，后轮猛一下滑到了公路边的沟坎里，任凭他怎么满头大汗变挡、加油门，汽车也爬不上来！

偏偏在这要命关头，前面又来了一辆罩着篷布的美军大道奇。

美军司机把戴着钢盔的宋惠国和新兵当作了南韩军，在距离他俩不远处停下，跳下车来，比画着主动表示愿意帮忙往上拉。

宋惠国沉住气，埋下头，挥手示意对方，谢谢，不用帮忙！

美军驾驶员转身提上折叠桶，顺着山坡下山打水去了。

宋惠国一看大道奇驾驶室的门小开着，引擎转着也没熄火，顿时有了主意，悄声吩咐新兵打开保险。一挥手，宋惠国从右边，新兵从左边，悄悄摸到了汽车后面。

撩起篷布，一股热气冲到脸上。透过缝隙往里一看，嗨，满满一车美国兵正抱着卡宾枪，在里面打瞌睡哩！

宋惠国心中暗喜，嗨，这才是鸿运当头，活该咱立功！

他示意新兵与自己一左一右，绕过车头，钻进了大道奇的驾

① 潜入北朝鲜活动的南韩军游击队十分猖獗，破坏路牌是他们惯常使用的手段。

驶室。

宋惠国压着嗓子对新兵说：“快把枪口对准后面的美国佬，如果被发现就马上开火！”说完推上挡，一踩油门就往回路上开。

山路颠簸，铺着厚厚积雪的路面直打滑，一不小心翻下山就完了。

宋惠国一心只想俘虏这满满一大卡车美国兵，借着照明弹的余光，一口气冲过了封锁线，跑回到志愿军阵地上。

整个过程，车上的美国大兵一点儿也没有觉察。

阵地上的志愿军一看冲过来一辆美军大道奇，立即抄起长短家伙，一拥上前，发出停车信号。

宋惠国冲着战友们大喊：“快抓俘虏！车上全是美国兵！”

说完便来了个急刹车，打开车门，抄着波波沙跳下来，和新兵分头冲到卡车尾部，用刚学会不久的英语大喝道：“葡萄藤——根！（即“放下武器”）”

这时候从车上跳下来一个美国军官，一看情形不对，本能地伸手去摸腰间的左轮枪。说时迟那时快，围上来的一名志愿军军官甩手就是一枪。

更多的志愿军举起武器大喊：“葡萄藤——根！”

虽然志愿军的发音不准，但美国兵还是听明白了。

他们一看眼前的阵势，知道要想活命最聪明的做法是什么。一个个马上规规矩矩地把枪递给志愿军，然后跳下车，双手举过头顶，乖乖投降。一大卡车美国兵还没回过神来，稀里糊涂全当了俘虏。

志愿军一边收缴武器，一边清点俘虏人数，结果，宋惠国用满满一车高粱米，换回来25个美军俘虏。

回到团部后，团长乐不可支地夸奖他：“宋惠国你这回赚大发了，一车高粱米换回一车正牌美国货。”

宋惠国也因此荣获二等功，他的这一段传奇经历，还被编成了连环画。

不过，后面接踵而来的朝鲜战地故事，比这更精彩，更曲折，更壮烈，更让人或拍案称奇或扼腕长叹……

2. 大资本家的儿子也立功

陈卓文父亲出任过重庆盐业公会的会长，是重庆排得上号的富豪，大大小小娶了好几个老婆。陈卓文是最不得宠的那个小老婆生的，他母亲最后郁郁而终。他们父子俩关系极差，最后闹到签字画押脱离关系的份上。倔人倔脾气，他和封建家庭划清了界限，索性报名参加了志愿军。

所以他在接受采访时，再三叮嘱不要写他老汉的名字。他这一辈子，和老汉没有任何关系。

陈卓文和父亲赌气参加了解放军，像他这种重庆大学毕业的正牌大学生在首长眼里当然是个宝，一穿上军装，首长便安排他当上了文书。他这人很有意思，长得来人见人怜，话不多，给人感觉总是一群人里最不合群的一个。整天看他忙前忙后不吱声，有他没他一个样，也就从没人和他过不去，闲职、副职总给他挂一个。

陈卓文在朝鲜待到1958年才回国，仗打得不少，和美国兵、英国兵、韩国兵、加拿大兵，甚至泰国兵都交过手。

留给他最深刻印象的，莫过于坑道战。

说起坑道战，看过上甘岭的没有不知道的。就是像矿洞一样，地底下挖一段涵洞，人躲在里头不怕炮炸。

其实这不全面，坑道战术实际上是因为以前吃了美军火力太大的亏，前线部队总结出来的一套防守战术。

大家都知道，一座山有两面，一面向着敌人，一面向着自己，两面都能看到的山顶轮廓叫棱线。因为敌人的火力太强太猛，如果在朝着敌人的那面构筑防守工事的话，往往一打起来，敌人一顿大炮飞机，工事就全毁了。志愿军火力太弱，根本没办法压制，就等于是把自己摆在砧板上，任由美国人狂砍乱剁，工事里的人八成都得完蛋。

志愿军流了很多血以后才总结出经验，把主阵地设在山的另一面——就是朝向自己后方那一面，也就是军事术语上说的“反斜面”——然后再利用反斜面敌人的炮火死角做文章。这样一来，敌人直瞄火炮首先就成了摆设，曲射炮虽然能打到，但炮弹落到反斜面死角很多，构筑挖掘出射击工事、屯兵洞、带顶盖的壕沟，志愿军基本不暴露在露天。这样一来，敌机，敌炮火的杀伤力，就减轻了好多。



反斜面阵地还有一个好处，敌人别想抄后路包围。如两座山一前一后，以往敌人进攻时首先用炮火压制住前山，让你动弹不得，既撤不下去，也没办法支援后山。他再集中兵力左右来上个穿插，把后山一占，把后路一断，前山的人基本就剩下死路一条，阵地守不住，人也基本完了。现在他再想来这手，首先炮火也好，飞机也好，根本压制不住前山的人，志愿军的主阵地就面对着后山，“你攻我后山，行，把你的后背全亮在我前山的枪口下吧。这在前线叫作‘倒打火’，我们就是趴在工事里打活靶，敌人敢这么干，他就是找死！”

现在再想进攻，对敌人来说就只有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啃，拿人来填。陈卓文他们在棱线上只设几个观察哨，放几个狙击手，东一枪西一枪，零敲碎打。迫击炮预先测好诸元，敌人大规模进攻，就用迫击炮隔着山头猛砸，观察哨修正弹着点。“敌人快冲到棱线附近了，我们隔着棱线甩手榴弹，人不露头，一片片地甩，你打不着我，我炸得你没处藏没处躲。敌人手榴弹甩过来也没用，我们大部分都在死角猫着呢！就算你攻过了棱线。对不起，噩梦刚开始，我主阵地的机枪就盼着你露头哩，一打一个准，还是打活靶。”

反斜面坑道阵地最大的好处是抵消了敌人的炮火优势，逼着敌人和陈卓文他们用一样的办法作战，人和人打仗，而不是人和钢铁打。

反斜面阵地的要害在于对棱线的控制，谁占领棱线谁就掌握了主动权，占领棱线就是刺瞎对手的眼睛，而在地面上交手，通常都是志愿军占上风。所以他们的眼睛始终雪亮。

如果敌人占领了棱线，他就可以在棱线上建立观察哨，修正它的迫击炮，一个点一个点地把志愿军的火力点敲掉，弄得陈卓文他们毫无还手之力。“甚至他还可以调上来几门直瞄火炮，大口径机枪把你封死在掩体里，掩护他的喷火兵、爆破手上来干掉你。”

陈卓文说：“最危险的是如果敌人动作快，我们又丢失了棱线，他突然全力扑上来，没有预警，我们没来得及展开兵力占领阵地，让他把你堵在洞子里那可就冤大了。首先洞口太窄，你的兵力无法展开，人家两支枪就把你整连整排封死在洞子里了，然后他的爆破手、喷火兵紧跟着就上来整你了。坑道拐个弯，或者多几个口子，他一下子吃不掉你，但是能够耗死你。地底下没有补给，人能活几天？憋几天？美军遇上实在打不开的洞子，就直接把推土机开上来填了了事。这就成了活埋。”

所以那时候的主要战斗，就是围绕着争夺棱线展开。

但是无论美国人想了多少办法，用了多少招数，打来打去，优势仍然在志愿军这一边。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它多么强大，多么牛气，只要能把仗打到由人来决定胜负的地步，咱中国，哈哈，还怕谁呀？

一次、二次、三次战役，美国佬在朝鲜是大折了面子的；四次、五次战役李奇微尝到点甜头，找回点自信，所以没隔多久，就发起了一系列进攻，想趁热打铁多捞回点面子。

这些进攻目的只有一个，试探志愿军防守的漏洞。对于一些对大规模进攻发起至关重要的战略要点，尽可能抢占。

不用问，这次打头的又是倒霉鬼南韩军。

当然了，人家本来就是来帮助你李承晚这个本家的嘛！要说这期间南韩军的战斗力，老实讲就步兵进攻的那个顽强劲儿还是很有点气势的，而且“李承晚集团”也并不像以前我们宣传的那样不得人心。这是因为金日成的部队所到之处，赤色专政的雷霆之威早就把逃到南边的那些地主、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打没有了。家破人亡，满目疮痍，生不如死，为替亲人报仇，这些人全都打红了眼！眼角眉梢都是恨，恨谁？一恨中国人，二恨苏联人，三恨美国人，因为这些人全都不把他们韩国人当人看。

南韩军的表现也挺有意思的，要吃大亏了，能拽上美国佬的绝对不自己单扛，能让美国大哥顶着的自己绝不出头。实在没招了，真要拼命也能打得地动山摇，面不改色。

好多志愿军老兵谈起那些韩国兵也说他们能吃苦、顽强、刁钻，而且要命时刻极擅逃命。

陈卓文的那个连队就是在这当口，又被投到第一线的攻防战中去了。那天一道命令，坑道守备挖掘移交给人民军，全连赶了几十里山路，就到了打得正炮火连天，热热闹闹的第一线。

陈卓文他们赶到阵地的时候，兄弟部队已经凄凄惨惨了。敌人用观测机指引火炮，把山上阵地和后方增援的路封锁得严严实实。轰炸机、歼击机也整天在脑袋上转。上阵地的小路被炸成一片开阔地，原有植被一扫而光。别说活物，所有犄角旮旯，能猫能藏的地方都挨过炸。那个汽油弹一扔，有个缝的地方它都能钻进去烧，阵地上白天根本上不去人。



冲在前面为美国佬开路的韩国兵把仗打出了“色彩”：进攻的时候十几个人轮流推着一个空汽油桶，匍匐前进，里面装些不容易打坏的什么锹啊铲的，或者半桶水泥沙子土什么的，用它来挡子弹，挡弹片挺管用的。而且一出来就是圆滚滚的几十个满地爬，爬到棱线附近再把汽油桶立起来，原来一面桶壁已经凿开了个小口，另一面也做成了活动的格子。一打开，每一个汽油桶就成了一个射击工事。每一个工事后面至少有一挺机关枪和十几支冲锋枪。几十个这样的工事突然立在面前，棱线的争夺对志愿军就难了，你稍一犹豫，人家就地开始加固。不一会儿简易工事做得像模像样。人家就这么稳扎稳打，利用炮火优势，逐步控制了棱线。

在这种战术下，白天棱线无论如何也守不住，唯一的办法是拖时间，死守反斜面阵地，拖到天黑，新部队运动上去，再反击，恢复对棱线的控制。第二天一切重新来过。反击部队就是上百人一股的敢死队。美国人就躲得远远的，看着韩国人和中国人拼命，双方伤亡都很大。

陈卓文他们就是这样带着一帮新兵，一天拂晓前摸上去躲屯兵洞里的。随着一声哨子响，几颗信号弹上天，敢死队员潮水般涌过棱线。咱们的迫击炮这时候也发了疯似的猛砸，敢死队员脑袋里就是一个字，快！趁着敌人照明弹还没升起来，炮弹还没砸过来。趁着敌人被我们的迫击炮砸蔫了，和敌人扭到一起，缠到一起，那死啊活的全交给老天命去安排了，一股劲儿掩杀过去再说。

新兵们跌跌撞撞地跟着老兵，迎着那些汽油桶，迎着机枪子弹往上冲。稍一犹豫就被打倒。“你扫吧打吧！打不死十几秒以后我就冲上来了，所有敢死队员脑子里只剩下这一种想法，冲到跟前，手榴弹炸，冲锋枪扫，再加上刺刀挑。”

真到了急眼的时候，韩国兵也不孬，三个五个抡着工兵锹，端着刺刀和中国人杀成一团。喊杀声，怪叫声，爆炸声，枪声，惨叫声响成一片。敌人的照明弹一发又一发升起来，惨白惨白地照着这一切。陈卓文他们边打边破坏工事，完了事赶紧撤，必须赶在天亮前撤回棱线那一边去。如果天亮前在正斜面上撤不下去，敌人的飞机大炮一炸，就一个也别想活了。

于是随着哨子一声长响，还没倒下的人就拖着还有口气的弟兄，赶紧往回疯跑。

果不其然，美国佬的飞机紧跟着赶来丢炸弹，远程大炮也打过来了。一群人穿过炮火跑回来一数，还剩36个！

等到飞机不见了影儿，炮击也渐渐停下来，棱线另一边传来了伤兵的哭喊声。

照明弹还在一颗一颗地升起来，天却是鱼肚白了。

突然，一阵猛烈的机枪声又响了起来。美国大炮马上猛砸了起来。

陈卓文马上爬到棱线一处观察点，借着照明弹的亮光和朦胧的天色往下一看，是他手下的一个班长，“他叫啥名字我都不晓得，”陈卓文说，“只晓得是个湖南湘西的人，自小在土匪窝里长大，人长得倒是斯斯文文，会武术，枪打得极准，不管手枪步枪，指哪打哪。这人才满17岁，他带那个班，是前一天才补充进来的。”

陈卓文只看见湘西人在一堆死尸中间跪着挪来挪去，手里端着一挺圆盘轻机枪，对着山下往上爬的南韩军猛扫。子弹打光了，又捡起身边的武器接着打。他身后拖着一段累累赘赘的东西，拖来拖去，很碍事儿。陈卓文仔细一看，竟然是湘西小伙子的一条被炸断的小腿，白森森的一根骨头，在惨白的晨光下看得清清楚楚。炮击炸起的烟雾一会儿就遮天蔽地，弹片乱飞，没人能够走过去把他带回来。

虽然仅仅隔着100多米的距离，烟雾中陈卓文看见那位湘西小伙子自己用刺刀把小腿上还连着的筋挑断，把小腿抓起来，向着山下扔了出去。然后再次被烟尘笼罩。美国佬的炮弹不停地砸过来，湘西人的枪声时断时续，很快便沉寂了下去……

陈卓文当初回国到处作报告的时候多数讲的还是一些正面的战斗故事，他知道若是把这些他主动过滤掉的真实故事加上去，会让人听了真不知说什么好。

比方说，他自己参加过敢死队的事，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就守口如瓶，说出去担心听众会认为这样做很残忍。那些年间的老百姓也都从电影上看到，只有反动的国民党军队才会把连长、排长、老兵集中起来，组成敢死队和解放军拼命。

陈卓文说：“不能说经常，确实有过。我们在朝鲜那阵，部队打红了眼，宁死不丢一寸土地的决心和勇气十分坚定。困兽犹斗大不了一死。东方民族的顽强和坚毅西方人是很难理解的。一次我所在的连



队在反突击作战中第二次几乎被打光，敌人也打累了，白天的进攻疲沓无力，仅仅象征性地打了几炮。我们活着的30多个人终于等到晚上全部撤了回去，阵地交给了新上来的连队。没想到第二天敌人的火力出奇的猛。像撒胡椒面一样扔炮弹。以前扔汽油弹也就一颗两颗，看准了来这么一下，那天的汽油弹扔得不断点。”

陈卓文那时候待在营指挥所里看着那个山头就像一个大火炬，整整一天烧得如同火焰山。到晚上增援上去，换下来一批伤员，那个惨啊！大部分都被烧得没了人样。

有一个被抬下来的时候昏迷，下来路上醒了一把拽住旁边的一棵断树死活不撒手，说出的话已经含含糊糊，别人不仔细听不明白。仔细听，原来他说不下去，要死在阵地上。他们全排都死了，他要回去死到一块儿，完蛋就完蛋！结果一下没按住，他滚下了担架，担架兵看见他的两条腿烧得像焦炭一样，把他弄上担架，按住抬了回来。结果下来就死了，一只手里还死死攥着一板亮铮铮的子弹。

陈卓文所在连队剩下的干部和老兵七八个人被一个电话叫到了团指挥所。到那里已经有兄弟连队的几十号老兵、班排长等着了。

团长的脸已经没了人形了，胡子拉碴。见了他们的面，团长声音嘶哑地说：“美国佬换防上来了，你们从后面绕上去，整他一家伙。侦察科长带队，不把他们的屁股整烂就别回来。”

说完摆摆手，进屋了。

侦察科长接着介绍情况计划，摇摇头说我们团伤亡太大，师里马上换别的团上来。咱们一定把阵地稳固好交给他们。

讲完就出发，到夜里那一场血战，打得来昏天黑地。

陈卓文边跑边甩手榴弹，一脚踩空滚下了一个小山包。正是美国人的一个机枪堡口，里面四五个人正打枪呢！陈卓文摔得心口发咸。那四五个人一回头看见了他。陈卓文心想完了，手上不带停，抢在美国兵没来得及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拉着了手上的手榴弹，一甩一个侧滚。与此同时第二颗已经掏出来了，在第一颗爆炸冲起的声音烟团中，第二颗也甩进去了。

黑天半夜，手榴弹就是最好的武器。机枪堡里传来一阵惨叫。没死的端着枪往外头胡乱扫射，四五个手榴弹也扔出来了。陈卓文也被炸伤，爬着离开了那里。往己方阵地爬呀爬，爬了回去，昏倒在自己人的阵地上。等醒来已经到了医院，他的一根肋骨摔断，一条胳膊也

被炸得血肉模糊。一只眼睛几乎失明。

此战，陈卓文荣立了二等功，他的前线生活到此也暂时告一段落，送回天津养了大半年伤。伤好后，组织上给他多种选择，他还是回到了部队。1958年志愿军胜利归国时，他已经是正营职干部，半年后，转到重庆南岸区人武部工作。

3. 从“违犯军纪”到“重如泰山”，再到……

1952年1月2日，元旦过后的第一天。清晨寒风凛冽，雪雾弥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7军141师侦察连的战士们，如往常一样沿着石田里村旁的栎沼河早操。旁边不远处，有一群小孩在结了冰的河面上玩耍。

7点左右，部队早操完毕，队伍回营房，刚刚走过河滩，突然听见了叫喊声。原来是冰面垮塌，有人掉进冰河里了。

一名走到队伍后面的志愿军战士飞步冲到河面上。

他看见冰窟窿里泛着水花，便猛地跳了下去，冰下的流水很急，不知把孩子冲到哪里去了。这位战士在水里摸了好一阵，也没摸到。孩子们站在冰上，焦急地盯着冰窟窿。一会儿，水面上一阵晃动，伸出来两只小手，接着是孩子的脑袋。志愿军战士把孩子托上来了，孩子用两只胳膊扒住了冰，使劲往上爬。没想到“哗啦”一声响，冰塌了一大片……

后来的结局在中国家喻户晓，落水的孩子得救了，救人的志愿军战士牺牲了。

被救的朝鲜儿童叫崔莹，牺牲的战士是141师侦察连文书，他的名字叫罗盛教。

1952年1月26日正值除夕，这天下午正在朝鲜志愿军47军139师执行采访任务的新华社记者戴煌，忽然接到新华社驻朝鲜志愿军总分社社长普金打来的一个紧急电话，给他简单讲了一下罗盛教牺牲的经过，要他马上去141师采访，越快越好。



1月27号大年初一，戴煌赶到了141师罗盛教生前所在的侦察连。

连里淹死了人，连里的干部正为这事情弄得来垂头丧气哩。

因为在那个特殊的岁月里，如果不是参加一线战斗而阵亡的战士，都要被当作非战斗减员的故事来处理，比如有的战士在巡逻过程中，意外被美军炸死，或者行军时跌下山崖摔死，不小心被山洪冲走，这些情况都被归入非战斗减员。

出现非战斗减员，就算事故，干部不仅无功，还会有过。轻则通报，重则包括连长指导员在内的相关人员，都要受到批评检讨，甚至降职免职的处分。

而像罗盛教这样在出早操时遇上突发情况，因救人溺亡，不仅已经理所当然地被视作违犯军纪造成的人员伤亡事故，连长和指导员联名向上级打了请求处分的报告，等待全师通报批评不说，至少有一人会被撤职或是降职。

可后来发生的事情，却很是微妙。

1月2号下午，罗盛教的遗体被打捞上来，挖好坑，准备安葬。连队干部也在忐忑中等待接受上级的处分。

然而就在这时，一些闻讯而来的朝鲜村民听说罗盛教是为救护朝鲜少年崔莹落水身亡的，一致向志愿军部队请愿，要用朝鲜老百姓最高的礼节——用酒擦干净身体后，再用白布裹缠全身——来隆重地安葬罗盛教。

侦察连连长和指导员急得急挠头——把自己战士的遗体交给外国人安葬这样的涉外大事，连队哪里敢做主？

而就在此时，志愿军部队内部报纸《47军军报》一位先期到达石田里采访的记者，已经敏感地从正在发生的这件事中，认识到了罗盛教牺牲的特殊价值，并且向罗盛教所在连队表达了他的不同看法。

戴煌晚年接受电视台采访时回忆说：“这个记者很有眼光，认识到这是一个有着国际主义精神的，非常伟大、非常难得的事件。罗盛教救的不是一般人，是朝鲜人民中的一位少年，因为中朝之间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心的问题，双方闹得很不愉快，现在上面正在大抓中朝两国两军团结这样的大事情，在这种重要的时刻，突然出了这样一件事，当然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这位军报记者还向侦察连连长和指导员说，你们不应该向上级写什么检讨，主动为自己要求接受处分，而是应该马上向上级打请功报告，赶紧替罗盛教请功。连长和指导员

心里正打鼓哩，听了军报记者的话，便大着胆子给上面打了个请功报告，心里仍放不开，只是忐忑不安地为罗盛教请了个三等功。这个军报记者回去就对141师的师首长说了，这样子师里面才重视起来，把这个事情就报告到志愿军总部去了。总部一看材料，这么典型的事情，给个三等功怎么行呢？得大张旗鼓地给予嘉奖啊！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知道这事后，才赶紧打电话给我，让我赶去141师采访。”

1951年夏天的抗美援朝战场上，刚刚结束第五次战役的中国军队遭受挫折，战士情绪冲动，加上水土不适，出现了焦躁不安的思乡情绪。

再加上志愿军有时迫不得已“就地筹粮”，中国军队同朝鲜军民之间，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诸多矛盾。

而且因为历史的原因，一些中国官兵脑子里普遍存在着恩人思想，看不起人民军和朝鲜老百姓，又不懂人家的说话语言，对朝鲜人的风俗习惯也不太尊重。

久而久之，各种各样的矛盾，甚至冲突就在所难免了。

中朝军民之间出现的这些矛盾和冲突，很快被察觉。两军合作，此为兵家大忌，而罗盛教救朝鲜落水儿童身亡的事迹，让政治敏锐的北京方面立即捕捉到了修复两国军民之间情感的极好契机。

于是，毛泽东最终亲自拍板决定，将罗盛教的事迹作为代表中朝兄弟般友谊的一个典型政治事件来处理，并立即着手大力宣传。

1952年2月3日，为表彰罗盛教的事迹，志愿军总部为罗盛教追记“特等功”，并追授一级“爱民模范”称号。

朝鲜方面也积极配合，追授罗盛教一级国旗勋章和一级战士荣誉勋章。并将其献身的栎沼河改名为罗盛教河，罗盛教所救的孩子崔莹的家乡，改名为罗盛教里，安葬罗盛教遗体的佛体洞山，改名为罗盛教山。

1952年2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的通讯。

文章开头这样写道：“在朝鲜北部某村的南山坡上，有一座新建的坟墓，一个多月以来，凡是在这座墓前经过的军人和人民，都怀着崇敬的心情走上了墓基，来凭吊这位埋葬在朝鲜土地上的中国英雄。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侦察连文书罗盛教同志……”

这篇通讯的作者，正是新华社驻朝鲜志愿军分社刚满19岁的戴



煌。当年的戴煌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自己这一篇不足两千字的小小的通讯，竟然在一夜之间为国人造就了一位时代英雄。

1931年，罗盛教生于湖南省新化县一个普通的村庄，全家以务农为生，罗盛教是家中长子，他还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1951年4月，刚刚从湘西军政干部学校毕业的罗盛教，加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并随部队奔赴朝鲜。一人参军，全家光荣。对于当时的罗家人来说，罗盛教是全家人的荣耀。

然而仅仅时隔不到一年，罗盛教从朝鲜牺牲的消息，就传到了家乡。牺牲时，他才21岁。

长子罗盛教的去世给罗家带来了沉重的打击，悲伤一度笼罩着这个家庭，然而很快这种悲伤就被接踵而至的巨大荣耀所冲淡。

罗盛教的英名一夜之间飘红全国，他的家人自此享受到了全国模范烈士家属中最高等级的殊荣。罗盛教牺牲后，他的弟弟罗盛民立即参军。全家人也被政府从相子村迁到了新化县城，全家都办了“农转非”。

中国大地上的每一个小学生，都要熟读甚至背诵课文《罗盛教》：“1952年1月2日早晨，朝鲜石田里的山野上铺（pū）着厚厚的雪。几个朝鲜小朋友在河面上滑冰。突然咯（kā）嚓（chā）一声，冰破了，一个孩子惊叫一声，掉进了冰窟（kū）窿（lóng）。他的同伴都吓得哭起来。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罗盛教正好走过这里。他听到叫声，知道出了事，就急忙向河边跑去……”

罗盛教牺牲之后，政府无论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给予了罗家极大的补偿，而这种补偿也让罗家人暂时忘却了一些悲痛。

可是在内心深处，失去长子的罗家，一直还是希望有一种情感的补偿，也正是在这样的心理背景之下，两个特殊的家庭，开始了特殊的情感交往。

1953年7月，停战协定签订100天后，罗盛教的父亲罗迭开随同以贺龙为团长的中国政府慰问团赴朝鲜访问。

在朝鲜，金日成会见了他们。罗迭开第一次见到了儿子罗盛教在朝鲜的墓地，并见到了被儿子救起的朝鲜少年崔莹。当崔莹飞奔上来一把抱住了罗迭开，用生硬的汉语亲热地叫他“爸爸”时，罗迭开老泪纵横……

随后，两家人互换了礼物，崔莹家送罗迭开的礼物是两套朝鲜民

族服装，一匹他母亲亲手织的家绢。罗迭开带给崔莹的礼物是一个毛泽东主席石膏像，一套蓝色毛哗叽衣裤。

同崔莹家的这次热烈会面，让罗迭开暂时获得了失去长子的情感补偿，甚至有那么一些时刻，罗迭开恍惚觉得眼前这位活泼可爱的朝鲜少年崔莹正是儿子罗盛教的化身。而懂事的崔莹也表现得令罗迭开非常感动。当罗迭开结束这场朝鲜之行离开时，崔莹对罗迭开说，“我真想同您一起到中国去，看看中国的妈妈、弟弟和妹妹们”。

令崔莹和罗迭开两家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崔莹的这个愿望很快就成真了。1954年3月14日，朝鲜第三届访华团抵达北京，崔莹幸运地成为访华团一员。时隔半年之后，崔罗两家人再次见面了。这一次见面将崔罗两家跨越国界，代表中朝两国人民友谊的交往，推向了极致。在此后数十年间，他们两家从朝鲜到中国，从中国到朝鲜，不受国界和语言的阻碍，一直坚持来往，从未间断。

而在崔罗两家亲密交往的背后，罗家革命烈士家庭的荣耀，也还在同步发酵。它当然吸引住了众多中国人的目光。

1968年，一位年轻美丽的姑娘跨进了罗家的门槛，很快便成为了罗盛教的弟弟罗盛民的媳妇，她叫陈纯。

当年仅18岁的知识青年陈纯，直到今天都毫不讳言她当初嫁进罗家的原因。

陈纯面对千千万万的电视观众坦诚直面自己曾经走过的人生道路，她说（原话直录）：“像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他家里的这个，罗盛教的家乡，我是绝对不到这里来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我是一个很要求上进的青年，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是个共青团员了，我就是对自己负责，我们对国家来讲，我也是负责，要求做个好青年，也是这么想，直接到罗盛教家乡去。我会发展成个好青年，我也很想读大学。”

陈纯所有的愿望都一马平川地实现了，大学毕业后她成为了一名中学老师，作为罗家最有文化的人，陈纯走进罗家后，自然成了家里的笔杆子。当年，罗迭开人生中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宣讲儿子罗盛教的英雄事迹，而宣讲稿，无不出自陈纯之手。

知识青年陈纯终于找到了她嫁进罗家的价值。

与此同时，她也理所当然地享受到了罗家人所拥有而普通人无法想象的无上荣光。自1956年开始，罗迭开先后8次上北京参加全国烈



士军属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两次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观礼，先后7次受到毛泽东的亲自接见。

而在志愿军中另外一位事迹与罗盛教一模一样的战士，却几乎被遗忘了。

被遗忘战士的名字叫史元厚。

史元厚是志愿军铁道兵某师警卫连的一名战士，山东省长清县人。1953年12月1日，朝鲜儿童赵元弘滑冰时掉到冰窟窿里去了，听到呼救声的史元厚飞步赶到，跳了下去。

结果与罗盛教一样，朝鲜儿童得救了，史元厚没能爬上来。

整个经过和罗盛教几乎一样。

虽然史元厚也被追认为党员，立了一等功，获得了“爱民模范”称号。可是，就因为他没有像罗盛教一样被列为有着特殊意义的“典型”，所以知道史元厚这个名字的中国人，就微乎其微了……

1973年，年仅37岁，已经成为一名军队工程师的崔莹因参加朝鲜的国防建设，受伤身亡。崔莹的去世无疑成为了崔罗两家关系变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有些巧合的是，从这一年开始罗家的命运，似乎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1977年，罗家的次子罗盛民也因病去世。崔罗两家两位男丁的先后去世，不仅给两家人带来了致命的情感打击，也使得曾经亲密的感情，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与此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中朝关系的冷暖变迁，阴晴不定，崔罗两家的声望，在各自的国家里也日渐走低。

当2010年表京玉代表崔家踏上中国时，早已没有了昔日的荣光，没有陪同，甚至没有官方接待。

78岁的表京玉就是罗盛教所救的朝鲜落水少年崔莹的结发夫人。

这一年，湖南某小学举行70周年校庆，特地邀请表京玉前来参加罗盛教母校建校70周年校庆。

年迈的表京玉由女儿和女婿陪同抵达吉首火车站这天，罗盛教的两位妹妹和陈纯专程前往迎接。

这是表京玉第一次来到中国，也是时隔多年之后，崔罗两家人真正意义上的一次见面。

表京玉此次前来中国，除了参加罗盛教的母校湖南某小学校庆之外，还有一个心愿，她想去看看罗盛教的故居。几十年来，崔家一直

对这位给了其生命延续的英雄，存有深深的感激。

她想在恩人的故居向恩人的英灵表达谢意，这或许是她有生之年唯一的一次机会。

然而表京玉的这个绝对不高的愿望，最终居然匪夷所思地“因为前往罗盛教故居的差旅费没有着落”（陈纯接受电视台记者采访时所言），而最终搁浅！

陈纯是这样解释的（原话照录）：“表京玉做梦也想到中国看看，也看看罗盛教原来小时候生长的地方，她很想到罗盛教的故乡看一看。但这次……唉，怎么说呢？很遗憾吧。”

表京玉最终不仅没能实现前往罗盛教故居缅怀的愿望，就这样带着遗憾，结束了这趟短暂的，肯定非常非常不愉快的中国之行，踏上了返回朝鲜的列车。

更不可理喻的是，“由于经济拮据，她们一家三口返程时的火车票，都成了问题”（陈纯语）。

象征中朝两国人民友谊的崔、罗两家的会面，最终竟然会因为不知道3张火车票究竟由谁来埋单，而画上了一个绝不圆满的句号。

区区3张到北朝鲜的火车票，怎么可能成为无法解决的“问题”？

时间可以改变一切，时间也可以验证一切。当时光远去，人们似乎已经渐渐淡忘了这一切，包括教科书上曾经的那些文字，也包括曾经的英雄罗盛教。

前往站台上送行的，唯有孤零零的陈纯一人。

列车一声长鸣，载着苦脸凄凄、默然无言的表京玉和她的女儿女婿渐行渐远……

4. 第一位高呼“向我开炮”的英雄

恐怕最能够佐证谭秉云所言“英雄不是想当就能当的，那得碰运气”的，是蒋庆泉的命运。

毫无疑问，中国人民志愿军步话兵蒋庆泉，算得上是全世界最倒霉的大英雄。



说蒋庆泉，得先从当年的志愿军第23军《战地报》记者洪炉^①先生谈起。

洪炉是1952年9月作为第二批轮换部队赴朝参战的，他入朝时，第五次战役已经结束，“三八线”基本上固定下来了，两军就在“三八线”上没完没了地打过来，打过去。

洪炉所在的前沿阵地石岘洞北山，一年之内打了4次。可见，自从朝鲜战争进入“边打边谈”阶段以后，这仗啊，就打得很稀疏了。

金日成对这个现象，非常气愤，甚至多次向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告中国人的状。

发生在石岘洞北山的第一次战斗是在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寿终正寝的那一天。

洪炉说：“部队动员的时候，说要为斯大林报仇。长期以来部队宣传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要保卫中国，国际主义还要保卫兄弟国家朝鲜和越南，革命英雄主义是上了战场不怕死。我就是专门干这个的，就是鼓动战士们只要上了战场，就决不能怕死，就必须争当英雄。”

作为随军记者的洪炉也得随时上火线，也得出生入死，就连先后出了蒋庆泉和于树昌两位战斗英雄的石岘洞北山阵地，他也亲自踩着一路死人上去过。

他说他上去时，要过一条小河沟，看到河沟中间鼓起一个包，他以为是一个沙土墩，想踩着这个土墩跳过去。哪知道那是一名战士的遗体。

第一位高呼“向我开炮”的蒋庆泉，就是在石岘洞北山第三次战斗中涌现出来的大英雄。

1953年4月18日，围绕着无名高地的争夺战已进行了3天。201团2营5连只剩下10多个人在阵地上坚守，已两夜一天没休息没吃饭喝水。

步话兵蒋庆泉就是其中之一。

这是在夏季反击战役的初期，志愿军23军67师正进行着第三次攻打“三八线”附近的石岘洞北山的战斗。对手正是在新兴里战斗中被志愿军27军成建制干掉了一个团的美军步兵第7师。

^① 洪炉，笔名卢弘，总参离休干部，今健在，住北京。

如果不是因为几个偶然原因，蒋庆泉或许不会出现在这次战斗中。

两天前的16日下午，夕阳将落。67师步话机排1班的25岁战士蒋庆泉还在伤后休整中。他在此前的一次战斗中受伤并荣立三等功。

蒋庆泉说，自己本是师部直属的步话机员，4月16日快打仗的时候，原本要跟2营营长下连队的步话机员有事走不开，1班副班长谷德泰就问他伤好得怎样，去临时顶替一下。

蒋庆泉想也没想，一口答应下来。

谁知道这一临时安排，改变了蒋庆泉一生的命运。

16日晚8点，蒋庆泉和王福臣一组随2营营长来到石岘洞北山。可是战斗没打多久，王福臣就被炮弹炸死了，蒋庆泉只好一个人背着步话机前行。

“当时营长问5连剩下多少人，5连汇报还剩下20多个，连长和排长都死了。营长就叫我留下来联系炮火，等待4连、6连的接应和换防，他转身就走了。”半个多世纪后再回忆这段往事，蒋庆泉仍难掩激动，“其实当我接到营长的命令，叫我留下来跟5连一起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不能活”。

随后发生的就是持续42小时的坚守，敌人一直没能拔掉这颗“钉子”，它们始终钉在敌人的“脑门”上，敌人每次反扑上来，都要留下几十具尸体。

洪炉说，这主要是步话兵蒋庆泉的功劳，单靠阵地上稀稀落落几个人是不可能把敌人打下去的。每次敌人一攻上来，他就立即用步话机把敌人的位置、人数报告师指挥所，来得多，要重炮，来得少，就要迫击炮。我们的炮一开火，他一会儿叫向右或向左修正几米，一会儿又兴奋地喊：“打得好！打得好！鬼子被打得叫唤了，哈哈，又滚啦！又滚啦！”敌人逃跑时，我们的炮弹就像长了眼睛一样，一直盯住鬼子打。

打到第三天，阵地上已经没几个能喘气儿的了。蒋庆泉在战场上就是炮兵的眼睛，背着个步话机，在前沿阵地上观察，哪儿敌人多，就用步话机招呼后面的火炮往哪儿打，一打一个准。

这时，美国人再次发起了冲锋，蒋庆泉躲在碉堡里，从射击口一边观察敌人的位置，一边向指挥部报告。

美国人也不是怕死鬼，他们顶着炮火，不顾死活地冲上了已经无



人守卫的志愿军阵地。

蒋庆泉离敌人的距离越来越近，50米、30米、20米、10米……

战斗打得相当惨烈，剩下的战士最后不得不退到碉堡里，除了伤员，就两三个人能打枪。

蒋庆泉没受伤，他不停地扯着嗓子呼叫炮火。他说往哪打，炮兵就往哪打，炮弹就打在他们碉堡附近。

后来，敌人离他们越来越近，就在碉堡外边10米的地方，围着志愿军打，用机枪封锁碉堡射击口。蒋庆泉就向步话机喊：“我们不撤了，也撤不下去了，就战死在这儿吧！快，向我的碉堡顶开炮！向我的碉堡顶开炮！”

那时候他脑子里啥也不能想，就剩下一个念头，呼叫自己人的炮弹向他们开炮，和蜂拥而上的敌人同归于尽。

和蒋庆泉保持通话联络的是67师师部指挥所步话机员、蒋庆泉的上线台陆洪坤，他一直就听见蒋庆泉在大喊大叫，同时听见蒋庆泉叫喊声的还有师部指挥所的首长和参谋们。

虽然不可能看见战斗场面，但从急促的呼喊声中，他们完全能够想象出战斗是何等的惨烈，蒋庆泉是在怎样险恶的状态下和美国人拼命。等听到对方声嘶力竭地喊出“向我的碉堡顶开炮”时，陆洪坤和他身边的同志们早已是泪流满面，不能自己了。

战斗一结束，蒋庆泉的事迹立即不胫而走，上上下下，热热闹闹，蒋庆泉的事迹一传开，大家无不被他的英雄气概所感染。

洪炉到来后，陆洪坤马上把蒋庆泉的英雄事迹告诉了他。

洪炉一听也感动了，就开始写蒋庆泉的事迹。这时，“向我的碉堡顶开炮”在官兵们的口头传播中已经简化成了“向我开炮”。

当时师首长也以为蒋庆泉牺牲了，让政治部整理了他的英雄事迹，向志愿军总部作了报告，为蒋庆泉请大功。

毫无疑问，已经“魂上重霄九”的蒋庆泉，这下就等着立大功，当大英雄了。

洪炉作为军报记者，对这样的人与事他如果不重视那就是严重失职。报道志愿军里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正是他的本分。于是立即赶到前沿，找到当时和蒋庆泉一直保持通话联络的陆洪坤、谷德泰等人，采写、整理蒋庆泉的英勇事迹。

当时，他写的通讯标题是《顽强的声音——记步话机员蒋庆

泉》。文章杀青，付排，眼看马上就要见报。谁知陡地就像有一盆冰水泼到烈火上，一下子冷气喷心，上面说，蒋庆泉出事了，不能宣传。

出了啥事？洪炉后来才知道，在板门店谈判桌上，美国人提供的被俘志愿军名单里，赫然出现了蒋庆泉的名字。

按照当时的规定，当了战俘，那就一切功劳苦劳全都没有了，剩下的只有一样：奇耻大辱！

蒋庆泉如同惊鸿一瞥，不可以再宣传。洪炉的文章，也就成了几页废纸。

在去往不知何方的路上，像水晶球般的血，颤颤巍巍滴落在蒋庆泉的下巴颏上，那是上层担架上刚死的美军士兵还没流尽的鲜血。在这辆装满美军尸体和志愿军被俘伤员的运输卡车上，一心想死的蒋庆泉被颠醒了，意识到原来自己还没死。更让他心惊肉跳的是，完了，自己这下竟然成了美国人的一名战俘！

蒋庆泉已经用自己的行动完成了一个战斗英雄所必需的所有构成元素，偏偏他运气不好，自己呼叫来的炮弹没把他打死，反而把他炸昏后使他落到了美国人手里，成了一名战俘。

而且后半辈子就因为“战俘”这两个字，他应该得到的，一样没有，自己不想要的，却硬生生往他脑袋上扣。

蒋庆泉是四五月间出的事，到了7月停战前，仍然是在石岷洞北山的第四次战斗中，又出现了一个叫于树昌的步话兵，事迹跟蒋庆泉几乎一模一样。

于树昌知道蒋庆泉的事迹，所以这回遇到同样的情况，他也拿蒋庆泉当榜样，大声呼叫“向我开炮”。

但于树昌的运气显然比蒋庆泉好得太多，他自己用步话机招来的自己人的炮弹把自己炸了个粉身碎骨，而没有被美国人活着捉去当战俘。因为前后两人的战斗过程基本上一样，临死前喊的也差不多是同样的意思，洪炉就索性把第一篇写蒋庆泉的文章拿出来，两篇通讯集中到了于树昌一个人身上。

很快，文章在《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上一发表，反响大得不得了，全国各地的报纸，争先恐后，纷纷进行转载。

摘录如下：

1953年5月28日，买荣彦所在部队接到指示：组织一支85人的突击分队，夜半插入伪2师守备的核心阵地8251高地。

在这支小分队中，孙绍均担任队长，买荣彦担任副队长。按照上级的预定计划，这支小分队只要占领了这个阵地，就可以控制左右两侧敌军的阵地。

半夜时分，小分队顺利插入敌后，全面占领了8251高地的主要位置。在向团里报告后，团长指示，搞清地形，标明火力点位置，拂晓以前返回。

然而，次日3时，敌军突然组织一个营实施了快速反击，小分队被缠住了。

情况危急，孙绍均让买荣彦带人撤退，买荣彦却坚持让队长撤退。在反复争了几次后，买荣彦不得不服从命令，带领10名战士撤离了高地。孙绍均则带领大部分战士和于树昌留在了阵地上（于树昌是步话员）。

在撤离过程中，买荣彦和战士们被敌人发现。敌人派出一个连反复阻击，在将敌人的步兵打退后，战士们又遭到敌人炮火的反复拦截。经过数次交锋，最后买荣彦带着仅剩的5名战士在拂晓前回到团部，向团长报告了情况，也把战士们冒死绘制的火力点位置图交给了参谋长。团长让其他同志回去休息，把买荣彦留在了指挥部。

买荣彦清晰地记得当时团长的命令：“你留在指挥部等消息，必要时和8251联系。”恰恰就是这个让他留在指挥部的命令，他听到了来自阵地上的最震撼人心的呼喊。

中午时分，指挥部接到报告，8251高地的处境相当危险，战士伤亡很大。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增援或者反击，都得等到天黑以后。

团长、政委和参谋长牵挂着高地上的战士，经过反复研究，最终决定组织全师主要炮火，依靠于树昌的报告，掩护8251高地的战士们坚持到黄昏，等待大部队的进攻。

报话机里，一段段震撼人心的对话，一次次精准的报告，将8251高地上一场惨烈的坚守战记录了下来。

8251高地上第一次传来了声音：“天津2号！天津2号！我是8251！”

买荣彦一下子就听出来是于树昌的声音。在随后的对话中，于

树昌不断地和指挥部联系，报告高地上的敌情，指挥炮火进行准确打击，压制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团长就坐在报话机旁，一根接一根地吸烟，静静地听着于树昌的报告。整个指挥所里，除了报话机的应答和呼叫声，没有其他声音。

“天津2号！天津2号！我是8251，快打‘东山腿’！”

一阵炮火之后，于树昌再次呼叫：“天津2号！天津2号！我是8251，约3个排的敌人从2号、4号目标分3路向我们运动，快打2号和4号目标！”

又一阵炮火之后，于树昌大叫：“打得好！打得好！天津2号，敌人又从洼地上来了，快开炮！大约一个连！”

指挥部里，回荡着于树昌激动人心的呼声，而正是这呼声，调动着我军的炮火，一次又一次将敌人的进攻打了下来。

买荣彦心里清楚，8251高地上的战友们几乎是在虎口拔牙，随时都会有牺牲的危险。然而，从于树昌的呼声中，却听不到一点儿畏惧和对自己安全的担忧。大家听到的，都是他准确的报告，和敌人退下之后的欢呼声。

指挥所里的同志们都松了一口气，高兴地讨论着刚才的战斗。

然而，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敌人的反攻一拨接一拨。8251高地上，于树昌几乎是用报话机在直播一场惨烈的坚守战。

大家的讨论刚刚进行了一会儿，于树昌又开始呼叫：“8251呼叫，快向1号目标射击！敌人又上来一个连！快开炮！加空爆弹跟踪射击！快打！快打！”

突然，步话机里一下子失去了于树昌的声音，整个指挥部安静下来。

买荣彦回忆说：“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全部在为于树昌担心。”

团长噌的一声站起来，从步话员手里抢过话筒：“8251！8251！我是天津2号，我是天津2号！8251！8251！快回答！”

1分钟、2分钟……5分钟过去了，时间似乎凝固了。

于树昌还是没有回答。

团长脸上豆大的汗珠滚落下来，他又接着呼叫：“前沿观察所，8251阵地情况怎么样？”

观察所回答：“8251出现大批敌人，手榴弹和爆破筒爆炸声此



起彼伏，阵地可能失守了！”

团长和另外一个步话员开始一齐呼叫：“8251！8251！我是天津2号，我是天津2号，听到回答。”

不一会儿，报话机里响起了嗡嗡声，紧接着又传出了于树昌的声音：“我是8251！我是8251！”

团长激动地说：“我是天津2号，刚才出现了什么情况？”

于树昌回答：“刚才有几个敌人从山梁后边偷偷爬到了我的地堡边，我用手榴弹把他们打回去了，顾不上呼叫。”

团长问：“你还有多少弹药？”

于树昌回答：“我这里只剩下一个重伤员，两箱手榴弹，两个爆破筒。”

忽然，于树昌又提高声音，开始呼喊：“天津2号！天津2号！敌人又上来一个连，目标0号，快开炮！”

团长心疼地说：“8251，你要保持体力！”

于树昌回答：“不要管我，快打击0号目标！敌人又从洼地上来了，快打！快打！”

团长又问：“8251，你的地堡墙土有多厚？”

于树昌着急地说：“天津2号不要问，快打！”

团长焦急地继续问：“8251，敌人距离你有多远？”

于树昌回答说：“70米，50米，30米……再近些！”

整个指挥部里，回响着报话机里传出的声音，所有的人都在担心阵地上的于树昌。

突然，于树昌连代号也不用了，直接呼叫：“团长，团长，我的地堡被包围了！快打我的地堡！”

团长急忙问：“于树昌你说什么？”

于树昌高声呼叫：“团长！团长！敌人在我地堡上边，对着地堡打，向我开炮！”

紧接着，报话机中留下一阵高呼：“团长！团长！向我开炮，祖国万岁！向我开炮！祖国万岁！”

耳机里传来一阵爆炸声，随后什么声音都没有了。指挥部里，留下的是大家对于树昌的牵挂，回荡的是于树昌高亢的呼声：“团长！团长！向我开炮！祖国万岁！向我开炮！祖国万岁！”

可是，这篇文章的作者不是执笔者洪炉和23军67师师部宣传干事田镜波，而是这次行动的队长孙绍均。

这又是咋回事呢？

原来，洪炉根据未能发表的《顽强的声音——记步话机员蒋庆泉》，以于树昌为主角另写了一篇《向我开炮》，但发表时却有意署上了孙绍均的名字。

洪炉说：“《向我开炮》的署名作者只有孙绍均，是因为当年采写《向我开炮》的时候是由67师宣传干事田镜波写成初稿，我来写二稿并加入了写蒋庆泉的《顽强的声音》中的内容。因为文章是以孙绍均的第一人称来描述于树昌，为了强调故事的真实性，文章就只署了孙绍均一个人的名字，而没有署我和田镜波的名字。那时候的人，也没有什么著作权的意识。当然，我也不后悔当初没有署上自己的名字，只要英雄的事迹能够更广泛地传播出去，自己就感到非常欣慰了。”

《顽强的声音》后来收录在由申述、刘思主编的《志愿军一日》文集中，题目是《向我开炮》。

60年代，电影《英雄儿女》风靡大江南北，影响了几代人，影片再现了抗美援朝战争当中非常壮烈的一幕，敌人已经潮水般冲上了我方阵地，而坚守阵地的志愿军以寡敌众，已经伤亡殆尽。此时，一个名叫王成的步话兵，他抱着和敌人同归于尽的必死的信念，拿起了步话机，对着我军炮兵高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随后跃入敌群，拉燃爆破筒，与敌人同归于尽。然后是全场热烈的掌声——全国都一样，掌声加眼泪。英雄王成喊出的那句“向我开炮”，迅速成为了那个革命时代的经典形象和经典口号，被广为传诵。

而电影“向我开炮”的事迹，正是取材于洪炉和田镜波写的通讯稿《向我开炮》中的英雄于树昌。

洪炉还说，他一直为蒋庆泉深感惋惜。《英雄儿女》红遍全国以后，“向我开炮”和英雄王成全国人民都知道了，但是他本人却当了美国人的俘虏。“被俘人员回来后，首先得接受审查，实际上蒋庆泉等于什么也没有，还反而受了处分，这公平吗？”洪炉还说，“蒋庆泉他们被放回来的时候，板门店搭了一个门，上边写着‘祖国怀抱’4个大字，被俘人员回来以后看到这几个字无不号啕大哭，把敌人发给他的衣服都脱光了，只剩下一个裤衩就一头扑进了‘祖国怀



抱’。哪知道回来以后，战俘们被送到归来人员管理处，每天的生活就是‘认罪和检讨’，‘不准讲功，只能讲过’。好在67师政治部为蒋庆泉提供了足够的支持，使他只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幸运地保留了党籍和军籍。这样的处理，是相当少的。”

结果，6064名归来人员中700人被开除军籍，4600多人只承认被俘前的军籍。2900多名共产党员中只有120人得以保留党籍，但也分别给予了各种党内处分，其余2800人，则通通被开除了党籍。这让他们本人和家人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生活十分艰难。

但是，无论是“联合国军”司令李奇微的回忆录还是国内的宣传材料，都曾记载着他们在战俘营升五星红旗，以血肉之躯与坦克机枪对抗的事情——而所有这一切让美国人刻骨铭心的壮举，都是包括蒋庆泉在内的这样一大批志愿军战俘们干出来的英雄壮举！

晚年，蒋庆泉回忆说：“我被送到釜山第三战俘营，里面关押的全都是‘不堪救药’的顽固志愿军战俘。他们给我三条路，去日本，去台湾，回国死路一条。我连想都没想，就说宁愿死，我也得回家。”

1953年，停战协定签订以后，蒋庆泉和6000多名志愿军战俘被交换回国。

此后，蒋庆泉回家以务农为生，从不提及抗美援朝那段只能给他和家人增添羞辱的往事。

20世纪60年代的某一天晚上，蒋庆泉和妻子去公社看露天电影，放映的正是飘红全国的电影《英雄儿女》。

蒋庆泉没有勇气坚持把电影看完就转身离去。

回家路上，他在黑沉沉的田野上号啕大哭，哭得妻子也陪着他抹眼泪。

“文革”中，蒋庆泉又一次被当作“政治死狗”弄出来“鞭尸”。公社院子里到处都是批他的大字报，墙上是，绳子上挂着也是。

面对人们的攻击，蒋庆泉说：“我从不认为自己是王成、是英雄，但我也不是狗熊；我的确曾经做过战俘，但我绝对不是叛徒！”

直到1981年的一天，民政局和组织部来了两名同志，宣布取消他的党内处分。也就仅此而已。那一天，在朝鲜战场上和美军战俘营里一滴眼泪都没流过的蒋庆泉，像个受尽母亲委屈的儿童一样，号啕大哭了一场。

从1964年《英雄儿女》在全国公映开始，洪炉便尝试着用各种方式寻找蒋庆泉。他一直为蒋庆泉抱不平，他认为蒋庆泉是货真价实的活着的“王成”，却因为被俘而被剥夺了英雄的荣誉与权利，甚至做人的尊严。他只知道蒋庆泉部队的番号，对他老家的情况全然不知。他当然也知道，23军的荣誉室里不可能为一名战俘保留一个位置和一份资料。

2000年，洪炉撰写了《关于王成原型》、《“向我开炮”的又一轶闻》、《呼唤“王成”：你在哪里？》、《向我开炮——英雄故事后面的故事》等文章，寻找从未见过面的蒋庆泉。

2004年，在中央电视台《电影传奇》栏目中，被邀作嘉宾的洪炉再次呼唤“王成”，说“向我开炮”的原型是蒋庆泉。

直到2010年的某一天，洪炉在记者山旭的帮助下，才终于找到了蒋庆泉，更幸运的是，他还找到了陆洪坤和蒋庆泉的老班长谷德泰。

那是4月里的一个下午，在锦州市松山区大岭村的一处农家小饭馆里，山旭和蒋庆泉、洪炉、陆洪坤、谷德泰围着一张有些污迹的白木桌子坐定。虽然还没有喝酒，但是围桌而坐的人都分明已经醉意盎然，神情恍惚。当陆洪坤像头愤怒的狮子般大吼着“蒋庆泉，你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大英雄，我陆洪坤愿意替你作证”的那一刻，蒋庆泉扑上前去，80多岁的老人，搂住陆洪坤大哭起来。

蒋庆泉，这个辽西偏僻小村里的普普通通的农民，和村里任何人都从来不敢提起自己曾经参加过志愿军的老人，终于放胆对闻讯而来的乡亲们吼出了一句压抑在心中许多年的话：“我就是你们看到的电影上那个‘王成’！”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蒋庆泉肯定不能说自己就是王成，因为王成是一个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形象。

正应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句老话，自打蒋庆泉的事迹不胫而走，效法者众，在同样的危急的情境下勇敢喊出“向我开炮”的志愿军步话兵，据统计竟高达47人之多！他们有的被炸死，有的至今依然活着。他们都是王成，却又都不能等同于王成。

最先把蒋庆泉从茫茫人海中寻找出来的《瞭望东方周刊》的年轻记者山旭说：“抗美援朝中每一个无愧于中国的战士都是王成。无论他是否已经成为烈士抑或被俘。”



说得好，赞一个！

洪炉对蒋庆泉等老战友们谈起了自己经历的一个故事。

几年前的一天，他在家中接待了一位来自香港的朋友。聊天中，香港朋友无意间提到，他认识美国内华达州前州长迈克·奥卡拉汉。这位州长是一位残疾人，只有一条腿，另一条腿在朝鲜战场上被中国人给打断了。

1953年，奥卡拉汉带领100多名美国士兵攻上了中国志愿军的阵地，发现只有一个小兵（于树昌）还活着，也没有武器。“按照战争的游戏规则”，奥卡拉汉让大家不要打死他。围拢到跟前时，却发现他拿着步话机在呼喊。由于语言不通，美军不知道他在喊叫什么，结果喊着喊着，被这个小兵招来的炮弹劈头盖脸地下来了，这个中国兵和几乎全部美国兵都被炸死在阵地上。最终只有3个美国人幸存下来，奥卡拉汉就是其中一个。他曾经对中国人很愤恨，觉得对方不遵守战争规则，“我们不打死你，你怎么可以调来炮火把我们都打死呢？”直到他看了中国电影《英雄儿女》后才改变了看法。而且对他憎恨了许多年的那个中国小兵肃然起敬。

后来，奥卡拉汉一家人都成了促进中美友好的积极人士。他一直在筹划，想以自己的经历拍摄一部反映朝鲜战争的电影。前几年奥卡拉汉因病辞世，去世的时候还特意交代副州长和家人，一定要完成这部影片。

最新的消息是，电影的第一个镜头将在联合国大厦前开拍，那里有一座给枪管打上和平结的反战雕塑。该筹备组的工作人员专门打电话给洪炉的香港朋友，托他转告洪炉和蒋庆泉，“这将是一部为了历史和人性而拍摄的反战电影”。

“好事，这当然是好事。战争总归不是好事情，中美两国人民，最好再也不要打仗了。”听完美国人的故事，蒋庆泉感慨地说。

有人问蒋庆泉为什么这么多年来选择沉默。他说：“那么多的王成都牺牲了，我还活着，我有过那段（被俘）经历，我不想给咱们的志愿军抹黑。”

看到几十年前的战友专程来看自己，听说当年23军的老战友们还在惦记着他，特别是党和政府为他落实了政策，蒋庆泉的心结才慢慢解开。

如今，已近90岁的蒋庆泉儿孙满堂，过着平静的生活，60多年

前他复员返乡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座生他养他的小村。

一阵热闹过去后，他的生活依然平静若水，仍旧和过去一样住在青葱得犹如世外桃源般的深山沟里，照料院外种下的小葱和韭菜。

逢上赶集天，他就带着老伴儿一起到集市支上小摊，卖老伴亲手缝制的鞋垫，军人和残疾人免费。

用他自己的话说：“不为别的，只为发挥点余热。”

“不幸陷囹圄，战俘名声坏”，这是蒋庆泉写的一首带有自嘲意味的小诗中的句子。

这样的中国人坏吗，朋友？

5. 金日成、邓小平共同关注的英雄

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许多家新闻媒体都先后发表了一条引人注目的消息：一位失散了30多年的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特等功臣，终于被原部队找到，并且佩戴上了早就应当属于他的英雄勋章。

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英雄叫柴云振，是志愿军15军45师134团8连7班班长。

而寻找柴云振的过程，就是一个传奇。

说起寻找英雄，不能不提起一个人，他叫李天恩，是一位解放战争时期入伍的老兵，抗美援朝期间，他是志愿军15军军部《战场报》的记者。后来这支部队改建成空降兵，他又当过军政治部宣传处处长。1983年离休后，军首长请他出任空降兵15军军史编写组组长。

在军史编写的过程中，军史编写组接到军首长给他们下达的任务，就是寻找英雄柴云振。

同志们接到任务后，立即开始查找，可是柴云振的情况很特殊。因为，自从志愿军总部授予他一级战斗英雄称号后，他的英雄勋章就一直没有人来领。部队也不知他的下落，他的籍贯是哪里，他当时是牺牲了还是仍健在，他的英雄事迹详细情况又是怎样的。可翻遍了部队保存的档案资料，也没有找到答案。

军史组成员知道李天恩在抗美援朝时就采访过柴云振，应该多少



知道一些情况，就向他请教。

李天恩说：“我也没有见到过柴云振本人。我是得知他的事迹后，到他们团里去找他的战友们采访，才逐渐了解了这个人。”

李天恩的回忆，把大家带进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志愿军15军在朝鲜战场上是支响当当的英雄部队，战斗英雄黄继光、邱少云都来自这个部队。柴云振所在的134团8连是其中的一个英雄连队。

就是这个连队，在后来的上甘岭战役中坚守坑道作战34个昼夜，毙敌逾千，该连有一面被穿有381个弹洞的战旗，至今还保存在军事博物馆里，被誉为“上甘岭特功八连”。电影《上甘岭》中的那个8连就是以这个连队为原型的。在参加上甘岭战役之前，这支部队曾经在朴达峰打过一次漂亮的阻击战。

柴云振就是在朴达峰阻击战中成为英雄的。

朴达峰位于金化西南30多公里处，山势险要，是敌人进犯金化的必经之地。

1951年5月28日拂晓，美军第25师和加拿大第25旅，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开始向朴达峰扑来。

担负阻击任务的是志愿军45师134团。经过5天5夜的激战，双方伤亡都很大。志愿军丢掉了两个山头，敌人已逼近我3营前沿阵地，情况十分危急。

营长武尚志将该营剩余人员全部编入第二梯队，全线设防，拼死阻击，同时命令8连7班班长柴云振带领9名战士出击，坚决夺回已被敌占领的两个山头，堵住敌人进攻缺口。

柴云振毅然接受了任务，凭借他的机智和勇敢，先后将两个山头夺了回来。很快，敌人开始进攻了，他们组织了一个排的黑人士兵敢死队往山头上冲。柴云振沉着应战，利用有利地势，端起机枪、冲锋枪，轮番向山下扫射，将成捆的手榴弹和爆破筒，扔向敌群。到中午时，弹药耗尽了，他就端起刺刀和冲上山头的敌人展开殊死的肉搏战。

仗打到第7天天亮时，柴云振已经杀红了眼。他挥舞着枪刺，像发疯了一般，和敌人拼杀起来。当他的面前只剩下最后一个敌人的时候，他的力量已消耗到了极点。然而，他仍然拼出最后的力气，把刺刀刺进了那个比他块头大得多的美国士兵的胸膛。这时他看了看，阵

地上只剩下他和孙鸿法两个人了。

“阵地一阵被敌人夺过去，一阵又被我们夺回来，反反复复好几次。敌人又一次攻上山头，架了一挺重机枪，对着我们的营部扫射，压得营部的人抬不起头来，打得营长武尚志啊，莫得办法，就喊，‘7班，坚决把山头给我夺回来！’7班这时候就剩下我和孙鸿法两个人了，我们摸着黑一上去，我一梭子弹扫光，一个箭步冲上前，伸手抓住了敌人的重机枪。”

今年85岁的柴云振对那场惨烈的战斗记忆犹新，他回忆说：“敌人的枪口原来对着我们那个方向，我把枪管车了一转，对着敌人的阵地，‘哒哒哒哒’，1000发子弹，我一口气硬是把它放完了才丢手。整个一个7班，那一仗消灭了200多个敌人。”

柴云振和孙鸿法利用战斗间隙，从敌人尸体旁拣了六七支加拿大冲锋枪和两箱半手榴弹，随时准备迎击敌人新一轮的进攻。

此时的柴云振虽然已经完成了营长交给他的任务，但此刻人手太少，刚刚夺回来的阵地，很有可能再次被敌人夺回去。

于是，本该固守待援的柴云振，在观察完战场形势后，萌生了一个大胆的念头。

“那一阵想啥子呢？看到战友躺得到处都是，死了那么多，命就不值钱了，干脆，和敌人拼了算屎！”他就对孙鸿法说：“你留在阵地上，我悄悄摸过去，给敌人一个冷不防，把指挥所给他端了。”

嘿嘿，一个人去端敌人的指挥所，也只有在那种不要命的情况下才想得出来。说完，柴云振利用地形，绕过了敌人的哨兵，摸到了敌人的指挥所跟前。

“我也不问有人无人，扯起手榴弹就接连往里面扔，几声爆炸过后，工事门被炸垮了。里面也不叫喊了。这时，我突然看到脚下的战壕里还有4个敌人，马上抢先扣动了扳机，3个敌人倒下了，可这时候子弹打光了。还有一个敌人，正伸手去摸自动枪。换弹匣来不及了，那时我在高处，敌人在低处，隔着好几米远近，我一个飞身扑下去，把敌人的枪杆抓住，两人就争夺起来。结果，我没能把枪夺过来，就连枪带人地把他按在了交通壕里，厮打起来。”

凭借着过人的胆识和对地形的熟悉，柴云振只身捣毁了敌人的指挥所。可随即，他却陷入了残酷的肉搏战。

由于美国黑人牛高马大，柴云振渐渐落了下风。



“那天夜里下了点雷阵雨，交通壕里本来有很多水，我两个滚来打去，把水都滚干了，两个都成了泥巴人，光看到两个眼睛在动。滚来滚去，最后我想抠他的眼睛，他力气比我大嘛，我有点吃亏，我就想把眼睛给他抓瞎，他看不见就好对付了嘛。头一爪抓去，我那手上没得指甲壳，只在他脸上抓了4条血印印。第二把再抓过去，哎哟糟了，他嘴巴是张起的，我那两个手指头，正好送到他嘴巴头去了。他像狗那么使起气力一咬，就把我右手的二指头咬断了。狗日的，咬断了他龟儿子还不放，我用力往外一挣，连到挣了两次，挣不断。有两根筋还在他的嘴里头咬着嘛。我只好一只手对付他两只手，抓到泥巴是泥巴，抓到石头是石头，反正抓到啥子算啥子，全朝他脑壳上砸。”

最终，浑身是伤，精疲力竭的柴云振反倒被敌人用石头猛击头部。

“狗日的抓到一块溜光石，就像敲木鱼一样朝我脑壳上不停地敲，我的脸、鼻子、嘴巴、脑壳，都遭他砸得来血糊糊，稀巴烂。慢慢地，我就觉得四肢没得力气了，眼前一黑，昏了过去。后来我咋个又活下来了呢？原来，这个家伙‘噼里啪啦’一顿乱砸，看我没动了，以为把我砸死尿了，他也累得要命。再加上这时候看到我们的后续部队冲上来了，他想活命，赶紧爬起来跑了。我听到机枪、冲锋枪一响，晓得是我们的人上来了。援兵一到，神经一松，我就人事不省，啥都不晓得了。”

在这场肉搏战中，柴云振的右手食指被敌人咬断，头部、腰部多处负伤，增援部队赶到后，卫生兵为昏迷中的柴云振进行简单包扎后，孙鸿法就把他背下了阵地。“后来到医院检查，我这个脑壳，被石头砸了20多个眼眼。”

朴达峰阻击战，柴云振的7班攻克了3座山头，歼敌200余人，并捣毁美军连指挥所一个，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奇迹，为志愿军兵团顺利北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战斗结束之后，志愿军总政治部发布命令，授予柴云振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光荣称号。

只不过，此时的柴云振一直都还在昏迷当中，对发生的一切，他全然不知。两个月后，他被转送回国，到了包头市的一家部队医院进行治疗。柴云振说，其实他后来如何被战友发现的，怎么被救的，他至今也还没弄清楚。他只知道，1951年从朝鲜战场上下来，他因为伤

重被转送医院治疗，治了大概一年多，和原部队也就此失去了联系。志愿军总部颁发给他的英雄勋章和证书，也无人领取。

正像歌曲《老兵》中唱到的：“您是一位老兵，曾在战场上屡立功勋，惜别军营，隐功埋名。我们苦苦把你询问，你在哪里，老兵？”

1952年4月，他在医院办了手续，复员回了老家。他说他记得很清楚，政府发给他80元钱，还有能够在老家领取1000斤大米的票据，他就回到了家乡四川省岳池县大佛乡。他说他那时候太满足、太高兴了——80元钱，1000斤大米，连老家的地主，也没他这么富有呀！

柴云振在给部队作报告时说：“我那时候想的是，我人已经残废了，回部队只能给国家增加负担，那时候朝鲜还在打仗，国家的经济好困难喽。和那么多死在朝鲜的战友比起来，我已经是运气最好的了，还有啥子想不通的呢？那就算了嘛，今天仗也打完了，人也打残废了，自己回去自力更生，就最好。”

听完老英雄的报告，全军上下，一片肃然。

随后，一条《英雄埋名三十年》的消息，成了各大报刊的头条。

1954年，部队回国以后，组织上就指示有关部门开始查找柴云振的下落。

根据一份当时保留下来的花名册，给他所在县的政府发了一份调查函，回函说该县查无此人。后来才搞清楚，由于工作人员的粗心大意，那份花名籍贯栏里，只填了县名，没有填省名，而且县名岳池还被写成了“乐池”（笔者注：在四川话里，“岳”与“乐”同音）。

后来，部队经过几次整编，驻地也不断变动，原先的一些老同志调走的调走，退役的退役，寻人的事也就搁下来了。

到了1980年，金日成到北京参加抗美援朝30周年纪念活动，邓小平会见了。两人自然谈到30年前的那场战争，金日成代表朝鲜国家和人民感谢中国的帮助和支持，还顺便向邓小平打听原志愿军15军的战斗英雄柴云振的情况。15军前身属于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当时的军长是秦基伟。

正好，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秦基伟这次会见时也在座。听到问话，秦基伟回答说：“柴云振是原志愿军15军的一名战士，在朝鲜



江原道金化郡朴达峰战斗中英勇顽强，志愿军总部授予他特等功、一级战斗英雄荣誉称号。”接着又说：“我们现在暂不清楚柴云振的情况，一旦打听到消息，一定及时向金主席报告。”

邓小平听了秦基伟的介绍，当即指示说：“尽快派人寻找柴云振。只要柴云振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哪怕是大海里捞针，我们也要把他捞出来！”

于是，15军再次组织对英雄的寻找，军首长把这个任务正式下达给了军史组。

中朝两国的最高领导人都在关注着这位英雄，军史组全体人员都感到肩上责任重大。可已经过去30多年了，部队里找不到一个熟悉和了解柴云振的同志，这个寻找工作应该从哪里入手呢？

为此，军史组专门开了会议研究对策。会上，大家讨论得非常热烈。有人提出，柴云振究竟还在不在？如果他还在，为什么这么多年他都不来找部队？尽管部队回国后的驻地他不知道，但部队的番号一直没有变，他只要想找，就一定可以找回来的。也许他当时已经牺牲。即使他当时没有牺牲，但从他当时在战场上受伤的严重情况来看，我们的战地医院是不是可以救治得了？就是经过抢救保住了他的生命，他的头脑是不是清醒？后来还会出现意外？大多数人认为，这种推测不是没有道理，但仍不能完全否定柴云振依然健在的可能性。从根本上讲，我们寻找英雄的意义不仅在于是不是能够找到他这个人，而是要告诉人们，凡是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贡献的英雄，国家和人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们。

李天恩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老同志，他满怀深情地说：“我们这一辈人年纪都不小了。趁我们这些了解情况的老家伙还在，一定要把柴云振的下落搞清楚。否则，我们对不起那些曾经浴血战场的战友！也无法向老军长和小平同志交代！”

决心好下，怎么去找呢？大家都沉默了。有人问李天恩：“你不是亲自调查过柴云振的事迹吗？还不想得起来，当时采访过的是一些什么人？也许这些人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寻找的线索。”

李天恩回忆了一会儿，说：“有一个叫孙鸿法的人，我当时采访过他。他和柴云振一起参加过朴达峰阻击战，还把受了重伤的柴云振从阵地上背了下来，是山西运城人。可他很多年前就转业了，现在在什么单位工作不知道。”

有人接着说：“可不可以通过战友来找战友？只要我们在山西运城找到一个我们军的战友，再由战友找战友，就一定能找到他。”

大家都认为这是个好办法。

很快，在15军内找到一个山西籍的老同志，通过他又找到一位已经转业的运城籍的老战友。

没多久，这位战友就给军史组来了信，把孙鸿法的地址、工作单位和他的近况写得清清楚楚。军史组立即决定派工作人员温铁汉前往山西运城。

温铁汉受领任务后，立即启程直奔山西运城，很顺利地找到了孙鸿法。

孙鸿法听温铁汉说明来意，思索了一会儿，便说：“柴云振是我把他从阵地上背下来的。当时他已经昏死过去，头上、身上到处是血。还有一根指头断了。我把他送到救护所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了。”接着又说：“柴云振是在朴达峰阻击战开始之前，才由师部一个单位调到我们的。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很短，只记得他是个中等个头，其他情况都不太了解。”

温铁汉问：“你知道不知道他是什么地方人？”

孙鸿法摇了摇头：“我跟他接触不多。没有问过，也没有听别人说过。”

温铁汉又问：“那你总应该听他说过话吧，是什么地方的口音？”

孙鸿法想了一下，用肯定的口吻说：“是四川口音！因为他说话的腔调和我熟悉的一个四川战友完全一样。”

听了温铁汉的汇报，李天恩说：“这一趟运城没有白跑。至少我们知道他可能是四川人。我军在入朝作战前，参加过西南剿匪，当时就有不少云、贵、川的人民子弟参军。黄继光就是那个时候从四川参军的。因此，柴云振是四川人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你再辛苦一下，去四川一趟，到省民政厅去查一查优抚档案，或许能有收获。”

温铁汉又日夜兼程赶到四川成都。民政厅的同志听说他的来意后，十分支持，立即派人协助查找历史档案，终于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一份花名册上找到了一点线索。

可花名册上只记载了一个“柴云正”的名字，其他项目均为空白。

这个“柴云正”是不是就是要找的“柴云振”呢？

不得而知。

于是，民政厅向各地、市、县发出协查“柴云正”的通知。

很快，下面就将查找的情况上报到省里，可均没有查到名叫“柴云正”的优抚对象。

温铁汉立即把查找的情况，用电话向李天恩进行了汇报。

李天恩说：“这个‘柴云正’很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柴云振，因为他们相似的情况太多了。只有一个字有差别，字虽不同，音却是相同的。那时人的文化不高，把字写错了，也是常有的事。没有查到‘柴云正’这个优抚对象，并不是说，就没有这个人。我的意见，你可以在《四川日报》上发个寻人启事，看看结果怎么样。”

几天以后，《四川日报》在第4版的右下角，刊登了一则特别寻人启事，启事四周围着方框的，特别显眼。

寻人启事

一级战斗英雄、特等功臣柴云振，原是我部三营八连七班班长，在朝鲜朴达峰阻击战斗中身负重伤，断了一根指头，战后与部队失散。请本人或知情者看到本启事后及时与原部队联系。

湖北省孝感市39155部队

1984年9月12日

启事发出后，温铁汉在成都等了半个月，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就返回了军部。

又过去了10多天，还是没有半点信息，军史组的同志们都有点失望了。

他们不知道，此刻在四川省岳池县，这则启事已经搅得来风生水起，有了反响。

现在岳池县邮政局工作的柴兵荣回忆，1984年，他高中毕业后在乡农机站开拖拉机。一天，他无意中在《四川日报》上看到了湖北省孝感市39155部队发出的那则寻人启事。

柴兵荣一路狂奔，回家大嚷：“爸，你的老部队在找你。”

柴云振看了启事说：“我叫柴云政，这个人叫柴云振……”

柴兵荣说：“你不是在这次战斗中受伤、与部队失去联系的吗？还有你的手指……”

无论柴兵荣怎么说，柴云振就是不愿去接那个茬。找亲戚劝说，柴云振还是不答应。

儿子急了，说：“我明天去孝感给部队提供情况。”

柴云振怕儿子给部队添麻烦，只好同意与儿子一起前往。

为凑路费，他们卖了一头猪，卖了100块钱。父子俩花40多元钱买了两张站票，在火车上站了两天两夜，来到了湖北孝感。

1984年9月23日，柴云振和儿子来到部队驻地。一天下午，军部司令部值班室转来营门岗哨一个电话。报告说从四川来了一个老头，自称叫“柴云政”，说是部队在报上发启事找他，他想见见部队领导。李天恩和温铁汉一听，立刻激动起来，一路小跑着直奔营院大门口。

到了营门岗哨，李天恩和温铁汉看到一个50多岁的老汉，背微驼，头上戴着圈圈儿草帽，穿着一身粗布黑衣裤和一双水胶鞋，鞋、裤腿上溅了许多泥浆，脸苍老得像开裂的树皮。

老汉掏出自己的复员退伍证和残废证，自我介绍说：“我叫柴云政，村里人都说你们登报找的那个人就是我。”

“柴云政？”又出现了一个与“柴云振”相似的名字，字不同音同。

李天恩走上去和老汉握手，发觉他缺了根指头，就问：“你的手指是怎么了？”

老汉回答说：“朝鲜战场上被美国鬼子咬掉的。”

李天恩又问：“你还有哪些地方受过伤？”

老汉把草帽一揭，说：“我的头也被鬼子打烂了。”

温铁汉走到跟前，扒开老汉的头发一共数出24个伤疤。

李天恩和温铁汉忙把老汉领到了军史组的接待室。李天恩给他倒了一杯水，就试探性地和他谈起朴达峰阻击战，并询问他后来的一些情况。老人记性还不错，也很健谈。

对于朴达峰阻击战，老汉说的大部分情况和我们掌握的情况是相同的，只是后边与美国鬼子拼刺刀一节有点不同。

据他回忆，当时阵地上，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忽然听见后面有脚步声，转过身来一看，4个高大的美国士兵已经冲了上来，离自己不到20米远了。他立即举枪扣动扳机，当场击毙了3个美国士兵。与此同时，他的手臂、腰部等多处也被敌人的子弹击中。柴云振强忍剧



痛，使劲扣动扳机准备消灭最后一个敌人时，发现冲锋枪里没有子弹了。他只好扔掉手中的枪，冲上前去与美国士兵搏斗。

这时他才看清对面的敌人是个体形高大的美国黑人。那个黑大个企图凭借个子高大的优势，要生擒柴云振。双方拳脚相加，然后又抱住对方扭打在一起，在阵地上来回翻滚。扭打中，柴云振揪掉黑大个的一只耳朵，黑大个抽出了匕首，向柴云振刺来。柴云振侧身躲过，趁势将黑大个推翻在地，将他的匕首打脱。然后双手攥拳猛击黑大个的脑袋，接着，又伸出五指去挖黑大个的眼睛。

不料，黑大个把脸一仰，张开嘴一口把柴云振的右手食指咬了下来。一阵剧痛使柴云振双眼发黑，那个黑大个趁机抓起一块岩石，对着柴云振的脑袋狠狠地砸来。柴云振只觉天崩地裂，很快失去了知觉。黑大个以为柴云振已经死去，便松开了手，急急忙忙向山下逃去。

朴达峰2号山头上静了下来，再也没了枪炮声和怒吼声。出奇的寂静使柴云振突然苏醒过来，他睁开双眼，见那个黑大个已经跑出近百米远了，便强忍剧痛，翻过身来，往前爬行，抓起敌人扔下的枪支，使出最后一点力气，瞄准敌人，扣动扳机，“砰”的一声，黑大个应声倒下。柴云振再次昏了过去。

说到这里，老汉再次伸出他的右手，食指只剩下半截；又摘下圈圈儿草帽，头顶布满了疤痕，这些都在无言地叙述着那场肉搏的惨烈！

李天恩这个曾上过战场的老兵，也被眼前这位老汉的讲述深深地打动了。他禁不住问道：“你后来是怎样被救下战场的？这些年你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来找部队？”

老汉道：“我一醒过来，就看到身边围着许多穿白大褂的人。他们都说我醒过来是‘奇迹’。我就问他们：这是啥子地方？他们就对我说：‘你已回国了，这里是内蒙古包头市部队医院。’后来，我才晓得自己是作为危重病人被前线战地医院用飞机送回国内的。”

部队从朝鲜归国的情况，他是几年后才知道的。当时，他也曾想过要回来找部队，可他不知道部队驻在什么地方。再说，就是找到了，也可能没有人能认识他了。

柴云振又一想，我是个军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每一个中国军人的责任，现在自己已复员回乡了，再去找部队也没有多大意

思。于是，他就一门心思在家乡当农民。他也很少向人提及自己在朝鲜打仗的事迹，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个抗美援朝的老兵，在一个叫“朴达峰”的地方打过仗。就连他应该成为优抚对象的名单也没有报上去。他在家乡干得十分出色，土改时，他被选为副乡长，后来成立人民公社，他又被任命为大队党支部书记。

在朝鲜打仗的事，他几乎都快忘记了。当然，他也并不知道自己是战斗英雄。直到半个多月前，村里有人见到他，说是报上登了启事，部队在找一个叫“柴云振”的人，问是不是他。他还没当回事。后来，儿子把那张《四川日报》拿了回来，他把那则启事看了又看，似乎觉得部队要找的人就是自己，但他又不敢完全肯定。

儿子劝他说：“是不是，到部队去一趟不就知道了。”到这时，他才动了要回一趟部队的念头。

听完老汉的叙述，李天恩和温铁汉已经基本断定，他就是部队要找的柴云振。

但他为什么又叫柴云政呢？就问老汉，老汉也没有说清楚。李天恩是个办事非常细心的人，没有十分把握，是不会轻易下结论的。他把老汉领到军部大招待所，先住下来再说。他是想把山西的孙鸿法请来，让他们见过面后再作决定。

这时恰逢15军要举行上甘岭战役胜利32周年纪念活动，军史组的同志就借机给远在山西的孙鸿法发去了邀请函，孙鸿法立即动身返回部队。

当时，回部队参加纪念活动的老领导、老战友很多，在事先不告知的情况下，专门设计了让他俩会面的场景。当孙鸿法一出现在会议室门口时，那个叫柴云政的老汉，就紧紧地盯着他，缓缓站了起来。

孙鸿法也盯着老汉细细看了好一会儿后，突然喊道：“你是柴云振？”

老汉也激动地喊道：“是的！你是孙鸿法？”

“是的！”两个老人急步走上前，紧紧地抱在一起，眼泪哗哗往下流。

“你原来没死啊！你这个老东西！”

“上帝不收我啊！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还能见到你！”

这次纪念活动上，柴云振还见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知情人，他就是原师部警卫连文书董贵臣。



董贵臣把柴云振3个不同名字的谜底揭开了。原来柴云振原是师部警卫连的，参加朴达峰阻击战时才调到134团8连。柴云振刚到警卫连时叫“柴云正”，连队的文化教员要给他的名字赋予政治意义，就叫文书董贵臣填写花名册时把他的名字记为“柴云政”。由警卫连补入8连时，负责送兵的人按照董贵臣的山东口音又把他的名字写成了“柴云振”。

找到英雄柴云振的消息，也很快在中朝两军传播开来。原15军军长，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秦基伟也派人前往四川岳池县，把柴云振接到北京，特地设家宴，请柴云振到家里做客。

当年的志愿军老首长杨成武、洪学智等以及中央和军委领导都分别接见了柴云振。

1985年10月，经中央军委的批准，柴云振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英雄代表团的成员，去朝鲜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三十五周年纪念”活动。其间，金日成两次接见柴云振，并给他颁发了“一级自由独立勋章”。

柴云振说：“他（金日成）就在上面站到起，志愿军英雄们排着队，一个个轮着和他握手。有个翻译官在旁边介绍每个人的情况，我和金日成握手的时候，他就介绍说：‘这就是隐姓埋名33年的柴云振老英雄。’金日成当时说的是：‘感谢中国，感谢中国人民对朝鲜的帮助和支持。’”

没过几天，第二次宴请柴云振等英雄时，金日成又对他说：“找到柴云振，历史应该改写过来，柴云振不是烈士，是活着的英雄。”

作为国宾在朝鲜访问期间，柴云振参观了朝鲜军事博物馆，在烈士陵园祭奠了志愿军烈士。

柴老说：“在军事博物馆里，翻译官指着墙上悬挂着的一幅素描画像对我说：‘这就是柴云振的遗像。’还告诉我在当年的朴达峰阵地上为我埋了一座假坟，立了一块碑。我就笑了，说，这才奇怪了，我还活着呀，咋个把我的遗像都挂到墙上去了？”

柴云振的遗像在朝鲜军事博物馆的显著位置上已经悬挂了20多年。

柴云振对陪同的朝方人员说：“我还活着的呀！这‘遗像’我得带回去！”

征得朝方同意后，柴云振亲手把自己的“遗像”揭了下来，至今

还保存在家中。

出访归国后，考虑到柴云振晚年的生活，部队决定为他安排工作。

柴云振说：“军长、政委、政治部主任都跟我谈话，说你现在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出来。我说我没得啥子要求。首长说你想回哪里去，现在征求你的意见。我说我从哪里来，回哪里去，我还是想回农村当个农民。我想得通的是，我比牺牲的那么多战友，多活了那么多年。几十年的农民都当过来了，有啥子不得了的？”

可是，柴云振的长子柴兵荣不干了，他从1984年10月开始，就一直陪伴着老父亲，作英雄事迹报告和四处演讲，将近一年的时间，既没有时间下地干活，也耽搁了养猪和开手扶拖拉机的营生，一看父亲谢绝部队的照顾，提出要回农村当农民，便忍不住提出了异议。

柴云振说：“他那意思就是，好像我这个做老汉的当了英雄了，还坚持回农村当农民，他又咋个办。当然嘛，那阵他在农村开‘蹦蹦车’，日晒雨淋的，也苦，就不能理解我的选择。回招待所关起门冲我嚷：‘你现在有地位了，回农村当农民也不怕，那我们咋个办？’我一听就发了脾气，‘啪’地就给了他脸上一巴掌，骂他：‘没得老子，你就不吃饭了，你想不通，就去死嘛！’”

从朝鲜回国后，柴云振被增补为岳池县政协常委，但老伴和孩子们仍然在家务农。直到他离休后，因身边需要有人照顾，这才解决了一家人的农村户口。

如今85岁的柴云振儿孙满堂，家里人说他平时最爱看电视，但是很少看战争片，每每看到战争片，就会泪流满面。到如今还是有一些年轻人老是问他，说当年立了那么大的功，回到农村为啥不去找部队呢？他总是会笑笑说，找啥子哟？能活下来，就已经很知足了。

柴老对人言，要说此生的遗憾，他也有一个，那就是还想回一趟朝鲜，希望到当年战斗过的朴达峰，去祭拜一下牺牲的战友。但是他也说这个愿望恐怕他这辈子很难实现了，因为1985年他随英雄代表团去朝鲜参加纪念活动时，和朝方的接待人员提出过这个想法。

朝方的答复是：当年的朴达峰阵地现在在韩国境内，由南韩军控制着，要去祭拜，涉及很多外交上的事情，办起来是难以想象的麻烦。不过朝方人员也安慰他说，别着急嘛，你身体还硬朗着哩，今后还有很多机会，等到朝鲜半岛和平统一那一天，你的愿望就会

实现了。

柴云振听了说：“好吧，我等着。”

南北统一，迄今遥遥无期，甚至只是一个梦，可他仍然在等。

6. 救命菩萨

戏演到快完的时候，主角的高潮应当到来了。

1951年5月下旬，好运气终于落到了曾一心渴望当英雄，而因时运不佳，一直未能当上英雄的谭秉云头上。

在窗明几净，纤尘不染的江津人民医院老干部病房里，我拜望了刚刚动过大手术的谭秉云。他的体力和精神尚未得到恢复，瘦削而线条分明的脸膛显得清瘦而松弛，额上深深的皱纹，记载着他不平凡的人生旅程。

他还输着液，说话很吃力，听我说明来意，他热情地请我在沙发上坐下，然后，我们开始了交谈。采访不能说是成功的，因为医护人员不允许他说更多的话。何况，我也于心不忍。

但是，随着我对他的进一步了解，这位仰躺在病榻上已经满头银丝的老人，在我心中却依然是那样的年轻英武，那样的鲜活动人。

1951年5月下旬，第五次战役已经进入尾声，“联合国军”利用志愿军后撤休整机会，出动大批机械化部队，北进穿插，企图与一支已突破我军北汉江防线的摩托化部队会合，以斩断江南志愿军后撤之路。

战局万分危急，尚在江南的志愿军大部队、机关、后勤奉命火速撤往江北。敌机疯狂轰炸，江面上无法搭浮桥，人多舟少，只好就地砍伐树木，用绳子连成无数长串，横置江面，会水的游向北岸，不会水的则抱着圆木“爬”过北汉江，失手被水冲走的不少。

为确保南岸部队安全转移，谭秉云所属的中国人民志愿军9兵团27军80师239团从东线赶到金化东南40公里处的390高地，构筑野战防御工事，以阻击进犯之敌，为江南部队过江争取更多时间。

谭秉云所在的27军和20军在长津湖战役中伤亡惨重，队伍几乎

被冻垮了，上级让他们在紧挨着鸭绿江的北朝鲜大山沟里长时间休整，第三次战役当看客，第四次战役也只派没赶上打长津湖战役的26军上阵。剩下的20和27军补充了新兵，全部换上了苏式武器。部队养精蓄锐，恢复元气后，战斗力反倒比原来更为强大。

在新兴里把美军黑人士兵当作鬼，被吓得神魂出窍的谭秉云仍当班长，他带的仍然是大班，只不过这次只有21个人，比原来少了3个。部队每日必须进行严格训练。尤其他们步兵饱受了美军坦克之苦，所以各个部队都把打坦克列入了训练中的重中之重。再加上苏制RPG-43反坦克手雷厉害无比，是世界上最早成功采用聚能破甲原理的手雷，每个有1.2公斤重。这杀器不单是威力巨大，还带有强烈的磁性，士兵不用跳上坦克，只需贴近坦克把导火索一拉，把手雷贴在坦克履带之间的传动轮上就紧紧地粘住了，随后立即跳下公路卧倒。手雷一爆炸，靠近公路外侧的坦克传动轮就被炸碎，履带也就脱落了，坦克就只能原地打转，一步也前进不了。里面的坦克手，被震得口鼻流血，或死或昏，动弹不了。

5月24日傍晚，谭秉云带着战士毛和在390高地下面的公路旁边挖好了散兵坑。这地形是谭秉云精心选择的，这段公路很窄，一边是汉江的一条支流，另一边是陡直的峭岩，打坏敌人一辆坦克，其余的坦克便无路可过了。

是个人都有表现欲，谭秉云也喜欢像眼下这个样子打仗。想想，差不多一个营千把号弟兄都待在后面半山腰上的战壕里，就他们这20多个人在主阵地脚下挖散兵坑拒敌。待会儿枪炮声一响，战友们全瞪着眼睛，在后面居高临下，就像观摩一场战术表演似的，看他们怎样和外国洋兵过招，还能不豁出命打吗？

作为大班之长，谭秉云深知这次战斗的重大意义，接受任务后，他当天便带领全班进入了阵地。他把全班战士按战斗小组布置在后面公路两侧，自己带着毛和到了最前端，潜伏在路边的一笼树丛里。

次日黎明时分，星星尚滞留在暗淡的夜空中，大地突然颤抖起来，震得小树上的露水“滴滴答答”往地上掉。

谭秉云大瞪着警惕的眼睛，注视着公路尽头处的动静，只见远处的天幕上，掠动着一道道光柱。

不一会儿，轰响声越来越大，光柱也越来越近。有两道光柱穿过前方的一片树林，射到山腰阵地上，再从阵地移向河面，又突然向着



谭秉云埋伏的方向移过来。

他沉着地拉过一蓬树枝，把自己埋了进去。

从树叶的缝隙望过去，光柱一道连着一道在公路上晃动，一个个庞然大物从远处疾驶而来。远看，公路上仿佛扭动着一条巨大的铁锁链。公路上尘土冲天，把那道道光柱，染成了橙黄色。

“班长，看清了吗，有多少辆？”新战士毛和有些心虚了，问。

“看不清。别怕，不管来多少，它只能一辆跟着一辆地往我们这半坡上爬。”谭秉云给毛和打着气，从腰间取下一个手雷递给他，说：“我上，你在这里掩护。呃，注意哈，看见我打手雷，马上张开嘴巴，要不然会把你耳朵震聋的。”

这时，马达声更加响亮起来，履带的铿锵声也愈发摄人心魄，车上的光柱直直地射到了隐蔽着众多战友的半山腰阵地上。

谭秉云离开藏身处，顺着树丛向前爬去。坦克越来越近，离他不到20公尺了。他一动不动，15公尺了，他直起身单腿跪地，右手紧握手雷，左手食指套在插销环里，继续等待着。

坦克每往前爬一步，毛和和山腰上的战友心里就揪紧了几分。

10公尺……7公尺，终于战友们看见谭秉云像只灵猫一样悄没声地冲上去，将手雷粘在了坦克屁股上。

“轰！”随着震天动地的一声巨响，一股火热的气流猛扑到谭秉云脸上。他定睛一看，气人！吃了一手雷的坦克并没有被打“死”，它闭着车灯，边打炮边挣扎着向前爬，很快便从谭秉云面前爬过去了。

谭秉云急坏了，放它过去，万万不能！

他不顾一切地冲上公路，提着手雷追上坦克，对准履带缝隙插了进去，用力一扯拉环。手雷爆炸了，他还没来得及卧倒，一块弹片击中了他的额头。眼前一黑，他昏昏沉沉地倒在了公路上。

“班长！班长！”毛和飞窜上公路，抱住谭秉云大声叫喊。

眼中涌满了额上流下来的鲜血，热乎乎，黏糊糊的，什么也看不见。谭秉云用衣袖擦着眼睛、额头，焦急地问：“坦克，坦克呢？”

“完啦！坦克已经报销啦！”

一听这话，谭秉云才松了口气。

毛和掏出急救包，就往谭秉云头上缠。

这时，一串炮弹在他的身边炸开。谭秉云一把推开毛和，连声叫

道：“快，快打第二辆！打，打！”

他摇摇晃晃地奔下公路，沿着路边的小沟，向迎面逼近的第二辆坦克冲去。这一动弹，鲜血又从扎紧的绷带里渗了出来。

谭秉云跃上公路，将最后一颗手雷向坦克掷去，眼前冲腾起一团巨大的烟火，坦克“吱”地嘶叫了一声，便骤然停下了；但马达仍在“轰轰”响着，炮口还在喷吐着火光。

这时，谭秉云的手雷已经打光。他一个翻身滚下公路，返身端起自动枪向着坦克扫射。他知道此时自己只有主动吸引敌人的火力，毛和才有机会靠上前去将坦克收拾掉。

果然，敌人转动炮塔，炮弹、子弹一齐向谭秉云打来。

趁这时机，毛和绕到坦克屁股后面，也将手雷插进了坦克履带的缝隙里，将坦克炸瘫痪了。坦克里的美军士兵打开顶盖，还没来得及跳下地，就被两支波波沙撂倒了。

谭秉云跳上公路，看见后面的坦克正拼命倒车逃跑。

这时，毛和突然惊叫起来：“班长，人！人！”

谭秉云蓦地回头，看见从已被炸毁的第二辆坦克顶部钻出来一个美国兵。这人真是奇怪，双手下垂，脑袋耷拉在胸前。

谭秉云一眼便识破了敌人的障眼法，这分明是坦克里的活人顶出来的死尸。谭秉云没等尸体落下来。一把抓住坦克上的凹形铁环登了上去。尸体刚从他身边滑落下来，他端起自动枪，顺着炮塔上的顶盖口往里一送，“哒哒哒哒”便是一梭子，坦克里发出几声哀嚎，随后便什么也听不见了。

谭秉云站在坦克上向南望去，敌人的坦克已经跑得老远了。

他走到散兵坑沿上，一屁股坐了下去。脑袋沉得厉害，里面好像蜂房般嗡嗡作响，伸手抹抹脸，满手是黏稠的血。绷带已经没有了，什么时候掉的，他全然不知。

毛和单腿跪地，再一次将班长头上的伤包扎好。

天已大亮了，一轮红日从高高的雪岳山后露出脸来。美机开始对390高地进行狂轰滥炸，山头上碎石泥块飞溅，浓浓的硝烟灰尘铺天盖地笼罩了公路。

毛和已被谭秉云派到连部要手雷去了，这段公路边上只有谭秉云一个人。

这时，一辆美式敞篷吉普从北边疾驰而来。吉普不断地鸣着喇



叭，要那辆已被谭秉云炸毁的坦克让开道。

谭秉云见车上涂着刺目的白星徽，驾驶员穿着暗绿色的美式军装，戴着钢盔，估计这一定是前两天越过我军防线的敌人，企图与进攻的装甲部队联络。

他睁着一只露在绷带外面的眼睛，端起波波沙，瞄准汽车狠狠地打了一个“快放”。方向盘前面的玻璃板碎了，驾驶员歪倒在座位上，汽车轰地着了火。

刚才汽车不断地鸣喇叭，倒把谭秉云提醒了：眼下这段公路已被堵塞，其余的坦克不会轻易进到这里，要收拾它们，必须到前面去截击。

于是他走上公路，向南而去。

走了约莫百多公尺，他看中了路边一处地形。这里，一边是石崖，一边是陡坡，陡坡接近路面的地方长着一笼密密簇簇的野葡萄，躲在里面，既能隐蔽，又能观察南边公路上的动静。他满意地点点头，转身回到原来的散兵坑里。

正巧，毛和带着4个手雷和一根爆破筒回来了。

不一会儿，排长也奔了下来，隔着老远便大声嚷嚷：“谭秉云，毛和说你挂了彩，你快下去，我派别人来换你。”

“不碍事，我能坚持。我已经打出了窍门，手雷往履带里塞，没一个瞎的。”谭秉云怕自己说话不清楚，边说边打手势。

“不行，谭秉云，你的伤不轻，还是快下去。”排长看见谭秉云头上的绷带血糊糊的，很替他担心。

谭秉云怒冲冲地对毛和道：“你这家伙！叫你去领手雷，怎么告我的状？”

毛和也劝道：“班长，你下去吧，打坦克包在我们身上好了。”

“呵！你们这是咋个搞起的？我不就擦破一点皮，有啥子关系？”谭秉云使劲摇晃着脑袋，表示他的伤真的不重，自己完全能坚持。

排长见谭秉云执意不下火线，只好勉强点了点头。

排长一走，谭秉云就吩咐毛和：“我到前边公路上去埋伏，你在这里警戒北边。”说罢，将手雷往腰里一抄，提起一根爆破筒，便大步往前走。

毛和往北一看，叫道：“班长，怎么又多了辆汽车？”

谭秉云道：“吼啥，那是死东西。”

没有掩体，没有堑壕，没有一门火炮支援，谭秉云独自趴在野葡萄丛里，双眼注视着公路的前方。一个人、一支枪、一支爆破筒、两枚手雷，将要对付的是美军的重坦克群！

很奇怪，谭秉云此时竟全无一点畏怯与不安，相反，他的心里很实在。他估计敌人不容易发现他。“即使他们发现了，这里是一个死角，炮弹、子弹也打不着我，想用履带轧我吗？更不可能，坦克只要一离开公路，稍不小心，就会顺着陡坡摔下深沟里。”

他感觉到很困很饿，便拧开水壶，从挎包里掏出一块压缩饼干，吃了起来。此时，偌大的战场上出现了暂时的平静，硝烟早已散去，太阳高挂在空中，天空蓝得耀眼。睡意阵阵袭来，扰得他上下眼皮直打架，咳，要能闭上眼睛睡上一觉就好了，可是，他敢睡吗？

他以顽强的毅力同伤痛、疲乏进行着斗争，使自己的意识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清醒。整整一天过去了，敌人的坦克没有动静。

日头西斜，天气异常闷热，谭秉云解开风纪扣，摘下一片葡萄叶扇着脸。

忽然，路面开始了颤抖。他兀地激动起来，来了，这帮送死的家伙终于来了！他丢下葡萄叶，将一颗手雷攥在手中。

不一会儿，一串坦克拉开十来公尺的距离，“嘎啦嘎啦”地碾了过来。炮声轰鸣，炮筒像伸出壳外的乌龟脖子，左右转动，喷射出一团团火花。很快，一股带着热气的尘土向他迎面扑来。眨眼间，坦克高大的黑影投到了葡萄藤上。

谭秉云这时注意到，因为天气太热的原因，坦克手在机舱里热得受不了，全都把顶盖打开了。坦克行驶起来，便有风灌进机舱里，坦克手会好受得多。

葡萄藤在摇晃，大地在颤栗。

谭秉云扒开葡萄藤，爬到公路边上，飞步冲上从自己鼻尖前驰过的坦克，扯掉手雷插销，一只手抓住顶盖，另一只手将手雷塞进了坦克肚子里，然后飞身从坦克上跳下地。他的右脚刚跨过公路，还没有蹲下来，只听天崩地裂一声巨响过后，浓烟从坦克里面卷出来。接着，机枪和炮弹在坦克里面爆炸，火光直闪。

“轰！”坦克里汽油爆炸了，一股股绿黄色的烟冲出来，火苗子不停地往外蹿。坦克里一阵乱叫。



谭秉云往上爬去，探出脑壳一看，坦克浑身冒火，炮弹、子弹在坦克肚子里“啪啪”地爆裂开来。公路上一团混乱，所有的坦克全都没命地倒车，火炮机枪漫无目标地一阵乱放。

美军装甲部队北进的道路被谭秉云成功地堵住了，他那满是血迹与灰尘的脸上，泛出了骄傲的微笑。

或许，谭秉云当时并不完全清楚，他所创下的奇迹的价值和意义。数月后，在全军英模大会上，彭德清军长紧握着他的手激动地说道：“谭秉云啊，谭秉云，你是天下最大的救命菩萨呀！你把美军的装甲部队堵住了8个小时，我们有多少同志，才能安全地撤过北汉江啊。”

运气来了，谭秉云一夜之间便成了大英雄。他的战斗故事，上了《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还被绘制成以志愿军英雄人物为主人翁的系列连环画，《反坦克英雄谭秉云》一书，在儿童中广为阅读。

《志愿军英雄传》与《抗美援朝英雄纪念集》均载：

“谭秉云，四川省江津县人……在金化东南390高地阻击敌人，战功卓著。以手雷击毁敌人坦克3辆，打退敌人坦克群的进攻，阻止敌人8个钟头未敢前进一步，对部队、机关、后勤的安全转移起到了重大作用。1951年9月2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特决定记特等功、同时授予‘一级英雄’。1952年10月2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授予‘一级战士荣誉勋章’”。

党和人民钟爱着自己的杰出儿子，谭秉云成为英雄以后，荣誉和幸福像狂风暴雨一样席卷而来。

1951年9月下旬，已经“跳升”两级当上排长的谭秉云参加“志愿军英模代表团”回国观礼。

29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礼堂，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地接见了英模代表，并同谭秉云亲切握手交谈。

10月1日，他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观摩了广场上举行的国庆盛典。

10月3日，他作为观礼团的代表，又出席了由朱德、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等军队领导人为英雄们举行的酒会。聂帅听说谭秉云和他同是江津老乡，对他分外亲切，和他打起了“乡谈”。开国元勋们

一个个依次向他敬酒。

此后，他又应中国妇联、共青团中央的邀请前去作报告。

1952年夏天，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在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的陪同下，在志愿军总部接见了她，她受到了金日成的高度赞誉。

可是，一年多以后，生活却给谭秉云开了一个具有时代特色的“玩笑”。

1953年一个寒风凛冽，梅花笑开的日子，谭秉云转业回到了她阔别已久的家乡。她的年迈的父母、两个弟弟和一个弟媳，已经搬到了当时的县治所在地白沙镇上居住。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川东，交通不畅，消息也非常闭塞，家乡人民居然不知道这位谭秉云已经成了全国有名的大英雄。英雄跨进家门的时候，正值县房管所的两名干部登门向她父母催讨房租。因父母无钱，已经拖欠逾时，两位干部的脸色煞是难看。

谭秉云赶紧拿出转业费，才将他们打发走。

到家第二天，谭秉云上街打酱油，碰上了一个在县委机关工作的熟人。熟人问《人民日报》上登载的那位反坦克英雄谭秉云是不是她。这一问惊动了县领导，但他们居然不敢相信，担心遇上了骗子。县领导把谭秉云请到县政府，验看了证件、勋章，为小心起见，又发电报到浙江金华谭秉云所在部队核实。部队很快回电，证实志愿军反坦克英雄谭秉云就是江津的谭秉云。于是，江津沸腾起来。县委县政府在广场上为谭秉云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县长亲自为英雄戴上了大红花，“英雄之家”的牌匾，也高悬在谭家门楣上。

谭秉云是享誉国际的大英雄，他的英雄形象屹立在中、朝两国人民的心中。他的事迹，记载在中、朝两国的史籍上。朝鲜战争结束20多年后，金日成访问中国，专门向中国政府提出要见反坦克英雄谭秉云。

1991年1月8日至18日，谭秉云等12名曾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授勋的志愿军老英雄，受到金日成首相的邀请，重返三千里江山。在朝鲜各地，鲜花簇拥着他们，朝鲜政府和人民给予了他们最高的礼遇。

谭秉云告诉笔者，此行她感到最激动的是，在平壤朝鲜人民军军事博物馆里，她看到了自己年轻时，作为战斗英雄回国参加国庆观礼，在平壤火车站接受朝鲜妇女献花时的那张巨幅照片。



而最令他遗憾的则是，他未能回到过去的390高地，他只能站在板门店北面的山坡上，隔着森严的军事分界线，向着他曾经浴血战斗过的金化东南方向，那高耸云天的雪岳山峰，长久地驻足遥望……

第十六章

为什么停止进攻

1. 轮番作战

1951年1月25日，被压缩在“三七线”上的“联合国军”突然大举北上，向志愿军发起了凶猛的反扑，激烈的战斗在漫长的战线上同时打响。

1月27日，彭德怀向部队发出“停止休整，准备再战”的电报。

美军有能力战胜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吗？与他们的统帅李奇微一样，参加反攻行动的绝大多数官兵心里并没有底。

毋庸置疑，李奇微接了个烂摊子，不单单是朝鲜战局的烂摊子，在光鲜的外表下，当时的整支美军都是一个烂摊子。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训练有素、骠悍孔武的美国陆军不同，出现在朝鲜战场上的美军步兵，完全好像变成了另外一支军队。尽管手中攥着威力无比的武器，大多数士兵却训练低劣，素质低下，许多兵员都只是仓促上阵的中学生，纪律涣散现象在驻日美军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战后初期的日本国民极度贫困，而且对战胜他们的强者十分顺从，区区几个美元就可以买到一切服务，很多美国士兵甚至连枪都懒得自己擦了。

一支把主要精力和时间花费在妓院酒吧而非训练场上的军队，其



在朝鲜战场上的悲剧性表现可想而知。

作为一名职业军人的李奇微，一直担心美国社会会因为过分强调物质享受而堕落，他曾警告说：“美国正成为一个人们走路越来越少，男人越来越柔弱的国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观点居然跟战壕对面的中国军人产生了共鸣。

志愿军资深敢死队长朱克回忆说：“美国兵打仗最熊包了，他们在阵地上铺开军毯，喝啤酒，吃香肠、烧鸡，吃罢喝罢，再端着卡宾枪冲上来。我们一打，‘哗啦’就退下去了。他们全指望着大炮、坦克和飞机来帮着打。在战场上要说俘虏一个美国兵，有时就跟玩儿似的。我跟他们打了几年仗，照我说啊，美国人的飞机、坦克，还有吃的喝的我们没法比，这个不承认不行。可美国兵，尤其是步兵，稀松得很。”

王绳金说：“当时我们听说美国人里边还有雇佣军，就是你给我钱，我替你打仗的军队。中国的战士们听了以后都觉得不可理喻，说世界上咋个会有这样的军队哟？战士的勇敢，不怕死，那才是胜利的根本保证，是不是这个理啊？”

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连续进行了三次战役，打得十分疲劳，大量减员。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于2月7日作出决定，实行“轮番作战”。轮番作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一个新创造。

1951年2月25日，杨得志为司令员，李志民为政治委员的第19兵团，作为第二轮兵力入朝参战。

3月18日，陈赓任司令员^①的第3兵团也接到入朝参战的命令。

当志愿军在前3次战役大获全胜之后，每一个参战者都毫不怀疑战争的天平，已经向着中国人倾斜。

李奇微麾下的美军，恐怕在短时间内，再也难以承受大规模的后撤了。就像一枚过了河的卒子，进攻，是李奇微唯一的选择，哪怕只是试探性的进攻。

李奇微为解燃眉之急，敦促陆军部，从美国本土雇佣了一部分参加过二战的老兵补充到前线，并且想尽了一切办法来重振部下的

^① 笔者注：陈赓未赴任，由副司令员王近山代理。

士气。但是，正如曾在滑铁卢战役中击败拿破仑的威灵顿公爵所说：“一支不断撤退的军队，是很难对他们的统帅产生什么爱戴的。”

第四次战役一开始，李奇微就登上了一架老式教练机，深入到志愿军战区进行空中侦察。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没有篝火的烟雾，没有轮痕，甚至没有被践踏过的雪地，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大部队的存在。”

他想看看中国人的动静，中国人呢？想尽一切手段，不让他看。

时任志愿军司令部电台队长的杨雨田回忆说：“杨成武的19兵团刚刚跨过鸭绿江，还没赶到指定作战区域哩，韩先楚副司令就叫我搞一次无线电佯动，就是说你弄一辆汽车，带部电台，带几个人，跑到离汉城远一点的地方，想办法迷惑敌人。我就带着电台跑到离汉城100公里以外的地方。然后呢，我就装扮成新入朝的19兵团的人，打开电台，用‘明语’向先期入朝的部队打招呼，就说‘哎，老大哥，你们辛苦了’之类的话，表示我们后续的部队已经到了。其实呢，后续部队离前线还远着哩。”

以“威力侦察”为目的的“猎犬行动”持续了8天，李奇微还是没能搞清楚神出鬼没玩失踪战术的中国军队的意图，以及防御阵地的准确位置。

但是，根据数支美军侦察队的报告，他从中国军队与美军交火时的反应判断，中国军队暂时还没有发动新的战役的企图和能力。在亲自乘飞机进行的侦察行动中，李奇微发现志愿军的补给线越拉越长，而在长津湖战役中重创美第10军的志愿军9兵团，居然没能够参加元旦攻势！

根据以上种种情况，李奇微判断志愿军的一线兵力，尚未来得及补充，现在很可能是中国军队最不宜作战的阶段，全面反攻的时机到了。

“立即向北方发起进攻！”李奇微制订了一个野心勃勃的作战计划。他集中了“联合国军”方面5个军，共16个师，外加3个旅，1个空降团，和全部的炮兵、空军力量，仅地面兵力就达到了23万人。针对过去总是让韩国人打头阵的做法，李奇微特别强调这一次，“最精锐的美国和英国部队，必须冲杀在最前面”。

他要求部下牢记：战争不是付出一点鲜血，带来一点不悦的游戏。这次大规模行动的目标，不是夺取地盘，而是消耗志愿军的有生

力量。

第8集团军把这次北进行动，称为“霹雳作战”。

1951年1月25日，在朝鲜待了一个多月的李奇微，终于发动了上任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攻势。

第1军和第9军肩并肩缓慢向前推进，以防止中国人再次实施他们最擅长的穿插战术。李奇微既不希望在各部队之间留出空隙，更不愿意把重要任务交给韩国军队去完成。

这次行动的目标很有限，他要求“联合国军”向北推进20英里左右，到达汉江北岸，并且在推进时务必保持谨慎和稳固，他不想大胆冒进，以至于让自己变成中国人的猎物。凭借着傲人的地面和空中火力，“联合国军”开始向世人展示其强悍的军事肌肉。

朱克说：“美国佬的一阵排炮打上来，我们的阵地起码被掀下去一公尺那么深，你说这人要不跑不动，有多少能不死啊，是不是？这炮一打就是半个钟头，炮火延伸后，别说找人了，你想找块战友的骨头都找不着了，上哪儿去了？我的个娘呢，都碎成渣了，没有了，啥都没有了，跟被炸得翻起来的泥土、石头混在一起了。运气好的，也还没完哩，炮火刚打过，美国人的飞机跟着又来了，一遍又一遍地轰炸。往我们头上扔下来那炸弹，一颗就有2000公斤，那叫重磅炸弹，一爆响，阵地上就是一个两米深的大坑。活着的人全成了聋子，说话听不见，全用手比画。”

负责用骡马往前线运送作战物资的军需员沈长江说：“美国人的排炮打来是什么样的感受啊？人待在防弹洞里，就像待在大鼓里一样，上边好像是阵阵惊雷不断地打在鼓面上，那个声音是既沉又闷。我们有的战友胸口贴地趴着，结果五脏六腑全被震烂而死。有的战友把口闭得很紧，被震得七窍流血而亡。我这只左耳朵，就是在洞子里被震聋的。”

与以往不同的是，李奇微现在急着要做的事，就是把自己的部下从吉普车和卡车的暖气里拉出来，像他们的先辈那样在冰天雪地里跋山涉水，长途行军。

即使他们不能和敌人分享别的东西，可至少应该和敌人分享这份严寒。

美国大兵们终于被李奇微踢下了卡车，像真正的步兵那样参与到战斗中去，这就让美军摆脱了此前在公路上坐以待毙的“富贵病”，

作战的范围和手段，也就空前地丰富起来。

随着天气转晴，一直受到制约的美国远东空军，也发挥出无与伦比的空中优势。

王绳金说：“美国飞机厉害呀，它一来就是上百架，几百架，不是给你弄个几架几十架，给你闹着玩儿似的，丢几颗炸弹它又回去了。那上百架几百架飞机到头上是啥概念啊？单是那声音，就能把刚上来的新兵的魂儿吓没了！那飞机就跟乌鸦似的，一群一群就过来了，有大的有小的，颜色也不一样，那个大型轰炸机上扔下来的叫什么‘一把抓’，一下扔出来好多炸弹，黑压压就是一大片，落地后‘咚咚咚咚’四处蹦跳着乱炸，根本没法躲，是死是活，就全凭运气了。”

张清劭说：“飞机往那儿一个俯冲，炸弹下来‘呱呱呱呱’一炸，我告诉你，我看得真真的，重磅炸弹下来的时候不打弯，也不转，直溜溜就下来了。我当时就在那沟里躺着，一边看着飞机在头上扔炸弹，一边想，哎呀我才18岁啊，可别往我头上来一颗啊！这的确确是我当时的心理活动。结果那个炸弹撂到山上，倒没炸着，崩我们一身土，那也真是算得上幸运了。而且那飞机一梭机枪子弹都没打，光撂炸弹，撂完就走。”

局势迅速地恶化了，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传到彭德怀的总指挥部，不断有前线指挥员在电话里报告“光啦！全打光啦！阵地没法守啦！”

志愿军官兵在用血肉之躯，阻挡着美军的飞机坦克和大炮。

“我给你说点真实的吧，这些都是我亲眼看见，过去都没敢讲的。在朝鲜战场，没有被打死，而被饿死的，多得很；被冻死的，也多得很。被美国人的坦克车轧死的，我也亲眼看见过，因为几天肚里没进一点东西，饿得太惨，实在走不动了，就躺在地上动不了了，可人又没死，眼珠子还滴溜溜转哩，没办法啊，只能听天由命。敌人的坦克上来后，可不管你是活的死的就轧过去了，到处‘砰砰砰砰’地响，好多都是十七八岁的娃娃呀，就睁眉鼓眼地瞪着坦克朝着自己碾过来，连想挪挪地儿，闪躲一下的劲儿都没有了。他们在老家戴上大红花，穿上军装，还没来得及训练哩，就让闷罐火车拉到朝鲜，边打边学，啥本事也没来得及学到，就这么死了，非常的惨烈！”讲到自己65年前曾亲眼目睹的惨烈战斗，原志愿军步兵焦振芒抹了把泪水，又接着说下去，“敌人围着你一个山头打呀，四处被敌人的坦克包围着，坦克炮也打，坦克上的机枪也打，包围圈外边的远程大炮也往



你这个山头上打，飞机也赶来往你这个山头上扔炸弹，所以说一个连守一座山头啊，坚持不了3个钟头，阵地上就剩不下几个还能动弹的了。”

彭德怀向志愿军各部发出了“停止休整，准备作战”的电报。

应该庆幸的是，几十万志愿军在半个月前及时停了下来，如果那时不顾实际情况，稍微有一点点好大喜功的念头，顶不住金日成和苏联人施加的压力继续南进，让部队在更加困难的时候迎接敌人的反击，那后果，简直不堪想象！

整条战线的志愿军都在险象环生的恶战中苦斗不已。

1月27日，也就是李奇微开始反攻两天之后，满眼血丝的彭德怀向毛泽东发电，建议部队后撤，足见前线战局之艰危。

局势或许还没有恶化到必须弃守汉江南岸的地步，可是，照这么打下去，还需要把多少条人命丢进这个深不见底的巨大的绞肉机才算罢休？以这么多年轻的生命为代价，就算一时守住这些荒山野岭，其意义又到底有多大？

彭德怀不愿做赔本买卖，不愿把士兵的鲜血和生命浪费在死守上，既然李奇微在撤出汉城时能在墙上留字，向他彭德怀“致敬”，彭德怀怎么就不能“见机而行，择日再战”呢？老祖宗传下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退后一步自然宽”怎么反倒被洋鬼子李奇微学去了？

不过，连彭德怀自己都认为北京不会同意自己的意见。

非但如此，来自中南海的回电让他惊愕不已！

“我军必须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以歼灭两万至三万美李军，占领大田、安东之线以北区域为目标。第四次战役后，敌人可能和我们解决朝鲜问题的和平谈判。那时谈判将于中朝两国都有利。而敌人则想于现时恢复仁川及汉城南岸桥头堡垒，封锁汉江，使汉城处于敌火力威胁之下，即和我们停战议和，使中朝两国处于不利地位，而这是我们决不能允许的。”

毛泽东不但不同意部队后撤，而且指示志愿军必须立即发动第四次战役，战役目标直指敌后100多公里外的大田和安东。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最高统帅非常清楚，只有战场上不断取得的胜利，才能使美国人陷入绝望。

但事实是，现在连“三七线”守不守得住都已经成了问题，想要志愿军打到“三六线”，也实在是强人所难，志愿军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即便已经有了三战皆捷的辉煌战果，也仍然不可能改变美中两国之间天上地下的实力差距。

由于毛泽东和彭德怀所处的位置不一样，看待问题的角度、深度有时也会不一致，而每当二人之间产生不一致之后，通常都是以彭德怀的服从作为结束。

这还不完全是因为“党指挥枪”和“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而是因为的确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彭德怀自己也明白，毛泽东分析、认识和处理重大问题的能力，远在自己之上。

最让他心服口服的一个例子，是毛泽东亲自为他修改讲话稿。

1951年1月25日，中朝两军高干会议如期在君子里的一个矿洞里举行。参加会议的有金日成首相和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主要负责人，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和志愿军其他领导人，还有代表中共中央前来指导的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有志愿军直属各部、各军的负责人，朝鲜人民军总部和各军团的主要负责人。

25日上午，大会首先由朝鲜劳动党元老级人物金斗奉致开幕词，彭德怀作《三个战役的总结与今后任务》的报告，下午和26日全天，朴宪永、邓华、杜平、洪学智、韩先楚先后作了专题发言。27日分组讨论。28日金日成、高岗先后讲话。

在29日上午的闭幕式上，彭德怀作大会总结。考虑到中朝之间出现的一些不和谐的现象，报告中特别加入了一段强调要进一步加强中朝两党两军团结的内容。

彭德怀原来的讲话稿是这样写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努力向朝鲜劳动党和人民军学习。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作战有成绩，这是光荣的，也是应该的。因为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过去朝鲜有很多同志参加中国革命战争，为中国人民而流血，我们应当向他们学习。”

毛泽东看到这个讲话稿后，认为很不妥，提笔删掉了以上一段文字，并逐字逐句地写成以下一段文字。

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和人民军，在朝鲜5年来的斗争中有了伟大的成绩。他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了



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政权，建立了英勇的人民军，和苏联、中国及其他人民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现在又正在和美国侵略军及李承晚伪军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因此，一切在朝鲜的中国志愿军同志，必须认真地向朝鲜同志学习，全心全意地拥护朝鲜人民，拥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拥护朝鲜人民军，拥护朝鲜劳动党，拥护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做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挥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如同我们在国内的想法和做法一样，这就是胜利的政治基础。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最后胜利，就一定会得到。

当彭德怀在会上诚挚而有力地讲完这段话时，热烈而持久的掌声轰然而起。中朝指挥官相互握手致意，掌声撞击着每个人的心扉。

在对待和处理重大国际政治问题上，毛彭之间，高下立判，不可同日而语。

也就是这一天，由于毛泽东“我军必须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的电报突然到来，原本安排1月29日闭幕的中朝两军高级干部会议，立即改为“发起第四次战役的动员会议”。

动员会议结束后，彭德怀为便于就近指挥，将“前指”移到更靠近前线的金化。

杀气腾腾的两大军事集团，再次轰然相撞。

“原子弹会是对中国人的回应吗？”在华盛顿，一名记者在记者招待会上这样当面问杜鲁门。

美国总统的回答吓得地球抖了三抖。他说：“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此事。”

杜鲁门早已宣布了扩军计划，毛泽东非常明白，如果他不能抢在美国重整军备之前解决朝鲜问题，战争一旦长久地拖下去，恐怕今后是很难招架的。这就仿佛是重量级选手和轻量级选手之间的拳击赛，重量级选手即使出错，只要没有被击倒在地，就有缓过劲的机会。而轻量级选手必须出奇制胜，不能出半点差错。在美国人选择妥协之前，不能在战场上给他们留下哪怕一丝翻盘的机会，否则，一切都会前功尽弃。早已精疲力竭，而且严重缺乏补给的第一批入朝参战的志

愿军部队，有能力化解美军的反攻吗？这必须画上一个巨大问号。

或许毛泽东也不指望他们真的能够歼灭眼前的敌人，他所需要的，只是时间。

战争，是政治的延伸，而战局的发展，又必然会影响政治上的决策。自从朝鲜战场爆发，给金日成发动的统一战争开了绿灯的斯大林，就一直处在风声鹤唳的状态之中，唯恐苏联任何形式的介入，都会给美军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带来借口。

苏联解密档案已经证明，与被刻意塑造出来的天下无敌、咄咄逼人的形象完全不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蒙受了巨大损失的苏联红军，其实根本就不愿也不敢与美军爆发正面冲突。甚至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的前一刻，为避免刺激美国人，斯大林竟不屑于中国人的感受，出尔反尔地拒绝为盟友提供武器支援和空中保护！

可是，当中国志愿军出乎所有人意料一鼓作气把美军踹回“三八线”以南之后，一直绷紧了脸的斯大林马上变得笑容可掬起来。斯大林不仅同意向志愿军提供大规模的现代化军事装备，苏联空军也与中朝两国空军一道，出现在了平壤以北、鸭绿江以南的大片空域，所谓的“米格走廊”是也。

中国军队无数士兵用鲜血和生命换回来的骄人的战绩，向全世界证明了自己的价值。终于，斯大林曾许诺过的大批苏制飞机、大炮、坦克开始源源不断地被移交到轮流入朝参战的志愿军官兵手上。苏联教官也进入中国境内，对中国士兵展开培训。

原志愿军某部卫生员张国民说：“我们在河北任丘开誓师大会那个时候，以前打蒋介石那一套旧枪旧炮旧装备，全部上缴，一律换成苏式装备，什么排长、班长全是转盘机枪、波波沙冲锋枪，战士就是上三棱刺刀的新式步枪，我们称之为‘水连珠’。”

但是，换装也好，培训也罢，这都是需要时间的，而这些极端宝贵的时间，只能靠陆续跨过鸭绿江投入战场的志愿军用生命去换取。

这也是毛泽东要求彭德怀克服巨大困难，立即再次向美军发动反击的重要原因之一。



2. 摩拳擦掌，壮志难酬

对16军入朝作战，毛泽东极为重视。因为这支部队是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唯一的合成军，军部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仿效苏军“联合指挥所”的编成来建设的。每个师都增配一个炮兵团和一个坦克自行火炮团，火力相当凶猛。

所以，16军入朝前，毛泽东两次接见了该军军长尹先炳和政委陈云开。

1951年6月，毛泽东召见16军政委陈云开（笔者注：军长尹先炳在南京陆军学院培训，未能参加）等几名军师级干部。

陈云开以前是红6军团司令部的译电员，长征途中当过执行科副科长，抗战时期在359旅当过炮兵营政委，毛泽东与陈云开早就相识。

陈云开向毛主席敬礼问好后，毛泽东握着陈云开的手说：“我认得你，你还是以前的老样子。”

陈云开向毛主席汇报了16军集结、整编、改装的情况。

毛泽东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在全世界人民支援下，中朝人民有能力打败它！世界大战暂时打不起来，有人担心美国的原子弹是一种杀伤力很大的武器，美国人有，别人也会有，我们今后也要有。所谓联合国军，图有空名，没有实际意义。实际上还是要美国自己去打，它的帮凶帮不了它的忙！”

陈云开只带耳朵，没带嘴巴。只听，只顾着点头。

毛泽东又说：“朝鲜战争是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大概要打3至5年才完得了，美国人打不下去了，就要停下来。我们需要有一个世界和平环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战争是美帝强加给我们的，我们反对战争，但不害怕战争，它要和我们打多久我们就打多久，一直打到它认输了才停。”毛泽东用了较长时间给陈云开讲怎样打仗，怎样带兵，怎样用兵，强调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加强仇美教育。

毛泽东对陈云开说：“‘美国人是打钢，我们是打气’。要求志愿军‘尊重朝鲜主权；维护金日成首相的威信；团结朝鲜同志；用公正态度处理问题’。”

毛主席问陈云开：“干部都配齐了吗？”

陈云开说：“基本配齐了，只是军长尹先炳同志还在南京学习，没有回来。”

毛主席向在座的聂荣臻说：“你给刘邓发个电报，请他们马上把16军的缺职干部配齐。”

毛主席又问陈云开：“你还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出来。”

陈云开说：“军师两级的电台，功率太小。”

毛主席马上看了看旁边的聂荣臻，说：“这个问题请荣臻同志负责解决。”

谈话中，毛主席对陈云开说：“我看过你在遵义剿匪的电报，干得不错，你们在剿匪中当了模范，在抗美援朝中要再立新功。”

谈话结束后，毛主席委托聂荣臻代表自己，请16军的将领们去全聚德吃烤鸭。

出了院门，聂荣臻对陈云开说：“主席给你讲的时间最长。”

陈云开谦恭地说：“主席知道我水平低，讲得要细一些。”

没过多久，毛泽东再召见尹先炳和陈云开二位主要将领。

毛泽东给这一对“红孩儿”^①讲怎样带兵，怎样打仗，特别强调做好官兵的思想工作，加强仇美教育，争取战争主动权等问题。“敌人从我们正面打不动，就可能从空中或侧后找出路，要提高警惕。工作也一样，抢在时间前面就主动，装备到一个师，就改一个师，不要等到齐了再改。”

毛泽东耳提面命屈膝谈心深深激励着尹先炳和陈云开，他俩当面向毛泽东表决心：“我们一定带好部队打好仗，决不辜负毛主席和祖国人民的希望！”

装备了现代化武器，配置了现代化指挥系统的16军入朝后跃跃欲试，很想显示一下不凡身手，接连给“联合国军”几个霹雳掌、旋风腿，杀他个屁滚尿流，人仰马翻。

但因为当时已经进入“边谈边打”阶段，他们参与打的两仗规模都不大，战果也就说不上骄人。这样小打小闹，手里攥着比所有兄弟部队都要好得多的武器、好得多的装备派不上大用场，军长政委也脸上无光。最厉害的时候，也就是派几辆坦克出去偷袭敌人的炮场、车场和坦克场。

^① 尹先炳1930年15岁参加红军。陈云开1930年17岁参加红军。



可就这么点动静，也把“三八线”那边吓得够呛，赶紧把被折腾得疲惫不堪的美步兵第3师换下去，把整补后的美步兵第2师和荷兰营换了上来，还在板门店唠唠叨叨地说中朝方对谈判没有诚意，把一个装备了苏式武器、训练有素的合成军调到“三八线”上来，不是想大打，又是什么？

得，这下弄得尹先炳直后悔，当初别那么着急去折腾人家，消停点不好么？没准儿志司就把金城那边的买卖交给我16军来做喽！

没办法，那就从小买卖做起吧。

1953年7月17日22时30分，尹先炳的“小买卖”开了张。

对手选了美步兵第2师第38团一个连据守的527.7以南无名高地，攻击部队是军里的头号老资格——第46师第136团第9连——声名赫赫的红9连。

尹先炳是合成军军长，炮火当然大大的阔气。这样一次“小打小闹”，他就组织了大大小小近百门火炮，精确计算确定诸元，分配目标，5分钟的火力突袭，就把表面阵地上的明火力点悉数摧毁。连长田敬堂、指导员王留锁带着一群如饿老虎般的士兵嗷嗷叫着一个冲锋攻上去，破铁丝网，消灭暗火力点。20分钟左右，守军美步兵第38团第3营H连就全连覆没。

美2师又上来一个连反扑，被红9连兜头打了个落花流水。

红9连立马撤了下来——尹先炳这是摸底。

底摸了，尹先炳觉得美国军队也就不过尔尔，除了火力强、阵地坚固、反应和协调较好外，其他也就平平。

19日，第136团换上第10连——第16军合成化后每个团有12个步兵连队，乘荷兰营A连上来换防之机，隐蔽接敌，打了荷兰鬼子们一个措手不及。30分钟解决战斗，没死的荷兰人，逃得比兔子还快。

第10连也撤了回来——尹先炳不想当“小地主”，想当“大地主”。

21日，第32师第94团第7连暗施杀手，将248.8高地的南韩军第2师第31团第1营第2连一个81人的加强排给解决了，时间也是不到30分钟。

小买卖挺赚的。

这下尹先炳再不想打小的了——没意思。

要当就当“大地主”！

他想步刚刚完成了金城反击战的老首长杨勇后尘，再打一个大反击战。在全军的防御正面，组织一次步、炮、坦克协同的大动作，将战线前推20公里，直捣铁原飞机场，拿下那个“八国联军指挥所”——这是尹先炳给美第8集团军前指取的诨名。

就在尹先炳们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的时候，志司杨得志副司令员打来了电话。

“杨副司令，我们正在准备，大家都嗷嗷叫哩！”尹先炳得意洋洋地报告。

“老尹，算了算了，敌人在板门店哇哇叫，要签字啦，我看你们就停下来吧，别打啦！”

“我们已经……”尹先炳一急，嗓门儿也大了。

“别说啦，24日最后校正军事分界线，你们服从命令吧！”

“是……”尹先炳的情绪顿时一落千丈。

一场持续了三年多的朝鲜战争，说停就停，就这么结束了。

原本正伏在桌子上审阅协同作战计划的尹先炳，把手中的红蓝铅笔狠狠地往桌子上一摔，怒骂道：“美国佬，你他娘的怎么总跟老子过不去！咱还没来得及动手哩，怎么就戾啦？”

尹先炳的“大地主”梦，破灭啦！

3. 轰动西方：“志愿军大规模屠杀美军战俘？”

1951年11月14日，正当开城停战谈判陷入僵局时，侵朝美军第8集团军军法处处长詹姆斯·汉莱上校在釜山召集新闻记者，发布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声明，称：“据可靠情报，中共军在朝鲜杀死了5500名美国战俘和290名其他盟国的战俘。”

石破天惊！西方媒体一拥而上。

第二天下午，美国军事电台就开始连篇累牍地播送所谓“暴力事件真相”。

杜鲁门也就此事件发表谈话说：“汉莱所报道的中共军队屠杀美国战俘的事件，是本世纪所发生的最野蛮的事件。”



美国总统的谈话产生了巨大煽动力，西方世界的主要报刊电台一哄而上，推波助澜，顿时把中国人民志愿军虐杀美国战俘的“野蛮暴力事件”渲染得有声有色。

美联社有一条新闻还提供了一组“有趣”的数字对比：在朝鲜战场上，手执武器的美军官兵与志愿军作战中，阵亡人数为6194名；而放下武器的美国战俘，被志愿军杀害的竟然多达6270名！

除了甚嚣尘上、扣人心弦的大肆宣传，还有形象化的历史比拟，他们说，中共军队对付美国战俘最残忍的一招，莫过于重演日本军国主义者当年在巴丹半岛的故伎——强迫美英战俘进行“死亡行军”。

霎时间，大量传播媒介都争先恐后地描绘起“死亡行军”的故事来，竟闹得沸沸扬扬，让读者和听众怵目惊心，毛骨悚然。

所谓“死亡行军”，典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太平洋战场的菲律宾群岛。1942年夏季，日军相继猛攻巴丹半岛和哥黎希律岛，美菲联军大败，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偕夫人乘潜艇逃出生场。接替指挥战局的温赖特少将遵照白宫旨意，认为坚持抵抗只会造成无谓伤亡，便命令全部美菲军队无条件投降。日军派人把温赖特将军押送到中国沈阳，关入监狱。同时下令美菲所有被俘人员做长距离徒步行军，从巴丹半岛的马利维尔斯奔向位于圣费南多的俘虏营，行程长达1000多公里。此时正值炎夏，病疫流行，粮食又缺乏，日军对战俘更是恣意虐杀，等到达目的地时，死伤人数竟达25000余人。几个月后，有3名美国士兵从日军战俘营中侥幸逃出，越海到达澳洲布利斯坦，才揭开了这次“死亡行军”的秘密。

麦克阿瑟将军得悉详情后，义愤填膺，下令立刻向新闻界公布全部细节。当时，华盛顿最高当局为了掩盖太平洋战场的败绩，决定禁止发布这一暴行的详细记录。

但在美国，毕竟没有遮得住新闻记者眼睛的屏障，“死亡行军”的内幕还是逐渐地传播开来，弄得家喻户晓。当时事态的发展，证明了华盛顿的忧虑是多余的。公开“死亡行军”的内幕，不但没有影响美军的士气，反而激起美国军人、美国人民以至世界人民的同仇敌忾。

美国军方显然想抄袭以往的成功，于是复制了朝鲜半岛“死亡行军”的故事，以此来提振越来越低下的美军士气。

而美方所说的“死亡行军”，指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第一、第二次战役中转运美军战俘的经历。

1950年10月25日至12月24日，入朝参战的志愿军相继发动了两次战役，歼灭“联合国军”及南朝鲜军5.18万人，彻底粉碎了麦克阿瑟发动的“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初步扭转了朝鲜战局。这两次战役中一共俘虏敌人14211名，其中有美军3781名，英法军147名。

任何战争，都应努力避免将敌方的被俘人员置于战线附近，这是起码的军事常识。志愿军俘获的大批西方战俘，只有尽快地转运到朝鲜北部远离炮火伤害的后方战俘营，才能进行有效的管理。因此，必然要产生一个战俘长途转运的问题。

当时，美军虽然在地面战场遭受惨败，却拥有巨大的海空军优势，多达1500架的各类作战飞机，从空中封锁着志愿军的交通运输线，每天要投下数以万吨的炸弹，任何军事目标与非军事目标都不放过。这种焦土政策，才是造成“联合国军”被俘人员无法安全及时地转运后方的根本原因。

志愿军第9兵团某团政治处朝语翻译李炳云，讲述了他参加初期转运美俘的艰难经历。

第二次战役结束，他所在的团在东线咸兴一带，抓了114名美国俘虏，必须及时转运到位于鸭绿江边的碧潼战俘营。部队特地组织了一支精干的小分队，指派一名团政治处的司务长任队长，一名懂英语的文化教员任英语翻译，一名卫生员照顾伤病战俘，让李炳云担任朝语翻译，另外还配了6名警卫战士，负责转运途中的安全保卫工作。

队伍出发前，团政委召集小分队10名干部战士开会，说明这次俘虏转运工作的重要性，一定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好各项政策，包括宽待俘虏的政策。小分队的成员联名向团党委写了决心书，保证像参加作战任务一样，不惜牺牲生命，也要完成任务。

这114名美国战俘，是打扫战场时零星集中起来的，且都是东躲西藏忍饥耐寒苟活下来的幸存者，多半带有不同程度的病伤，情绪特别颓丧，有的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

为避轰炸，转运队从傍晚5点钟出发，13个小时走走停停，只向北移动了24公里，可付出的代价却是惊人的：1名警卫战士为了寻找两名掉队的美俘坠崖身亡；3名重伤战俘因防空时受颠簸伤势恶化死去；还有6名战俘失踪，属于蓄意逃跑。

他们又改为白天行进，速度有所提高，可在一次空袭中，4架野

马式战斗机飞掠过来，当场炸死了7名战俘，重伤4名，小分队成员中，卫生员中弹身亡，司务长和一位警卫战士负轻伤。

无数的困难中，最熬煎人的困难是缺粮。所带的上百斤炒面，当作上等口粮，只够调成糊糊给病伤战俘做“营养餐”，且所剩无几。

李炳云为筹粮弄得心力交瘁，每到一处宿营地，别人可以一屁股坐下来休息，他除了到处找房子，还得觅粮食。

令人为难的是，村民们可以把活命的粮食匀给志愿军，却坚持不肯分给美国俘虏兵。

面对严酷的现实，许多战俘越来越感到绝望。

一天晚上，在一个小山村，夜间空袭的飞机刚刚飞走，突然，一个平时沉默寡言的美军上士突然扑向左臂负伤的警卫战士，夺下连发卡宾枪，奇怪的是，他不朝志愿军开枪，却对着俘虏群哒哒地扫射起来。他一边扫射，一边狂喊：“我以上帝的名义，拯救你们，解脱你们……”这一下，打死了美俘5人，伤17人；我一名警卫战士重伤，半小时后牺牲。司务长额角负伤，鲜血直流。

司务长迅速安排了几个人为伤俘包扎，一边命令全体战俘就地坐下，一边安排人手掩埋死者。另外，派人火速找上级报告情况，请求支援。

第二天上午，全体战俘集中到村后的密林中，一边防空，一边开大会。

额头包着绷带的司务长脸容瘦削，身上的棉军衣又脏又破。他将近40岁年纪，为人敦厚，平时不爱多说话，不料这一回对美国战俘说起话来却滔滔不绝：“这一路来，大家都很苦，这我懂……”他的眼圈忽然红了，“两年多以前，我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上士班长，在战场上给共产党军队解放了，也就是当了俘虏。开头我怕得要命，可是很快就相信了事实——共产党军队是尊重俘虏宽待俘虏的，把俘虏看成人，看成解放了的兄弟……”

文化教员的英语水平不高，越翻译越吃力，简直要哭出来。就在这时，战俘群里有一个上尉战俘站了起来，严肃地向司务长敬了一个军礼：“我懂汉语，请允许我替你们翻译。”上尉转过身，面向战俘们，流利地将司务长的话译成了英语。

一片静寂，战俘们听得专注极了。

有几名战俘大声提了几个问题：“听说把我们送到后方，是要慢

慢杀死我们，或者是去当劳工，是这样吗？”

“唉，哪有的事啊！”司务长叹息道，“跟我一起当俘虏的，有成千上万的人，开头谣言也很多，大家也很担心，后来不少人领到路费回家了，我自愿留下，还当上了干部。这段经历我平常不爱跟别人说，可是跟你们说了，这是因为我把你们也看成‘解放兄弟’，我请你们一定要相信志愿军的俘虏政策。眼前的困难，都是‘联合国军’的空中封锁造成的。只要大家好好合作，我相信一定可以克服这些困难。”

上尉译完司务长的话，又告诉俘虏们，说他二次大战时期在中国待过很长的时间，相信中国人的道德标准，希望大家鼓起信心，遵守纪律，千万不要再做蠢事。文化教员也做了翻译。

会后，战俘们一致推选上尉当战俘联络代表，配合小分队一起工作。上尉还找司务长单独谈话，转达许多战俘伙伴的共同心情，对连续发生的不幸事件，都愿意进行深深的反省……

天无绝人之路。第二天晚上，后方领导接到报告，派一辆卡车开到了山村，带来两袋大米、一包咸鱼和许多食品罐头。后半夜，卡车接走了20多名病伤严重的战俘，直奔碧潼战俘收容站。一周后，其余的战俘也比较顺利地到了目的地。

这次战俘转运行军，比起从“三八线”出发的千里辗转，并不是最典型的一次。有一支战俘转运队伍遇上B-29重型轰炸机的“大把抓”轰炸，同时投下十几吨的炸弹，构成“地毯式”爆炸效果，使得一支数十人的战俘队伍连同志愿军押运人员，霎时化为乌有。

如果朝鲜半岛上真的存在战俘“死亡行军”的话，那是指挥战争的美军将领为西方战俘们制造了死亡。

要感谢西方那些正直的新闻工作者和敢于说真话的人们，是他们用良知揭开了“朝鲜半岛 死亡行军”的谜底。

最先向美国官方发难的是美国自由派报纸《华盛顿邮报》、保守派刊物《夜星》，他们发表社论或署名文章，对汉莱上校提供的数字表示了怀疑。

接着，《时代先驱报》在头版刊登了一篇来自东京的快讯，还附加编者按语称：“五角大楼的一位权威人士断言说，陆军司令部没有确切证据可以证明，中国共产党在朝鲜战争中干下了屠杀战俘或其他野蛮行为。”



汉莱被新闻界逼得走投无路时，亮出了他的救命符：“我当然是得到高级官员的批准才发表讲话的。”他所使用的材料“是总参谋处经过正常的途径发下来的”，“我从总部新闻处得到许可以后才发表了数字”。

而他的上司——“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当然不好把责任再推给他的上司——美国总统，于是，李奇微窘态百出，先是发表声明，表示对汉莱讲话“毫无所知”，说要“派人对此事进行调查”，又对汉莱“遽尔发表”谈话表示“非常遗憾”，后又说“目前仅仅可以证明有365人被杀”。

可这个数字本身也还是虚假的。

李奇微将军如此出尔反尔，自然贻笑大方。从此，再也无人理睬“朝鲜半岛的‘死亡行军’”之说了。

中国志愿军在对待战俘问题上展现出的泱泱大国风范，连敌人的最高统帅也不得不发自内心地表现出感佩之意。

曾经在“志愿军大规模杀害美军战俘”问题上，出于当时的政治功利目的，说过假话的李奇微，多年后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也满怀感激之情地写到了中国人释放美军战俘这件事，承认中国人是“更加文明的敌人”，并作出了高度评价：

中国人释放俘虏的做法与北朝鲜人对待俘虏的做法截然不同。北朝鲜人往往在俘虏脑袋后面补上一颗子弹。

有一次，中国人甚至将重伤员用担架放在公路上，而后撤走，在我方医护人员乘卡车到那里接运伤员时，他们没有向我们射击。

我们后来体会到，中国人是坚强而凶狠的斗士，他们常常不顾伤亡地发起攻击。但是，我们发现，较之朝鲜人他们是更加文明的敌人。有很多次，他们同俘虏分享仅有的一点食物，对俘虏采取友善的态度。这样做，很可能是想让俘虏深深感到，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要比资本主义制度下好得多。^①

^① 引自《李奇微回忆录》，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

4. 彭老总害怕什么

接连顶住“联合国军”两次进攻之后，中朝联军于1950年12月31日主动发起第三次战役，向敌人展开大规模进攻，3天之内全线突破敌防御纵深达20公里，迫敌全线撤退。志愿军右翼突击集团及人民军第1军团当即向仁川、汉城、水原方向追击，左翼突击集团及人民军第2、第5军团向洪川、横城方向追击。

不料，战至1951年1月4日晚，前锋已达“三七线”，攻势凌厉，劲头正猛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却突然停住了脚步。

在彭德怀的力主之下，因连续大规模运动作战而筋疲力尽的志愿军部队，终于开始了全线休整。

炮声“隆隆”的朝鲜前线，再次沉寂下来。

攻克汉城，是现代历史上中国军队第一次武装占领他国的首都，这样的情景，直到今天也再没有重现过。

但是朝鲜半岛上的“联合国军”并没有遭到中国志愿军的致命打击，美国人是不会就此吞下失败的苦果的。中国军队虽然停止了南下的攻势，但是，战争还将继续。

中国军队突然间销声匿迹了，如同在清川江第一次伏击“联合国军”之后突然消失一样，没人能猜到中国志愿军最高司令官的脑子里正在打着什么样的主意。在中国人雷霆万钧般的沉重打击下，参谋们应麦克阿瑟的要求，已经制订好了撤出朝鲜半岛的详细计划。整个前线，弥漫着一种前途未卜的气氛。

刚上任几天便面临着不可逆转的大撤退，丢掉汉城的直接责任或许不应由李奇微来承担，从某种程度上讲，“联合国军”的大踏步撤退是明智的，也是成功的，中国人不是爱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嘛。

但是，在添油加醋、挑灯拨火的媒体面前，脸上热辣辣的李奇微仍然觉得度日如年。可是他一开始就不认为美军输定了，当麦克阿瑟跟华盛顿的高官们大打口水仗，很多人开始打小算盘的时候，李奇微把一切私心杂念抛诸脑后，开始全神贯注地履行一个军人的职责。

中朝联军一连串胜利的消息，由新华社即刻广播到全世界，中朝

两国人民走上街头，热烈欢呼。

1951年1月5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头条大字标题：《朝中军队发起新攻势，光复汉城向南急进》，同时刊载通讯《午夜的欢声——记北京大学同学庆祝汉城光复大游行》；毛泽东还亲自提笔，为《人民日报》撰写了《祝汉城光复》的社论。

1月6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大字标题：《中国各民主党派致电朝鲜人民：“祝贺光复汉城大胜利！”》，同时刊登大幅照片《北京市学生、工人、妇女庆祝汉城光复》。

1月7日，《人民日报》又以头条通栏标题刊登《全国各地人民欢庆汉城解放》的报道。

曾经饱受列强歧视的中国人民随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捐款捐物活动，豫剧大师常香玉一人就捐献了一架飞机，女学生表达爱意的慰问信像雪片一样飘向朝鲜战场的堑壕里，立志参加志愿军的青年人，更是挤破了报名点的大门。

为了让前线将士填饱肚子，男女老少齐动手，家家户户做炒面，周恩来总理，以及被关押在功德林里接受改造的国民党高级战犯们，也都拴着围腰抡着锅铲上阵做炒面。在瑞雪飞舞的广袤大地上，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处处飘散着炒面特有的香味。

在志愿军某团部当警卫员的晋德俊晚年回忆说：“当时城里参军的学生兵吃不下炒面，嫌呛喉咙，我们这些从农村去当兵的就不同了。炒面是甚？那是大米做的呀，像在俺老家的农村里，哪儿能吃上大米啊？我们一年至少有半年吃糠咽菜，在部队里的生活，有大米吧，有过去说的洋面，现在叫的白面吧。大米、白面那样的好东西，连俺老家的地主，也是不容易见着的。我们在部队能吃上，比在俺老家强得太多太多哪！当时俺就觉得挺幸福的。”

聂荣臻元帅的女儿聂力中将在怀念父亲的《山高水长》一书中写道：“为了解决志愿军的吃饭问题，国内组织动员东北、华北的城市制作炒面。到后来，武汉、南京、长沙等地的机关和市民也加入了制作炒面的行列。周恩来视察时还动手和大家一起炒制^①，很快集中了数千吨炒面运往前线。但是食用时间一长，部队普遍反映，炒面伴雪吃下去，容易引起腹胀腹泻，加之副食供应不上，很多人患夜盲

^① 黄济人《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一书中可看到，周恩来视察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时，与国民党战犯一起，为前线的志愿军战士炒制炒面。

症，仍然造成大量非战斗减员。第五次战役结束以后，战线逐步趋向稳定。由于国内组织工作的加强、广大后勤战线同志的努力，后勤的运输供应有了改善，吃饭问题随着有了好转。到后来志愿军能吃上饼干、鸡蛋粉、油炸花生米等，有时还有一些罐头……生活越来越好，战士们就很高兴了。”

在野战医院工作的长金说：“祖国慰问团来了，我们还能看到演出，像话剧《血泪仇》啥的。祖国慰问团不常见到，但是我们经常能收到祖国人民送来的慰问袋。慰问袋就是那种白帆布袋，上面印着‘献给最可爱的人’，里面装的慰问品不一样，有牙膏，有肥皂，也有梳子、手绢、铅笔信封啥的，还有慰问信，五花八门的。一发慰问袋我们可高兴了，像过节一样，一般是按人头发下来的，一人一份。打开自己那份，就互相打听别人那袋子里装的是啥。现在想起来，我还是很难忘却当年收到慰问袋时的情景，因为那是我们不认识的祖国亲人送来的礼物，因为全国人民都把我当成最可爱的人，你知道吗？我成了‘最可爱的人’，那可是用什么宝贝都换不来的荣誉！”

这些炒面和慰问袋在前线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后勤补给的范畴。在狂风暴雪、枪林弹雨中一往无前的中国志愿军士兵，或许武器简陋，衣衫褴褛，但他们能够深刻地感受到身后是全国人民无比热忱的期待，这种朴素的认识，让他们保持着昂扬的斗志和乐观主义的精神，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凭着这股精气神，就足以打败装备和国力占绝对优势的帝国主义纸老虎了。

让人匪夷所思的是，由于宣传的作用，诸如“我们无比强大”、“我们已经取得了压倒性的全面胜利”的情绪，居然是从远隔战场数千里之外的国内蔓延到了朝鲜的战壕里。极度艰苦的生活，让打过“三八线”的官兵们也产生了“快打快胜快回国”的情绪。阵地上到处响起了“从北到南，一推就完”、“要像挤牙膏一样，一鼓作气把美国兵挤下大海”的口号。

却不料就在此时，彭德怀下达了一条引起各方激烈争论和迷惑不解的命令——“全军立即停止追击！”

全世界——包括北京都大吃一惊！

眼看着大获全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突然脱离了与敌人的接触，而且似乎看不出有什么必须如此的明显原因。



连好不容易稳住阵脚的“联合国军”都在纳闷，中国人为什么不乘胜大举南下？

志愿军停止追击的原因不是这仗打得不顺利，而是因为这仗打得太顺。结果，部队打得太快，追得太远，后勤保障越拉越远，物资根本就跟不上去。

彭德怀此时面临的压力不单单来自苏联和朝鲜两个方面，连国内也产生了轻敌速胜思想，中南海里有的同志对彭德怀停止追击的命令想不通，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质疑和责难。

一问：“战役开始前你们就摆了各种各样的困难，怎么志愿军一过江，又打大胜仗了？”

二问：“你们为什么要停止追击？现在敌人这样望风而逃，这样溃不成军，汉城也轻轻松松就收复了，你们为什么不乘胜追击？为什么要突然结束第三次战役？”

三责怪：“第三次战役不应该停下来，应该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把美国鬼子从朝鲜半岛赶下海嘛。”

彭德怀坚决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切实际的，在军事上是根本不可行的。

他频频回电国内说：我恨不得再加把劲儿，一下子把敌人赶下海去，不是更好吗？但是，不行啊！要把那么多装备精良的敌人一下赶下海，能赶得下去吗？不可能嘛，敌人也不会让我们赶下海去呀！要是做得到，我们在朝鲜的同志，还愿意早日完成消灭敌人的任务凯旋吗？

洪学智也坚定地站在彭德怀一边，往国内发电说：“前三次战役共损失1200多辆汽车，平均每天损失30辆。另外，后勤力量不足，机构不健全，也是不能保证战时供应的重要原因。美军13个后勤人员供应1个兵，志愿军则是1个后勤人员大体要供应6至10个兵。没有充分的物资，没有足够的道路和交通工具，没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就谈不上后勤保障。”他还强调：“在大兵团作战的情况下，不能光靠后勤供应，还要依靠就地筹粮，取之于敌。”他初步计算：“下次战役需要3400辆汽车运输，现在只有1000多辆，怎么办？一是抢修铁路，加速火车运输；二是优先运输主要物资和必不可少的物资；三是除增加几个汽车团，加强汽车运输外，还要组织人力、畜力、大车参加运输。”

就在前方捷报频传，国内大肆庆祝的同时，彭德怀冷静地注意到了志愿军正在发生的诸多困难：众多的部队拥挤在“三八线”以南狭小地区，粮食供给成了大问题；气候奇寒，我军冻伤人员剧增，汪洋的116师冻伤数千人，其中586团已因冻伤失去战斗力。这等于敌军不费一枪一弹，而我军折损近一个主力师！

5日，韩先楚报告：此次战役，部队损失尽为骨干，现已有不少营团丧失了攻击能力，甚至有的师只有半数人员在前面作战。且部队极端疲劳，“三八线”以南沿途群众跑光，房屋被敌人烧光，成为300里无人区，部队无法吃饭睡觉，也征集不到粮食，很难支持，沿途三五成群掉队的战士很多。加之后勤供应不上，部队无鞋穿，弹药接济不上。炮兵因道路破坏，不能随步兵前进支援作战。“三八线”以南敌人埋设地雷很多，时常发生触雷事件，仅40军触雷死者即达百余人。相反，打到“三七线”以后，运输线加长，各部官兵多数靠挖野菜和随身携带的炒面度日，不少部队连炒面也已吃光，饿死人的现象相当普遍，各支部队均汇报，目前队伍士气不振。

虽然志愿军经连续7个昼夜毫不停顿的进攻，把战线往前推进了100多公里。但是，据各部队报告，敌人抵抗并不坚决，汉城亦系主动放弃，敌军伤亡并不重，并没有歼灭美第8集团军的主力。严寒的气候和后勤补给方面的困难，比敌人的抵抗对我军造成的阻力更大。

尤其是因运输不畅被堵塞在三登火车站的大量战略物资，美军轰炸机群一次空袭，被几乎炸光烧光，更是给了志愿军当头重重一击！

彭德怀敏感地意识到，敌人极有可能且战且退，故意诱使我军过远南进，从而疲惫甚至拖垮我军，之后再从我方侧后登陆，重演仁川一幕。

彭德怀心里有些担忧，经过连续3个胜仗，部队官兵普遍产生了轻敌与松懈的情绪。多年的经验告诉彭德怀：胜利的同时，也往往潜在着失败的因素。

这天开早饭的时候，政治部的同志把国内送上的几张报纸拿来，告诉彭德怀、邓华等，国内抗美援朝气氛高涨，轰轰烈烈，热气腾腾。

邓华接过一张报纸看了一阵，递给了彭德怀。

“彭老总你看看，国内温度的确够高的。”

彭德怀放下碗筷，接过报纸，是1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面刊



登了一篇社论，题为《祝汉城光复》，社论写道：“汉城的光复，又一次证明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强大。美国绝对优势的空军、海军，坦克和大炮，在伟大的中朝人民军队面前，无论在进攻和防御中，都已证明无能为力。中朝人民军今天已经向全世界表明了自己是强大的和平力量。他们完全有力量消灭与赶走美国在朝鲜的侵略军，恢复朝鲜的和平。”社论最后豪情万丈地高呼：“前进！向大田前进！向大丘前进！向釜山前进！把不肯撤出朝鲜的美国侵略军赶下海去！”

彭德怀叮嘱解方参谋长：“以后发战报，注意留有余地，不要使我们自己背上包袱。”

这张报纸上还登有一则消息报道，是《首都人民为汉城光复游行》。

彭德怀摇摇头，把报纸甩到一边，冷冷地说：“大游行，庆祝汉城解放，还满城高喊口号，要志愿军把美国侵略者赶下大海去？解放个汉城就这样搞，要是我们丢了汉城，怎么向人民交代？”

“汉城万万不能丢，真要丢了汉城，我们的压力就更大了！”邓华说。

“哎，”洪学智忧心忡忡地叹道，“国内只知道我们打了胜仗，不知道我们取胜的代价和我们的困难。”

解方说：“话是那么讲，劲必须要鼓的嘛。不过主席的意思还是要压迫美国尽快撤出朝鲜，争取速胜。据我看，速胜的可能性有，但不大，希望就在于春季攻势的决战，所以必须准备得更充分才行。”

彭德怀说：“主席多次告诫我们，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要做艰苦奋斗的准备，怎么能够允许报纸在他眼皮底下，一窝蜂地这样宣传啊！”

几年后，在朝鲜战场上卸任后的彭德怀在一次作战会议上回忆了第三次战役的情况，他说：“我打了几十年仗（从1916年入湘军当兵已有35年征战生涯），从来没有害怕过。但打过‘三八线’以后，我环顾前后左右，深深为几十万大军的状况和境遇感到担忧和不安。第一线6个军（即38、39、40、42、50、66军）入朝后一直没得到休整补充，官兵普遍有三怕：一怕无粮饿饭，二怕无弹不能打仗，三怕负伤抬不下火线，不能医救。‘三八线’南北300里是无粮区，在敌飞机破坏下，第二、三次战役时粮食只能供应所需的25%到30%，

炒面伴雪，没有新鲜蔬菜，官兵大量患夜盲症，影响执行作战任务。战士们编了顺口溜说：‘中国撒拉密（朝语“人”），来到朝鲜地，吃的是喷气式（吃炒面时常喷出面粉），躲的是比恩机（朝语“飞机”）。’又说：‘不想家也不想老婆，只想吃个白面馍。’南方战士则说：‘影戏歌舞不想看，只想吃顿白米饭。’我不能把几十万军队的生命当儿戏，必须坚决地停下来，不能再前进，并且立即做好抗击敌人反攻的各种准备。”^①

彭德怀的直觉完全正确，美军并不是侥幸从北朝鲜逃出生天的，第三次战役是雷声大雨点小，看上去志愿军气势如虹，浩浩荡荡，追得敌人狼狈后撤，吓得敌人魂飞魄散，实际上战果甚微。而且受到打击的主要是南韩军，并没能挫伤美军的元气。

从某种意义上讲，李奇微主动把汉城让给彭德怀，并在墙上留字向他“致敬”，让彭德怀敏锐地意识到他的对手并不完全是无奈之下的被迫之举。对方的损失跟前两次战役相比，根本就不足挂齿。

那么，李奇微到底为什么要顶住那么大的压力主动撤出汉城，而没有选择和志愿军死拼到底呢？

后来才知道，那时候的李奇微，连和志愿军拼命的本钱都没有。从战术上讲，他正在执行的是一次极其危险的军事任务，如果大量的部队和装备在乱石拥堵的汉江上挤作一团时遭到志愿军截击，被迫背靠汉江和志愿军决一死战的话，“联合国军”的损失之巨大，难以想象，后果毫无疑问是灾难性的。

杜鲁门总统曾经明确地告诉麦克阿瑟，“一兵一卒也不会再派到朝鲜了”，在朝鲜的美国兵打光了，也就打光了，所以，李奇微没敢在汉江押上自己的全部家当，和彭德怀拼个你死我活。

他很明白，这一把一旦赌输，他就将彻底失去翻盘的机会！作为多年的美国陆军副参谋长，李奇微清楚地知道，号称天下无敌的美国，也是存在着战略性短板的。

1948年，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乔治·凯南提出：“世界上只有5个重工业地区可以大量生产现代化军事力量，即英国、美国、苏联、莱茵河流域和日本。遏制战略的主要任务应限定在保证除苏联外的其他4个重工业地区，不落入共产主义之手。”

^① 引自“彭德怀传编写组”著《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



凯南的思想在华盛顿赢得了广泛认同，只要美国能够牢牢控制住除苏联外的其他4个区域，即使苏联控制了中国大陆，也不会对美国的安全利益产生灾难性的影响。这也就是美国在蒋介石政权崩溃时，采取脱身政策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果此时依然保持着数万辆坦克和数百万作战兵力的苏联人向日本或者欧洲突然发起一场进攻，美国及其盟友基本上无力阻挡。

白宫和五角大楼最终作出的决定是：除了补充兵，短期之内，美国决不会向朝鲜战场投送新的部队。

所以说，目前的兵力，就是李奇微的全部家当。汉城他丢得起，部队他无论如何丢不起。

上任之后的李奇微闭口不谈失败和撤退，胸前挂着手雷与急救包，当着部下、媒体和韩国政府官员的面，大秀行为艺术，渴望以此在官兵中树立起自己光辉决绝的英勇形象。

尽管他要求部队寸土必争，背地里却早就做好了后退，甚至请求华盛顿主动讲和的准备。

无独有偶，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也在回忆录中写道：“志愿军发起第三次战役时的主要目标，是跨过‘三八线’，完成有限度的进攻，能歼灭多少就歼灭多少，歼灭得少，也无所谓。”

显然，从洪学智话里的意思看来，第三次战役的主要目标，和气吞山河如虎的毛泽东提出的要求，是有不小距离的。

就这样，攻方都知道自己底气不足，是力求有限度的进攻，有限度的歼敌，有多大战果算多大战果。守方是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退，都是三心二意，根本没有与对方死磕到底的打算。

这样的仗，显然碰撞不出多少火花。

双方统帅心里其实都十分清楚，真正的决战，还尚未到来。

5. 彭德怀与金日成的争执

此时彭德怀面临的压力不仅来自中南海，同时也来自近在身边的苏联人和金日成。

1951年1月11日，刚从南边的君子里回迁到桧仓矿洞里的彭德怀，和从平壤赶来的金日成举行正式会谈。

金日成想不通志愿军为什么不乘胜追击。双方就是不是只要向“三八线”以南进攻，美军就会撤出朝鲜的观点，进行了讨论。讨论时分歧极大，甚至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彭德怀问：“如果我军去追，美军就一定会退吗？”

“我们认为结果一定会是这样。”朝鲜副首相朴宪永回答。

彭德怀又问：“请问你们的依据是什么？”

朴宪永说：“第一是美国人民反对这场战争；第二是美国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

金日成居高临下，以命令的口吻插话：“司令员同志，最好半个月，志愿军至少应有3个军向南进攻，其余休整一个月后再南进。”

“我可以下命令追击，可是如果美军不退出朝鲜怎么办？你们考虑过吗？”彭德怀上火了，却仍然控制着怒气耐心地说道，“你们把胜利的希望寄托于侥幸，就完全有可能把战争引向失败。如果你们认为我这个中朝联军司令不称职，可以撤掉我。如果你们认为我们一南进，美军就会撤退，那么我提议，由志愿军承担东西海岸全部警备和维护后方交通线的任务，人民军5个军团12万人，已经休整了两个月了，交还给你们自己指挥，照你们的意愿向南进攻。”

这样的会议，双方自然是不欢而散。

在彭德怀的强硬坚持下，志愿军开始了全面休整，部分军、师、团级干部被调回国内，参加在沈阳举行的诸兵种联合作战集训班，恭恭敬敬给斯大林派来的苏联教官当学生。

与家人的重逢，让这些军官们有了久违的好心情。

部队开始轮战，伤了元气的部队被拉回国内，一支支精锐之师不断地跨出国门。

于开志的部队也得到了休整的机会，他回忆说：“那个虱子之多啊，身上简直成了个蚂蚁窝，分不出个了，衣服缝里全塞满了虱子。我们一个姓蒋的叫蒋少海，湖南人，比我小两三岁哩，他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个玻璃瓶，捏起虱子往瓶里装。我发现了，说小蒋你弄这玩意儿干啥呢？他回我，这东西吃我的血，算是我抓的俘虏，留着做个纪念。到了第三天，我看就装了半瓶还多哩。我们呢？就用竹片刮刮，掉地上喂蚂蚁。我们当兵的还听说，我们军长回沈阳开会，回家



住了一夜，老婆烧了一大锅开水，把他衣服裤子脱下来烫烫，结果盆底黑了一层。在朝鲜打仗，哎呀呀，军长、师长也和士兵一样，全都得喂虱子。”

从1月15日开始，美军在朝鲜前线的侦察和试探性进攻，变得非常频繁，双方还爆发了几次小规模遭遇战。但是，只要一接触到志愿军的主要防御线，美军部队便主动开始退却，双方都没能占到任何便宜。

彭德怀召开专门会议，研究这种情况后认为，敌人没有进攻我汉江南岸桥头堡阵地的企图，志愿军部队继续按照准备春季攻势的态势部署，部分主力秘密向北移动，以利休整。

1951年1月23日，在对志愿军防线进行了8天持续不断的袭扰后，美军侦察部队消失在茫茫雪原里。

枪炮突然停止，山川大地，万籁俱寂。

第二天，朝中两国的100多名高级官员，在设在桧仓矿洞里的志愿军总部欢聚一堂，愉快地观看一出叫《阿妈妮》的歌剧。

演出结束后，彭德怀作了《三个战役的总结与今后的任务》的报告，对是否“乘胜追击”的敏感问题避而不谈。

第二天的会议，讨论的是后勤问题。

会刚开到一半，前线传来了敌人大举进攻的消息。

于开志谈起那段经历，迄今记忆犹新。“我们部队刚宣布开始休整哩，结果敌人突然向我们发起了进攻。如果我们能休整半个月至20天，把损失的兵员补充上，粮食弹药运上来，我们的战斗力就恢复了，往南打就有劲了，可美国人没有给我们这个机会。”

更加准确的消息很快传来，“联合国军”这次不是袭扰，而是向“三八线”以北发起了大规模的全面进攻。

彭德怀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终于发生了。

就像着了关羽的“拖刀计”一般，志愿军刚占了短短几天上风，“联合国军”便突然转过身来，向北发起全线进攻。

战争就是如此，好比两个棋手下棋，你走一步，他也要走一步；并不能让对方少走一步而你可以连走两步。彭德怀像棋手一样，时刻关注着对方的变化，力争不失去主动，或变被动为主动，这是彭德怀作战思想活的灵魂。

张清劭说：“最艰苦的就是1951年春天那段时间，第三次战役开打以后，我们三四个月没有洗过一次脸，洗澡那就更是做梦了。裤裆里面的虱子乱爬，我回国以后，光是消灭虱子啊，就消灭了两个月。”

于开志也说：“那两三个月不洗脸，不洗澡，你想想是什么情形？夜里行军，汗水湿透了军装，就这么靠身子的温度烘干。下雨了，全身上下里外淋透，就算洗了澡，接着又烘干。当时呢？饿了就是吃炒面，埋着脸吃不行，得仰着脸，张开嘴巴吃，边吃嘴里边‘呼呼呼’往外冒烟。吞下去也困难啊，又没有水，只好地上抓两把雪，就着吃。”

黄树青说：“衣服从来不换，也没有机会洗澡，几个人睡一个大炕，一个班才一条毯子。用扫帚一扫，炕上、毯子上、衣服上、人身上全是虱子。晚上我们就围着柴火堆烤虱子，只听到‘噼啪噼啪’响，就像放鞭炮一样。5、6月份天热起来的时候，虱子全部从棉衣里面钻了出来，爬到外面，密密麻麻，像蚂蚁乱爬。就在这时候，疥疮等传染病又开始在队伍中蔓延开了。我那个班，有15个战士得了疥疮，从头到脚，浑身都是。一遇到温泉，战士们知道水中含有的硫磺可以治病，都像见到救命稻草一般，争先恐后往水里跳。”

那时候志愿军汽车少，往前线运粮食弹药有很多马车，马车上就有给马准备的精饲料、黄豆、玉米什么的，马不吃料它就不拉，它罢工啊。给它拌料的时候，还得往里面掺点精饲料才成。那马呢，它嚼不碎，拉那个马粪蛋子里面就有没消化的黄豆和玉米粒儿。有的战士就白天到公路边，拿那小棍儿把马粪蛋弄碎，把黄豆、玉米挑出来吃了，有的还中毒了，就饿到那样儿了。

伤员更可怜，有炸断腿的，炸没了手的，伤口得洗，得消毒啊，连吃的盐巴也没有，军医只好用那个行军锅，烧一大锅开水，搞点盐巴抓两把扔里头，弄个树棍“哗啦哗啦”搅几下，再用从棉衣上扯下来的棉花蘸蘸，消毒就用这个。洗完了再往伤口上撒点药面，一包，手术就完了。

1951年1月8日，当志愿军的前锋越过汉江，将“联合国军”驱逐至北纬37度线附近之平泽、安城、堤川、三陟一线时，彭德怀在反复查看敌我态势后说：“乘胜追击容易，但我们要十分慎重，敌人放弃汉城，继续后撤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随即下达了全军立即停止追



击的命令，留一部分部队就地占领有利地形，构筑工事，以防敌人的进攻。

志愿军转入休整后，1月14日，毛泽东指示彭德怀，“在目前开始的两个月至三个月内，补充新兵到军队里去，使新兵尽快向老兵学会作战方法，加强军队的装备，储备粮弹，修理铁路，改善运输系统和后方勤务工作”。

根据由彭德怀主导的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制订的休整计划，着手准备3月份发动春季攻势的各项工作。

总顾问拉祖瓦耶夫一听彭德怀不打了，气势汹汹地冲着志愿军统帅厉声呵斥：“在苏军战斗条令中，没有在进攻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主动停止进攻的。只能不断进攻，扩大战果，不能给敌人以任何一点喘息机会。彭德怀同志你右倾，我一定要告你，让斯大林同志和毛泽东同志来教训你！”他逼着彭德怀下命令，要志愿军马不停蹄地继续进攻，一直打到釜山，将美军赶出朝鲜半岛。

拉祖瓦耶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红军向日本关东军进军时，是进入朝鲜的苏联第25集团军司令员。苏军撤离朝鲜时，他留下改任朝鲜人民军总顾问。他完全不顾中国志愿军的实际条件，按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以苏军向德国法西斯军队由战略反攻到战略进攻的情况为依据，来认识朝鲜战场敌我双方的战况，认为中国志愿军就应该像1945年的苏联红军那样，用最快速度向败逃的美军和南朝鲜军队，发起连续不断的进攻。

苏联军事顾问们与中国志愿军的指挥员们想的不一样，往往容易被暂时的胜利冲昏头脑。他们在志愿军入朝前是这样，在志愿军入朝后仍然本性难移，常常在各级志愿军和人民军指挥员面前指手画脚，表现得自高自大，很不得体。尤其是拉祖瓦耶夫总喜欢以军事家和太上皇自居，在中国人和朝鲜人面前居高临下，盛气凌人。

而彭德怀是个富有实战经验的军事家、战略家。他清楚地知道以志愿军的武器装备以及后勤保障，暂时尚不具备大规模歼灭美军的基本条件。而且美军有两个师已经从本土出发，正乘轮船向日本驰来。不顾部队的实际情况，只图把仗打得漂亮，打得好，意气用事，贸然向南追击作战，是极其危险的。

彭德怀压住火气说：“我军已很疲劳，又没有制空权，后方供应上不去。敌人是摩托化，我军是两条腿，这怎么能够追上敌人呢？”

而且如果再将敌人压缩到朝鲜半岛东南部，敌人集中了，又有洛东江阻隔，更不利于我军歼灭敌人。”

拉祖瓦耶夫说：“消灭不了敌人，多占领一些地方，也是好的。”

彭德怀说：“消灭不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占领了地方也保不住。”

拉祖瓦耶夫说：“敌人为了避免被消灭，肯定会撤出朝鲜的。”

彭德怀说：“不会。我完全不同意你的意见。我要对志愿军战士的生命负责，如果错了，我负完全责任。”

第三天，怒气冲冲的金日成带着苏联驻朝鲜大使什特科夫和副首相姜健心急火燎地赶到桧仓志愿军总部，进门就毫不客气地劈头大嚷：“彭德怀同志，哪有你这么指挥的！自己的军队打了大胜仗，攻下了汉城，为什么不让他们乘胜挺进，继续进攻？现在我们只要再跺跺脚，吹他一口气，美国人就掉太平洋里去了。在这决定两军胜负，祖国统一的关键时刻，你竟然下令不打，我真不明白你究竟怎么想的。”

当时在场的柴成文后来回忆说：“身经百战，年过半百的彭老总，被一个毛里毛躁的年轻人劈头盖脸吵了一顿，我看他那张脸啊，气得通红。彭老总把桌子一拍，瞪着大眼冲金日成怒吼：‘我是中朝联军总司令，命令是我下的，有种你就把我毙了！’”

金日成不了解，这仗彭德怀其实早就不想打了。

上一年的11月27号，那时志愿军还没过“三八线”呢，彭德怀就给毛泽东发了电报，说从10月25日一刻不停地打到现在，一口气打了32天，连着打了2次战役，志愿军实在是筋疲力尽了。美军完全占据着制空权和制海权，那么多的伤员在各处战地医院里摆得密密麻麻，铺天盖地，运不下去，各部队急需的新兵又运不上来。很多部队实际上已经减员严重。冻死的，冻掉手脚的，比战场上牺牲的不知多了多少，有的部队甚至已经成了个空架子。

虽然在美军军史里对志愿军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神奇魅力惊叹不已，匪夷所思，甚至列出专章来探究这个令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但是，我们同样也应当看到，思想教育固然重要，但也并非万能，而且绝对不可能替代必需的军事装备和物资，也同样不能让才穿上志愿军军装几个月的“起义战士”和“解放兵”马上就全部脱胎换骨，焕然一新。

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将军说：“在志愿军被俘人员中确实有一批不



愿回国的人，真正不愿遣返的所谓‘反共战俘’，据后来归国人员反映及其他方面得到的情况分析，大约有3000人左右，绝大部分为原国民党军党团骨干分子、潜伏的特务、宪兵、兵痞和军校毕业生，其中有300余名原国民党军官又构成其核心。此外还有少数出身地主、家庭受过共产党斗争而又隐瞒成分参军的人。由于大部分志愿军部队入朝比较仓促，对于解放战争后期吸收的大量新成员未来得及很好清理，在第四次战役节节后退时部队控制有时不严，第五次战役后期部队后撤中又一度出现混乱，这些坏分子就乘机向敌人投降就俘。”

志愿军战俘中坚决要求回国、被美方称为“亲共战俘”的有6000多人，其中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由于战俘营的领导权一开始就被美军支持的原国民党军人员和台湾特务控制，谁要求回大陆就有遭到杀害的危险，没有比较坚定的政治立场和相当勇气的人，一般不敢做出这一选择。

国内对于归俘人员的处理过去确实存在偏差，这一偏差的出现也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要求每个成员战斗到最后一口气也不能当俘虏。如果投降就俘，在政治上也是一种严重的失节。志愿军的战场纪律第7条就规定：“誓死不当俘虏。”

从中国革命军队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出发，提倡这种宁死不当俘虏的精神，是必须的，也是合理的。

赫鲁晓夫在回忆录里写到了他与毛泽东在中南海里进行的一场关于战争、人与国家力量的争论。

有一次也是在游泳池旁，毛又挑头谈起这个话题：“赫鲁晓夫同志，我们来算算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对比吧。我搞了个计算……”他算出的结果是：中国拥有将近7亿人口，所以它可以组建多少多少个陆军师。苏联拥有2亿人口，它能够组建多少个师。

是的，军队有兵员定额，他的计算大致是正确的。他用常规的方法估算了一下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能够让多少人去当兵。然后又开始计算美、英、法等北大西洋公约国家能够组建多少个师。

他说：“瞧，力量对比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还怕什么呢？”

这番议论很符合他1957年在兄弟党国际会议上发表的那个观点，当时毛声称，损失3亿人，即人口的二分之一，对于中国来说算不上什么悲剧。如今他又把这个问题抖落出来，用计算数据来充实

他那个关于我们不必害怕战争的论点。他并没有直截了当地说根本不必为和平而进行斗争。但如果仔细琢磨一下，他的论据归纳起来恰恰是这个意思。毛不是把和平共处问题放在首要位置，而是把准备战争的问题放在首要位置。准备战争的目的就是要在这场战争中打败我们的敌人，无论战争会给社会主义国家造成多么大的损失。

我对他说：“毛泽东同志，您计算出的数据，人们都知道。但是还必须考虑到，只有当我们生活在另一个时代，当人们用肉搏方式，或者用诸如标枪和刺刀等冷兵器作战时，算术学统计结果才是合理的。从前就是这样，谁的棍棒多，谁就占上风。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不同了。机枪刚刚问世，立刻将各方力量拉平了一些：力量对比后来发生了有利于拥有更多机枪的军队的变化。后来又出现坦克和飞机，力量对比则全然改观，战胜者不再是拥有更多人口的一方，而是拥有良好军事工业和能够充分供给自己新式武器的一方。现在我们拥有导弹和核武器。世界大战将是导弹核战争，而导弹核战争将使机会均等。一枚导弹可歼灭几个师。可见师的数量多寡，现在不再是实力的标志，说句粗话，那不过是一堆炮灰。因此我们对战争问题抱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不以人口数量衡量力量对比。我们现在正加速发展我们的工业，特别是核工业和火箭工业，以防苏联遭遇不测。我们必须拥有足够数量的、敌人肯定会用来装备自己的各种新式武器。我们的敌人具有高度的组织性，拥有非常强大的工业，具有很高的技术水平。”

毛说：“不，我还是认为您错了。在力量对比上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人口的数量。”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用任何手段都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他发表了他的观点，我发表了我的观点。我们都没有再反复谈下去，因为那样做不会有什么结果。^①

再者，后勤运输线几乎全部被美军飞机炸断，粮食弹药无法补充，部队冻饿交加，减员严重，部队被迫“就地筹粮”，虽然打了白条，但违犯军纪的现象仍然时有发生。军法队频频出动，也无法彻底制止，以至于在那段时间里严重地影响了志愿军的形象和声誉。

^① 引自《赫鲁晓夫回忆录》（三卷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关于志愿军打白条“就地筹粮”这件事，像块沉甸甸的石头，长久压在彭德怀心上。

赵南起晚年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彭老总有一次叫住我，专门向我了解朝鲜族的风俗民情，以及朝鲜老百姓对志愿军的看法。我说志愿军入朝以来，在地方政府和群众中借的粮食，打的白条，累计起来大约朝方统计3000万斤，到现在为止一颗也没还。因为朝鲜打了两年仗，农业大幅度减产，春荒时节老百姓可能要饿肚子。我当时已经从志愿军总部调到后勤司令部工作，跟彭老总谈完话后，我就返回了后勤司令部，没过几天，彭老总命令志愿军后勤部，限期把向朝鲜老百姓借粮食时打的所有白条清理干净，必须在今年5月以前，一粒不少地偿还完毕。为啥呢？一到5月，老百姓就大面积青黄不接。我反映的问题，老人家记住了。我那个时候是管计划，管运输的，正好该我管这个事。我按照彭老总指示办理，一共是3000万斤，我们借的大部分是玉米、洋芋、黄豆、高粱米等粗粮，还的全是东北大米。3000万斤，装了500个车皮，5月份以前，一粒不欠，全部还完了。”^①

所以说不是彭德怀不想打，几十万部队都已经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让他怎么打？

但是，毛泽东从国际政治着眼，坚持要彭德怀打过“三八线”再停下来休整。现在“三八线”已过，汉城也拿下来了，彭德怀也是想借着联合国要求停火这个机会，让官兵们喘上一口气，得到一点补充，趁美军飞机暂时没有出动这个难得的空儿，赶紧把伤员送下去，让新兵赶上来。

彭德怀压下怒气，苦口婆心地向上门来兴师问罪的3人解释：“志愿军入朝作战已经两个多月，我军伤亡已达五六万人，冻死冻伤的也有五六万人，我们负出了这么大的代价，不就是为了取得胜利吗？我们没有制空权，补给无法解决，全军很多官兵过江后一次补给也没有过，身上的那几斤炒面早就吃光了。冰天雪地，很多人连棉衣也没有，几十万大军向前推进追击途中，有一半人的鞋子烂了，只能光着脚行军，烧饭的锅也丢了，被炸坏了，战士们在如此严寒的冬天赤着脚，饿着肚子，我这个司令官，怎么忍心命令他们再追击？”

^① 引自2013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12集文献纪录片《不能忘却的伟大胜利》。

金日成不听，仍然要彭德怀不惜一切代价，命令志愿军继续进攻。

“再说，敌人这次也不是真败。”彭德怀见金日成不依不饶，只好继续陈述自己的理由，“根据侦察，美军主动后撤到洛东江一带，是想充分利用洛东江的天然屏障，在两岸加筑工事，诱我前进，以图歼灭。”

金日成说：“我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你们在朝鲜的土地上作战，下停战令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提前向我报告？”

邓华回答说：“停止追击是按照第三次战役计划实施的，代表朝鲜方面的朴一禹同志参加了战役计划的制订，计划也早就送到了你的手上。所以，按照战役计划实施的过程中，没有必要再向你报告。”

金日成被邓华顶得后退了一步，说：“我对志愿军休整并不反对，只是要求你们缩短休整时间。你们中国这么大，兵源充足，完全可以一边休整，一边追击嘛。比如，可以先出动3个军继续向南追击，其余几个军休整一个月，再南进不行吗？”

“不行，”彭德怀一口拒绝，“敌人很有可能是诱我南进，想把我军逐个围歼，假如继续追击，我军会吃大亏的。”

金日成又说：“南下假如不能歼灭敌人，那就解放南方的城镇乡村，扩大领土，我派干部过去建政管理，征粮纳税，也是好事啊！”

彭德怀情绪很大地说：“你们过去说美国一定不会出兵，从不设想如果美国出兵怎么办。现在又一厢情愿地说美军一定会退出朝鲜，不考虑如果美军不退出怎么办。你们指望速胜而又不做具体准备，结果只会延长战争。你们把战争胜利寄托于侥幸，把人民的事业拿来赌博，只会把战争再次引向失败。”彭德怀越说越生气，怒道：“志愿军休整补充需要两个月，一天也不能少，甚至可能还要休整3个月，没有相当的准备，一个师也不能南进。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轻敌的错误意见。你们认为我彭德怀不称职，可以撤职审判，可以杀头！”

由此可见，双方分歧之严重。

志司作战处副处长杨迪晚年在回忆录《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里说：“友方领导同志由此而对彭老总积怨。”

从入朝的第一天起，彭德怀在诸多重大问题上，几乎都和金日成难以达成一致，有的甚至还存在严重分歧。



首先引发二人矛盾的，是中朝军队由谁统一指挥的问题。金日成提出由他统一指挥中朝联军的要求被彭德怀毫不犹豫地拒绝后，也意识到这一想法很不现实，转而努力希望保持人民军指挥的独立性。

但彭德怀另有考虑。彭德怀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提道：“朝鲜党征兵问题异常严重，16至45岁男子全部征调入伍。入伍工人家属无人过问，一般群众没饭吃。一切无长期打算，孤注一掷的冒险主义从任何方面都可以看到”；“军事指挥异常幼稚，19日下令死守平壤，结果3万人未退出多少”……可见其对朝鲜方面的军事指挥能力缺乏信心。第一次战役期间，双方因协调乏力，朝鲜党政军民撤退堵塞道路导致“志愿军行军作战受阻、人民军误击志愿军等事件多次发生”，则促使彭德怀开始考虑军队指挥权归属的统一。

但金日成在这个问题上相当敏感，拒绝配合，坚持双方只派参谋担任通信联络，不同意让人民军总部靠近志愿军总部。彭德怀希望留下人民军中战斗力最强的方虎山的第6师协同志愿军作战，金日成则坚持将其调走；彭德怀提出第二次战役后撤几十里设伏，金日成则联合苏联总顾问表示反对。此事最后闹到莫斯科，由斯大林亲自拍板表示“完全赞同由中国同志来统一指挥”，才算告一段落。

此外，在铁路运输的统一调度方面，中、朝也出现了相当激烈的矛盾。现实是：朝方铁路和机车损毁殆尽，运行车辆、抢修线路的工人和器材、运送物资的部队、司乘人员均依赖中方提供，由朝方管理调度实不可能。但金日成认为铁路管理涉及国家主权，无论如何不能完全由中国掌控。双方纠结争论良久，最终仍由斯大林出面强压金日成，遵照北京的意见处理，才得以解决。凡此种种在金日成看来，则是中国以大欺小，对朝鲜采取“大国沙文主义”的手段。

双方在朝鲜战场上芥蒂颇深，甚至延及到了战场之外。

杨迪在回忆录中披露，“1952年4月15日，是金日成40岁生日，朝鲜方面要举行祝寿庆典，3次请彭德怀同志去参加祝寿活动，每次都是派党政军最高级领导来邀请，彭老总就是坚决不去。记得当时彭老总说话的大意是：现在前方的指战员正在浴血奋战中，朝鲜国土被敌人轰炸成一片废墟，人民正处在最艰难困苦，无以为生中，怎么40岁生日就搞祝寿庆典呢？友方领导同志由此而对彭老总又一次积怨。”

不论彭德怀拒绝出席金日成的生日庆典的理由是否如其所言，其

结果只可能是加深彼此间的不满。

就在彭德怀不胜其扰的时候，一天夜里，毛泽东给他发来一封电报。彭德怀一看，是斯大林1月9日给毛泽东的复电，顿时喜上眉梢，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第四天，金日成又带着朴宪永来了。

什特科夫这次没来，他当天回到平壤大使馆，连夜就向斯大林报告了中朝高层在战略指导思想上的重大分歧。

彭德怀把电报往他手里一递，说：“咱们别再吵了。金日成同志，你不是说再跺跺脚，吹他一口气，美国人就掉太平洋里去了吗？这口气请你马上去吹，我给你守着后方，保证不让美国人在你后面再来个仁川登陆。”

金日成看过电报，脸色“唰”地变了，把电报往桌上一放，一句话也没说，便起身离去。

原来，斯大林给毛泽东的电报上写的是：“如果朝方同志认为不必休整补充即可前进，则亦同意人民军前进击敌。并可由金日成同志自己直接指挥。志愿军则担任仁川、汉城及‘三八线’以北之守备。”

不过，性格倔强的金日成并未就此死心，回去和政治局的同志商量了一夜，第二天又带着朴宪永从平壤赶到了桧仓。

得，彭德怀再忙，也得放下手中的活儿，来听金日成唠叨。

金日成说：“现在我们还没有打痛美军，唯一的办法就是请你立即出动3个军，消灭了美军主力，把他痛打一顿，他们就会撤出朝鲜。”

彭德怀说：“我们不能单方面凭想当然行事，美军也肯定不会按照我和你的意愿做的。希望打胜仗而又不做具体预备，结果只会导致失败。打仗有赌博的成分，但毕竟不能等同于赌博，不能存有半点侥幸心理。过江以来接连打了3仗，志愿军都是血肉之躯，不补充不休整，就算他们个个是神兵天将，也不可能再打胜仗。”

金日成仍然喋喋不休，强逼着彭德怀撤销停战令。

彭德怀这下沉不住气了，拍案而起，大吼道：“照你们的意见办，志愿军非吃败仗不可。我彭德怀从来不打无把握之仗，对不起，金日成同志，假如你认为我不称职，可以另请高明！”



金日成和朴宪永一见彭德怀动了三昧真火，便不再吭声，气鼓鼓地坐在那里，也不走。

彭德怀只得无可奈何地说：“你们既然坚持只要我军继续南进，敌人就会退出朝鲜的意见，那么，我只好提议，仁川、襄阳以北的全部海岸线警戒和维护后方交通线归志愿军负责，人民军5个军共12万人，好多已经在我国吉林省休整了两月了，刚刚上来，干脆就由你金日成同志来指挥，你想打哪儿就打哪儿。美军如果按照你的设想退出朝鲜，我彭德怀替你鼓掌，庆祝朝鲜全境解放，祖国统一。假如美军不退，志愿军仍按原定计划向南作战，你看这样行不行？”

金日成断然否决：“不行！绝对不行！我们力量单薄，上次打釜山已经吃过美军的大亏。”

朴宪永也说：“中朝两国是一家人，要打一起打，我们单独南进怎么可能呢？这不明摆着出我们的洋相吗？”

彭德怀说：“可以试一下嘛，也许发生了奇迹呢。”

金日成摆着手说：“已经试过了，前次我们一直打到了洛东江，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试不得，不能试。”

彭德怀说：“怎么就不能试呢？我一再告诫你们眼下不能南进追击，嘴皮说起了血泡，你们就是不听。你以为我就不想结束这场战争吗？还想留在这里挨冻受饿吗？可以说，我的心情，几十万志愿军官兵的心情，和你们一样迫切！可是，想归想，做归做，不是心想，就能事成的。”

这时，有人送上电报，是斯大林请金日成转交给拉祖瓦耶夫总顾问的。斯大林在电报中措辞严厉，说拉祖瓦耶夫不顾主客观具体条件，强行南下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电文还指出：“中国志愿军的领导是正确的，毫无疑义，真理在彭德怀同志手里。”斯大林还批评苏联驻朝大使不懂军事，说“彭德怀是久经考验的指挥员，他指挥志愿军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是天才的军事家，今后朝鲜战场必须听彭德怀同志的指挥。任何人也不得干扰彭德怀同志的指挥”。

老大哥一锤定音，金日成这下再也没啥好说的了。

他站起身，尴尬地握着彭德怀的手说：“我们朝鲜方面的同志确实存在错误的速胜思想，既然斯大林同志说中朝军队都听你指挥，我们就遵照他的指示办好了。”

杨凤安是彭德怀的军事参谋兼志司办公室副主任，金日成数次带

着人来瓮瓮志司和彭德怀吵架，他都是目击者。

杨老晚年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这个金日成啊，平时他一般情况下还听彭老总的，但是苏联的总顾问拉祖瓦耶夫是朝鲜劳动党和人民军的太上皇，他听他的，听斯大林的啊。彭老总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他真正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英明统帅。就在部队3战3捷，看上去打得很顺的时候，马上下令停止追击，不打了。在那个时候有很多本国的上层领导，都说原来这美帝国主义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那么一打就稀松软蛋了。天安门都在搞大规模的庆祝活动了。实际上呢，彭老总和志司的同志都清楚，那个时候美国有强大的海空优势，陆军也没有受多大损失，美国的主力也还很完好的，他仗着机动灵活，主动往后撤，就等你过来打我呢。所以彭老总这个时候决定停下来，他判断敌人是有计划地撤退，撤退到洛东江防线，再往你后方一登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顶不住金日成和苏联人的压力，真要闷着脑袋一路往南打下去，敌人在后方一登陆——他是完全有那个能力的——我们极有可能比朝鲜人民军在仁川败得还惨！可那个金日成和拉祖瓦耶夫怎么说也不听，老摇头，老吵，还给毛主席写信，告了彭德怀8大罪状。气得彭老总最后拍了桌子：‘好，我就这样子定了，错了杀我的头！’当然，也就是嘴上说说，谁真敢杀他的头啊？”^①

什特科夫后来向莫斯科报告说：“当美国人已经准备从朝鲜撤出的时候，中国人却离开水原回到‘三八线’地区，他们放弃了大规模的进攻行动，所有这一切，都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在朝鲜领导人心目中的威信。”

战场上的急剧变化很快证明彭德怀的决策是正确的，还没等着志愿军往南打呢，1951年1月中旬，也就是金日成和彭德怀发生争吵短短几天之后，“联合国军”已经由退却转为进攻，气势汹汹返身杀来。刚停下来喘口气的志愿军还来不及休整，又马上投入了战斗。

1月27日，志愿军仓促间被迫转入了第四次战役，实际上就是在极为被动的情况下一边打，一边往后退。战略指导思想就是“以空间换时间，等待二梯队赶快上来”。

^① 引自2013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12集文献纪录片《不能忘却的伟大胜利》。



6. 8天，8天，还是8天

1951年1月15日，李奇微为了消耗疲惫志愿军，查明对手的情况，开始采用“磁性战术”，在水原至利川之间实施试探性进攻。每日以汽车搭载步兵，配合少量坦克，采取多路小股的方式，在宽大正面进行试探搜索，不断地对志愿军进行小规模攻击。开始以连排兵力，后来又以营团兵力实行火力侦察，大批侦察机频繁出动，情报部门也在千方百计努力工作。

然而，庞大的中国军队似乎神秘地失踪了，无法查出它的踪迹。据情报部门估计，在第8集团军正面，至少有18万名中国志愿军和北朝鲜军队，这些部队究竟部署在什么地方？下一步的意图是什么？为了弄清楚这些疑团，李奇微决定亲自出马。

这位司令官一向雷厉风行，办事认真，他不愿重蹈麦克阿瑟“圣诞节攻势”的覆辙，冒冒失失地把他的部队推入中国军队埋伏的巨大陷阱里。他要亲自飞到中国军队的阵地上方，亲眼看看那是什么情景了。

他命令第五航空队司令官帕特里奇准备一架飞机。他在电话里对这位空军司令官说：“帕特，不知你是否有兴趣和我一起坐一架侦察机，在中共军队上空兜兜风，看看他们在干什么？”

“乐意奉陪，将军。”帕特里奇说，“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亲自驾驶飞机了，我想这正好可以在你眼前显示一下我的飞行技术。”

于是，帕特里奇亲自驾驶一架AH-6型老式高级教练机，载着李奇微，开始在敌方占领区纵深几十里的范围内进行搜寻。

帕特里奇熟练地驾驶着飞机，越过一座座山峦和一道道河流，在任何可能驻有大部队的村庄附近及山谷地带盘旋侦察。这架老式教练机飞行速度虽然很慢，但它像一匹驯服的老马一般，非常听主人使唤。在3个多小时的飞行搜索中，只在一处看到大部队移动的迹象，白皑皑的雪野上，有一片密如蛛网般的车辙轮迹和脚印。从一个村庄通往一处密布松林的山谷，帕特里奇驾驶着飞机在这山谷四周掠来掠去，只看见墨绿色的松林随着山势起伏延伸，到处是厚厚的白雪覆盖着，却看不到有什么车辆和人马移动的迹象。除此之外，在这天上午的整个飞行搜索过程中，他们几乎连个人影都没有发现。

李奇微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们很难发现一个活动的生物。既没有篝火的烟雾，也没有车辙痕迹，甚至没有被人践踏过的积雪，以表明那里驻扎着大部队。”

返航途中，李奇微对帕特里奇说：“我看只有一个办法可以用了，我要让第8集团军向北推进，只有这样，才能查清楚敌人到底在哪里集结。”

晚上，李奇微在第8集团军指挥所里，在一盏瓦斯灯的帮助下，反复地查看作战地图和历次作战的记录。从中国志愿军入朝参战以来，中国人共与“联合国军”进行了3次大的战役，“联合国军”在前两次为进攻一方，第三次为防御一方。

李奇微翻开参谋处交给他的作战笔记簿，找到了如下几个数字的记载：

第8集团军第一次向鸭绿江的进攻，从1950年10月25日遭到中国参战部队的埋伏攻击，大规模战斗从26日开始，至11月2日第8集团军主力撤至清川江以南为止，历时8天。

第8集团军第二次向鸭绿江的进攻，从11月25日夜开始遭到中共军的攻击，战至12月2日，中共军就停止了对溃败的“联合国军”的攻击，历时8天。

第三次是中共与北朝鲜军队于12月31日黄昏全线向“联合国军”发动大规模进攻，战至1月8日，中共军队即停止了攻击，同样是历时8天。

看到这里，李奇微心中猛然一跳，秃鹰一般锐利的眼睛“唰”地亮了，“8天，8天，还是8天，多么巧合的一组数字！3个8天，3个完全相同的数字，3种大致相同的作战方式！”

李奇微恍然大悟，这8天，原来是由中国军队的后勤补给能力决定的。由于美军的空中封锁和自身补给手段的原始，在战役开始之前，依赖人力、畜力补给的中国军队，只能为每一位中国士兵提供大约一个星期的粮食和弹药。

8天，3个同样的数字摆在李奇微面前……中国军队的任何攻势，无论参战兵力规模有多大，战斗持续的最长时间是8天。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后世的军史研究者们开始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礼拜攻势”。

谭秉云告诉笔者：“每个步兵身上有枪、有子弹、有手榴弹、有



背包、有水壶，加上步枪，平均每个战士身上最少40公斤左右。一过鸭绿江，晚上就没有正经睡过觉，顶多是你走一段路，累得不行了，让休息了，把背包往下一退，就躺在地上，枕着背包休息个一两个钟头就又要上路了。根本就没有过住到屋子里，脱了衣服，打开背包，把身子扯抻了睡一觉的美事。”

这就是说，中国士兵必须把所有的补给都扛在身上，一旦粮食弹药消耗完毕，再凌厉的攻势也只能停止。

黄树青说：“现在好多去朝鲜打过仗的老兵经常说‘一把炒面一把雪’，其实有炒面吃，算好得很了！我们部队过鸭绿江后，只在兵站领过一次补给，每人9斤炒面，第二次领补给，是在50天以后。你说咋办？我们又不是神仙，能够不吃不喝，不想办法，一个个就非饿死不可，只好去找老百姓借。老百姓一见当兵的扛着枪闯进村子，大人娃娃吓得飞起跑，我们只好自己找，找到了就开张借据，多少多少斤写清楚，找个东西压着留给主人。后来‘三八线’北边的全还了，不管粗粮细粮一粒不少，我们全还上等的东北大米。‘三八线’南边的呢，就没办法还了。”

据此，李奇微可以放心地认为：中共军队来势汹汹的进攻，无非是“礼拜攻势”而已。

再者，由于中共军队担心白日作战会遭到“联合国军”的轰炸和美国军舰在东西海岸的炮击，一般只在夜间作战，天亮后必须隐蔽起来，这样一来，就同样减少了他们攻击作战的时间，而且大大增加了他们作战的难度。这种限制一旦被“联合国军”利用，那么中共军队在以后的战斗中，将难以有所作为。

想到这里，更加鼓舞起了他发动进攻的勇气和信心。李奇微为了不給中共军队以穿插分割的机会，他命令各部队连接一线，互相策应，齐头并进，推进速度不应过快，要稳扎稳打，稳步向前推进。

这次进攻，李奇微集中了“联合国军”5个军16个师又3个旅、1个空降团及其全部的炮兵、坦克兵和海军舰空兵，地面部队23万余人。美英军主力及南韩军一部于西线（南汉江以西），向汉城方向实施主要突击；美军一部及南韩军主力在东线（南汉江以东），实施辅助攻击。敌人这次进攻的特点是：为避免南韩军一遇上中国人就会溃败，美韩军混合编队，由美军担任主攻，南韩军协同，并加大了战略纵深；为防志愿军实施反击，被分割包围，也一反过去分兵冒进的做

法，而改取互相靠拢、齐头并进、稳扎稳打的做法，力求东西呼应，互相支援；并针对志愿军装备劣势和供应困难的弱点，实行了“磁性战术”和“火海战术”，对志愿军实行消耗战。

所谓“磁性战术”，是敌人在摸到了志愿军供应不继的弱点之后，企图仗恃其现代化装备机动快、火力猛的优势，像磁铁一样始终保持与我接触。在大规模交战之前，先以少量坦克和汽车搭载步兵与我保持接触，或进行武装侦察，或抢占我某一重要地区，或迟滞我之行动，掩护其主力转移和进攻，以此来消耗、疲惫对手。

所谓“火海战术”，是美军仗恃其优势的炮兵、航空兵火力，以及坦克的火力对志愿军进行的一种密集的火力突击，以杀伤志愿军有生力量的战术手段。

当时志愿军总部虽然也曾估计到形势的发展有可能迫使我军在2月间就要打一仗。但是，没有料到敌人会这么快就发动大规模进攻，所以主要是把精力放在春季攻势的准备上。

当我判明敌人企图之后，遂于1月27号停止休整，准备作战。并将正在进行中的中朝两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改为准备进行第四次战役的动员会议。

洪学智副司令员在其回忆录中写道：“第四次战役我们是被迫打的，彭老总对此次战役的后果是很担心的。他在1月31日给毛主席的电报中就曾明确指出：第三次战役即带若干勉强性质，此次战役则带有更大的勉强性。如主力出击受阻，朝鲜战局有暂时转入被动的可能。”

攻克汉城之后，不顾疲劳连续作战的志愿军部队，终于得到了难得的喘息机会，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被提到了首要地位，那就是把前3次战役的8000余名伤员，尽快护送到祖国后方的医院。

可是，由于美军飞机的严密封锁，志愿军的运输能力遭到严重限制，大量伤员被滞留在距离前线不远的地方。为了照料暂时无法后送的伤员，志愿军部队从各个机关里抽调了許多人充当临时的“照顾员”。

中南军政大学的学员于开志，便是他们中的一员。

他们负责护理的彩号有14个，全部待在山洞里。

有个班长的大腿被打断了，躺在担架上，领导安排于开志护理



他。头两天，班长痛苦得很，动动担架都喊得要命，疼啊！结果到了第三天，班长要解手，他说：“照顾员啊，我想解大手。”

于开志说：“班长你是老兵，我是个新兵蛋子啊，你给我说办法，我来配合你。”

班长说：“你上外边找几块石头吧，把这担架垫高，在帆布上挖个洞，把我这屁股露出来就成。”

于开志说好，然后到外边找了几块大石头回来，掀一个角给他垫一个，把担架垫高以后，正好他兜里有一把水果刀，便拿刀在帆布上剃了个屁股大小的洞，在班长的裤头上也挖个洞。再把敌人吃饭那个鸭蛋形的饭盒拿了十来个过来，往洞子口一搁，对伤员们说：“你们谁解大手小手，都可以在这里解决，不出去，这样就不容易暴露目标。”

接着，他又把棉袄上的袖子剪下来一只，把班长的屁股给垫起来，感动得那个家在东北黑龙江，叫王家富的班长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

于开志说：“班长你别感谢我，感谢党就成，是党派我来照顾你的，我辛苦点没啥，只要你少受点痛苦，我就心满意足了……哎呀，那个惨劲儿哪！”

于开志说，除了志愿军的伤员，很多受了伤的“联合国军”的俘虏，也被分散安排在伤员队伍里。由他照顾的14个彩号里，就有4个俘虏伤员，有2个黑人，2个土耳其人。结果一吃饭哎呀他就发愁，他们10个志愿军伤员吃完了，说护理员，这个饭你要吃就吃，不吃扔了都行，不能给敌人吃啊。你叫敌人吃了我们不乐意。有的嚷，饿死他们！于开志说好啦同志们，不叫他们吃就行了。

结果他把4个外国伤号悄悄叫到洞子外边，再叫他们吃饭。

那时因为志愿军拉补给的车队被美军飞机炸了，前线官兵全都饿着肚子哩。

在质朴的志愿军士兵眼里，美国人之间的种族歧视，令他们大吃一惊，动了恻隐之心。

离子开志所在山洞卫生所二里地的一道沟里，关押着37个好胳膊好腿的“联合国军”俘虏。

一天，直工科科长郭伟叫上于开志：“小子，我听说有几十个俘虏关在这附近？”

于开志指着前面说：“离这有小二里地，关在一栋独房子里。”

科长说：“走，你带我去。”

科长的话就是命令，于开志只得去。

结果到那儿一看，一个副连长带一个班，在那儿看着那37个俘虏哩。

于开志对李连长说：“郭科长想看看俘虏呢，咋弄？”

李连长说：“不行哩，已经两天两夜没吃东西了，门一开要来个暴动咋弄？”

郭科长说：“你把机枪端好，对准他们，然后叫人上前开门。谁敢暴动，就给他一梭子。”

门一打开，只见几十个俘虏全挤在门口，饿得来眼珠子全发绿光。一见于开志背上的干粮袋就用手乱指，意思是要干粮吃。

郭科长说：“小子，倒出来，给他们吃喽。”

于开志说：“给他们吃喽，我吃啥呀？美国飞机炸那么凶，补给断好几天了。”

郭科长说：“没事，吃完了我想办法给你弄。”

于开志看见门口有个破钢盔，就捏住粮袋，倒了一多半炒面在钢盔里边，还留了小半袋，没舍得倒。

他这里还没来得及站起来哩，那边一堆俘虏猛一下就扎过去了。几下把炒面抢在手里，拼命往嘴里塞，呛得嗓子直冒烟。

这时候，于开志看见旁边蹲着个黑人，动都不敢动一下。

郭科长也发现问题了，说：“我看出来，在美国，黑人是受白人压迫的，小子，你把黑人叫到门外来，把你手上剩那点炒面给他吃喽。”

于开志说：“科长你不是找难题吗？当着那么多白人的面，他敢吃不敢吃啊。”

科长说：“别管那么多，他两天没吃东西了，肚子不饿啊？”

结果警卫员上前把那黑人拉出来，于开志拿过钢盔，把剩下的炒面“呼啦”一下全倒进里面，递给黑人。

黑人端着钢盔，瞅一遍在旁边瞪着他的白人，不敢吃。

郭科长比画着说：“你的，给你的，吃，吃。”

黑人吃了两把，不敢再吃，把钢盔递给旁边的白人。

于开志说：“郭科长你没事找事啊，那天我看那些白人拿那黑人



练拳击，把他打得鼻青脸肿的，黑人吭也不敢吭一声。你这么弄，到了夜里，这些白人不把他掐死才怪咧。”

郭科长一听，问于开志：“那咋整啊？”

于开志说：“带走吧，我那儿还有两个黑人俘虏，两个土耳其俘虏，让他们待一块吧。”

春节就要到了，终于能歇歇脚的志愿军开始筹备过年物资，国内运来的慰问品在鸭绿江北岸堆积如山，虽然被炸毁的多，也仍然有部分陆续送抵部队，部分官兵甚至吃上了肉，还有后方为前线官兵补充营养而专门研制的“蛋黄粉”。

原志愿军野战医院工作人员长金说：“国内那时候经常运上来很多罐头，像牛肉罐头，还有蛋黄罐头。蛋黄罐头其实就是蛋黄粉，用水一和，能摊鸡蛋吃。”

中朝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在毛泽东发出的“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指示下，志愿军总部号召官兵们开展“拥护朝鲜劳动党和政府，爱护朝鲜人民”的活动。

长金说：“那时候美国飞机老是轰炸，也没法儿种地啊，朝鲜的老百姓就吃板栗，皮儿上带刺的。板栗是朝鲜的特产，满山都是板栗树，用棒子一打，装一袋子，放菜窖里，吃的时候端一盆上来。”

原志愿军炮兵祝子清说：“野菜、板栗成了朝鲜人民的主要口粮，朝鲜还有一种草根子，又粗又长，长在地下，老百姓也挖这个东西吃，我吃过，煮熟后有点面。我们也挖，后来总部下命令，说这是朝鲜老百姓的主要口粮，不准志愿军挖，也不准采野菜吃。那时候看到老百姓饿死的很多，好多村子死得绝了户。总部还规定，志愿军每人每天要节约2两粮食，帮助当地的老百姓。”

原志愿军某部文化教员邱从义回忆说：“当时朝鲜老百姓生活很困难，没有粮食吃，饿死人的事到处都有，部队往往给救济高粱米。上面还规定，在志愿军驻军的地方，不许饿死朝鲜人。就是要我们少吃一点，省下的拿去帮助他们。”

李奇微终于在纷乱的朝鲜战局中理出了头绪，如何才能验证这种现象呢？那就放几条猎犬，去探探虚实吧。

1951年1月15日，也就是彭德怀命令中国军队全线停止追击的一个星期之后，李奇微亲自命名的“猎犬行动”开始实施。

他的一位部下后来这样回忆说，李奇微用咄咄逼人的口气问他，你知道坦克是干什么用的吗？部下回答说，用来杀人的，长官。李奇微又说，那就带着你的坦克，去水原吧。部下回答，坦克开去水原很容易，可是中国会切断自己的退路。李奇微瞪了他一眼说，谁说回来的事了？只要你能在那里待上24个小时，我就会派一个师赶到那里。

猎犬行动的意思是像猎狗一样扑上前去，主动寻找正处在物资严重短缺困境中的中国军队，把他们死死缠住。美军在少量坦克的引导下，用汽车搭载士兵，采取小股多路的方式，在宽大正面进行小规模试探性进攻。

就因为一个人的到来，一支完全不同的“联合国军”出现在朝鲜战场上，而中国军队的统帅似乎还尚未意识到这一点。

李奇微表情依旧严峻地对即将出发的小分队成员们说道：“不是都在问面对中国人的攻势，联合国军应该怎么办吗？那就让我告诉你们，出路只有进攻，进攻，再进攻！”

1月25日，美军在大量航空兵、大炮和坦克的支援下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坚守在汉江南岸的志愿军部队在天寒地冻、粮弹供应困难、工程器材异常缺乏的情况下，依托一般野战工事，进行防御作战，抗击敌人优势兵力的进攻，前仆后继，不怕牺牲，使敌人付出重大代价。

战斗打响后，志愿军政治部根据这次战役的特点，于2月1日向部队发出了《第四次战役的政工指示》。指出，此役是在相当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诸如部队普遍希望休整，作战思想装备不够，兵员未能得到补充，粮食、弹药困难等未完全解决，因此政治工作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让全军指战员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不怕疲劳，勇于克服困难，保证这次战役的胜利。

战役进行中，志愿军虽然在横城一战歼敌12000余人，却在砥平里大吃了苦头。

从1月25日至2月16日，志愿军虽然在全线取得了歼敌22000余人的战绩，但因砥平里失利，因部队力不从心，东西两线战役反击均不顺手，战略预备队未能及时赶到投入战斗，也就难以制止敌人的进攻了。

战至3月，在志愿军连遭重创后，彭德怀不得不决定全线转入防御，节节阻击，迟滞和杀伤敌人，争取两个月的时间，等待第二轮兵



团的到达；同时积极改善交通运输，囤积作战物资，为下一个战役创造有利条件。

彭德怀在完成以上部署后，于2月19日火速回国，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汇报朝鲜战场出现的紧急战况，并请示下一步的作战方针。

前线的中朝联军，则且战且退，向着“三八线”以北后撤。

让麦克阿瑟感到意外的是，第8集团军经过李奇微的整顿，采取了一种稳扎稳打、齐头并进的战术，将战线从朝鲜半岛的“三七线”附近，逐渐向北推了回去。

美军在战场上的逆转，使麦克阿瑟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

因为不久前，麦克阿瑟还一再上书华盛顿，竭力渲染朝鲜战场的严重局势，声言如果不立即采取他的扩大朝鲜战争的计划，第8集团军将面临覆灭的危险。然而，自李奇微接手指挥第8集团军，从1月中旬开始向节节逼近、气焰正炽的中国人发动进攻以来，他曾经预言的那种全军覆没的危险分明并不存在了，这让自从军以来便有着好大喜功特点的麦帅，好不难堪！

不过，麦克阿瑟对李奇微的这种消耗战的打法并不放在眼里，轻蔑地称之为“一场拉手风琴式的战争”，嘲笑这种作战的公式是前进——后退——再前进——再后退。尽管麦克阿瑟有意用调侃来掩饰自己的无所表现，但战局的好转却是显而易见的。于是，麦帅又在记者招待会上不动声色地将这一切归功于自己的名下——难道不是自己首先提名由李奇微接替倒霉的沃克出任第8集团军司令官的吗？难道李奇微的进攻计划不是经他批准的吗？谁能否认他高屋建瓴的指导呢？

朝鲜战局的突然好转，刺激了这位被西方世界誉为“天才”的将军萌生彻底击败中国人的勃勃野心。2月11日，他又给华盛顿当局发去一个新的取胜的计划，实现这个计划，就将有效地肃清朝鲜半岛上的敌人。

根据麦克阿瑟的设想，这个计划将分三个步骤执行。

第一步，首先对北朝鲜内敌人后方的全部地区进行大规模轰炸，切断所有公路和铁路，以造成敌人的混乱和动荡不安。

第二步，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敌人增援部队跨过鸭绿江。如果仍然禁止轰炸鸭绿江和对岸地区，则应在敌人的主要运输线上布设放射

性废料，以切断北朝鲜和中国东北的联系。

第三步，在北朝鲜东西海岸两端实施两栖和空降部队登陆，对敌人实行大包抄。那时中国人要么饿死，要么投降。

在这份电报末尾，麦克阿瑟叫嚷：“应当趁热打铁，乘胜前进！”

第十七章

战与和的两手准备

1. 美国人决定和中国人赌一把

沈志华认为，朝鲜战争的重大失误在于两句话，14个字，“该出兵时未出兵，该停战时未停战”。

“该出兵时未出兵”，是金日成的责任；

“该停战时未停战”，则是毛泽东的原因。

尤其是第三次战役结束的时候，志愿军完全占了上风——美国人根本没有同中国人打过仗，志愿军又“不讲规矩”，什么近战啊、夜战啊，一打仗还满山遍野吹喇叭，美国人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到处都是喇叭声，目力可及之处全是人，一个个又不怕死。弄得美国人慌了神。

不过，这两次战役并不是国家实力之间的真实展示，中国军队采用了突袭、计谋，让对手对自己不了解而形成误判，导致其马失前蹄，因而压了对手一头。尤其是第一次战役，打的就是一场让美国人猝不及防的遭遇战。美国大兵还没回过神来，中国人已经消失在了冰峰雪原之中。

1950年12月，联合国第一次在朝鲜战争问题上发生公开的意见分歧。以印度为首的13个亚非国家的代表团联合提出了《朝鲜和平

方案》^①，主张立即停火；中美两国军队撤出朝鲜；美军撤离台湾海峡；南北朝鲜军队解除武装，由联合国成员国组成的维和部队与联合国朝鲜委员会留在朝鲜，完成选举后撤走。

随后联合国大会通过了13国提案，提议立即成立三人小组，商定可以在朝鲜实现停战的条件，以提交大会讨论。

事实上，在美国介入朝鲜战争不久和美国在仁川登陆成功之后，印度都曾展开过调停活动。如果说之前的调停是为了防止战争升级而做华盛顿方面的工作，那么此时的调停更大程度上是为了阻止中国军队乘胜追击，而努力做北京方面的工作。

至少北京是这么看待1950年12月12日的13国提案的。

因为这时志愿军通过第二次战役，在东、西两线双双粉碎了“联合国军”的进攻，各路大军正顶风冒雪，咬紧牙关“宜将乘勇追穷寇”，向“三八线”掩杀而去。

如果说朝鲜战争的爆发是一次国际突发事件和重大危机，那么新中国应对这次事件和危机的决策和措施是及时而正确的。万事开头难，在战争第一年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立足长远，审时度势，权衡利弊，经过反复讨论和慎重抉择，作出了抗美援朝的重大决策；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同朝鲜人民军一起，先后发起三次战役，将已经兵临鸭绿江的“联合国军”赶回至“三八线”以南地区，并迫使其转入战略防御，为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

但是，近些年也有学者认为，志愿军第三次战役结束后，联合国军退至“三七线”以南，再次失掉汉城，军队士气降至最低点。如果中国军队挟大胜之威，屯兵于“三八线”两侧，形成军事压力，然后接受联合国已经通过的“补充报告”，开始停战谈判，那么无论在政治、外交还是军事上，对中国而言都是完胜。

其实在第二次战役结束后，李奇微接替车祸丧生的沃克出任第8集团军司令时，“联合国军”就已经成为一支张皇失措的军队。

李奇微对这种状况特别深刻，其回忆录里几乎用了半个章节来描述：基层士兵大脑一片麻木，大多数人只想着早日离开朝鲜回国。

^① 即1950年12月12日由当时印度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劳斯代表阿富汗、缅甸、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黎巴嫩、巴基斯坦、菲律宾、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也门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上提出的关于在朝鲜停战的提案。



高层军官，所有的军长、师长都已丧失重新进攻的信心，认为无论何种进攻方式都会归于失败。韩国军队的情况更加严重，在撤出汉城的时候，韩军士兵丢弃了所有重型火炮、甚至步枪，他们只有一个念头——离中国军队越远越好。

美国政府也一度失去将战争继续下去的信心。在1950年12月底，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将如下看法通知麦克阿瑟，“中共部队现在十分强大，如果他们全力以赴，完全可以迫使联合国军撤出朝鲜”。

第三次战役结束后，严峻的现实迫使麦克阿瑟不得不改变对中国人的成见，开始正视对手的存在。他在回复中表示：“如果参谋长联席会议不改变其决定（不向我们提供大规模增援；不封锁中国海岸；不空袭中国大陆；不许轰炸中国东北的基地；不放国民党军队‘出笼’），则在没有极其重大的政治原因的情况下，‘我们的部队应以作战情况允许的速度尽快撤离朝鲜’。”

在这种情况下，身为美第8集团军司令的李奇微甚至开始着手撤出朝鲜半岛的准备：在半岛最南端的釜山港地区重新设置一个纵深很大的防御区域（美军称为“戴维森防线”），美军甚至已经为这个堡垒体系设置了铁丝网。

美方自从被志愿军打回“三八线”后就开始积极寻求停战，用艾奇逊在他的回忆录中的话说：“我们就像一群猎狗那样到处去寻找线索。”

艾奇逊没有撒谎，他先后派人在纽约、巴黎、瑞典分别找苏联外交官试探停战谈判。斯大林看到中国参战后，志愿军三战三捷，突破了“三八线”，并于1951年1月4日攻克了汉城，正向南朝鲜乘胜挺进，对美国人的主动示好根本不予理会。艾奇逊再派人到香港试探，也没能成功，最后找到了美国前驻莫斯科大使乔治·凯南。

凯南受命后私下会晤马立克，不理会对方的打岔，直截了当地告诉他：“美国准备在联合国或在任何一个委员会，以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人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

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态度一样，自然不会同意。

随着战争的扩大，十几个国家都已经牵扯进去了，当时还没有“有限战争”的概念，再不停就是世界大战了，很多国家都不得不着手备战。整个国际舆论则是一派停战之声，派有军队在朝鲜半岛作战的英国、法国都要求停，联合国里以印度为首的13个亚非国家再一次

提出停战方案。随着战事对中国越来越有利，特别是第三次战役中国志愿军打过了“三八线”，占领汉城，兵锋直抵“三七线”后，联大政治委员会讨论并通过了“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在13国提案基础上提出的，关于解决朝鲜问题基本原则的“补充报告”。

该报告建议立即实现停火；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恢复和平；外国军队分阶段撤出朝鲜半岛，并安排朝鲜人民进行选举；为统一和管理朝鲜做出安排；停火之后召开一次由英、美、苏和共产党中国参加的会议，以解决远东问题，其中包括中国台湾地位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这个事先几个小时才通知美国政府的最新提案使白宫左右为难，进退维谷。如果同意的话，美国人在战场上与中国人交手三战皆墨，大大地落了下风，咽不下这口气，这届政府一定会倒台，国会议员们肯定会大骂政府。拒绝呢？美国同样受不了国际舆论的压力，别说印度为首的13个国家，连英、法这样的老弟兄，都会跳出来与他公开反目。

国务卿艾奇逊想了很久，终于说服杜鲁门总统下决心和中国人赌一把：签字同意，就赌中国人不同意。

如果中国人不同意，拒绝和平的责任，无疑就落在了毛泽东和中国政府的头上。

正如艾奇逊指出的，我们“热切地希望并相信，中国人会拒绝这个决议”。

于是，联合国马上把停火方案（“补充报告”）交给了北京。

对13国“补充报告”的态度，不仅仅是一个外交问题，更是一个军事问题。在1950年1月中旬那样一个时间段，究竟是美国，还是中国更需要停战？

这一判断的正确与否，是直接关系到当时中国外交应对正确与否的关键所在。

彭德怀急切致电毛泽东，建议中国政府接受这个以印度为首的13国提出的“补充方案”。他认为如果赞同这一方案，美国会立即陷入极其被动和尴尬的境地，志愿军则三战三胜，无一败绩，足堪完美。此时志愿军已攻至“三七线”，即使撤回“三八线”，也是胜利而归，美国国内必然闹翻天，西方反华集团也会出现重大裂缝。

美国著名政论家约翰·斯帕涅尔评论：“如果中国在那时同意



谈判，战后的政治地理和国际形势就会同现实有很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对中国来说一定会更加有利。这是因为，那时的中国能够作为不败的胜利者，使美国怀有中国无比强大的印象，来到会议的座位上。”

是见好就收，还是继续打下去，毛泽东和周恩来、聂荣臻在中南海彻夜未眠。

毛泽东坐在圈椅里，抽着烟。周恩来和聂荣臻坐在对面的沙发上。

聂老总先就加强广东、福建海防的事情向毛、周汇报。他的声音有些沙哑，两眼因疲劳过度布满了血丝。

由于在代总参谋长的位置上过度疲劳，聂荣臻的身体终于支持不住了。聂力在《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中写道：“1952年秋天的一天中午，父亲晕倒在办公室里。秘书范济生把他搀到沙发上躺了一会。素来身体无恙的父亲没当一回事，躺了一会又爬起来，继续处理电文。可是他总感到身体轻飘飘的，怎么也站不稳。……当年跟随父亲打仗的部下都有个感觉，那就是他们的聂总身体一直不错，很少听说他生病，即便是在晋察冀最艰苦的岁月里，在接连不断的反‘扫荡’中，也没见他病倒。但是，这一次，他真的顶不住了。”

聂荣臻说：“据各方面报告，1月8日，蒋介石派何应钦去东京密见了麦克阿瑟，商谈制订反攻大陆的计划。准备用20万至25万兵力进攻厦门、汕头，以配合朝鲜方面作战。据称，麦克阿瑟已告诉蒋介石，美国有可能在1月宣布结束对台湾进攻大陆的限制。”

毛泽东轻松地弹了弹烟灰，说：“我看麦克阿瑟捉襟见肘喽，居然又打起了蒋介石那些残兵败将的主意。不过，也不得不防啊。”

聂荣臻说：“我们已电告陈毅和叶剑英同志，请他们考虑加强福建和广东的防务。”

有关华东和中南防务问题处理完后，三位领导人的话题又转到了朝鲜战场上。

周恩来说：“对于1月13日联合国通过的停战委员会拟定的五步方案，我们应尽快作出反应，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并就此给苏联方面发个备忘录。我已指定外交部拟文，很快就可报来。”

毛泽东听罢周恩来的汇报，思索片刻，从圈椅上站起来说：“美国要的是先停火，再谈判，为的什么？无非是停战对他有利。只要先

停战，美国就可能保存实力，还可以使李承晚保有若干地区和武装资本，而谈判嘛，可以无限期地延下去。我们绝不上美国人的当。”毛泽东提高声调说：“我们要拒绝先停战的谈判，并针锋相对地提出我们的主张：提议在同意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的基础上举行谈判，以结束朝鲜战争。”

周恩来说：“谈判内容还要包括美国第7舰队从台湾撤离和恢复我们新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合法席位问题。”

“对！就是要将美国一军！”毛泽东说，“杜鲁门肯定不会同意我们的提议，否则他太丢面子了。如此说来，决定问题的还是战场上的军事形势。因此，必须督促中朝军队加紧整训，以强大的力量，来迎接春季作战。”

聂荣臻说：“德怀同志电告，他们已通令全军停止追击，转入休整，并准备于1月25日召开中朝两军干部会议，总结第三次战役经验和讨论下一步行动。我军入朝两个多月，连续进行了三次战役，部队太疲劳了，减员也很多，的确需要充分休整，以利再战。”

毛泽东说：“依我看，今后敌人统帅部方面对朝鲜的军事行动，无非有两种可能，其一是，在中朝军队的压迫下，略作抵抗，即退出南朝鲜。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不大。其二是，双方进行反复较量，待我们打得他们无法再打下去了，方才退出朝鲜。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必须在思想上、行动上作长期艰苦的战斗准备！”

11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明确表示，“联合国军无意放弃他们在朝鲜的使命”。

不仅如此，美国此时还提出了很高的停战条件：“如果停火是在‘三八线’的基础上，可以得到联合国的全面支持；但这样的停火安排不得附有危害联合国部队安全的条件，也不得以在其他问题上达成协议为条件，诸如台湾问题、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等；如果联合国军出于军事考虑而不得不撤出朝鲜，则联合国必须宣布中国为侵略国家，并运用一切可能的政治和经济措施制裁中国。”^①

当英国首相艾德礼前往美国，试图调停朝鲜战争时，杜鲁门和马歇尔表示：“必须保持我们在西太平洋的防御以及亚洲人对我们战斗

^① 引自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力量的信赖，这样才能获得他们的好感。”

艾奇逊则说：“被赶走和自动撤出是大不相同的，我们不会考虑避开、逃跑和放弃。”

很显然，美国并不会真正接受此时的停火谈判。

对于这样的停火议案，毛泽东和周恩来从一开始就看透了它的本质——“政治试探和政治欺骗”。

12月2日、3日，周恩来在《关于在联大政治委员会发言方针给伍修权等的电报》中作出分析和判断：“美国在东西两线均惨败，现正向平壤、咸兴、元山之线撤退中。英法甚怕牵入对中国作战，故急。美国想骗取停战，好稳住阵线，调整兵力，以便再行进攻。”

他指示伍修权等：“此时他急我不急。你们应采取攻势，凡遇以朝鲜停战为言者，你们都不要拒绝谈判，你们应答以只要美军从朝鲜撤退，朝战自停，并且愿将他们意见向北京作报告。”

可见，最初中国政府并没有拒绝停火谈判，并一再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们历来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并使朝鲜问题局部化”，说明中国政府对当时所谓停战谈判的看法：“美国统治集团却在武装干涉朝鲜的同时，实行武装侵略台湾，轰炸中国本土，并扩大在东亚的侵略。现在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要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时候，美英集团却要在朝鲜保留侵略军队和侵略行动，继续侵占中国台湾，并对全世界加紧进行其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这从杜鲁门总统、艾德礼首相的联合公报中，从马歇尔将军向美国国会提及准备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中，就可得到证明，并从而可以懂得奥斯汀先生^①所赞成的在朝鲜首先停战的真正意图，就是要求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束手以让美国侵略军在朝鲜继续侵略，就是要求台湾仍然被美国武装侵占，就是要求日本军国主义可以被麦克阿瑟重新恢复起来，就是要求美国人民可以被美国统治集团为所欲为地驱入战争深渊。”

周恩来在表达对于和平的愿望的同时，也揭露了美国的真正目的：先停战后谈判，“只能是适合美英集团的要求，继续侵略朝鲜，侵略台湾，轰炸中国，并威胁亚洲和世界的和平”。

最终，周恩来明确表示中国政府“绝对不能同意”这样的停战议案。

^① 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引者注。

上述分析表明，虽然中国拒绝了1950年12月12日以印度为首的13国停战议案，但这并不能说明当时中国没有停战的意愿，更不能把朝鲜战争又延续了两年才结束的责任怪罪到中国身上，而恰恰有力地证明了美国以停战为幌子，争取喘息之机的战略企图。

军事只能是政治的延续，中南海丰泽园里的考量显然比朝鲜桧仓一座金矿洞子里涉及的问题更为重大，眼光也更为广阔。朝鲜战场上千军万马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帮助中南海里的最高决策者更好地运筹帷幄。

毛泽东此时的战略目标是彻底将美帝国主义赶出朝鲜半岛，所以，他明确指示彭德怀“继续进行战斗，以争取彻底的胜利”。

“彻底的胜利”并非是一个政治口号，而是有着具体的目标指向，那就是将以美国人为首的“联合国军”赶出朝鲜半岛。

毛泽东这厢一拒绝，艾奇逊那厢顿时欣喜若狂，立即宣称：“我们必须清醒地正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共产党无意停止他们对联合国的蔑视。”

然而，正像艾奇逊所期望的那样，中国的答复恰恰是否定了这个联合国已经通过的停火方案。1月17日，彭德怀关于接受此方案的建议被毛泽东否定。经斯大林批准，周恩来公开发表声明答复联合国：“先停战后谈判的原则，只利于美国维持侵略和扩张侵略，决不能导致真正的和平。先停战后谈判只是美国寻找喘息机会，以利再战的阴谋。因此，中国政府不能予以同意。”

中国认为这一方案是以美国为主导的一些国家的阴谋，美国立刻策动联合国通过了认定“中国是侵略国家”的另一个提案。认为中国就是个得寸进尺的无赖，你原来提出的条件全都得到满足了，凭什么还不同意和平？

结果，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联合国大多数国家都投票赞同“中国是侵略国家”。

半个多世纪以后，关于1951年1月谁更需要停战的问题，已经再清楚不过了。一直难以得到后勤支持的志愿军已经到了一而鼓，再而衰，三而竭的危险境地。就连彭德怀都已明确表示：“打第三次战役就很勉强，若再不休整补充，继续作战，朝鲜战局难免会有暂时转入被动的可能。”

以后的事实也证明，第三次战役时志愿军已经推进到了极限。此



后的第四、五次战役，志愿军都打得极其艰难，不仅被迫全面后撤，而且伤亡、被俘人数大幅度增加。

面对“联合国军”立即发动的大规模反攻，彭德怀马上想到了利用联合国决议的问题，他于1月27日致电毛泽东说：“为增加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可否播发中、朝两军拥护限期停战，人民军和志愿军从乌山、太平里、丹邱里线北撤15至30公里的消息，如同意请由北京播出。”

但毛泽东对美军意图和敌我力量对比做出了与彭德怀并不一致的估计，他命令彭德怀停止休整，立即发起第四次战役，“其目的是消灭2万至3万美军和伪军及占领大田、安东一线以北的地区”。

斯大林也推波助澜，积极支持毛泽东的这一主张。

彭德怀不想打，而他的新对手则已急不可耐，跃马阵前，主动向他搦战。

此时的李奇微已经了解了参战中朝军队的实力，并总结了“联合国军”连战连败的教训，把纷繁复杂的战场形势，逐一分析出清晰的条理。

李奇微认为，志愿军的战斗精神和士气“无与伦比”，战术“勇猛灵活”、“无法抗拒”，指挥是“世界上第一流的”，“联合国军”最害怕与志愿军近战夜战，害怕被志愿军迂回包围穿插。

同时，李奇微也发现志愿军由于没有制空权，缺乏空中掩护；没有机械化、摩托化装备，火力弱，突击力和机动力差；随着战线前移，后方运输线越拉越长，缺乏运输工具，后勤补给极其困难。因此志愿军战役进攻受到很大限制，只有能力发动“月圆攻势”（每月只能发动一次战略性进攻战役）、“礼拜攻势”（每次战役只能持续一个星期）。

李奇微由此认为“联合国军的出路只能是进攻、进攻、再进攻”，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对付志愿军的办法：当对手凶猛的“礼拜攻势”接近尾声的时候，即以强大的反击力量投入前沿，向弹尽粮绝并准备转入休整的志愿军发动猛烈反击，不让志愿军有喘息之机。

事实表明，由于敌我军事力量悬殊，在“联合国军”的强大攻势下，中朝联军不得不被迫向北撤退。毛泽东企望在朝鲜歼灭美军1个

甚至6个整师，结果在砥平里一战走了麦城，第四次战役最终遭到了重大失败。

砥平里，位于“三八线”以南64公里，汉城以东80公里，在抗美援朝第四次战役中，给交战双方都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1989年初，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在搜集朝鲜战争的史料时，特别访问了这个叫作砥平里的小村庄。根据当地一位老人提供的线索，他在北纬37度线附近，挖出了19具中国志愿军士兵的遗骸，还有军装、子弹、水壶、牙刷、胶鞋等遗物。

1989年5月12日，这19具志愿军烈士遗骨，由军事停战委员会“联合国军”方面，移交给中朝方面。当天下午，烈士遗骨被中国驻朝大使馆安葬在开城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内。

砥平里之战，志愿军伤亡惨重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把自己的主要弱点完全暴露给了对手，鼓舞起对手战胜志愿军的信心，对此后的朝鲜战局，影响极大。

美国军史认为：“第2师在砥平里的英勇坚守，后来证明是挡住中国军队进攻的转折点。”

金东明在《韩国战争史》中写道：“砥平里战斗，是美军同中国军队作战中在战术上取得的第一个成功战例，也可以说是‘第二仁川’。”

第四次战役结束后，邓华副司令员就砥平里失利，作了如下检讨：主要是敌情不明，攻击不力。当时认为敌人只有野战工事，兵力不到4个营，而实际上已形成坚固据点，有5个营共6000余人。我攻击部队在兵力尤其是火力上不占优势，又以野战方法去打形成据点的敌人，必败无疑。再加上参战部队建制多，彼此又无联系，协同动作差，以致当夜仅歼敌一部，未能解决战斗。15日美骑兵第1师一部在坦克30余辆，飞机100余架的掩护下，进至砥平里西南的曲水里，与志愿军阻援部队，即116、126师各一部展开激战，其步兵被击溃，但大部坦克已突入砥平里与守军会合。在这种情况下，志愿军如果继续攻击砥平里，即便攻下来，也难以造成各个击破敌人的态势。为避免陷入更大的被动，邓华决定于当日17时30分停止对砥平里的进攻，命令部队于16日拂晓前撤出战斗，向北转移。

不仅如此，邓华还在检讨会上承认，攻击砥平里失利，他应负主要责任。



具体指挥砥平里作战的徐国夫将军晚年在回忆录《大漠风声疾》中饶有深意地写道：“听了邓华的话我很激动，我为他敢于承担责任的态度表示钦佩。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不像有的极个别领导，有了成绩，即使与他不沾边，他也要千方百计靠上去。特别是有风险的战斗，这种人一般不表态，或借故离开，待战事基本趋于明朗化时，他才突然出现在前线指手画脚。一旦战斗不理想，这种人或者把责任推到下边，或者溜之大吉，装作与他没关系。这种人过去有，现在也有；一般干部中有，极个别中高级干部中也有。请注意，是极个别的！”

与美好的愿望相反，在紧接着主动发起的最大规模的第五次战役中，反倒是志愿军遭到重大挫折，甚至在战役末期发生了180师遭受重大损失的悲剧。

中国军队的重大牺牲主要是在发起第四次战役以后付出的，在一、二、三次战役中牺牲的团以上干部共28人，其中师级以上仅58师参谋长胡乾秀一人。而自第四次战役以后，牺牲团以上干部187人，师以上干部24人，包括67军代军长李湘、23军副军长饶惠谭、20兵团保卫部长冯建屏、50军副军长蔡正国、39军副军长吴国璋、后勤部副政委邱世清、20军后勤部长喻求清，创下解放军历史上最惨痛的战例。

志愿军被俘人员80%是在四、五次战役中被俘的。本来是中朝联军把美军打回了“三八线”，打到了“三七线”，结果反倒成了美军把中朝联军打回并打过了“三八线”，形成实际控制线。最终也只能在这条实际控制线，而不是原来的“三八线”为界签订停战协议。

本书开篇写到的赫鲁晓夫与彭真发生在布加勒斯特的那一场激烈争辩，便已毫无疑问地表明苏中两大国高层对朝鲜战争是胜是负的真实而清楚的态度。

江青在延安鲁艺时的同学、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职于外交部的张颖晚年披露，1972年8月29日，江青在会见美国作家维特克时，谈到了朝鲜战争。

江青是这样对为她写传的美国作家说的：“这期间中国还有战争哩，比如抗美援朝。你是美国人，也应该知道。美国发动侵朝战争，越过‘三八线’，向我鸭绿江进攻。毛主席号召抗美援朝，四个大战役我们都是全歼敌人，第四次战役彭德怀拒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吃

亏了，美军俘虏我1万人左右……”^①

张颖是原文记录江青的谈话，即使明显的错误也照记不误，所以才出现“四个大战役我们都是全歼敌人”、“第四次战役……吃亏了，美军俘虏我1万人左右”等完全不着调和自相矛盾的话。

事实是，志愿军接连取得了第一、第二、第三次战役的胜利，但并没有形成对美军伤筋动骨的打击，更没有出现在任何一次战役中全歼敌人的战果。

“美军俘虏我1万人左右”——江青显然是指志愿军180师全军覆没一事——是发生在第五次战役，并非第四次战役期间的事。

笔者引用江青对朝鲜战争“黄腔顶板的评述”，实是因为感到好奇：江青不是长期在文艺圈混，替她视若心肝的八个“样板戏”当总导演吗？她一个从未去过朝鲜的妇道人家，怎么会对朝鲜战争形成了这样的结论性认识？

就在第四次战役期间，临时客串护理员的于开志经历了他一生中永难忘记的一件事情。

一天夜里12点多，团部赶来的辎重股长把他从睡梦中叫醒。

于开志睁开眼睛问：“咋个回事？”他还睡得迷迷糊糊哩。

股长说：“赶快带着运输大队，跟我去拉东西。”

也没告诉于开志拉啥，到了地点一看，他才晓得是所野战医院，看见死人就像柴捆子一样码着。他以前也拉过好几次尸体，可从没凑近看见过这么多死人，有的没有头，有的没有上半身，有的没有胳膊，有的没有腿，他都拉过，可那是他第一次看见这么多不成形的尸体堆码在一起，心里还是害怕得不行。

股长问：“小子，怕不怕？”

他赶紧说：“不怕，不怕。”其实心里怕得要命，他对采访者说：“不怕你们笑话我，当时尿都下来了，裤裆里吊了一坨冰！”

股长说：“工兵已经挖好了坑，你让运输大队把尸体运过去，放进坑里码好就算完成任务。”

于开志就和同来的人一起往大车上装尸体。好家伙，那夜里的气温零下三四十度哩，一冻一缩，尸体还剩下一小团，没了水分，轻得

^① 引自张颖《外交风云亲历记》，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很，也不占地方，一架大车能装四五十个。按入朝之初的战场规定，连以上干部和战斗英雄的尸体运回国内安葬，排级干部和战士，都就地掩埋了。后来尸体太多，没法后运，上级的规定也就水涨船高，升级了，先是营级干部，等到51年初夏15军入朝时，得团级干部的尸体才能运回国安葬了，团级以下，都回不了家……

讲到这里，于开志抹去涌出眼眶的两行老泪，发出一声既深且重的叹息：“唉！”

2. 榜样的力量

1951年3月14日，志愿军放弃汉城。

这时距离李奇微从汉城撤退刚刚70天。

重返汉城的李奇微发现，中国人并没有对这座城市进行破坏，就连战前“联合国军”运到汉城，准备用以修复这座遭到轰炸的城市的建筑材料，也好端端地放在原处，只有少许被用去修缮公共设施。除了上次“联合国军”撤出时故意给它造成的严重损害外，汉城几乎是完好地回到了“联合国军”手中。这个巨大的对比，使得顽固反共并憎恨中国人的李奇微，也不不得不对他所遇到的“英勇顽强而又最文明的敌人产生敬意”。

如果说毛泽东的进攻设想让彭德怀都大吃一惊的话，那么，摆好了横扫志愿军汉江防御线阵势的李奇微，是不是也想不到志愿军会在这样的时候大举反攻呢？

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洪学智在回忆录中写道：“立即转移，必然失去汉城，这在政治上是极为不利的。守，又守不住，只能硬着头皮反击了。”

自入朝首战告捷以来，胜利的喜讯频频传来，舆论让彭德怀和他的部下们陷入了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只能胜利，不能失败的怪圈，彭德怀对此心知肚明。

但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很简单，党指挥枪，政治挂帅，军事服从于政治。这也是他们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得以取得最终胜

利的根本所在。明明知道进攻在军事上是很不现实的选择，但这是出于国际政治的需要。彭德怀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但是，目前交战双方的装备水平悬殊，而彭德怀手里能够用来弥补这种差距的资源只有一种——英雄的士兵！

彭德怀盯着双方战场的态势图沉思了很久，在脑海里勾勒出一个初步的战役设想，只能让几十万志愿军将士以身犯险，拼死一搏了。

对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来说，最严峻的第四次战役，就是在这样极不乐观的背景下打响的。

爆发于1951年1至2月间的第四战役，志愿军正逢上朝鲜最寒冷的一个冬天，气温降到了零下40摄氏度，吐出的口水还未来得及掉到地上已经冻成了冰球，落到地上“哒哒”响。

战士们行军走路尚容易熬过，最怕的是因情况不明等原因，让部队停留在雪地里待命，浑身汗水浸透的棉衣顷刻就冻硬了，脊梁上像贴着大冰块。大家都在原地跺脚，以保持不被冻僵，并且互相提醒：“不能睡觉”、“不要坐下”。可是走了几十里已疲劳不堪，加上肚内无物，有的同志挨不住就地睡着了，到前进号吹响时，已长眠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

城市被炸成废墟，农村也难觅几间完好的房子。宿营时能找到一个防空洞或一个散兵坑已成为高级享受。人们只希望能拥有一个草袋子或一捆稻草，否则天亮了很难在雪地里坚持一整天。

在美军占有绝对优势的空中和地面火力面前，志愿军在整条防线上伤亡惨重，险象环生。在双方军力国力悬殊的情况之下，新中国的领袖认为，出奇制胜，乃是志愿军在朝鲜坚持下去的不二法门。

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志愿军原本准备是在1951年春天，再发动第四次战役，并将继续向前推进到大田和安东附近，然后为进攻釜山做准备。他们是在“联合国军”步步进逼的情况下，才被迫提前发起仓促的反攻。在准备不足，粮弹俱缺，部队极度疲劳的逆境中，原定计划中全面进攻的设想，已经变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彭德怀被迫作出了折中调整，他把前线部队一分为二，由韩先楚和邓华在东线和西线分别成立前指，再由总部进行统一指挥。西线负责顶住敌人的主力，东线伺机反攻，争取歼灭部分敌军后，再从侧翼威胁西线敌军，从而制止住敌人的全面进攻。由人民军掩护西线的邓华集团，未能赶上长津湖战役的宋时轮9兵团第26军进驻铁原，充当

总预备队。

就在志愿军各部队进行紧急部署的同时，“联合国军”正在坚决地、近距离地同他们接触，不间断地发起持续的进攻，不给志愿军以任何补充的时间。依靠优势的炮兵、空军和坦克火力，采取“火海对人海”战术，对志愿军进行高密度、高炽烈的火力突袭。

简而言之，就是利用钢铁去摧毁肉体。而坚守在对面阵地上，同他们死缠烂打的好多中国士兵，甚至连鞋子都没来得及补充。于是，他们干脆就用破布包住双脚，继续战斗。在一片火海中，双方军人都表现出了高昂的英雄主义和坚强决心。帮助美国士兵坚持下去的，是一个领先于全世界的工业国家令人生畏的制造能力；而中国士兵所依赖的，则唯有人的意志。

张清劭说：“不管敌人强与弱，咱们部队的士气一直都挺高的。在朝鲜那样艰苦的环境里，说实话，志愿军要没有这样一种必胜的信心，要没有这样一股子精神力量，是绝对撑不下来的。”

张瑞明说：“就在大家因为补给上不来，饿得眼睛发花的时候，干部就和大家聊天，讲共产主义的好。说，你们不知道啥叫共产主义啊，我告诉你们吧，共产主义具体说，就是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住的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吃的呢？顿顿是白面馒头随便拿，小米稀饭随便喝。噫，那可好啦！战士们都兴奋得叫喊起来。干部说，好好干吧同志们，打败了美帝国主义，回家建设共产主义，将来人人都能享这样的福。大家心里暖烘烘的，就盼着这个哪！”

刘兴贵说：“每天都在给我们讲，时时刻刻都在给我们讲，每发生一件事情，就有党员或者班长、副班长来谈话，你们没有经过这样的事吧，有时干部们轮着来，一天找你谈几次的有，十几次的也有。走路谈，吃饭谈，夜里躺下还谈，谈什么呢？谈得最多的就是‘最可爱’，既然咱们都成最可爱了，那么就要弄明白战士为什么最可爱。你打仗不勇敢怎么可爱呢，是吧？第一个就讲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我们是为革命献身，牺牲了重于泰山。我们当兵的不死，就会有千千万万的父老乡亲去死，我们一条命要保护多少万条命。脑子里面，心里面，装的全是这些东西，你想想，战士们的士气，怎么会不高呢？”

“双方士兵所持有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美国人把土改和剥夺外国人的资产，视为共产主义疯狂的证据，却看不到或不愿

看到这些反对剥削与特权的事情，对于那个年代的绝大多数中国普通百姓的意义。曾经拥有灿烂过去的中国文明，也被骄傲的西方人视作没落的劣等文化。当因为巨大落差而萌生的民族张力，与社会主义超常规发展，重排世界座次的许诺结合起来，这支由中国底层农民组成的军队，就因为有了可贵的精神力量，而变得坚不可摧，异常地强韧起来。”^①

王绳金用有力的手势加强自己说话的语气，斩钉截铁地说：“我跟你讲，军队中的共产党员，都是战斗模范，威望高得很！大家都瞪大眼睛看着哩，只要上了战场，冲在最前面的肯定是共产党员。明知道是牺牲，首先上去的也仍然是共产党员。那时候的共产党员，真棒啊！你不服都不行。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榜样的力量！”

沈长江也有同感：“只要不打仗，连排干部和班长总是爱找战士个别谈心，进行教育灌输，可当兵的全都服他们。各级指挥员基本上都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无论哪一支志愿军部队里，只要枪炮声一响，党员干部总是冲在最前面！”

在生命转瞬即逝的战场上，这些有着共产党员身份的大大小的中国军官，从未在士兵们的视野中消失过。跟麦克阿瑟带着一大帮随军记者在天上绕着圈视察战场情况，李奇微挂着手雷坐着敞篷小吉普四处晃荡，大秀行为艺术不同，这些头顶着炮弹在阵地上巡视的中国军官，是在用无言的行动告诉自己的士兵：对不起，弟兄们，我没能力给你们打不完的炮弹，没能力给你一双棉鞋，一件棉大衣，也没能力让你们吃一顿饱饭后再上战场去和敌人拼命，我能做到的，就是和你们同甘共苦，死在你们的前面！

在此前数月的鏖战中，已经交足了学费的美军领悟到，他们的敌人是一支在精神上几乎无法被打垮的军队。正像他们的最高统帅说的：“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对于战争的双方来说，这样的仗，再拼尽全力，不惜以举国之力再接着打下去，就没啥意思了……

^① 引自王树增《远东：朝鲜战争》，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第四次战役初尝败绩的彭德怀，怀着悲愤的心情飞往北京。

专机降落沈阳加油时，前来迎接的军政首长请他到招待所休息吃饭。彭德怀眉头紧锁心情恶劣，说道：“我不吃饭！不休息！你们别管我！”他就站在飞机旁边等，飞机加完油后，立即起飞。

到了北京，他直奔中南海。当得知毛泽东不在中南海而在西郊玉泉山静明园时，他又立即赶往静明园。

因为抵达时毛泽东正在睡午觉，秘书和警卫人员不让他进去。彭德怀大吼一声：“我有急事向毛主席汇报！”不由分说，推门而入。

被惊醒过来的毛泽东一边穿衣服，一边大声说：“只有你彭老总，才会在人家睡觉时间闯进来提意见！”

彭德怀向毛泽东汇报了朝鲜战场的艰难情况，以及与美军作战和与蒋军作战的不同。

毛泽东思考后终于表示，根据现在的情况看：“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

在周恩来主持的军委扩大会上，彭德怀充满感情地说：“国内只知道取得3次战役胜利的一面，并不知道严重困难的一面。第一批入朝的9个军，经过3个月的作战，已经伤亡45000人，另外，生病、冻伤、冻死约40000人。几十万志愿军既得不到充足的粮食供应，更吃不到新鲜蔬菜，一线部队只能靠一把炒面一把雪坚持作战。战士营养不良，面黄肌瘦……”

有些领导开始强调自己主管部门的困难，彭德怀实在听不下去，猛地站起身大喝道：“这也困难，那也难办，你们整天干的是做什么？我看就你们知道爱国，几十万志愿军战士他们不知道爱国吗？你们到朝鲜前线去看看，战士住的什么？吃的什么？穿的什么？这些可爱的战士在敌人飞机坦克大炮的轮番轰炸下，就趴在雪地里忍饥挨冻，其艰苦程度甚至超过了红军时期。经过几个月的苦战，伤亡了那么多战士，他们为谁牺牲，为谁流血？战死的、负伤的、饿死的、冻死的，这些都是青年娃娃呀！难道国内就不能采取紧急措施吗？”

人们鸦雀无声，屏息静气。

回到住所，彭德怀怒气未消地对妻子浦安修说：“前线战士那样苦，北京还到处跳舞！我这个官佬当然饿不着冻不着，可那些年轻的战士呢？我这个司令官不能睁着眼睛，不为他们说话呀！”

彭德怀此次回京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促使中央军委加快速度，

作出了有利于改善前线后勤条件的一系列决定。

几天之后，他又匆匆赶回到几十万大军正在浴血奋战的地方。

3. 先胜后败

1951年4月19日深夜，彭德怀向全军发出政治动员令：

第五次战役就要开始了！大量歼灭几个师的光荣任务，已经落在同志们的肩上！

这次战役的意义十分重大，因为它是我军取得主动权与否的关键，是朝鲜战争时间缩短或拖长的关键。

我们要力争战争时间缩短，因为它符合中朝人民的利益；我们要力争这个仗打胜，因为它有胜利的条件。

我们向敌人出击了，为中朝人民立功的时机已到！

我们的战斗口号是：全体动员起来，发扬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精神，争取每战必胜！保持革命光荣传统！

4月22日傍晚，中朝军队14个军（内含人民军3个军），沿着200多公里宽的战线同时发起了进攻。根据预先确定的正面突击和战术分割包围相结合的作战原则，部队采取多钳合击的方式，勇猛向前穿插。宋时轮第9兵团和39军首先在战线中央击溃了南韩军第6师和美第24师，将“联合国军”的战线分割成两部分。东西两线的中朝军队乘胜向后撤之敌猛攻，在为时7天的第一阶段攻势中，全线推进了70至80公里，在战役进攻的总体上，抢得了先手。

但是，由于新入朝的部队缺乏对美军作战的经验，也没有经受过美军超出想象之外的火力攻击，有的指挥员不敢大胆穿插迂回，分割包围敌人。结果第64军被敌人火力阻住，未能穿插前进。而第65军的2个师也尾随而上，致使5个师5万多人拥挤在临津江南岸约20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域内达两天之久，持续遭到敌人飞机、大炮、坦克密集火力的攻击，战场上真正成了尸山血海。

后来，部队虽经艰苦奋战，得以继续前进，可是汉城以北的敌军主力已经全部撤走，让志愿军扑了个空。等到4月29日，第19兵团赶到，进抵汉城北郊，第3、第9兵团和人民军东线部队也进抵“三八线”以南。可是美军却坚守汉城，在城市东北西三面组成密集火网。这时，志愿军自身携带的粮弹基本已用尽，攻击汉城显然是有心无力，彭德怀只得被迫下令停止进攻，部队后撤，转入休整。

第一阶段的进攻遭受了挫折，虽然东西两线一共歼敌23000余人，但别说“大量歼灭几个师的光荣任务”未能完成，连成建制地消灭一个团，也未能实现。

从彭德怀、邓华、洪学智、韩先楚、杜平等志司高级指挥员的回忆录、传记里可以看到，关于第五次战役打不打的问题，是有不同意见的。在最高的决策会议上，彭德怀严肃地问他的几位副手，这个仗你们到底想不想打？洪学智副司令员表示反对，他主张把对手再往北放，直到战机形成，供应充足时再打。洪学智的理由是：如果现在就打，敌人一撤，我们士兵的两条腿是追不上美军汽车轮子的。追得太远，战线一长，部队供应就跟不上。等到敌人反击时，情况就不同了，我们还是跑不过敌人，再加上粮草弹药的匮乏，只能被动挨打，这种情况在第四次战役时已经出现了。毛主席要求我们“成建制地消灭敌人”，这样的打法恐怕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后来的事实果然被洪学智不幸言中。

此后，洪学智又单独向彭德怀提出最后一次反对打第五次战役的意见：“彭老总，我已经向你提过两次了，我现在再向你提一次，当然，打不打，最后由你决定。”

邓华副司令员和解方参谋长也对彭德怀的方案持反对意见。

然而，彭德怀坚持己见，并将自己的意见电告了毛泽东。

结果，毛泽东批准了他的作战方案……

解方参谋长在检讨会上指出：“主要是敌人已根据志愿军擅长夜间穿插的战术，采取了节节撤退的战法。敌主力白天撤退，担任掩护的摩托化部队和坦克黄昏撤退，每天最多只退20公里——恰恰是志愿军一夜行军的路程——结果志愿军攻击部队夜间抓不住敌人，天亮后又正好进至敌预设阵地前，反遭敌猛烈炮火的袭击。从战役部署上看，主要是志愿军各级指挥员仍沿用国内战争中打大歼灭战的方法，口张得太大，预定的突击距离太远。同时敌人根据我军的攻击特点，

不断地改变战术，建立了兵力和地空火力密切配合的纵深防御。我军却还是采用过去的尖刀战术，以密集兵力突破一点，这就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敌人地空火力的密集封锁，尽管付出很大的代价，在整个战线上，也只能形成一线平推，不能重歼敌人的主力。”

5月16日晚，中朝军队共13个军（内含人民军4个军）发起了第二阶段攻击。西线杨得志第19兵团佯攻汉城，以吸引美军主力，中线王近山第3兵团实行中央突破，切断了敌东西线的联络。担任主攻的第9兵团和人民军3个军在东线开始分割包围南韩军。由于采用了傍晚突破，夜间向纵深穿插，天明实现合围的方式，加上突击部队十分勇猛，东线的南韩军迅速崩溃，一泻千里。

第27、20军发起进攻后，第一夜就推进了25至28公里，至5月18日就切断了南韩军4个师的后路。这时，南韩军又习惯性地采用遭到沉重打击即化整为零的老办法，丢弃全部车辆和重武器，分散逃入深山。志愿军虽缴获了4个师的重装备，却由于东线山高林密，一时搜剿不易，只歼敌17000余人。还眼睁睁地看着缴获的重装备被美军飞机炸毁。

从5月16日至21日，中朝军队经5天连续进攻，拼尽全力，也只在东线普遍推进了50至60公里，在敌方战线上打开了一个大缺口。可是在进攻中，由于我方供应困难，不得不停下三天等待补给。美军和南韩军各一个师则趁机以摩托化行军，仅十几个小时，就前进了100多公里，迅速堵住了缺口。

这时，彭德怀鉴于部队疲劳和供应困难，已无法发展战役胜利，决定第五次战役就此结束，将主力转移于“三八线”以北休整。综合两个阶段的作战，志愿军共歼灭“联合国军”46000余人，俘敌9800余人，击毁和缴获汽车1000多辆，坦克270辆，击落敌机236架。

可是，就在志愿军奉命北撤时，却出现了一场大悲剧！

全军上下在后撤途中，由于普遍出现麻痹思想，当时志愿军还有历次战役累积下来的近万名伤员未能转移，也严重影响了部队的行动。这时，李奇微却根据对我军“肩上后勤”能力的计算，认为我军已进攻5天，粮弹基本耗尽，又没有得到补充，锐气已尽。于是使用以逸待劳的美军7个师为主力（每师约1.8万人），连同南韩军等部共13个师，于5月22日开始全线反扑。

这次由李奇微指挥的“联合国军”的大反攻，改变了上次战役



中稳扎稳打的战术，大胆地以坦克集群和摩托化步兵组成的特遣队，在大批飞机掩护下，沿公路快速向我方纵深迅速穿插，抢占桥梁和渡口，配合后续部队包围正在向北后撤的志愿军各部。

由于部队未安排好交替掩护，尤其是在要命时刻，王近山的第3兵团司令部又来了个无线电静默，整整三天三夜与所辖各部失去联系，志愿军中部战线顿时大乱。加上不少刚从国内上来的指挥员缺乏现代战争的知识，在前沿布置临时掩护部队时不注意破坏桥梁，也未很好地以火力封锁公路，而是把兵力集中在山头上，准备敌人到来后固守。结果敌军一旦突破前沿，就能于最快的时间在我方纵深肆无忌惮地穿插、推进，有的地段，竟插入我军后方达六七十公里。大量志愿军被敌人打散，包了饺子。

形势急转直下，至5月24日，志愿军第12军军部和下属的两个师，第9兵团的27军和第60军所属的180师被敌人切断在“三八线”以南，面对突然出现的严峻局面，被包了饺子的志愿军部队大都表现出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由于敌军特遣分队虽然机械化程度高，但兵力不多，敌步兵又普遍缺少近身肉搏的勇气，主要依赖火力进行封锁，拦截，突围坚决的部队，都获得了成功。

如在长津湖遭受重创，刚刚得以恢复的第9兵团27军，当发现敌坦克和空降兵已插入自己的后方，全军已基本断粮后，军长彭德清与政委曾如清决策果断，沉着冷静地组织部队交替掩护，寻敌空隙，灵活地绕路转移。

这一路上究竟有多苦，迟浩田晚年有回忆，他说：“那时连续下大雨，对我们伤害很大，部队拉肚子的特别多，等到往后撤的时候，我这个教导员也拉上了，没办法呀，就和拉肚子的战士们一样，大家都把裤子脱下来，挂在肩膀上，边走边拉。这样倒好，大雨一冲就干净了。后来撤到元山，部队休息了很长时间，才恢复过来，一个个瘦得不得了！”

谭秉云，也正是在这次大撤退中，把一支美军坦克部队堵住了8个钟头，才被彭德清军长誉为“最大的救命菩萨”。

虽说苦不堪言，但无论怎样，彭德清的第27军总算是建制完整地撤回到了“三八线”以北。

第12军运气没有27军好，遭受了不小的损失，但主力也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尤其是该军第91团，在敌纵深90公里处被包了饺子，

可是该团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一路寻野菜充饥，夺取敌人的武器补充自己，并利用夜间和敌人混在一起，夺路突围，5天后终于和大部队会合。

此役最悲剧的无疑当数180师，由于该师师长郑其贵指挥失当，导致全师11000余人中损失7000多人，其中有5000余人被俘，包括代政委吴成德。这也是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人员被俘最多的一次！

形势极其险恶，为了尽快扭转因敌人凶猛反扑而出现的混乱局面，志愿军前敌领导在组织节节阻击的同时，又在后方匆匆建立起三道防线，并迅速调集兵力，待敌深入到“三八线”以北地区时，再进行大规模反击。为此，正在抢修机场的47军紧急调赴前线，第20兵团也由国内紧急入朝。

对此，李奇微认为：“敌人再次以空间换取了时间，并且在大批部队和补给完整无损的情况下得以安然逃脱。”

他和新任美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都估计中朝军队即将举行大规模的反攻，因此于6月10日下令全线转入防御。第五次战役原本由彭德怀主动发起，最终却由李奇微来宣布结束。战场的主动权，也随之落到了美国人手里。

“联合国军”在反攻作战中也损失严重，据我方统计，第五次战役历时50天，共歼敌82000余人，我方损失85000余人。特别在战役后期，部队在后撤中竟多达2万人失踪。其中第3兵团因司令部电台保持静默，导致部队出现极大混乱，加上内部一些潜伏的坏分子，乘机叛逃，因而失踪人员最多，达16000人，这也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损失最惨重的一次。

在战役检讨会上，韦杰成了众矢之的。

“韦杰，你这个军长是怎么当的？命令部队撤退时，你就照转电报，为什么不安排好？你们那个180师是可以突围的嘛，你们为什么说你们被包围了？你们并没有被包围，敌人就是从前面过去了。晚上还是我们的天下嘛。后面也没有敌人，中间也没有敌人，就是过去了嘛，晚上完全可以过来嘛，为什么要说被包围了？哪有这样把电台砸掉，把密码烧掉的？”彭德怀毫不留情，当面质问韦杰。

第38军军长梁兴初在第一次战役时因穿插不到位，放跑了敌人被彭德怀骂得来狗血淋头，这一次第60军军长韦杰一个整师受重创，还能有他好受的？



彭德怀一通怒火出膛后，也作了自我检讨，说：“关于第五次战役的打法，洪学智曾向我提过意见，我没有采纳。现在看来，洪学智的意见是正确的，我要对战役失利负主要责任！”

更要命的是彭德怀当众把韦杰骂过之后，总参又发来电报，命令仅韦杰立即回京，向毛主席单独汇报战况。^①

据说，韦杰上了飞机，便紧闭双眼，一言不发，脚杆微微颤抖……

事实上，第五次战役的失利，主要原因还在于志愿军司令部是在力不从心的情况下发动的此次战役。此外，在战役组织过程中，第3兵团代理司令员王近山和180师郑其贵师长应负主要责任。王近山的电台保持静默后，所辖各部在紧急后撤过程中，战术协同上严重失误，导致后撤部队一片混乱。当时的180师直属兵团代理司令员王近山指挥，并不在60军军部掌握之中。60军的179师、181师，也都先后被志司调走，把韦杰调成个光杆司令。

经过调查后，韦杰仍然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并未因此受到影响。此后韦杰能被授予中将军衔，便是证明。

但180师的战俘问题，却成了韦杰将军心中永远的痛。

后来的60军重整旗鼓，走出了受挫的阴影，在后面的几场战斗中打得十分出色，但这已是韦杰将军离开之后的事了。

第五次战役志愿军遭受重创，对毛泽东也有所触动。

战役结束后，他陆续召见了邓华、解方、韦杰等4位军长，通过听取汇报，才比较清楚地认识到志愿军为什么一次难以歼灭美军一个团的问题。为了改变战略战术，1951年5月26日，他特地给彭德怀发了如下电报：

德怀同志：

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这是因为美军在现时还有颇强的战斗意志和自信心。为了打落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

^① 笔者注：在韦杰之前，对于第五次战役遭挫负有重大责任的王近山，也蒙毛泽东“个别谈话”。

整营，也就够了。现在我第一线有8个军，每个军歼敌一个整营，共有8个整营，这就给敌以很大的打击了。假如每次每军能歼敌两个整营，共有16个整营，那对敌人的打击，就更大了。如果这样做办不到，则还是要求每次每军只歼敌一个整营为适宜。这就是说，打美英军和打伪军不同，打伪军可以实行战略或战役的大包围，打美英军则在几个月内还不要实行这种大包围，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即每军每次只精心选择敌军一个营或略多一点为对象而全部地包围歼灭之。这样，再打三四个战役，即每个美英师，都再有三四个整营被干净歼灭，则其士气非降低不可，其信心非动摇不可，那时就可以作一次歼敌一个整师，或两三个师的计划了。

过去我们打蒋介石的新一军、新六军、五军、十八军和桂系的第七军，就是经过这种小歼灭战的一段路程。

但是还不够，还须经过几次战役才能完成小歼灭战的阶段，进到大歼灭战的阶段。

至于打的地点，只要敌人肯进，越在北面一些越好，只要不超过平壤、元山线就行了。

以上请你考虑电告。

毛泽东

5月26日

从初入朝时的一战歼灭美军三四个整师，到现在要求每个军歼灭美军一个整营，毛泽东审时度势，以其特有的语言风格，给中国军队在朝鲜今后的作战重新制定了一个基本的指导方针，这就是著名的“零敲牛皮糖”战术。

毛泽东的这封电报十分重要，而且非常及时。他根据新的战争实践，及时总结经验和教训，并进行了新的思考和探索。常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在军事科技手段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战争中，以身作则，带头克服志愿军指挥员们普遍存在的经验主义，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4. 一个体面地走向谈判桌的契机

整个朝鲜战争期间规模最大的第五次战役结束以后，中美两国综合国力上的差距，在战场上更加清楚地体现了出来。

最能说明这一严峻问题的是，由于无法保障后勤，彭德怀拟定的第六次战役，也不得不被迫取消。

在长期的国内革命战争中，人民军队实行的是人民战争基础上的兵站跟进式保障，形成了人民群众“车轮滚滚支前”，保障军队作战的壮观场景。

陈毅元帅说过一句名言：“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

然而，这一体制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却受到了严峻挑战。

由于志愿军是第一次出国作战，第一次与现代化的美军作战，第一次在国外特殊的地理条件下作战，在高峰时要保障180万军队作战，因而，这种军民结合的后勤模式虽然在保障部队供应上做了最大努力，但保障的可靠性、及时性等方面，远远不能适应作战的需要。

由于战争爆发突然，各级后勤出国前临时扩编，人员缺口大，装卸、担架等勤务均由民工担任，有限的后勤力量被分散在从军区到团的六七个保障层次：后勤与参战部队人数之比为1：40；1951年后虽增至1：10，但无论人数还是素质，都不能适应作战要求。

志愿军机动保障能力差，后勤技术装备数量少、质量差、不配套，大量工作依靠人背马驮进行。兵团以下后勤装备少，力量弱，独立保障能力低，平均400人编配一台运输汽车，其他技术装备更为少见，无法保障穿插、迂回等机动作战，部队只能依靠携运物资保障一周的作战行动，被敌人称之为“礼拜攻势”。

对于“礼拜攻势”的影响，时任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中指出：“第二次战役中，我们原计划的以两个军、两个师的兵力担任西线的战役迂回任务，就是因为所需粮食运不上去，被迫取消了两个师，影响到取得更大的战果。东线部队入朝仓促，准备不足，就更困难了，部队不仅吃不饱，而且冬装太薄，难以御寒，出现了大量非战斗减员……随着战线南移，运输线不断延长，后勤供应更加困难。第四次战役时，粮弹补给的困难尤为突出。例如，因为炮弹不

足，使进攻的步兵得不到有力的炮火支援而大大影响了战果。步兵因弹药缺乏，有时不得不用刺刀与敌人拼杀。第五次战役中，我军在县里地区突破敌人防线后，因等待补充粮弹，曾停止进攻3天，失去了有利战机。我军还包围过许多团、营规模的敌人，也因为火力不足，没能予以歼灭。有的部队因供应不上，被迫后撤，严重地影响了作战任务。总之，在运动战阶段，志愿军因粮食、弹药等供应不及时，在作战中或被迫停止进攻，或加重了自己伤亡的例子，是相当多的。”

9月7日，彭德怀在给聂荣臻的电报中说：“早晚秋风袭人，战士们着单衣，近旬病员大增，洪水冲，敌机炸，桥断路崩，存物已空，粮食感困难，冬衣如何适时运到，在在逼人。”

除了国力不继，难以给志愿军提供充足的物质保障，对后勤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也是一个关键。

聂荣臻元帅在他的回忆录里也谈到了朝鲜战争时的后勤工作，他写道：“严格地说，我们是从抗美援朝战争中，才充分认识到后勤工作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的。打一场现代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力物力的竞赛。”

负责志愿军后勤工作的洪学智副司令员在中朝两军联席会议上作后勤工作总结报告时说：“在朝鲜战场上，美军13个后勤人员保障1个兵，志愿军则是1个后勤人员保障6至10个兵。”

迟浩田说：“洪学智副司令员到下面调查，问大家：‘你们最需要什么？’我们的战士回答只有两句话：‘枪有弹，肚有饭，我们就什么都不怕！’”

1951年5月下旬，一次投入了志愿军70万兵马的第五次战役激战正酣，毛泽东便主持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决定了“边打边谈，争取谈判解决问题”的方针。

第五次战役尚未结束，朝鲜半岛上的局势却已经变得来更加严峻的时候，毛泽东急邀金日成于6月3日访问北京，对面前局势进行紧急研议。研议的结果是立即派高岗和金日成一同赴苏，同时通知在苏联养病的林彪也参加会谈，请求斯大林出面斡旋，力争尽快停战。

可是，斯大林仍然希望战争继续打下去。

6月5日，他致电毛泽东：“持久的战争第一能够使中国军队在实战中学习现代战争；第二将会动摇美国杜鲁门政府和打破美英军队的



军事神话。由于几度后撤，志愿军的士气已经出现了问题。如果不准备和不实行对敌人的重大打击，消灭其三四个师，就不可能消除这些不健康的情绪。”

但是到了6月10日，美军已经反攻到“三八线”以北的汶山、金化一线；6月11日，美军攻占铁原，土耳其旅攻占金化，韩国第1军攻占杆城、进逼高城。志愿军则全线紧缩兵力，拼死防守。在铁原担任阻击的63军更是伤亡惨重，完全丧失了战斗力。

当时任19兵团司令后任志愿军司令员的杨得志晚年回忆：

彭老总在兵团几乎没有停，他要亲自看一看刚从第一线下来的战士们。我们的战士当时真可以说是衣不遮体了，火烧的，子弹穿的，荆棘挂的，一丝一缕，上下尽是“窗户”。有的战士上身赤背，下身只有1条短裤。他们的头发长长，胡子长长。

彭老总来到战士们中间，疼爱地看望他们。拍拍这个露出肩头的肩膀，抚抚那个络腮胡子的面颊，战士们高兴极了。但是，当彭老总对大家说“同志们，你们打得好，打得很好！你们吃了不少苦，我们牺牲了不少好同志。祖国和人民忘不了你们，祖国和人民感谢你们！”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战士一下子都抱在了一起，他们用哽咽的声音高喊着：“祖国万岁！”

在临离开63军的时候，彭老总问傅崇碧军长有什么要求，傅崇碧说：“部队减员太严重了，有的连队只剩下一两个人。”

“给你补，给你补些老兵，能打仗的老兵。”彭老总说，“你还要什么？”

傅崇碧说：“有兵，就什么也不要了。”

“不，”彭老总说，“要给你们发新衣服，新装备。祖国人民送来了大批慰问品，有酒、有烟、有各种罐头，很快给你们运来，这些东西一定要先发给战士们——当然，你们这些首长也有一份喽！”

这仗照这样继续打下去，中国军队打得过二战的胜利之师美国军队吗？会不会引起美国政府向中国公开宣战，从而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

对这些重大问题，毛泽东并不是没有担心过。他曾在争论激烈

的出兵会议上对这场中国人即将投入的战争设想最坏的局面：“我们认为最不利的情况，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

眼下朝鲜战争的局势，显然不是毛泽东希望看到的。

6月13日，高岗当面向斯大林提出争取以“三八线”为界，举行停战谈判。

斯大林情绪颇大地质问道：“你们为什么要停战？害怕打下去的是美国人，不是我们。我了解美国人的心理，你们打死一名美国兵，他们多往国内送回一具棺材，他们国内反对这场战争的压力也就越大，最后要求停战的一定是美国人。”

当高岗和林彪一再强调种种困难，战争已经无法再坚持打下去之后，斯大林不得不说：“如果你们一定要停战，那就试一试吧。”

毛泽东接到斯大林同意停战的电报，立即下决心停战，马上致电高岗与金日成，就与斯大林协商停战的办法发出指示：“现在由我们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对朝鲜和对中国都是不适宜的，因为在最近两个月内朝鲜军队和中国志愿军都是采取防御态势。最好这样做：一、等待敌方提出；二、由苏联政府根据凯南的声明，向美国政府试探停战问题。”

而美国业已解密的档案证实，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早在6月1日就电令李奇微：“1. 缔结合理的停战协定，终止敌对行动。2. 在适于行政管理及军事防卫的北部边界线以南地区，建立领导整个朝鲜的大韩民国政权，而这条边界线不得划在‘三八线’以南。3. 为分阶段从朝鲜撤出非朝鲜籍武装部队做好准备。4. 强化南朝鲜武装力量，使之足以阻止或击退北朝鲜的再度侵略。”

李奇微虽然极为不满，也只得执行命令，他可不愿像前任那样拿自己的脑袋往石头上硬碰，于是立即下令全军转入战略防御。6月15日以前美军的战斗，不过是为了夺取有利防御的地形目标而已。

随着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朝鲜战场上的形势更趋持久化，使美国不仅承受了更大的政治压力和经济负担，也违背了美国以欧洲为重点的国际战略计划。在朝鲜继续打下去无力取胜，长期僵持，则消耗不起。因此，美国不得不考虑调整朝鲜战争策略问题。

洪学智回忆说：“那时候美国的战略重心还是放在欧洲，发生在亚洲的朝鲜战争，美国负担很大，很多海空力量都牵扯进来了，



打到后来甚至连弹药都发生困难了，因为他原来打的都是二次世界大战剩余下来的物资，差不多已经打光了，所以啊，他那时候急于要停战哩。”

中国军史家齐德学将军说：“第五次战役打完，5月15、16号两天，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专门开会研究停战的问题。会后特地发了一个备忘录给李奇微，此次会议确定的战略目标是：沿‘三八线’一带，通过谈判，实现‘体面的停战’。”

停战，成了战争双方梦寐以求的共同目的。

接下来让双方费尽心机的关键之点是：如何才能为自己一方争取到更多一点“体面”。

位于美国纽约海滨长岛的伦克福庄园，那时候是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周末度假的好去处。

1951年5月31日，一位神秘的不速之客突然造访了这里。

此人就是美国国务院资深顾问，美国政府曾派驻莫斯科大使、著名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

凯南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谋求朝鲜停战谈判。

在伦克福庄园，凯南开门见山，向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雅可夫·马立克表示，美国政府准备与中国讨论结束朝鲜战争的问题，愿意恢复到战前状态。

6月23日，在联合国新闻部举办的一个名为“和平的代价”的广播节目中，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发表了这样一段演说：“苏联人民相信，保卫和平的事业，是能够做到的；苏联人民进一步相信，目前最为尖锐的问题，在朝鲜的武装冲突问题，也能够得到解决。苏联人民认为，作为实现停火和停战的第一步，交战双方应当开始进行讨论，以便为双方从‘三八线’撤出武装力量做好准备。采取这一步骤可能吗？我认为，这是可能的。假如大家真诚希望结束朝鲜的流血战争的话。”

马立克的演说，对交战双方来说，都是一个使自己能够“体面地走向谈判桌的契机”。

短短24小时后，马立克奉斯大林之令，在联大发言时更进了一步。

他说：“苏联政府相信，在朝鲜的交战当事者之间开始进行停战谈判的良好时机已经到来。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以及双方

尽快把军队撤离‘三八线’。”

马立克话音一落，杜鲁门当天下午即发表声明：“我们现在准备参加在朝鲜和平解决战争的谈判，就像我们一直准备做的那样。”

这一重大消息很快传递到北京。

6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马立克的建议是公平而又合理的，中国人民完全支持马立克的建议，并愿为其实现而努力。”

这场战争的真正策划者斯大林，此时又以局外人和调停者的身份，在世界舞台上公开进行和平使者的表演。

据苏联驻朝大使拉祖瓦耶夫观察：“朝鲜领导人对于停战谈判有戒心，尽管他们没有公开和直接地表达出来。”

金日成相继与毛泽东、斯大林会谈后回到平壤，心情十分沮丧。

他认为苏联在联合国的代表马立克6月23日呼吁停战谈判的发言“是中国力图达到的停战和摆脱援助朝鲜这一负担的最明显的表示”，甚至在马立克发表声明之后的几天时间里，北朝鲜的媒体以及其他宣传机关，对这样重要的问题都“没有进行详细的解释，也没有发表任何评论文章”。

虽然朝鲜领导人后来也“认识到了缔结停战协定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必要性”，但他们认为中国代表团（主要是其负责人李克农）为能达成停战协定而对美国人过分宽容和让步。同时也抱怨中国人在谈判过程中没有及时地、充分地听取朝鲜代表的意见。

特别是当7月27日毛泽东通知金日成，如果美国人坚持现有的前线作为分界线的话，那么中国人认为可以向美国人做出让步时，金日成表示出了极大的不满。他立即答复说：“这种让步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意味着对朝鲜的“严重的政治打击”。金日成甚至对朴宪永说：“我宁愿在没有中国人的帮助下继续进行战争，也不愿意做这种让步。”……苏联大使还注意到，朝鲜人对中国人的态度明显地冷淡了，朝鲜更加坚定了依靠苏联人的方针。^①

然而，朝鲜战场上的局势却不以金日成与毛泽东的意愿为转

^① 引自沈志华《朝鲜战争期间中朝高层的矛盾、分歧及其解决》，发表于《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4期。

移，中朝双方对谈判的态度，在斯大林的操控下，最终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1951年7月10日开始谈判，斯大林有令：“实行强硬路线，不能有急于结束谈判的表现。”

而毛泽东制订的“边打边谈，争取谈判解决问题，把美国人拖在远东”的策略，也恰恰是最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

斯大林致电毛泽东说：“事实证明你是对的。这场战争已经大伤了美国的元气。对美国必须强硬，中国同志必须了解，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中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美国人是一批商人，每个美国军人都是投机商，都做买卖。德国人20天就占领了法国，美国兵已经打了两年了，却对付不了小小的朝鲜，这算什么实力？”

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之下，始而开城，继而板门店的谈判自然就变成了旷日持久的马拉松比赛，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谈判代表团和中朝联合代表团双方一谈就吵，吵了两年多，战场也打了两年多，什么问题也谈不成。

中方翻译过家鼎先生晚年回忆：“双方代表从不握手或寒暄，不苟言笑，态度十分严肃。会议桌上也不放饮料，只有双方为自己提供的纸笔。1951年8月10日那天上午，出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美方首席代表乔埃与朝中方面首席代表南日面对面地坐着，你瞪着我，我瞅着你，谁也不一言不发，全场鸦雀无声，相持达2小时11分之久，然后各自起身离去。这在世界外交谈判史上，是空前的，也是唯一的。”

战争持续到1952年下半年，在双方基本取得力量平衡的同时，板门店的停战谈判却陷入了僵局，问题竟然胶着在毛泽东起初认为最容易解决的战俘问题上。

美国人提出了“自愿遣返”的原则，中国方面则坚持必须一个不剩，全部遣返。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互不让步，就因为这个原因，枪炮声又轰鸣不息了一年多。

与此同时，斯大林从苏联与美国对抗的全球战略出发，竭力鼓动毛泽东把战争继续打下去，在谈判问题上坚决不能向美国人让步。

对于斯大林来说，最有利的局势就是处于不战不和的状态，既不扩大战争——以免将苏联卷入冲突，也不实现停战——以便把美国长期陷在朝鲜战场这个大泥坑里。

可是，当初踌躇满志，主动打响第一枪的金日成同志此刻却无论如何也撑不下去了——小小的北朝鲜毕竟是防击打能力太差的轻量级选手，在重量级对手的不断重击下，咬紧牙关苦熬了两年多，摇摇欲坠，如今再也扛不住了。

而毛泽东此时则主张把战争继续下去，在谈判条件上坚决不能让步。在战与和的两手准备中，毛的策略是：只要条件有利，就把战争坚持下去，直到对方让步为止。

1953年2月7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号召全国人民要加强抗美援朝斗争。

“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蛮横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毛泽东强调指出，“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罢，就打下去，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毛泽东这可不是说说罢了，此时他已经完全具备了和美国人继续打下去的实力，苏联提供的大规模军事援助，使志愿军的战斗力大增。在苏联人的帮助下，中国人的空军不仅上了天，还出手不凡，弄出了大动静。为了粉碎美国人针对中国人也来一个仁川登陆的野心，志愿军平均每天有50万人昼夜突击施工，在朝鲜政府的大力支援下，经过4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到1953年4月底，圆满完成了沿“三八线”的建筑堡垒工事的任务，并且在东西海岸各自设置了纵深10公里的两道防御地带，动用人力6000多万个，挖掘坑道8090条，总长720公里。挖堑壕3100多公里。构筑了605个永备水泥堡垒工事及大量炮火掩体。这样，在东西海岸和正面1100多公里的弧形防线上，形成了以坑道和钢筋水泥工事为骨干支撑点的防御体系。

在如此铜墙铁壁面前，美国人很难寻找到下手的机会。

与此同时，志愿军铁道兵和工程兵部队对北朝鲜的交通网络进行了全面的改造和完善，新建铁路龟城至行川段、价川至殷山段于4月中旬先后通车，使朝鲜北部三大铁路干线联为一体，并在原有铁路线上新建便桥35座，迂回线路4处。到3月底，新建和加宽公路566公里，架设公路桥47座。志愿军和人民军交通运输困难的局面有了极大改善。物资储备更是有了很大的增长。到1953年2月底，物资囤运任



务已经超额完成，在前线共囤积弹药123800多吨，粮食2.5亿公斤，可供全军食用8个半月。

兵强马壮，粮弹充裕，再加上清一色火力凶猛的苏制杀器，这就更加坚定了毛泽东继续和美国人打下去的信心。

可是，金日成却希望接受美国的停战条件，尽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他原指望至少不晚于5月份与美国人签订停战协定，并以此来计划安排1952年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但中国方面却因战俘问题和美国人产生争议，双方寸步不让，使停战谈判拖延了下来。

拉祖瓦耶夫大使在向莫斯科呈递的1952年第二季度工作报告中称，“这使朝鲜领导人感到莫大的失望。金日成建议中国同志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并争取签订停战协定”。

拉祖瓦耶夫还称，“金日成在与南日讨论谈判陷入死胡同的原因时明确表示了这样一种看法：应该建议签订停战协定，而把所有未解决的问题移交给政治会议去研究。金日成认为拖延谈判是不利的，因为美国空军正在继续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造成惨重的损失。他看不到中国继续就战俘问题进行争论有什么合理性，因为这些争论正在导致更大的损失。金日成还认为：中国志愿军的大多数战俘都是以前蒋介石军队的人，政治上不可靠，所以为了他们去斗争没有特别的意义。金日成指示南日弄清楚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并建议以李克农的名义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金日成还直接向毛泽东表示出不愿意继续打下去的意见”。

在朝鲜方面的强烈要求下，7月3日，中朝代表团提出了停战新建议，在原来的条件上作出了一些妥协，包括不再坚持遣返全部战俘。

这同时也是中国向朝鲜作出的妥协。

但此时在战场上占了上风的美国人又不干了，他们不顾中朝方面的一再退让，于7月13日提出了总共遣返83000人，包括人民军被俘人员的80%和志愿军被俘人员的32%的概数（其余的68%选择去台湾），并声称这是“最后的、坚定的、不可改变的方案”。

在战俘的释放问题上，中朝之间持有不同的立场。除了政治上的考虑外，还有一个更为实际的原因，即双方的战俘政策大相径庭。

由于受国内战争传统做法的影响和缺乏国际斗争的经验，当然也因为极度缺乏物资的志愿军无力承担那么多战俘的消耗，所以中方一开始就从未想过扣留战俘。相反，还在对方未曾释放一名战俘的情况

下，单方面不断地用主动释放战俘来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一支仁义之师。毛泽东明确指示彭德怀：“释放一批战俘很对，今后对战俘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

这样一来，志愿军在整个战争期间对战俘是一边抓，一边放，等后来到了谈判桌上，手里捏着的战俘，自然就不多了。

此外，1951年11月中朝商定，为便于战俘的管理工作，以后南朝鲜战俘一律交给人民军看管，志愿军只负责管理其他国家的战俘。这样一来，中方实际看管的战俘就更有限了。因为在入朝初战与被称为最后一仗的金城反击战，志愿军都是选择性地把铁拳砸在南韩军头上，俘获的战俘也以南韩军最多。这样一来，当志愿军代表坐到谈判桌旁，看到美国人把战俘当作一张牌来打时，才发现自己手中没有多少本钱。

这也大抵是中国坚决主张“全部遣返”的原因之一。而朝方出于战后经济建设需要劳动力的考虑，则扣留了13094名南韩军战俘；此外，还扣留了战争前期从南朝鲜抓来参加人民军的数万名壮丁。在这种情况下，金日成当然不可能坚持“全部遣返”的原则。

在咄咄逼人，绝不让步的美国代表面前，中国领导人的态度十分坚决。7月15日，毛泽东在致平壤的电报中，向金日成说明，在“敌人狂轰滥炸的军事压力面前接受其挑拨性和欺骗性的建议，对中朝方面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极为不利的。战争继续下去，固然会给朝鲜人民和志愿军带来进一步的损失，但中朝人民也在战争中加强了自己的实力，鼓舞着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对侵略战争，并推动着全世界保卫和平运动的发展。战争把美国的主要力量吸引在东方并不断蒙受损失，必然会使苏联的建设和世界革命运动得到更大的发展，因而也就推迟了世界大战的爆发”。

毛泽东向金日成保证，中国人民愿意尽一切可能帮助朝鲜人民解决困难。总之，“在现时形势下，接受敌人这一方案必然要长他人志气，来灭自己威风”。

最后，毛泽东在表示中国将“竭尽全力保证朝鲜人民渡过难关”的同时，也告诉金日成，“如果我们没有能力解决您的问题，那我们当转报菲利波夫同志征求他的意见，得复再告”。

同日，毛泽东也致电斯大林，“主张坚决拒绝敌人这种挑拨性和引诱性方案”，并表示准备进一步扩大战争。



毛泽东还通报说，“金日成同志对此有不同看法”。

金日成在同一天致斯大林的电报中，则对毛泽东的态度不无抱怨。

致尊敬的大使同志，请转告约·维·斯大林同志下述电文内容：

致亲爱的约·维·斯大林同志：

我认为有必要向您，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报告下述情况：根据对朝鲜状况的总体分析，不排除停战谈判有可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在过去一年的谈判时间里，我们实际上减少了战斗行动并转入了消极防御。

这种状况造成了敌方在不停地使我方遭到人力和物质财富上的巨大损失，而他们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损失。

例如，仅仅最近一段时间敌方就破坏了朝鲜的所有发电站，并且空军活动猖狂，使电站无法恢复。这就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带来并继续带来巨大的损失。

敌机对平壤一个城市仅一昼夜（1952年7月11日至12日夜）的狂轰滥炸，就使和平居民的死伤高达6000多人。

敌方利用这种形势，提出了谈判中我方无法接受的要求。

当然，中国朋友拒绝接受这些条件。在这一问题上，我们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

祝您为了进步人类的幸福而健康长寿！

致深切的谢意！

您的金日成

1952年7月16日于平壤^①

金日成虽然表示“接受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但斯大林不会看不出，字里行间，金日成对中国人在战场上的表现是相当不满意的。

“在过去一年的谈判时间里，我们实际上减少了战斗行动并转入了消极防御”，这分明就是在告中国人的状，责备彭德怀长时间按兵不动

^① 引自沈志华挂在网上的《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解密文件》之《拉祖瓦耶夫转呈金日成对停战谈判看法致华西列夫斯基电》。

了，虽然用的是“我们”，但中朝联军的组成，朝鲜人充其量只占一成，且又是由中国人独立指挥，结果呢？“这种状况造成了敌方在不停地使我方遭到人力和物质财富上的巨大损失，而他们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损失。”

这不就等于说，中国人在过去的一年里打的全是败仗，让朝鲜在人力和物质上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而对手“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损失”。

所以金日成在这次与苏联大使谈话时还是坚持：“我们必须坚决力争尽快签订停战协定、实现停火和根据日内瓦公约交换所有战俘。这些要求会得到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支持，并使我们尽快从被动的局面中摆脱出来。”

1952年8月周恩来访苏，与斯大林举行了多次会谈。周恩来介绍了战场上的情况，认为“现在我们有足够的把握，可以进行更长时间的作战”。周恩来简要地介绍了在战俘问题上中朝之间存在的分歧，表达了毛泽东“必须坚持遣返全部战俘”的看法。

周恩来说：“朝鲜人以为继续打下去不利，因为每天的损失远远超过了在遣返上有争议的战俘人数，而停战对美国不利。毛泽东则认为，战争打下去对我们有利，因为这打乱了美国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

斯大林对毛泽东不惜一切代价打到底的决心给予了积极的肯定。

他说：“毛泽东同志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北朝鲜人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牺牲以外，并没有输掉任何东西。美国意识到，这场战争对他们是不利的，必须结束它，特别是当他们知道仍有苏联红军驻在中国以后。”他当然不会忘记恰到好处地向中国人的痛处掐上一把，“对美国必须强硬。中国同志必须了解，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中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

中途赶来的金日成、朴宪永和彭德怀参加了后期会谈。



5. 金城：最后一战

1953年4月26日，在数百名记者的注视下，朝鲜停战谈判双方的代表们走进了板门店，中断了6个月零18天的谈判重新恢复。

可是，有一个人却极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场面出现。

这个人就是孤独地坐在大韩民国总统府里，郁郁寡欢的李承晚。

虽然很多人形容李承晚政府是美国人的傀儡政府，可现在朝鲜战争打了将近3年，如果就这么收场，李承晚实在是心有不甘。为了祖国统一，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让李奇微的继任者克拉克将军和彭德怀、金日成无法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在李承晚的运作下，南朝鲜政府开始高叫“反对任何妥协”、“进军鸭绿江”、“大韩民国单独打下去”的口号。

同时，汉城、釜山出现了大规模的反对停战的“群众示威游行”。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南朝鲜政府派出的以白善焯为首的停战代表，在李承晚的授意下，竟单独退出了谈判，公然破坏和平的希望。

接下来，李承晚对停战谈判的强硬态度，远远超出了他的盟国首脑们的预判。

1953年6月17日深夜，因得知停战协定即将签订而受到强烈刺激的李承晚铤而走险，亲自跳将出来，做了一件更加疯狂的事情。他下令沧山、马山、釜山和尚武台的4个战俘营，以就地释放为名，“哗啦啦”打开牢门，将2.7万名朝鲜人民军战俘放了出去，并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编入南朝鲜国防军中。

非但如此，李承晚还上台发表讲话，这位年过古稀，头发银白的老总统像个武士一样热血愤张，一无所惧，公开叫嚣，为了祖国的统一大业：“要向鸭绿江进行一次全面的军事进攻，即使我们不得不单独作战，也在所不惜！”

他还公开表示，朝鲜半岛未能统一之前，大韩民国政府拒绝一切停战条款。

南朝鲜国民议会也拥护总统的决定，表决，“一致反对停战条款”。

李承晚导演的这一严重事件，立即引起了中朝方面的极大愤慨和

世界各国的谴责。不仅是他在战场上的对手的愤怒，同时也引起了他的盟友、参加“联合国军”的所有西方国家的愤怒。因为那些国家的士兵早就不想打了，厌战情绪弥漫兵营，官兵们一心只想着早一点回家与亲人团聚。

这场闹剧一出，各国舆论一致痛骂李承晚为“出卖和平的叛徒”、“不负责任的乖戾小人”。

连早已赋闲的丘吉尔也向李承晚提出抗议，“女王政府强烈谴责这种背叛盟友的行为”。

所有人都要求韩国人的靠山、美国政府对这一事件作出合理的解释和妥善的处理。

其实，美国人的反应是相当迅速的，就在李承晚断然采取释俘和上电台演讲等反对停战谈判的重大行动的同一天，艾森豪威尔总统就已急电李承晚：“你目前的命令，和根据这个命令所采取的行动，给联合国军司令造成了困境。这种局面如果继续下去，只会牺牲联合国军精锐部队用鲜血和勇敢为朝鲜赢得的一切。”

这个时候的李承晚，会听他的救命恩人和大靠山的话吗？

答案是“NO”。

6月19日，金日成与彭德怀联名致函李奇微的继任者、“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将军，严厉地质问“究竟联合国军司令部能否控制南朝鲜的政府和军队？如果不能，那么朝鲜停战究竟包不包括李承晚集团在内？如果不包括李承晚集团在内，则停战协定在南朝鲜的实施，有何保障？”

艾森豪威尔总统一方面四处解释，南朝鲜释放战俘与美国无关，一方面授意中情局，马上拟定针对李承晚的暗杀方案和推翻李承晚的政变计划。

而就在6月19日这同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和朱德等讨论朝鲜战争的形势。

谈到李承晚最近搞的一系列的“自选动作”，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说：“看来，帝国主义内部的争吵和分歧正在扩大，鉴于这种形势，我们必须在行动上有重大表示，使类似事件不致再度发生，并便于我方掌握主动。”

远在乎壤的彭德怀与毛泽东心有灵犀，不谋而合，就在毛泽东



说这番话的第二天，6月20日晚，彭德怀致电中南海：“根据目前情况，停战协定须推迟至月底较为有利，为加深敌人内部矛盾，拟再给李承晚伪军以沉重打击，再消灭伪军15000人。”

毛泽东次日即复电：“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方能作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

在这封电报的结尾，毛泽东还写下了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話，“马上就打，越早越好”。

毛泽东号准了韩国总统的脉，李老头儿的病，就得用这一味猛药治！

而且最高统帅与前线总司令的想法不谋而合——这一仗，专打狂妄得不知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重的南韩军！

此时朝鲜战场金城一带的南韩军防区，形成了一个突入志愿军战区的弓背形战线，如果将主战场设置在这里，从三面对南韩军进行攻击，获胜率极大。

6月21日，彭德怀在位于朝鲜桧仓山洞中的志愿军司令部里召开会议，会议决定：在金山以南的牙沈里到北汉江之间22公里地段同时发起进攻。以拉直金城以南战线，歼灭当面南韩军8个团另1个营为战役目的。要求7月上旬完成作战准备，7月10日发起总攻。

因为这次战役是在金城地区实施的，因此，彭德怀将此次战役命名为“金城战役”。

战役部署确定以后，该交给谁来实施呢？第3兵团司令员许世友，第9兵团司令员王建安，第20兵团司令员杨勇互不相让，大家都想打好这抗美援朝的最后一仗。

最后，志愿军副司令员杨得志说话了。

“这次任务，大家都不要争了，我看，由20兵团的杨勇来打这一仗最合适。”

杨得志点将杨勇的理由很简单，当时20兵团下辖21、54、60、67、68五个军，其中，60和67军在金城正面和南韩军对峙，其余的3个军只需稍微向前移动一下，就能迅速支援金城战场。

彭德怀采纳了杨得志的建议。

美军战史对杨勇是这样评价的，“长于攻坚，屡立战功”。

杨勇是1953年4月被派到朝鲜担任20兵团司令员的，上任才两个多月，志愿军总部领导就把金城反击战的重任交给了他。

杨勇马不停蹄赶回兵团司令部，他对赶来参加作战会议的军长师长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是一场大仗！必须仔细研究金城地区的地形地貌与守军特点。做到知己知彼后，再制订作战计划。”

此时的志愿军的武器装备经过持续不断的更新，早已是“乌枪换炮”。单单是杨勇的20兵团，就拥有火炮1100余门，平均每平方公里达到44.4门，坦克20辆。对当面南韩军形成了3：1的兵力优势和1.7：1的火力优势。

从战役上对敌形成火力优势，这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的地面战场上，是参战以来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而且这个火力密度，已经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德战场的标准。

这样的大排场，中国军人在此之前连想一想都觉得太过“奢侈”。

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司令洪学智这回得意洋洋地当了一回“大土豪”。他大大方方地调集了10个汽车团2000辆汽车，昼夜不停地向前线赶运了15000吨作战物资，炮弹囤集了70万发，炸药120吨。

后勤部门也一反一两年前那抠门的小家子气，轰轰烈烈地向参战部队发放各种物资，光是渡河器材，就发放了各式门桥47副。

而在板门店谈判桌上，自知理亏的美军首席谈判代表乔纳遭到了中朝代表训斥式的质问：“究竟‘联合国军’司令部能不能控制南朝鲜政府和军队？”

乔纳：“由于谈判所取得的结果，你方可以确信联合国军统帅部，包括南韩军在内，已准备履行停战协定的各项规定。”

中朝代表：“我问的是南朝鲜军队到底受不受联合国军司令部的节制。”

乔纳：“南韩军当然属于联合国军司令部。”

中朝代表：“对于已达成的停战协定的实施，你方能保证南朝鲜政府和军队不进行阻挠和破坏吗？”

乔纳：“我方保证韩国将不以任何方式阻挠停战协定条款的实施。”

中朝代表：“如果它进行阻挠和破坏怎么办？”

乔纳：“这个问题我刚刚已经回答过。”

中朝代表：“我问的是如果它进行阻挠和破坏怎么办。”

乔纳：“我向你保证：大韩民国进行任何破坏停战的侵略行为

时，联合国军将不予支持。”

堂堂美利坚合众国军队的代表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窝囊气？

当然，在中朝军队面前被迫低了一头的“山姆大叔”回到那边，又是另外一回事了。美国代表照例又对李承晚威胁了一通，又以保证向韩国提供长期经济援助为代价，得到了李总统对签署停战协定后不再阻挠的最后认可。

艾森豪威尔总算松了一口气，心想李老头弄出的麻烦事儿这下总算是过去了。却万万没料到，中国的彭德怀此时正和手下一帮如狼似虎的将士们打上门来了！

7月13日晚21时整，第20兵团前指一个简短的命令通过密如蜘蛛网的电话线路，传达到了高昂着炮口的炮兵阵地和潜伏在敌前的突击分队。

而后，二战后最惊天动地的炮火发出了震撼世界的轰鸣。串串相接的炮弹划破夜空飞向对面韩军阵地。尤其是苏联老大哥的“喀秋莎”火箭炮齐射场面，更是让观者瞠目。片刻之间，那天就红了半边。

金东明在《韩国战争史》里这样描绘了当时的场面：“21时，敌人的大炮突然开火，向全师（此处指的是韩国首都师——引者注）整条防线轰击，简直无法弄清有多少种、多少门，威力之大，若雷霆万钧，震天撼地，从而拉开了‘7·13’攻势的序幕战。”

中国军队的所有官兵，尤其是那些红军出身、身经百战的师长、军长、兵团司令、总部首长们，谁都没有见过这么壮观的炮火，谁都没有用这么阔气的炮火打过仗——那份阔气从来都是属于对手的——现在看到这样的场面，全都像孩子一样欢呼雀跃起来，好多人是一面跳着脚叫好，一面“哗哗”淌着泪。

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和第9兵团14军在经过猛烈的炮火准备之后，同时向当面之敌展开了更为猛烈的突击。

抗美援朝战争的压轴戏——金城反击战就如此漂亮地打响了。

西集团的203师仅用了12分钟时间，就完全占领了南韩军首都师的前沿阵地，控制了476.5高地。紧接着西集团主力开始向纵深发展进攻。

这时，从铁流疾进的主力中，分流出许多小箭头，悄然无声地消

失在黑沉沉的夜幕中，向着南韩军阵地纵深的指挥机关、炮兵阵地和要冲之路涌去。

轰响的大炮与轻武器的射击声仿佛成了撼人心魄的英雄交响乐，在如此雄浑壮丽的交响乐伴奏之下出现在国际大舞台上的中国军人，足以创造出任何人间奇迹！

一支13人组成的化装侦察兵支队，在师主力占领第一线阵地的同时，迅速穿过敌人的炮火封锁区，绕过公路口的雷场，向敌人纵深奔去。

他们的目标是韩军首都师第1团（白虎团）团部。沿途，他们抓了一个俘虏并机智地取得了敌人的通行口令，于是他们大摇大摆地通过了一道又一道哨卡。

过了勇进大桥，当离白虎团部约二三里时，突然前边一支正由南向北开进的车队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车队很长，看来是敌人的增援部队，一时半会儿过不完。

侦察排长杨育才果断发出命令：“冲过去！”

侦察兵们一跃而起，手榴弹飞出了手，“乒乒乓乓”地在汽车驾驶室、车厢里开了花。敌人顿时乱成一团，到处奔窜。

就因率领志愿军的一支侦察小分队完成了一次堪称世界军事史上经典战例的战斗，杨育才一举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大英雄。

几分钟后，冲过公路的侦察兵们在白杨树会合了，无一伤亡地继续向目标前进。

杨育才率侦察班一路冒雨涉险，巧妙地通过敌军几道岗卡，十分机智地进到白虎团团部驻地，发现该团部是由铁丝网围起来的，里面有两排整齐而讲究的木板房，院外的小山沟里，停放着大卡车和吉普车，敌军正慌忙地往车上搬东西，企图逃跑。借着灯光，杨育才发现敌军首都师副师长、机甲团团长等正在开会。

开会的是前来督战的副师长林益淳，争吵的是白虎团团长崔喜寅上校与机甲团团长陆根洙上校，为是否立刻向中国军队发起反击的事情，两位团长争论不休，吵得不可开交。

正在这时，一顿手榴弹飞进去，屋子里顿时浓烟滚滚。

紧跟着，十几支波波沙冲锋枪响了……

杨育才率侦察班突然勇猛地闯进会议室、警卫室，立即开枪射击，打得敌军措手不及，当场击毙敌机甲团团长，俘敌军事科长、榴

炮营副营长等。此时，乱作一团的敌军，四处逃窜，拼命挣扎，在前有枪口，后无退路的情况下，只好纷纷举手投降。

此战，侦察班共歼敌70余人，只有副师长林益淳^①、白虎团团长沙喜寅带着两个参谋落荒而逃，团部其他人员全部被歼，缴获团旗一面，打乱了该团的指挥体系。侦察班轻伤一人。战斗结束，他们押着俘虏，登上凯旋的征程。

南朝鲜首都师第1团是1946年1月南朝鲜首批组建的8个团之一，享有主力的美名，是首都师的王牌团；在“三八线”以北的襄阳守备战中，一战成名。李承晚总统亲授“虎头旗”，从此得名“白虎团”。但在金城战役二青洞一战中，被志愿军68军203师渗透迂回的一支侦察小分队打得威风扫地，虎头旗也落入志愿军手中，如今收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而白虎团也在金城战役中走进了坟墓。

为表彰杨育才及率领的侦察班的功绩，1953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给他记特等功，1954年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英雄”称号。侦察班荣立集体特等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杨育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同时授予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

战至7月27日，志愿军第20兵团基本上全歼南朝鲜首都师，给予第6师、第8师、第3师以毁灭性的打击，迅速突破南朝鲜军4个师防守的宽达25公里的坚固阵地，将战线拉直，将阵地前推了15公里，向“三八线”以南扩展阵地140多平方公里。

目睹此状的美联社记者罗伯特·吉布逊发出报道：

汉城讯美联社记者罗伯特·吉布逊报道：

攻击的部队通过在战场上的中国师向前推进，中国人的进攻是经过仔细的演习，很巧妙地进行的。首都师的副师长和一个团长在战斗中失踪了。许多美军顾问没能从这次残酷的战斗中回来。

韩国部队更是惊恐万状，狼狈不堪，丢弃了大量的武器和物资，一窝蜂似的向南溃逃。从金城通往华川的公路上，向南溃退的韩国军队，汽车压着尸体、坦克挡着汽车，乱成一团。

那些仓皇溃逃的韩国士兵，有的攀在坦克上，有的骑在大炮

^① 林益淳运气实在糟糕透顶，他逃脱后又撞进了志愿军204师一支侦察部队的手中，做了一名俘虏。

上，但是还有成千上万的人用那起了水泡的双脚一拐一拐地向南步行，到了精疲力竭的时候，在路旁的泥泞地里倒头就睡，顾不得倾盆大雨了。此时，如果共军有一队战斗轰炸机的话，他们就能够把公路上的这个长达数英里的地段变成一条血河。

金城战役历时15天，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志愿军第20兵团共计歼敌52783人，其中俘敌2836人，缴获飞机1架，坦克35辆，汽车231台，各种火炮245门和大量弹药等战利品，有力地促进了朝鲜停战的实现。

作战中，第20兵团伤亡23000余人。

就在中国方面积极备战，决心以飞速增长的军事实力迫使美国做出让步的时候，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突然驾鹤西去了。

苏联政策的重大改变不是在斯大林去世以后，而是在他中风昏迷的那一刻就立即开始了。

这一改变来得如此迫不及待是有背景的，斯大林晚年的对内和对外政策，使苏联处于一种极度紧张，甚至使党政军内的高层领导人自危的恐怖状态之中。这不仅表现在国际关系方面和国内社会生活方面，而且发生在斯大林身边，甚至连莫洛托夫和贝利亚这样长期追随斯大林左右的核心人物，也感到自己的地位和生命时时刻刻受到强烈的威胁。因此，一种不安、不满，甚至憎恨的情绪早已在苏联的权力中心酝酿成熟，人们迫不及待地企盼着可以自由呼吸的那一天能够早一些到来。

1953年3月1日斯大林突然中风，当克里姆林宫的掌权者们确认他们的伟大统帅已经不太可能清醒过来的时候，便于3月5日晚上，急不可耐地召开了一次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紧急联席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确定苏联党和国家新的领导班子，调整党和国家的组织机构，并任命重要部门的领导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决议重新任命的名单中，虽然已经丧失了意识，但仍在喘气儿的斯大林仍然被保留了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的职务，而且被排在第一位，但其他所有具有实际权力的职务，都已经被他看上去表情沉痛，依然忠心耿耿的追随者们三下五除二地解除了。

在斯大林弥留之际做出的这个决议，与其说是斯大林继承人之间



的斗争，还不如说是莫斯科欢呼雀跃地抛弃了奄奄一息的斯大林和他的路线，转而实行“新方针”的前奏。

无论出于什么目的，苏联新领导人都在积极地，甚至是争先恐后地推动一场对内对外政策的全面转变。自然，在这一切变化当中，首当其冲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对结束朝鲜战争的立场的转变。

任何一个苏联人也不会想到，斯大林去世后提出重新审视朝鲜战争问题的，竟然是过去事无巨细，无不仰斯大林鼻息办事的莫洛托夫。

据莫洛托夫回忆，当他被重新起用回到外交部后，首先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起草结束朝鲜战争的建议，因为“形势的发展趋势是，我们已经不再需要朝鲜人强加给我们的这场战争了”。

此外，贝利亚在结束朝鲜战争问题上也“表现出积极的姿态”。

但是，在作出这一涉及中国和朝鲜两个国家根本利益的重大决定之前，早习惯了做老大的苏联人，根本就没有想到是否应当事先征求一下中国和朝鲜同志的意见——哪怕是出于假惺惺的客气。

3月18日，莫洛托夫向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提交了他起草的关于朝鲜战争新政策的方案。方案认为：“以往有几次停战的好机会，都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现在到了必须立即停止这场战争的时候了。”

苏联新领导人集体通过了这一个方案，在随后分别致毛泽东和金日成的信函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苏联政府注意到前一时期朝鲜事件发展的全过程，全面研究了当前情况下朝鲜战争的问题。苏联政府由此得出结论，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继续执行迄今为止推行的路线，如果不对这一路线做一些符合当前政治特点和出自我们三国人民最深远利益的改变，那是不正确的。苏、中、朝三国人民关心世界和平的巩固，一直在寻找尽可能快地结束朝鲜战争的可行途径。”

在批评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性后，苏联政府强调指出：“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目前情况下，对朝鲜战争问题仅仅机械地执行过去一贯推行的路线，而不试图表现出一种主动精神，或者说，不利用敌方的主动精神，不按照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按照所有其他爱好和平人民的利益，找到使中国和朝鲜尽快脱离这场战争的出路，是完全错误的。”

周恩来于3月21日抵达莫斯科，既为吊唁斯大林，也是来同苏共

中央新领导班子商谈停战方案问题的。

苏联新领导人明确表示不同意把战争再进行下去，中方则坚持要美方从实际控制线退回到“三八线”以南，以及无条件遣返全部战俘以后才能停战。苏共新领导班子不同意，压中方做出让步，马上停战。而金日成则早就对停战望眼欲穿，当然举双手赞成。

两架马车合力一拉，中国也就被迫放弃了自己的意见。

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定签字，这场打了三年多的战争终于停了下来。

毛泽东后来心有不甘地说：“如果再打8个月，我们可以打垮他们的全部阵地。假如在这之后进行和谈，我们可以争取到更有利的条件。可是，这个时候斯大林逝世了，苏联同志不要打下去了，因为要解决他们内部的问题。金日成同志也不要打下去了。”

以上可见，朝鲜战争从始至终，都是苏联人在导演，何时打，何时停，也都是苏联人决定的。

第十八章

尾声：谁是胜利者

胜利者不需要解释

审视历史需要有穿透历史的眼光，何况历史演进的本身就能说明一切！

朝鲜战争的伟大意义与带给中国人的精神财富是不可衡量的！每一个真正的中华儿女都知道——我们获得的，远远超出了一个局部战争的意义。而要看清楚这一点，根本不需要什么高深的智力与知识，而只要有一点点的常识与良知！

说到朝鲜战争的得与失，中国人无疑有足够的理由感到骄傲。军事上看起来双方打了个平手，志愿军无法把美国人赶下太平洋，美军也无法突破中国人的重重堵截打到鸭绿江。

但全面考虑一下当时的实际情况，就可以得出结论：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规模，最先进的科学技术，陆军装备超一流，还拥有最强大的海空军，算得上是个名符其实的巨无霸。

而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年，工业极其落后，部队装备极差，开始时说不上有海空军，陆军装甲力量极弱，一个军的炮兵装备不如美军一个团；通讯、后勤、医疗等各方面的装备水平和美军相差更是天上地下。由于没有制空权，大部队白天无法行动，补给极为困难，美海军

在志愿军入朝后虽然没有大的行动，但其威胁却使得志愿军不得不将大批力量部署在东西海岸反登陆。志愿军最多时有79个作战师部署在朝鲜（尚不包括铁道兵和基建工程兵），其中53个师部署在东西海岸，防止美军再来一次“仁川登陆”。

在这么多不利的条件下，志愿军仍然能够把美军从鸭绿江边赶回“三八线”，使其蒙受“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并能牢牢守住“三八线”而不后退一步。虽然志愿军遭受过挫折，在入朝之初三战三捷以后有些仗打败了，但无论如何，他们在那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取得的战果是了不起的，堪称军事史上的奇迹！

朝鲜战争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影响尤其深远，在与世界超一流军队的较量中，解放军从正反两方面都学到了很多东西，人民空军也在战火中迅速成长壮大起来了。

抗美援朝打破了许多中国人心中的崇美恐美情绪，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望和地位——包括中国的敌人也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鸦片战争一百多年来，中国屡受列强欺凌，十来艘军舰，几万人就能让中国政府屈膝投降，割地赔款的悲剧，再也不可能发生了。苏联东欧等国家第一次对中国有了发自内心的尊重，西方国家虽然参与了对中国的制裁，和中国关系长期恶劣，但中国通过朝鲜战争赢得了尊严，成为以后双方发展真正平等关系的基础。

戴高乐曾对艾森豪威尔说：“与其等到中国强大得你不得不承认他，不如现在就承认他。”对于满清帝国和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华民国，这位享誉世界的法国领袖显然不会说这样的话。

1949年开国大典上，毛泽东说过一句惊天动地的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准确地说，毛泽东那时候表达的还仅仅是中国人民的一种理想，而真正实现这种理想，正是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

然而也必须冷静和理智地看到，这种“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仅仅停留在中国人的心理层面上。

所谓胜利，应当是指战争决策者确定的战略方针得以实现，而毛泽东显然没有实现他把美国军队赶出朝鲜半岛的战略方针。

当然，就中国出兵决策的最初动因——国际义务和国家安全——



而言，战争的最后结局也算是达到了预期目的。不过，这些目标早在1951年初的第三次战役取得胜利后，即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两年半以前，就已经实现了。

中方的兵力损失绝大部分发生在中国拒绝联合国停火议案、美军发起反攻之后。也就是说，由于第三次战役中国取得胜利之际，未能及时灵活地调整战略方针，而使战争延长，中国付出了三倍于前的人员代价……

在朝鲜劳动党内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固定的认识，正是因为彭德怀在第三次战役取得胜利，美军“大溃”之际突然下令停止追击，未能趁热打铁将美国人一举赶下太平洋，才造成了朝鲜半岛延续至今的分裂。

这仗打得不好，不怪咱朝鲜人没能耐，原因在彭德怀身上——中国反倒成了金日成的替罪羊。

对于新中国的统一大业来说，朝鲜战争的延长无疑起到了决定性的阻碍作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本来指日可待，第7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虽然对此有所延搁，但美国这时仍有意与台湾的蒋介石政权保持一段距离。如果及时停战，并按照联合国建议由英、美、苏、中四国会议讨论台湾问题，据当时联合国多数成员国的倾向性意见看，台湾问题的解决要比后来简单和有利得多。但在中国拒绝了联合国的建议后，情况发生了极大变化，不仅多数国家的立场转向不利于中国，美国政府也迅速加强了对蒋介石政权的全面援助。

特别是1952年3月22日由参谋长联席会议起草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28号文件，标志着美国对台政策的根本改变。这种政策性转变随着战争的拖延而愈加走向极端，随着战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两岸统一，成为遥遥无期的政治愿望。

从国际政治格局更为广阔的视野观察，人们发现，战争结束以后，世界并没有得到和平安宁。战争使美国对外政策更加深入地陷入了僵硬的冷战立场，其结果不仅让美国最终背上了蒋介石这个它曾经一再想摆脱的包袱，而且还迫使美国不断地加强军备，扩大其在经济和军事上所承担的义务，并且由于强化对华遏制方针，而迈出了通向越南战争的第一步。

与此同时，中国终于被牢牢地捆绑在本来是以美苏对抗为核心的冷战战车上。甚至由于毛泽东被战争激发出来的革命激情，中国比苏联更深地陷入了与美国敌对的旋涡之中，而无法自拔。

朝鲜战争结束后不久，中国的军事将领们就曾对这场战争中的经验和教训进行过讨论，其中不乏冷静，敢于直言的人。

在1957年5月15日审议《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总结》初稿时，彭德怀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历史进程证明中国出兵的决策是英明正确的，但也有不英明的时候，就是毛主席否定了关于及时停战的建议，结果使战争延长了两年半。”

当时的总参作战局副局长雷英夫也认为：“如果那时（雷注：第三次战役胜利以后）停下来，我们在军事上、政治上、外交上都是重大胜利。”

已经流行了半个多世纪的一种说法应当得到纠正。那就是所谓的“一位美国将军说过：朝鲜战争是美国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一个错误的对手，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这句话的确是当时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上将说的，但是他的原话并不是这个意思，他讲这句话是因为：当美国在一、二、三次战役中连遭失败时，恼羞成怒的麦克阿瑟提出要把战争扩大到中国，把轰炸范围扩大到天津、青岛、北京、沈阳，只有这样才能遏制共产党军事力量的不断补充壮大。但是他的意见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认为无论如何不能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因为中苏有同盟条约，苏联一参战就是世界大战。布莱德雷也持这种观点，所以他说这句话有一个被省略掉的重要前提：如果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就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对手，发动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他完全不是说朝鲜战争不该打，打错了，而是说如果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去是错误的。他的这个想法也是当时大多数美国政治家的观点。中国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把布莱德雷的这几句话诠释为美国自认为决策失误所以输给了中国，有后悔之意，是一厢情愿的误解，和布莱德雷的本意，相去甚远。

当然，倘若因此便认定朝鲜战争是中国人民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得落花流水，不得不收刀敛剑，金盆洗手，主动认输，那也只是一种提振民心士气的必要手段。我们的胜利只能算得上是一场惨胜……

不过，以中国当时的国力和美国军队能够打成那样一个结果，就如同中国足球队和巴西足球队在绿茵场上大战了120分钟，最终打成个平手，这难道不是中国人的胜利，而是巴西人的胜利？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聪明的美国人才为他们的子孙后代选择了“遗忘”。

美国人把朝鲜战争称为一场“被遗忘的战争”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战争打成这副样儿，也的确让他们感到很是难堪。半个多世纪以来，提起朝鲜这事，总让他们胸中难以涌荡起勃勃豪情。

他们有太多充分的理由选择遗忘，因为两百年来所有战争的胜利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了日、德那样强大的军事机器，并成为全世界救星的美国军队，自从开国伊始，还从来没有遭遇过这样的奇耻大辱。

朝鲜战争，最大的成功就在于中国军队挫败了以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强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进攻，把已经打到鸭绿江边的美国人赶回到“三八线”上，从而使近百年来始终遭受列强侵略欺凌的中国终于有了在军事上成功抗击列强的记录。它极大地提升了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使海内外华人扬眉吐气，从而也极大地提高了共产党的声誉，巩固了新政权的地位。

同时也使世界从此认识到，中国不再是那个任人欺凌的国家，中国已经成为任何人都不能忽视的力量，一个世界强国将崛起在东方。志愿军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洗去的是百年来蒙在整个中华民族身上的耻辱，捍卫的是整个民族的尊严，他们是真正的英雄好汉，是中华民族的光荣，理应得到子孙后代最崇高的敬意！

志愿军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吃苦耐劳的作风和高超的军事素质和指挥艺术，彻底改变了世人眼中中国军队的形象，赢得了敌人和朋友的尊敬。

志愿军的赫赫军威，新中国领导人在外国侵略势力面前绝不低头的骨气，是国家安全的有力保障，是国家外交的坚强后盾。多少想占中国便宜，看中国不顺眼的国家从此不得不三思而后行。

沈志华告诉笔者，2001年1月中旬，他在上海复旦大学组织召开了冷战史研究方面的学术会议。这是一次国际性的会议，俄中友协主席季塔连柯、韩国总统金大中的中国问题顾问朴斗福、北朝鲜驻华使馆官员、美国国务院的文化官员以及日本的汉学家等大批相关人士前来参加。

许多人还清楚地记得一位韩国学者用英语所做的滔滔不绝的发言，大意是：你们中国通过朝鲜一战而再次崛起，从此成为世界强国！

以好强斗狠闻名于世的韩国人说话的声音尤其洪亮激昂，传递出的意思也尤为复杂——请注意，在资本主义社会过着优裕生活的韩国学者，

可不是越洋过海跑来为曾经痛打过他前辈同胞的中国人歌功颂德的！

不过，想来也很平常，这根本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理论，乃是基本的经验判断而已。

美国著名军史家贝文·亚历山大在他的专著中有精辟论述：

当朝鲜战争最后停火时，美国最高军政领导人向美国人民传达了一个乐观的信息。他们带给人们的印象是：美国实际上赢得了胜利，因为它遏制了共产主义的发展势头。在很长时间内，美国人民整体上接受了这一看法，或者起码认为，这场战争最差也是打了一个平手。不管如何，美国人民对停止流血、战争没有升级为世界性冲突而感到欣慰。

但是在美国高层领导人的心灵深处和私下商讨中，却有一种深深的受挫感，这种情感因无法向公众透露而变得特别强烈。他们明白，本来1951年就可取得的和平却延至1953年才最后得到。他们知道两年间所受到的一切痛苦、牺牲和损失通通都是无谓的；1953年的最终停火线和1951年的几乎没有多大差别；1953年美国所接受的条件两年前也许就有可能达到。

这且不说，尽管美国公众很少有人了解真实情况，但美国领导人却心中有数，他们曾计划征服北朝鲜，使之与李承晚的南朝鲜合并，而这一计划却被红色中国挫败了！

1950年9月仁川登陆后，美军又入侵北朝鲜，其唯一原因便在于此。美国领导人知道，遭到失败后进行的战争实质上是一种没有目的战争，但公众却鲜有人知。

最令人感到沮丧的是，红色中国人用少得可怜的武器和令人发笑的原始补给系统，居然遏制住了拥有大量现代技术、先进工业和尖端武器的世界头号强国美国。^①

沃尔特·G·赫姆斯也在著作中坦率承认：“另一个在战争中提高了地位的国家是共产党中国。从中国人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所显示出来的强大攻势和防御能力中，美国及其盟国已经清楚地看出，共产党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可怕的敌人，它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那个

^① 引自（美）贝文·亚历山大《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软弱无能的国家了。”^①

叼着玉米芯烟斗，握着曲柄手杖，穿着佩戴五颗上将银星的开领衬衫，这是麦克阿瑟的经典形象。

一脸威严的表情，很少留下笑容，给人以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刚直烙印，这是彭德怀的标准形象。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麦帅在对日作战中的丰功伟绩，笔者前面已有介绍，而在中国上千名将帅中，能获得毛泽东赋诗以赠的，也唯有彭德怀一人——可知彭老总，绝非寻常之辈。

不过，一世英名的麦克阿瑟，也糊涂昏庸得可以，在他晚年出版，必然经过他亲自审定的《麦克阿瑟传》里，居然从头至尾地把自己在朝鲜战场上的头号对手——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错当成了林彪。

中国元帅彭德怀与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一个在北美洲，一个在亚洲，肤色不同、语言不同、经历不同、信仰不同，连穿着、口味也不同，但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却使他们走上了同一战场，成为沙场对手，进行了一场让全世界军事家瞠目以视的生死大决战。

这场世纪大较量的最终结果，是来自中国湖南的农家子弟彭德怀成为了胜利者。

在朝鲜战争结束以后的许多岁月里，全世界的军人提到“彭德怀”这三个字，莫不肃然起敬。

麦氏因三战皆墨，迭遭重挫，失去理智，强烈要求对中国发动一场包括使用原子弹在内的全面战争，结果被杜鲁门解除帅印，告老还乡。一世威名，从此风光不再，最后郁郁而终。

中国人民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反抗侵略的伟大壮举，创造了震撼世界的辉煌业绩，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永远载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丰绩永存！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全新的自己：自鸦片战争以来，在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历史上，只有新中国，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拒外来威胁于国门之外，遏侵略凶焰于初临

^① 引自美国军史家沃尔特·G.赫姆斯《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一书，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之时；只有新中国，第一次基本依靠自己的力量，卓有成效地维护了我们和平生存、和平建设与和平发展的权利；只有新中国，第一次出色地履行了对盟友乃至对世界和平的国际主义义务，鲜明地向朋友，向敌人，向世界，展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真真切切的现实存在：言必信，行必果；不抛弃，不放弃；敢承受，能担当！而以世界头号强国美国为首的列强们，也正是通过这场战争的较量，开始真正听懂了他们曾经听不懂的铿锵之声：

“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

“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世界头号强国同样也得到了“第一次”的体验——第一次“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画押；第一次面对战争结局享受“失望的痛苦”；第一次面对把企图削弱的对手给打强大了的尴尬处境；第一次在一个站起来的东方民族面前低下了高傲的头；……

新中国走向世界的真正起点，其实正是始于这场伟大的战争！

朋友，还记得那位当兵时在新兴里和志愿军血战，被冻掉了7个脚指头的必胜客老板约翰吗？他在请中国人民解放军前大校赴家宴时，发出了一腔令中国客人心灵震撼的感叹：

当年，我们的历史老师和军队长官这样告诉我们，一百多年来，中国军队经历过很多次与外国的战争，基本上都是一败涂地。所以，中国人最胆小怕事，一听洋枪洋炮就两腿发抖，一看到坚船利炮就赶紧跟对手谈和签约。所以，全世界都把中国人看成一个美丽而羸弱的女人，谁都能上她的床。但是，当彭德怀在停战协定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后，一切，都变得和过去不一样了。

（终）

雄赳赳
气昂昂
跨过鸭绿江
保和平
卫祖国
就是保家乡

ISBN 978-7-229-13086-2



9 787229 130862 >

定价：98.00元